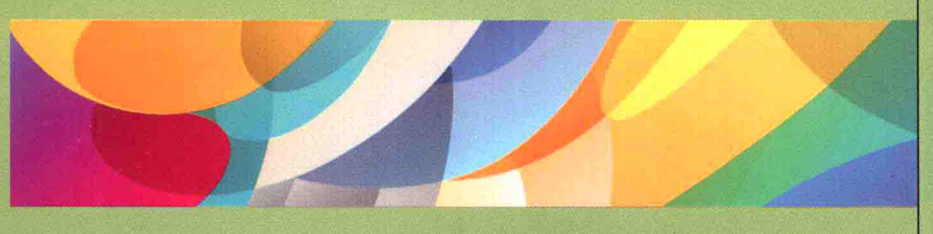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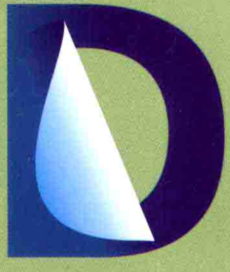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丛书
主编 / 周 翔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话语研究
多学科导论

第2版

图恩 · 梵 · 迪克(Teun A .van Dijk)◎主编
周翔◎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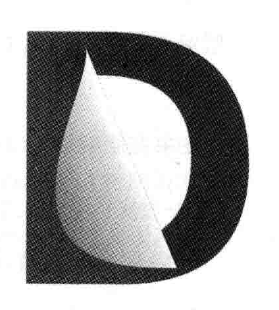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丛书
主编 / 周 翔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话语研究
多学科导论



第2版

图恩·梵·迪克(Teun A .van Dijk)◎主编

周翔◎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Discourse Studies: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2e, by Teun A. van Dijk.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2010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版贸核渝字（2015）第 0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 /（荷）梵・迪克（Van Dijk,T.A.）主编；周翔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6
书名原文：Discourse studies:a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ISBN 978-7-5624-9014-2

Ⅰ.①话… Ⅱ.①梵… ②周… Ⅲ.①话语语言学
Ⅳ.①H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6114号

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
HUAYU YANJIU:DUOXUEKE DAOLUN
（荷）图恩・梵・迪克 主编
周 翔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向文平 版式设计：向文平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25 字数：608 千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9014-2 定价：78.00 元

译者前言

初次接触到梵·迪克[1]的《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是2000年我在美国留学工作期间。因课程学习和研究项目需要，在文献数据库中查阅了一些资料后，确定了一个针对传播文本内容的研究方法书单，其中就有这本书，当时还是第一版（分上、下两册，共23章）。自己虽说以前是修辞学硕士出身，其实对源自于语言学的话语分析并不是十分了解和熟悉，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在国内高校时的整个大环境似乎对研究方法（无论是何种路径）并无太多概念，更不用说倡导学习应用了；当然，这也与自身的眼界狭隘有关。恰是因为自己缺乏基础，这本书也就成为开启我从诸多学科视角认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话语分析的启蒙书之一。

2013年6月，回国多年后的我再度应邀赴爱尔兰都柏林参加IAMCR（大众传媒研究国际协会）全球年会时，习惯性地前往SAGE等几大国际知名学术出版社的图书展示摊淘宝，惊喜地发现了《话语研究》第二版样书。大致浏览后，遂即购买了一本，尽管此书售价不菲。之所以如此毫不犹豫，首先是因为较之于第一版，第二版不但新增了第13、18章（有关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全新章节），而且其他与第一版标题相同的16章也全部经过重写，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示了自第一版问世以来话语研究在语言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的最新拓展。于是我萌生了将此书带回国的念头，一是作为自己的方法课教学参考，二是希望找到合适的机会将此书译介给国人。不曾想，借着我出版《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一书的机会，有幸与重庆大学出版社达成了由我主编出版一套“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丛书”的协议，《话语研究》很自然地就被列入到我提供给出版社的第一批书目中。因此，我特别感谢雷少波、林佳木和邹荣等几位策划编辑的专业眼光和倾力支持。

《话语研究》一书充分体现了梵·迪克对“话语研究”的个人理解和主张。他

1　国内语言学界也有人将其译为冯 · 戴伊克。按照国内通行的新华社译名手册，原译为范迪克，但因其享誉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这本书，最终确定与此书统一译名。

始终倾向于使用“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注意此处的复数和单词首写字母的大写）这一术语，而非一般人常用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他把话语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e）来对待（参见本书第1章），包含了诸多学科领域的学术活动，而不仅限于对文本和谈话的分析，也不只是人文社科领域诸多方法中的“一种”方法[1]。因此，“话语研究”在梵·迪克的理解中，同时指涉了分析方法、理论和应用。《话语研究》第二版更是强化了梵·迪克的这种理念，全面、集中地呈现了话语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乃至于整合的态势及其最新应用。这种研究的前沿性和跨学科性，既为读者带来一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话语分析的全新视角和宽阔视野，也给初学者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困难。

梵·迪克首先在开篇的第1章扼要概括了话语从认知和互动的微观层面到社会政治秩序的宏观层面的十大属性和多维面向，以此说明话语理解和产出过程中的层次化和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研究的层次性、情境性和变异性。主要来自（侧重言语交际和人际传播的）传播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30多位专家，包括诺曼·费尔克拉夫、鲁思·沃达克等这样的话语研究世界级领军学者，分别围绕话语的各种属性（特别是话语的互动、交流、意义和权力等属性）和维度撰写其余不同章节。显然，这些学者是以高度凝练式的写作方式，将如此繁复多样的多学科话语研究（包括理论、方法和应用）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2、9、10章将作为“人类参与者间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的话语，分别纳入到语法与话语的关系、朋友间的会话以及机构性互动交流的语境中来探讨，揭示出特定语境中独特的语言使用。比如，语言的不同语法形式如何与话语的使用动机紧密相关，透过既定语法形式的表达（诸如词汇选择、短语形式、零形回指、句法结构、句式等）和话轮转换如何传递出话语的社会性意义（包括说者与所指之间的社会/情感距离以及说者与听者之间的社会差异等），以及特定的语境又如何决定了特定的语言结构和语言特点，等等。所有这些分析都凸显出话语的情境性这一属性以及情境化在话语研究中的重要性。

第4、5章从话语的交流角度探讨叙事和论证这两种不同的语体，依然是重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从情景和语篇功能的角度分析叙事结构、语言的选择和组合模式，以及语言的使用者通过怎样的叙事和论证方式展开思想的表达和交流，并将语用论辩理论运用到对社论式广告的批判性结构分析中。

1 Van Dijk, T. A.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In Wodak, R., & Meyer, M.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age, 2009.

第3、6、8章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学和语用学的不同视角指向话语的社会意义属性。第3章“话语语义学”的两大核心议题——知识整合和信息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如何确保信息接收者领会信息传达者意在传达的意义。前者涉及话语中单独的命题如何整合在一起以反映说者的概念表征，并对听者产生最佳概念表征；而后者则事关说者和听者在互动、交流过程中信息的组织和分配过程。第6章“话语符号学”强调话语的多模态这一本质及其在话语研究发展新趋势中的显著性，指出多模态话语分析涉及话语、设计、产品和分布等四个分析层次，不但需要利用语言分析工具，还要从艺术设计、音乐等学科吸纳、借鉴视觉、听觉等分析工具和方法，进而分析各种符号资源和意义资源的生产、使用和理解。第8章“话语语用学”解释对话者如何在语句意义和说者意义之间搭建桥梁，将多种语用学理论（如意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礼貌理论等）运用于分析特定语境中的推论意义、协商意义和面子需求，并指出话语语用研究的四个兴趣领域，即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规则的文化差异、翻译中语用意义的对应问题、发展语用学中语用能力的发展路径以及话语语用学中媒体话语的分析。

第7章检视了从认知角度探讨话语的新近研究，在指出将语料库分析和计算语言学整合到话语处理的认知研究这一发展趋势的同时，引入多学科领域（如心理学、教育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的方法论分析话语的理解和产出过程，针对如何理解和生成多重层次（包括表层代码、文本基础、情境模式、类型和修辞结构，以及语用交际等）的话语建立推论和模式。

第11、12、14、17、18章利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来解析社会范畴的话语，以揭示话语中的各种权力和控制关系。其中，第17章系统论述了该理论的历史根源及当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包括批判语言学与社会符号学、费尔克拉夫的研究路径、社会认知研究、话语-历史路径、论证与修辞、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研究路径等），并指出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本质，以及研究者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共同使用的研究视角和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其余各章则通过对日常话语和媒体话语的案例分析，揭示语言实践来自于社会实践，与社会性别、种族、阶级、组织和职业等相关的各种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以及既有的意识形态如何在话语中得以再现或重构。

第13、15、16章通过分析文本样本在语用、语义、句法等层面上的语言选择，说明话语与认同、文化和政治相互构建的关系，揭示言说方式与人们在特定文化和政治环境下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阶级立场之间的关联，进而敏锐地理解其中的意识形态意义。研究视角和方法路径涉及人类学、跨文化社会心理学、语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可以说，全书在融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了话语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各章都鲜明地体现出话语研究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反映了话语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最新态势，涵盖了日常口语、书面话语、多媒体话语等各种话语形式，呈现出理论与方法的统一与交融，既是理论概念的高度概括，也是方法操作的具体展示。

从学习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各章都能在针对用于某一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主要原理（特别是某种研究路径的关键概念及其研究维度）进行阐释后，选用具体恰当的语料为范例进行细致分析，以实例分析来阐述和体现概念原理，并展示如何基于理论概念着手实施相关的话语分析，从而使读者不但能更好地理解理论，而且从中可以学习到如何运用既定理论框架针对不同语境中的话语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此一来，方法的操作运用内化于对理论概念的理解之中。对于具有极强质性特征的话语分析而言，这样一种学习范例的展示方式是极为难得且大有裨益的。另外，原书编著非常用心，考虑到跨学科、理论视角和方法的复杂性难以在一个个章节中阐述清楚，每一个章节都提供了重要研究文献，供读者索引和延伸阅读。

本书的跨学科性以及多种路径的理论与方法的融合同时也为翻译工作带来了难度。在此，我谨向我的学生翻译团队致以衷心的感谢，可以说，是集体的智慧和汗水成就了此译本的问世。具体分工如下：李静（第13、16章）、彭雨蒙（第2、3章）、顾雨霏（第8、14章）、刘欣（第7、12章）、戴淑进（第1、4章）、汪艳（第5、6章）、宋明玉（第9、10章）、李镓（第11章）诸君提供了初译稿，其余由我翻译，并对全书进行逐句校译（或重译），附加译者注。虽然我的小伙伴们在此翻译之旅走得相当艰辛，部分初稿几经修整而大变原貌，但在此旅程中，我倍感他们的全力以赴与自始至终的相伴相随，特别是李静和彭雨蒙两位，协助校译了部分章节并多方查证术语。2014年暑期奋战的这段记忆充满理解和温暖，深深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因为我与小伙伴们在痛并快乐中携手攀援着学术之崖。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我又触摸到了那种源于语言学出身却与传播学握手连心的欣然跳动。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辑向文平，其细心校读帮助我弥补了原稿中诸多疏漏之处。

周　翔

2015年春于珞珈山

前 言

1997 年，《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初版，十几年后，又到了发行第二版的时候。出于显而易见的现实原因，此次版本以单册形式发行，篇幅上有些许删减，虽不无遗憾，但也不可避免。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话语研究，历经 30 余年发展，先后在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研究、社会学、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传播研究和政治科学各学科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硕果，而后，自 90 年代末开始，话语研究在跨学科领域中的新进展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现在，已有好几所大学以此为主题开设专门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本领域专门的期刊也已有近十份。正如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认知科学这些同样以话语、文本、对话为特色的母学科经常举行各类学术会议一样，话语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领域的学者代表大会和专题座谈会也日渐频繁。截至 2010 年夏天，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知识网页数据库中，主题或标题中含有“话语”一词的文章数为 43 379 篇，其中明确以“话语分析”作为主题的有 3 210 篇。截至 2010 年 8 月 1 日，美国国会图书馆里话语分析的相关书目共含 5 319 本。换句话说，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话语分析还只是在社会科学和语言学领域中初步兴起但已颇具现代视野的一项研究内容，而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保守的学术体制仍未承认话语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院系的学科地位。

对文本和谈话的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仅局限于该领域的正统研究之中。新的理论、方法及各种描述性的、民族志的、实验性的、自动化的和正式的研究，以及尚未开掘的研究领域和相关子学科，就这些方面而言，无论是母学科领域，还是话语研究自身的新研究方向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本版中各修订过的章节以及新增章节都包含了这些新的发展和内容。

在这一领域的众多新发展趋势中，我们首先要提及话语的多模式本质。这一本

质现在得到普遍认可，并在至少十几本专题著作和上百篇基于“符号学”路径的文本和会话分析的文章中有所反映，其如此显著必要，应归于话语遍布于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体这一事实。现在，这种对话语的多模态本质的研究兴趣也已经扩展到了更广为人知的语言和传播的“具象”性质之上。

其次，同样是出于近乎所有的学术语境中都离不开计算机这一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的增多带来了量化精度，而在之前的研究中，对于频率的印象性评估曾一度盛行。

第三，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人工智能**目前也被经常性地用来展现**自然语言处理**这一快速发展领域中文本生产和理解的正式模拟仿真。当然，把**自然语言处理**称为**话语语言处理**或许更加恰如其分，因为这些研究极少局限于独立句子的仿真。

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也大获成功，其中，除了这些较为正式的研究方法之外，关于话语生产和理解的实验性研究也稳步增多，而在今天，这些研究越来越具备一种基于复杂的、多模式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学的基础。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人类是唯一一种不仅发展了自然语言，同时也能以复杂话语进行交际和传播（即不单单只是肢体语言和信号）的物种，而上述研究发展则关涉人类的生物构成要素和遗传基因。

显然，大部分这些新的子学科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人类传播和话语的诸多类型是如何伴随着语言的系统发展而发展，并且在不同文化中是如何适应日常生活环境变化的。尽管关于以往经验的对话和讲述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性并且因此深深融入我们的语言和传播体系（及其多模型扩展）中，但是很显然，比起报纸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以及法院或网站上的正式起诉文书等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要新近得多。

这些新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的交叉学科和子学科的诞生，也表现在这一个研究领域中研究主题多样性的不断增加，而之前的研究则始于对传播事件的组织、衔接（cohesion）与连贯（coherence）、话轮转换（turn taking）、不同类型的功能性运动、脑海中的故事剧本、叙事（narrative）和论证结构（argumentation stru ctures）等这样一些传统话题的分析。

而今，我们研究的内容之丰与视野之广早已大幅提升，这表明话语及其结构和功能特性已经从根本上融入到作为组织、社会团体和文化社区传播者及成员的语言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会话分析现在已经远不仅仅是对日常谈话的研究，理所当然

同样也用于检验制度化情境中的专业性互动和交谈，如新闻采访、政治访谈或其他一些类型。“认同（identity）”、“意识形态（ideology）”、“权力（power）”等概念现在也常见于社会和政治科学领域大量话语研究中，如性别和种族维度的话语表现研究等。除了这些针对不同社会情境下文本和谈话进行的大体上是描述性的研究之外，话语的应用性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第一和第二语言学习、素养和教育这类显明研究领域，而是同样开始关注自闭症儿童或者患有老年性痴呆症人群的话语，并在曾经只能通过辞典或简单的句子语法来提供帮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发出诊断器械。

因此，我们看到跨学科的话语研究在过去的十年间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的广度还是在理论、方法上的深度上均取得了发展。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著作、入门读物、手册、期刊的出版以及大学课程专业的开设、学术会议的召开，跨学科话语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在所有人文、社会和认知科学中，多种话语和会话分析中的方法运用也日渐普及。正如日常非正式的、组织的和制度化的交往和生活中的文本和会话承载着诸多不同的功能，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也是多种多样，许多研究应用也扩展到了临床领域。话语的定义也延伸到了多模式和具象传播，对认知层面的话语的探索也逐渐从大脑的神经心理研究入手。

话语不再仅仅指口头文本和谈话，同时也包含了情境本质，这一本质作为传播性事件的模型实际上也控制着话语。另外，情境本质的适用性问题也正在以多学科的范式展开研究。批判性话语研究的成功表明，文本和谈话在社会的权力生产和宰制以及异议的话语挑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话语研究在新的领域、理论、方法和主题上取得了诸多成功，但是，抛开古典修辞学近两个世纪的丰富积淀的事实，这一新兴的跨学科门类及它短短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与其母学科相比，依然年轻，依然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和内容需要探索。我们在话语的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及其重要应用领域的研究都才刚起步，我们几乎也还未弄清知识在话语的生产、管理和解读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反，话语在知识的社会文化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群体成员的谈话和文本可能受意识形态影响，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标准的方法来分析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或者具有特殊性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话语。毫无疑问，话语和社会阶级之间的重要关系也还有待深入细致的探究，这也是因为大部分的话语分析研究者并没有那种极度贫困的日常生活体验。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生产和理解话语，但是也仍然无法

自然地和人类进行对话，也不能够利用话语文本、谈话内容、证人证词或其他大部分的文本或谈话类型来进行新闻报道。确实，我们已经对诸多话语类型进行了总体组织、变化、风格、词汇集以及社会功能方面的系统分析，但是，仍有不同文化中的大量的话语类型有待系统地描述和分析。总之，话语研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继续关注有关话语的语言学、符号学、认知学、神经学以及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

这本关于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导论介绍了这一领域最前沿的理论、方法和数据，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学科入门、教学引导之余，本书的主要作用是希望激起那些刚刚步入这一有趣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学生和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兴趣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图恩·梵·迪克

2010年夏，巴塞罗那

简明目录

详细目录

导论：关于话语的研究 1

Introduction:The Study of Discourse

⊙ 图恩·梵·迪克

1.1 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典修辞学里关于公共话语中“如何表达好（*bene dicendi*）”的研究，但是，它在当代的出现却必须从1964—1974年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和齐头并进中寻找线索。

◎在民间故事的结构化研究之后，人类学拓展了其民族志研究，将一般的**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s）包括进来。

◎同样的，社会学也普遍转向对**互动**的细化分析，甚至是转向日常的**会话**，并因此希望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社会秩序至今都被用以解释群体、组织和机构的抽象**结构**。

◎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们认识到现实语言应用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孤立句子的语法分析，而是提倡应该关注**现实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认知性、社交性**情境化文本和谈话**的结构、策略和过程。

◎刚刚从行为主义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认知心理学，在对语言的生产与理解过程的研究中，重新探索心智和记忆，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和其他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角色，这与此同时也将其研究视野从句子扩展到了**话语**。

◎不久之后，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少有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强调，心理学家应该关注**话语**和**互动**以及它们“阐释”现实和心智的方式，而不是在实验室里，从许多其他现象中选择“行为”、态度或者属性来进行研究。

◎最后，传播学研究一直关注“信息”——比如，在大众媒介、政治传播、人际传播和健康传播中——的分析，以及信息生产和信息对接收者和总体社会的“效果”。早期的研究路径，比如**内容分析**，已经逐渐被更为细致的定性的话语和会话分析所补充。

今天，这些有关现实语言使用者运用现实语言的结构和策略的研究，所取得的最初独立且基本毫不相关的发展，逐渐交叉重叠并融合在一起。这些发展受到其母学科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了各自母学科的发展。所以，今天的话语研究融合了语言应用、口头互动、会话、文本、多模态信息（multimodal messages）和交流事件等内容。在方法论上，可以是从对抽象句子、对话或论证结构的正式分析入手，到认知过程或心理表征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对处于社会语境

下的谈话和互动的民族志考察（从其他诸多方法中）。

1.2 相关的交叉学科

这些并行的发展并不是自发地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见证了符号学发展的跨学科萌芽，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它把传统文学研究和艺术史中所没有的叙事、图片、电影、手势、绘画和其他非言语形式的“文本”和交流的融合分析引入进来。与此同时，符号学也影响了话语研究和传播学研究这些姊妹交叉学科，它强调文本和会话不仅仅只是书面或口头语言，而应该被放到它们所处的整个多模态的复杂性中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

尽管基本上所有研究语言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仅仅局限于表达（语音、句法、语汇）和后来的意义研究，但是语言的理念和社会学是相似的，它们都强调人类交流的第三个维度——**行动**（action）——所具有的基础相关性。言语行为（speech acts）、会话假设、礼貌、可索引性（indexicality）及其相关现象，因此也构成了诸多看似混杂多样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很快形成了后来的所谓的语用学（pragmatics）。这一新的、**以语境为导向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现在逐渐与话语研究、会话分析和社会语言学交叉重叠，甚至融合在一起。

在话语研究广阔领域的另一端，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当中，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更为正式的话语分析与认知心理学以及更为普遍的认知科学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在自动化翻译、人机互动、专家系统和其他程序的开发设计过程中，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则以及知识基本功能角色的实现，以实现话语的生产和理解。语料库语言学当前的研究旨趣和它在话语研究中的应用，可以卓有成效地融入文本或会话的自动化分析和仿真的发展当中。

最后，过去的这十年，涉及话语生产、话语理解的心理表征和过程的经验性研究也得到了【3】拓展和加深，通过神经科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对大脑神经基础结构的探索来实现。虽然这刚刚起步，要从用复杂的神经学来解释话语处理细节的角度中撤离也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在它的帮助下，将来至少能够弄清楚社会情境化话语、知识和互动之间的一些神秘关系。

经过近半个世纪，话语的跨学科研究日渐成熟，并且确立了自己作为一门充满生气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以及历史学、文学中的地位，甚至令人惊讶但毫不谦虚地说在政治科学中也占一席之地。为数众多的论文、专著、手册、介绍性书籍、专业期刊、年度国内和国际学者代表大会、新的大学课程项目都见证了其学术成就和无处不在的身影。

今天，语言应用的研究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词语、从句、句子或命题的抽象结构的分析，而是作为互动和人类传播的社会性、文化性和认知性这个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完整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在其原始母学科中的情况亦是如此。所以，尽管这种发展也强调不同物种间有着广泛的交流形式，但是人类在自然语言应用上独一无二的形式是以一致的、具有上下文情境的合适文本和会话呈现出来，也就毫不为奇了。

1.3 话语的属性

本书的许多章节对话语在结构、认知和社会等方面的属性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如果要对这些介绍再做一个介绍的话，新手们可能特别需要对文本和谈话的基本特性有个简要的了解。尽管要定义诸如社会、文化、思想和语言这些复杂概念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所有学科的发展也提供了理解这些现象的视野，但是话语研究的教师们还是常常会面对关于话语的准确定义的提问。为了在部分程度上回答这些提问，我们有必要在下面列举出话语的主要属性，这些属性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在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是研究的重点。

1. 作为社会互动的话语　也许从根本上说，话语被定义为**人类参与者间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扩展开来，也包括人和机器间的互动）。除了说话（书写或手势）和表意，参与到谈话或文本中的语言使用者也会完成许多社会行动，并且是在同时或交替协调他们行动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把它作为有意义的、适应社会的一种互动。正是话语的这种根本性的互动维度定义了人类社会的社会秩序基础。这一维度特别关注语用学和（各种各样的）会话分析。

2. 作为权力和宰制的话语　作为话语所诠释和再现的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方面，**权力和权力滥用**（宰制）可以定义为社会群体或组织对公共话语的优先**使用**和**控制**。公共话语的这一稀有的象征性权力资源属性特别注重更多地从批判的、社会政治的路径来研究话语，比如从性别、阶级、种族或性取向角度研究宰制问题。通过对语言使用者思想（知识、态度、意识形态、规范、价值、意图）的复杂控制，以及对建立在这些心理表征基础上的行动的间接控制，话语一方面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又是用来对抗权力、表达反抗和不满的有效工具。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话语在社会政治秩序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4】

3. 作为交流的话语　通过文本和谈话进行互动的诸多目标之一是在语言使用者之间展开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得以了解其他人的知识、意图、目标和情感，也得以了解我们是如何获取和积累社会所**分享**和**传播**知识的，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协同互动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维度定义的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秩序。互动和认知彼此互为假设，没有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话语研究也无从谈起。可惜的是，在目前的大部分研究中，认知和互动之间的割裂仍然是话语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分歧。话语的这个方面在认知心理学、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科学和传播学研究中都得到了特别的研究，研究的是信息对受众心智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4. 作为上下文情境化的话语　作为互动和传播的话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社会**情境**的一部分，是人们的一种生活体验。话语参与者会在他们的主观心理模式中反映出某一状况下对他们而言具有意义的因素（比如环境、参与者身份和关系、目的、当前行为和知识）。正是主观心理模式定义了语境，并促使语言使用者在当前传播情境中选择**合适**的文本或谈话。语用学特别关注对这些情境适切性的条件和规则的研究，相反，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则更多地关注社会阶级、性别、年龄和种族对话语的影响，而文体学（stylistics）则把重点放在不同情境下表达的变化（比如正式或非正

式语言的选用）。由于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情境，这就为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中话语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情境化话语研究也关注话语在同一或不同情况下和其他文本或谈话之间的跨情境关系。而如果这些情况是发生在多年以前，那这种**跨情境**分析也为话语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路径的基础。

5. 作为社会意指（social semiosis）过程的话语　文本和谈话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自然语言的使用，同时在多模态话语中，还更为广泛地借助听觉、视觉、手势和别的具有具象意义的社会行为这些其他的符号学系统来得以实现。在经过早期对文学、电影、舞蹈和其他形式的符号化表达、互动和传播的研究之后，这种多模态的话语研究在当今所谓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中尤为倡导。

6. 作为自然语言应用的话语　在之前几十年的研究中，话语研究的重点是其互动、认知、功用和符号属性以及话语的情境和结果，但是，话语研究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在于自然语言的应用。这种自然语言作为人类所独有的能力，用于创造和理解词汇、句子或其他基于规则的语言使用单位形成的符合文法、有意义的、恰当的组合。由此，也形成了话语研究中语言学及其姊妹学科的核心关联性。

7. 作为复杂、分层结构的话语　话语分析将话语定义为一种复杂的、层次化、多维度的客体或现象，这一客体或现象包含了自然语言的三个主要维度：**形式**或**表达**（听觉、视觉、词汇、短语等）、**意义**和**行动**。每一个层面或维度然后又从语音的、符号的、句法的、词汇的、语义的、图式的、语用的和互动的各种理论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除了关注句子、变换或移位等**局部结构**（local structures）（序列，sequences），话语分析同时也更为关注诸如会话的组织化图式（**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s）、新闻报道或学术论文等**整体结构**（global structures）。相应地，意义和行为也不仅仅只是在句子表现或表达出的命题或行为等局部层面上得到描述，同时也包括了整体性意义（**宏观结构**、话题、主旨）和整体性行动，比如在话语语法和会话分析的研究中。最后，根据这些层面上的内容，在诸多学科中，修辞学检验那些用以强化或弱化话语的局部意义的特殊结构或做法（比如重复、夸张、含蓄等）。在这里，重要的是各个不同层面和维度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研究的，而是相互间严密关联，也就是说，精心组织的话语表达具有深刻的意义，并表现为各种恰当的社会行为。

【5】

8. 序列和结构层次　文本和谈话的一个关键的结构特性是它们的**序列性**(sequentiality)。在前面所提及每一个层次上，话语的结构特点是根据话语生产和理解的时间先后顺序，由声音序列、词汇序列、句子序列、主题序列、动作或行为系列所组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层次上的话语单位及其解读通常都受到它之前话语单位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其随后的话语单位，并由此形成了文本和谈话的正式**衔接**以及语义和语用上的**连贯**。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局部的序列性可以用来组合形成复杂**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s）（比如在书面文本中，句子构成段落，段落构成小节、章节等，或者谈话中轮次的序列构成演讲的介绍或结论）中更高层次的话语单位。最后，除了话语结构的这些“水平”和“垂直”轴线，我们也可以区分出第三条轴线，在这条轴线上，其特征包含诸如前景化（foregrounding）、重点、焦点和亮点等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背景化

（backgrounding）[1] 和缓和语（mitigation）等概念。话语结构研究的这三个主要分野，可以被隐喻性地可视化或感知为一个立方体的构成，分别有左右、上下与前后等六个面。序列性、结构层次和理论基础是文本和谈话的特性，这些特性在话语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在话语语法和会话分析，以及叙事和论证研究中得以探讨。

9. 抽象结构与动态策略　我们可以对话语进行选择性或补充性的研究，可以把它当成包含抽象结构的对象，也可以把它当成事件的一个动态、变化的系列，或者当成具有策略的心智活动或者社会行为的执行。因此，句法结构或总体图式结构通常会从抽象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互动过程中的对话或者更为一般的谈话则会从更为动态的角度进行探讨，比如把它当成正在进行的行动或表现，就像通过认知路径对话语的生产和理解进行的研究一样，其情况也是如此。

10. 类别或类型　话语以不同的类别（type）、种类（sort）或类型（genre）[2] 呈现出来，比如日常对话、议会辩论、报纸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或者广告等。这些不同的类型也许一部分是以其典型的结构为特征，或者是以其**语域**（register）为特征，比如在日常讲故事中所包含的被动语态、第一人称代词或者是叙事结构，也或者是以社论或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论证结构为特征。然而，当话语类型被当作是**行动**类型的特征时，就像议会辩论这种情况一样，它更应该如上面所定义的一样，从**语境**参数的角度来进行定义。正是话语的这个方面才特别关注类型研究。

1.4　有关话语的研究

话语的这些基本属性，有一些是可以组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比如，在多学科的研究中，就议会演讲的语境限制以及这些限制对语义话题、含义或论证谬误所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这种研究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受众的政治主张以及政客借此操纵选民投票的方式。另一方面，别的研究可能只是从众多的研究选题中关注一些内容，比如参与者所共享的知识（“共同基础”）如何影响会话中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结构，或者不同文化间日常叙事的差异。

尽管早期的研究通常只是关注某一层次上文本或谈话（比如，会话或叙事性结构中语义的连贯、话轮转换）的结构性细节，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些结构通常都受到话语其他层次或维度的结构或局限性的影响，比如情境、社会交往和认知的结构和限制。因此，如果本书中的某个章节只是关注了话语的一个方面，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不能或者之前没有从一个更广泛、多层次或者在多学科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而仅仅只是因为一个独立的章节不能够顾及文本或谈话的所有相关层面。【6】

1.4.1　（不）研究什么？

话语研究的学生们（不仅仅是初学者）经常困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

1　有关前景化和背景化等概念的论述参见第 3 章。——译者注

2　国内也有译作“体裁”。——译者注

的写作中，应该选择特定话语类型的何种结构、层次、单位或属性进行研究。我们知道，话语类型的研究都取决于其情境，特别是取决于要达成的目标、时间上的可行性、可获得的相关资源、所要研究的行为或类型，同时也和研究者的兴趣、知识技能密切相关。学术性的话语研究亦是如此。显然，一个人不太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内对报纸上成百上千篇的新闻报道进行详尽的句法结构研究。这种目标太不现实，即便是这一研究意义重大。事实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即使只是对十几篇的新闻报道展开论证结构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闻报道并不像社论，不具有典型的论证图式特征。如果要进行代词的研究，我们需要话语中的语法和连贯的有关知识；要进行有关记忆和电视新闻的心理实验，我们需要一定的实验室资源和实验方法技能。除此之外，根据以往诸多专家学者几十年的研究经验表明，没有谁可以就前述的所有话语属性进行不管何种程度的研究，即使我们把研究限定在某一特定类型，比如新闻采访、学术论文或者电视广告。因此，在一个话语研究项目中，选择恰当的情境限制因素就显得相当必要。

正如前面简要提及的那样，话语分析研究变化多端，就像文本和谈话的结构、维度、属性以及它们在互动、传播和社会中的功能一样丰富多彩。话语研究项目可以有效地关注前面所提到的*话语结构*的某一个层次上的某一未知的研究细节，比如电视辩论中的干扰因素、电视报道中的功能性变换或者是教科书中的作业。项目研究方法上无非就是一些正式的、定性的或者定量的、描述性的、实验性的、民族志的以及 / 或者批判性的研究方法。而这毫无疑问是所有话语研究的核心。

除了这些*以话语为中心的研究*，更多*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会关注*社会或政治问题或议题*，比如在某一特定学校或学科中的青少年的学习问题、与日俱增的社会种族歧视问题，再或者就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如何操纵议会接受他介入伊拉克战争的行动，这些问题在为数众多的其他问题当中都可以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话语分析*并不像这一领域之外的人经常假定的那样，**它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门（交叉）学科**。因此，正如本书书名一样，我们更愿意把它说成是有关*话语研究*的学科。在话语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利用大量正式的、描述性的、民族志的、实验性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诚然，和社会科学中所应用的内容分析方法不同，话语分析方法通常倾向于使用定性分析方法，而不是定量分析方法。但是，对特定话语结构的定性描述也可以很好地结合定量的分析，就像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和大部分实验研究一样。【7】

1.5 结　语

尽管话语研究确实已日臻成熟，但仍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仍然有众多未知的文本或谈话的类型和属性有待探究，不同层次或维度的话语也有待勾连。要想通过编程使计算机可以和人类一样理解话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对于语言使用者的大脑如何能够实时处理富有意义的、恰当的文本和谈话的复杂结构，我们的理解也才刚刚开始。也还有数不胜数的社会问题，有待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彼此间也很少相互关注

对方的研究，即使是当一个更广泛的研究方向和自己的研究项目密切相关的时候，也是如此。尽管有着多学科的渊源，话语研究仍然承认很多的研究项目和团队通常只关注话语的一个属性，从而也就忽略了该属性在其他层面上的限制因素。总之，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话语研究也不过是人之所为，因此，也就表现出人类行为的所有局限性。

本书对话语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进行了多学科的介绍，这些成就在诸多出版物中都有所反映。然而，作为一本入门性书籍有其局限性，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亦有其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希望可以促使学生对本书中尚未提及的文本和会话的诸多属性和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8】

话语、语法和互动 2

Discourse,Grammar and Interaction

⊙ 苏珊娜·卡明　小野毅　里特瓦·劳里 [1]

本章探讨的是话语与语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种针对语法现象的、我们称之为“话语 – 功能路径（discourse-functional approach）”的分析方法。话语 – 功能语法学家把话语——这种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用来交流互动的口头、符号或书面的语言——看作是全世界各语言的语法的首要载体，它不仅明示了语法的用途，也是语法形成或“浮现”的源起（Hopper, 1998）。根据这一观点，语法生发于话语复现的模式之中，也正是这些模式不断打磨、形塑了语法。这种理解视角不同于所谓的“自治论（autonomist）”路径，后者认为语法是完全独立于其交流使用而存在的。

语法的话语 – 功能路径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描述性的：话语 – 功能路径属于传统的语法分类，通过检视在实际话语中存在的已被建构的实例（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分类，如短语、小句、句子以及词类［parts of speech］）来进行语法类别的确认，如若如此，这些类别是如何形成和运用的？例如，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可以是，（在已经确定了话语中表达“同样”内容的所有名词短语以及代词的情况下）这些形式分别存在于哪些语境之中？第二个目标【9】则是解释性的：为什么语言具有它们特定的资源？或者说，为什么一些具体的语法资源，例如某些代词，存在于多种或者所有的语言之中，并且为何某些特定的语法形式尤其具备某些特定的功能？由于上述这两方面的内容都能影响语言的普遍性及类型学，因而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①是否存在某些跨语言的范畴和模式，以及②如果存在，它们是不是由同种因素而激发的？譬如，主语位于宾语之前的情况更具普遍性，这或许是因为，主语通常具有与话语主题相关的指示对象，并且在许多语言中，与话题相关的信息一般都倾向于在小句中率先呈现出来。

致力于研究语法的话语语言学家已经逐渐把注意力聚焦于三种最常见的解释上。认知的解释强调的是互动者在生产和理解语言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认知资源及过程。社会或互动的解释强调的是使用语言（尤其是口语）时的互动情境的动态性，以及社会规范及 / 或文化准则、资源及互动的目的。最后一种解释，历时性的解释关注的是话语 – 功能对语法的制约和语法的演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通常也被称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当然，这三种解释来源并不是完全互斥的，事实上，它们以错综复杂的形式彼此关联着。话语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形式总存（formal repertoires）的多样性产生于不同的功能性压力的互动之中，而这些压力时而相互竞争——使得言语社区必须在两种或多种发

展完善的结果中作出“选择”——时而又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极具一般性甚至是普遍性的语言结构模式（参阅 Du Bois, 1985）。

2.1 历史回顾

秉持上述观点的语言学家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语言学派。那时，美国的“功能”语言学家开始从“形式”（自治论）语言学家中脱离出来。这一新语言学派极大地受到了早先的欧洲社会传播学研究路径的影响，尤其是经韩礼德（Halliday）拓展的弗斯（Firthian）理论（例如，参阅韩礼德 1967 和 1968 年的论文以及 1985 年的其他论著中总结的内容），以及在费尔巴斯（Firbas, 1966）、丹尼斯（Daneš, 1974）、马西修斯（Mathesius, 1975）等人提出的“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下发展起来的布拉格学派的传统。这些路径把语言的社会环境、交际功能，特别是话语中的信息管理看作是对语法的任何一种理解的核心。

在同一时期，一些美国的语言学家也就话语问题展开了探讨。德怀特·博林格（Dwight Bolinger）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 Bolinger, 1952; 1986; 1989），阐明了在实际运用中进行语义理解的重要性；并且，博林格是研究口头语言特征，尤其是语音语调方面的先驱。派克（Pike, 1954）、朗加克（Longacre, 1972）以及格兰姆斯（Grimes, 1975）的研究同样代表了一种视话语为语言理解的核心的语言学研究路径。

另一种对这一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悄然兴起的话语功能主义至关重要的研究路径是语言学的类型学派（typological school），这一思想受到格林伯格（Greenberg, 1966）等人初创成果的启发，他们的研究首次以人类语言的普遍属性为关注焦点。格林伯格及其后继者把对统计趋势的观察也纳入世界语言的研究范畴之中，此外还包括对不同的句法子系统特征之间关联性的考察——如名词短语和从句中的词序问题。这些新的观察需要系统地解释，而话语 – 功能路径则能较好地满足这一要求。【10】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还涌现出其他几种相关学科的流派，在随后的几年间，话语 – 功能的语法研究路径与这些流派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由于语法的话语 – 功能主义路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认知因素，因此心理语言学以及近期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一直是解决话语语法问题的重要依托。此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思想也构成了另外两种重要的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学科同样作出了贡献，在这里我们将不赘述。[2]

自 70 年代中期起，相关领域的学者逐步开始研究话语资料，在后文中我们将对有关话语和语法的奠基性研究展开探讨。我们尤将着重关注兴盛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话语 – 功能语言学（如，Chafe, 1980; Hopper and Thompson, 1980; 1984; Givón, 1983），此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实际话语语料的分析来着重挖掘语言结构与认知因素及话语因素之间的联系，并且通过观察定量的和分布的现象，以及观察语言变化的方式，表明了语言结构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该类研究同样开始揭示现实运用中的语言范畴的本质，而这一发现显然与先前结构数据（constructed data）所建立起来的语言范畴有所不同。我们还将探讨在一种被称为互动语言学（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的新的研究框架之下开展的研究（如，Ochs, Schegloff and Thopson, 1996; Selting and Couper-

Kuhlen, 2001），这一框架运用的是社会学领域所称的会话分析（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n, 1974），通过结合话语－功能语言学以及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来检视作为语言的基本形式的会话中的语法与互动。该领域的研究揭示了语法资源是如何被谈话者利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与互动因素协调整合的。其中的不少研究已经发现，语法的实际生产是由局部语境管理的，即实时发生，一秒接一秒地，且在言语活动中，其产出通常视与其他会话者的协商情况而定。此外，虽然由这一过程产生的语法模式在传统研究中或许常常会被认为是“不合语法规范”的，然而在实际的互动过程中，会话者却会主要采用这样的模式。因此，这一研究脉系始终致力于发掘现实交际情境中的语法资源的本质和运作方式，并重塑我们对语言分析基本范畴的理解。本框架视域下的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

【11】

2.2 方法论与数据

正如前文所述，话语－功能语言学家的基本思想是，在自然的情境中运用语言来交流，这对于语言组织来说是根本性的。就方法论而言，作为描述的客体以及解释的源头，语法在话语中的首要地位对话语语法学家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不同于“自治论”语法学家，在过去的30年中，话语语法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射在自然发生的语言材料之上，而非人为构造的例子。而且一个增长趋势是，话语－功能语言学家已经尽可能尝试着把话语发生的语境纳入研究的数据库中，这些语境不仅包括语言的语境，还包括人种的以及语言外的各种语境，也就是既涵盖了其社会的又涵盖了其物理的方面。这是因为语境往往可以体察出与此情此地相关的功能性压力，而这些恰恰是仅从语言信号本身无法探测得到的。意识到语境在形塑语言结构方面的重要性，学者对“语境”的本质展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把它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还有不少话语语言学家也逐渐取得共识，认为我们必须看到话语及其语境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而绝非仅仅只是一种单向过程这么简单。

另一随之出现的话语－功能研究视角与文本频率的问题有关。诸多话语语法学家认为，就特定的语法构造而言，文本频率对于理解话语的动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那些最可能影响交流者的功能性压力同样也最可能影响语言形式；按杜波伊斯（Du Bois, 1985）的话来说，“说者言之最多，恰是语法编码之最佳（grammars code best what speakers do most）”，这一观点为语法的话语路径的方法论带来了两方面重要的影响。首先，许多话语语法学家已开始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并且格外关注特定的语法形式与语言语境及非语言环境等方面之间的统计相关性。[3] 其次，诸多话语语法学家在近期开始越来越专注于语言的形式，在世界各地日常“互动谈话”中，语言使用者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注在语言的形式上。其他的话语类型和话语风格，即使产生于不同的功能性限制和压力之下，却仍然被看作是相互关联的，但互动中的谈话，作为一种解释语言结构和变动的源头，却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由诸多研究者对语言研究最终目的的共识所决定的，那就是力图理解最基础的语言行为——口头语言。

【12】

由于强调自然的语料和全面的语境，话语语言学家采用了日新月异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

首先，他们通过录音和转录文本的方式，一举从分析书面话语转而实现了对口头话语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日臻成熟的录音设备和日益丰富的转录系统来实现这一过程（Edwards and Lampert, 1993）。目前，得益于录像机的使用，这一研究方法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因为录像机既可以提供言谈语境也可以展示非语言环境。并且，利用原始录音或录像来直接分析弥补了主要依据转录文本进行分析的缺憾，因为转录文本不论有多翔实，语境中交谈者的信息总是无可避免地有所损失。新兴的多媒体技术例如声音和影像的数字化也有所助益：数字化的音频和视频资料在不损失声画信号的情况下可以反复倒退播放，并且储存在数据库中，可依任何顺序使用和存取，还可便捷地定位查找、使用录音录像中的特定片段。

上述因素决定了话语－功能模式相关研究中独一无二的方法论特性：强调细致记录自然语料以及重视与语法模式有关的量化及分布的信息。

2.3 分析范畴的本质

话语－功能语言学区别于自治论语言学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对待基本分析范畴的方式。话语－功能语言学家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语法范畴，即语法范畴的结构在于一个既定的项目要么属于某个范畴，要么被排除在外，且决定是上述哪一种情况的判别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参阅 Givón, 1989，该作者不支持此观点的论断）。相反，他们提出了范畴结构的一系列其他模型，并用到了包括层级（hierarchies）[1]、标度（scales）、连续体（continua）[2]以及原型（prototypes）等在内的一系列术语。所有这些提法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认为范畴的归属是个程度问题。【13】

最简单的非亚里士多德范畴类型是把范畴的划定视为标度，在标度中，不同的程度依一个单一维度来测定位置。例如，吉冯（Givón, 1983）提出，“话题（topic）”这个范畴是标度。他认为话题性本身就是连续的（话语中某一特殊之处的一个所指或许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话题性），但是任一既定的语言将根据其语言形式的细目表来划分这段连续体。譬如，如图 2.1 所示，一个话题连续体由语言中形成鲜明对比的“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3]、非重读代词、重读代词以及完整的名词短语分成了四个部分。由图可知，音韵上“偏轻”的语料被划分至标度左端的一边，而音韵上“偏重”的语料则属于靠右边的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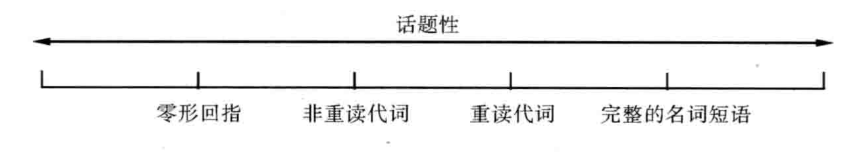


图 2.1 一个标度范畴（a scalar category）

对于某些语言学范畴的类型，“标量”模型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因为这些语言范畴被认为会依据多个维度而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罗施（Rosch, 1978）提出了另一种原型结构（prototype

1 即范畴存在层级结构，例如上位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下属范畴。——译者注

2 即范畴之间不是离散的，而是一个连续体的关系。——译者注

3 又称为“零回指”，是指话语结构中，在语义层面上有一个与上文出现的某个事物指称相同的所指对象，但从语法上看该所指对象没有词语表达形式，具体可参阅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中国语文，1987。——译者注

structure）[1] 作为替代性模型，在此模型中，一个范畴的“中心”成员具有一个相关特征集，而非中心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缺乏多少种特征以及缺少哪些特征的具体情况而有多种形式的偏离。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我们将介绍这一类型的两种分析，并简要讨论发展中的语言流变，因为这也构成了语法范畴不属于亚里士多德式分类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们还将探讨近期这种基于会话的、愈加关照语言范畴现实本质的话语 – 功能语言学的相关内容。

2.3.1 及物性

在传统观念中，亚里士多德式分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及物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分。霍珀和汤普森于 1980 年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Hopper and Thompson, 1980），其中就详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传统语法中，“及物的”和“非及物的”动词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其后是否可以接宾语，然而，这种区分应该被细化为不同的方面，以阐明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和多个语法特征之间的各种跨语言相关性。霍珀和汤普森列举了与施事者(agent)(如意愿性[volitionality])、动词(如具备结点的有界性[telicity])、受事(patient)(如受事性［affectedness］）以及子句的整体论元结构等问题相关的诸多因素。他们以一段话语示例显示了这些因素（总体来看具有“话语及物性”的特点）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在汤加语中，当宾语完全受到动词动作的影响时，有一种标注“及物性”的记号，'*i*，用于标明是完成体(perfective aspect)：[4]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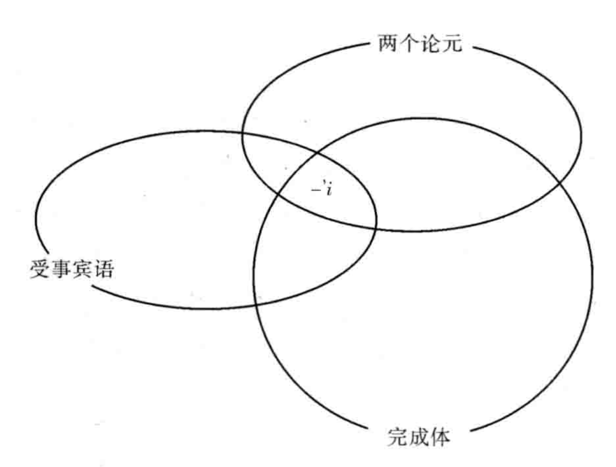


图 2.2　作为原型范畴的及物性

（1）（a）Na'etaipe'e he tangata'a e topi.
PAST type ERG DEF man ABS DEF letter
（PAST 打 ERG DEF 男人 ABS DEF 信）
'The man is typing the letter.'（这个男人正在打这封信。）

（b）Na'e tanu–'i 'e he tangata'a e ika.
PAST bury–TRANS ERG DEF man ABS DEF fish

1 又译为“典型结构”，是指同一范畴中的成员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具体区分为典型成员与非典型成员。罗施列举了“鸟”这个范畴，“知更鸟”是典型成员，而“企鹅”是非典型成员。——译者注

PAST 埋 -TRANS ERG DEF 男人 ABS DEF 鱼
'The man buried the fish.'（这个男人把鱼埋了起来。）

这个例子显示了各种及物体的聚合原则上是相互独立的。图 2.2 说明了这种聚合，即图示中圆圈的非重叠部分表明这三种因素可以通过单独的语言手段（如在许多语言中那样）进行编码，而图中居中的重叠部分则表示这些因素也常常出现聚合的情况。

世界语言的语言形式具有多功能性，这种特性为形成一种话语及物性的共同观念提供了支持，理解这点使我们容易了解到，即使一种语言并不具备汤加语的那种多功能形式，其话语中的子句仍可或多或少地被认为具备这种"话语 - 及物性"。比如，甚至是在英语中，一个含有两个论元（arguments）和一个完全受影响的宾语的完成体子句，相比于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子句，显得"更为及物"。霍珀和汤普森进一步说明了涵盖多种与高及物性相关的特征的子句，具备一种在叙事中标注出"突显处"或事件线的常见话语功能，但是，及物特征不显著的子句的事件线就相较不明显，譬如，描述性文章正是如此。对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的探讨，构成了不同的及物性参数（transitivity parameters）之间的类型学联系的"话语基础"。[5] 【15】

2.3.2 词汇类型

另一组属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语法范畴是一系列词类或词典中所谓的"词类"。霍珀和汤普森（Hopper and Thompson,1984）提出了一种介于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词类对比的原型观点。他们指出，之所以区分这两种词汇类型，主要是由名词和动词的功能所决定的：一方面，言说者需要确立时间稳定的所指并通过话语寻踪定位所指，该功能主要与"名词"相关联；而另一方面，言说者还需要推进话语中事件在时间上的发展，"动词"则主要承载了这一功能。他们还认为，与这两种范畴有关的形态属性（morphological properties）（例如名词数量和名词类别、动词的时态和体）也取决于这些相异的话语功能。因此，当我们把名词和动词与话语功能联系起来考察，而非仅从"中心的"或者"原型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时候，这些各式各样的形态标记便会相应减少。

譬如，下面是从一段在废纸回收再造厂工作的对话中截取的例子（mayate 是墨西哥西班牙语中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称呼）。思考该例子中"纸（paper）"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情形。[6]

（2）21 G: .. But the mayate,（但是那个美国黑人，）
22 ... apparently,（显然，）
23 .. it seems like he's,（看起来他曾经，）
24 ... worked in a —（工作在—）
→25 D: ... paper company before.（废纸厂。）
26 G: Yeah.（是啊。）
27 He knows about paper.（他很了解纸。）

第 25 行的"纸"这个词是非指称性的：语段中没有提及具体的纸。在 G 的回复中提到的纸并不是一个代词（他并没有说"他很了解它（it）"，即使这两个名词无疑指向的是同种类型：一般 【16】

性的纸），这说明“纸”并没有在话语中被用于定位一个具有时间稳定的所指。所以，与名词相关联的标准形态属性和句法属性在这个文本中无法体现：名词不能用冠词或其他修饰语来修饰，也无法被代词化。

动词也有类似之处。下面是一则和语段（2）来源相同的一段节选文本，注意第 4 行的**增加存货**（stock boost）这个动词：

（3）1　G: .. Can you imagine man?（你能想象吗，伙计？）
　　2　　...They hired summer help（他们雇用了夏季帮手）
　　3　　.. They're paying seven fifty （他们支付 7 元 50 美分）
→4　　to stock boost.（来增加存货）

这是一个目的从句，所以它并不指向一个被断言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因此，它只能以“分拆式”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不存在动词的标准形态和句法上的陷阱，比如时态标记、个人同意和主语表达。

霍珀和汤普森提出的术语“范畴性（categoriality）”，指的是功能上具有原型特质并具备一种范畴的完整的形态和句法“象征符号”。例如，目的从句中的非指称性的名词或动词可以被认为是低范畴性的。学者认为名词和动词这两个范畴更适合用一种原型结构来描述，而非一种标量，因为有不同方式可以让一种表述偏离每个范畴的中心功能。例如，当一个动词指向一个非实际的情形时，它有可能无法推进事件线的发展，如上文中的目的从句中便是如此；或者这个动词指向的是一种状态而非一个事件，又或者通过预设而非确切断言的方式。这些都是范畴性较低的不同方式，而且它们无法仅被置于一个单独的维度中来加以考察。

2.3.3　日常谈话中的范畴

正如上文讨论所示，话语 - 功能语言学家引用话语变异和类型学领域的证据，对“语法范畴”的本质发起挑战，后者虽然是语法研究传统路径的核心，但仅仅只是基于设想，而未经语言的实际应用所检验。这一研究思路在较近一时期扩展到了对人类语言的首要形式即日常交谈的探索。小野和汤普森（Ono and Thompson, 2009）由此已发现，日语形容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的公式化表达，恩格尔布雷森（Englebretson, 2003; 2008）也证明了在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之下所划定的印尼语群的语法范畴，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与标准的类型大相径庭。[7] 同样的，陶（Tao, 2003）已经表明，在日常会话中相对常用的英语动词 remember（**记得**）和 forget（**忘却**）的论元结构与学者之前的认识有所不同。过去，remember 被认为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既可以接一个名词词组（如，I remember that story，**我记得那个故事**）、一个从句（如，I remember that I turned off the lights，**我记得我关了灯**），也可以是一个非限定的形式，比如以一个动名词（I remember doing that，**我记得我做了**）作为其宾语。但是，陶发现，在实际使用中，remember 和 forget 这两个词经常以不接宾语的形式出现（见 The chapter is becoming two chapters. Remember？**此章变成了两章，记得吗？**：Tao, 2003: 87）。并且，不同于前人的观点，在实际口语中，这两个动词都极不可能接从句作为其宾语。

【17】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考察语词的实际用途可以大大充实和丰富我们对实际语言内容的语法行为以及总体范畴的理解。此外，这些研究还反映出日常会话中的语法范畴将与传统的观念有所不同，部分原因恰恰是出于人类语言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现象这一特性。任何一份现存的话语材料都是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的暂时性结果，本章后文将要考察一些这样的具体例子。这便要求话语功能研究者应在交际、互动中以更加创新的方式来对语法进行概念化，霍珀（Hopper，1988；1998）和杜波伊斯（DuBois, 2003）已开始着手在这方面进行尝试。

2.4 解释性主题

在话语－功能研究领域，有诸多十分重要且很可能反复出现的解释性主题，或者说是功能维度。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简要概述其中最为核心的主题。对于这些主题，我们将分别列举出相应的语法现象作为典型示例。

在针对话语和语法的众多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与“信息流”这一主题相关，它关涉信息在从句内和从句之间的分布方式的问题。

虽然信息流可被视为主要与一席话的话语语境相关，但是其他类型的语境因素也不无关系。在本章，我们也会探讨言说者对一个所指或一个命题的态度，以及与互动有关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涉及说者和听者，还与他们之间实时互动相关。对这些因素的研究是互动语言学的一个重中之重，由此出现了大量较为集中的相关研究（Couper-Kuhlen and Selting, 1996; Ochs, Schegloff and Thompson, 1996; Selting and Couper-Kuhlen, 2001; Ford, Fox and Thompson, 2002a; 2002b; Couper−Kuhlen and Ford, 2004）。【18】

最后，对于语言学的话语－功能路径的未来发展走向，我们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了一些优秀的研究问题。

2.5 信息流

“信息流”或许是最为人所知，也是被话语－功能语法家们最广为利用的概念化工具，且在话语－功能语言学发展的早期，是它催生了焦点集中、颇具影响的相关研究。这一系列研究现象或多或少地以各种名目出现在各类文献之中，我们这里采用的术语是由切夫（Chafe, 1994）提出的，但也有一些其他广泛使用的叫法，包括“交际动态性（communicative dynamism）”、“已知性（giveness）”、“话题性（topicality）”、“主位性（thematicity）”以及“焦点（focus）”。“信息流”所暗含的观点为，语言的一项最主要的功能便是将信息从说者传递给听者。无论是从说者还是听者的角度出发，信息都会因其达意或处理的难易程度的不一而有所不同。对于说者而言，我们可以从有意或无意，或者说（以切夫的术语来表述）是“意识”焦点的角度，对信息作出区分。而从听者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有语境和先前的话语作为参考，我们可以根据是否可预期或预测这一点对信息加以区别（Prince, 1981; Givón, 1983）。我们认为那些相对容易理解或可预期的信息仅需较少的工作量便可对其编码。反之，那些不太容易理解或出乎意料的信息便需要以专门的、

有分量的或“显著的”语言学机制来进行处理。此外，可预测性或许会因为语言学编码设备的差别而产生于不同的方面（正如下文展示的代词和定冠词之间的差异）。

信息流通常被纳入认知范畴，是基于说者和听者在话语生产和消费中的动态心理状态来理解的。说者决定了言语内容，因此话语语法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说者的心理状态；而另一方面，由于说者在生产话语时会顾及听者的需求（在话语研究的历史、人类观察的结果以及常人的期待之中，都已认同了这一观点），因而听者的心理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听者心理状态中的说者模式——也必须被纳入考量范围。图 2.3 展示了这种相互关系。

这个图的迷惑性在于它似乎展现了说者头脑中、语言信号中、听者头脑中存在的信息是“同一”信息，此外，说者对听者的表征也是确切的，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然而，这张图或许与互动者在交流上的通俗模式相呼应。因此，此图展示的是一种相关的视野，也是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最为接近的模式而采用的、便于理解的观点。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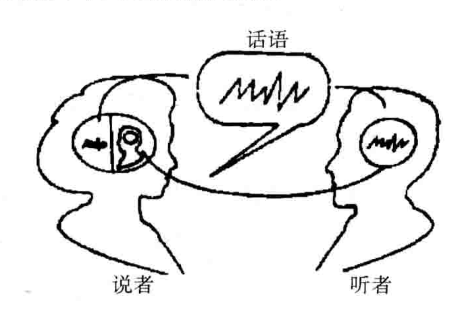


图 2.3　话语信息的一个简化模式

由于很难接入说者和听者在自然情境中所构建的心理表征，话语 - 功能语言学家往往根据话语自身的特征来操作化这些表征的方方面面。例如，“不易理解 / 预测”可能被操作化为“近期未被提及”或“在文本中间隔甚远”。替代性做法是，研究者可以通过利用实验手段来处理说者的表征。例如，他们可以为受试者放映一部电影并要求他们描述剧情，也就是通过提供材料来实现语言表述这一过程，就像切夫（Chafe, 1980）和汤姆林（Tomlin, 1987）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

研究已引证了诸多与甚为广泛的语法现象相关的信息流因素，或许最根本的因素是那些与单个语言单位中的信息数量（尤其是涉及名词短语形式时）及其排列（如根据要素排序及它们在论元结构中的作用来排列）等相关的问题。下面的章节探讨的是涉及名词短语形式、语序（constituent order）和论元结构的信息流；若想了解更多其他的话题，见本章末的推荐阅读书目。

2.5.1　名词短语的形式

话语 - 功能语言学家们研究得更为透彻的一个领域是选择问题——即在不同的指代形式如全名词短语、代词和“零形回指”（简单省略）之间作出选择——它们历来被认为具有“可选择的”特征，以及冠词的（例如英语中的 the 和 a）使用和其他限定词的使用问题。在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表明，指代形式的明确程度与说者所判定的所指在听者头脑中的可理解程度之间有关联（Chafe, 1976; 1987; 1994）。全名词短语的使用与说者认为的在听者意识里并不活跃的所

指有关，而代词则与那些在听者意识中活跃的概念有关。另一方面，冠词关涉的是由切夫（Chafe, 1976）所描述的“可辨识性”（identifiability）这么一种信息状态因素：说者假定听者能够基于话语中先前提到的内容或源自其他渠道的知识来辨识某个所指。具有明确标识的 the 与可辨识的所指相关，而不定标识的 a 则与不可辨识的所指有关。【20】

思考以下例子，里面囊括了我们先前列举过的例（2）与例（3）：

（4）1 G: ...Can you imagine man?（你能想象吗？）
2 ...They hired summer help（他们雇用了夏季帮手）
3 ..They're paying seven fifty（他们支付 7 元 50 美分）
4 to stock boost.（来增加存货。）
5 three machines man.（三个机械工。）
6 ...Two dudes.（两个伙计。）
7 ..A mayate,（一个美国黑人，）
8 ...and a white dude.（和一个白人伙计。）
9 D: Nobody in finishing?（没有人快做完了吗？）
10 ...Just two guys they hired?（他们只雇用了两个人？）
11 G: ...Uh,（啊，）
12 ...and one more,（还有一个，）
13 ..on the tables.（在桌子上。）
14 ...Uh,（呃，）
15 ...Zamorra's un .. brother-in-law.（扎莫拉的姐夫。）
16 D: ..Is that right?（是那样吗？）
17 G: ...Yeah.（是的。）
18 D: ...Wow.（哇。）
19 G: ...So they got three new guys.（所以他们有三个新伙计。）
20 ...But they're summer help.（但是他们是夏季帮手。）
21 ...But the mayate,（但那个美国黑人，）
22 ...apparently,（显然，）
23 ..it seems like he's,（看起来他曾经，）
24 ...worked in a -（工作在——）
25 D: ...paper company before.（废纸场。）
26 G: Yeah.（是啊。）
27 He knows about paper.（他很了解纸。）

在这个例子中，说者 G 试图给说者 D 确立起一个所指。对话中第一次提及所指 a mayate（第 7 行，一个美国黑人）时，是通过一个不定冠词修饰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的。而第二次提及，是下文若干行之后（第 21 行）才出现的以 the 修饰的名词短语，这一次，该所指是可辨识的（凭借先前的提及），但由于距离上次提及的间隔时间并不算短，以致不能认为它在听者的意识里是一个活跃的概念。随后很快出现的第三次、第四次提及（23 行和 27 行）是分别依赖一个人称代词完成的 ***he***，这说明，由于该所指刚刚才在上文中被提及过，因此说者可以认为该指示物在听者

的头脑中正处于活跃状态。

这便反映了下述的这么一种一般性模式：当某个被提及的所指在听者的意识中并非处于活跃状态时，它便有可能以不定的名词短语的形式被表达出来。当该所指处于可辨识但不完全活跃的状态时（例如，它已被介绍但未被较近提及），说者将会使用一个限定性名词短语。最后，当它处于完全活跃的状态时（例如，由于它刚被提及），说者将会使用一个代词。

【21】

在第 21 行选择全名词短语 the mayate 的另一个原因是，紧挨着的上一行包含了一个表示 the mayate 是其中一员的所指（‘three new guys’）。所以，文本中有三个人物指称。通常情况下，若某个语境包含了不只一个语义兼容的所指，那么说者会选择使用全名词短语而非代词（Clancy, 1980; Givón, 1983; Fox, 1987）；吉冯把这种情况称作“潜在干扰（potential interference）”。

如上文所言，在一个文本中，除了之前已经提及的信息是可辨识的信源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可辨识信源。在例（4）的 13 行中，名词短语 the tables（桌子）是限定性的，因为 G 和 D 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因而 G 可以假定 D 能够辨识出他所指的桌子。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在选择名词短语的形式方面信息流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但是其他不同的因素也有关联。下文将对这些因素中的一部分进行介绍。

2.5.2 语　序

语序——从句中要素的顺序，特别是动词、主语和宾语的相对位置——是另一个长期以来把信息置于关键地位的研究领域。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观察到，较之新信息，已知信息在从句中更早出现，在具有相对灵活语序的语言中尤为如此。例如在印度尼西亚语中，当存现（existential）/ 处所（locative）动词 ada——“英语中的 be（at）（在）”——的主语是已知信息时，它就在动词之前，但当它是新信息时就会放在动词之后。例（5）和例（6）分别阐释了这一内容。

（5）katakana saja yang map hitam itu,
Say just REL folder black that（比如就 REL 文件夹黑色那个）
...Map hitamnya,
...folder black: the（……文件夹黑色：这些）
S V
→ **dia** ada di lemari sini.
they be at cupboard here（它们是在柜子这里的）
‘Say for instance the black folders... the black folders, they’re in the cupboard here.’
（“比如说这些黑文件夹……这些黑文件夹，它们在这里的柜子里。”）

（6）...Tapi,
...But（……但是）
ada s- —
be —（……是）
【22】
V S
→ ada **dua hal yang mau saya kasih tahu,**

be two thing REL want I give know（是两件事 REL 想我给知道） 【22】
sama anda-anda ya?
To you:PL yes（对你 :PL 是）
'But, there's o- there are two things I want to tell you, OK?'（"但是，有一件——有两件事我想告诉你，好吗？"）

尽管英语是一种语序相对固定的语言，但在英语中同样也倾向于用这种方式来排列已知信息和新信息，这反映在上述例子的注释当中：对比 they are in the cupboard（它们在柜子里）和 there are two things I want to tell you（有两件事我想告诉你）。在后面这个句子中，英语语言的固定语序体现在"形式主语（dummy subject）"there 的运用上，但是逻辑主语是 two things I want to tell you，它出现在句子末尾的从句中。

虽然这里说明的模式（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很普遍，但在很多语言中也有另一种与此相矛盾的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将特定种类的不可预知的信息放在最靠前的位置，特别是对比性信息或者"复指性（resumptive）信息"（指信息在先前已经被提及过但没有间隔太久）。这种模式通常出现在古马来语中，现代印尼语就是源自古马来语，但却展现出构成语序模式的显著差异（参阅 Cumming, 1991）。学者把从句前置的功能称作"具有信息价值（newsworthiness）"，通常包含新鲜的和有对比性的信息，同时，在米图恩（Mithun, 1987）的论述中从句前置与多式综合语言（polysynthetic language）有关。

2.5.3 优先论元结构

信息流因素对语言编码至关重要的另一个表现方面在于"论元结构"，这个概念指的是从句中的名词短语所具备的语法和语义功能。比如，学者早就注意到，主语非常容易有一个既定的所指对象（Li, 1976）。这通常是由于主语——特别是及物动词的主语——通常是施事，施事一般是人，人又通常是话语的主题，因此这些主语经常是给定的信息。杜波伊斯进一步扩展了这一分析，认为新信息同样有优先性：在很多语言中，新的所指更容易被引入作为及物动词的宾语，或作为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上面的例（6）说明了不及物动词引入所指的用法（存现动词和处所动词尤其适合这种用法）；下面的例子，摘引自例（4），将说明如何通过一个及物动词在宾语位置引入新信息（注意动词的主语是代词，与给定的及物主语的趋势相一致）。

(7) ... So they got three new guys.（所以他们雇用了三个新伙计。）

因此，及物动词的宾语通常包含新的信息，及物动词的主语通常包含给定的已知信息；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intransitive subjects）则有时候是给定的信息（就像及物动词的主语一样），而有时候又是新的信息（就像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杜波伊斯认为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将呈现出下述两种主要的格标志（case marking）模式的其中之一：一种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和及物动词的主语具有相同格标志的模式（即所谓的"主宾格（nominative-accusative）"模式，一般出现于印欧语系及其他地方的语言中），另一种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和及物动词的宾语具有相同格标志的模式（即所谓的"作格"模式，出现在许多印第安人、澳 【23】

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及其他地区的语言中）。

2.6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

“主体性（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作“立场”、“说者态度”、“观点”、“移情”、“人际元功能”，或者简称 “主体性”，在文学作品中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象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了语言形式的诸多方面。不同于信息流因素，态度因素既不反映话语的内容也不说明其信息，但它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讨论中的事物的状态。在此，我们将探讨立场对于名词短语的形式、论元结构以及句子结构的影响。

2.6.1 名词词组的形式

已有研究表明对于指代性的选择取决于立场。前人的几项研究已经发现，在某些语言中，指代形式的明确性与移情程度有关（Clancy, 1980; Duranti, 1984）：说者对所指的移情越深，所使用的指代形式越不明确（例如，零形回指和代词）。

相反的情况同样也成立：有时候，使用一个较完整的指代形式来表示缺少移情。梅斯和小野（Mayes and Ono, 1991）也指出，在日语中，无论所指在听者一方的可及性如何，都会采用一些特定而明确的指代形式（回指代词加名词）来表示说者和所指之间的某种社会距离。思考下面的例子。[9]

（8） H: iwayuru furui taipu no eigyoo- moo
so-called old type of sales: person EMPH
‘Because (he) is an old world sales-’
（“因为（他）是一个老销售”）

T: ne.
PRT
‘Yeah.’
（“是啊。”）

【24】

H: tenkeitekina eigyooman da kara ano hito.
Typical sales person be because that person
‘typical sales person, that person.’
（“典型的销售员，那个人。”）

T: honto yan nacchau ano hito.
Really disgusted become that person
‘（I’m） really tired of that person.’
[“（我）真的很厌烦那个人。”]

最后两行之所以使用指示较为明确的 ano hito（**那个人**），可以从说者对于所指的立场这一角度

作出解释。在该对话的语境中，对话的参与者正在抱怨一位同事，使用 ano hito 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社会 / 情感距离，暗示说者和所指之间缺少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最后一句话中的不太常见的语序或许也是出于立场的原因：小野和铃木（Ono and Suzuk, 1992）的研究以及小野的另一研究（Ono, 2006）列举了一些日语中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暗含强烈情感的谓语出现在论元之前，然而日语却是以其严格地将谓语放在句末而著称的。

在众多语言中，指示词（demonstratives）似乎成为了表达社会差异的强有力的工具。譬如在玛雅语中，指示词可以被用来表示所指的那个人被排除在进行中的交际互动之外，换句话说，那个人并不是彼时彼刻谈话信息的接收者，即使他 / 她本身其实就是这个对话的参与者（Hanks, 1990）。与此恰恰相反，在芬兰语中，一个指示词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同时在场的人被纳入交际之中（Seppänen, 2003），这一现象特别有趣之处在于，第三人称的形式（例如指示词、人称代词如 she、名词短语如 that guy）以往一直被认为指的是对话中的不在场者。

2.6.2 论元结构

一些研究者已经表明，说者采取的立场与事件参与者映射到话语中的格角色（case roles）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事或者主体通常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的句法地位，这既是因为说者秉持了他们的“观点”（如 Chafe, 1994 中所言），也是因为学者认为他们对事件负有社会性的“责任”（如 Duranti and Ochs, 1990 中的解释；同样参阅 Duranti, 1994）。思考下面这个例子，它源自一次传统的萨摩亚人村务委员会会议（Duranti, 1994:132）。塔菲丽揭露了一则迫使她哥哥萨维不得不起诉艾古的谣言。起初，塔菲丽说：[10]

（9） e (le)aga'o'upu gei ou ke kaukala iai,
'because these words I am going to talk about,'
（“因为我将说的这些话，”）

→ “ ‘ua fa'akau Savea **e Igu** i kupe.” ...
PST buy Savea ERG Igu with monies
‘ “ Savea has been bought by Igu with money.” ...’
（“‘萨维已经被艾古用钱收买了。’ ……”）

ia'ua kakau ai lâ ga **kulâfogo**'upu gâ,
'so it has been necessary to try in court those words,'
（“所以有必要试着在法庭上说那些话，”）

【25】

在这段揭穿谣言的引述中，**艾古**以 e（一种“作格”标记，使得我们能够明确艾古是一个及物句子的施事）来修饰。杜兰蒂表示这一格标志与归因责任有关联——归因责任在此是相关的，因为这是一种对错误行径的控诉。但是，在该会议的后面部分，萨维说：

（10）→ e leai â se kupe **a Igu** o maimau
TA NEG EMP ART money of Igu PRED wasted
'There is no money of Igu's wasted'
（“艾古的钱一点都没有浪费”）

e kokogi ai sa'u fâsefulu kâlâ …
TA pay PRO my forty dollars
'to pay my forty dollars ...' (or 'to pay forty dollars for me')
[“来支付我的四十美元……”（或“为我支付四十美元”）]

此处谈到了同样的事件，但是这一次艾古是用所有格标记 *a* 来修饰。显然在这个情境中，萨维在以一种尽可能减少艾古责任的方式重塑着这个事件。

更普遍的情况是，由于人物指称最初就是负责接动作，并且说者倾向于采取他们的观点，因此许多跨语言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物的提及很有可能被置于核心的语法角色之中，尤其是作为主语而存在（如 Du Bois, 1987； Thompson, 1997; Nakayama and Ichihashi-Nakayama, 1997; Helasvuo, 2001a, 2001b）。

2.7 作为认识 / 证据 / 评价片段的词汇化小句

本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部分集中在主语 – 动词的组合上，如英语中的 I think（我认为）和 I guess（我猜测）。有学者认为，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此类表达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反映说者的内在心理状态，而是作为话语中用来标识主体性和立场的一种工具（Kärkkäinen, 2003）。思考下面这个例子（摘引于 Du Bois, Chafe, Meyer and Thompson, 2000），是关于一位律师帮客户为庭审做准备的内容。[11]

（11）REBECCA: [Becau]se,
RICKIE: [2(SNIFF)2]
REBECCA: [2(H)2] number one they pick out,
.. I think .. more vulnerable peo[ple.
（…… 我想 …… 更脆弱的人）

【26】在这个例子中，通过使用 I think，某种特定的立场得以表达，而非只是单纯地陈述里贝克的想法；在这个语境中，如果没有 I think，里贝克的表述会被以为是指她的听者里奇很脆弱；而在一次之前的讨论中，里奇的表现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脆弱的（她一直在哭，且在这段对话中也一直可以听到她的抽泣）；使用了 I think 之后，便可以缓和这种面对面话语的潜在尴尬和误解（有关这个例子的分析可参阅 Kärkkäinen, 2003: 119）。

近期的研究也发现，话语中的立场标记语并不是一种个体的行为。相反，有学者认为彰显立场体现了一种固有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是一种话语参与者共同参与的活动。研究表明，立场的建立包括与已经表现出立场的他人进行结盟。换句话说，人们不会因为受到内在感觉的激发而突然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而是通过回应与他们正在交谈的对方的观点来形成自己的立场。例如，对话中的参与者常常会先退让一步认可对方的看法，然后再来表明自己的异议（例如，参阅 Du Bois, 2007；其他相关论文可参考 Englebretson, 2007；了解让步这一内容，参阅 Couper-Kuhlen and Thompson, 2000）。在上面这个例子中，里贝克采取的立场可以理解为是对里奇的情

感立场的回应，且在随后二人的互动中（没有摘录在本书中），我们可以认为里奇是在认同或者回应里贝克的立场。

还有诸多研究关注的是对话中所展现出来的情感或情绪。在这类研究中，学者研究了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在表明立场、传递情感和建立友好关系方面的分工的不同（如，Goodwin and Goodwin, 2000; Stivers, 2008; Couper-Kuhlen, 2009）。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许多因素都是和信息流的方方面面有关的——包括代词的使用、语序问题、格标志，以及句子结构——同样也与说者的态度有关。那么在下一节中，我们还将讨论与语法形成有关的诸多社会因素。

2.8 互动的因素

最近，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对话中语法结构的偶发性本质。福特（Ford, 2004）已经证明对话中的句法单位，绝非是经过说者在头脑中预先深思熟虑后再大声表达出来，而是基于对交际中的情形作出反馈，并且常常需要修改和补充。此外，一系列的语法建构也与会话中因互动需求所产生的压力密不可分。语法的诸多方面都可以被看作是由话轮转换的对话系统中的互动者的个人目的所激发的（如本书第 9 章中波梅兰茨和费尔所言）。交际压力对语法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影响，并促使信息以特定的顺序呈现出来，在此，我们将围绕这一内容展开讨论。【27】

2.8.1 左移位句式

“左偏置（left-dislocation）” 是一种常见于诸如“Sandy, she likes garlic”（**桑迪，她喜欢大蒜**）这类句子中的句式。根据传统的看法，这种句式涉及“前移”一个名词短语，并用一个“代词副本（pronoun copy）”代替它。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种简单的、仅含单一小句的句式。但是，基南和希费林（Keenan and Schieffelin, 1976）以及格卢伊肯斯（Geluykens, 1992）等人的研究都已经表明，这种句式实际上在交际中可能较为复杂，因为在互动中会受到不止一人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它本身就是用于达成互动这一目的的。例如，格卢伊肯斯（Geluykens, 1992: 36）列举了下面这样的例子：

（12）A: well Sir Garnet Wolseley
A：那么加尼特·沃尔斯利先生
B: yes((sure oh oh))
B：是［（当然了，哦，哦）］
C: he was the one did all the army reforms in the eighteen eighties
C：19 世纪 80 年代他只身完成了所有的军队改革

在这段对话中，说者 A 用一个名词短语在话语中引入了一个所指，然而直到说者 B 确认了 A 引入的这个所指之后，A 才回过头来接着介绍这个所指。因此，这里的左移位句式是由两位说话者分三次才完成的，还涉及他们二位之间的一次协商，即确认所指的这一过程。因此，通过考

察话语中的左移位句式，我们发现它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牵涉大量的互动性内容，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句式本身的本质和特点或许就是由互动所促成的。

近期，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会话者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即会话的参与者将把这一句式当作组织他们当时所采取的各项行为的一种资源。并且学者注意到会话者不仅利用这一句式来实现对指示物的协商，它同样也可用于表明立场（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以及修正已经表述过的语句（Pekarek Doehler, 即将出版）。

2.8.2 句末状语从句和增补

状语从句是那些从属于主句、既可置于主句之前也可置于主句之后的句子。在英语中，它们通常由诸如before（*之前*）、because（*因为*）或although（*尽管*）这样的“从属连词（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s）”引入。由于它们可以出现在句中的多个位置，因此有必要考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它们在句子中的实际位置。通过将一系列研究进行比较，包括切夫（Chafe, 1984）和汤普森（Thompson, 1987）针对叙事进行的研究、马西森和汤普森（Matthiessen and Thompson, 1988）对说明性话语的研究以及福特（Ford, 1993）围绕会话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之间的横向对比说明，句首状语从句通常以提示时间、地点或方位的转变的方式来塑造和呈现话语的结构，如 When I 【28】 was living there for the couple of years...（*当我住在那的几年间……*）这句话（摘自于 Du Bois, Chafe, Meyer and Thompson, 2000）。另一方面，福特（Ford, 1993）认为，当状语从句位于句末、伴随着会话中语调的下降出现时，这时状语从句的位置便是由互动的因素而决定的。例如，福特在她搜集的会话语料中找到了如下这样的例子：[12]

（13）1 A: Did you get ye=r your first pay check from it?
1 A: 你拿到你的第一份工资支票了吧？
3 .. at least?
3 .. 至少？
4 R: No= I won’t get that for a couple weeks yet.
4 R: 不 = 起码接下来几周都还拿不到。
5 A: Oh,
5 A: 哦，
7 .. W’I
7 .. 为什么
8 R: ’Cause it takes a long time.
8 R: 因为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9 A: at least it’s in the bank,
9 A: 至少它在银行里。
10 R: ... Yeah it will be.
10 R: ……是，它会在银行里。

在1—3行中，A问了R一个问题，R在第4行中的回答多少让A有些出乎意料，从第5行A

的回答 Oh（哦）我们可以看出（Heritage, 1984）。福特认为，第 8 行的状语从句是为了回应 A 所表现出的互动遇到了困难这一点，即它是作为先前意外回复的一次说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互动导致了英语中句末状语从句的使用。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个例子同样体现了另一种由互动造成的语法现象，我们通常称之为增补（increment）：一种在谈话中满足语法要求、重新补充之前的某句话使之变得完整的现象。例如，在第 1 行中，A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Did you get ye=r your first pay check from it?（你拿到你的第一份工资支票了吧？），这个问题在语法上、韵律上、实际意义上都是完整的，因此期待着 R 的回复。然而正如第 3 行中的停顿处所显示的，由于没有得到 R 的合适的回答，A 又补充了一句 at least？（至少？）作为增补内容，它与第一句话在语法上也是相匹配的，这两句在一起便组成了另一句语法、韵律、意义完整的句子 Did you get ye=r your first pay check from it at least?（你至少拿到你的第一份工资支票了吧？），使得 R 可以再次作答。现在，正如第 4 行中显示的，R 给出了合适的回复 No= I won't get that for a couple weeks yet.（不 = 起码接下来几周都还拿不到。）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由互动激发的语序要素，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此（Auer, 1996; Schegloff, 1996; Ford, Fox and Thompson, 2002c; Couper-Kuhlen and Ono, 2007）。

2.8.3 双子句和多子句句式

近期，许多话语语法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双子句和多子句句式——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句组合（大致而言，一个子句包含一个谓语及其关联的论元）的特性问题。我们在下文将结合立场的因素来探讨一个与 I think 和 I guess 这类表述有关的问题。从前，在诸如 I think that I will have beer instead（我想我实际上会要的是啤酒）的这种由主句和从句组合而成的句子里，I think 和 I guess 这类表述被认为是作为主句在行使着功能，然而已有学者指出，由于在话语中反复使用，它们已经被惯例化了，地位也在下降，甚至有人说它们已经成为了一种“认识 / 证据 / 评价片段”（如，Bybee and Scheibman, 1999; Scheibman, 2000; 2001; Thompson, 2002; Hopper and Thompson, 2008）。伴随这种惯例化的是，出现在不同句法位置的此类表述增多，也不仅仅只是置于从句组合的句首，在这种位置，人们通常会希望像在如上提到的英语等语言那样出现一个常规性的主句 [参考上面的例（11），其中 I think 所处的句法位置不同于一般主句所在的位置]。这使得研究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很多语言中，像这样的表述不再行使着主句的功能（例如，参阅 G ü nthner and Imo, 2003 中对德语的分析）。【29】

即使上述类型的表达出现在一段话语的开头，会话语料已经表明它们最好被当作投射性手段来分析（Auer, 2005; Hopper and Thompson, 2008），这种手段暗示谈话处在待续之中，因此能够为说者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组织他 / 她要说的话，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如引用或评价）来架构他 / 她的语言。除此之外，谈话参与者在后续谈话中定位倾向似乎并不是那种公式化的“主”句（如 I think 或者法语中的 je veux dire“我是说”），其后要说的话才是“主”句。这些事实，将使得我们对于一个包含了上述公式化表达的双子句句式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如 Thompson, 2002; Hopper and Thompson, 2008）。思考下面这个例子，摘自于一段关于双语问题

的法语对话。这个说话者正在解释一个懂双语的人所掌握的两门语言中的一些内容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它们被翻译成与彼此对等的样子。

(14) 8 L: ouais c'est que c'est c-c'est basé sur des connotation,
'yeah it's that it's it's based on connotations,'
"是啊它是那个它是它是基于含义的，"

9 je veux dire euh: (1.4) des endroits de la maison la waschküche
'I mean places in the house the laundry-room((in German))'
"我是说家里面的地方洗衣房（（德语））"

10 on disait la waschküche pour la buanderie,
'we used to say the laundry-room ((in German)) for laundry-room,'
"我们以前用洗衣房（（德语））来表达洗衣房，"

11 par example ben c'était pas seulement n'importe quelle
'for instance well it wasn't just whatever'
"比如那么它不只是怎样都行"

12 buanderie c'était celle du bas.
'laundry-room it was the one below.'
"洗衣房它是下面那个。"

第9行中L用je veux dire“**我是说**”这个表达，把下面两个内容联系在一起：a. 第8行中关于具有“相同”意思的词语并不完全等同的一般概论，因为它们的意思是基于隐含意义（即，每种语言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具有其特定的隐含意义）。b. 说明这种一般概论的例子是第9—12行里L所呈现的：她家所使用的德语词汇waschk ü che仅仅只是指他们楼下的那个洗衣房。注意je veux dire“**我是说**”后面紧跟着表示犹豫的这个词euh：之后是第9行中相对较长的1.4秒的停顿，这说明je veux dire是用来引出后面的大段发言的：该说者还将继续，因此另一个说者不应该接话（Pekarek Doehler, 即将出版）。

【30】

和组合从句有关的另一个现象涉及会话话语的合作性质。从句组合可以在会话中产生，因此会话的一个参与者可以贡献一部分内容，而另一个则可以贡献另一部分内容（如，Helasvuo, 2003）。在类似于日语这种主句通常出现在其子句之后的语言中，一个说者甚至是另一个说者可以在某个已经完整的句子后面再添加从句（Tanaka, 2001）。学者们热衷于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是，连接词在语法层面上倾向于变为助词。在许多语言中，为了处理主句难以或无法辨别的情况，一些传统语法中认定为从属连接词的词汇形式将以开启或结束句子的方式出现。通常，连接词的这种作为句末或句首助词的用法可以被认为是语言的持续演变的结果；例如，目前英语中的but似乎正在逐渐演化成一个句末助词（Mulder and Thompson, 2008）。另一方面，芬兰语

中的连接词 että “**那个**” 既可以是从句连接词，也可被用作句首、句末助词。但是，连接词和助词在使用时的界限并不明晰，这种模糊不清是正在历经一种范畴变化的诸多形式中的典型（Laury and Seppänen, 2008）。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语言的不断演变所产生的范畴的交叠是人类语言的永恒特性。

2.9 结 语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表明，对于许多语言学现象，我们必须根据它们在话语中所具备的功能来理解。通过建立语言学现象的话语基础，话语－功能语法学家已经证明了在语言学研究中采用自然的真实语料的重要性。在最后这一部分中，怀着一份对未来的硕果累累、振奋人心的话语和语法研究的憧憬和期待，我们想要探讨几个我们认为最具前景或最有必要的研究方向。

大规模录音/录像语料库：首先，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数语言的数据库仍未形成规模，这种数据库既包含转录文字也包含日常对话的原始录音和录像资料。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随着国际语言学的新发展，语法被认为是包含如眼神注视、肢体动作等在内的非语言特征的多模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囊括录像资料。考虑到本领域的关键性进展，为了尝试理解人类语言，创造大规模的可以展现文本和录音/录像中的日常对话的数据库，是本领域最当务之急和令人振奋的任务。

多模态：第二，如上文所言，多模态（multimodality）似乎是大多数现有研究的关注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曾经被赋予独立地位的语法，在当下只有和其他的人类行为模式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并且强调了如下内容的重要性：即试图确定我们对现实人类行为中的语言到底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能运用它来做什么。【31】

其他领域：第三，本章中提到的所有研究几乎都主要关涉形态句法学（morphosyntax）的问题：例如，研究者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是说者如何在不同的语言形式之间作出选择，以及特定的语言范畴及句式的本质、形态和用途分别是什么，但是极少有研究侧重的是形态句法学以外的内容。尽管也有学者，如洛克尔、库珀－库伦、拜比以及他们的同事等（Local, Kelly and Wells, 1986; Couper-Kuhlen and Selting, 1996; Bybee, 2001; Couper-Kuhlen and Ford, 2004），以语料研究的方式在理解语音学和音韵学知识的本质和技巧等方面进行着尝试。但总体而言，以现实语料中的词汇、语义等方面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关注日常对话的研究还是相当少见，因此，需要学者投入更多的关注。

建模：最后，也是与最后一点相关，我们同样想强调，本章节中所提到的话语－功能语言学家还并未着手建立出一个一致的、总体性的人类语言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阐明功能性的因素是如何逐一、独立发挥作用，以促成特定语言形式之间的互动，并且那些相互作用的功能性

因素与语言的结构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建立人类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模型。当然，这样一个模型不仅要囊括语言学传统领域所涵盖的要点，如形态学、语义学等，同样也应该涉及与认知、互动因素有关的内容，譬如记忆、注意力、移情、情感及互动。除此之外，它还应该吸收语言学其他领域的重要内容，包括语音学、音韵学这些话语－功能语言学家较少关注的内容。建立一个明确的模型应该成为话语－功能语言学家潜心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并且我们相信，由于已经开始着眼于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本领域具备了其自身的特殊优势，虽然目前还处于尝试建模的研究初期，但我们的努力将不再无据可循。

本章作者感谢桑迪·汤普森（Sandy Thompson），迈克·尤因（Mike Ewing）以及罗伯特·恩格尔布雷森（Robert Englebretson）为本章初稿出谋划策。同样还要感谢玛吉·坎普（Maggie Camp），真嗣由佳（Yuka Matsugu）以及青木裕美（Hiromi Aoki）帮助我们准备、整理手稿。

注释

[1] 在本书的第一版中，这一章节内容由卡明和小野合著完成，而在当前的这一版中，小野和劳里对本章内容进行了大篇幅的更新和完善。

[2] 语言学领域中同时期的另一相关研究范畴关注的是结构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由认知语言学（Langacker 1987; 1991）的框架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联系。采用这一方法路径的研究者提出了“基于使用的语言学（usage-based linguistics）”这一术语，在实际研究中通常运用于检视结构资料的基础之上，它非常恰适地抓住了本章节中介绍的方法路径所力图研究的重点。

[3] 虽然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在近期取得了发展，但是话语－功能语言学并未受其影响。因为语料库语言学涉及大量的书面资料和／或口头语言的转录文本的统计学分析，但是话语－功能语言学并不会通过仔细研究原始记录材料来考察在交际互动中的语法的实际使用情况。

[4] 举例中使用了如下不同的术语缩写：PAST= 过去的（past）；ERG= 作格（ergative）；DEF= 有定性（definiteness）；ABS= 绝对格（absolutive）；TRANS= 及物的（transitive）。

[5]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汤普森和霍珀（Thompson and Hopper，2001）表示，在日常面对面交谈中及物性出现的频率一般很低，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话语类型。

[6] 这个例子以及后续的举例都是取材于达纳伊·保利诺（Danae Paolino）收集和转录的英语会话材料，并采用了下述几种转录惯例：

1. 换行符代表语调单位（intonation units）。
2. 行末标点表示的是语调变化（intonation contours）。
3. 两点代表短暂的停顿；三点代表较长的停顿。
4. 括号 [ ] 中的内容意味着发言者话语重叠的部分。

由于我们取材的语料中存在多种不同的话语转录系统，不同的系统中标示信息的符号也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忽略某些与讨论无关的符号（如时机、呼吸等）的方式，简化了许多例子的内容。

[7] 以钻研词库／语法以及基于结构的数据为主的类型学家最近也指出，某些语法范畴例如“被动语态”或“直接宾语”或许并具有跨语言效力（Dryer，1997; Croft，2001; 2007）。

[8] 这个部分的例子摘自苏珊娜·卡明收集的由迈克尔·尤因记录的一份办公室对话的文字稿。印尼语上方的标识展示了分句中不同语法要素的相对位置：V= 动词；S= 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下面的这些缩写将出现在印尼语和马来语的示例中：PL= 复数（plural）；REL= 相关从句标记（relative clause marker）。

[9] 摘自梅斯和小野（Mayes and Ono，1991）的研究。缩写：EMPH= 强调（emphasis）；PRT= 助词（particle）。

[10] 摘自杜兰蒂（Duranti，1994）的研究。缩写：ART= 冠词（article）；EMP= 强调（emphasis）；ERG= 作格标记（ergative marker）；NEG= 否定的（negative）；PRED= 谓语标记（predicate marker）；PRO= 代词（pronoun）；PST= 过去的（past）；TA= 时态 / 体标记（tense/aspect marker）。

[11] 缩写：（SNIFF）= 抽泣声（sniff）；（H）= 吸气声（inhalation）。

[12] 例子摘引于福特（Ford，1993：115）的研究。为了与之前的例子保持一致，此处的文本内容已稍作修改。

延伸阅读

若读者有兴趣深入探索语言学本领域新兴的研究内容，即结合语言的实际用途来考察人类语言的理论性内容，可以参考下列阅读书目作为深入学习的起点。

Bybee, J. (2010)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

这是一位以语言使用为研究基础、具有创新性的语法学家的最新著作，试图以整合的方式来为语言使用、演变和结构等构建语言模型。

Couper–Kuhlen, E. and Selting, M. (eds) (1996) *Prosody and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互动语言学领域的第一本且颇具影响力的一本论文集，关注于韵律是如何在对话中建构和使用。

Ford, C.E., Fox, B.A. and Thompson, S.A. (2003)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Vol. 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p. 119–143.

这是一篇很好的关于互动语言学的导论性文章。它或许应该在阅读奥克斯、谢格洛夫和汤普森的著作（Ochs, Schegloff, and Thompson, 1996）之前或与之同步学习阅读。

Hopper, P. (1998)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p. 155-175.

这是一本了解霍珀著名的语法理论的简明易读的入门文章。

Ochs, E., Schegloff, E.A. and Thompson, S.A. (eds) (1996)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涵盖了互动语言学领域的功能语法学家、人类语言学家以及会话分析学者们的最早期的众多研究。由三位编者撰写的本书导言部分，为我们在理解范式的本质以及影响其发展的研究传统方面作了丰富的阐释。

在线阅读

下面这些文章可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获取。

Fox, B.A. (2007) 'Principles shaping grammatical practices: an exploration', *Discourse Studies*, 9(3): 299-318.

Thompson, S.A. and Couper-Kuhlen, E. (2005) 'The clause as a locus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7(4-5): 481-505.

参考文献

Auer, P. (1996) 'On the prosody and syntax of turn-taking'. In E. Couper-Kuhlen and M. Selting (eds), *Prosody and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7-100.

Auer, P. (2005) 'Projection in interaction and projection in grammar'. *Text*, 25 (1): 7-36.

Auer, P. and di Lurio, A. (eds) (1992)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Language*. Amsterdam: Benjamins.

Bolinger, D. (1952) *Fonos of Englis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linger, D. (1986) *Intonation and its Part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linger, D. (1989) *Intonation and its Us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 (2001)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 and Scheibman, J. (1999) 'The effect of usage on degrees of constituency: the reduction of *don't* in English'.*Linguistics*, 37 (4): 575-96.

Chafe, W. (1976) 'Given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 topics, and point of view'. In C.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5-55.

Chafe, W. (ed.) (1980)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Chafe, W. (1984) 'How people use adverbial claus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437-49.

Chafe, W. (1987)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 In R.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21-51.

Chafe, W.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ancy, P. (1980) 'Referential choice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In W.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pp. 127-202.

Couper-Kuhlen, E. (2009) 'A sequential approach to affect: the case of "disappointment"'. In M. Haakana, M. Laakso and J. Lindström (eds), *Talk in Interaction: Comparative Dimensions*. Helsinki: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 pp. 94-123.

Couper-Kuhlen, E. and Ford, C.E. (eds) (2004) *Sound Patterns in Interac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Couper-Kuhlen, E. and Ono, T. (2007) '"Incrementing" in conversation: a comparison of practices in English, German and Japanese'. *Pragmatics*, 17 (4): 513-52.

Couper-Kuhlen, E. and Selting, M. (eds) (1996) *Prosody and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uper-Kuhlen, E. and Thompson, S.A. (2000) 'Concessive patterns in conversation'. In E. Couper-Kuhlen and B. Kortmann(eds), *Cause, Condition, Concession, and Contrast: Cognitive and Discourse Perspectiv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pp. 381-410.

Croft, W.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oft, W. (2007) 'Beyond Aristotle and gradience: a reply to Aarts'. *Studies in Language*, 31: 409-30.

Cumming, S. (1991) *Func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Malay Constituent Orde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aneš, F. (1974)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n F. Daneš (ed.), *Papers o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Prague: Academia. pp. 106-28.

Dryer, M. (1997) 'Ar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universal?'. In J. Bybee, J. Haiman and S.A.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Dedicated to T. Givón*.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15-43.

Du Bois, J.W. (1985)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Benjamins. pp. 343-65.

Du Bois, J.W.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Language*, 63 (4): 805-55.

Du Bois, J.W. (2003) 'Argument structure: grammar in use'. In J.W. Du Bois, L.E. Kumpf and W.J. Ashby (eds), *Preferred Argument Structure: Grammar as Architecture for Func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0-60.

Du Bois, J.W. (2007) 'The stance triangle'. In R.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9-82.

Du Bois, J.W., Chafe, W.L., Meyer, C. and Thompson, S.A. (2000) *Santa Barbara Corpus of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Part One*. Philadelphia, PA: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Du Bois, J.W., Kumpf, L.E. and Ashby, W.J. (eds) (2003) *Preferred Argument Structure: Grammar as Architecture for Function*.Amsterdam: Benjamins.

Duranti, A. (1984) 'The social meaning of subject pronouns in Italian conversation'. *Text*, 4 (4): 277-311.

Duranti, A. (1994) *From Grammar to Poli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ranti, A. and Goodwin, C. (eds) (1992)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anti, A. and Ochs, E. (1990) 'Genitive constructions and agency in Samoan discourse'. *Studies in Language*, 14 (1): 1-23.

Edwards, J. and Lampert, M. (eds) (1993) *Talking Data: Transcription and Coding in Discourse Research*. Hillsdale, NJ: Erlbaum.

Englebretson, R. (2003) *Searching for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Complementation in Colloquial Indonesian Conversation*.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Englebretson, R. (ed.) (2007)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Englebretson, R. (2008) 'From subordínate clause to noun-phrase: yang constructions in colloquial Indonesian'. In R. Laury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 Amsterdam:Benjamins. pp. 1-34.

Firbas, J. (1966) 'On defining the theme i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2: 267-80.

Ford, C.E. (1993) *Grammar in Interaction: Adverbial Clauses in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d, C.E. (2004) 'Contingency and units in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6 (1): 27-52.

Ford, C.E. and Fox, B. (1996) 'Interactional motivations for reference formulation: he had. this guy had, a beautiful, thirty-two O:lds'. In B. Fox (ed.), *Anaphora in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45-68.

Ford, C.E., Fox, B.A. and Thompson, S.A. (2002a) 'Social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Vol. 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p. 119-43.

Ford, C.E., Fox, B.A. and Thompson, S.A. (eds) (2002b) *The Language of Turn and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d, C.E., Fox, B.A. and Thompson, S.A. (2002c) 'Constituency and the grammar of turn increments'. In C. Ford, B.A. Fox, and S.A. Thompson (eds), *The Language of Turn and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38.

Fox, B. (1987)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Anaphora: Written and Conversational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x, B. and Hopper, P. (eds) (1994) *Voice: Form and Func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Fox, B. and Jasperson, R. (1995) 'The syntactic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P. Davis (ed.),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s in the New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77-134.

Fox, B. and Thompson, S.A. (1990)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Language, 66 (2):297-316.

Geluykens, R. (1992) *From Discourse Process to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n Left-Dislocation in English*. Amsterdam:Benjamins.

Givón, T. (ed.) (1983)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 a Quantitative Cross-Language Study*. Amsterdam: Benjamins.

Givón, T. (1989) *Mind, Code and Context Essays in Pragmatics*. Hillsdale, NJ: Erlbaum.

Givón, T. (1990)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Goodwin, C. (1979) 'The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of a sentence in natural conversation'. In G. Psathas (ed.), *Everyday Languag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Irvington. pp. 97-121.

Goodwin, C. (1981)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 and Hearers*.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Goodwin, C. and Goodwin, M.H. (2000) 'Emotion within situated activity'. In N. Budwig, I.C. Uzgiris and J.V. Wertsch (eds),*Communication: An Arena of Development*. Stanford CT: Ablex. pp. 33-54.

Greenberg, J. (1966) *Language Universals*. The Hague: Mouton.

Grimes, J. (1975) *The Thread of Discourse*. The Hague: Mouton.

Gumperz,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ünthner, S. and Imo, W. (2003) 'Die reanalyse von matrixsätzen als diskursmarker: *ich mein*-konstruktionen im gesprochenen Deutsch'. In M. Orosz and A. Herzog (eds), *Jahrbuch der Ungarischen Germanistik 2003*. Budapest/Bonn: DAAD. pp. 181-216.

Haiman, J. (1985) *Natural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A.K. (1967–8)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s 1–3'.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1): 37–81, 3 (2):199–244, and 4 (2): 179-215.

Halliday, M.A.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nks, W. (1990) *Referential Practice: Language and Lived Space among the May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lasvuo, M-L. (2001a) *Syntax in the Making: the Emergence of Syntactic Units in Finnish Conversation*. Amsterdam:Benjamins.

Helasvuo, M-L. (2001b) 'Emerging syntax for interaction: noun phrases and clauses as a syntactic resource for interaction'. In M. Selting and E. Couper-Kuhlen (eds),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5-50.

Helasvuo, M-L. (2003) 'Argument splits in Finnish grammar and discourse'. In J.W. Du Bois, L.E. Kumpf and W.J. Ashby (eds),*Preferred Argument Structure: Grammar as Architecture for Fun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47–72.

Heritage, J. (1984) 'A change-of-state token and aspects of its sequential placement'. In J.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9-345.

Hopper, P. (1988) 'Emergent grammar and the a-priori grammar postulate'. In D. Tannen (ed.), *Linguistics in Context:Connecting,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Norwood, NJ: Ablex. pp. 117-34.

Hopper, P. (1998) 'Emergent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pp. 155-75.

Hopper, P. and Thompson, S.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 251-99.

Hopper, P. and Thompson, S.A. (1984)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Language*, 60 (4):703-52.

Hopper, P. and Thompson, S.A. (2008) 'Projectability and clause combining in interaction'. In R. Laury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99-124.

Iwasaki, S. (1993) *Subjec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Spoken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Kärkkäinen, E. (2003) *Epistemic Stance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 Description of its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with a Focus on I Thin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Keenan, E. and Schieffelin, B. (1976) 'Foregrounding

referents: a reconsideration of left dislocation in discour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240-57.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ury, R. and Seppänen, E.-L. (2008) 'Clause combining, interaction, evidentiality,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and the conjunction-particle continuum: the Finnish että'. In R. Laury (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53-78.

Li, C. (ed.) (1976)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Local, J. (1996) 'Conversational phonetics: some aspects of news receipts in everyday talk'. In E. Couper-Kuhlen and M. Selting(eds), *Prosody in Conversation: E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5-230.

Local, J., Kelly, J. and Wells, B. (1986) 'Towards a phonology of conversation: turn-taking in Tyneside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2 (2): 411-37.

Longacre, R.E. (1972) *Hierarchy and Universality of Discourse Constituents in New Guinea Languages: Discussion.* 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ongacre, R.E. (1976) *Anatomy of Speech Notions*. Liase: Peter de Ridder Press.

Mathesius, V. (1975)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Present-Day English on a General Linguistic Basis* (trans. L. Duskova, ed.J. Vacek). Prague: Academia.

Matthiessen, C.M.I.M. and Thompson, S.A. (1988) 'The structure of discourse and "subordination"'. In J. Haiman and S.A. Thompson (eds), *Clause Combining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275-329.

Mayes, P. and Ono, T. (1991) '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reference in Japanes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ano hito*'.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3: 84-93.

Mithun, M. (1987) 'Is basic word order universal?'. In R.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Benjamins. pp. 282-328.

Mulder, J. and Thompson, S.A. (2008)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but* as a final particle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In R. Laury(ed.),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pp. 179-204.

Nakayama, T. and Ichihashi-Nakayama, K. (1997) 'Discourse perspective for core-oblique distinction in Japanese'. *Santa Barbara Papers in Linguistics*, 5: 158–77.

Ochs, E., Schegloff, E. and Thompson, S.A. (eds) (1996)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o, T. (2006) 'An emotively motivated post-predicate constituent order in a "strict predicate final" language: emotion and grammar meet in Japanese everyday talk'. In S. Suzuki (ed.), *Emotive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39-53.

Ono, T. and Suzuki, R. (1992) 'Word order variability in Japanese conversation: motivations and grammaticization'. *Text*,12 (3): 429-45.

Ono, T. and Thompson, S.A. (2009) 'Fixedness in Japanese adjectives in conversation: to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a lexical (part-of-speech) category'. In R. Corrigan, R. Moravcsik, H. Ouali, and K. Wheatley (eds), *Formulaic Languag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117-45.

Pekarek Doehler, S. (forthcoming) 'Emergent grammar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on-line formatting of left- and right dislocations in French conversation'. In P. Auer and S. Pfänder (eds), *Emergent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ike, K. (1954)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The Hague: Mouton.

Prince, E.F. (1978) 'A comparison of WH-clefts and It-clefts in discourse'. *Language*, 54 (4): 883-906.

Prince, E.F. (1981) 'Toward a taxonomy of given – new information'. In P. Cole (ed.), *Radical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23–55.

Rosch, E. (1978) 'Principi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and B.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Erlbaum. pp. 27-48.

Sacks, H., Schegloff, E.A.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4): 696-735.

Schegloff, E.A. (1996) 'Turn organization: one direction

for inquiry into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In E. Ochs, E.A. Schegloff and S.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2-133.

Scheibman, J. (2000) 'I dunno ... a usage-based account of the phonological reduction of don't in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2: 105-24.

Scheibman, J. (2001) 'Local patterns of subjectivity in person and verb type in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 In J. Bybee and P.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61-89.

Selting, M. and Couper-Kuhlen, E. (eds) (2001)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Seppänen, E.-L. (2003)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addressing and referring in Finnish'. In I. Taavitsainen and A. Jucker (eds),*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Address Term System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375-99.

Shibatani, M. (ed.) (1988) *Passive and Voice*. Amsterdam: Benjamins.

Stivers, T. (2008) 'Stance, alignment and affiliation during story telling: when nodding is a token of preliminary affiliation'. *Research on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41: 29-55.

Tanaka, H. (2001)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ssible cognitive shifts in Japanese conversation: complementizers as pivotal devices'. In M. Selting and E. Couper-Kuhlen (eds), *Studies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81-111.

Tao, H. (2003) 'A usage-based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remember" and "forget" in spoken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8 (1): 75-95.

Thompson, S.A. (1987) '"Subordination" and narrative event structure'. In R.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435-54.

Thompson, S.A. (1990) 'Information flow and "dative shift" in English'. In J. Edmondson, C. Feagin and P. Mühlhäusler (eds),*Development and Diversity: Linguistic Varia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pp. 239-54.

Thompson, S.A. (1997) 'Discourse motivations for the core-oblique distinction as a language universal'. In A. Kamio (ed.),*Directions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pp. 59-82.

Thompson, S.A. (2002) 'Object complements' and conversation: towards a realistic account'. *Studies in Language*, 26 (1): 125-64.

Thompson, S.A. and Hopper, P.J. (2001) 'Transitivity, clause structure, and argument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onversation'. In J.L. Bybee and P.J. Hopper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Benjamins.pp. 27-60.

Tomlin, R.S. (1987) 'Linguistic reflections of cognitive events'. In R.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Benjamins. pp. 455-79.

话语语义学 3

Discourse Semantics

⊙罗素·S. 汤姆林　琳达·福里斯特　濮明明　金明熙

3.1　关于意义的问题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的沟通是如此的畅通无阻。无论是叙述我们的日常琐事还是为我们的思想观念而激情论争，无论是阅读报纸上的世界新闻还是研读一篇有关人类语言的学术论文，无论是撰写一封简洁的感谢信还是拟定一份诉讼案情摘要，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确保让信息理解者领会我们意在传达的信息，以及怎样从我们听到或者读到的内容里获取信息？作为语言学家，我们同样面临着此类难题：针对信息理解者，无论是听众还是读者，我们都应该为他们描述并说明，意义是如何从这些多种信息来源中提取出来的；而针对信息生产者，无论是演说者还是写作者，我们也应该为之解释，意义是如何传达出去的。关涉意义的这一问题，即话语语义学（discourse semantics）[1]的问题，它无疑是复杂的，涉及一系列广泛的语言学和非语言学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

请看例（1）中的文本片段。

（1）文本片段

1　……冰球被戴尔·麦考特击出了
　球被史蒂夫·舒特接住/
　现在舒特突围了，到了底特律队的区域/
　他从前面将球击出/
5　勒梅尔射门了。
　球被里德·拉森挡住了/

这个文本片段转录自网上的一小段冰球比赛的赛况解说。解说员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对比第4行和第1，2，6行）、名词形式和代词形式之间以及存在小句类型（第5行）和简单小句（第3行）之间进行转换。那么，解说员如此在不同的结构中进行选择，到底是想要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本章介绍了潜藏在我们直觉之下的相关概念和过程，以阐明交际中的强调、重要性以及先验知识，是如何帮助我们在理解过程中从文本和话语中获取意义的，以及在传递更为广泛的意

1　国内又译为“语篇语义学”。——译者注

义时，它们是如何促成并影响了人们对于语言结构使用的选择的。

3.1.1 话语互动的隐喻

学者看待话语的方式对其所提出的话语语义学的理论类型具有重大影响。一个最为稚拙的隐喻被称为话语的**管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Reddy, 1979）。根据这一观点，说者将他想要传达的意义打包进一个文本制作品中。该成品**包含**了说者想要表达的意义，它以口语或书面语的形式被传递到听者那里。然后听者将文本“打开”，从文本成品中提取意义。

在此我们还将介绍另一个隐喻——话语的**蓝图隐喻**（blueprint metaphor）。这种观点认为，说者持有一种对事件或观念的概念表征，并且他认为这种表征应该被复制于听者的头脑之中。而在这一努力中，听者并不是无助或被动地接受这种表征，而是主动地构建她自己对于相关事物的概念表征。说者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样，他的语言产出，即文本，可以被视为一张帮助听者建构概念表征的蓝图。一张真正的蓝图并不会涵盖实际的建筑材料，它只是按照惯例描绘了如何利用现成的材料筑起一座指定的大厦，同理，文本自身实际上也几乎不包含或根本不具有意义，而是依照常规指引听者建构概念表征。

要建构或是阐释文本蓝图，需要我们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要将每句话中的语义信息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说者必须从个人经验中选择出相关的概念和事件，并且以一种有助于听者理解的方式来组合这些概念和事件。而听者则需要将听到的语句整合成连贯的表达，使她能得到或构建出实际上与说者完全相同的概念和事件。我们可以把这称作**知识整合**（knowledge integration）问题。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动态的、实时的互动中管理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信息流。说者通过引导听者处理文本里的信息，从而帮助听者实现知识的整合。例如，如果说者认为某些信息于听者而言，将是新鲜或不曾预料的陌生信息，那么他便会帮助听者发掘出那些在通常情况下与这些陌生信息相关或预示其即将出现的信息内容。听者所获取的信息的连贯性将受到说者提供的信息的连贯程度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信息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的问题。

【39】 知识整合需要有效的信息管理，但是仅凭后者却不足以解说知识整合。

3.2 话语中的知识整合

为了从意义生产和理解这两个方面探究话语语义学的复杂性，我们来思考这两个例子。首先，对于说者而言，我们可以试想这么一幅简笔画，或许就像一些儿童书籍里的插图一样。

在发展一种话语语义学的理论时，学者必须要考虑诸多重要因素。首先，说者必须在其头脑中构造出讨论主位的某种**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这种表征便是说者在建构一个话语时所用到的最基本的“意义”。作为语言学家，我们常常将概念表征看作一系列的命题，有时候也把它看作是一种文本表征（Kintsch, 1974; van Dijk and Kintsch, 1983），但是一个概念表征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在上述简笔画的例子中，说者会形成一种他在解说这幅画时所需要参照的**视觉**表征。而在其他日常经验中，也很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表征。譬如，品味咖啡

的概念表征就很可能与听音乐的表征有所不同，而后者反过来又或许和驾驶汽车换挡时的表征大不相同。另外还须谨记的是，我们不但可以创造概念表征，同样也可以从记忆或感知经验中来提取、使用它们。

除此之外，概念表征是**动态**的。虽然简笔画本身是静态的，但我们的观察并不是静态的；我们的眼睛从一个元素移向另外一个元素，时而停顿，时而跳跃，从而形成较小规模的形象和印象。同理，绝大多数的概念表征都是动态的：我们对于现场事件或其他发展中事物的观察要远多于我们欣赏图片的次数。甚至我们的抽象思维都是动态的，因为我们会不断从一个想法跳转到另外一个想法。

当然，单独的概念表征并不构成话语意义。说者仍然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从整个概念表征中选择出一定的信息，并用这些信息建立一个文本。说者会选择那些他认为是听者需要的信息，并呈现出来以帮助听者理解其所听到的。说者**管理**这些信息的方式，在话语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话语管理包含着四种相互独立的思路。

1. 说者从来都不仅仅只是通过语言来输出概念表征。他们心中总是怀揣着某种**目的**或**目标**。这些目标制约着搜索概念表征以及选择要传递的信息的方式。总体而言，目标被视为话语语境的一部分，并且学者大抵通过话语语用学的研究来分析这些目标（van Dijk, 2008）。说者对所选取的同一幅简笔画可以展开不同内容的表述，具体内容取决于对说者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即是要“描述图中看起来发生了什么”还是“评价画作的质量”。

   在这两种表述中，说者都会利用图画的视觉表征，但是经由他选取并最终整合到口头表达中的信息将会产生差异。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表达目标看作是独特的话语生产的**修辞目标**，而与此相关的选择过程则可被称为**修辞管理**（rhetoric management）。
2. 受修辞目标的限制，说者使用概念表征，为听者动态地选择所指和命题。说者会实时地确定哪些所指和命题对于推进中的话语更为重要。这样的**起点**最终可以帮助听者构建自己的概念表征。我们可以将重要的**所指**或者说是起点看作是话语的**主位组织**（thematic organization），而与此相关的语用概念和过程我们则称之为**主位管理**（thematic management）。
3. 与主位管理同时并存的是，说者还会动态地监控哪些所指和命题已可为听者所获取，而哪些则需要进行介绍或者再介绍。我们可以将这些无论寻常与否的所指和命题的相扣模式看作是话语的**指称组织**（referential organization），而我们把与此相关的语用概念和认知过程称作**指称管理**（referential management）。
4. 说者会动态地监控那些他希望确保引起听者注意的所指和命题。有时，说者也许不能确定听者是否在正确的时间领会了正确的所指，或者他也许希望以某种方式来**突出**某个特定的所指或命题。说者努力引导听者注意到特定的所指和命题，这可以看作是话语的**焦点组织**（focus organization），而与此相关的语用概念和认知过程我们则称之为**焦点管理**（focus management）。

【40】

话语管理的这四个方面界定了话语中信息管理的核心问题。虽然对这四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大量的文献可参考，但是迄今为止还无人提出一种关于它们之间如何共同协调的综合性模式，以阐明知识整合的问题（但可参阅 Vallduvi, 1992; 或 Lambrecht, 1994; 或 Levelt, 1989）。

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听者。我们可以发现听者的问题与说者的问题类似，而绝不仅仅是其反向问题。当听者接触到话语时会形成一个概念表征，她会运用从文本中提取的信息以及手头已有的信息来共同构建一个概念表征。请看例（2）中的话语样本，并且在阅读时，你可以在头脑中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2）一个头顶着木桶的男孩儿正试图接住一只从木桩上掉下来的青蛙，而这个男孩儿却意外地用网抓住了他的狗。

听者一个接着一个地实时接收着话语片段。针对由说者通过文本所描绘出的蓝图，听者也创建了与所绘事件相应的概念表征，并且她是利用手头所有可用的信息构建出某种**文本表征**。这个文本表征就有点类似于该文本的主旨，是一种连贯完整的、对事件或其他讨论主题的概貌的呈现。最为人所知的文本表征模式或许是金奇和梵·迪克的模式（Kintsch and van Dijk, 1978）。对他们而言，文本表征就是一系列的命题，这些命题通过共同的所指以及诸如时间或地点这样的事件特点联系在一起，并且联接成一个更高层级的话语主题或**宏观命题**（macroproposition）。其他模式（Gernsbacher, 1990; Kintsch, 1998; Reinhart, 1981; Vallduvi, 1992）大体都遵循这种总体架构。但是现有模式中还没有哪一个真正解决了下面这个更广的问题，即文本是如何联接起来，以构成这个由文本描画出的最终的概念表征，例如通过理解文本例（2）而产生的一幅头脑中的图景。

【41】在动态、实时地处理文本蓝图的过程中，听者至少使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类型来解码文本，并将其信息整合为一个文本表征。听者调用她个人语法体系中的**形态－句法细节**，来编码文本和话语中的信息流。根据更广的话语语境，她通过对文本中的句子进行语用阐释来提取**含意**（implicatures）。并且她也会利用**推论**（inferences）的一般性过程，来帮助她将当前的文本和她既有的更广的知识储备联系起来。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有这些过程都关涉知识整合，但同样重要的还要认识到，这些过程各自的贡献和功用是彼此不同的。在描述话语中语言形式的功能时，语言学家很容易将关于含意和推理的事实纳入进来。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亦然，他们认为，其观察到的语言使用的种种现象，关涉的正是语言体系的问题，它们或许就是由于计划或推理这些非语言过程导致的。两个极好的文献资源，见于莱文森（Levinson, 1983）和利奇（Leech, 1983）的研究，可以帮助防止产生这样的混淆。

有两个有助于理解的知识整合模式：格恩斯巴彻的结构建构模式（Gernsbacher, 1990）和金奇的建构－整合模式（Kintsch, 1988）。在格恩斯巴彻的**结构建构模式**（structure building model）中，听者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连贯一致的心理表征或者话语中的信息"结构"。通过多种一般性的认知过程和机制，听者确立了心理结构的基础。一旦形成了这种基础，听者将把后继信息**映射**（mapping）到原有的结构上，以此来进一步发展她的心理结构。然而，只有当新信息与先前的信息保持一致时，这些信息才能被映射到现有的结构上。如果新信息与之前的并不那么一致，听者就必须**转移**，以构建一个新的结构。

金奇（Kintsch, 1988）的**建构－整合模式**（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也能很好地解决知识整合的问题。请看这样一句话：**"玛丽为萨利烤蛋糕并把手指烫伤了"**。要理解这句话，听者必须掌握比说者所言说的单词和短语更多的内容。她必须具备有关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大量的一般知识，比如在这句话中，她应知道烘烤的过程会使物体在短时间内都会保持高温。她也应该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如在这句话中，“**烘烤**”这个动词需要一个施事，而玛丽就是这个句子中的施事。另外，听者需要知道使用这些词的情境的具体信息。从词语本身我们并不能得知，玛丽为萨利烤蛋糕到底为了送给她一份礼物，还是萨利自己需要烤一个蛋糕而玛丽为她代劳了。

知识整合将现实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与话语中的实际表达结合了起来。说者运用非语言学的知识来观察和理解世间发生的事件及其与听者之间的关联。然后他利用这种知识和语言知识，来选择出那些对听者有价值的特定的语言结构。而听者一方，则必须运用她自己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知识去解读这些语言结构。如果说者可以恰到好处地为听者提供适当的信息，那么这项任务将会变得简单一些。在接下来的四个部分，我们便会探究说者是如何为听者控制信息的。

3.3 话语的修辞管理

【42】

言说涉及信息和行动。其中，信息包括命题内容的细节，还包括诸如强调、重要性和预设等语用要素，这些要素会引导语义内容应该如何被解读。而行动则包括话语规划的细节，既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它们将帮助说者管理语用要素，同样也能限制听者的解读。修辞管理对于话语语义学的贡献，既体现在内容和语境的语用学方面（van Dijk, 2008），也体现在对能够形成一种叙述或论证的特定组织结构的调度方面。

话语中语言学结构的使用与说者采取的语言行动有关。例如，在句子层面上，**发号施令**这种语言行动可以通过多种语言结构来完成：一个祈使句（**把你的钱给我；让我来掌管你的钱**）、一个疑问句（**我能拿你的钱吗？**）或一句陈述（**我想要你的钱**）。这些例子表明话语形式与行动（此处是指话语承载的**言语行为**）这二者是可以分离的。

言语行为理论（Levinson, 1983; Searle, 1969; 1979）认识到，语言是用于行事的（Austin, 1962）。话语的言语行为分析关注的是影响小句或句子类型的局部因素。但是作为行动的语言同样反映在话语组织的较高层面。例如，斯韦尔斯（Swales, 1981）检视了大约 48 篇关于科学技术文章的介绍。在每篇介绍中他都发现了行动的四个关键成分。这些行动，即斯韦尔斯称作的**语步**（moves），抓住了说者从其主题概念表征中选取出的信息的关键类型。

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有多条不同的研究脉络，其中最知名的或许是与库尔撒德以及辛克莱有关的话语分析的英国传统（Coulthard, 1977; Coulthard and Montgomery, 1981; 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他们的经典研究（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考察了英国学校里的课堂话语的结构。**米恩**（Mehan, 1979）同样在教育领域展开了类似的大量研究。

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已经考察了话语的目标定位结构及其与话语涉及的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格罗斯（Grosz, 1974）研究了工人组装水泵时所使用的语言，揭示了知识表征和指涉形式之间的联系。科恩和佩罗（Cohen and Perrault, 1979）、拜吉特（Baggett, 1982）、麦基翁（McKeown, 1985）、悉尼（Sidner, 1983）及其他人对此类基于任务的话语展开了研究。

语言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考察了话语的组织结构。普罗普（Propp, 1958）早期的研究

以俄罗斯童话为研究对象。格兰姆斯（Grimes, 1975）则发展了一个修辞性谓词（rhetorical pridicates）目录，以抓取话语的意图结构。利维（Levy，1979）对正在完成课程计划的学生参与的非正式访谈结构进行了考察。海因兹（Hinds，1979）关注的则是日语中的程序性话语（procedural discourse）。曼和汤普森（Mann and Thompson, 1986）从描述自然话语中修辞管理的细节信息着手，构建了一个极为丰富的系统。这一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RSL）已经被用于【43】话语分析、理论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以及人工智能这些多元的领域，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文本和自然语言生成、短语自动提取、语料库文本分析等方面（Taboada and Mann 2006a; 2006b）。

所有这些努力和尝试都提出了一个具有分级组织结构的各种行动的目录。高层结构可以被分解为一组受控制的低层级单元；而低层级单元则以受限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话语组织的高层级形式。因此从斯韦尔斯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四个语步，且这四种独特的语步类型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篇内容翔实、信息丰富的介绍性文章。

研究话语语义学，了解修辞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原因有二：①把信息整合进文本，这从来都不仅仅只是处理独立语句那么简单——这些语句的整合与更高层级的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是由修辞性成分来管理的；②随着话语展开，在指示一个或另一个信息状态的过程中，句法将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即形态－句法的编码。决定哪些信息是主题或重点等，与展开话语的更高层级的修辞目标紧密相关。

3.4 话语的指称管理

指称管理的核心见解是，某些概念似乎具有共通性，或者是说者和听者共享的，而其他概念则不然。共通的信息组成了概念架构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依靠这个架子进行有效沟通。关键问题是：①说者和听者“共享”信息，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②指称管理是如何与知识整合联系起来的？

事实上，话语结构的每一种理论都在**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同样也被称为**旧的**与**新的**，**知晓的**与**未知的**，或**共享的**与**新的**）之间划分了一条界线。每一个小句或表述既包含在说者看来与听者共通的元素，也包含其认为与听者不共享的元素。所以在话语片段（3）中，加粗了的名词性短语通常被认为是已知信息，而划线的名词性短语被认为是新的信息。

（3）摘自于E. 拉瑟福德的通俗小说《血清》（*Sarum*）（E. Rutherford, 1988: 15）中的一个片段：

1 第二天**他**发现了**那个湖**。
是一个距内陆约五英里的低矮的小山丘
率先引起了**他的注意**。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5 可以让他查看地形
并且至少可供他们夜晚露营的地方］。

但是，当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惊讶而欣喜地发现
在它的后面并且在他所在的路上
10 隐藏着一个半英里宽的浅水湖。
在湖的东岸，一个小小的泄水口将它的湖水引入大海。 【44】
沿着湖边走了一圈
他发现
它源自北边和西边的两条小河。
15 在它的北岸是一片平坦的、空旷的湿地。
湖水，依傍着小山丘，显得十分平静；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着蕨草、泥土以及水芦的香甜的味道。
湖面上，一只苍鹭飞过
还有海鸥们在鸣叫。

在第 1、4、7、8、9、12、13、14、16 行中加粗的名词短语表示的是已知信息，因为它们在前文已经被提及了。而第 1、2、10、11、15、17、18、19 行中的划线文字表示的是新信息，因为它们是刚刚介绍的内容。其他的一些例子就不那么明显了。第 3、11、14、15、18 行中的的名词短语也被加粗了，把它们看作已知信息，这是一种假定的状态，是因为作者、读者共享湖泊及其环境的相关知识。但是湖同样也包括当地的鸟类，例如苍鹭以及鸥等，所以我们很好奇为什么第 18、19 行中的的名词短语不能也算作是已知的信息。

3.4.1 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概念基础

关于已知信息和新信息，有两个基本的观点：①已知信息表示的是说者和听者以某种方式共享的所指；②已知信息是一种在认知上被激活的所指。

3.4.2 作为共享信息的已知信息

传统上来说，指称管理认为一个已知的语义论元（semantic argument）同样具备类似于**旧的**或**已知的**或**知晓的**信息的语用状态。在布拉格学派中，马西修斯（Mathesius，1939）认为，言说中的部分内容表示的是听者从之前的语境中获取或推断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知晓的**（**旧的**，**已知的**）。它们与言说中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截然相反，即说者呈现出的新（未知）信息，也就是言说所要表达的内容。马西修斯考察了这种信息状态是如何经由诸如词序、声调以及其他句式等不同的策略而体现出来的。以丹尼斯和费尔巴斯为代表的其他布拉格学派的学者，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内容。

韩礼德（Halliday, 1967a; 1967b）则把一个既定句子中的每一个信息单元都与之前的话语联系了起来。他在**已知的**和**新的**信息之间作出了区分。新信息表示的是在说者看来听者未知的信息。已知信息则是说者认为听者知晓的信息。不同于布拉格学派的研究者，韩礼德在**知晓的**和**未知的**信息之间作了进一步的区分。韩礼德认为，如果说者假定听者可以辨识所指，那么这个信息

【45】 就是知晓的，反之这个信息是未知的。杜波依斯（DuBois, 1980）同样在指称管理中认同了可辨识性的重要性。

普林斯（Prince, 1981）发现这些直观的、吸引人的概念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她提出了一种信息类型的多方式的划分方法。①当一个所指第一次被引入话语中时，它是**新的**。新的所指也许是**全新的**内容，即说者新创建的内容，也可能只是**未用**信息，即那些说者认为听者知道、可是没有在前文提及的实体。②如果一个所指已经是话语的部分内容了，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被唤起的**（evoked）。如果听者先前就在说者的指导下（如说者提及了所指）唤起了某个所指，那么这个再次出现的所指就是**被文本唤起**的；如果听者知道如何自己来唤起某个所指，如指代听者的称呼“你”，那么这个所指就是**被情境唤起的**。③如果说者假定听者可以利用知识和推理来推断某个所指，那么这个所指就是**可推知的**（inferable）。所指既可以通过文本也可以通过情境推断而来。

3.5 作为一定程度记忆激活的已知信息

切夫（Chafe, 1976; 1987; 1994）根据在我们意识中所激活的内容探讨了信息状态这一问题。他提出，一个特定的概念在话语处理的特定时段会有三种不同的激活状态：**活跃**（对应“已知”），**半活跃**（可理解的），或者**不活跃**（对应“新的”）。

如果说者在说出一个语调单元之前，就假设某个概念在听者的大脑中已经处于活跃状态，他会以一种弱化的方式用言辞将这个概念表达出来，最有可能的是对其作代词化处理。如果他假定一个概念目前还没有在听者的意识中处于活跃状态，他便会选择不那么弱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概念，并极有可能将其作名词化处理。

在克拉克和哈维兰（Clark and Haviland, 1974）对“已知—新信息策略”的讨论中，他们将这些观念与记忆过程联系起来。说者说出的每一句话中都包含了一些旧有的或已知的信息，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信息。旧有信息就像是一个提示，帮助听者在其记忆中寻找到与当前语句所传达的内容相关联的信息，因此可将其视为“一种具体说明在哪里把新信息整合到原有知识中的指南”（Clark and Haviland, 1974: 105）。所以，代词和限定性名词短语更多地用来指向旧有的和已知实体，非限定性名词短语则指向新的信息。

吉冯（Givon，1983）也是在认知基础上来考量指称管理。他观察到说者会估量一个给定的所指在听者的心理层面上的可理解程度。如果理解程度很高，说者会用一个简短的指代形式来标示所指（省略或代词化）。如果理解程度比较低，说者便会采取一种较长的语言形式，也许是一个简单名词性短语或者是一个附有修饰词的名词短语。如果理解程度非常低，说者可能会运用非限定性名词短语或其他手段，以将所指引入概念表征。

【46】 阿里尔（Ariel, 1990; 1991; 1994; 1996）提出并发展了一种针对句子和话语回指的认知方法，该方法主张，指称性表达表明具体的心理表征的可理解程度。她认为，通过选择不同的先行词，一个已知的回指词显示了对其预期的潜在所指的某种特定的认知理解程度。换言之，先行词不

是事先既定的，而是根据一个特定的回指词所采取的形式与其一系列具体的语义属性以及语用和语境信息而“获取理解”的。按照这种观点，可理解性相当于是一种实体被提及的语境，也是一种用来获取该实体的线索。

3.6 指称管理和知识整合

指称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话语生产和理解的过程中了解说者和听者是如何追踪所指的。追踪这些所指又涉及三个相关的问题：①在话语中引入所指；②在引入所指之后继续维持指示状态；以及③在长时间间断后重新引入所指。为此，几乎现行所有的应对方法都采用了某种对心理模式或概念表征的管理观念。说者会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来将所指引入话语，具有代表性的形式为非限定性名词短语或焦点句的语调或词序。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引入是将所指从幕后移到台前，或从长期记忆储存转移到当前的概念表征。

说者也会使用其他语言形式，最典型的就是回指形式、代词化或限定性名词短语，以示意听者哪些所指是可用的。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指看作是被激活的，或者是被安置于概念表征之中的。此外，说者可以在一段长时间间断或一些其他形式的中断之后，重新引入所指。对这些所指的历时追踪，涉及一种重要的介于所指激活状态与话语间隔长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中，针对话语的指称管理问题，有众多的研究方法，其中片段模式（episode model）（Fox, 1987; Marslen-Wilson et al., 1982; van Dijk and Kintsch, 1983）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模式把**回指**（anaphora）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特定的话语结构——段落或**片段**——所具有的功能。虽然文本可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生成，但是它们仍然是作为一组片段，按照高低等级加以组织和处理的，也就是说，语义单元将受控于更高级别的宏观命题（van Dijk and Kintsch, 1983）。

片段作为语义单元受控于宏观命题，多项研究发现这一观念具有心理学的关联。例如布莱克和鲍尔的研究（Black and Bower, 1979）表明，在一个以故事处理为考察对象的心理学研究中，片段作为叙事记忆的组集而存在。类似地，金敦和金奇（Guindon and Kintsch, 1984）发现，宏观结构的形成似乎是一个近乎自动的过程。也就是，在阅读和提取与一段文章相关的宏观命题时，人们似乎在尽可能快地形成一种宏观结构。上述学者的研究发现为金奇和梵·迪克（Kintsch and van Dijk, 1978）以及尚克和埃布尔森（Schank and Abelson, 1977）的片段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提供了依据。

话语组织的认知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话语结构和回指之间的关系。一个片段，作为一个包含于宏观命题之中的语义单元，是一个记忆组集的文本表达形式，它表现出持续的注意力，并且一直延续，直至抵达片段边界为止。在处理完片段之后，注意力便发生转移。换言之，“在对同一个片段的剩余内容的解读之中，宏观命题会继续保留在短时记忆中。当某些命题不再能以契合该宏观命题的方式进行解读时，一个新的宏观命题便建立了”（van Dijk, 1982: 191）。在片段边界处，解码的负荷将更重，所涉及的指称内容更加难以理解，所以需要一个更明晰的回指形式来编码所指。而当某片段之中的宏观命题仍在维持时，所考虑的所指就变得更易于理解，所以即使一个不太明确的回指形式也足以编码指称内容。【47】

诚然，诸多关于回指的研究都指出，名词性回指和代词回指的轮替使用发挥着段落或者片段结构的功能。例如海因兹（Hinds, 1979）讨论了段落结构是如何决定对名词短语和代词的选择的。他发现在一段话的关键句子中，名词短语被用于传达“语义显著的”信息，而代词则在非关键句子中被用于表示“语义次要的”信息。福克斯（Fox, 1987）的研究则说明话语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了回指的基本模式：名词短语通常出现在“发展结构”的开头，以区分新的叙事单元，而代名词则被用于结构内部。马斯伦－威尔森等人（Marslen-Wilson et al., 1982）认为，说者对指称形式的使用，是受话语结构和说话语境所支配的。回指的一般性模式是在某个特定的指称对象受到关注的程度较低时，说者会在片段中运用名词短语以及合适的名称来建立初始的指称，而当指称对象受到关注的程度较高时，则运用代词在一串行动序列中维持指代。

虽然片段模式预先假定了认知限制和话语层级组织的重要性，但它也面临着困境，即在理论上未能很好地界定诸如段落、片段、事件和主题等此类结构单元。在口语和书面文本里，许多结构单元难于识别，且很容易就被错误地阐释。

为了解决这个出现在前人研究中的问题，汤姆林（Tomlin, 1987a）尝试着引入了注意力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他把回指的运用与注意力、记忆的认知活动直接关联起来。他认为，一个片段代表了连续的注意力，一直持续到注意力发生转移为止。在他的研究中，一个片段用一张幻灯片图片来呈现；投影仪的幻灯片切换为受试主体给予了足够强的感知中断，这个切换周期就相当于片段边界。他以实验表明，当注意力发生转移，名词短语便被用于片段边界处，而当注意力持续时，代词便会被用于片段内部（还可参阅 Tomlin and Pu, 1991）。

另一个重要的指称管理模式是吉冯（Givon, 1983）提出的距离模式，它说明了话语中回指和指称距离的相关性，例如在已知回指词与其先行词之间的小句数目，就是指称距离的一种反映。【48】此模式所隐含的“象似性原则（iconicity principle）”是，指称距离越远，听者越难辨认所指，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更明确的指称形式（例如完整的名词短语）。相反，距离越近，听者越容易辨认所指，因此可以采取不那么明确的指称形式（词汇代词或零形回指）。

3.7 话语的主位管理

主位管理的核心思想在于，某些概念和命题似乎对于话语的发展而言比其他概念和命题具有更中心或更重要的地位。这些首要的概念和命题提供了一种框架或架子，围绕此框架来安排话语的细节内容。在此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①是什么因素导致一个概念或命题显得更为重要呢？②这种重要性是如何与话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③说者如何才能使这种重要性传递到听者那里？以及④听者又是如何才能知道应该何时把一个概念或命题解读为重要的呢？

3.7.1 主位或话题：概念性起点

关于小句层面的主位或话题的观点和议题，已有一些相当出色的研究文献（Góez-Gonzáez, 2001; Goodenough, 1983; Gundel, 1988b; Jones, 1977; Schlobinski and Schüze-Coburn, 1992）。理论上认为每一个小句或语句都包含一个对于话语更为重要或中心的元素（更专业的说法是，它充当着话语的*起点*），或者充当谓词表达所*关涉*的那个元素。

要理解主位或者话题的思想，我们需要处理三个相关联的问题。首先，主位或话题有其理

论定义，一般以**起点**或**关涉性**(aboutness)为根据来予以表述。其次，它们通过句法形式表现出来，并且一般大多围绕语序（句首或前置）、主语、或者其他的形态－句法线索展开讨论（如日语中的 *wa*，参阅 Hinds et al., 1987）[1]。最后，主位或话题的定义所涵盖的与其句法形式相关的信息程度，与上述（1）（2）两方面内容相互之间发生影响。

在段落片段（4）中，加粗的名词短语表面上是小句层面的主位。而从本质上来讲，每个加粗的名词短语的所指似乎都满足了重要性、中心性、起点以及关涉性等方面的要求。

（4）文本片段摘自于E. 拉瑟福德的通俗小说《血清》（*Sarum*）（E. Rutherford, 1988: 206）：

1 冬末时节，地上的积雪还未融化，
一个新来的大人物抵达了这个小岛。
他中年谢顶，个子很高，一张瘦脸慈眉善目。
据波蒂厄斯观察**他**有两种怪癖：

5 **他**跟人说话的时候会躬下腰来，
就好像 ø 在专心致志地听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在 ø 没有参与到会话中时
他的双眼常常看起来很游离
就好像他在神往某个遥远的地方。

10 **他**是朱利叶斯·克拉西安努斯，接替落魄的德西安努斯·卡图斯的新行政长官。
他的职责包括小岛上所有的财政事务。
在罗马的分权体系下，**他**直接向皇帝进行汇报。

【49】

从整个文本的角度来看，这段话介绍了小说中的一个新人物，一个叫朱利叶斯·克拉西安努斯的人，并且展开了对他的初步描述。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围绕小句层面上的主位或话题的基本观点和议题。首先，有数个小句中都展现了典型的小句层面主位（3，4，5，10，12）。其中，每个例句中加粗名词短语的所指是这段话中最中心或者最重要的角色，它同样也是与谓词表述相关的所指。通过该所指，故事描述也得以推进。尽管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主位的决定性特征，但是，在每个例句中的相关名词短语都是该小句的主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正是基于对这些例子的考察，学者才构建了主位和话题的核心理论思想。

其次，在主位和话题的相关讨论中，几个小句也说明了一些不确定的问题。首先，我们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对待小句 2 中的主语，**一个新来的大人物**。有些人会认为这个名词短语并**不是**一个主位，因为该信息从指称上来说是新信息，而不像其他典型例句中的名词短语那样。其他人会说，这个名词短语恰恰就是主位，因为它的指称地位从原则上来说独立于其主位地位，而在这个小句中，正是这个名词短语才构成了该语句的起点，同时也是谓词表述之关涉。

第三，如何看待小句 8 和 11 中的主语，也不甚清楚。这两个小句都没有指示出段落中的主要角色，所以很难坚持认为这个所指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小句本身，粗体的名词短语似乎都是语句的起点，也是和语句谓词相关的名词短语。

1　为语法助词，有研究者认为它的语法功能就是标示其前面的部分为话题。——译者注

最后，例子中还有几个从句，包括嵌入式的，这些从句要么具有明确的主语，要么省略了主语。至于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从句中关键性名词短语的主位地位，我们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有了对这些现象的思考，我们便可以开始进一步细致地探索与小句层面的主位和话题有关的主要观点。

3.7.2 主位和话题的概念基础

尽管在定义的形成以及所界定的具体术语方面存在着个别提法的差异，但是从本质上而言，【50】关于小句层面的主位或话题的构成有三种基本的观点：①主位是句子**所关涉的**内容；②主位是句子的**起点**；③主位是一句话中**注意力的**中心。

3.7.3 作为关涉性的主位

古典的语言学和逻辑学，根据句子叙述了什么事物以及叙述了这个事物的什么内容，把句子成分作出了区分，也就是传统上的**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区别。当代研究已经发展了这一思想，从关涉性的角度提出了小句层面的主位或话题。当某个特定的所指即是其所在句子的其余部分之关涉时，该所指便可视为主位。冈德尔（Gundel, 1974; 1988b）做了一个针对关涉性的经典“测试”：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如果某个特定的名词短语可以被放在以“**至于**（As for）”开头的前置状语中，那么这个名词短语就可以算作是该句的话题。因此例子（4）的第 8 个小句中的加粗的名词短语就可以视为是一个话题，因为这个所指正好符合下面这个句子：

（5）至于他的双眼，它们看起来变得很游离……

当前本领域的研究主要考察的就是作为**关涉性**的主位或话题。这一研究议题始于布拉格学派的经典研究，随后韩礼德（Halliday, 1967b; 1973; 1976）以及韩礼德和福西特（Halliday and Fawcett, 1987）的研究推进了本领域的发展，而在当前的众多研究中，它俨然居于显要地位（Gundel, 1974; 1988b; Hajicova, 1984; Lambrecht, 1994; Reinhart, 1981; Vallduvi, 1992）。

3.7.4 作为起点的主位

主位同样被认为是作为信息的语句的起点。这个起点有助于架构该语句，把谓词和某个为话语参与者所共知、共享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方法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主位是已知的或知晓的信息。它和**关涉性**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它更强调话语的动态本质，以及对于话语的历时处理，或随时间发展所发生的变化（Chafe, 1994）。这种方法体现在威尔（Weil, 1887）的早期研究中，也是布拉格学派早期思想的体现（Mathesius, 1929）。近期采用了此种视角的学者包括切夫（Chafe, 1994）和麦卡惠尼（MacWhinney, 1977）。

3.7.5 作为注意力中心的主位

关于主位，还有第三种看法，它考察的是小句层面的主位或话题与某种注意力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此方面的早期研究观察到，在生产语句的过程中，某些概念会首先浮现在脑海之中，

也正是这种进入意识的思想，界定了主位。因此，冈德尔（Gundel, 1974:24）的论文探讨了范德加贝莱兹（van der Gabelenz, 1868）对**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的划分，前者是“说者意识中率先出现的想法……是说者在思考并希望听者也去思考的内容”，后者则是“与心理主语相连接的部分”。心理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研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Prentice, 1967; Sridhar, 1988; Tannenbaum and Williams, 1968）。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考察了注意力的认知理论与主位或话题的传统观念有何关系（Tomlin, 1983; 1995; 1997）。

3.7.6 话语层面的主位（整体主位）

一般而言，在一段连续的话语中，会有一个所指居于中心地位，或者说话语中的命题都是关于这个所指的。一个所指所具有的全局重要性，影响了小句层面所做的选择；也就是说，小句层面的主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某种更高层级的话语单元如某个段落或片段的局部反映。考虑到小句中可以存在两个所指，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局部的主位，当然将根据其与更全局的或更高层级的主位之间的紧密关系而确定。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给定的段落或片段是关于玛丽的（而不是关于约翰的），那么这一段中涉及了玛丽和约翰的小句应该倾向于把玛丽作为小句层面的主位，因为玛丽与更高层级的片段或段落主位之间的一致性更强。

“整体主位”（global theme）这个术语，同样和整个话语所关涉的内容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整体主位一般是以命题的形式而非一个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Jones, 1977; Keenan and Schieffelin, 1976; van Dijk, 1985）。虽然不如局部语句层面的主位那么受学者重视，但是整体主位的重要性依然得到了肯定。作为说明示例，请看下面这段话（摘自于 van Dijk, 1985: 298）：

（6）今天早上我牙疼。我去看了牙医。牙医有一辆很气派的轿车。这个车是在纽约买的。纽约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困境。

虽然每句话都和前一句话因一个共同的所指而相连，但是这段话作为一个整体仍然缺乏连贯性，而这正是因为这段话没有一个整体主位。

而且，一个界定明确的整体主位有助于文本的理解；它通过激发话语解读者的心理模式（表征）而发挥着一个先行的组织者（Frase, 1975）、一个支架（Anderson et al., 1978）或者说是一个定位点（Pichert and Anderson, 1977）的作用。一个界定明确的整体主位还可以唤起相应的知识结构，不管这个组织性结构是被称为**图式**（schema）（Rumelhart, 1980），还是**框架**（frame）（Minsky, 1975）、**脚本**（script）（Schank and Abelson, 1977），或是**场景**（scenario）（Sanford and Garrod, 1980）。话语解读者不仅构建了话语模式，也构建了语言表征，这一点已经在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参阅 Bransford and Johnson，1972）。

最后，句子层面的主位和话语层面的主位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呢？许多学者推测，更高层级的主位的一个功能就是分配低层级的主位。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金的实验性研究（Kim, 1996; 2002）把整体主位从局部主位中分离了出来，并且发现在英语和韩语中整体主位对于主语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实际上它们在话语生产中有单独的作用。

3.7.7 前景和背景：命题中心性

正如其他核心的话语概念，话语中的**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信息这一对概念，【52】作为解释语言中结构性交替的一种尝试，出现在了语言学研究之中，对这种结构性交替尚无明白无疑的语义解释。例如，请看例（7）中的段落：

（7）示例段落：

这是平静、祥和的一天，小鱼一如既往畅游在它的天地。就在优雅地游向水面之时，这只小鱼受到了令它生畏的敌人——螃蟹的惊吓。它们惊讶地相互盯着对方，尽管小鱼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险境。小鱼还没来得及安然脱逃，螃蟹就开始疯狂地攻击它，用它长长的钳子去钳夹鱼身体任何可攻击的部位。未经细想，小鱼飞快地逃离了螃蟹。

划线的小句都是从属的状语从句；加粗的小句都是简单的独立小句。关键问题是：这个片段中的某个既定命题，是作为从属的从句出现、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小句出现的，这一点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传统的回答相当简单：独立小句中出现的是更重要一些的内容，而从属从句中的则是不那么重要以及辅助性的内容。对于**前景和背景信息**这一对话语概念的种种看法和认识，都采纳了这一传统的观点，并且发展了其内涵。

关于前景问题的最早的一些研究（Grimes, 1975; Longacre, 1968; 1976; 同样比较参考 Labov and Waletzky, 1967），把**骨干**信息（backbone information）和**背景**信息区分开来，并且用这种区别解释了许多语言中存在的句法性交替。对于圣经中的希伯来语，朗加克（Longacre, 1976a）观察到包含 *waw-* 谓语结构的小句的子集组成了全部叙事的一种连贯摘要，而其他的小句则不行。因此，*waw-* 谓语结构似乎被用来标记了那些组成叙事骨干的小句的重要性。

再后来，霍珀（Hopper, 1979）的研究发展了朗加克和格兰姆斯最初提出的观点。叙事话语中的前景信息包括"属于话语骨架结构的叙事部分"（Hopper, 1979: 213），而背景信息是"自身与主要事件无关但却是对辅助材料的表达"（Hopper, 1979: 213）。霍珀（Hopper, 1979）主张，前景小句既与独立小句也与完成体有关（同样参阅 Hopper and Thompson, 1980）。而且，霍珀把前景信息与叙事话语的事件线联系了起来（Hopper, 1979; Labov and Waletzky, 1967）。与主要事件线上的事件有关的小句就是前景小句，而那些与非主要事件有关的小句则为背景小句。近期的研究则考察了话语中前景化（foregrounding）和背景化（backgrounding）信息中的动词时体的角色以及具体的小句结构（Carreiras, Carriedo, Alonso and Fernádez, 1997; Depraetere, 1996; Glasbey, 1998; Yourssef and Winford, 1999）。

大多数关于前景－背景信息区别的研究都是指向叙事话语。说明性话语（expository discourse）则需要前景化处理，对其进行理论性界定时不依赖于事件线这一概念（Jones and Jones, 1979）。汤姆林（Tomlin, 1984; 1985; 1986）提供了一种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目的，减少对事件线依赖的前景化的处理方式。在这种处理中，前景化被看作是一个主位问题。对于话语中的任一给定的命题，话语主位与话语的修辞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造就了这一命题的中心性。

【53】3.8 焦点管理

焦点管理（focus management）领域内最主要的发现在于，某些概念和命题在听者看来显得

更新颖或更出其不意。事实上，新的概念和命题似乎就是说者言语的目标，也就是说者希望听者加入其心理表征中的那部分具体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包括：①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个概念或命题更为新颖？②这种新颖的概念是如何与正在形成的话语发生联系的？③说者如何才能把这种新意传达到听者一方？④听者如何才能知道应该何时把某个概念或命题解读为充满新意？

3.9 作为显著性的焦点

语言学家所采用的“焦点”这个术语指的是，为了使一些信息在听者那里更醒目，说者包装信息所需要的资源。与焦点管理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说者如何才能让听者知道，关于语句中的那个中心元素，哪一部分信息是她尤其应该注意的。

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多种方式，使得说者可以突出某些信息的显著性或重要意义。在英语中（许多其他语言亦是如此），有些词在表达时可以额外重读。例如，请看下面的句子：

（8）I'M not mad at you.（我是不生你的气。）

（9）I'm not mad at YOU.（我是不生你的气。）

这两个例句，组成句子的词语成分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通过刻意重读不同的词语，两个句子所传达出来的意思便略有区别。句子（8）暗含的意思是，虽然我不生任何人的气，但实际上别的人可能在生你的气。而另一方面，句子（9）暗示的是，我*的确*在生某个人的气，但是我的愤怒不是冲着你的。通过使个别词语在全句中凸显出来，听者便会推想，为什么这一特定的信息尤为重要，并且会把这种情况与其他可能的情况作对比。在这些情境中，可以认为聚焦的信息具有一种对比的功能。

3.9.1 焦点的界定

学者威尔（Weil, 1887[1844]）率先阐述了一个句子中各元素所具有的不同的重要性。他提出，一句话的“焦点”与下一个话题（或主位）有关。在威尔之后，那些关注句子元素交际动力的布拉格学派的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Firbas, 1974; Vachek, 1966）。而韩礼德（Halliday, 1967a）则详细说明了布拉格学派的研究工作，并考察了他所谓的*信息结构*。对于韩礼德而言，焦点是以音高显著性的方式来突显新信息的，而主位则是那些置于句首的信息元素。 【54】

承袭着韩礼德以及后来乔姆斯基（Chomsky, 1970）的研究，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考察了在决定句子的语义表征时话题和焦点所处的重要地位。我们通常认为，在许多欧洲语言中，焦点主要在句末的部分，而在句末时，它不需要被加以强调。但是当一个聚焦的元素出现在句子靠前的部分时，我们就会在语调上对其强调，而跟着它出现的名词短语就是句子的主位。其他的语言对这些处理策略做了一定的改变。例如，在亚瓜语（Yagua）中（Payne, 1992），聚焦的信息出现在句首部分，但有时同样也会在句末重复出现。

切夫的研究（Chafe, 1976）对焦点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考察的是所指的状态，也就是在一个句子表征之内的那些名词的相关内容。一种状态是，“受话者如何能够根据某个语境的背景来处理说者正在表达的内容以及说者对此所作的评估”。在此，焦点与信息的包装方式有

关，也就是说者为听者呈现信息的方式，而非信息本身的内容。说者将以不同的方式包装信息，具体取决于他对听者心理状态的评估，即评估她正在想什么。切夫考察了个体在包装现象时的焦点反差（或对比性）。在英语中，这一般是通过对句子的某个元素作高音和重读处理来体现的。

针对语言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焦点现象，迪克的研究（Dik et al., 1981; Dik, 1989）提供了一些实用而详细的讨论内容。迪克试图确定的是，如果我们要解释不同语言中所有的焦点现象，那么必须有哪些不同的焦点范畴。就像其他学者那样，迪克（Dik, 1978; 1989）也对比了话题和焦点。话题呈现了在既定情境中与述谓结构的谓词有关的实体。而焦点代表的则是在既定情境中最重要或最显著的信息。

与切夫和韩礼德类似，兰布雷希特（Lambrecht, 1994）一直在关注信息是如何架构的，他试图弄清说者如何操控语句的焦点，以满足说者所设想的听者的需求。对于兰布雷希特而言，焦点是命题所主张的、说者期望听者在听到了言说的句子之后而知道、或习惯的那部分内容。主张的信息则与预设的信息形成了对比，后者是说者认为听者**已经**知晓的或者习以为常的信息。兰布雷希特辨析了三种不同的焦点类型：谓词焦点、论元焦点和句子焦点。每一种类型的焦点都出现在截然不同的交际情境中。

普林斯（Prince, 1978）探索了英语中的两种焦点结构，研究了它们在自然话语中的使用。如下例子展示了这些被称为分裂句（或 it- 分裂句）和假 - 分裂句（或 WH- 分裂句）的句式。

（10）（a）John lost his keys. (Neutral construction)
约翰丢失了他的钥匙。（中性结构）
（b）What John lost was his keys. (Pseudo-cleft)
约翰丢失的是他的钥匙。（假 - 分裂结构）
（c）It was his keys that John lost. (Cleft)
他的钥匙正是他所丢失的。（分裂结构）

虽然三句话所表达的基本信息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包装信息块的方式却不一。具体来说，【55】它们在哪些信息是聚焦的、哪些信息是预设等方面有所不同。从逻辑上来讲，（b）和（c）都预设了“约翰丢失了某种物品”这一点，但（a）却没有。而（b）和（c）中没有预设的信息是“某种物品”为何物，即“钥匙”，这是句子的焦点。因为（b）和（c）具有同样的预设和同样的焦点，许多语言学家一直以来都把它们看作是本质同义的（Bolinger, 1972; Chafe, 1976）。普林斯的研究却表明并非如此。

近年，李、戈登和伯灵（Lee, Gordon and B ü ring, 2007）梳理了一批从一种宽泛的类型学视角来探索话题和焦点的语义和韵律学成分的论文，表明了从语调上体现焦点在不同语言中的范围和局限。

总而言之，说者会试着让一些信息在听者那里更突出、更显著。针对不同的语言，他们有诸多可用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聚焦信息的目标。

3.10 话语语义学的认知研究路径

话语语义学研究的长远未来，在于对话语理解和生产的认知模式的发展。对信息管理的基

本概念，主位、已知的 / 新的、前景、焦点等，在发展出理论上理想、经验上可行的定义方面经历了重重困难。这使得不少研究者一直在探索这么一种策略，它能让话语概念以认知方式实现操作化，或者可以全部用认知的视角来替代传统的观点。

在指称管理中，许多学者致力于从记忆或记忆激活的角度，对已知的和新的这一对传统的概念进行重新考量。切夫（Chafe, 1987）就提供了这么一种解决对策，尽管他并没有把他的理论直接与认知学研究文献联系起来。其他学者也把记忆研究领域的观点吸纳到指称管理模式中来，而这种模式的建立基于对片段结构和记忆激活的实验性操控（Tomlin and Pu, 1991）。

在主位管理中，学者也把精力放在证明主位和注意力之间的联系上。针对这个问题，已有数篇相当出色的总结性文章可供参考（Cowan, 1988; Posner and Raichle, 1994; Tomlin and Villa, 1994）。汤姆林和他的学生们所做的研究认为，主位这种想法本身就可以简化为一种认知的观点，尤其是可以简化为在语句组成之时的注意力探测（Forrest, 1992; Tomlin, 1995; 1997; Tomlin and Villa, 1994）。根据这种观点，注意力的认知过程不仅仅是语言学主位或话题的认知反映，更要强调的是，主位或话题的概念被当作是话语生产过程中在概念表征内施加注意力时所产生的一种人工制品。最近的这方面研究则把作为注意力连接物的主位或话题扩展到了认知处理的其他方面（Myachykov and Tomlin, 2008; Myachykov, Posner and Tomlin, 2007; Myachykov, Tomlin and Posner, 2005）。【56】

对于焦点管理，也有许多重要研究结合了认知的内容，主要以兰布雷希特（Lambrecht, 1994）和瓦尔杜维（Vallduvi）为代表。其他的一些研究者把焦点看作是另外一种关涉注意力的研究内容（Erteschik-Shir, 1986; Levelt, 1989）。这一观念认为，焦点并不是名词短语或论元的一种状态，而是在话语生产和理解过程中将听者注意力引向某个所指的一种结果。一种有意思的看法是厄尔特希克 – 谢尔的支配观念，即如果说者打算把听者的注意力引向某个特定的所指，那么这个句子成分就是占支配地位的。

所有这些学者的尝试和努力所体现出的共同愿望，远远不仅仅只是为了克服在充分发展信息管理理论定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研究路径逐渐从对处于语用状态的文本结构进行概念化（例如，名词短语是一个话题；论元是一个焦点），转向对动态的话语和语法的概念化。在这种视角下，形态 – 句法的线索揭示了说者概念表征的记忆和注意力特征，并且引导听者使其概念表征的记忆和注意力特征符合说者的概念表征。注意力和记忆流会随着概念表征实时地发生变化；正如切夫（Chafe, 1974）早期所观察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信息会随着时间发展在话语中发生变化。

3.10.1 知识整合模式

研究者同样开始逐步转向对知识整合的认知处理。知识整合需要大规模的模式，来反映单独的命题是如何在纳入文本表征之后，经由整合在听者的头脑中生成最终形式的概念表征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个尤为重要的模式：格恩斯巴彻的结构建构模式和金奇的建构 – 整合模式。但是在话语中，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更加综合全面的知识整合模式。首先，一个更全面的模式必须更有效地处理形态 – 句法在帮助知识整合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

格恩斯巴彻还是金奇的模式都未能充分处理（作为与其内容相对的）语句形式如何帮助实现知识整合这一问题。其次，这个模式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话语生产和理解的过程中，文本表征——一组与实际的文本蓝图密不可分的彼此连接的命题——如何与更深层次的概念表征产生联系。最后，这个模式还应该明确地反映出语言使用和概念化的动态本质。语言使用的短暂性特征很可能与话语语义学无不关联，相反，当人类共同生产话语时，它们会限制最终可行的系统的种类。

【57】

3.11 结　语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话语语义学的核心议题和概念。这一领域涉及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知识整合的问题：文本和话语中单独的命题如何整合在一起来恰当地反映说者的概念表征，并且优化出在听者一方所产生的一种适合的概念表征。其二是信息管理的问题：在创造蓝图的过程中，随着说者和听者互动，信息是如何组织和分布的。在这一方面，我们考察了四种互不相同的信息管理类型：修辞管理、指称管理、主位管理以及焦点管理。在话语展开的过程中，每一种信息管理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帮助提升了知识管理的效力。

但是本章也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局限性。首先，我们没有考察话语语义学的正式模式。尽管许多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会想要了解坎普和雷勒（Kamp and Reyle, 1993）所做的一些重要研究，但是这一块内容最好还是留给那些知识功底更深厚的学者去探索吧。其次，我们无法如一些读者所愿，针对个别学者的研究工作进行详尽的介绍和阐述。我们撰写本章的重点在于为读者提炼出每个领域中核心的见解，唯愿这一番努力能够引领一些读者去进一步钻研相关的研究和原始资料。

延伸阅读

值得细品和深挖的且与本章所涉议题相关的著作列举如下：

Gernsbacher, M.A. (1990)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s Structure Buil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这个研究提出了一种重要的结构－建构框架，它把语言理解的目的视为建立一个连贯的结构心理表征。它结合经验性证据，描述了潜藏在语言理解背后的一般性认知过程和机制，以及结构－建构过程中记忆激活所扮演的角色。

Graesser, A.C. and Millis, K. (2010)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Chapter 7, this volume).

在此书的这一章节中，作者对近年来采用了认知方法的话语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并且详细讨论了建立多层级话语模式的不同领域尤其是在计算机语言学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这些领域对于研究话语理解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Halliday, M.A.K. and Matthiessen, C.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New York: Cassell.

这本书是基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针对语义学及其与认知、句法之间的关系，它提供了一种综

合的考察视角，着重对作为一种语义系统的人类经验进行了说明。它代表了研究语言和认知关系的一种颇有意思的另类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通过根据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来阐释语言，而是根据与语言过程之间的关系来阐释认知"（p. x）。【58】

Levelt, W.J.M. (1989) *Speak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这本著作不仅从基础层面上探讨了语言的处理和生产，并且还展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全面研究认知和语言的复杂性的研究起点，及其与话语语义学的交互影响。

van Dijk, T.A. (forthcoming)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是梵・迪克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作为对他之前研究话语和认知的著作的延续与拓展，这本书包含的是对话语处理中的知识整合和概念表征的综合性研究。我们尤其希望读者能够阅读"话语、知识和认知"这一章节的内容，它探索和详述了涉及话语处理和知识系统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的认知性基础。

在线阅读

下面这些文章可在网站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在线阅读：

Anderson, R.C., Spiro, R.J. and Anderson, M.C. (1978) 'Schemata as scaffolding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onnected discours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3): 433-40.

Taboada, M. and Mann, W.C. (2006a)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Looking back and moving ahead'. *Discourse Studies*, 8(3): 423-59.

Taboada, M. and Mann, W.C. (2006b) 'Applications of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Discourse Studies*, 8(4): 567-88.

参考文献

Anderson, R.C., Spiro, R.J. and Anderson, M.C. (1978) 'Schemata as scaffolding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in connected discours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5: 433–40.

Ariel, M. (1990) *Accessing Noun-phrase Antecedents*. London: Routledge/Croom Helm.

Ariel, M. (1991) 'The function of accessibility in a theory of grammar'. *Journal of Pragmatics*, 16 (5): 443–63.

Ariel, M. (1994) 'Interpreting anaphoric expressions: a cognitive versus a pragmatic approac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0: 3–42.

Ariel, M. (1996) 'Referring expressions and the +/- coreference distinction'. In T. Fretheim and J.K. Gundel (eds), *Reference and Referent Accessibil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35.

Austin, J.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aggett, P. (1982) 'Information content equivalent movie and text stories'. *Discourse Processes*, 5: 73–99.

Black, J.B. and Bower, G.H. (1979) 'Episodes as chunks in narrative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8: 309–18.

Bolinger, D. (1972) 'A look at equations and cleft sentences'. In E.S. Firchow, K. Grimstad, N. Hasselmo and W.A. O'Neil (eds),*Studies for Einar Haugen Presented b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 Hague: Mouton. pp. 96–114.

Bransford, J.D. and Johnson, M.K. (1972) 'Contextual prerequisites for understanding: some investigations of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1: 717–26.

Carreiras, M., Carriedo, N., Alonso, M. and Fernández, Á. (1997) 'The role of verb tense and verb aspect in the foregrounding of information during read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 438–46.

Chafe, W. (1974)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Language*, 50: 111–33.

Chafe, W. (1976) 'Given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topics, and points of view'. In C.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5–56.

Chafe, W. (1979) 'The flow of thought and the flow of language'. In T. Givon (ed.),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59–81.

Chafe, W. (1980a) 'The deployment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duction of narrative'. In W.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pp. 9–50.

Chafe, W. (ed.) (1980b)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Chafe, W. (1987)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 In R.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1–51.

Chafe, W.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omsky, N. (1970) 'Deep structure,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R. Jacobson and S. Kawamoto (eds),*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Presented to Shiro Hattor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Tokyo: TEC Corp.

Clark, H.H. and Haviland, S.E. (1974)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s linguistic explanation'. In D. Cohen (ed.), *Explaining Linguistic Phenomena*.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pp. 91–124.

Cohen, P.R. and Perrault, C.R. (1979) 'Elements of a plan-based theory of speech acts'. *Cognitive Science: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3: 177–212.

Coulthard, M. (1977)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Coulthard, M. and Montgomery, M. (eds) (1981) *Studi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owan, N. (1988) 'Evolving conceptions of memory storage,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their mutual constraints within the hum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system'.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4 (2): 163–91.

Depraetere, I. (1996) 'Foregrounding in English relative clauses'. *Linguistics*, 34: 699–731.

Dik, S. (1978) *Functional Gramma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Dik, S. (1989)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Dordrecht: Foris.

Dik, S. (1997)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Vol 2*. New York: Mouton de Gryuter.

Dik, S., Hoffmann, M.E., Jong, J.R.D., Djiang, S.I., Stroomer, H. and Vries, L.D. (1981) 'On the typology of focus phenomena'.In T. Hoekstra, H.V.D. Hulst, and M. Moortgat (eds), *Perspectives on Functional Grammar*. Dordrecht: Foris. pp. 41–74.

DuBois, J.W. (1980) 'Beyond definiteness: the trace of identity in discourse'. In W. Chafe (ed.), *The Pear Stories: Cognitive,Cultur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Narrative Production*. Norwood, NJ: Ablex. pp. 203–73.

Erteschik-Shir, N. (1986) 'Wh-questions and focu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9: 117–49.

Fawcett, R.P. (2000) *A Theory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irbas, J. (1964a) 'From comparative word-order studies (thoughts on V. Mathesius' conception of the word-order system in English compared with that in Czech)'.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4: 111–28.

Firbas, J. (1964b) 'On defining the theme in functional sentence analysis'.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1: 267–80.

Firbas, J. (1974) 'Some aspects of the Czechoslovak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In F. Danes(ed.), *Papers o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The Hague: Mouton. pp. 11–37.

Firbas, J. (1987a)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me in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In R. Dirven and V. Fried (eds), *Functionalism in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7–56.

Firbas, J. (1987b) 'On two starting points of communication'. In R. Steele and T. Threadgold (eds), *Language Top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3–46.

Firbas, J. (1992)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in Written and Spoken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rest, L.B. (1992) 'How grammar codes cognition: syntactic subject and focus of attention'. Unpublished MA thesis,University of Oregon.

Fox, B.A. (1987)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Anaphora in Written and Conversational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se, L.T. (1975) 'Prose processing'. In G.H. Bower (ed.),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47.

Gernsbacher, M.A. (1990)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s Structure Buil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Givon, T. (ed.) (1983)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 A Quantitative Cross-Language Stud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on, T. (1989) *Mind Code and Context: Essays in Pragmatic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Givon, T. (1991) 'Serial verbs and the mental reality of "events": grammatical vs cognitive packaging'. In E. Traugott and B.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81–127.

Glasbey, S. (1998) 'Progressives, states, and backgrounding'. In S. Rothstein (ed.), *Events and Grammar*.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pp. 105–24.

Gómez-González, M.A. (2001) *The Theme-Topic Interface: Evidence from English*.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oodenough, C. (1983) 'A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me and information focu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

Grimes, J. (1975) *The Thread of Discourse*. The Hague: Mouton.

Grosz, B. (1974) 'The structure of task oriented dialogue' (in German). In *IEEE Symposium on Speech Recognition: Contributed Papers*.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pp. 250–3.

Guindon, R. and Kintsch, W. (1984) 'Priming macroproposition: evidence for the primacy of macroproposition in the memory for text'.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23 (4): 508–18.

Gundel, J. (1974) 'The role of topic and comment in linguistic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Gundel, J. (1988a) 'Universals of topic-comment structure'. In M. Hammond, E. Moravcsik and J. Wirth (eds), *Studies in Syntactic Typol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09–39.

Gundel, J.K. (1988b) *The Role of Topic and Comment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Garland.

Hajicova, E. (1984) 'Topic and focus'. In P. Sgall (ed.), *Contributions to Functional Syntax, Semantics,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89–202.

Halliday, M.A.K. (1967a)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1'.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37–81.

Halliday, M.A.K. (1967b)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2'.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199–244.

Halliday, M.A.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A.K. (1976) 'Theme and information in the English clause'. In G. Kress (ed.), *Halliday: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4–88.

Halliday, M.A.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A.K. and Fawcett, R.P. (eds) (1987)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Grammar. Theory and Description*. London: Frances Pinter.

Halliday, M.A.K. and Matthiessen, C.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n*. London: Edward Arnold.

Hawkinon, A.K. and Hyman, L.M. (1974) 'Hierarchies of natural topic in Shona'.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5: 147–70.

Hinds, J. (1979)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in discourse'. In T. Givó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Discourse and Syntax*.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35–57.

Hinds, J., Maynard, S.K. and Iwasaki, S. (eds) (1987) *Perspectives on Topicalization: The Case of Japanese'w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opper, P. (1979) 'Aspect and foregrounding in discourse'. In T. Givon (ed.),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Press.pp. 213– 41.

Hopper, P. and Thompson, S.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99.

Johnson-Laird, P.N. (1983) *Mental Mode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ones, L.B. and Jones, L.K. (1979) 'Multiple levels of information in discourse'. In L. Jones and L. Jones (eds), *Discourse Studies in Mesoamerican Languages: Discussion*. Arlington, TX: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p. 3–28.

Jones, L.K. (1977) *Theme in Expository English*. Lake Bluff, IL: Jupiter Press.

Kamp, H. and Reyle, U. (1993) *From Discourse to Logic*. Dordrecht: Reidel.

Keenan, E.L. (1976) 'Toward a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subject'. In C.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pp. 305–33.

Keenan, E.O. and Schieffelin, B. (1976) 'Topic as a discourse notion'. In C.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337–84.

Kim, M.H. (1996) 'Pragmatic determinants of syntactic subject in English'.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 839–54.

Kim, M.H. (2002) 'Thematic management in Korean'. In M. Louwerse and W. van Peer (eds), *The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7–56.

Kintsch, W. (1974) *The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Memor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Kintsch, W. (1988)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Review*, 95 (2): 163–82.

Kintsch, W. and van Dijk, T. (1978) 'Toward a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5: 363–94.

Labov, W. and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r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ambrecht, K. (1981) *Topic, Antitopic, and Verb Agreement in Non-Standard French*.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Lambrecht, K. (1987a) 'Aboutness as a cognitive category: the thetic categorical distinction revisited'. In J. Aske, N. Beery, L. Michaelis and H. Filip (ed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366–82.

Lambrecht, K. (1987b) 'On the status of SVO sentences in French discourse'. In R.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17–61.

Lambrecht, K.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C., Gordon, M. and Büring, D. (eds) (2007) *Topic and Focus: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Meaning and Intonation*. Dordret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Leech, G.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Levelt, W.J.M. (1989) *Speak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evinson, S.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y, D.M. (1979) 'Communication goals and strategies: between discourse and syntax'. In T. Givo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83–210.

Longacre, R.E. (1968) *Discourse, Paragraph, and Sentence Structure in Selected Philippine Languages*. Santa Ana, CA: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Longacre, R.E. (1976a)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of the Flood narrative'. In G. Macrae (ed.),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6 Seminar Papers*. Missoula, MT: Scholars Press. pp. 235–62.

Longacre, R.E. (1976b) *An Anatomy of Speech Notions*. Lisse, the Netherlands: Peter de Ridder Press.

MacWhinney, B. (1977) 'Starting points'. *Language*, 53: 152–68.

Mann, W.C. and Thompson, S.A. (1986) 'Relational proposition in discourse'. *Discourse Processes*, 9: 57–90.

Marslen-Wilson, W., Levy, E. and Tyler, L. (1982) 'Producing interpretable discourse: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efence'. In R.J. Jarvella and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Chichester: Wiley. pp. 339–78.

Martin, J.R. and Rose, D. (2003)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Mathesius, V. (1929) 'Zur Satzsperspektive im modernen Englisch'. *Archiv fur das Studium den neuren Sprachen and Literaturen*, 155: 202–10.

Mathesius, V. (1939) 'O tak zvanem aktualnim clelneni vetnem [On the so-called actual bipartition of the sentence]'. *Slovo a Slovcesnost*, 5: 171–4.

Mathesius, V. (1975) 'On the information-bearing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In S. Kuno (ed.), *Harvard Studi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467–80.

McKeown, K.R. (1985) *Text Generation: Using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Focus Constraints to Generate Natural*

Language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han, H. (1979) *Learning Less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nsky, M. (1975)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 In P.H. Winston (ed.), *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 New York: McGraw-Hill.

Mithun, M. (1987) 'Is basic word order universal?'. In R.S.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81–328.

Myachykov, A. and Tomlin, R.S. (2008) 'Perceptual priming and structural choice in Russian sentence produc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9 (1): 31–48.

Myachykov, A., Posner, M.I. and Tomlin, R.S. (2007) 'A parallel interface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theory, method, and empirical evidence'. *Linguistic Review*, 24: 457–74.

Myachykov, A., Tomlin, R.S. and Posner, M.I. (2005) 'Attention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grammar'. *Linguistic Review*, 22: 347–64.

Payne, D.L. (ed.) (1992) *Pragmatics of Word Order Flexibil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ichert, J.W. and Anderson, R.C. (1977) 'Tak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a stor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9:309–15.

Posner, M.I. and Raichle, M.E. (1994) *Images of Mind.*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Prentice, J.L. (1967) 'Effects of cuing actor vs. cuing object on word order in sentence production'. *Psychonomic Science,* 8: 163–4.

Prince, E.F. (1978) 'A comparison of WH-clefts and it-clefts in discourse'. *Language*, 54: 883–907.

Prince, E.F. (1981) 'Towards a taxonomy of given-new information'. In P. Cole (ed.), *Radical –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23–56.

Prince, E.F. (1985) 'Topicalization and left-dislocation: functional analysi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433: 213–25.

Propp, V. (195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Reddy, M.J.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84–324.

Reinhart, T. (1981) 'Pragmatics and linguistics: an analysis of sentence topics'. *Philosophica*, 27 (1): 53–94.

Rochester, S.R. and Martin, J.R. (1977) 'The art of referring: the speaker's use *of* noun phrases to instruct the listener'. In R.O. Freedle (ed.),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Advances in Discourse Processes.* Norwood, NJ: Ablex.

Rumelhart, D. (1980) 'Schemata: 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 In B. Spiro, B.C. Bruce and W.F. Brewer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Rutherford, E. (1988) *Sarum.* New York: Ivy Books.

Sanford, A.J. and Garrod, S. (1980) 'Memory and attention in text comprehension: the problem of reference'. In R. Nickerson(ed.),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VIII.*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chank, R.C. and Abelson, R.P.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Schlobinski, P. and Schütze-Coburn, S. (1992). 'On the topic of topic and topic continuity'. *Linguistics,* 30 (1): 89–122.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dner, C.L. (1983) 'Focusing in the comprehension of definite anaphora'. In M. Brady and R.C. Berwick (eds), *Computational Models in Discours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267–330.

Sinclair, J.M. and Coulthard, R.M. (1975)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ridhar, S.N. (1988) *Cognition and Sentence Production: Cross-Linguistic Stud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Stout, G.F. (1896) *Analytic Psychology* (2 vols).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Swales, J. (1981) *Aspects of Article Introductions* (Aston ESP Research Report no. 1). The Language Studies Unit, University of Aston in Birmingham.

Taboada, M. and Mann, W.C. (2006a)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Looking back and moving ahead'. *Discourse Studies*, 8 (3): 423–59.

Taboada, M. and Mann, W.C. (2006b) 'Applications of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Discourse Studies*, 8 (4): 567–88.

Tannenbaum, P.H. and Williams, F. (1968) 'Generation of active and passive sentences as a func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focu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7: 246–50.

Tomlin, R.S. (1983) 'On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ctic subject, thematic information, and agent in English'. *Journal of Pragmatics*, 7: 411–32.

Tomlin, R.S. (1984) 'The treatment of foreground-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the on-line descriptive discourse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6: 115–42.

Tomlin, R.S. (1985) 'Foreground-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the syntax of subordination'. *Text*, 5: 85–122.

Tomlin, R.S. (1986) 'The identification of foreground-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on-line descriptive discourse'.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 465–94.

Tomlin, R.S. (1987a) 'Linguistic reflections of cognitive events'. In R. 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455–80.

Tomlin, R.S. (1987b) 'The problem of coding in functional gramma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C Davis Conference on the Interaction of For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Davis, California, April.

Tomlin, R.S. (1995) 'Focal attention, voice, and word order: an experimental, cross-linguistic study'. In P. Downing and M. Noonan (eds), *Word Order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517–54.

Tomlin, R.S. (1997) 'Mapping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nto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grammar'. In J. Nuyts and E. Pederson (eds), *With Language in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2–89.

Tomlin, R.S. and Pu, M.M. (1991) 'The management of reference in Mandarin discour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1): 65–95.

Tomlin, R.S. and Villa, V. (1994) 'Atten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SLA'.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2): 183–204.

Vachek, J. (ed.) (1966) *The Linguistic School of Pragu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Vallduvi, E. (1992) *The Informational Component*. New York: Garland.

van Dijk, T.A. (1977) 'Sentence topic and discourse topic'. In B.A. Stolz (ed.), *Papers in Slavic Philology l: In Honor of James Ferrell*. Ann Arbor, MI: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an Dijk, T.A. (1980) *Macrostructur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van Dijk, T.A. (1982) 'Episodes as units of discourse'. In D. Tannen (ed.),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 and *Talk.*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p.177–95.

van Dijk, T.A. (ed.) (1985)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cademic Press.

van Dijk, T.A. (2008) *Discourse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A. and Kintsch, W. (1983)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an der Gabelenz, G. (1868) 'Ideen zur einer vergleichenden Syntax: Wort und Satzstellung'.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6: 376–84.

Weil, H. (1887 [1844]) *The Order of Words in the Ancient Language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 Languages*(trans. C. Super), 3rd edn. Boston: Ginn & Co.

Youssef, V. and Winford, J. (1999) 'Grounding via tense-aspect in Tobagonian Creole: discourse strategies across a Creole continuum'. *Linguistics*, 37 (4): 597–624.

日常生活叙事 4

Narrative in Everyday Life

⊙ 埃莉诺·奥克斯

4.1 叙事的范围

如果要寻找一些使人类与众不同的事物，叙事的使用对于解读人类的存在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天生具有叙事的本能，这种本能促使一系列叙事类型盛行于每一个社区。为什么叙事享有此等地位？詹姆斯（James, 1904）曾经认为，主观经验具有拟混沌的特点，而昆德拉（Kundera, 1995）则绝望地把当前时刻比喻成在雾中行走。但是直到**后来**我们才开始思考经验的形貌和意义是什么，才开始研究“叙事”这种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普遍使用却并不完美的方法。而问题的症结在于经验，经过不同的叙事**类型**以及对话者相互之间的经验叙述**活动**，在语言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改变。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叙事：人的一生中，不能够和别人分享自己或其他人所经历的事情，不能够讲述你所阅读的书籍或看过的电影。人们也无法聆听、欣赏或阅读别人撰写的戏剧。彼此间无法进行对话，也没有印刷文字、图画或电影等这些与现实或虚构事件有关的媒介。再想象一下我们甚至不能够对自己或为了自己而构造我们内在心理的叙事。不，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如此的不可想象，因为它将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历史，没有神话，没有戏剧，生活里也没有回忆，没有启示，没有作为说明的修正。

当谈到叙事，我们会想到文学形式这种出类拔萃的叙事性文本。至少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Aristotle, 1962）开始，诸如悲剧和喜剧这样的叙事类型就已经成为哲学家和批评家们所关注的对象。然而，作为一种用于组织我们思考以及彼此互动的方式的基本类型，叙事包含了极为广泛的话语形态，其中也包括了流行的和艺术的类型。最基本且最普遍的叙事形态，或许并不是诗意的创作，而是日常会话的产物。

人类非常幸运，可以利用好几种传播形式来创建叙事。叙事可以建立在口头、文本、肢体、绘画和音乐等表现形式中，其中口头叙事和文本叙事最为常见。考虑到表演的历史性、普遍性及其魅力，这种借助肢体运动和面部表情的戏剧表演活动，或许是一种更为基础的叙事手段（Aristotle, 1962）。伯克（Burke, 1973: 103）则追溯至宗教仪式戏剧，它是一种“原始的形态，一个‘中心’，**人类**行动的其他方面都被认为是从这一中心辐射开来的”。而每一幅图片，则都以一种多少有些压缩的叙事形式讲述着一个故事。确实，艺术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

叙事表现的历史（Adorno,1984; Berger, 1972; Marsack, 1991）。有时候，叙事是通过一系列的描绘得以传达的，比如某种形式的岩洞壁画或者某些中世纪的手绘手稿。而另一些时候，事件的来龙去脉，会被压缩成单一的表现方式，要求观众从场景的不同元素中厘清故事的发展脉络。从某种角度来说，极简派艺术（minimalist art）对观众的要求很高，需要他们从高度抽象和晦涩的形式和对比中创建出叙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极简派把观众从对艺术家或主顾所描绘的单一的、权威的叙事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因而可以自由地解读这些视觉形式所暗示或隐含的各种可能的叙事。

视觉艺术所具备的这种叙事解读的广阔范围，同样也是一些其他叙事方式所具备的特点，尤其是音乐。乐器、音色和主乐调或多或少可以以明确或形象的方式构建角色，并改变他们的情绪和行为（Feld and Fox, 1994）。费尔德（Feld, 1982）描绘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鲁里人是如何将鸟类歌唱的旋律和人类的某种情感、行为和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某些音高能够表达哀伤和哭泣，反过来可以激发人的失去感和遗弃感。卡鲁里人在歌唱的叙事表演中，反复歌唱这样的旋律，以激起听者强烈的情感（Schieffelin, 1976）。

尽管仅通过一种传播渠道（比如言语或书写）就可以很好地组织叙事，但是叙事者却可以利用多种多样的传播资源。他们可以口头讲述一个事件，也可以从书本或报纸中阅读这件事。与此相类似，那些参加学校“分享时光”叙事活动的美国小朋友们，会以言语表达和展示从家里带来的物品的形式来讲述故事（Michaels, 1981）。在法庭上的叙事中，证人和律师，会利用可以作为证据的物品和图像，共同构成一个似乎合情合理的叙事。同样，物理领域的科学叙事或许也会综合运用图表、图示以及其他图形（Ochs, Jacoby and Gonzales, 1994）。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艰辛历程中，科学家们也许会以绘制曲线图的方式假定物理要素的某个方面，来完成叙事。就像如下摘自实验室叙事的文本片段中所展示的：

【66】

[因为你们说
[((*看着黑板*))
[如果 [我走这边，那仍然会有衰减（现在时）
[((*指着图中的 2 个位置*))
[但是你们又说
[((*看着黑板*))
[如果我<u>这样</u>过来 [(0.5) 然后 [走这：里
[((*指着图中另外两个位置*))
并且 [走这：里，就没有衰减。[1]
[((*移动手指到图中不同的位置*))

本文段中，某个物理项目的首席主持人使用声音和手势进行讲解，把自己想象成正在经历物理状态预期变化的一个物理实体，这些物理状态以符号点的形式展示在黑板上的图示当中。而在图画书中，同样也穿插着图像和语言文字，让读者利用这两种叙事形式来寻找叙事线索。舞台戏剧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表演，如哑剧、声音、文字、视觉影像和乐器。

在叙事过程中，说话者可能会广泛使用其他的话语类型（Ochs and Capps, 2001）。比如，他们可能在叙事中插入一段争论，就像下面这段对话，当时家庭成员们正在讲述一个故事：

妈妈：　　= 我们没有笑，相信我。

罗达：　　[有，你笑了 - 是你开始笑的。

科基：　　[((摇头示意没有))[没有，没有

　　　　　((妈妈看着科基以确认没记错))

妈妈：　　我认为我们没有笑 - 我 [得走了 -

罗达：　　　　　　　　　　[有，你就是笑 : 了。[2]

此例中，罗达指责家人在她尴尬的时候取笑她。当一个谈话者成为叙事中的笑柄，他或她通常会争辩事件的起因。闲言碎语，作为一种叙事形式，通常讲述的是对文化规范的违背，具有争议性的特点（Besnier, 2009; Brenneis, 1984; Goodwin, 1990; Haviland, 1977）。闲言碎语的高度对抗性本质，可以反应在古德温（Goodwin, 1990: 209）对美国黑人女孩间的这种行为的表述中。这些前青春期的小女生们会参与到所谓的“他 - 说 - 她 - 说（He-Said-She-Said）”这样复杂、充满冲突的叙事中，在这些叙事里，一个女生会对另一个 / 一些女生们说，谁谁谁说了她或她们什么（比如，“他们说你们都说我把一切都写在了那了”）。这种打小报告式的指责通常会遭到反驳（比如，“呃呃 .= 那是文森特说的”），如此，反过来又会引起大伙无休止地讨论。

叙事不仅可以催生、容纳其他语言活动，其自身也可以被纳入更大的类型或活动之中。比如，一个叙事不仅可以包含一场争论，也可以成为持续不断的争论的一部分，比如当某人通过讲故事来表达其所要表述的观点时。叙事也可以作为祷告的部分内容而出现。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小孩开始其餐前祷告，但在程式化的感恩过程中，她开始叙述当天发生的事：【67】

劳里：　　好吧 - 主啊？请 :- 嗯 - 帮助我们去爱

　　　　　以及 . 嗯 - 谢谢你让这一天如此美 : 好

　　　　　并且让我打了个（不错 / 有趣）的盹？

　　　　　嗯 - 还有 :-（让）妈咪道别

　　　　　我很高兴我今天哭了？

　　　　　因为我喜欢哭 [. 呵呵，并且

安妮?:　　[（（偷笑））

劳里：　　我 [很高兴今天所发生的（任何事 / 一切）=

罗杰?:　　[（（偷笑））

劳里：　　= 以主的名义

　　　　　（（鼓掌））阿 : - 门！[3]

本例中，劳里在餐前祷告中，讲述了当“妈咪道别”，她在学校哭了的这件事。但是，对于劳里的叙事来说，祷告的作用并不仅仅只是像一副固定前后的书立一样那么简单，正如下面所示：

祷告 1/2 叙事 1/2 祷告

而是，祷告这一叙事类型的特点渗透在故事的讲述当中：

G r N a ARRA c TIVE e

祷 叙 告 事 祷 叙 事 告

特别是，祷告的一个关键特点，是感恩的情感表达。当劳里讲到“我很高兴我今天哭了”，“我喜欢哭”的时候，这种情感组织起了她的叙事。哭泣通常都和悲伤有关，像这样的事情所饱含的一种情感，适合餐前祷告这种场合。在这种方式下，根据其所发生的情境，叙事得以组织和构建。

当谈到文本叙事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和劳里的叙事不同。由于受标题、印刷间距甚至是书籍封面的限制，书面文本似乎具有明确的界限。然而，即便是书面文本也可以是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比如争论、请愿或政治议程）的组成部分，这些互动将以微妙却又深刻的方式塑造叙事性文本。伯克（Burke, 1973: 1）指出：“批判性和想象性作品所处的情境会面临许多问题，而这些作品自身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们不仅仅是答案，更是**策略性的**答案，**风格化**的答案。”【68】从伯克到俄国形式主义者（Bakhtin,1981; Todorov, 1984）再到文化研究的拥趸，诸多学者们都希望叙事研究者能够把这些文本置于其所参与的社会和历史对话中进行解读。

叙事的创作者，不仅仅是那些提出它们的人，同时也包括众多读者和谈话参与者，他们影响了叙事的方向（Bakhtin, 1981; 1986; Bauman, 1986; Goodwin, 1981）。这种协同创作关系在会话叙事中最为明显，其中，对话者会提问、评论，要不然就是直接地推进故事的发展（Goodwin,1984; 1990; Jefferson, 1978; Mandelbaum, 1987a; Sacks, 1978）。话语的交互式生产维持和改变着其中的个人及其之间的关系（Mattingly and Garro, 2000）。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既会受到那些协同讲述的叙事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为构建一个连贯叙事而协同工作的经验所左右。

考虑到实现叙事活动的传播渠道和类型的多样性，要了解叙事活动是如何植根于知识、信仰、价值观、意识形态、行动、情感和社会秩序的其他维度等这些文化系统中，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典型特征是，叙事的文化分析通常会聚焦于叙事活动的特定情境，比如演说式或歌唱式的叙事表演（Bauman, 1986; Briggs, 1992; Feld, 1982）、神话故事（Hymes, 1971; levi−Strauss, 1955）、个人经历的会话叙事（Miller et al., 1990; Morgan, 1991; Ochs and Taylor, 1992b）、阅读故事书（Heath, 1983）、闲言碎语（Besnier, 2009; Brenneis, 1984; Goodwin, 1990; Haviland, 1977），或者是教室里的叙事表现（Michaels, 1981）。以上每一种情境中的叙事都具备某种**一一对应的**、意义丰富的本土民族精神的特质，比如对自主或干涉的价值取向、明确的说教、文本的神圣性、文本的真实性、想象的自我、社会的不对称性，等等。时至今日，还没有研究把叙事活动视作由单一言语社区中的不同模式、环境和参与者而构建的各式各样的叙事行为来加以考察。如此一来，当我们对具备一种叙事风格的文化进行宽泛的一般推论时，需要小心谨慎。

4.2 叙事和时间

“叙事”一词的使用，要么用来从狭义上表明某种故事类型，要么就是从广义上涵盖了更广泛的类型，不仅包括故事，也包括报道、体育和新闻广播、计划和日程。是什么把这些多元的叙事形式维系在了一起？抛开叙事所处的情境、表达方式以及叙事间的类型不谈，所有的叙事都**描述了事件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时间上的转变**。这一属性并不只是叙事的特点。

我们可以把这种时间上的属性当作叙事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正如后面将讨论到的，叙事所描述的远不止事件的时间顺序这些内容。

里科尔（Ricoeur, 1988）把叙事的时间特性当成是“时间序列维度”。它是以语言的方式，通过一串由两个或多个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句子序列来体现的（Labov, 1972）。无论叙事是精彩还是无聊，都具备这一特征。它不仅体现在对神秘莫测的事件也体现在对可预知事件的描述之中。叙事可以是一个对事件的简单记录，也可以是试图解释这些事件以及 / 或使他人信服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对事件进行情景化表达。【69】

叙事可能关涉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估算时间的假设性、习惯性或者其他与文化相关的模式（Ochs and Capps, 2011）。主要与**过去事件**有关的叙事，包括广泛的类型，例如故事、历史和那些与专业的或个人的事件有关的报道。比如，波拉尼（Polanyi, 1989: 17）就指出：“故事和对过去事件的报道是具体的、确切的、与过去时间有关的叙事，它们讲述的是发生在独特的过往世界中的某一独特时刻的一系列事件”。拉博夫和韦利特斯基（Labov and Waletsky, 1968: 287）认为，个人故事就是“个人经历的叙事”，并且从语言学的角度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即它们是“概括过往经历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把语言上的句子序列与（据推测）实际发生了的事件序列匹配起来而达成的”。前面所摘录的两个叙事，罗达的尴尬和劳里的哭泣，都是关于个人经历的叙事。

叙事也可以主要与**当前**正在发生的序列事件有关，比如，在体育广播中，评论员会讲述运动员动作、战术策略以及运动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除此之外，叙事也可以关注可预期的**未来**，就像一般而言的日程安排、处方、忠告、建议、指南、预告、警告、威胁和计划等事件序列。比如，在前文所述的物理实验的叙事中，就假定在某些情况下，物质世界会发生变化。同样，在下面的文本片段中，一位年轻女孩叙述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为她的生日宴会做筹划和准备：

萨利：　妈咪！你知道我的生日那天我必须要做什么吗？ –
　　　　我们生日那天可以给自己画鬼脸吗？
妈妈：　随你吧，
　　　　.
　　　　.
萨利：　((*边说边数手指*))妈咪，第一，我们要画鬼脸 –
　　　　嗯，接着，第二，我们要去公园，
　　　　第三，爸爸要扮怪物，
　　　　嗯 :– 第！**四**：？：！呢，还要去打迷你高尔夫
　　　　然后第五去 UCL 游泳池 –
　　　　第六呢？ – 亲一亲我的妈咪
　　　　哈哈，我逗你玩的，[4]

尽管科学类的叙事（比如实验报告）主要是通过科学的测量单位对时间进行估算的，但是自传以及其他类别的个人叙事的时间测算，则主要是依据个人对时间的理解。叙事时间是**人的时间**，而不是钟表时间（Heidegger, 1962; Ricoeur, 1988）。我们在当下的世界里生活感悟，但是却满怀着对过往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担忧。叙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过去带回到当前的【70】

意识里，为自我和社会提供了连续性感知。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以往事件的记录和叙事可以帮助我们掌控并不确定的未来。在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的框架里，当我们对过往建构叙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它们所能给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带来何种启示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那些关涉了以往事件的叙事，通常也关乎现在和未来（Ochs, 1994）。在某些情况下，叙事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新的模式，开创了全新的可能。当一个人面对疾病、事故或者灾难的时候，需要他重新调整生活，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辛酸了（Briggs and Mantini–Briggs, 2003; Mattingly, 1998; Shohet, 2007; White, 2007）。关于过去的叙事常常会引起人们对现在或者未来的关注。比如，在黑人女孩间所讲述的他－说－她－说的叙事中，关于过去事情的闲言碎语"煽动"了其中一个谈话者（被指责那个）为当下的自己辩护，并设想她将来应该如何纠正别人对自己的这种攻击（Goodwin, 1990: 271）：

芭芭拉：好吧，你**告**诉她
来当着我的面：（0.6）说，**我**会让
她好看。

在会话叙事中，对当前和未来的关注有可能出现在叙事讲述的任何一个节点。协同叙事者会在时间地图上来回游走，关照过去，然后又把它与当前和未来联系起来，接着又再返回到过去的另一个时间点上。比如，当劳里讲述（在饭前祷告中）当妈妈在学校跟她道别，她是如何哭了的时候，其家人又回来探讨劳里的问题，以帮助她变得坚强（Ochs, 1994: 129）：

妈妈：　但是宝贝？ – 我只是工作 –
　　　　这周 – 难道只是这一周
　　　　我整周都在工作吗？
　　　　还是因为这是第一周？在学校
安妮：　[但 – [她 3 点钟也哭了的
　　　　（0.2）
妈妈：　但这之后呢？ – 这 – 我一周只工作一天吗？你瞧
　　　　那是星期二。

然后，家人从谈论过去的相关琐事：

妈妈：　劳里？ – 你没有把你的（（*摇着头表示没有*））–
　　　　毯子带到学校，对吧。
劳里：　没有，我（忘）记了（（*暴躁地*））。

转到应对未来的策略：

【71】

妈妈：　我们得把它从柜子中拿出来 –
　　　　把它和午餐的东西放在一起
　　　　（2.0）
吉米：　对 – 这样你就可以 – 带（着去 / 到）学校。

感受时间（人的时间）对于理解叙事有什么意义呢？含意之一就是故事和计划都同时发生在一个叙事里。学者们现在已经不提这样的问题，“这个文本是什么叙事类型？”，他们现在问的是，“这个文本是如何同时作为故事、计划、广播和/或预告组织在一起的？”叙事者和学者们的任务是寻找发现贯穿于叙事文本中不同叙事类型，进而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集中讨论故事这一叙事类型的特点。我们将就这一叙事的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构展开研究。

4.3 观点和情节结构的叙事点

虽然叙事可以主要讲述完全能够预测的事件，但是故事通常关注值得关注的事件，那些令人惊奇、不安、有趣的事，或者是值得讲述的事情（Labov and Waletsky, 1968）。故事通常都是要表明一个观点，它组织着叙事自身的建构。而通常这个观点是对所发生事件、行动的一种道德评价，或者是对一组事件的心理态度。

与其说故事是对事实的描写，不如说它是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伯克（Burke, 1962）认为，故事是现实的**节选**（selections），而不是现实的**写照**（reflections）。而戈夫曼（Goffman, 1974: 504）指出：

> 故事或者轶闻，也就是一种回放，并不是对以往一件事件的任意汇报。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声明，这种声明源自一个确定了的、实际或潜在事件参与者的个人视角，因此，所汇报的事件就可以从这一起点出发，实现时间上的、动态的发展演进。因此，事件回放会不经意地让听众移情式地融入，并间接地重新体验所发生的事件。简而言之，事件回放不仅仅只是对事件的汇报，而是对个人经历的讲述。

亚里士多德使用**主题**（mythos）或“情节（plot）”一词，来表明事件和情感是如何相互交织，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正是因为情节，才使得一系列事件与历史或者故事区分开来（Bruner, 2003; Frye, 1957; Ricoeur, 1981; White, 1981）。在创建情节时，历史学家和故事作者会在一个合理的规划中架构事件。情节把诸如场景、施事者（agent）、施事（agency）（工具）、行为以及意图等各种环境元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围绕一件非同寻常、且常常令人不安的事件所展开的连贯的事件规划方案（Burke, 1962）。

我们可以将情节看成是有关事件的一个理论，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解释事件的特定视角，来理解这些事件（Feldman, 1989; Ochs, Taylor, Rudolph and Smith, 1992）。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故事与科学叙事相似。尽管科学性叙事弱化施事者和动机（Latour, 1987），但是它和故事性叙事一样，都是讲述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谜团、矛盾、奇闻、质疑以及打破平衡的乱象。并且，科学叙事和个人叙事这两者都试图从一系列的因果事件和环境因素中，阐明这些事情的问题所在。【72】

建立和解读情节是人类所具备的一种典型能力。故事是一种出类拔萃的文化工具，它帮助人类理解那些非同寻常、出乎意料的行为或者令人烦忧的问题（Wilce, 1998）。如此，故事使得那些异常事件也变得可以理解（Bruner, 1990: 52）。由于故事讲述的都是那些远离人们预期的

事件，因此它也可以阐明和维护关于什么才是正常的文化这一共识。出于这一点，我们说叙事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方式，它使得儿童了解和接受那些符合当地情境的社会观念。协同叙事者往往会在汇报事件时对自己会如何表现，而其他人又应该如何表现作出评论。而儿童，作为这些叙事互动的参与者，便会逐渐理解什么是人们所期许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又是得体的。

4.4 建构叙事

故事性叙事是如何建构的？如何开头、发展，又是如何收尾？当我们看到一段印刷文字，一个标题或是其他视觉特征，我们可能马上就能认出这段话也许是个故事。虽然通过会话来讲述的故事并没有标题，但是它们通常会有一段**故事引语**（Sacks, 1992）。故事讲述者并不会突然开始讲故事，而是会在其他交谈者的配合下过渡到故事话题。他们会以诸如“你想听个故事吗？”这样的故事引语来过渡。在此期间，交谈者表明了其即将讲述一个相关故事的意图，并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可以继续的许可。会话互动中的故事讲述者通常会有一个额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让其他人知道，他马上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通常不止三言两语），还必须在这个故事和当前话题间建立一个起码的关联。为此，他们会重复之前谈话中的某些内容，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Jefferson, 1978: 221）：

罗杰：　说起 40 **多岁**，我在：摩格内利家族公司工作
　　　　40 年。

有时候，故事引语会由别人来介绍，而不是那个要开始讲故事的人。比如，女性有时候会为其丈夫做故事开场，然后再由丈夫开始故事讲述（Goodwin, 1986; Mandelbaum, 1987b）。在下面的片段中，菲利斯引出了一个故事，并让她丈夫迈克主要讲述（Goodwin, 1986: 298）：

【73】

菲利斯：　迈克说昨天晚上下面有人狠狠打了一架。
科特：　　噢，真的？
　　　　　(0.5)
菲利斯：　和基根，以及，什么
　　　　　保罗 [*德瓦 :: 尔德*？][1]
迈克：　　[保罗　德瓦：尔德。这家伙来自……

一个故事一旦开始，就已经预设了一个特定结构。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哲学家、民俗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话语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分析故事的组成要素。亚里士多德详细地描述了悲剧和喜剧的体系结构，并从情节、性格（道德习惯）、语言、思想、景象（风俗）以及旋律的原则入手，归纳了悲剧的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节是悲剧的灵魂所在，性格的重要性紧随其后。情节必须要有开端、中间部分和结局，但是这种推进过程并没有最初看起来的那么明显（Aristotle, 1962: 52）。

开端是那些不一定非要出现在某些部分之后的内容，但是其后自然而然地有其他内容

1　英文姓氏 Dewald 的拖长发音。——译者注

存在或出现。而结尾则相反，是在某些内容之后自然出现，可以是这些内容的必然结局，也可以是通常的（甚至是可能的）结局，但是结局自身之后并没有内容再出现。中间部分则既是紧随某些内容之后出现，同时其后也会有别的内容。因此，构思巧妙的情节，不会随便在某一点开始，也不会随便在另一个点结束，而是会遵循这里所叙述的原则。

经典的文学研究一直利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原则，分析故事性叙事的结构（Barths, 1988; Frye, 1957; Propp, 1986; Ricoeur, 1988）。拉博夫对纽约市有关个人经历的口头叙事的语言学分析，同样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开端、中间部分、结尾这些叙事构成要素的概念。那些叙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你曾经遇到过有可能被杀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吗？” 拉博夫在评论中认为，这些叙事是“完整的，因为它们有开端、中间部分和结尾”，但是一些更为完整的叙事则具有以下有关个人经历叙事的特点（Labov, 1972: 363）：①概要（如，“我哥朝我头部刺了一刀”）；②定位（如，“这发生在我父亲死后没几天”）；③使行为复杂化（如，“我把他的手反扭到背后……”）；④评价（如，“这难道不是混账行为吗？”）；⑤结果或决定（如，“在那一切之后，我给了那个伙计香烟，在那一切之后”）；⑥尾声（如，“事情就是那样了”）。

认知心理学家则会从“故事语法”的角度来分析故事（Mandler and Johnson, 1977; Stein and Glenn, 1979; Stein and Policastro, 1984）。在斯坦和格伦（Stein and Glenn, 1979）的研究中，故事的主要“语法”构成要素包括：①背景；可以是②启动性事件；也可以是③内部反应；④明显的企图；⑤结果。斯坦和波利卡斯特罗（Stein and Policastro, 1984）另外增加了第 6 个故事组成要素：对③、④、⑤的反应。曼德勒和约翰逊（Mandler and Johnson, 1977）则增加了一个“结局”要素，并进一步区分了以目标为导向的故事和不以目标为导向的故事之间的差异。以目标为导向的故事与斯坦和格伦的模式相对应。不以目标为导向的故事则包括：①背景；②开端；③简单的反应（可以是情感反应或意外的行为）；④结局。所有构成故事片段的要素，除了背景之外，都被认为是按固定不变的顺序安排的。【74】

背景（setting）这一概念在叙事的文学模型、语言模型和心理模型中很常见。故事语法和背景的语言概念化，从主人公行为的物质、社会和时间的情境角度，对背景进行界定。故事的文学分析和文化心理路径则强调，背景超越了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包含了期望叙事性事件发生的心理氛围。小说和其他叙事类型在历史上的兴盛，与人们对布鲁纳（Bruner, 1990）所说的“心智图景（mental landscape）”的更大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这一心智图景包含了主人公在进入关键的叙事事件时的情感状态、道德、视角和动机。正是这种心理氛围才给主人公染上了悲情男主角 / 女主角或喜剧里的傻瓜的色彩。比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依靠的是建立具有高尚道德性格、却又不知不觉成为环境牺牲品这样的主人公形象。这种心理语境通常是建立于背景之中。

尽管有关背景的内容在故事一开始就会部分出现，但是叙事者也可能等到故事的后面才会揭示背景的关键性内容。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叙事者希望慢慢地揭示关键性的环境内容，以制造悬念。如果叙事者一开始就介绍了全部相关的背景信息，故事就会失去其戏剧张力。其二是因为在讲述故事开头时，叙述者自己也并不一定就清楚关于故事背景的重要细节。只有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叙事者才会将之前提到的环境因素和所关注的问题事件联系起来。在交谈式的故事中，参与互动的协同叙事者可能会提示叙事者这些相关的环境内容（Ochs, Smith and Taylor, 1989）。在心理治疗对话中，心理医生有助于唤起病人未提及的心理、行为状态或能使叙事事件意涵更丰富的条件（Capps and Ochs, 1995）。

推迟揭示背景内容的另一个原因，是叙事者一开始会试着像塑造主角一样把自己光辉的形象展现给大家（Ochs, Smith and Taylor, 1989）。在背景设置上，叙事者会让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看起来合情合理，能够引起交谈者的共鸣。然而，有时候这种即使最如意的安排设计，结局也往往会出其不意，比如当其他协同叙事者说出那些没有披露的背景细节，这些细节便会瓦解叙事者自身建构的积极形象。以下所摘录的叙事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掩饰。故事一开始，9岁的露西抱怨她们学校一名女生在几个男孩子的面前掀她朋友的裙子，但校长没有公正地处罚她（Ochs et al., 1992: 47）：

露西：　　我觉得嗯安德鲁女士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嗯

　　　　　.

　　　　　.

　　　　　当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嗯 –

　　　　　这名女生？ – 她把嗯 – 维基的裙子掀（（*手伸到膝盖那儿*））

　　　　　到那儿（（*手高举到胸前*）），当着那些男孩子的面

妈妈：　　然后呢？

露西：　　她只 – 她只是被留校一天

【75】在她的家人赞同了露西的看法之后，她6岁的弟弟查克说出了她家人不知道的一些背景：在那个女孩让她朋友难堪的相同时间（同一天），露西自己也被校长处罚了：

查克：　　露西？ – 你只去了一次 – 对吧？ =

父亲：　　=（（*清了清嗓子*））

　　　　　（0.1）（（*露西弓着背，瞪大眼睛，惊呆了，开始摇头表示一次都没有，父亲正看着她*））

母亲：　　（你[进去过/你可以告诉我们，不是吗？]

父亲：　　[（我在？听）

露西：　　（（*白了查克一眼*））（谢谢）

　　　　　（0.4）

露西：　　（（*更大声地*））[是啊 – 那 – （是）

母亲：　　[（她进去了）一次？

　　　　　（0.6）

露西：　　一次。

在会话性的故事讲述中，露西这样的窘境比较常见。当我们在亲近的人比如家人或朋友面前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因为他们对我们生活的了解而变得猝不及防。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介绍一些背景信息，从而扰乱我们作为叙事者想要表达的观点。

故事的所有描述都会通过**一个打破了常规和预期环境的平衡的关键事件**而具体展开。比如，“混乱”（Aristotle, 1962）、“麻烦”（Burke, 1962）、“偏离常态”（Bruner, 1990）、“复杂化的行为”（Labov, 1972）、“触发事件”（Stein and Glenn, 1979）和“煽动性事件”（Sharff, 1982）这些概念，都与某个叙事性片断所聚焦的一件不可预料或不同寻常又或者是充满问题的

事件有关。比如，在劳里做饭前祷告时所讲述的故事中，她关注的是“妈咪道别”这一问题性事件。而在露西的故事里，一开始所关注的是班上一位同学的问题行为：“这名女生？ – 她当着男生们的面把嗯 – 维基的裙子掀到了这儿”。

在很多故事中，关键的问题性事件被认为会激起**心理反应**和**行为**，以试图恢复某种平衡。在曼德勒和约翰逊（Mandler and Johnson, 1977）的框架里，这些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故事。比如，在劳里的故事中，是“妈咪道别”导致了劳里的哭泣。在露西的故事中，是同学的违规导致了校长惩罚这名违规者留校一天。

这些心理上和行为上的反应反过来又会产生**结果**，其会引起**进一步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比如，在露西的故事中，当她发现校长只惩罚那名同学留校一天时，她很气愤。她告诉她家人，校长并不公平；并且当她母亲问她：“你觉得她应该被停学吗？”，露西回答道：“至少是这样！”

在一项对广场恐惧症的叙事建构的研究中，卡普斯和奥克斯（Capps and Ochs, 1995）发现，一名有广场恐惧症的妇女对于个人的一次恐慌经历的叙事，始终描述的是一系列螺旋上升的问题事件，其中，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出现：比如，她认为交通堵塞会使她高度警觉。这一认识反过来又让她恐慌，而恐慌又引起主人公一连串尝试减轻这种恐慌的行为，结果都失败了，因此导致更进一步地恐慌，直到主人公对别人说出她的痛苦并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在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不断累积中，叙事者构建了一个无助、由恐慌驱动的世界。【76】

当故事讲述者说到一个问题性事件引起了心理反应或行为的时候，这个故事似乎被限定在了过去的时间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故事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关乎未来，故事讲述者常常会设定一件刺激性事件、一个心理反应或者在**仍然**悬而未决、**仍然**疑窦丛生的事件讲述中，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劳里的故事里，尽管她自己认为“妈咪道别”这一问题性事件已经完结（“我以基督的名义表示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任何事 / 一切）都很高兴，阿：– 门！”），但是她母亲却并不这样认为。劳里的母亲把“妈咪道别”这件事以及劳里的反应看作是**当前**的问题，这促使她提出了一系列对未来有帮助的行为建议。在恐慌事件这一例子中，广场恐惧症患者始终认定，恐慌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它使人节节败退。确实，广场恐惧症的一个特点，就是面对未来生活也沉溺于过往恐慌片段的后果之中的这种倾向。作为故事的过去变成了此时此地以及未来的基石（Capps and Ochs, 1995）。

许多叙事似乎是因为叙事者对于他们或其他主人公当前处事的不满所引起的，就像露西抱怨她的校长对那起校园事件的处理一样。确实，叙事者讲述故事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和别的谈话者一起讨论他们现在如何看待或应该如何看待过去情境中的某些问题。哈韦尔在《致奥尔加的信》（*Letters to Olga*, 1989）一书中指出这一动机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探索的一部分，它试图把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更广阔领域的关系、地域、目标、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其他的人类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充满了奥秘，我们通过讲故事来和其他人一起探究这些神秘、令人沮丧的事情。尽管协同叙事者的性格各不相同，但是这一行为使得我们有机会、有可能对公共事务进行思考，不仅思考某种特定经历的意义，同时也思考历史、文化和宇宙哲学维度的人生意义。

在很多社区中，通过协同叙事解决问题的行为是友谊、共治或家庭成员关系的象征。这些

社区的成员并不总是可以要求熟人以叙事的方式协同解决问题。即使是在交往密切的家人和朋友之间，讲述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觉得尴尬或力不从心（Jackson, 2002）。如果没有此类非正式的解决问题的机会，那些潜在的叙事者就可能会把他们的故事带到社区工作者那里。在一些社会中，这些人所从事的是“调解帮适”（Watson-Geogo and White, 1990）工作，而在另一些社会里，他们提供的是“心理治疗”（McLeod, 1997）。

【77】4.5 叙事身份

叙事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它同时也是一种包含了不同参与者角色的社会活动。巴赫金（Bakhtin, 1981）和戈夫曼（Goffman, 1974）都把作者（或者，用戈夫曼的话说，主角）的叙事角色和叙述者（或者，用戈夫曼的话说，发声者）区分了开来。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巴赫金也主张这样一种看法：叙事的受众在叙事的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受众是叙事形式和意义的共同作者。

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 1987a）认为在讲述故事时受众的参与有所不同，其差异表现在讲述者主导和听众主导这两种故事类型之间。讲述者主导的故事和戈夫曼对故事的描述类似（Goffman, 1974: 509）：“有时候【参与者】会通过几段连贯的叙事来持续讲述他的故事，而其他人的插入式交谈大多采用的是鼓励、专注的表现或者其他‘反馈信道’（back channel）[1]效果的形式。”而在听众主导的故事讲述过程中，听众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积极（Mandelbaum, 1987: 238）：“讲述者和听众一起决定所讲述的故事‘内容’以及对故事的解读。”受众主导的故事讲述具有这样一些情境特点，即在这些情境中，听众也是故事主角，特别是当听众是故事中的笑柄的时候。这一观察和古德温（Goodwin, 1990）对他－说－她－说互动的研究遥相呼应，在这一研究中故事的主要听众既是故事指责的对象，在后续故事的结构组织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对于故事细节的处理，故事听众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各有差异（Goodwin, 1986）。在美国成年人间讲故事的互动中，那些对即将讲述的事件具有更多知识的听众，往往会对该故事的讲述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掌握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够参与叙事。比如，在关于孩子的故事中，孩子自己往往不具有叙事的权利，而更多是如父母一方或双方所愿，做一个听众（Taylor, 1995）。与此相似，桑普森（Sampson, 1982）指出，在澳大利亚的土著社区，生病或受伤的人不可以自己讲述他们的病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被认为不再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能够叙述事情。而那些照顾病患的人才可以有此权利。

在对话性的故事讲述中，由于众多参与者都将一起建构故事，因此讲述者和听众的角色分配不再有效。特别是在包含有亲密朋友和家庭成员的故事讲述中，这种讲述就更为大家所分享。在研究家庭的故事讲述中，奥克斯、泰勒等人（Ochs and Taylor, et al. 1992）发现把全部的家庭成员都当成共同讲述者将会非常实用，因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叙述往往会从一个家庭成员转

1 出自语言学家 Victor Yngve，是指说话者在不放弃正在进行的话语轮次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反馈信道获得听话者诸如“是”、“嗯”等简短的信息。该词后广泛用于计算机网络领域。戈夫曼在原著中加上了引号，也有借用该领域“信道”一词的考虑。——译者注

换到另一个成员。他们区分了**初始讲述者**（最先开始引出某个故事的人）和**其他讲述者**（那些对已经开始了的故事的讲述有所贡献的人）。家庭成员所担负的并不是次要的角色，而是和其他讲述者一样，对故事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包括提供背景信息、设想心理上的反应以及尝试解决故事的关键问题。比如，在作为初始讲述者的露西开始讲述她那个只被留校一天的同学的故事之后，她的母亲接过了这个故事，她暗示了对于同学的这种冒犯行为露西所应该持有的心理反应：【78】

露西：　她只 － 她只是被留校一天
母亲：　然后呢？ － 你认为她应该被停学？
（0.6）
露西：　至少是这样！
.
.
母亲：　（因为露西）觉得非常难堪
（（*点头表示同意，边吃边说*））
（1.6）
母亲：　（我是说你 / 露西确实）想要杀了 － 那个女孩 － 嗯哼？
露西：　（（*她一边咀嚼，一边慢慢地点头表示同意，叉子还在嘴里*））
[
母亲：　（因为）你很烦她 －
（（*说得很快*））但是你忍住了
因为你（觉得）你的学校会处理这件事
但是学校没有，于是你就很气愤

然后其他家庭成员作为协同讲述者插入到话题中来。比如，露西的弟弟查克建议他会给那个女孩更多的留校惩罚：

查克：　我认为？她应该 － 被留校一整个月？或者差不多的时间 =
?：　=（嗯，或许吧）
（0.6）
查克：　每天她都（将）得去那儿 － 每天每天每天
即使？……

并且，正如前文所述，正是查克把故事带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揭露了露西自己也被留校的细节。

4.6 叙述生活

当叙事互动中的成员既作为讲述者又作为听者积极参与互动的时候，他们行使着合述叙事的权利。当叙事内容与生活经历相关时，合叙者会影响对这种经历的理解。这不仅仅只是一段叙事，也是共同建构的一段生活或一段历史。考虑到叙事是一种会意的活动以及一种留存经验于记忆之中的主要手段，能够参与叙事的合述，无疑是一种强大的权力，其包含了过去、现在、

未来以及想象中的世界。

当合叙者建构故事之时，他们会决定发生了什么，确认事情的**真实**状态并在脑海中强化记忆，比如下面的一位母亲和她的小孩的叙事（Fivush and Reese, 1992: 7）：

【79】

母亲：你记得去年复活节吗？
小孩：嗯
母亲：我们复活节做了什么？
小孩：什么？
母亲：我们复活节做了什么？
小孩：什么
母亲：不记得了？
小孩：嗯
母亲：我们给复活节蛋上色
小孩：噢
母亲：谁和我们一起给复活节蛋上色？
小孩：什么？
母亲：你记得是谁和我们一起给复活节蛋上色吗？
小孩：嗯
母亲：谁？
小孩：（毫无反应）
母亲：是雪莉奶奶

合叙者也可以决定在过去**可能**发生了什么或者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种现象就是通常说的侧投射（side-shadowing）[1]（Morson, 1994）。侧投射创建的是非线性化的故事，因为故事线索的建构已经或即将按多个可能的方向发展。这些故事蕴含了看待事件的不同视角，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观察物理现象一样，也往往会提出多种可选的轨迹。侧投射让人对过去或未来的事件产生质疑。当应用于某人的自我经历时，对于叙事者如何确立个人生活走向，侧投射可能会带来走向的分支。比如，肖赫特（Shohet, 2007）发现和厌食症作斗争的年轻女性的生活故事便具有侧投射的特点，而那些从厌食症中完全恢复的女性的叙事则更为线性，她们会用健康的现在取代厌食的过去。

合叙者也可以讲述什么是**应该**发生的，因此会评价主人公的**道德**状态 (Duranti, 1994; Ochs and Capps, 2001)。通常叙事者会认为主人公的行为是道德上所不齿的，然后再讲述在同样的情境下具备常识的人会怎样做。本章中所分析过的所有叙事都传递出有关生活的义正词严的道德

1　是叙事学家盖里·默森基于 foreshadowing 和 backshadowing 而创建的新词汇。这三个词通常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分析，与时间维度相关。Foreshadowing（逆投射）是一种逆向的因果关系，是指某件事情在发生前已经有一些征兆，人们根据这些征兆可以预测这一事件即将发生。这些征兆就是由该事件所产生的逆向逆射。在叙事时间上，征兆先于事件。而 backshadowing（正投射）恰恰相反，是正向的因果关系，是指某件事情发生后，人们回过头来说，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一些征兆表明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叙事时间上，事件先于征兆。除了这种正向和逆向所投射出的因果关系外，默森认为，我们也可以从叙事的某件事情中看到其他的多种可能性，于是，他创造了 sideshadowing 一词，它关注的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或者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是过去原本可能会发生什么，但却没有发生以及将来不一定就会发生什么，而是有可能会发生别的什么。——译者注

评价，但是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应该是露西和那个在学校里只受到一天留校处分的女孩的故事。在这个叙事里，家庭成员指责校长对那个女孩的处罚过轻，而赞同露西的观点，认为那个女孩至少应该被留校三天。类似这样的故事反映了评价完全不同的有关行为、思考和感觉的道德方式，这些故事是巩固或建立家庭和社区价值观的途径。

然而，在别的情况下，对于其他讲述者对情感、行为或环境所作的解释，合叙者也可能会提出异议。通常，当故事的讲述者是一群彼此具有相同历史背景并且和故事主人公也有着相同背景的人时，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在类似于美国主流社会的社会里，那些与所展开故事的背景信息有利害关系的人，可能披露一些能完全改变故事线索的细节。比如，在留校处分的那个故事里，露西的弟弟对她留校事实的披露，削弱了露西对为什么校长不公平所作的解释。尽管露西认为处罚不公正，是出于同学违规的严重性，但她弟弟也提供了露西作出判断的另一种根据：校长不公平，因为她给露西和她的同学相同期限的留校处分。在这个例子中，露西的弟弟并没有站在她这一边，而是披露了潜在的不利信息。

【80】

涉及质疑和改写故事脉络的协同叙事，类似于学术和法律上对事件解释的质疑和修正。在这两种情况下，质疑都会把叙事的表述重塑为一种**版本**的经历，而非某种事实。如此，合作完成的个人经历的故事讲述，可以作为那些职业领域所需求的智识技能的社会化的一个源头。和人类所有行为一样，对别人讲故事的方式所提出的质疑，应组织、成形于社会互动之中，并且究竟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质疑，人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希思（Heath, 1983）的研究中，白人工薪家庭不允许他们的小孩对书面叙事产生怀疑。与此类似，家庭、组织和社区对于谁可以扮演质疑者的角色也莫衷一是。例如，在许多社区中，成人比小孩、丈夫比妻子更多地具备这种权利（Fader, 2009; Goody, 1978; Heath, 1983; Ochs and Taylor, 1992b）。在奥克斯和泰勒所研究的美国白人中产家庭的，协同性叙事互动中，母亲质疑的次数通常是小孩的两倍之多，而父亲则是小孩的三倍还多。而由于在这些家庭里，叙事性行为无处不在，因此家庭成员所反复出现的叙事角色帮助他们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的父母，特别是父亲，喜欢对叙事性内容提出质疑，对于这一点那些年轻人们非常清楚，因此他们会反过来表现另一种偏好，那就是在父母想要长篇大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们在一旁捣乱或者只是敷衍性地附和。对于这类家庭来说，下面这种对话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没什么。”这些家庭的小孩并不愿意他们的故事受到父母这样的合叙者的批判。

4.7 结　语

这种方式的叙事活动曾经是一种话语媒介，用以强化道德范式，探究事件的形貌和意义，并使身份和地位的概念具象化。叙事活动可以让社区成员对事件、思想和情感进行反思，但是这样的机会分配并不均衡，使得某些人的反思权利多于另外一些人。除了对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建构至关重要之外，协同叙事也精心书写了传记和历史。然而，生活的意义——什么是可能的、现实的、合理的、可取的——往往是由某些人来定义而不是其他人。出于这些目的，叙事具有限制或改造人类心智的能力。

注释

[1] 此文本片段摘自一个语料库，该语料库是两个由斯潘塞基金会（the Spencer Foundation）赞助的、关于物理学家解决问题的话语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收集了众多语料，这两个研究项目是“科学话语的社会化”（1990—1993）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1994—1997）：E. 奥克斯是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2] 此文片段节选自一个语料库，该语料库是由国家儿童健康和发展协会（1986—1989）赞助的一个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研究的是“美国家庭的话语处理”：E. 奥克斯和 T. 韦斯纳是该项目联合首席研究员。

[3] 本片段摘自于前文注释[2]中所提及的语料库。

[4] 本片段摘自于前文注释[2]中所提及的语料库。

延伸阅读

以下读物涵盖了日常生活叙事实践及其对个人、机构、社会关系的组织和人类状态所带来的影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Bruner, Jerome(2003)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认为，叙事对于理解经历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为生活事件赋予了情节结构，同时还有主人公、问题的讲述以及对解决方案的追寻，所有这些都带有讲述者的道德评判，以支撑其观点。

Mattingly, Cheryl and Garro, Linda C. （2000）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这本编著由一系列研究组成，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叙事在医学领域的意义建构以及治疗中所发挥的作用。本书的导语以广阔而敏锐的视角，介绍了叙事如何帮助患者重新认识自我和未来。

Ochs, Elinor and Capps, Lisa. （2001） *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该书论述了人们叙事的时候受两种相反的趋势所推动——运用标准的情节来了解他们的经历（“对连贯的追求”）以及为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寻找其他的解释（对真实性的追求）。本书认为，这两个取向都和叙事结构、儿童成长、残障、疾病以及人格和自我的建构相关。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在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在线阅读。

Laura A. Sterponi. （2003） ‘Account episodes in family discourse: the making of morality in everyday 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5 （1） : 79-100.

Jan blommaert. （2001） ‘Investigating narrative inequality: African asylum seekers’ stories in Belgium’, *Discourse & Society*, 12 （4） : 413-49.

Besty Rymes.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agency in the narratives of high-school drop-outs’, *Discourse & Society*, 6(4): 495-516.

参考文献

Adorno, T. (1984)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Aristotle (1962) *Poetics*. New York: Norton.

Bakhtin, M.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by M. Holquist, translated by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khtin, M.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rthes, R. (1988) *The Semiotic Challen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auman, R. (1986)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BBC and Penguin Books.

Besnier, N. (2009) *Gossip and the Everyday Productin of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Brenneis, D. (1984) Grog and gossip in Bhatga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Fijian Indian convers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 487-506.

Briggs, C.L. (1992) '"Since I am a Woman, I will Chastize my Relatives": gender, reported speech, and the (re) 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Warao ritual wailing'. *American Ethnologist*, 19:337-61.

Briggs, C. and Mantini-Briggs, C. (2003) *Stori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Racial Profiling during a Medical Nightma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uner, J.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J. (1991)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18: 1-21.

Bruner, J. (2003)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 K. (1962) *A Grammar of Motives and a Rhetoric of Motives*. Cleveland and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Bruner, K. (1973)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pps, L. and Ochs, E. (1995) *Constructing Pan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pps, L. Bjork, R. and Siegel, D. (1993) The Meaning of memories. *UCLA_Magazine*, 4(4): 8-10.

Duranti, A. (1986) 'The audience as co-author: an introduction'. *Text*, 6-3: 239-47.

Duranti, A. (1994) *From Grammar to Politics: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n a Western Samoan Vill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der, A. (2009) *Mitzvah Girls: Bringing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asidic Jews in Brookly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ld, S. (1982)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Feld, S. and Fox, A.A. (1994) 'Music and langua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3: 25-53.

Feldman, C. (1989) 'Monologue as problem-solving narrative'. In K. Nelson (ed.), *Narratives from the Crib*.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vush, R. and Reese, E. (199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M.A. Conway, H. Spinnler, D. C. Rubin and W. Wagenaar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Netherlands: Kluwer. pp. 1-28.

Frye, N. (1957)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Goodwin, C. (1981)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New York: Academic.

Goodwin, C. (1984) 'Notes on story structur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5-46.

Goodwin, C. (1986) 'Audience diversit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xt*, 6(3): 283-316.

Goodwin, C. (1994) 'Professional vi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3): 606-33.

Goodwin, M. (1990) *He-Said-She-Said: Talk as Social Organization among Black Childre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oody, E. (1978)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vel, V. (1989) *Letters to Olga*. New York: Holt.

Haviland, J. (1977) *Gossip, 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ath, S. (1983) *Ways with Words: Language, Life 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idegger, M. (1962)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Hymes, D. (1971) 'The "wife" who "goes out" like a man: re-interpretations of a Clackamas Chinook myth'. In P. Maranda and E.K. Maranda (eds), *Structural Analyses of Oral Tradi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James, W. (1904)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 '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18): 477-91.

Jefferson, G. (1978) 'Sequential aspects of storytelling in conversation'. In J. Schenkein (ed.), *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p. 219-48.

Kundera, M. (1995) *La Lenteur*.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bov, W. and Waletzky, J. (1968) 'Narrative analysis'. In W. Labov et al. (eds), *A Study of the Non-Standard English of Negro and Puerto Rican Speaker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p. 286-338.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évi-Strauss, C. (1955)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McLeod, J. (1997) *Narrative and Psychotherapy*. London: Sage.

Mandelbaum, J. (1987a) *Recipient-driven Storytelling in Conversat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andelbaum, J. (1987b) 'Couples sharing stori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5: 144-170.

Mandler, J. and Johnson, N.S (1977)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rsed: story structure and recall'. *Cognitive Psychology*, 9: 111-51.

Marsack, A. (1991) *The Roots of Civilization*. Mount Kisco, NY: Moyer Bell.

Mattingly, C. (1998) *Healing Dramas and Clinical Plot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ttingly, C. and Garro, L. (2000)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and Hea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chaels, S. (1981) '"Sharing Time": children's narrative styles and differential accesss to literacy'. *Language in Society*, 10: 423-42.

Miller, P., Potts, R., Fung, H., Hoogstra, L. and Mintz, J. (1990) 'Narrative practic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lf in childhood'. *American Ethnologist*, 17(2): 292-311.

Morgan, M. (1991) 'Indirectness and interpretation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discourse'. *Pragmatics*, 1(4): 421-51.

Morson, G. (1994)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s of Tim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chs, E. (1994) 'Stories that step into the future'. In D. Biber and E. Finegan (eds), *Perspectives on Register: Situating Language Variation in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6-35.

Ochs, E. and Capps, L .(2001) *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hs, E. and Taylor, C. (1992a) 'Science at dinner'. In C. Kramsch (ed.), *Text and context: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Study*. Lexingong, MA: D.C. Heath.

Ochs, E. and Taylor, C. (1992b) 'Family narrative as political activity'. *Discourse and Society*, 3(3): 301-40.

Ochs, E. and Taylor, C. (1994) 'Mothers' role in the everyday reconstruction of "Father Knows Best"'. In K. Hall (ed.), *Locating Power: Proceedings of the 1992 Berkeley Women and Language Confer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chs, E. Jacoby, S. and Gonzales, P. (1994) 'Interpretive journeys: how physicists talk and gesture through graphic spcce'. *Configurations* (Special Issue: *Located Knowledges: Intersections between Cultural, Gender, and Science Studeis*, edited by M. Biagoli, R. Reid and S.

Traweek) 2(1): 151-72.

Ochs, E., Smith, R. and Taylor, C. (1989) 'Dinner narratives as detective stories'. *Cultural Dynamics*, 2: 238-57.

Ochs, E., Taylor, C., Rudolph, D. and Smith, R. (1992) 'Story-telling as a theory-building activity'. *Discourse Processes*, 15(1): 37-72.

Polanyi, L. (1989) *Telling the American Story: A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ropp V. (1986) *The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icoeur, P.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 (1988)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ck, H. (1978) 'Some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f a dirty joke'. In J. Schenkein (ed.), *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from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Fall 1971). pp. 249-69.

Sacks, H. (1992)*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Cambridge, MA: Blackwell.

Sampson, B.(1982) 'The sick who do not speak'. In D. Parkin (ed.), *Semant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p. 183-95.

Schieffelin, E.L. (1976) *The Sorrow of the Lonely and the Burning of the Danc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collon, R. and Scollon, S. (1981) *Narrative, Literacy, and Face in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Sharff, S. (1982) *The Elements of Cinema: Toward a Theory of Cinesthetic Impa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ohet, M. (2007) 'Narrating Anorexia: "Full" and "Struggling" Genres of Recovery'. *Ethos*, 35(3): 344-82.

Stein, N. and Glenn, C.G. (1979) 'An analysis of story comprehen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R.O. Freedle (ed.), *New Directions in Discourse Processing*. Norwood, NJ: Ablex. pp. 53-120.

Stein, N. and Policastro, M. (1984) 'The Concept of a story: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ldren's and teachers' viewpoints'. In H. Mandl, N. Stein and T. Trabasso (eds),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ext*. Hillsdale, NJ: Erlbaum.

Taylor, C (1995) '"You think it was a fight?": co-constructing (the struggle for) meaning, face, and family in everyday narrative activity'.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83: 283-317.

Todorov, T. (1984)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tson-Gegeo, K and White, G. (eds) (1990) *Disentangling: Conflict Discourse in Pacific Socie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 (1981)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J.T. Mitchell (ed.), *On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hite, M. (2007) *Maps of Narrative Practice*. New York: W.W. Norton.

Wilce, J.M. (1998) *Eloquence in Troubl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omplaint in Rural Banglades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R. (1982)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New York: Schocken.

Williams, R. (1983) *Writing in Society*. London: Verso.

【85】

论 证 5

Argumentation

⊙ 弗朗斯·H. 梵·爱默伦 萨莉·杰克逊 斯科特·雅各布斯

5.1 什么是论证?

论证使用语言来证明或驳斥一方立场，目的是争取观点间的一致性。关于论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两人或多人所展开的争论中的互动，如讨论或辩论；或者是个人进行论证的文字稿，如演讲或社论（O'Keefe, 1997）。针对论证的研究，适当的理论方法应该与论证的过程以及在论证过程中产生的争论有关。仔细思考一下下面的段落，它改编自一则在多家报纸上都刊载过的新闻报道（Associated Press, 1993）：

（1）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被杀害。1993 年 40% 工作时死亡的女性是被谋杀的，在同一时期工作时死亡的男性中只有 15% 是被谋杀的。

第一句话是作者的一个论点，另外两个句子则提供了作为原因的证据，使人相信这个观点。这种论点—论据的结构安排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论证。

但是论证不仅仅作为独白出现，一个论证也可能建立在提出论点的人与挑战论点的人之间的互动上，就像下文中年轻女病人与中年男治疗师之间的交流一样（选自 Bleiberg and Churchill, 1977；同样参阅 Jacobs, 1986）。

【86】

（在对话的转录文本中，方括号通常用来指出一个人讲话与另一个人重叠的部分，如病人话音未落之前大夫就开始讲话了。括号中的句号表示短暂停顿。）

（2）1 病人：我不想他们与我的生活有关，除了（。）[安全问题（？）
2 医生： [你住在家里？
3 病人：是的。
4 医生：他们支付你的费用吗？
5 病人：是的。
6 医生：那他们怎么可能与你的生活没有关系？

在第一句话中，病人说她不想她的父母（他们）与她的生活有关系，似乎传达了她认为她父母确实可以与她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这一立场。治疗师通过询问一系列问题来质疑这个观点，问题的答案显然支持了相反的立场：病人的父母不可能与她的生活没有关系。

例（1）与例（2）阐明了论证概念的核心特征。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例子中提炼出一种典型的推理结构：提出主张作为论点，以及其他主张（原因）支持和/或反驳这些论点。第二，两个例子中的争论都关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面性并能够提供正反交流者的角色，正方提出一个主张，反方质疑它、反驳它，或者不认同。对于那一则新闻报道，其中的反方是一个想象中的需要可使之信服的证据的、持怀疑态度的读者；而对于那一段关于治疗的谈话，反方是质疑病人立场并提出相反观点的治疗师。第三，这些例子指出了论证嵌入行为和活动中的方式。在上述新闻中，作者没有公然提出工作中女性比男性更易被杀害的主张或论证，而是通过“最近一项研究”来提出观点并进行论据支持，因此避免了对论证的真实性承担个人责任。在关于治疗的谈话中，治疗师提出问题，引导病人承认其观点的前后矛盾之处，迫使她放弃自己最初的观点，进而论证了治疗师自己的观点。论证就是在这种协作性的活动中形成的。此外，病人通过一个心愿表达了她最初的观点，且她进一步认为这一心愿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似乎正是治疗师抓住了这一点对病人进行反驳。

这两种论证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包含了令人存疑的举例方法。在例（1）中，其实存在一个很严重的推理问题，但是由于它本身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其结论貌似是合理的。事实上，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在工作中受到谋杀。尽管论据中的陈述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性也不能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具体原因我们将会在后文中进行简要说明。而例（2）中的论证所存在的问题与所述事情的真实性或者推理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是因为治疗师进行步步紧逼的具有攻击性的论证方法。【87】

第6句中的反问句以及治疗师其他唐突、宣告式的提问，这些相当于是对病人进行一种“施压”，使得她不敢再进一步为自己作严肃的辩护。有关论证的研究长期关注的便是对这些论证之中的不足之处（一般表述为谬误）所作的分析。

5.2 论证话语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

论证研究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关于逻辑（证明）、修辞（说服）及论辩术（质询）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于论证的功能是使别人信服一个人所言之事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因此，论证理论中经久不衰的研究问题必然离不开对评估问题的讨论：以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支持结论，应该选用何种标准来决定观点是否可接受，等等。历史上，对于论证的研究兴趣，来源于学者们对完善话语以及修正话语对社会的影响的浓厚热情。亚里士多德把论证看作是暴露思考中的错误以及塑造理性典范话语的一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关键在于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区别。他的逻辑并不是为了对个人论证的利弊进行特质分析，而是要从那些可以从真实性已经明确或还不得而知的陈述中识别出论证模式。这些模式普遍适用，因此任何内容都能被具有同样结果的内容所代替。思考下面的论证：

（3）有些性侵儿童者是教师。
　　而有些教师是女性。
　　因此，一些性侵儿童者是女性。

在这种（被称作“直言三段论（categorical syllogisms）”的）论证中，前两个句子（前提）提到了三类人，每一个前提都表明了这三类人中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句子（结论）陈述了上述前提中并不匹配的两类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结论是真实的，因为有两个前提被提出来用以支持这一结论。但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并不能证明这一结论，如果我们对论证中所提到的、号称在这三类人之间存在的正式关系作抽象化处理，便可明白这一点。按惯例，我们用 *S* 代表作为结论中主语（subject）那一类人，*P* 代表结论中作为谓项（predicate）的那一类人，*M* 代表将 *S* 和 *P* 联系起来的中间项（middle term），这种联系通过在一个前提中与 *S* 匹配而在另一个前提中与 *P* 匹配的方式实现。为了消除所涉事物表述的复杂性，我们用 *S* 代表“儿童性侵者”，*M* 代表“教师”，*P* 代表“女性”，因此可以将论证的形式呈现如下：

【88】

（4）有些 *S* 是 *M*。
有些 *M* 是 *P*。
因此，有些 *S* 是 *P*。

这个论证中的错误在于，*S* 可能完全包含在非 *P* 的 *M* 类别中，因此很有可能，没有 *S* 是 *P*。所以，例（4）中的结论有可能、但不一定完全正确。一些儿童性侵者或许可能为女性，但这并不能通过前提的真实而得到确信。当一个论证的形式可以保证，在任何时候前提为真结论也为真时，我们把这种论证形式称为是“有效的”，但是当尽管前提为真，结论却可能错误时，这种论证形式被称为是“无效的”。

人们几乎不会以完整的三段论形式进行论证。尽管如此，这种形式在日常推论中有着直观的基础，我们从下面这段叔叔和他四岁侄子的交流中就可以看出：

（5）　（（柯蒂斯跑进厨房撞到了叔叔））
叔叔：柯蒂斯，你在做什么？
侄子：我是宇航员。
叔叔：你不是宇航员。你没有戴宇航帽。
侄子：汉·索洛也不戴宇航帽。
叔叔：是啊……
侄子：他是宇航员。（。）你看，不是所有的宇航员都戴宇航帽。
（（柯蒂斯跑进了客厅））

通过在缺失之处补充合适的前提，并改换表述的方式以符合特定标准的形式，叔叔的论证也可以成为符合有效的三段论形式。缺失的前提是戴宇航帽是成为宇航员的必要属性，通常表述为“所有的宇航员都戴宇航帽”。在标准的推论形式中，所有的陈述句都要表达两种类别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前提改写为“所有宇航员都是戴着宇航帽的人”。为了把叔叔的论证以标准的三段论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陈述句中的主语和谓项都作为一般性的类别。因此，“柯蒂斯”必须被当作一个只有单一成员的类别，在这一类别中，明确表述的前提“你没有戴宇航帽”可以被改写为“所有的柯蒂斯们都是非宇航帽佩戴者”，或者，通过一种被称为“换置法（obversion）”的转换关系，这句话也可以改写为另一种逻辑上相等的形式“没有一个柯蒂斯是宇航帽佩戴者”。当我们分别用 *P*、*M*、*S* 来代替“宇航员”、“宇航

帽佩戴者”以及“柯蒂斯”时，我们可以把日常会话的表述转换为表 5.1 中所呈现的抽象的类别表达。请注意，无论选择这种特殊的改述方法或其他类似的改述方法（例如，将“非宇航帽佩戴者”作为一个类别），我们都会得到这么一种形式，即若前提为真则结论不可能为假，这是有效形式的定义特征，并且这一属性随后会转移到这一形式的任意“代替例子”中。

【89】

表 5.1

会话表达	类别的改述	类别的抽象化
所有宇航员都有宇航帽	所有的宇航员都是戴着宇航帽的人	所有的 P 都是 M
柯蒂斯没有宇航帽	没有一个柯蒂斯是宇航帽佩戴者	没有一个 S 是 M
因此，柯蒂斯不是宇航员	因此，没有一个柯蒂斯是宇航员	没有一个 S 是 P

表 5.2

会话表达	类别的改述	类别的抽象化
汉・索洛没有宇航帽	没有一个汉・索洛是宇航帽佩戴者	没有一个 P 是 M
汉・索洛是宇航员	所有的汉・索洛都是宇航员	所有的 S 都是 M
因此，不是所有的宇航员都是宇航帽佩戴者	因此，一些宇航员不是宇航帽佩戴者	（假设至少有一个 S 成员）一部分 S 不是 P

尽管这种论证是有效的，也不意味着结论的真实性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论证中的一个或两个前提都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在前提真实性的情况下得出柯蒂斯不是宇航员的结论，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质疑一个前提的真实性来质疑结论，这也是该对话本身出现的情况。柯蒂斯就三段论的要求进行了推断，他推断他的叔叔一定假设了所有的宇航员都戴宇航帽，并且他集中反驳了这一推论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S* 代替“宇航员”，*P* 代替“宇航帽佩戴者”，*M* 代替“汉・索洛（再次将具体的个体当作只有一个成员的一个类别），正如表 5.2 所示，柯蒂斯三段论的结论与他叔叔三段论的第一个前提相矛盾，这种矛盾没有在对话中实际陈述出来，但我们有必要呈现出叔叔推理的形式和内容。考虑到汉・索洛的存在，柯蒂斯按照经典三段论逻辑的说法，推测出了与其叔叔的命题相“矛盾的”一个命题。这两个命题中一定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的研究遵循的是分析独立于其内容的论证性推理的形式的传统。学界希望能够正式呈现出那些看起来可行或不可行的争论的推理结构，而现代的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的发展则是对此的一种直接的回应。

经典的修辞学与有效说服相关，其原则是达成赞同或合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现代的说服理论并不太相同，后者主要致力于分析态度的形成和变化，却不太关注说服信息的生成问题（Eagly and Chaiken, 1993; O’Keefe, 1990）。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重点关注的是针对受众的有效论证的生产，在这种论证中的主题自身并不能证明什么。虽然三段论是逻辑证明中最显著的一种形式，但是省略三段论（enthymeme）在修辞学上也与其具有同等地位。省略三段论被认为是一种能够从听众处确立其前提的三段论。它们通常只是部分地表达，其中的逻辑也是由

【90】

读者来完成的。在例（5）中叔叔论证的失败之处在于犯了一个省略三段论的错误，即他的受众（柯蒂斯）没有接受已经隐含的前提（尽管柯蒂斯确实认识到了这个前提）。日常的（“市场”）争论中省略三段论的水平高低，带来了论证分析中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在普通的论证式话语中如何表现含蓄的未陈述的部分？

对于后来的论证研究而言，对谬误（fallacy）的分析也同样重要［谬误一词最初被诡辩家命名为“诡辩的反驳”（sophistical refutations）或“诡辩”（sophisms），诡辩家是一群古代的理论实践家，他们因把劝服的成功等同于论证的精华而受到指责］。在由亚里士多德明确的众多诡辩中，存在那些字面意思不确定的论证形式，例如一词多义（equivocation）的谬误，即在论证中使用的词语意思悄然发生了转变，由此产生推论错误。

在例（1）中关于工作中的谋杀率的争论，就包含这种一词多义的谬误：这在于或然性（probability）与可能性（likelihood）之间具体含义的区别。新闻中的结论指的是一个女人（或男人）工作中被谋杀的可能性，它是通过计算工作中被谋杀的女性（或男性）数量与所有工作女性（或男性）数量之间的比例，并且进行比较而得出的。而结论中显示这个比例女性要高于男性。但是该结论所依据的对几率的定义则截然不同，它是计算女性（或男性）工作中被谋杀的人数与其因工作死亡的人数之间的比率。只有当男性与女性有相似的总体工作死亡率时，新闻中的结论才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但是那篇文章也显示，在所有发生的工作时死亡的案例中，男性占 93%。这一现象所带来的结果的差异是显著的：基于该报道中其他的统计数据，读者可以计算出有 849 名男性在工作中被谋杀，而女性被谋杀数量仅为 170，尽管（也正如文章中报道的）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男女的数量相当平均（分别为 55% 和 45%）。如果只比较在工作中死亡的男性和女性，男性因谋杀死亡的可能性比女性因谋杀死亡的可能性要低，这一结论便站得住脚。然而，如果把所有在职的男性与女性进行比较，男性工人被谋杀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女性工人。

在发展论证理论的悠久历史中，一个主要的任务便是对论证进行分类以及对谬误加以分析（Hamblin, 1970）。这类理论所涉及的研究工作永远不会完结，因为新的论证形式（如或然性推理）的出现，会导致新的谬误的产生，又将为明确以及解释这些谬误提供新的路径。

我们现在回过来接着梳理亚里士多德对论证研究的贡献，对他所提出的论辩（dialectic）[1] 概念的最恰当的理解是，视其为批判讨论中的一种质询的艺术。论辩是通过暴露和消除立场中的矛盾来对思想进行批判性检验的一种方式：正方提出一个论断，并回答持怀疑态度的发问者（反方）的问题。

【91】在例（2）中，治疗师与病人之间的交流，纵使没有体现这种方法的合作性精神，但也算抓住了这种方法的结构。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ic dialogues）中提问和回答的技巧，是一种论辩的范式示例，但是例（5）中所采用的主张和赞同的模式，同样也可以是论辩范式的内容。任何特定主张的充分性都应该是一种多方面的考察，首先评估作为导入的、通常被认为是论证起点的种种前提，再通过从这些起点中提取含义、确定其与讨论中观点的兼容性大小来进行评估。当有问题出现时，新的命题便会被提出，以避免矛盾的产生。这种严格限制了的对立方法相当于对逻辑的语用学运用，即一种把逻辑运用于实际、以将推测和意见转为更为确定的信念的一种合作性的方法。

1 在语用学分析中，论辩主要是为言语行为确定一个理想的、理性的批判性讨论。——译者注

虽然亚里士多德概述了质询者与回答者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允许的问题和答案的类型，但论证的论辩概念在论证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不被重视，直到最近才有所转变。虽然论证理论中已经发展了类似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假设（presumption）、**归谬法证明**（*reductio ad absurdum proof*）等概念，但是学界并没有太关注它们在论辩方面的问题与表现。而近期对于论辩概念的重新认识与发现，则标志了对于论证理论和研究关注点的决定性转变。

5.3 当代视角

当代论证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佩雷尔曼（Perelman）与奥布莱茨 - 泰特卡（Olbrechts-Tyteca）的著作《新修辞学》（*La Nouvelle Rhétorique*，英文名 *The New Rhetoric*），以及图尔敏（Toulmin）的《论证的使用》（*The Use of Argument*），两本著作都出版于 1958 年。图尔敏论述了对理性这一概念的新的、非形式的定义，并且结合了大量的规范性组织不一的话语情境（“场域”）进行分析。佩雷尔曼和奥布莱茨 - 泰特卡的新修辞学再次向读者介绍了论证理论，并提供了一份有效论证技巧的列表。从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到论证的交互性问题的研究视角的转移，对当代论证研究而言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佩雷尔曼和图尔敏都将法庭辩论视作一般性论证的典型，主要关注的是两个对立争辩者之间的角色交替。这些里程碑式的著作开启了把论证作为语言活动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

新修辞学的主要贡献，是把论证重新置于一个争议性的语境中进行考察，在这种语境中论证会指向某些受众。人们通常认为修辞学是反理性或与理性理想背道而驰的。修辞学研究的是有效劝服的技巧，而论辩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合理性、理性以及对真理的不断接近，但在当代修辞学理论中，学者们显然不再对修辞学和论辩这二者进行生硬的区分。在这些现代修辞学研究的重新检视中，有特色的研究主题是论证的情景化特质以及偏向受众定位的重要性。其核心的理论问题是，如何通过语言的使用使对立的观点相互调解，以及如何通过修辞学本身使现实的受众更加接近于理想化的理性受众所采取的立场。【92】

这种论辩化（dialectification）的趋势在哈姆林（Hamblin, 1970）的哲学著作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在对谬误的“标准疗法”的详细评论中，他将论证视为围绕争论者为使另一方信服己方观点所做的努力而展开的论辩过程。哈姆林的方法有几个重要特征：其强调的是明确言说者责任以及调控互动行为的规则，而不是注重作为论证发生机制的逻辑形式，同时注重对论证的自我构成和自我调整的特征的认识。哈姆林对对话形式的分析兴趣，是论证理论当前最令人关注的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先例。

尽管我们可以采用形式化的以及非语境化的方法研究论辩，但论证研究的论辩路径将离不开对“真实”论证的关注，因为它们会反复出现在实际争论中。考虑到日常论证案例充分性的评估问题、日常论证的条件，以及展开论证所采取的沟通和互动的方式，论辩的研究路径已经逐渐与话语及会话互动的语用学研究方法联系了起来。

与论辩研究的大趋势同时存在的，还有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功能化以及语境化的趋势，主要以图尔敏的研究为核心（Toulmin, 1958; Toulmin, 1970）。概括来说，图尔敏认为，先不管实

质语境，我们可以认为论证提供了一个论点和特定典型问题的答案，但是判定论证充分性的标准将因论证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说者要“接着”讲什么，这个问题带来了图尔敏所谓的“根据（ground）”——与经典逻辑学中的前提大体类似。什么能够证明从这些根据推论至该主张的合理性，恰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开始思考“正当理由（warrant）”或“推理许可（inference licence）”——对此更恰当的理解或许是一种推理策略或规则，而非另一种前提。“支持（backing）”正当理由，可能将以与“根据”类似的实质信息的形式出现，因此这种现在被称为“图尔敏模式”的结构，与对论证的传统描述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它不关注论证中的各部分之间的形式关系，而是侧重其功能关系。

试想我们将如何“图解”例（1）和例（3）中的论证。通过图解，我们常常会发现，必须要增添那些并没有实际陈述、却对呈现说者的推理必不可少的元素。在例（1）中，我们必须增加关于人如何计算以及比较可能性的这个假设，如图 5.1 所示。

例（3）表面上很简单，实际却更加复杂，因为要想充分图解它，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两个论证，其中的一个为另一个建立根据。正如例（1）一样，我们也必须要增补出隐含的内容，具体来说，我们必须给叔叔增添这么一种信念，即戴宇航帽是宇航员必要特征，而不是所有宇航员恰巧共享的一种特性。这种暗含的信念可以被划分为关于“宇航员”这一类人的不同属性的事实命题（在图 5.2 中以支持关于所属类别成员要求的假设形式出现），以及详细说明在具备何种条件才可被视为某个种类一员的推理规则。正如图 5.2 所示，具体说明个案的事实材料为结论或支持正当理由提供了根据，推理规则和其他类似的元素则作为了正当理由。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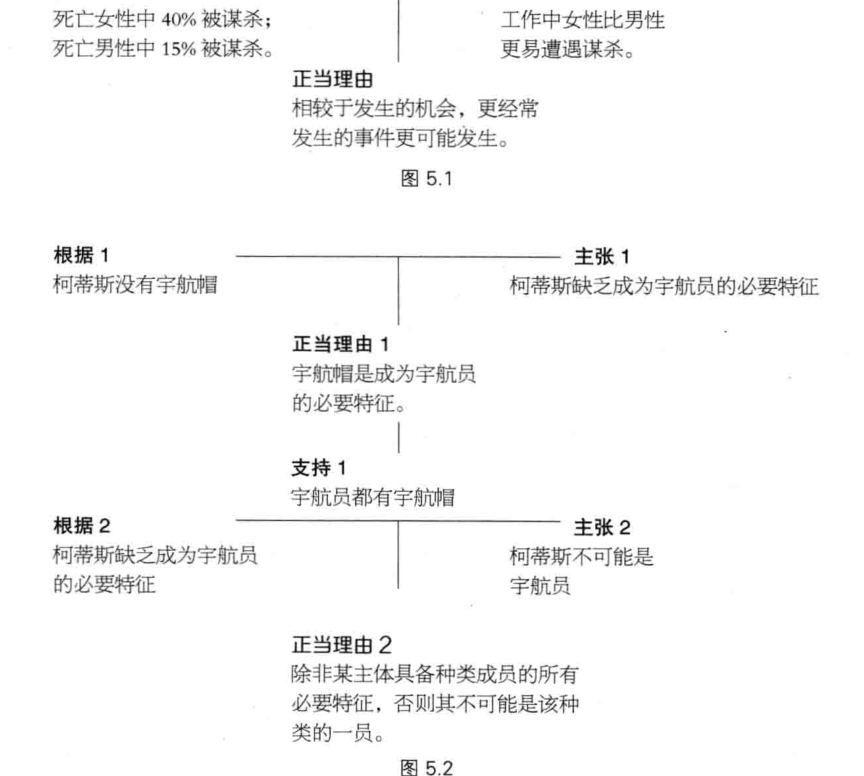


图 5.1

图 5.2

这些图表不仅有助于解释论证中的不同部分是怎样关联起来的，而且有助于定位每一个论证中存在的问题。在图5.1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机会”，一个女人工作中被谋杀的可能性不应以死亡的女性数量中被谋杀的比例来进行测量，而应当采用所有工作女性中被谋杀的比例，且这一比例低多了。而在图5.2中，其错误在于支持正当理由时没有表明的部分：认为所有宇航员都有宇航帽的这一明显存在误解的观念，由此相应错误地假设了佩戴宇航帽是成为宇航员的必要特征。【94】

图尔敏的著作也前瞻性地指出，大量话语语境中存在论证的植入，尤其体现在图尔敏所认为的论证的评估标准“因场域而定（field-dependent）”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一个更基本的观点中，即我们可以将受场域影响的论证元素（主张、根据、正当理由等）理解为针对理想化的对话者所提问题的回答。尽管这种受图尔敏的研究所启发的分析风格（将论证作为完整单元进行图示化）看起来更关注论证的形式和内容，而不是互动，但这一论证结构确实是这些以某种具体的互动功能命名的论证的各个部分之间互动的产物——以作为对那些针对原始论点提出的特定问题或质疑的回答。

图尔敏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线索是“非形式逻辑”运动（‘informal logic’ movement）（Govier, 1998; Johnson and Blair, 1983）。非形式逻辑不是新的逻辑种类，它是一种在日常表达中规范的论证方法，比形式逻辑的方法更常用。非形式逻辑学家的目标是发展规范、标准以及确立解读、评估、分析论证的步骤，以应对日常论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非形式逻辑中一个常见的议题是，在形式上无效的论证，通常很适合作为实际决策的依据。

根据布莱尔和约翰逊（Blair and Johnson, 1987）的研究项目，论证的效力与演绎逻辑的形式有效性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认为结论的前提一定要满足三个标准：①相关性，②充分性，③可接受性。针对相关性，要考察的问题是结论和前提的内容之间是否有适当的关系；对于充分性，问题在于面对反对和争辩时，前提是否能为结论提供足够强大的证据支持；至于可接受性，指的是前提是不是真实的、可能的或者可靠的。

语用学论证理论是对论证理论的功能视角和互动视角的进一步发展，如梵·爱默伦和格鲁腾多斯特的语用论辩理论（pragma-dialectical theory）（van Eemeren and Grootendorst, 1984; van Eemeren and Grootendorst, 1992；van Eemeren et al., 1993; Walton, 1989; Walton, 1995）。语用论辩理论首先是假设论证的目的是解决观点之间的分歧，因而，论证角色的对立是论证话语的典型特征。当说出的、暗示的或传达的话语明确表明了两方观点之间有差异时，论证则被看作源于其他互动事务的语境之中的一种互动。这种描述必须是抽象的，因为论证可以以任何形式出现，它可以是面向未知读者的作者所写的一份书面文本，也可以是两个人之间面对面激烈地来回辩论。但对于论证而言，其重要、典型的特征在于，通过探查对立观点的相对理由，它以一种表明以及尝试解决意见分歧的方式出现。作者预计读者能够被支持自己观点或反驳读者观点的论证所说服。而对话中的争论者彼此之间，则会以直接回应对方每一次连续的表达的方式来使他们各自的立场得以展开。但在这两种情况中，论证的组织都将依赖于对立角色的存在以及每一个争辩者对议题的理解，为了消除对立，这些议题必须要解决。【95】

语用论辩理论从讨论过程而非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提供了一种论证话语的模式，这反映了论证的辩证化、功能化以及情境化的广泛趋势。语用论辩模式替代了适用于单个证据单元的一套

标准，为论证互动和相关的前提条件提供了规则，这些前提条件与参与者的能力、态度以及权力等这样的内容有关。

从语用论辩的（pragma-dialectic）视角来看，论证被认为是管理话语自身的一种话语手段。它属于名为“修复机制（repair mechanism）”这种手段类型，且它的功能是查找和解决观点的分歧（Jackson and Jacobs, 1980）。把论证视为一种修复（事前核查或**事后分析**）的形式，这种看法尤为重要，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其他种类的互动事务中论证的嵌入。换句话说，对任何特定论证——包括那篇新闻中关于工作谋杀的以及那段关于宇航员的谈话中的论证——的分析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且被置于更广的语境中，这个语境通过明确分析最重要的东西来指引论证分析。

如果说论证作为一种修复形式而出现，那么这同样也是在说，论证的组织必须要从一般性的互动原则的角度来进行理解。根据语用论辩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Searle, 1969）以及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theory of conversation implicature）（Grice, 1989）中的见解当作一种桥梁，连接论证的特殊组织以及组织话语和互动的一般性原则（参阅 van Eemeren et al.,1993，尤其是第 1 章和第 5 章）。

最近，梵 · 爱默伦与豪特劳斯尔（van Eemeren and Houtlosser, 2002b）通过引入“策略调动（strategic manoeuvring）”的概念扩展了语用论辩理论的范围（van Eemeren, 2010）。策略调动指的是，在论证话语中，争论者既要做出有效的论证行为，与此同时，也要遵守关键的合理性标准（或至少给人一种正在做努力遵循的印象）。这意味着策略调动的目标在于，在论证话语的修辞学维度和论辩维度之间保持平衡。策略调动同时体现在话语中的论题选择、根据读者需要进行的话语改写以及陈述策略的利用等方面。针对一个话语，如果相较于维持其合理性的辩证规范，我们更关注它修辞学方面的问题，且违反了批判性讨论的规则，那么其策略调动就会被打乱，谬误也将随之出现（van Eemeren and Houtlosser, 2003）。

【96】

5.4　案例研究：社论式广告的批判性分析

有关论证的论辩理论在论证式讨论中的应用显而易见，那就是它可以指导两个辩论者交换观点。我们可以在许多已出版的书籍刊物中找到对这类材料的分析（例如参阅 van Eemeren et al., 1993; 第 5—7 章）。而作为这里的案例分析，我们选择了一份更具有挑战性的材料，一系列仅表现了一方观点的独白式文本。我们分析的“论辩性”并不是因为它瞄准的是对话，而是因为它把论证文本置于这么一种语境之中，即通过答疑解惑，以及在双方都接受前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方努力使另一方确信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关注的关键点在于，这些短篇独白把作者塑造成了正方的形象（在这里是 RJR 烟草公司），而把信息接收者塑造为反方或持怀疑态度的对话者的形象（在这里是一个正在考虑是否要吸烟的年轻人）。

呈现在例（6）和例（7）中的两个文本，最初是作为社论式广告（或“软文”）刊登在 1984—1986 年间的美国杂志上，由 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付费。这两则社论式广告表面上建议年轻人不要吸烟。为了重构论证，它们举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因为这些社论式广告利用并颠

覆了看似他们宣扬的那种公开、合作讨论的标准。努力进行合理论证的表象只是用来掩饰谬误的存在而已。

(6) 1 一些对年轻人出人意料/非同寻常的建议
2 来自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
3 不要吸烟。
4 一方面，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即便是对成年人而言，吸烟
5 也是备受争议的。因此即便我们是烟草公司，我们也不认为
6 年轻人吸烟是个好主意。
7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建议对年轻人会适得其反。
8 但是，如果你开始吸烟只是为了证明你是成年人，那你的证明正好相反。
9 因为决定是否吸烟应该是你
10 无须证明任何事的时候再考虑的事。
11 请三思，毕竟，你或许还没有到吸烟的年龄。
但你已经到了思考的年纪。
12 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

(7) 1 一些关于吸烟的肺腑之言
2 对年轻人。
3 我们是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我们呼吁你不要吸烟。
4 我们这样讲是因为吸烟在全世界都是成年人的习惯。
5 也因为当今即便在成年人中，吸烟也是广受争议的。
6 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忽略这个建议。你可能觉得我们这样与你对话
7 好像你是个小孩子。并且你可能不会那样看待自己。
8 但是正因为你不再是个小孩子，这也不意味着你是成年人。如果你
9 开始吸烟只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个小孩子，那么你就是自欺欺人。
10 所以请不要吸烟。当你成为成年人了你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
11 吸烟对你是否合适。
12 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出的最坦率直接的建议了。
13 R. J. 雷诺兹烟草公司

【97】

虽然你很容易就能够感觉到文本中存在纰漏，但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用论证来解释这些错误。论证重构（argument reconstruction）是一种能实现这种关键性功能的分析工具。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试图说明，例子中的论证毫无说服力，并且实际上弄巧成拙了。这些社论式广告中的论证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是，对于为什么年轻人不应该吸烟，缺乏很好的论证。而我们可以从对论证的重构中看出，文本中这种似乎在反对年轻人吸烟的传播效果是如何达到的。

辩证地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如此看待这些社论式广告，也即它们有助于引发关于烟草角色以及美国社会烟草产业的更广泛的公共辩论。到了1984年的时候，公众对于吸烟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导致了对于在餐厅、酒店、政府大楼、火车和飞机上吸烟的前所未有的限制。国会听证会按照预定计划，除了其他措施，还考虑进一步对烟草广告进行限制。之所以会有这

样的听证会，是因为一些民众认为，越来越多的成年烟民开始戒烟或命不久矣，为了弥补可能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烟草公司开始刊发针对儿童的烟草广告。因此，即便这两则社论式广告似乎是只针对年轻人的自圆其说的夸张言辞，我们也应该预料到，整个社会大环境会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对待广告中的论证。并非巧合的是，这两则社论式广告后还有第三个广告，标题为“我们不对儿童做广告”。作为其中的论据，第三则广告指出：“首先，我们不希望年轻人吸烟。而且我们的广告专门针对年轻人，目的是告诫他们只有成年人才可以吸烟。”

至少在表面上，例（6）和例（7）中的论证看起来在努力进行辩证推理。对于为什么年轻人不该吸烟，二者在开头（4—5行）给出了朴实直接的理由。首先，吸烟是成年人的习惯。其次，即便是对成年人吸烟也是有争议性的。这些论证界定了一种分歧空间，其中，正方和反方没有过多地探讨吸烟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是个坏主意，而是探讨了这么一个可能会由年轻读者巧妙提出的关于吸烟的问题：如果（正如RJR烟草公司一定认为的那样）成年人可以吸烟，为什么年轻人就不可以？

在两则广告中接下来的部分里，都更坦率地预估和表述了年轻受众可能据此作出的反应。【98】在例（6）中的7—11行中，烟草公司预计自己给出这种建议会适得其反，会激起年轻人以广告中不提倡的行为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年人。这一逆反效果的问题本质，在例（7）中的6—9行表述得更为清楚：这种建议可能遭到拒绝，因为它似乎显得高人一等（与读者对话，好像他们是小孩子一样）。而在这两个例子中，RJR都认为，拒绝这个建议并开始吸烟，并不能证明一个年轻人就是成年人或不是小孩子了。

最后，这两则社论式广告都认为，自己做这种广告“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因此其论证应该是尤为可信的。在例（6）中，RJR暗示道，他们的呼吁和主张恰恰与他们作为一家烟草公司的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并把他们的建议称为“出人意料的”，然后坚称他们认为年轻人吸烟不是个好主意，“即便我们是一家烟草公司”（第5行）。在例（7）中，该社论式广告在开头和结尾中都强调了该广告信息具有“坦率直接”的特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或多或少地从形式上描述了例子中的论证，主要关注的只是与文本中与材料保持紧密对应的论点和理由。两个关于不吸烟的基本论证可以呈现如下：

（8）主张：年轻人不应该吸烟。
　　理由1：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
（9）主张：年轻人不应该吸烟。
　　理由2：吸烟在成年人中也备受争议。

就像大多数自然情境的论证，这些文本自身不足以作为潜在推理的概貌。但这并不意味其论证是有推理缺陷的，也不是说，其理由不能为论点带来充分的正当性支持，只能说明，我们不得不把隐含的内容补充完整。

直观地来讲，相比明确陈述的论证，在这些包含暗示的论证中，人们的理解会更透彻。在这些论证的建构中，一些不言而喻的共享信念和意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些信念的假定和意义的再现，使得论证中的理由能够构成对主张的正当辩解。这就是省略三段论论证的典型特征，但是，这些不言而喻的信念是什么呢？并且按照何种原则才能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再现形式呢？这便是

不表述前提所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被用于作为一个体现话语中连贯和推论问题的特殊例子。

一种解决办法是，试图辨识出那些虽未明说、但仍可作为论证前提的、可主张的命题。我们假设 RJR 烟草公司正在尝试为这次辩论作出合作性的贡献，并且根据格赖斯（Grice, 1989）的含义理论，我们应该找出这么一些命题，即虽没有明确陈述但论辩双方都能让对方理解，并且如果明确表述了出来，明理之人便能够察觉并利用其进行论证的这么一些命题。至少，一个理性的辩论者应当致力于采用一种有效的推论模式，并且其前提应该真实，或者至少是貌似真实可信的。这样一种模式可以是如下的样子：

（10）前提 1：如果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那么年轻人就不应该吸烟。
前提 2：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
结论：年轻人不应该吸烟。

（11）前提 1：如果吸烟在成年人中也是有争议的，那么年轻人就不应该吸烟。
前提 2：吸烟在成年人中也是有争议的。
结论：年轻人不应该吸烟。

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补充了一个前提，它符合有效的、演绎的、被称之为假言推理（modus ponens）的推论模式。假言推理是一种命题的推理形式，它的“元素”是命题而不是类别。把 p 和 q 作为命题变量（可以代表任意命题的符号），我们可以将例（10）以如下抽象的形式表示出来，其中 p 代表“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这一命题，q 代表“年轻人不应该吸烟”这一命题：

（12）如果 p，那么 q
p
因此，q。

要注意的是，虽然社论式广告中并没有表述“如果 p，那么 q”这一假设，但论证的正方（RJR）通过将 p 作为接受 q 的理由，表达了自己所信奉的事实。由于例（8）和例（9）中的“理由”和“论点”的论证功能多少还是明显易懂的，因此例（10）和例（11）中增加的前提也并不难懂。

但是把解释这种前提当作重构的一步毫无意义，除非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前提所替代的实质性的根据。我们可以用任意两个以论证关系出现的陈述句，来增补出一个实际上意为“如果有理由，那么主张”的前提。这无异于表明，我们可以从一个陈述中推断出另一个陈述。虽然这样的前提满足了有效推论在逻辑上的最小标准，但它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一个人会认为一个断言是声称另一个断言的足够充分的理由。如果可能，我们应寻找出这样的能够提供信息的、未表述出的、且实质上并不空洞的前提。因此，在例（5）中，最好把叔叔的论证中未明说的前提看作是类似“所有宇航员都戴宇航帽”这种句子，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像“如果你没有戴宇航帽，那么你就不可能是宇航员”这么琐碎的表述。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比前提 1 更有信息量的前提，或者是对前提 1 的基础作更有信息量的解读。

让我们先来思考例（10）中的推理：吸烟是成年人的习惯，这与年轻人不应该吸烟有什么关系？ R. J. 雷诺兹把这么一种假设纳入他们建立的论证之中，即，是否应该吸烟是成年人才有

权为自己作的一个决定（例（6）中9—10行的“是否吸烟应该是你无须证明任何事情的时候再考虑的事”；例（7）中10—11行的“当你成为成年人了你将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吸烟对你是否合适”）。这至少部分是坚称某事是成年人的习惯所意味的内容。

【100】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从两则社论式广告中，提取出年轻人不是成年人这一命题。例（7）认为，年轻人或许不认为自己是小孩子。RJR否认了吸烟能够表明他们是成年人，以此回答了这一问题（8—9行）。在例（6）和例（7）中，年轻人被预设为一直试图证明他们确实是成年人——这种尝试，根据社论式广告的观点，证明是适得其反。然而，即使年轻人不是成年人，那又怎样呢？为什么要说这一点与年轻人不该吸烟的主张相关呢？

因为，坚称吸烟是成年人的习惯，这不仅意味着成年人有权这么做，也意味着只有成年人才被允许这样做。如果不是成年人，他们就没有吸烟的权利（“只允许成年人吸烟”）。

因此，我们可以将例（10）中的论证解读为基于下面的一串推理。只有一个人是成年人时才有权利实践成年人的习惯。（如果某个人是成年人，他便有权利实践成年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年人，他就没有权利实践成年人的习惯。）年轻人不是成年人，由此，年轻人就没有权利沾染成年人的习惯。而由于吸烟是成年人的习惯，所以年轻人就没有权利吸烟。并且，由于一般都认为，人们不应该做他们没有权利做的事情，因此我们能够得出年轻人不应该吸烟的结论。

这种推理的实质肯定会被那些可能有吸烟习惯的年轻人所拒绝，但这是社论式广告所提供的全部意见的根据。而且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广告中存在的有问题的论证弱点。不管我们怎样前后阅读文本，怎样试图找出一个能够连接列举的原因及其论点之间的实质性基础，我们都将发现这么一串推理逻辑链，它只是一直在反复重申成年人的权利、成年人的特权以及成年人有权限制孩子的选择这一点。

RJR烟草公司要辩护的立场是，只有成年人有权吸烟，年轻人被排除在这一类人之外。但是为什么年轻人被排除在外？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成年人”和“小孩子”这两个类别，主要是道德上的分类，而非生理上的。成年人具有小孩所不具备的权利，并且使用这些权利需要你具备作成熟决定的能力。如今，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小孩不能针对健康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因此需要外界的保护，以免自己作出不正确的选择。确实，这两则广告都暗指年轻人会有孩子气的不成熟的推理（在例（6）中：“但是如果你开始吸烟只是为了证明你是成年人，那你的证明正好相反”；例（7）中：“如果你开始吸烟只是为了证明你不是个小孩子，那么你就是自欺欺人”）。不成熟恰恰是将年轻人与成年人区别开来的一个基本特点，而RJR公司却直截了当地屏蔽了与此相关的任何假设。在例（6）中，通过催促年轻人“仔细考虑”以及声称他们“还未到吸烟年龄，但（他们）已经到了思考的年纪”，广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事实上，年轻人在任何重要的方面都与成年人不同，对此，两则广告中根本没有提出真正的论证。这两则广告都估计，它们的年轻读者会拒绝归入非成年人一类（且会通过吸烟来尝试证明他们是成年人），但是这两则广告都没有在实质上对论证的前提作出辩护。在例（7）中，【101】RJR没有证明年轻人不具有成年人的地位，他们仅仅只是否认了，读者不是小孩不意味着就是大人的这个事实（第8行）。在例（6）中，RJR烟草公司又通过循环推论来表明，年轻人不是成年人，循环推论被福格林和辛诺特-阿姆斯特朗（Fogelin and Sinnott-Armstrong, 1992）称为

自我封闭论证（self-sealing argument）：通过把证明他们是成年人的举证责任推给年轻人（并且将年轻读者很可能会否认自己不是成年人这一点归为证明的动机），烟草公司确信了他们不可能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是不需要证明什么的。在两个例子中，表面上是反驳和抗辩，实际上是在拒绝辩护。由于没能证明其对年轻人分类的合理性，这些社论式广告在这一方面走入了死胡同。

同样，这些广告明显在回避为什么吸烟是一种受限制的行为。对于这一争议，首先存在这样的基础：年轻人没有认识到成年人受限的合法性。这些社论式广告仅仅把它们的主张限定在年轻人不应该吸烟，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年轻人无权吸烟，直至成为成年人为止。广告借用了传统看法的力量，即在于说明吸烟“一直”是成年人的习惯并且全世界都是如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广告中缺乏真正的实质性的支撑材料，因为它没有利用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反对吸烟的论证：烟草是一种可致死的且易上瘾的毒品，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有人可能会认为例（11）中重建的论证暗示了这些实质性的反对理由，但是，说吸烟是有争议的，这不过是在说一些人支持吸烟而另一些人不支持。这一论证仅仅只是支持了排除（年轻人）这一推定而已。

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有争议”的含义。人们通常说某议题有争议，是说该议题有两个方面，没有哪个方面是明显正确的，因此该议题受到质疑，但本质上是无法确定的。广告上说：“吸烟是有争议的”，意味着吸烟既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而在缺乏决定性结论的情况下，带有假设的立场便获胜了——如果成年人选择要吸烟，他们便该有权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种意义的“争议性”，尤其适用于一方存在推测的这种情况，即一方立场被有力挑战。例（9）中的理由，以“即便是在成年人中”为条件开头，这通常暗示了吸烟对于某些群体而言要比成年人这个群体更“有争议”。大概正是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对比群体，因为社论式广告讨论的就是这个群体的吸烟情况。如果吸烟在成年人中有争议，那么在年轻人中一定更有争议。而在这儿的意义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吸烟甚至更有问题，更受质疑。也就是说，相较成年人，更不应当允许年轻人吸烟。

但是，是什么使得年轻人更不被允许呢？两则社论式广告都没有提出质疑或对比的实质性基础。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假设成年人有吸烟的习惯，而这不适用于年轻人。

【102】论证的矛盾特征是恶性的，它会有损所提供的建议的可信度，同时阻碍批判性检视。这些社论式广告似乎在用实质性的论证和直率的反驳，来公开应对那些年轻人的质疑和挑战，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回避更进一步的严肃讨论。他们同样似乎作出了公正的、平衡的和客观的论证，但其论证的方式和内容却巧妙地包装为与下述立场保持策略性一致，即成年人吸烟是出自一种合法、合理且成熟的决定。最重要的是，这些社论式广告提供了建议，但却采用了与年轻人矛盾的适用方式——即，不选择读者可能接受的前提，而选择读者几乎肯定会拒绝的前提。

5.5 论证研究的实际应用

要理解论证研究的整个领域，首先要设想三个（或更多）独特的科学目标。第一个目标

是规定性的：制定一组指导人们如何更好地论证的原则。这一内容，以及实际的兴趣，首次出现并清晰地表达在关于修辞学、论辩和逻辑学的几个世纪的著作中。第二个目标是描述性的：确立在经验上正确的论证话语模型，这种模型与主题谈话、管理会话的层次以及协商社会认同等这些现象的模型，在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兼容。描述性论证研究的典型案例可以在会话分析及相关流派的著作中找到（Coulter, 1990; Goodwin, 1983; Jacobs and Jackson, 1982; Schiffrin, 1984）。现代形式逻辑和认知科学也在近期转向对自然推理过程的描述，努力构建那些长期被忽略的现象的模型，如运用启发法（heuristics）以及“缺省推理（default reasoning）”的结构。此外，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描述性论证研究的形式，并明显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即辨识出那些再处理论证文本时实际对人产生了影响的因素（Eagly and Chaiken, 1993; O’Keefe, 1990）。第三个目标是批判性的：发展出一种评估和改进实际论证实践的框架，把这两项内容都作为待解释的现象以及干预的机遇，也就是，试图带来社会变化（Goodnight, 1982）。

这些目标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些实践的附加内容，因为，从古典时期开始，论证的研究就一直是一项与提升推理及陈述理由的话语有关的实践性事务。当代的论证研究强调大量的话语实践和话语情境，其体现实践性的方式与更传统的研究方法略有不同。在广泛的论证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存在如下两种主要的应用类型。

【103】

5.5.1 教育学应用：论证能力的培养

第一种类型的应用显然与悠久的修辞学传统联系最为紧密：批判性能力的发展。论证研究的一个目标，是要培养分析和批判性质询的能力。对谬误的研究在教育学领域最好的体现，便是培养一种批判意识，使得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论证的话语中：不是指能在辩论中“更好”地赢，而是说能够使讨论“更好”地朝着理性解决方案发展。因此，例如在教育学生应把私利看作是对理性的潜在威胁时，我们也要提供接受检验的反方观点。又如，分析烟草公司广告的案例研究，不仅对持续性话语的研究作出了潜在的贡献，也是关于公共说服的批判性思考的鲜活例子。

但是，我们说当代教育学应用与传统修辞学有紧密联系，并不意味着这些当代的应用仅仅只是对过去成就的重新利用。恰恰相反：由于话语实践自身与其他社会条件在一同发展，批判性分析必然将面对来自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的新挑战。例如，在当代公共话语中，人们极其普遍地使用民意测验作为管理民意的工具，这导致了一些独特的现代谬误形式的产生，它们需要细致的理论分析，也需要系统的教育学方面的研究（例如，见 Harrison,1996）。

5.5.2 干预：话语过程的设计

第二种类型的应用，在概念上与诸如威拉德（Willard, 1982; Willard, 1989）互动论理论的实践取向的研究路径，以及与我们自己的语用论辩理论有关，并且它关注的是话语过程的设计问题。人类社会一直在设计传播系统，但是近期才针对特殊系统的设计特征进行了清晰而详细的检验，这是由更宏大的社会变革而催生的，如传播信息技术的大爆炸。正如我们在其他著作中指出的（van Eemeren et al., 1993: 第 8 章），描述性和规范性的综合考虑不仅有助于个人层面的、与论证研究长期有关的教育学应用，也有助于社会或制度层面的应用，这些应用解决的是如何展开话语这个问题。

我们会怎样思考上面分析过的案例研究的干预问题呢？也许第一个启示就是，在一个充满社论式广告、商业信息广告和文献电视片的世界里，热线广播节目就像是一个公共论坛，陪审团在谋杀案审判中作出的决定取决于民意测验的结果，公众所需要的，不仅是更多更好的、关于事件内容的信息，而且也是更多更好的、关于信息提供方式的信息。那些与 R.J. 雷诺兹烟草公司社论式广告类似的信息，其狡猾之处，与其说是它们论证中具有欺骗性的内容，不如说是其试图消除敌意的、呈现论证的框架。任何一套批判式讨论的规范或程序都不可能预计或阻止它们自己的颠覆和利用。当然，我们需要为之提供的是论证过程自身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控制论证谬误，唯一有效的方式是运用指出了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反向论证。【104】

而这又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对于那些类似于 R. J. 雷诺兹公司刊发的“付费的”社论广告，不存在为了理性反对而建立的自然的辩论论坛。针对这一案例中呈现的问题，一个论证的解决方法，也许不仅需要为了反驳某文本的其他文本的发展，同样也需要设计出支持反驳的结构（如政府授权项目来促进反吸烟教育活动的开展）。

结构的设计特征恰好出现在论证研究的领域之内，不管它们是对抗的还是非对抗的，不管如何规定观点间的平衡竞争、如何确定解决方案等。从语用论辩的观点来看，对反驳加以设计，可以校正现实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所存在的障碍，而这一方式尤为有趣。

延伸阅读

作为进一步阅读的一点建议，我们首先想提及一些关于论证理论的最前沿的研究综述；其次，还得提到那些解释了不同理论路径的颇具影响力的专题论著；最后，我们也建议阅读一些与策略调动这一整合概念有关的近期出版物。

Van Eemeren, F. H., Garssen, B., van Haaften, T., Krabbe, E.C.W., Snoeck Henkemans, A.F. and Wagemans, J.H.M. (2011) *Handbook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Dordrecht: Springer.

这本手册介绍了论证理论，解释了经典的和现代的理论背景，并综述了当前最知名的研究路径。

Johnson, R. H. (2000)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van Eemeren, F.H. and Grootendorst, R. (2004)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D.N. and Krabbe, E.C.W. (1995) *Commitment in Dialogu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ersonal Reasoni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这三本专著每一本都解释了一种论证话语的理论路径：约翰逊介绍的是一种非形式逻辑路径，梵·格爱默伦与格鲁腾多斯特介绍的是语用论辩理论的方法，而沃尔顿和克拉比着眼的是相关的论辩研究路径。

Jacobs, S. (2006) ‘Nonfallacious rhetorical strategies: Lyndon Johnson’s daisy ad’, *Argumentation*, 20: 421-42.

Tindale, C. W. (2006) ‘Constrained maneuvering: rhetoric as a rational enterprise’, *Argumentation*, 20: 447-66.

van Eemeren, F. H. (2010)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Extend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Zarefsky, D. (2006) ‘Strategic maneuvering through persuasive definitions: implications for dialectic and rhetoric’. *Argumentation,* 20:399-416.

梵·爱默伦的专著，为那些致力于追求修辞效果和论辩推理的论证话语的策略调动问题提供了理论方法。雅各布斯（Jacobs）、廷德尔（Tindale）和扎里夫斯基（Zarefsky）则呈现了关于三种论证话语的观点，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与检验策略调动相关。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在网址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可以阅读。

Eemeren, F. H. van and Houtlosser, P. (1999) 'Strategic Manoeuv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Discourse Studies*, 1(4): 479-497.

Richardson, J. E. (2001) "Now is the Time to Put an End to all this':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Theory and 'Letters to the Editor", *Discourse & Society*, 12(2): 143-168.

Rips, L.J., Brem, S.K. and Bailenson, J.N.(1999) 'Reasoning Dialogu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6):172-177.

参考文献

Associated Press (1993)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murdered at work than men, study finds'. *Arizona Daily Star*, 2 October: A5.

Blair, J. A. and Johnson, R. (1987) 'Argumentation as dialectical', *Argumentation,* 1: 41-56.

Bleiberg, S. and Churchill, L. (1977) 'Notes on confrontation in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4: 273-8.

Coulter, J. (1990) 'Elementary properties of argument sequences'. In G. Psathas (ed.), *Interaction Competence.*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p. 181-203.

Eagly, A. H. and Chaiken, S. (1993)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isher, A. (1998) *The Logic of Real Argu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gelin, R. and Sinnott-Armstrong, W. (1992) *Understanding Arguments: an Introduction to Informal Logic*(4th edn).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Goodnight, G. T. (1982) 'The personal, technical, and public spheres of argument: a speculative inquiry into the art of public delibe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orensic Association*, 18:214-27.

Goodwin, M.H. (1983) 'Aggravated correction and disagreement in children's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7: 657-77.

Govier, T. (1988) *A Practical Study of Argument* (2nd edn). Belmont, CA: Wadsworth.

Grice, H.P. (1989) *Studies in the Ways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mblin, C. L. (1970) *Fallacies*. London: Methuen.

Harrison, T. (1996) 'Are public opinion polls used illegitimately?: 47% say yes'. In S. Jackson (ed.), *Argument and Value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CA/AFA Summer Conference on Argumentation.* Annandale, VA: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ackson, S. and Jacobs, S. (1980)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al argument: pragmatic bases for the enthymem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6: 251-65.

Jacobs, S. (1986) 'How to make an argument from example in discourse analysis'. In D.G. Ellis and W.A. Donohue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Processe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pp. 149-67.

Jacobs, S. (2006) 'Nonfallacious rhetorical strategies: Lyndon Johnson's daisy ad'. *Argumentation*, 20: 421-42.

Jacobs, S. and Jackson, S. (1982) 'Conversational argument: a discourse analytic approach'. In J.R. Cox and C.A. Willard (eds), *Advances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pp. 205-37.

Johnson, R. and Blair, J. A. (1983) *Logical Self-Defense.* Toronto: McGraw-Hill.

O'Keefe, D. J. (1977) 'Two concepts of argu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Forensic Association,* 13: 121-8.

O'Keefe, D. J. (1990) *Persuasion: Theory an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erelman, C. and Olbrechts-Tyteca, L. (1958)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Brussels: University of Brussels.

Perelman, C. and Olbrechts-Tyteca, L. (1969) *The New Rhetoric: 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 (trans. J. Wilkinson and P. Weaver).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Schiffrin, D. (1984) 'Jewish argument as sociability'. *Language in Society*, 13: 311-36.

Searle, J.R.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ndale, C. W. (2006) 'Constrained maneuvering: rhetoric as a rational enterprise', *Argumentation*, 20: 447-66.

Toulmin, S. E. (1958) *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ulmin, S. E. (1970) *An Examination of the Place of Reason in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Eemeren, F. H. (2010)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Extend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van Eemeren, F. H. and Grootendorst, R. (1984) *Speech Acts in Argumentative Discussions*. Dordrechts: Foris.

van Eemeren, F. H. and Grootendorst, R. (1992) *Argumen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Fallacies: a Pragma-Dialectical Perspectiv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van Eemeren, F. H. and Grootendorst, R. (2004)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Eemeren, F. H. and Houtlosser, P. (2002a) 'Strategic manoeuvring with the burden of proof'. In F.H. van Eemeren (ed.), *Advances in Pragma-Dialectics*, pp. 13-29. Amsterdam: Sic Sat.

van Eemeren, F. H. and Houtlosser, P. (2002b) 'Strategic maneuvering: maintaining a delicate balance'. In F.H. van Eemeren and P. Houtlosser (eds.), *Dialectic and Rhetoric: the Warp and Woof of Argumentation Analysis*, pp. 131-59.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van Eemeren, F. H. and Houtlosser, P. (2003) 'More about fallacies as derailments of strategic maneuvering: the case of *tu quoque*'. In H. V. Hansen, C. W. Tindale,. J. A. Blair, R. H. Johnson and R.C. Pinto (eds), *Argument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rganised by the 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in May 2001*, CD-ROM. Windsor, Ontario: Ontari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van Eemeren, F. H. and Houtlosser, P. (2006) 'Strategic maneuvering: a synthetic recapitulation'. *Argumentation*, 20: 381-92.

van Eemeren, F. H., Grootendorst, R., Jackson, S. and Jacobs, S. (1993) *Reconstructing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van Eemeren, F. H., Grootendorst, R., Snoeck Henkemans, F. , Blair, J. A., Johnson, R. H., Krabbe, E. C.W., Plantin, C. ,Walton, D., Willard, C.A. ,Woods, J. and Zarefsky, D. (1996) *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van Eemeren, F. H., Houtlosser, P. and Snoeck Henkemans, A. F. (2007) *Argumentative Indicators in Discourse: a Pragma-Dialectical Study*. Dordrecht: Springer.

Walton, D. N. (1989) *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on, D.N. (1995) *A pragmatic Theory of Fallacy*.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Walton, D.N. and Krabbe, E.C.W. (1995) *Commitment in Dialogu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ersonal Reasoni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illard, C. A. (1982) *Argumentation and the Social Grounds of Knowledge*.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Willard, C. A. (1989) *A Theory of Argument*. 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Zarefsky, D. (2006) 'Strategic maneuvering through persuasive definitions: implications for dialectic and rhetoric', *Argumentation*, 20:399-416.

【107】

话语符号学 6

Discourse Semiotics

⊙ 西奥·梵·利尤温　冈瑟·克雷斯

6.1　多模态话语分析

20 世纪有四个语言学流派，除了研究语言外，也参与到对符号模式（semiotic modes）的研究中来。第一个是布拉格学派，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该学派将语言学研究延伸至视觉艺术和戏剧中的非语言方面，也包含了对民俗学的研究，并与先锋派艺术家进行合作（例如参阅：Matejka and Titunik, 1976; Mukarovsky, 1977）。第二个是巴黎学派的符号学，其运用来自于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的概念和方法，大部分研究都专注于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而非民俗学或先锋派艺术（如，Barthes, 1967; Barthes, 1977; Barthes, 1983）。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语言学家开始对口语和非言语交流的多模态分析产生兴趣。如雷·伯德惠斯特尔（Birdiwhistell, 1973）设计出一套精细复杂的转录文本方法来分析肢体动作，皮腾杰等人（Pittenger et al., 1960）发表了一篇高度详尽且具开创意义的论文，其内容是针对精神病治疗谈话中的前五分钟内容的多模态分析。第四个学派则发展于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了语言学家 M. A. K. 韩礼德（Halliday, 1979; Halliday, 1985）的启示。正是这一学派首次采用了“多模态”这一术语，并发展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工具和方法（Baldry and Thibault, 2006; Hodge and Kress, 1988; van Leeuwen, 2005）。

“多模态”这一术语针对的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理论或方法——这种现象出现于文本和传播事件之中，是通过把多种“符号模式”（表达手段）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而产生的。例如，会话将语言、语调、音色、面部表情以及手势和姿势整合起来，因而一些会话分析者开始将非【108】语言元素整合进他们的转录文本中（Goodwin, 2001; Ochs,1979）。写作不仅使用词汇和句子，同时也是一种图像形式的表达，因此，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再次关注笔迹学和印刷格式（Crystal, 1998; Graddol, 1996; Walker, 2000）。因此，“多模态话语分析”针对的是这样一种研究领域，即考察不同模式的共同属性以及不同的传播潜力，并分析这些模式是如何被运用于多模态文本和传播事件中的。这一分析使用了来自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但也从其他相关学科受到了启发，如艺术和设计理论以及音乐学。

当代这种对多模态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因为，大约在过去的 90 年间，交流本身已经迅速多模态化。杂志和广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将语言、图像和图形传播混合使用，美国的连环画在

1930年代也同样如此。电影的到来改变了表演，放大了非言语交际中微妙的一面，因此影响了全世界人民如何交谈、行动和微笑。麦克风将音质和音调的细微差别凸显了出来，电视使得非言语交际成为政治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尼克松和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进行的电视竞选辩论中。显然，如果没有对交际中非语言方面的关注，话语研究不再能做到充分和全面，无论在会话、治疗过程或政治话语中都是如此。

最初，多模态话语分析将交流中的不同模式分开来研究，使用语言学模型将视觉传播描述成一种“图像的语言”，将音乐传播描述为一种“音乐的语言”等。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则是个例外，因为他不仅注意到多模态传播中潜在的一般性原则，设计出一种可以被应用于所有符号模式的概念框架（Barthes, 1967），同时还发展出一种研究文本和图像与多模态文本的整合方式的理论（Barthes, 1977）。但即使在巴特的著作中，“语言信息”和“视觉信息”也仍然是分离的，在它们彼此相关联之前，如在图像可以作为文本的“图示”或文本可以作为“锚定”（即文本赋予图像更具体和精确的意义）图像之前，它们只能被孤立地理解。对于许多种多模态文本而言，这曾经是——现在仍是——完全貌似可行的，但对其他文本来说就远远不够了。文本和图像之间的整合已经太密切、太相互依赖，因此不能被孤立地解读。摄影师马特·赛伯通过拍摄街景和商店室内场景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移除了广告牌、指示牌等上面的所有文字，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则删除了除文字以外的所有事物。没有了语境，文字显然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分布，读起来像是一首奇怪的象形诗。而失去了文字，广告牌以及指示牌上的箭头、框架和图画碎片都不再具有意义（Siber, 2005）。

赛伯的研究结果同样适用于当代连载漫画、杂志广告或网页。例如一个猫粮的单页广告，顶部出现了一只有黄色眼睛的毛茸茸的灰猫，在其下方的文字是“宠坏的、宠坏的、宠坏的、宠坏的”，再下方是四个黄罐猫粮。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多模态的命题，内容类似于：“这只猫被宠坏了四次，通过四罐不同的猫粮。”这一命题的“主语”是视觉的（猫的图片），“谓项”是言语的（“宠坏的、宠坏的、宠坏的、宠坏的”），“被动施事”是视觉的（猫粮）。视觉和言语就这样被混合起来。文字和图像不再孤立地产生意义，而是需要依靠彼此来传递信息。这不仅体现在多模态文本中，这些文本生产的方式也是如此。过去每种模式都需要专业设备和专业技能（作家、排字工人、摄像师、录音师），而现在，一个人就可以通过一个并且是同一个键盘来操控这一系列模式，多模态传播不再是专业人士的领地，而面向所有人开放。现今的日常书面交流使用多种字体、布局和颜色，谈话和报告则通过幻灯片的图表资源将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结合了起来。是的，语言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现在它只是多种交流模式中的一个。因此，作为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者，我们要将研究领域扩展至多模态理论（multimodality theory）和多模态话语分析中。

【109】

6.2 社会符号学

支撑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是“社会符号学”。这一理论可以被描述为：①对多模态交流中所使用的素材资源的研究，②对使用这些资源来沟通和表达的方式的研究。

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可以是生理上的也可以是技术上的。生理资源包括产生面部表情的声音和肌肉，以及非言语交际的手势和姿势。技术资源则延伸了生理资源的潜在可能，我们不仅用声音交流，也用乐器交流；不仅通过面部表情和手势交流，也通过衣着和打扮自己的方式与人交流。除了这所有的一切之外，我们还创造出了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拓宽我们的符号活动的技术，使得符号活动跨越距离分布（如广播和电话）并随时间流逝得以保存（如书写、绘画、视频录像）。

社会符号学首先研究这些资源本身——它们特定的、文化生产的、但同样也是模式内生的传播潜力。一方面，符号资源具有某些内在特征，使得它们符合特定的传播目的，无论是基于素材质量还是感知意识。声音即便是在背后也能被听到，但视觉则是一种“窄束（narrow beam）”。因此，声音是召唤人们（如学校的铃声）或发出警报（如救护车的鸣笛）更好的媒介；而视觉资源更擅长展示精确的空间关系，如地图或楼层平面图。另一方面，如果是出于实践或文化的原因，符号资源变得令人满意，那么文化实践和技术就能推翻它的内在特征——例如，开发定向传声器，或使用语音导航代替地图。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特定模式的特定传播潜力，也要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属性和潜质。同一个故事，我们既可以口述或者书写出来，也可以拍成电影；同一个现象，我们既可以用图表也可以通过文字来进行解释。当然，传播的效果会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哪一种类型的传播方式更受欢迎也没有定论。今天，许多曾经我们习惯于用文字书写的信息，以视觉的形式呈现了出来，因此视觉符号资源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发生了改变，并向曾经无法涉及的领域进行扩展。

【110】

符号资源基于以往的使用获得了一种**意义潜势**。一旦我们确认了某种符号资源（如视觉作品），我们就能问：“作品以何种方式产生意义，并且目前为止产生了什么类型的意义？”与此密切相关的术语是“可供性（affordance）”，这源于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的著作（Gibson, 1979）。根据吉布森的观点，可供性是一个既定对象的使用潜能。他认为这些潜能直接源于它们可观察到的特性。但是，取决于观察者的需求、利益及具体情况，不同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不同的可供性。“意义潜势”这一术语则由韩礼德（Halliday, 1979）提出，它与“可供性”之间的区别在于，“意义潜势”是指已经被确立为既定语境的固有组成的一部分的意义，但“可供性”所包含的意义，也就好像是对象或材料中潜藏的一样。当然，社会符号学家对这二者都很感兴趣——对现有资源的使用以及对新资源的创造。我们将在后文中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意义潜势仅仅只是**潜能**。它们会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实现，因此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符号资源在多模态文本和传播事件中是怎样被使用的？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支配着符号资源使用的规则，它们是由制定该规则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利益所决定的；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有可能会创造出这些资源的全新使用方式，或者具有部分新意的使用方式，符号生产者会从可用的资源中选择最适合的“能指（signifier）”（素材、可感知的资源），来表达既定情境中所要表达的“所指（signified）”（意义）。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一项关于儿童玩具的符号学研究（van Leeuwen, 2005）中，研究者录制下了十位妈妈用两种不同的婴儿车上的摇铃与她们三四个月大的婴儿玩耍的情景。一种摇铃由四个相同的、有光泽的硬塑料兔子组成，并且通过有弹力的绳子把它们系在婴儿车侧面或车内小床的挂钩上。拖拽绳子会使它们旋转起来，并产生一种轻柔的叮叮当当的摇铃声。另

一种摇铃由三种不同的卡通形象组成，看起来像是友好的怪兽一样，有夸张的眼睛、龙的尾巴和角等，并且是由深蓝绿色、紫色和橙色的柔软羊毛织物制成的。每一个卡通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一个需要挤压、另一个需要摩擦，等等）发声，它们通过维可牢（velcro）[1]的尼龙搭扣固定在一起，中间布满了金色的星星。

【111】

正巧，这里涉及一些特定符号资源的使用规则。无论在育儿书籍、杂志中还是从专家或同仁的建议里，每一位妈妈都接触过“规范性话语（normative discourse）”，它告诉我们妈妈们必须鼓励孩子猛击或踢打摇铃，以教会他们“手眼协调”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摘自《新生儿》（*New Baby*）杂志（May, 2000）的例子：

> [婴儿车摇铃]对于教婴儿学会手眼协调和因果关系非常有用——如果你的婴儿用他的手或脚击中悬挂的玩具，它们就会移动，或许还会发出声响。给你的婴儿示范怎样击打玩具，然后接下来让他们自己去探索。

结果，妈妈们都知道该怎样使用婴儿车的兔子摇铃：将摇铃举起来，并绕着中心旋转，鼓励婴儿击打。下面是从一份录音中简短摘录的部分内容：

> 妈妈：哦，看，把你的脚放在上面。
> 她将玩具摇铃举在婴儿的面前并摇晃它。
> 妈妈：哦！踢，踢，踢……哦，你今天忙了一早上
> 现在婴儿的脚实际上踢中了摇铃。
> 妈妈：看呀……哦……它们多可爱……你喜欢它们……

对于另一种婴儿车摇铃，她们试图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但并不奏效。晃动摇铃非但没有产生声音，反而使它们散架了。于是妈妈们作罢，并开始尝试其他方法，她们对玩具上的这些清晰可见、可触可感的卡通形象，加以创造性地使用（材料的柔软性、每个卡通形象的“个性”、“怪物”肖像学等）。一位妈妈用其中的一个卡通人物轻抚婴儿的脸颊，另一位妈妈则将其中的一个当作娃娃，让它在婴儿的肚子上走路，第三位妈妈进行了一场小小的木偶表演。在这个过程中，妈妈们并不认为她们的婴儿仅仅只是被“机械控制”所占据，就如规范性话语所控制的那样，而是认为他们已经能对故事以及充满想象力的模仿游戏感兴趣了，即便是在三四个月大的时候。以下是一个简短的摘录文本：

> 妈妈将摇铃靠近婴儿的耳朵，晃动其中的一个卡通人物并听它的声音。其中的一个维可牢尼龙纽扣松动了。
> 妈妈：哦，它们掉下来了。
> 她摇晃那个已经掉下来的卡通人物，发现捏它会使它吱吱作响。
> 妈妈：哦……（发出外星人的声音）……吼吼吼……它就像一条龙。

规范性话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一些会提供高度规定性的、权威的规则来表明应该用哪种能指来表示所指。这里有一个纽卡索大学（澳大利亚，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例子——

1 一种尼龙搭扣的商标名称。——译者注

一份权威的关于特定颜色代表特定学科（如建筑学、医学等）的色码表。实际上，这些颜色的选择是“任意的”，因此，很难说为什么商学而非教育学是绿松石色，或者为什么工程学而非建筑学是天青石色。

【112】 本校毕业生的学位服应该是：

建筑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工程学博士、文学博士、医学博士、音乐学博士、护理学博士、理学博士、这所大学的博士——鲜红色的喜庆长袍，带有深红色的风帽，其边缘的绸缎为适当的颜色，即

建筑学博士——深印度红

商学博士——绿松石色

教育学博士——翡翠色

工程学博士——天青石色

……

先前例子中的规范性话语是一种“专家话语”。当今的媒体信息中到处都充斥着符号专家，他们会告诉你流行的颜色或风格的风向标：

引人注目的、充满热情的紫色是当季最热的流行色彩。要想立即让衣服感觉更像“2007年秋款”，加一点紫红色就好。

专家话语当然不像权威规范性话语那般具有规定性。时尚或许是一种“指示”，但是，建筑学博士所着长袍的风帽的边缘必须是深印度红，至少毕业期间是如此，而我们呢，即使我们感觉到热情洋溢，也没人要求我们一定要穿紫色。时尚的能指，以及其他专家话语的能指，同样是“鼓动性的”而非任意性的——紫色是适合热情的能指，就像提到“一点紫红色”就已经传递出了这种感觉。

“角色榜样（role model）”（电影明星、流行歌手、运动员或其他名人）也能体现规范性话语。与他们扮演的角色、唱的歌或在媒体中塑造的形象有关的意义、价值和身份，随后都会变成所指，而他们的样貌、交谈、着装以及一举一动都成为了能指。劳伦·巴考尔（Lauren Bacall）[1] 在她的自传中，回忆导演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是怎样将她在《江湖侠侣》（*To Have and Have Not*, 1944）中扮演的角色，构思成具有“男性的行为方式——无礼的，毫不示弱，以牙还牙，没有屈服，没有无助”（Bacall, 1979: 87）。为此，霍克斯不仅为她设计了“样貌”——头轻微低垂，却古怪地看向上方，暗示女性的顺从又无礼——但同时也叫她在声音上下功夫，“保持低音”。到了适当的时候，低音就会变成巴考尔的标志以及表达一种特定的女性身份的新符号资源。

今天，符号软件（semiotic software）同样可以吸纳规范性话语。例如，通过使用默认选择。比如，每一次你插入一张新的幻灯片，都会被要求起标题。而规范就是每张页面是一个单一主题的独立文本单元（这方面 PPT 页面与网页非常不一样）。你当然可以不顾这个规则，但大多数人不会，通过这种方式，像 PPT 一样的技术能够创造出实践的一致性而无需规则。

规范性话语生产于强大的机构。国家研究院、教育系统以及出版社，长久以来生产着管【113】理我们的语言使用的规范性话语。今天，全球的符号产业如时尚产业、媒体、广告和软件生产商，将会生产许多针对关键的符号资源的规范性话语。它们不再使用权威的指示，但尽管如此，

1 美国电影明星，代表作是 1944 年的《江湖侠侣》，她的嗓音深沉、沙哑，被视为性感。——译者注

它们在传播共识和实践上仍然卓有成效，这些共识和实践，每一个接触到当下媒体的人都会遇到。

6.3 话　语

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中我们将会讨论多模态文本和传播事件的三个分析层次——“话语”、“设计”、“生产”。所有这些都为文本和传播事件的生产及解释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资源，并且在每一个案例中，规范性话语都力图支配人们应该怎样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它们。虽然，为了更清楚地进行说明，我们将会分别讨论这三个分析层次，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无缝的整体。

我们将“话语(discourses)”(注意是复数)定义为“关于某些方面的现实在社会中建构的知识”。因此，话语是构建和解释文本和传播事件的**内容**的资源。它们本身没有物质的存在：它们是知识、脑力资源，尽管我们当然会通过文本和传播事件了解它们。但是，虽然它们是脑力的现象，但它们同样也是“在社会中建构的”——在特定社会机构的语境中发展，不论规模是大(如跨国公司)还是小(如一个具体的家庭)，并且采取符合这些语境主导利益的方式。梵·迪克将它们称之为“社会认知”（van Dijk, 2009: 78）。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例如，在“童年纯真话语”中，儿童是无性的，不知道任何关于性（sexuality）的事，并且必须要远离性知识、性接触。今天这种想法还存在于大多数人们的部分认知之中，但是，不管他们是否赞同，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已经指出，并非所有年代所有地域都是这样，在欧洲，这种看法大致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慢慢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教领域，这些人逐渐以矛盾的心理看待儿童，一方面儿童“犹如天使，亲近于爱他们的基督”，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是缺乏“理性”，是“需要保护和改变的上帝的脆弱生物”，直至成为“会思考的人和好的基督徒”（Ariès, 1973:129）。

这种话语在澳大利亚最近的种种事件中发挥着作用，摄影家比尔·亨森的摄影展中包含一些青少年的裸体镜头，当正要公开展览时警察将此作为色情照片没收，而这一控告后来不得不被撤销。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凯文·拉德在他的一次例行的电视露面时，就此事情接受了提问，他说，他觉得这些照片“绝对是反叛的”：

> 小孩子值得人们保护他们童年的纯真，我对此深信不疑。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孩子做孩子吧。

【114】

随后，有许多其他政客、公安局长和其他政府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对于童年当然有不同的话语，**的确**有将儿童视为具有性欲的这类话语。一百多年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道（Freud, 1973: 243）：

> 首先，否认儿童有性生活，认为性仅开始于生殖器成熟的青春期，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看法……

他的这种理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争议，并且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就像弗洛伊德所说（Freud, 1973: 243）：

对于那些探索了恋母情结的精神分析研究，这个世界并没有给予多少感谢。恰恰相反，这一发现在成年人中激起了最暴力的反对。

让我们注意这些话语的一些关键特征：

①话语可以被浓缩为“教条”——核心智慧的珍品，例如“儿童是单纯的”，“儿童已经具有性欲”。这样的陈述将在许多不同场合以及不同构想中反复出现，并经由原因、例子和逸事等加以阐述和强化，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会紧扣“纯真”（或“已经有性欲的”）教条的基本内核。

②话语是复数。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童年有不同的话语，关于“儿童”的本质天性也有不同的观点，它们通常是分歧和差异核心，就像弗洛伊德的时代以及澳大利亚比尔·亨森的例子中所表现的那样。

③话语使特定实践正当化，并服务于特定机构的利益。如“单纯的儿童”话语被用于审查管理之中，以避免儿童接触到性（但并非避免接触到人们经常提起的暴力）。比尔·亨森仅仅是这种例子中的一个。但是同样也会存在更广泛的问题。保护单纯经常用来服务于“保护者”持续的权力。在许多社会中，压抑女性，作为一种对“性清白”或贞洁的保护，是合法的。

④话语建构于社会之中，并受到具体的历史影响。在《童年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中，菲利普·阿利埃斯证明了，在16世纪，“在儿童面前一切都是允许的：粗鲁的语言，猥亵的动作和难堪的情形：他们听到了一切也看到了一切”（Ariès, 1973: 101），这种看法，仅仅只是在“纯真儿童的话语”开始占据优势之后，才逐渐消失。

⑤话语在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模式或不同的模式组合中都可以实现。例如，性征化儿童的话语，可以体现在语言学中，以一篇学术散文（就如上面弗洛伊德引言中的那样）的形式，或者也可以是多模态的方式，甚至是在一本儿童读物中也有，就像在《熊的故事》（*The Bear*）（Briggs, 1994）一书中，一只熊从窗户进入了蒂莉的房间，她邀请熊坐到她的床上，并感叹道：“哦，小熊！你太温暖了！妈妈发现我们一起在床上不会惊讶吧？”第二天她的爸爸嫉妒地问：“那我呢？”蒂莉回答：“你没有**毛皮**，爸爸。但你非常好，我的确还是喜欢你**多一点点**”。

6.4 设　计

按照我们这里使用这个术语的方式，设计，或多或少是用于文本和传播事件的常规化的格式或模板。它们位于内容（话语）和表达（生产）之间，后者就是多模态话语的实际素材的实现，而我们会在下一部分讨论这一问题。设计具有两个关键特征：

【115】

◎设计，通过将话语嵌入具有特定传播目的结构之中，使话语置于语境之中，并且预示着参与者之间的特定关系（平等或不平等关系，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等等）。因此，“纯真儿童的话语”可以被置于一篇报纸文章、一次对总理的电视访谈、一部电影、一本建议父母开展儿童性教育的小册子，或许多其他语境之中。

◎设计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物质形式之中。例如，广告有特定的传播目的，并对参与者（销售员 / 潜在顾客；游说者 / 被说服者）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了编码，但广告仍然可以由不同的形式实现，如广播商业广告、电视商业广告、杂志广告、海报等。

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设计的关键特征。在我们的《阅读图像》（*Reading Images*）（Kress and van Leeuwen, 1996）一书中，我们认为，视觉作品，根据作品元素所处的位置——或左或右，或高或低，在中间或边缘等，为它们赋予了不同的信息价值。

我们认为，这种左—右维度在“已知的”和“新的”之间创造了一个动态的对比。如果两个元素——一个放置在右边，一个放置在左边——两极化地处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制造差异或对比），那么左边的元素将会是已知的，我们自然而然把它当成是那些假定读者或电视观众已经熟知的信息的出发点，而右边的元素将会是新的，提供那些读者一定会特意关注的新信息。这是一个根据文化所作的具体安排——在由右向左书写的文化中，已知信息出现在右侧而新信息出现在左侧。

而在垂直的两极布局中——一个元素被放置在图片、纸张或屏幕的上部分，另一个被放置在靠下的部分——上面的元素是“理想的”，是理想化或普遍化的信息精华，而下部的元素是“现实的”，呈现事实细节、书面证明或实践的结果，与理想情况相对比。在单页杂志广告中，理想经常描绘的是产品的“承诺”、它能带给消费者的魅力、成功或感官的满足，而现实则展示的是产品自身并提供产品的事实信息。

中心是另一个重要的作品区域，不同于将作品元素两极化，中心将它们统一起来，展现以它为中心的元素——边缘——具有共同的意义或目的。一张施乐公司为员工出版的小册子的封面标题为“奖励和认同”，封面中心呈现的一位是快乐的施乐员工的轮廓，他欢乐地跳起来，围绕他的文字暗示了施乐公司嘉奖推崇的员工精神（“团队为核心”、“灵活”、“自愿”、“授权集中（empowerment focus）”、“高效”，等等）。

这些作品维度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四象限的作品设计，如图 6.1 所示。【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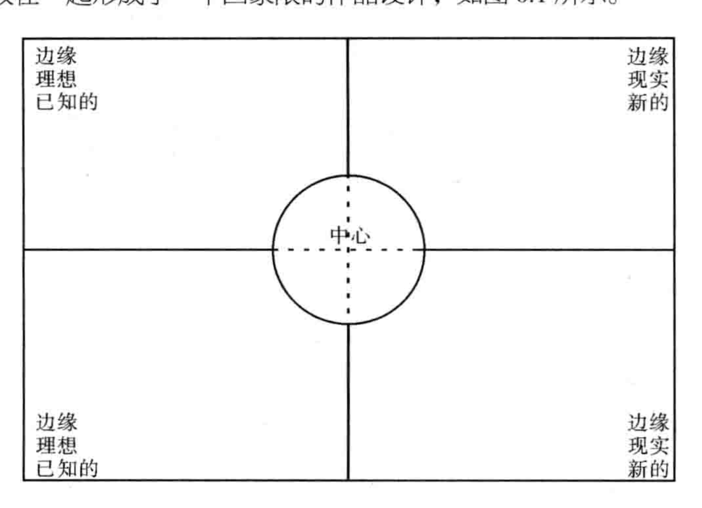


图 6.1 西方视觉符号中的视觉空间

这里讨论的作品模板的元素可以用不同方式连接在一起。或者换句话说，存在一个模式（网格），人们可以通过它来做许多事情。一张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海报包含三

个水平方向的区域。左边区域留出来呈现机构名称，作为已知信息；右边留白，一块留给观众未来采取行动的区域；较大的中心部分，就像一幅现代的三联画那样，是连接两边的“调节者”（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6: 198–9），它包括一篇不规则排版的关于政治迫害的文章，而受害者的脸在文章后面模糊地若隐若现。这个三联画便形成了“理想”，也就是特赦组织信息的精华，并占据海报三分之二的空间，而现实展现的则是特赦组织官方的追求目标、实现途径，还有它的联系地址。

因此，作品的传播目的是以特定的方式将作品的元素彼此联系起来，也使这些元素与观众联系起来，如，把观众定位为那些已经拥有特定信息（“已知的”）但还没有意识到其他信息（“新的”）的人。例如，特赦组织的海报把自己的受众定位为那些已经听说过该特赦组织的人。或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是，即便是没有听说过特赦组织的读者也会意识到，在这个既定的语境中，他们应该是已经听说过这个组织的。

就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设计仍然与素材的实现或“生产”（在后文中我们称其为“生产”）相分离。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设计模式，能够应用于图片以及综合了文本、图像、图表设计的多模态文本，就像特赦组织海报的这个例子。的确，正如我们试图在其他书（van Leeuwen, 2005; 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6）中详细展示的，它能应用于任何空间配置，无论是两个还是三个【117】维度——例如图像、文本、博物馆展览、舞台设计、建筑外观等。

最后，和话语一样，要理解设计也离不开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我们将用另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选自《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November 2004）：

如何弥补约会时的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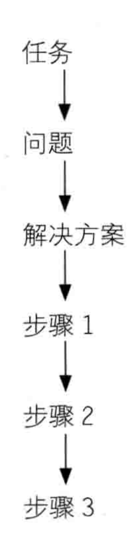
你冲撞他的行为有没有弄巧成拙呢？通过以下三个步骤来缓和事情吧：

◎尽快道歉。承认你的失态，可以说“我太紧张了/一时间犯傻了，结果做了一些反常的事”。你的坦白表明你承认自己粗鲁的行为，另外，你甚至也许能获得一点同情。

◎**展现真实的你以**对他作出弥补。例如，如果你在前一晚因为一长串个人问题而对他大吼大叫，那么在接下来的几次约会中，好好鼓励他。一旦他看到，你不是一个惯性的抱怨者或唠叨狂，他就会意识到你的失态只是一次偶然的行为。

◎冷静处理。等一个星期，再决定你的立场：如果你们回到正轨，或者你们两个可以就你愚蠢的错误开玩笑，那么就很好。但是如果他外出的时候看起来很可疑，或者在你们之后的几次交谈都不肯放过你的错误，那么或许你只能认输，寻找下一段恋情了。

这种文本具有一种教学指示的结构。首先它表明读者要学习的任务（“如何弥补约会时的过失”）。接下来将读者定位为，犯了一个错（她太自以为是了），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一种“缓和”错误的策略，方法是分三步来达到这个目标（“道歉”、“弥补”和“冷静处理”）。因此，这种文本的设计可以模式化为：



这些元素在印刷时有标记。“任务”是一个黑色稍大的字体；“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字体第二大，白色并且缩进；三个“步骤”的字体最小，带有白色的项目标号，以及黑色的“简介”（如“尽快道歉”）和白色的文本。不同的元素同样是用空格隔开的，整个内容位于淡紫色背景的方框里。

很明显，许多不同的话语都可以置于这种设计之中——在像《大都会》这样的杂志里，建构某一方面现实的话语尤为如此，如美丽、健康、关系和工作。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设计可以在一系列素材形式中实现——口头或书面，视觉或言语，或这些元素的某些多模态组合。在许多广告中，“问题”和“解决方案”是可视的。“偏头痛”的问题可以以一个男人或女人表情痛苦的照片实现可视化，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打广告的药物产品的图片，视觉化地呈现出来。【118】

我们援引的这些例子同样说明，设计存在不同的层次水平——有对文本元素的设计，也有对作为整体的文本的设计。例如，从句结构是语言文本元素的设计（于是可以在口头或书面形式中实现），而文本种类的类型结构（书信、报告、童话等）则是对语言文本的设计。

但还有其他的内容。类似“如何弥补约会时的过失”这样的文本设计，作为针对人际关系问题从文化的角度具体给出“辅导”意见的一种方法，它自身具备并传达了某种意义。它揭示出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些事情。一方面，它为女性在处理关系时提供了独立的建议来源，因此她们不用依赖家庭、宗教和传统。在许多国家中（《大都会》在全球都有发行，并被翻译成了 48 种语言），传统服务于维护父权系统，因而一个新的独立的意见来源，对女性起到了解放的作用。（尽管这个例子中，女性被建议要为自己的自以为是而道歉！）另一方面，作为咨询的一种形式，它对女性的定位是，只能凭一己之力，失去了支持网络，并且只有一个选择——咨询媒体和网络专家寻求解决策略。正如梅钦和梵·利尤温已经证明（Machin and van Leeuwen, 2007），这种设计是全球性的，因此更加重要，尽管《大都会》给出的实际建议（话语）可以因地域而不同。

6.5 生　产

我们可以看到话语和设计是相对独立的。换句话说，文本可以采用不同的话语，但使用相同的设计（例如报社编辑在一个特殊议题上采取不同的方针），或采用相同的话语但却是不同的设计，就像同一种童年话语出现在学术论文或儿童读物中。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第三个变量是“生产”：同样的设计可以通过不同的物质符号资源，或通过物质资源的组合而实现；“同样的”文本（话语和设计的角度都相同）既可以通过口语表达，也可以书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或喷在墙上；“同样的”图片（也是话语和设计的角度都相同）既可以用炭笔来勾画，用油彩来着色，也可以置于照相机前，然后拍成黑白或彩色照片，等等。

【119】就在前不久，人们还经常认为，生产不能增加更深的意义，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许多享有盛名的交流和表达形式中支配着物质符号资源的使用。印刷工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只有一种印刷字体可以使用，正如过去的打字员所体验的，那么印刷的表达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只是意味着“这是打印出来的”，不管它与外界有何关联。许多专业的印刷工人仍旧认为，印刷或许最多“在很有限的程度上（……）有助于表达与词语一致的感觉或情绪”（Mclean, 2000:56），而“多半情况是，‘印字和书法是抽象的艺术’”（Mclean, 2000:54）。而最近，文字处理软件的到来，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大量的打印资源，即便并非所有人都能马上知道该如何使用，于是印刷工人开始争论，说印刷排版是“高度发达的表达媒介”，具有“使交流变为可能的一套复杂的语法”（Neuenschwander, 1993:13,31）。现在，各地印刷工人正在探索和扩展这种新的符号资源（例如，Triggs, 2003; 2005）。

声音（voice）是另一个例子。曾经，对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公众演讲所具备的特质，存在着统一和制度化的标准，并且对于表演中出色的演说和经典歌唱中的**美声唱法**，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美学追求。这当然不会带来完全的一致性。相反，它考虑到了个性和差异的细微形式，这有点类似于西装，尽管灰色西装看起来几乎都一样，但它们的裁剪也可以体现出缝纫上的雅致和技巧的精细程度。接下来便出现了放大，允许演员和歌手培养他们自己的、可迅速辨识的声音。在不到一个世纪的过程中，诸如劳伦·巴考尔、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2]、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3]等其他人的声音，建立了一种新的符号资源、一种新的声音语言，简单举几个例子，雷·查尔斯（Ray Charles）[4]、鲍勃·迪兰（Bob Dylan）[5]、尼娜·西蒙娜（Nina Simone）[6]和阿斯特拉德·吉尔伯托（Astrud Gilberto）[7]唱歌时的声音就是如此。

1　美国电影明星，气喘吁吁的嗓音成为她的一大标志。——译者注

2　又译为吉米·史都华，美国电影明星，1941年凭借《费城故事》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此后在荧幕上多留下正直的形象，被誉为“明星楷模”、“美国的良心”。——译者注

3　美国电影明星，《欲望街车》、《码头风云》、《教父》等是他的经典作品，嗓音低沉浑浊。——译者注

4　美国黑人歌手，幼年双目失明，以盲文识读乐谱开始音乐创作，他涉猎的音乐类型非常广泛，包括灵魂乐、爵士乐、摇滚乐和蓝调等。同时，他也是一位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译者注

5　美国摇滚歌手、民歌手，200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创作的歌曲被视为映射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特征的一面镜子。——译者注

6　又译为妮娜·西蒙，美国歌手、作曲家及钢琴表演家，她创作的歌曲类型包括蓝调、节奏蓝调和灵魂乐。——译者注

7　巴西歌手，以巴萨诺瓦曲风闻名，20世纪60年代搬到美国，开始以职业歌手身份表演。她的嗓音被认为是具有若有若无的隐约美感。——译者注

这些新符号资源是怎样发展的呢？让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说明，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中马龙·白兰度的声音。他的声音①相当高，②嘶哑，③用僵硬的下巴和几乎闭上的嘴发音，④轻柔得近乎耳语。白兰度使用这些声音特点的可供性来表达教父的人物特征。男性中高音代表着权力和支配。在歌剧中男高音是主角，摇滚歌手唱歌时通常比正常讲话时的声音至少高一个八度（前面劳伦·巴考尔的例子表明女性正好相反）。因此白兰度通过参考人们的日常经验，参考关于男女声音的音高范围的众所周知的日常现象，表达了教父性格中盛气凌人的一面。另外，他的声音嘶哑、粗野，这种表面意义上的、身体的粗野可以变成一种隐喻，表达一种更加比喻性的粗野——教父性格中的粗鲁、严肃和不轻易宽恕他人的一面。白兰度同样没有太张开他的嘴，并且从口腔靠后处发前元音。换句话说，他抑制自己，这种表面上的抑制也变成一种比喻性的抑制的隐喻，使得我们很难辨别他真正在思考什么以及他可能会做什么。【120】最后，在密谋的时候或者在亲密状态下，人们会使用耳语，这是一种一般经验，因此白兰度的耳语为他的记仇和封闭的性格增添了几分令人不安的感官魅力。

简而言之，为一种新的符号资源建立意义潜势，可以通过诉诸日常经验以及经验性的隐喻而实现，在后者中，能指的具体物理特征变为了更抽象的意义、价值观和身份的象征，是受拉克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理论（metaphor theory）所启发，他们认为隐喻要基于具体经验来进行理解："脱离了经验基础，我们就不能理解或者甚至是充分表现任何隐喻"（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9）。

但也有另一种意义资源——含蓄意指（connotation）。在这里我们将它定义为"含蓄意指"（在早期的著作中我们也使用"来源"（provenance）这一术语），在含蓄意指中，能指从建立它的特定领域，可以说是，进入另一个领域，并且直到进入那个领域才被使用。在新的领域中，处于新领域的人们会把一些意义、价值观和身份，与能指所来自的领域关联起来，于是这个能指便代表了这些意义、价值观和身份。在这里，方言是个很好的例子。在符号一致的时代中，它们或多或少标志着持久的、稳定的身份，如出身、阶级，并且常常给说这种方言的人打上了烙印。对上层－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来说，乡村方言是落后的，工人阶级的语言是下等的，而外国口音要么是可疑的，要么是搞笑的。方言和口音携带着一种内涵，巴特将其称之为"神话"（Barthes, 1973），并指如"意大利性（Italian-ness）"这样的术语，这个术语包含了在流行文化中所认为的与意大利有关的、典型的刻板印象和价值观。在好莱坞电影中，方言很快变成重要的能指，一份19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编剧手册这样写道（Herman, 1952:198）：

> 方言，和化妆品一样有启示性，和戏服一样生动别致，和姿势一样有典型性，和身体残疾一样可识别，并且和面部表情一样充满戏剧性效果。

因此方言失去了与特定地点或特定社会群体相联系的纽带，并变成了一种基于文化含蓄意指的新的表达媒介。例如，说"普通澳大利亚语"不再是表明了你的出生背景的一种命运，而是变为了一种身份选择—— 一种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将"澳大利亚人（Aussie）"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自己联系起来的选择。在后现代时期，这种文化含蓄意指的原则，还延伸到了对关键性的演员、歌手的标志性声音的理解中来，现在，人们对这些演员、歌手的声音的理解，逐渐不再是基于他们的声音特色，而是从整体的角度，根据演员角色和歌手所演唱的歌曲来进行理解。

几乎同样的推理脉络也可以用于排版印刷的这个例子。例如，在特赦组织的海报中，我们可以基于“它从何而来”的文化含蓄意指来理解打印字体——也许出自一台老旧的、已经磨损的打字机，由那些没有途径接触电脑的人、或许是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所使用——于是这赋予了文本一种真实文件的特性。但经验性隐喻也在这里起到了作用——字体的间隔及其相对于基线的位置，呈现出一种刻意的不规则性。排版工人经常使用不规则的排版来表达不愿意制作出整洁、规律的形式，这在语境中也意味着“非常规”、“玩笑”、“叛逆”、“缺乏训练”等。像这样的隐喻是基于这么几个问题：字体事实上是什么（不规律）、什么原因使得它们可能被生产出来，对此我们知道多少（如，欲表达非常规、叛逆或玩笑）或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如通过漏墨的钢笔或破旧的打字机）。

【121】

现在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符号资源。“模式”是被规范性话语规定的符号资源，无论外显与否。它们为与特定表达模式并不密切相关的符号产品提供模板。这种模板可以是留下大量解释和创造空间的架构（如爵士音乐家即兴创作的和弦）或解释空间较少的脚本（如乐谱或电影剧本）。但是，两种类型都依然会为那种生产中的意义留下余地，如爵士音乐家使用的乐器音色或演奏“同样”一曲古典乐，对于不同乐器所作的不同安排，也可以是不同的指挥家所作的不同诠释。

“媒介（media，复数）”是不那么系统性组成的符号资源，并依赖文化含蓄意指和经验性隐喻来生成意义。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在技术意义上（电视、网络）使用“媒介（medium，单数）”这一术语，也可以在更广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当艺术家说他们的媒介是“画布上的油画颜料”或“画板上的丙烯酸”时，艺术家对“媒介”一词的使用也可以被包含进来。至少目前，“媒介”较少受到规范性话语的支配，尽管，什么是设计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什么可以留给生产环节，这些问题还是几乎总要受到规范性话语的控制。

虽然“媒介”可以用来表达话语，但它们似乎特别适用于身份的表达，要想隔断这两者并不容易。格温·斯蒂芬尼（Gwen Stefani）[1] 的歌曲《泡沫电流》（*Bubble Pop Electric*）掀起了一股 20 世纪 50 年代[2] 青年人约会的流行风潮（“汽车电影，开车带我走”）。“乐福鞋和狮子狗裙”的年代时尚，在后座“爱抚”的那种迫不及待，这些场景的塑造，不仅体现在歌词里，同时也表现在斯蒂芬尼的音色之中，她时而歌唱，时而用低沉的气声诱惑她的男友（“今夜我正在沉沦，你会抱住我吗”），还表现在青年人的流行文化里，正如她用更高、更紧的、感觉像人工通“电”了一般的声音重复着“泡沫电流”。但是纯真和诱惑的结合，同样也为歌曲中的角色塑造了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身份。

在我们的书《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0）中，除了“话语”、“设计”和“生产”，我们还区分出了第四个层次。我们称之为“分布（distribution）”，其定义是，出于分布或保存目的而对符号产品进行的技术性“再编码”。但是，尽管存在这样的领域，技术可以实现如上内容——记录和 / 或播放已经完整的符号产品，而无须添加任何新的内容——但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要把“分布”从设计或生产中分离出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留声机被发明出来时，是作为一种复制的媒介，但是后来被 DJ 们用作为“生产”的一种

【122】

1 美国歌手、时装设计师，作为摇滚乐队 No Doubt 的女主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歌坛，2004 年后开始发行个人专辑。——译者注

2 原文如此。格温·斯蒂芬尼成名于 20 世纪 80 年代。——译者注

媒介，一种乐器，一种新符号资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也可以表明，最初仅仅只是用于分布和再生产的物质的可供性，已经被作为一种符号资源而进行开发和发展。

至于符号软件，关于符号模式使用的规范性话语，如布局、排版和颜色，被制作成软件。例如，幻灯片可以精确提供我们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那种布局设计类型。虽然幻灯片可以完美地制作出中心－边缘设计，但少数作为2003版和2007版的默认选择的基本设计，相比中心－边缘结构，更倾向于“极化”的结构。因此，幻灯片建立了一种对于极化结构的规范性偏好，这无疑会导致人们更频繁地使用这种结构，人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制作好幻灯片。这种对于“内置的”规范性话语的研究，应变为针对符号资源及其意义潜势、实际使用的研究的重要内容。

要点概括

◎可供性（affordance）

可供性（Gibson, 1979）是给定物体的使用潜质，源自可感知的物体特质。因为感知是可选择的，取决于感知者的需求和兴趣，不同的感知者会注意到不同的可供性。但是那些没有被注意到的依然客观存在，潜藏在物体中有待被发现。

◎任意性（arbitrary）

“任意性”这个词标志着不能根据某种特定的动机来进行理解，因此指派给所指的能指似乎并不是不出于什么具体的理由。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当符号资源从一个领域输入另一个它不通常被使用的领域时，含蓄意指就会产生。于是它代表着某些观点和价值观，由输入领域的人将其与原领域联系起来。含蓄意指性符号通常表示的是观念、价值观和身份，而非具体的人、地点和事情，因此是符号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也是在“生产”层面上意义生成方式的典型代表。

◎设计（design）

设计是将话语植入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格式或模板，为话语增加一种传播目的以及一系列交流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任何给定的设计都能通过不同的符号资源或符号资源的组合而实现。

◎话语（discourse）

话语是关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在社会中建构的知识，当现实的那个方面将在文本或传播事件中呈现时，就可以利用这种知识。表现现实的同一个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话语，它们涵盖和排除不同的事情，也服务着不同的利益。

◎分布（distribution）

分布是指，为了分布或保存，符号文本和传播事件可以进行技术性再编码的方式。但是，这些分布和保存的方法也经常变成了意义生产的方式。

◎经验性隐喻（experiential metaphor）

【123】

隐喻，是根据与之有（部分）类似关系的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拉克夫和约翰逊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建立在隐喻之上。经验性隐喻使得我们能够基于具体经验来理解复杂和抽象的观点。在社会符号学中，经验性隐喻是能激发符号的方式之一，也是在“生产”层面生成意义的典型方式。

◎**利益**（interest）

术语“利益”表明了符号生产者或符号生产机构选择特定能指来表达特定所指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即刻的传播情境及其具体的紧急事件、生产符号时的传播类型以及更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因此，利益既具有即刻且具体的、也具有更广的文化和社会的维度。

◎**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

意义潜势是依靠并通过给定的符号资源所可以表达的意义总体，是基于过去记载的或集体记住的资源的用途而确定的。

◎**媒介**（medium）

媒介是一种被纳入社会传播和表达中的、特定的物质或物理现象。

◎**模式**（mode）

模式是一种用于创造设计的符号资源，如语言或视觉作品。它通常不与特定的素材的使用有关。模式需要根据其与所在的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中的关系来进行界定。例如，视觉作品的模式，可以被界定为包括过去六百年西方视觉艺术中已经发展出的所有的作品架构，也可以作更狭义的界定，或许如幻灯片的作品架构。

◎**有理据的**（motivated）

“有理据的”这一术语[1]，用于那些由符号生产者或符号生产机构所选择出的能指，它们可以作为表示特定所指的恰当的能指，例如，因为这个能指在某些方面与所指类似，或因为以某些其他方式与能指[2]相关，因而比较合适。含蓄意指和经验性隐喻常常都是有理据的。

◎**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对多模态文本和传播事件的分析。这一分析所涉及的分析层面共有四个层次——话语、设计、产品和分布，本章中详述了其中的三个。

◎**多模态**（multimodality）

多模态是文本和传播事件使用一系列表达方式的现象。讲话一般离不开面部表情、手势、姿势以及通过着装和修饰的自我展示，而书写与布局、排版、视觉图解等相关。

◎**规范性话语**（normative discourse）

规范性话语是关于应该怎样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使用符号资源的、在社会中建构的知识。它们在不同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呈现：规定性的权威规则、专家意见、行为榜样，以及在今天同样可以是内置在符号软件中的偏好设置。它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文本传达：简单举例，如规章、杂志文章、培训和教学课程、或非正式谈话。

◎**生产**（production）

生产指的是使用实际物理现象或素材来实现设计的方式。特定素材或物理现象的使用，进一步为那些已经隐含于话语和设计中的内容增添了意义。这些意义可能是表达所述事情的一些特性，包括感情方面，也包括（在特定语境中的）交流者的身份。

◎**意指过程**（semiosis）

用于创造新意义潜势的一个术语。

◎**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

1　索绪尔在谈到句法模式时，提出“有理据的”一说，即以某种理性的、“自然的”方式同其意义彼此关联。索绪尔以“相对理据”来限制符号的任意性，即相对规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方式，与下文解释相符。——译者注

2　原文如此。译者疑为笔误，似应为“所指”。——译者注

符号资源是我们用于交流的行为、素材和手工制品。它们具有一种基于过去的记录或集体记忆的使用的意义潜势，还具备基于其可能的用途的一系列可供性。在具体社会语境中，它们的使用受规范性话语的支配，虽然这些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允许有不同程度的自由。

◎所指（signified）

能指所表达的特定意义。

【124】

◎能指（signifier）

一种特定的、可感知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用于表达特定所指的物体或事件。

◎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对符号资源以及在多模态文本和传播事件的生产和解释中的符号资源的使用方式的研究。

延伸阅读

本章中描述的研究路径浓缩了大量出版物中的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这一章节参考了多种文献，但深入阅读的第一步是通过以下文献详细地研究作者的著作。且接下来应该继续探索他们在著作所提到的文献的出处。

Hodge, R. and Kress, G. (1988) *Social Semiotics.* Oxford: Polity.

建立在他们先前关于批判语言学的著作之上，这本书将社会符号学的路径引入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并将其置于符号学“奠基人”的语境中展开论述。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这本书首次提出了支持本章节的框架，将多模态传播描述为融合了“话语”、“设计”、“生产”和“分布”，并区分了“模式”和“媒介”。

van Leeuwen,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这本书始于讨论多种重要的符号学概念，然后提出了针对话语、类型、风格和模态等概念的社会符号学研究路径，最后解释了分析多模态文本的四种不同的方法。

Kress, G. (2010) *Multimodality.* London: Routledge.

在这本书中，克雷斯总结性地陈述了他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整合和扩展了其 20 多年的研究，并且重新论述了许多本章中所讨论过的概念。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在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阅读。

Martinec, R. and Salway, A. (2005) 'A system for image-text relations in new (and old)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4(3): 337-371.

O'Halloran, K. (2008) 'Systemic functional-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F-MDA):constructing ideational meaning using language and visual imagery', *Visual Communication* 7(4): 443-474.

Iedema, R. (2003)'Multimodality, resemiotiz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Visual Communication* 2(1): 29-57.

参考文献

Ariès, P. (1973) *Centuries of Childhood*.Harmondsworth: Penguin.

Bacall, L. (1979) *Lauren Bacall by Myself*. London: Jonathan Cape.

Baldry, A. J. and Thibault, P. (2006)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Analysis*. London: Equinox.

Barthes, R. (1967) *Elements of Semiotics*. London: Jonathan Cape.

Barthes, R. (1973) *Mythologies*.London: Fontana.

Barthes, R. (1977) *Image-Music-Text*.London: Fontana.

Barthes, R. (1983) *The System of Fash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irdwhistell, R. (1973) *Kinesics and Contex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riggs,R. (1994) *The Bear*. London: Julia MacRae.

Crystal, D. (1998) 'Towards a typographical linguistics'. *Type* (1): 72-3.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Foucault, M. (1972) 'The order of discourse'. In C. Kramarae and N. Thorne (eds),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Foucault, M. (1979a)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 (1979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Harmondsworth: Penguin.

Freud, S. (1973)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Gibson, J. J. (1979)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Goodwin, C. (2001) 'Practices of seeing visual analysis: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n T. van Leeuwen and C. Jewitt (eds),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London: Sage.

Graddol, D. (1996) 'The semiotic construction of a wine label'. In S. Goodman and D. Graddol (eds), *Redesigning English: New Texts, New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Halliday, M. A. K. (1979)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Herman, L. (1952) *A Practical Manual for Screen Playwriting for Theater and Television Film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Hodge, R. and Kress, G. (1988) *Social Semiotics*. Oxford: Polity.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0) *Multimodal Discourse-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chin, D. and van Leeuwen, T. (2007) *Global Media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Matejka, L. and Titunik, I. R. (eds) (1976) *Semiotics of Art: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cLean, R. (2000) *Manual of Typograph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Mukařovský, J. (1977) *The Word and Verbal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uenschwander, B. (1993) *Letterwork-Creative Letterforms in Graphic Design*. London: Phaidon.

Ochs, E. (1979) 'Transcription as theory'. In E. Ochs and B. B. Schieffelin, (eds),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O'Halloran, K. (2004) *Mathematical Discourse-Language, Symbolism, and Visual Images*. London: Continuum.

Pittenger, R. E., Hockett, C. F., and Danehy, J. J. (1960) *The First Five Minutes*. Ithaca, NY: Martineau.

Scollon, R. and Wong Scollon, S. (2003) *Discourses in Place-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Siber, M. (2005) 'Visual literacy in the public space'. *Visual Communication* 4(1): 5-20.

Thibault, P. (1991) *Social Semiotics as Praxis: Social Meaning Making and Nabokov's 'Ad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Triggs, T. (2003) *Type Design: Rad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Triggs, T. (2005) *The New Typography.* Special issue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4(21).

van Dijk, T. A.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van Leeuwen,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Walker, S. (2000) *Typography and Language in Everyday Life: Prescriptions and Practices*. London: Longman.

【126】

话语与认知 7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 亚瑟·C. 格雷泽　基思·米利斯

话语理解是一项非常丰富的多层次认知活动。考虑一下在阅读一则简单的新闻报道时需要什么吧。词语包含了字母、发音模式、意义，有时还包含情感的细微差别。句子具有句法构成、语义思想以及风格特征。深度理解要求对名词所指、话语焦点、预设和似然推理的建构。读者需要辨别话语中旧的（既有的）和新的信息，并且潜在地认可什么是话语共同体（所谓的共同立场）中的个体所共享的知识。在更为全局性的层面上，读者需要识别话语范畴（如客观报道与社论）、修辞结构和不同人的观点，有时还需要识别作者的态度。一个熟练的成年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以每分钟 150~400 词的速度完成所有这些层次的处理。我们必须掌握的语言和话语的层次繁多，在此情况下，我们能够理解任何我们读到的东西真是令人惊讶。

多年以来，话语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口语会话和印刷文本的多种层次。认知传统下的话语研究者通常包括了五个层次（Graesser, Millis, and Zwaan, 1997; van Dijk, 2008; van Dijk and Kintsch, 1983）：

①**表层代码**（surface code）　逐字表达的词语和句子排列。

②**文本基础**（textbase）　当那些几乎不具有语义重要性的表层细节被去除后，留下的形式精简的显性文本所具有的语义表征。核心思想单位常被称为命题。

③**情境模式**（situational model）　话语相关事物的指涉内容。它包含明确的和推断的人、客体、国家、事件、行动、过程、目标，以及其他类型的内容，后文将会予以说明。

④**类型和修辞结构**（genre and rhetorical structure）　话语类型及其结构构成。例如，在粗略的层面上，话语的类型有描述、叙事、阐述和劝说。在更为细致的层面上，叙事内部【127】的差异可以区分出民间故事、爱情小说、历史小说和许多其他的子类型。每种类型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组成，比如民间故事里的环境 + 情节 + 寓意，或者论证里的主张 + 证据。

⑤**语用交际**（pragmatic communication）　一个特定社会情境里的一个会话轮次、连贯信息或者较长话语片段中，说话者 / 作者希望传递给听者 / 读者的观点或信息。除了明确的口头表达外，这还包括言说参与者的意愿、态度、情感、手势和联合行动。交流所处的语境包括环境（时间和地点）、参与者（交流角色、社会地位、身份、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认知。

认知研究者花费了4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表征层次，以及它们如何在儿童和成年人的心智中建构起来。他们采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些方法探索话语理解、话语生产过程中及之后的认知机制。典型的科学实验有：①控制给参与者提供的话语、内容和指南；②搜集不同的认知和行为的测量数据（例如，阅读时间、眼球跟踪、有声思维报告、词语命名、评级、回忆、总结、问题回答等）；以及③测量或刺激脑部活动。**话语过程**这一研究领域分析了话语的多重层次，并且考察了心智如何利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或生产话语。

7.1 推 论

为了构建上述五个话语层次中的大多数层次（即使不是上述所有层次），强调这种建构对推论的需要是很重要的。推论是读者生成的想法，并被读者附加在五种话语层次中的某一种上（通常是第二层次至第五层次）。认知研究者进行了实验来确定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哪种推论。为说明起见，来看看以下选自伊恩·兰金（Ian Rankin）《绝妙自缢》（*A Good Hanging*）的开场摘录：

> 这是完美的谋杀。
> 完美，正如洛锡安区和边境的警察所关注的那样。凶手打电话自首，随后惊慌地试图逃跑，却在逃离犯罪现场时被抓住。故事结束了。（1998：1）

在这一文本中的特定节点，读者将有可能作出以下四个推论，而且组成第三层次（情境模式）：

①**上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凶手想向警察自首”是阅读小句“*杀人犯打电话自首*”时的一个推论。

②**上级目标/行动**（superordinate goal /action）：“凶手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是阅读小句“凶手打电话”时的一个推论。

③**原因前情**（causal antecedent）：“凶手改变了主意”是阅读小句“随后他惊慌”时的一个推论。

④**原因后果**（causal consequence）：“凶手尝试逃跑”是阅读小句“随后他惊慌”时的一个推论。

当然，也许会产生其他的推论。例如，你可能推断你正在阅读一部小说（也许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而不是一则新闻报道，尽管这一信息并未给出。这些方面应该属于第四层次（类型）。【128】

认知研究者调查了理解过程中作出的常规性推论类别，以及与之相对的不那么典型的类别。例如，根据格雷泽、辛格和特拉巴索（Graessser, Singer and Trabasso, 1994）的建构主义理论，成年读者通常会产生推论A和C，而不是B和D。推论A和C是对于“为什么－问题”的回答，这是引导话语层次三、四和五的基础性问题。所以当被问到“凶手为什么拨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会是“为了向警方自首”。当被问到“凶手为什么惊慌？”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不想向警方自首”。推论B是对于“怎样－问题”（“凶手怎样拨打电话？”）的答案，而不是一个为什么－问题。因此它仅仅是修饰性而非生成性的，除非读者有特殊目标去监控角色的精确行动。推论D是对一个“接下来发生什么－问题”的回答（“凶

手惊慌后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一个“为什么 – 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不会常规性地生成。

建构主义理论的这些预测并未获得认知研究者的普遍接受。例如，一个具体呈现的认知框架会预测从属行动（D）是被建构的。根据这个具体呈现的认知框架，读者在心理上刺激（也即生成、建构）了故事世界里富有细节的角色行动（Glenberg and Kaschak, 2002）。共鸣和极简派模式（minimalist models）也许预示了这些推论大部分并非是被建构的，除非有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准确引发正确记忆的表层特征和文本基础成分的特征（Lea et al., 2008; O' Brien et al., 1998）。对于在正常理解中生成什么样的推论，话语心理学家仍在持续激烈地争论这一问题并持续在做相关实验。

7.2　多层次话语中的中断和失配

理解并非总是轻松、迅速和令人满意的。当初级读者苦于吃透单个词语时，阅读速度减慢了，并影响了较深层次的理解。即使是最熟练的成人读者也会因为一篇关于晦涩难懂话题的解释性技术文本而犯难，比如一味处方药的成分、一份法律文件，或者对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安装说明。一个成功的读者会被强行去确定缜密、清楚而耗时的策略，以便修正或规避一个存在疑问的阅读部分。

根据多层框架，理解可能会在这五个层次的任一层次上中断（breakdown）（Pickering and Garrod, 2004）。这种崩溃也许归因于读者方面的不足（如知识或处理能力的欠缺）或话语上的缺陷（如不合逻辑的文本，莫名其妙的演讲）。中断的范围从一次吸引理解者注意力的短暂而微小的不合常规，到理解的全面崩溃。一个层次的中断也许会给其他层次带来消极影响。不仅如此，理解者也许试图通过使用来自其他话语层次的信息、世界知识，或外部来源（如其他人或技术）来填补某一层次上的中断。举例而言，想一想以下设想场景，它们说明了不同话语层次上的中断或小差错，以及因此造成的后果。【129】

◎（场景 1）一个移民抵达美国，而且完全不懂英语。在话语层次 1 上的完全失灵也阻碍了更深层次 2—5 的理解。

◎（场景 2）一个孩子在朗诵一本关于恐龙的书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她在所有生僻词语上都磕磕绊绊。她在阅读《豌豆公主》（*The Princess and the Pea*）时就没有困难，因为她已经听了许多遍这个故事。记忆和知识补偿了层次 1 的词语缺陷。

◎（场景 3）两个购房者阅读一个带有嵌入小句的长句和许多逻辑运算符（与，或，非，如果）的法律文件。由于句法复杂、文本基础部分难懂（层次 1 和 2 上的不足），他们对于这一文件明确陈述了什么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但是，这对夫妇签署了合同，因为他们明白文件的目的，并且信任房地产中介。在这种情况下，层次 4 和 5 规避了完全理解层次 1—3 的必要性。

◎（场景 4）一位父亲和儿子阅读拼装一个新桌子的指南。他们对于如何将拉手连接到抽屉上产生了争论，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将哪个螺丝钉钻入这个把手。他们对于理解指南中的词语和文本基础毫无问题（层次 4 和 5）。但是，他们对于情境模式这一层次（层次 3）里的螺丝钉感到困惑。一系列的争论、心理模拟和通过试错解决问题之后，他们成功地

理解了这个拼装指南。

◎（场景 5）一个小说家热爱阅读法国小说，但是却痛苦地回忆起大学里在法国文学课上得了一个 C。多年后，当他阅读一本关于法国历史的书时，他刹那间意识到缺少了什么。对于那些法国小说的背景和情节，他曾有着卓越的记忆力和鉴别力，但是从未理解它们的深刻意义，因为他忽略了作者的意图和态度。法国历史的知识对于重构作者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案例中，话语层次 1—4 是完整有效的，但是小说家在大学里修这门课时没有达到层次 5。

7.3 限制和处理流

上述场景描述了在一个或多个话语层次里的缺失如何对我们的理解及其附属的认知过程（诸如注意、意识、记忆、问题解决和社会互动等）产生深远的后果。现有的认知研究证实了一些关于处理顺序、互动、合作、补偿机制和不同层次话语理解的限制的普遍原则。这里列举了一些这样的普遍原则：

◎存在着软性的、统计学上的限制，而不是硬性的、脆弱的规则。不同层次上累积的信息被建入于理解中，并且是概率性地、而非根据一成不变的原则影响其他层次。与金奇（Kintsch, 1998）所发展出来的建构 - 整合模式相一致，该模式包含一个不同程度地激活编码、记忆和规则的建构阶段，随后是一个整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通过相互的制约性满足，依据概率最终汇合成一种再现描述。

◎意义自下而上依赖。理解深度方面的顺序被假定为 1→2→3→4→5。也就是说，较低层次对较高层次的限制要甚于较高层次对较低层次的限制。但是，这一顺序只是一种趋向，而非严格如此，因为理解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机制的一种综合。例如，类型和修辞结构也许有助于引导文本基础和情境模式的建构。尽管如此，也需要对层次 1—3 的局部分析来充分建构这一修辞结构。

◎理解在某一层次的中断会放大较深层次的问题。某一层次（L）的中断会保持前一层次完好无损，却会威胁到层次 L 和更高层次的建立。正如场景 1 所描述的，如果读者无法在层次 2 建构一个文本基础，那么即使层次 1 是完整的，在建构一个恰当的情境模式、类型和语用交际时仍然会存在问题。场景 5 中的人在大学里完成了层次 3，但在层次 4 时遇到了问题，并且未能达到层次 5。理解者正常情况下会达到由话语、他们的知识和处理能力所支持的较深层次的理解，但是也许会在处理流的任一层次上受到阻碍。【130】

◎新奇信息比熟悉且自动实现的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处理努力。信息的新奇性是吸引注意力和努力的一个基础性认知维度，在记忆中颇为突出。可以认为，生僻的词语、文本基础层次和情境模式都倾向于具有较高密度的新奇信息。相反，层次 1、4 和 5 大多数所具有的组成成分则倾向于是那些经常被体验因而被很好地学习并自动实现的部分。

阅读时间研究证明，生僻词语所需要的处理时间多于高频度词语（Just and Carpenter, 1987），文本基础部分和情境模式里表达的新信息的处理时间在更大程度上多于已经提及的旧信息（Haberlandt and Graesser, 1985; Millis, King and Kim,2001）。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类型、修辞结构和作者特征这些层次通常是熟悉的结构，对于理解者是无形的，除非有非常规之处或中断。

◎注意力、意识和努力被引向各层次上的中断和失配（misalignments）。分析的任一层次上的中断都可能吸引认知资源。阅读时间研究显示，额外的处理时间会被分配给悬而未决的代词或含糊不清的所指（Rayner, 1998），在衔接（cohesion）方面有断裂的句子（Gernsbacher, 1990），在情境模式里有连贯（coherence）断裂的句子（Zwaan and Radvansky, 1998），还有与在发展中的情境模式里所建立的想法相矛盾的句子（O'Brien, Rizzella, Albecht, and Halleran, 1998）。注意力向诸如干扰、异常、差异、矛盾和衔接上的鸿沟等认知失调来源转移（Graesser, Lu, Olde, Cooper-Pye and Whitten, 2005）。

◎中断可以由其他话语层次或外部来源的世界知识和信息来加以修复或规避。上述场景描述了一些可以修复或规避失误的补偿机制。对世界的认知弥补了场景 2 中的词汇缺失，而场景 3 里的句法和文本基础缺失则被话语层次 4 和 5 里的信息规避了。场景 4 情境模式里的鸿沟和失配被父子之间的延伸对话和积极的问题解决所纠正了。

本文所讨论的多层次框架至此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说明话语理解中不同层次上建构意义的复杂性的梗概。总而言之，意义有多重层次，彼此非对称性地相互制约。如果文本构成完善，并且一个读者具有先决背景知识和处理能力，那么每一层次的组成部分会被成功地建立。但是，会出现程度不等的间歇性问题，从微小失配、理解困难到理解中断等。这些非常规之处是吸引注意力的磁石，有时会触发修复或规避问题的补偿机制。

7.4 话语认知包含语料库分析和计算机语言学

话语是成员的日常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所以有大量时间去学习和磨炼相关的话语能力。人们认为，一个词语、句法结构、类型或其他话语成分在大量广泛经历后会自动实现并得到迅速的处理。相反，正如在前面章节所讨论的，较为新奇的成分颇为耗时。为了更准确地处理话语认知，认知领域的研究者们意识到他们有必要汇总这一群体经常经历的语言和话语记录。**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领域的研究者实现了这一要求。语料库语言学者们会系统地分析语言和话语多种维度下的大量自然文本或口头话语（被称为**语料库**）。计算话语元素、类别、特征、序列、全局模式或这些语言 / 话语总体结合的频次和分布，据此分析话语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所取得的进展现在是认知科学和话语处理的主流。

【131】

话语认知研究者所分析的语料库往往非常庞大，所以需要计算机来系统地分析印刷文本或转录的口头对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计算机上自动实现语言、话语和文本的翻译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计算机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是一个整合了计算机科学、理论语言学和话语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的混合领域。现在计算机能够以一定程度的准确性从文本里提取

信息，这让一些人认定计算机确实能够理解语言的意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维度上。例如，一种文章自动化打分机被研发出来，它可以像英语作文方面的专家一样可信地给文章打分（Landauer, Laham and Foltz, 2003）。有一种系统，可以基于67种语言学和话语特性将文本分为不同的话语类型（Biber, 1988）。这些系统有一部分与药物、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直接相关。例如，彭尼贝克、布思和弗朗西斯（Pennebaker, Booth and Francis, 2007）开发了一个“语言学研究与单词计数”（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LIWC）系统，它可以自动分析创伤性事件受害人所写的叙述里的词语。有趣的是，这个LIWC系统可以预测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应付创伤，以及这个人看医生的次数。“理解援助的问题”网站（the Question Understanding Aid，QUAID, www.psyc.memphis.edu/quaid.html）识别了存在问题的问卷题项，包括难词、复杂的句法或可能给工作记忆带来的超量负荷（Graesser, Cai, Louwerse and Daniels, 2006）。研究显示，被QUAID识别为存在问题的题项影响了眼球运动的轨迹，而且降低了人工答题的信度。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家和话语研究者开发了能自动分析话语的所有这些计算机系统。

一个名叫“Coh–Metrix”（Graesser, McNamara, Louwerse and Cai, 2004, http://cohmetrix.memphis.edu）的计算机工具分析了层次1~4的语言和话语。公共网站上存在超过60种话语测量工具，而内部研究版本在各种阶段的检验上有将近1 000种测量工具。Coh–Metrix工具简单易用，而且对公众免费。用户只需在窗口输入文本，单击按键，然后系统将产生大量文本的测量工具。

Coh–Metrix的主要关注点最初在于话语衔接和连贯，但最后却承担了大规模的语言和话语测量。**衔接**被定义为明确文本在帮助读者从心理上联系文本思想方面所具有的特征。**连贯**被定义为一种反映语言/话语特征与世界知识之间互动的认知再现。Coh–Metrix的设计是为了超越标准化的可读性公式，如仅仅依靠词语长度和句子长度来确定文本难度的弗莱施-金凯德等级水平（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Klare, 1974–1975）[1]。Coh–Metrix的一些测量适用于单个词语的特征，但大部分测量会在更深层次上将文本进行等级区分，分析句法、指称衔接和语义衔接、情境模式的维度以及修辞构成。【132】

作为Coh-Metrix的一个示例，考虑一下下面一段关于药物**伪麻黄碱**的文本吧。这种流行药物帮助那些周期性鼻塞的人摆脱过敏、感冒或流感。但是，它也曾被吸毒者滥用，所以药品市场必须寻找替代品。公众想要了解这类药物及其相关替代品的用途、注意事项和副作用。以下这一段来自一种含有伪麻黄碱的商业药物的包装标签：

> 暂时缓解由普通感冒、花粉症或其他上呼吸道过敏所导致的鼻塞，以及由鼻窦炎引起的鼻塞。暂时缓解鼻窦阻塞和压迫。如果你正在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 MAOI）（针对抑郁、精神病或情绪调节或帕金森症）的药方，请勿服用本药，或者待停止使用MAOI药物两周后再服用本药。

我们将此段话录入至Coh-Metrix，并记录了诸多指标的得分后，我们发现这段话可以被证明对大多数公众而言是一个挑战。弗莱施-金凯德可读性记分显示出12个等级的阅读水平，据称，那些未能高中毕业的公众成员在阅读这些关于伪麻黄碱的用途和注意事项的说明时会遇到麻烦。

1 弗莱施-金凯德等级水平是弗莱施-金凯德可读性测试的两种方式之一，其测试结果与美国年级水平一致，便于教师、父母、图书管理员等判断各种书籍和文本的易读性，也可以表示需要多少年的教育来理解某一文本。——译者注

一些词语（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的词频得分很低，这将造成理解问题。文本中连续的句子在概念上的衔接对于指涉衔接来说分值中等，而且对于情境模式来说则分值较低，然而逻辑运算符（**与，或，如果，那么，非**）的出现密度则很高。对这一测量工具的概述支持了这样的结论：读者需要高水平的推理和语言能力来理解这段话，因此它试图传达的信息可能并未有效地到达主要的公众。

这个 Coh-Metrix 的例子说明了将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整合到考察话语处理的认知基础的研究项目中的重要性。对认知的理解需要对现实世界里的话语进行系统的分析，也需要用来计算意义的计算机基础。研究者同时也将神经系统科学整合到他们的研究项目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发展趋势，但是超越了这些研究者可以处理的范围（参阅 Schmalhofer and Perfetti, 2007）。这也标志着话语认知学实现了它作为跨学科领域的历史悠久的、明确的使命。几乎所有当前话语认知学的主要研究项目都涉及与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和/或神经系统科学的跨学科的一系列合作。

【133】

7.5 理解技术性文本的挑战

大多数文化里的公民都被期望能够紧跟科学、技术和其他与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相关的技术性话题的进展。但是，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即使他们是富有技巧的读者，也都在对技术性说明文的深层次理解上有困难。对技术性文本的深层理解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因为读者可能对于技术性术语、关键的概念化、心理模式和其他形式的背景知识所知甚少。即使是那些具有相关背景知识和普通阅读能力的人也会很费劲。

理解技术性文本的挑战已在评估我们对于情境模式的理解的试验研究中得到证明。在一项关于牛顿物理学的特殊研究里（VanLehn et al., 2007），大学生被分配到三种情况里：①与一个智能的计算机导师（叫作 AutoTutor，后文将进行讨论）一起工作来解决物理学问题；②与 AutoTutor 的情况一样，花同样的时间阅读关于同一内容的教科书；或者③什么都不读。在训练前后，进行了含有多项选择题的前测和后测，测试他们对于深层物理学知识的理解。结果，从 AutoTutor 那里获得了实质性的学习成果，这对于研发者而言是好消息。但更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后测得分显示，阅读教科书没有任何的学习成果。阅读教科书与什么都不读的得分没有差别。相似的发现也出现在计算机素养话题以及关于科学方法的批判性思考中。

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深层知识通常不能从阅读教科书里产生。这不能归因于使用了低劣的教科书，因为在以上所有研究中选择的教科书都是非常流行的（这个物理学文本已经印刷了 8 版），或者由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所著。原因更可能被归结于读者花费在建构深入且准确的情境模式上的时间和努力不足。但是，这个原因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读者不花费时间和努力来准确地理解这个材料？有两个最可能的原因。第一，这些读者无法将他们的理解校准到足够的准确度。第二，他们没有运用可以促进深层理解的阅读策略。

成年人理解校准力存在缺陷这一观点已经被许多关于话语认知的研究所证实（Maki, 1998）。理解校准力是通过计算两个分值之间的相关性来进行测量的，一个分值是读者充分理

解一个文本的等级分，一个是文本理解的客观测验得分。这一相关性是中度分值（$r = .27$），说明许多读者对于他们什么时候理解了或未理解材料，并没有准确的感觉。话语心理学家验证了其他许多发现，支持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成年读者常规下会满足于浅层次的理解（Sanford and Sturt, 2002）。读者经常忽略文本里的矛盾，即使前提条件在话语里很明显地并列。他们会陶醉于引人入胜的细节和富有趣味的奇闻异事（*如，艾萨克·牛顿的母亲曾想让他当农民*），这会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深层次情境模式（比如，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转移开来。读者还会忽略掉与先前知识明显冲突的错误预设。譬如，来看一下教室里的这样一次交流：【134】

老师：摩西将每种动物里的几只放在了方舟上？

全班（孩子，齐声）：两只。

老师：啊哈。是诺亚，不是摩西把动物放在了方舟上。

这个*摩西假象*（Moses illusion）说明理解者可能深入地监视着话语焦点里的信息，却通常掩盖了预设的信息（Van Oostendorp and Kok, 1990）。他们会假设说者 / 作者要表达的只是真实的预设，所以这一信息不会受到深入的审查。经常是那些具有高度背景知识的理解者承认他们并未理解。这是因为要了解一个人所不知道的，是需要知识的。研究元认知（也即人们对于他们的思维过程所坚信的）的学者一直验证了许多这样的悖论和违反直觉的结果（Hacker, Dunlosky and Graesser, 2009）。

当文本是技术性的时候，读者的理解策略通常不是面向深层次理解的。因此，他们将需要学习更好的策略。话语认知的令人兴奋的趋势之一便是改善学习环境、发展出干预方法，以帮助学生学习更好的理解策略（McNamara, 2007）。现在已经有一些策略被设计出来以改善如下几个方面：①对句子和部分文本片段的理解；②文本成分的跨越和连接；③将文本以个人经验和日常活动作为依据；④掌握修辞结构和文本类型；⑤与专家、导师和同侪的社会互动；以及⑥问问题、回答问题、反思和总结的过程。譬如，一个策略是鼓励学生在阅读时生成对文本的*自我解释*。这是因为自我解释被认为能够提升理解（Chi, de Leeuw, Chiu and LaVancher, 1994; McNamara, 2004）。也就是说，当读者逐句理解文本时，个人建构了对事件因何发生、作者因何表达了某些事、想法是如何联系起来，以及材料是如何与读者的先前知识和个人经验相关的解释。理解策略的训练传统上在教室里或通过人的辅导进行，但近年来已经转向计算机环境。

7.6 电子文本、话语和多媒体

我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在数字显示屏上阅读，不论它们是计算机、手机、个人掌上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书阅读器或者显示器。我们所阅读的也比之前提到的类型更为多样：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多媒体显示屏，还有浏览万维网。这些小设备的受欢迎程度当然说明了我们不仅渴望更高效地完成任务，还渴望与别人保持联系。【135】

技术确实正在改变我们阅读的方式。我们所阅读的更多地在数字显示屏上展示。在电子设备上显示话语有明显的优势。其中之一便是通过电子书和其他便携式设备，我们在一天 24 小时

里有 7 个小时能够获得丰富的话语资源。比如，亚马逊网站出售的 Kindle 系统使用无线网络技术下载成千上万的书籍。另一个优势是这一技术可以在理解的特定层次上帮助读者。我们可以改变文本的字体大小或者通过点击词典选项来查阅一个词语的意思。这些改变分别与层次 1（表层）和层次 2（文本基础）相对应，而且没有理由止于这些层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电子书和读者之间的短时交替，以评估后者是否形成了充分的情境模式。

判断我们所有的纸质书是否会被电子书所取代，还为时尚早。我们确知的是书籍相对于电子书的成本正在迅速变化，所以很难说哪一种最经济。除了成本，手捧一本书并用手指翻动书页，更令人感到熟悉和抚慰，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雨天，坐在炉火边时。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视力较弱的人，阅读数字显示屏会有困难。如果字母和背景的对比不完全正确，那么他们聚焦会有困难，而且眼睛会很容易疲劳。幸运的是，视力专家和心理学研究者们正与私人企业合作来帮助解决这些在阅读呈现于数字显示屏上的文本时产生的问题。这里的一个解决方案被称为“**可视化句法文本格式化**（visual syntactic text formatting）”。不同于将文本呈现于普通的段落格式里，文本会以这种方式呈现：

你正在阅读
　　这一句
排版
由可视化句法文本
　　格式化

虽然看起来奇怪，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这种排版减轻了眼球的负担并增强了理解（Walker, Schloss, Fletcher, Vogel and Walker, 2005）。它似乎能通过帮助读者依据句法解析句子（层次 1），以此来增强理解，这样他们可以将脑力资源投入在更高层次上。

还有其他帮助我们理解书面词语的技术手段。一个是多媒体，信息通过使用不同传输系统（视频，文本，模拟，图像）的不同展现模式（言语的，图像的）和感官模式（视觉的，听觉的，还有可能是触觉的）得到呈现。鉴于这一过程不会产生注意力超载，通过这种多媒体展示的信息促进了记忆和理解。图像（照片、视频）有助于记忆的原因之一，是通过增加大量的方法手段，信息可以在事后的某个时间里检索提取。例如，给一个学生展示氢原子的图解，该学生要比另一个阅读文字描述的学生显示出更好的记忆。看到图解的学生会对它的图像和言语描述都进行编码（“原子核位于中心”，“电子围绕原子核”，等等），而仅仅阅读了描述的学生可能无法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图像。因此，看到图解的学生会有更多的机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提取这些再现中的某一个（一段言语描述或一个图像）。

【136】

除了记忆，多媒体还能帮助读者获得对可获取的材料的深刻理解。图片、图形显示、动画和视频都有潜力帮助读者获得一个有关图像附文的深层的、完整的并且准确的情境模式。想象一下阅读一个关于计算机内部运行的文本：中央处理器，异或逻辑门、字节、输入和输出等。对于存在于这样精细的领域中复杂的、暂时的、因果的、空间的、逻辑的和语义学的关系，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但是，许多这样的关系可以通过漂亮的动画、图表或模拟来传达，在这样的模拟中用户可以控制一些参数（如逻辑门、内存大小），并观察结果。

梅耶（Mayer, 2005）广泛地研究了多媒体如何影响理解、记忆和学习，他得出了多套原则来说明多媒体如何基于信息选择、组织和整合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尽管多媒体能通过提高语义学方面丰富的整合经验来帮助理解，多媒体显示也会干扰理解。例如，一系列传达重要功能的静态图像实际上可能要好于动画，因为后者可能对于观看者而言太快而难以理解全部信息（Ainsworth, 2008）。除此以外，也存在着使注意力产生分裂的效果。在 PowerPoint 演讲展示中，当一个演讲者说话的同时播放一张词汇量丰富的幻灯片时，这种分裂效果即会发生。观看者的注意力因此会同时分别投注到演讲者和幻灯片，这会加重正在工作的记忆的负担，结果就是所理解到的信息极其之少。如果在一个关键时刻任一展示样式超载，那么相似的过程会发生在多媒体展示中。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学习的时代里，我们的许多学习、培训和教育都是通过电子手段来传送的。在我们的旧教育环境中，学生和同事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和时间聚集，由一个老师或老板来人工指导。在新环境下，我们可以在家里甚至在乘坐巴士时通过 iPhone 就能看到网上的辅导，接受其指导。电子学习的倡导者们勾画了这样一个未来：学习更以学生为中心、更积极主动并更加投入；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场所和时间；有丰富多媒体的，个人化的，在现实情况里语境化的，基于问题的（相对于基于指导的），社会化的，并且为便携式计算机设备提供更多机会的。所以老师会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向导，而不是站在讲台上的圣贤。

网络一代似乎很适合于这样的未来，因为他们一直是伴随着互联网、即时通信、手机和电子游戏而成长（Gee, 2003）。的确，一些教育学、心理学、话语处理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者正在与游戏产业合作，致力于创造富有魅力的教育游戏。他们已经注意到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缩写 MMORPGs）的巨大吸引力，其中众多玩家会在网上虚拟地（由“化身”所代表）并且同时地互动。2008 年，一款基于幻想的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有大约 1 000 万注册用户。令许多父母感到惊慌的是，青少年玩家平均每周会花约 20 小时玩电子游戏，比他们花费在作业上的时间长得多。想一想拥有一个让人欲罢不能、深入教授生物、化学、代数或政治科学概念的视频游戏的影响吧（Ritterfeld, Cody and Vorderer, 2009）。大多数父母会欣喜若狂，如果他们的儿子或女儿真心期待做作业。

【137】

7.7 动画会话的代理

虚拟学习环境（教育游戏、模拟、多用户虚拟环境）越来越多地运用动画教学代理（pedagogical agents）。教学代理是多种形式（如人物、植物、动物、昆虫、普通物品）的虚拟实体，可以移动（如走、指示、手势），交流（说话、倾听），显示个性（如粗鲁的、礼貌的），激发不同的认知状态（如学习、遗忘）和展示情感（如惊喜、快乐、怀疑）。因为“代理”可能被定义为具有观点的任何实体，学习环境的开发者已经提供给动画代理一些教学角色或功能：教师、导师、学生、专家、朋友、旁观者等（Baylor and Kim, 2005）。在一些学习环境里可能只有单个动画代理，而在其他环境里可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这些动画代理能通过询问和回答问题与人

类用户交流，但是他们也可以与其他代理交流。例如，一个“学生代理”能展开与“教师代理”的对话，以此来为人类用户模拟一项任务。正如预期一样，动画教学代理可能会非常投入于互动，并开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不仅如此，话语心理学家在建立和测试这些会话代理中发挥了中心作用（Graesser, Jeon and Dufty, 2008; McNamara, 2007; Millis et al., 2009）。推动我们理解会话的一种有力方式便是建立一种可以与人类和其他代理成功交流的代理。

学习环境里的动画代理能提供一种自然的、引人参与的界面，用于将用户（学生）引向对话题的深入理解。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大多数读者不会了解他们是否真的理解了他们所阅读的内容。教学代理能被用于挑战读者的理解，这样，可以将不完整的知识和错误观念识别出来，并予以处理和修正。这种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一种学习环境 AutoTutor（Graesser, Jeon and Dufty, 2008; VanLehn et al., 2007）。AutoTutor 是一个通过展开自然语言的会话来帮助学生学习的计算机化智能辅导。AutoTutor 代理向用户提出问题，评估答案的质量和完整性，并且提供简短的反馈（正面的、负面的、中立的）、提示、及时的询问以引出一个特定的词语和探问（“还有别的吗？”），以此来指导用户形成完整的答案。AutoTutor 还回答某些类型的学生问题，【138】并在对话中的多个时点上提供总结。这取决于“理解”用户给出的答案的计算机语言学方法。AutoTutor 到目前为止已经面向科学和技术话题，诸如物理学、生物学、研究伦理、计算机素养、研究方法和批判性科学思维等，而且在增进学生的理解上获得了成功。根据多项研究，在针对理解和学习的测试中，与 AutoTutor 互动的学生的得分，较之于各种控制条件下的得分，几乎高出一个字母等级（Graesser et al., 2008）。与从中学直到大学里与人类导师互动的大多数学生相比，与 AutoTutor 互动的效果大概是其两倍。

AutoTutor 背后的框架适于不同学习环境里的众多不同类型的目标。其中之一是一个刚出品的名叫 *Operation ARIES*！的教育类游戏。*ARIES* 是“习得研究与调查性和评价性技能”（*A*cquiring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ve and *E*valuative *S*kills）的首字母缩写（Millis et al., 2009）。*Operation ARIES*! 的学习目的是教育学生如何批判性地评估媒体上的研究。游戏背后的故事线的核心关键是 Aries 星座上的外星人通过出版漏洞百出的研究，来谨慎尝试着在科学方法上迷惑人类。在游戏的第一阶段，真人学生需要通过阅读一本关于研究的在线教科书来完成一门科学课程。此人获得这次机会来检验每一章，或者进行一个多项选择“挑战”测试，或者等到这一章被阅读测试之后。在游戏的这一节点，有两个动画代理：奎因（Quinn）博士，他是一个老师，还有格拉斯·蒂尔曼，他是一个上这门课的同龄学生。

在真人玩家回答了一个多项选择题后，玩家、奎因博士和格拉斯这三个代理之间会有一个简短的会话。这被称为“三人会话”（trialogs）并由 AutoTutor 的修订版精心安排。三人会话的目的是通过话语促进学生的学习，并帮助学生以一种与他们的知识水平一致的方式来控制他们的学习。当测试问题的成绩表明学生对于测试话题所具备的知识很少时，真人玩家会观看奎因博士与格拉斯进行的一次辅导性对话。事实证明低水平知识的学生能够通过观察他人的互动而得到帮助（Craig, Sullins, Witherspoon and Gholson, 2006）。当成绩表明中等深度的知识时，奎因博士于是会引进该真人学生参与一次简短的辅导性对话，与原始版本的 AutoTutor 非常相似。最后，当真人学生显示出高水平知识时，会要求她去教格拉斯。也就是说，帮助好学生学到更多的一个方式是让他们去指导其他学生或代理。

表 7.1 显示了最后一种情况里真人指导同龄代理的三人对话示例。话题是因变量，它们是一个实验里被测量的结果。格拉斯在定义“因变量”时向阿曼达（一个心理学真人本科生）寻求帮助。系统要求阿曼达说出①因变量是被测量的，以及②他们随自变量（实验者操控的变量）而变化。阿曼达在她的头两次回答时暗示她知道②，但不知道①。格拉斯试图通过提供给她一些提示，让她说出“被测量的”，但是她没有做到，导致奎因博士插嘴说了正确答案。在格拉斯给出一个提示之后，阿曼达终于明确地表达了所需要的想法，也就是说实验者测量因变量。

你可能会认为这段对话并不完美，而且有一点笨拙。但是，这些类型的互动鼓励学生去完成若干已知能促进理解的流程。这包括让学生使用预期的词汇、生成解释、将相关信息从不相关信息里辨别出来，以及处理错误观念。这些过程指向话语的表层、文本基础和情境模式等层次。还应该注意的是，格拉斯需要真人的帮助，但愿这会促使真人去很好地完成。在此，语用层次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应该明确她的贡献，因为她会假设格拉斯不具备她所有的知识，而不能假设在一个共同的水平上。人是否会像对待其同类一样，假设与动画代理有着相似的语用立场？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表 7.1　三人会话示例 【139】

格拉斯：	我认为我把自变量和因变量弄混了。阿曼达，再说一遍什么是因变量？
阿曼达：	因变量是受到自变量影响的变量。
格拉斯：	由于某种原因，思考因变量让我想到了因果关系。
阿曼达：	对自变量的控制是因变量的原因。
格拉斯：	我知道因变量不是那个被控制的变量。所以，那是什么样的变量？
阿曼达：	被控制的。
奎因博士：	被测量的。
格拉斯：	因变量与数据有关。
阿曼达：	它们是实验者测量的与自变量相对的东西。
奎因博士：	真聪明！
格拉斯：	我懂了。因变量是被测量的结果。测量取决于构成自变量的小组。

（格拉斯 = 动画学生，奎因博士 = 老师，阿曼达 = 真人学生）

怀疑者也许会提出反对，认为当会话代理（conversational agents）尚未完全理解人时，会最终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猜测，当对于精确和共同立场的期望值高时，这也许会真是如此。但是，当内容涉及言语的详尽阐述而非数学运算时，当学生具备有关话题的低级到中级知识时，就不会是个大问题了。代理还可以选择回避表明它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学生（例如，“我能理解你所说的很多内容，但请明白的是，我并不完美而且不可能洞悉你的心思”）。对这些会话代理教学价值的基本测试，并不在于它们完美理解的能力，而是在于它们能与人比较，及其促进学习的能力。

7.8 结 语

本章检视了采取认知倾向的话语处理的新近研究。在话语处理、认知科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学领域已然取得了充分进展，针对如何理解和生成多重层次的话语建立详细的模式，这些层次包括：表层代码、文本基础、情境模式、类型和修辞结构以及语用交际。通过使【140】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收集实证数据，这些模式得以形成并得到检验。其中许多层次已被充分具体化，在计算机上对其自动化处理。计算机模式已经演进到可以建立实用的计算机技术，例如文章评分器、文本分析器（胜过可读性公式）、自动会话辅导以及多方互动游戏。话语认知研究者一直延续着跨学科传统，欣然接受其他领域的洞见和方法论，最近是在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教育、多媒体、会话代理和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考虑到在过去十年里这一领域的重大改变，很难预测接下来的十年里会产生什么样的突破性进展。但是，话语认知领域的跨学科立场让我们有各种理由保持乐观。

感谢我们关于阅读理解和话语处理的研究的资助方，包括国家科学基金（ITR 0325428, ITR 0325428, REESE 063398），教育科学研究所（IRS R3056020018-02, R305H50169, R3058070349, R305A080589），以及由海军研究局管理的国防部多学科大学研究计划（MURI）拨款N00014-00-0600。如需复印本请写信至Art Graesser,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365 Innovation Drive, University of Memphis, Memphis, TN 3852。

延伸阅读

以下书单可以帮助感兴趣的读者学习更多本章提及的话题。

Graesser, A.C., Gernsbacher, M.A. and Goldman, S.R. (eds) (2003) *Handbook of Discourse Processes*. Mahwah, NJ: Erlbaum.

这一著作很好地概述了当代关于话语处理的研究，包括文学的、教育的、口语的、书写的以及计算机中介的话语。本书还呈现了跨学科研究者所使用的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

Schmalhofer, P. and Perfetti, C. (eds) (2007) *Higher Level Language Processes in the Brain: Inferences and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Mahwah, NJ: Erlbaum.

本书详细描述了本章开头论述的理解的不同层次，尤其是文本基础和情境模式。它还强调了支持这些内容的关于潜在神经表征（the underlying neural representations）的最新研究。

McNamara, D.S. (ed.) (2007) *Reading Strategies*. Mahwah, NJ: Erlbaum.

为了获取对高难度材料的深度理解，读者使用一些不同类型的阅读策略，如自我解释、复习和提问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阅读策略的最新理论、干预和技术的读者会发现本书非常实用。

Spector, J.M., Merrill, M.D., van Merriënboer, J.J.G. and Driscoll, M.P. (eds) (2008)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这本手册检视了随着我们在数字时代的进步而日益相关的正在勃兴的信息和传播技术（ICT）。它包含历史基础、指导和学习策略、工具和技术、学习模式、设计与开发以及方法论议题等章节。

Ritterfeld, U., Cody, M. and Vorderer, P. (eds) (2009) *Serious Games: Mechanisms and Effects*. Mahwah, NJ: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严肃的游戏是被设计用来教授技能和内容的互动电脑游戏。本书探索了与严肃游戏相关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机制，总结了对于它们的有效性的研究，并且讨论了它们在教育环境中的前景和局限。【141】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在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上获取。

Graesser, A.C. (2006) 'Views from a cognitive scientist: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underlying discourse are sometimes social'. *Discourse Studies*, 8, 59-66.

Wiley, J., Goldman, S.R., Graesser, A.C., Sanchez, C.A., Ash, I.K. and Hemmerich, J.A. (2009) 'Source evaluation, comprehension, and learning in Internet science inquiry task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6, 1060-1106.

参考文献

Ainsworth, S. (2008) 'How do animations influence learning?' In D.H. Robinson and G. Schraw (eds), *Recent Innovations on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that Facilitate Student Learning*.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Baylor, A.L. and Kim, Y. (2005) 'Simulating instructional roles through pedagogical ag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15: 95-115.

Biber, D. (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ber, D., Conrad, S. and Reppen, R. (1998) *Corpus Linguistics: Investigating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 M.T.H., de Leeuw, N., Chiu, M. and LaVancher, C. (1994) 'Eliciting self-explanation improves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Science*, 18: 439-77.

Conrad, F.G. and Schober, M.F. (eds) (2007) *Envisioning the Survey Interview of the Future*. New York: Wiley.

Craig, S.D., Sullins, J., Witherspoon, A. and Gholson, B. (2006) 'Deep-level reasoning questions effect: the role of dialog and deep-level reasoning questions during vicarious learning'.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24: 565-91.

de Vega, M., Glenberg, A.M. and Graesser, A.C. (eds) (2008) *Symbols and Embodiment: Debates on Meaning and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e, J.P. (2003) *What Video Games Have to Teach Us about Learning and Literacy*.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Gernsbacher, M.A. (1990)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s Structure Building*. Hillsdale, NJ: Erlbaum.

Glenberg, A.M. and Kaschak, M.P. (2002) 'Grounding language in action'.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9: 558-65.

Graesser, A.C., Cai, Z., Louwerse, M. and Daniels, F. (2006) 'Question Understanding Aid (QUAID): A web facility that helps survey methodologists improve 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ques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0: 3-22.

Graesser, A.C., Gernsbacher, M.A. and Goldman, S.R. (eds) (2003) *Handbook of Discourse Processes*. Mahwah, NJ: Erlbaum.

Graesser, A.C., Jeon, M. and Dufty, D. (2008) 'Agent technologie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interactiv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45: 298-322.

Graesser, A.C., Lu, S., Olde, B.A., Cooper-Pye, E. and Whitten, S. (2005) 'Question asking and eye tracking during cognitive disequilibrium: comprehending

illustrated texts on devices when the devices break down'. *Memory and Cognition*, 33: 1235-47.

Graesser, A.C., McNamara, D.S., Louwerse, M.M. and Cai, Z. (2004) 'Coh-Metrix: Analysis of text on cohesion and language'.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36: 193-202.

Graesser, A.C., Millis, K.K. and Zwaan, R.A. (1997)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 163-89.

Graesser, A.C., Singer, M. and Trabasso, T. (1994) 'Constructing inferences during narrative text comprehen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1: 371-95.

Haberlandt, K.F. and Graesser, A.C. (1985) 'Component processes in text comprehension and some of their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4: 357-74.

Hacker, D.J., Dunlosky, J. and Graesser, A.C. (eds) (2009) *Handbook of Metacognition in Education*. Mahwah, NJ: Erlbaum/Taylor & Francis.

Jurafsky, D. and Martin, J.H. (2008)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An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Recogn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Just, M.A. and Carpenter, P.A. (1987)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an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Kintsch, W. (1998) *Comprehension: A Paradigm for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lare, G.R. (1974-1975) 'Assessing readability'.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10: 62-102.

Landauer, T., Laham, D. and Foltz, P.W. (2003) 'Automatic scoring and automation of essays with the Intelligent Essay Assessor'. In M.D. Shermis and J. Burstein (eds)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87-112). Mahwah, NJ: Erlbaum.

Landauer, T., McNamara, D.S., Dennis, S. and Kintsch, W. (eds) (2007) *Handbook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Mahwah, NJ: Erlbaum.

Lea, R.B., Rapp, D.N., Elfenbein, A., Mitchel, A. and Romine, R.S. (2008) 'Sweet silent thought: alliteration and resonance in poetry comprehen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709-15.

Maki, R.H. (1998) 'Test predictions over text material'. In D.J. Hacker, J. Dunlosky and A.C. Graesser (eds), *Metacognition i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17-44). Mahwah, NJ: Erlbaum.

Mayer, R.E. (2005) *Multimedia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Namara, D.S. (2004)'SERT: Self-explanation. reading training'. *Discourse Processes*, 38: 1-30.

McNamara, D.S. (ed.) (2007) *Reading Strategies*. Mahwah, NJ: Erlbaum.

McNamara, D.S., Levinstein, I.B. and Boonthum, C. (2004) 'iSTART: Interactive strategy trainer for active reading and thinking'. *Behavioral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36: 222-33.

Millis et al. (2009).

Millis, K. K., King, A. and Kim, J. (2001) 'Updating situation models from descriptive texts: a test of the situational operator model'. *Discourse Processes*, 30: 201-36.

O'Brien, E.J., Rizzella, M.L., Albrecht, J.E. and Halleran, J.G. (1998) 'Updating a situation model: a 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 view'.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 24: 1200-10.

Pennebaker, J.W., Booth, R.J. and Francis, M.E. (2007) *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 Austin, TX : LIWC. net (www.liwc.net).

Pickering, M. and Garrod, S. (2004) 'Toward a mechanistic psychology of dialogu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7: 169-226.

Rankin, I. (1998) *A Good Hanging*. London: Orion Books.

Rayner, K. (1998)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 372-422.

Ritterfeld, U., Cody, M. and Vorderer, P. (eds) (2009) *Serious Game: Mechanisms and Effects*. Mahwah, NJ: Routledge/Taylor and Francis.

Sanford, A.J. and Sturt, P. (2002) 'Depth of processing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not noticing the evid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6:382-86.

Schmalhofer, P. and Perfetti, C. (eds) (2007) *Higher Level Language Processes in the Brain: Inferences and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Mahwah, NJ: Erlbaum.

Snow, C. (2002) *Reading for Understanding: Toward an*

R&D Program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Spector, J.M., Merrill, M.D., van Merriënboer, J.J.G. and Driscoll, M.P. (eds) (2008)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Spivey, M., Joanisse, M. and McRae, K. (eds) (2009) *Cambridge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A.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A. and Kintsch, W. (1993)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VanLehn, K., Graesser, A.C., Jackson, G.T., Jordon, P., Olney, A. and Rose, C.P. (2007) 'When are tutorial dialogues more effective than reading?'. *Cognitive Science*, 31: 3-62.

Van Oostendorp, H. and Kok, I. (1990) 'Failing to notice errors in sentences'.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5: 105-13.

Walker, S., Schloss, P., Fletcher, C.R., Vogel, C.A. and Walker, R.C. (2005) 'Visual-syntactic text formatting: a new method to enhance online reading'. *Reading Online*, 8(6). Posted May 2005: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Inc. ISSN 1096-1232.

Zwaan, R.A. and Radvansky, G.A. (1998) 'Situation model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3:162-85.

【143】

话语语用学 8

Discourse Pragmatics

⊙ 肖沙纳·布卢姆－库尔卡　迈克尔·哈默

8.1 语用学理论

从最广义上来说，语用学是对语境中语言交际的研究：在社会互动中语言的使用者作出的决定以及意义生产的过程。语言是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然而只是简单地掌握一门语言的词语和语法并不能确保交流的成功。词语可以比它们所说的意味着更多，或者意味着其他含义。对词语的阐释建立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上，包括对语境的熟悉、语调暗示、文化假设等。同样一个短语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而同一意向也可能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现象是语用学研究问题。

历史上，语用学产生于**普通语言学哲学**学派，并与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及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约翰·瑟尔（John Searle）和H. 保罗·格赖斯（H. Paul Grice）[1]晚期的著作相联系。这些著作囊括了语言作为社会行动的关键特征，并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语言是如何产生作用的[1]。这些框架后来被话语学习者采纳，并应用于对语境中文本和谈话的实际顺序的分析中，而不是如传统语用学那样分析孤立的言说（utterances）[2]。这样的研究在此被归入**话语语用学**（discourse pragmatics）之下，通常超越了核心语用学模型，并从其他研究路径那里吸收了影响。同时，其他一切领域对话语的兴趣，如语言人类学、传播民族志以及互动社会语言学，都受到了作为语言使用理论的语用学基本见解的影响和启发。

【144】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讨论源自于语用学研究核心传统的三种开创性模式：格赖斯的**含意理论**（theory of implicatures）；奥斯汀和瑟尔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以及布朗（Brown）和莱文森（Levinson）的**礼貌模式**（model of politeness）。我们将关注每个模式与**话语分析**的相关性，包括语用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语言学发展和媒体话语。最后，我们要回归到语用学与其他语言使用理论的联系和差异。

1　语言哲学家，出生于英国并在英国接受教育，晚期学术生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他在意义的本质、会话含义方面的研究分别对语义学和语用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2　“Sentence”，“text”，“utterance”和“discourse”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分析单位，分别译为“句子”、“文本”、“言说”和“话语”。而“言说”被视为语用学分析的基本单位。——译者注

8.2 格赖斯的意义理论

有关语言使用的本质的基本哲学见解之一是由 H. 保罗・格赖斯（Grice, 1957; 1968）对有意的交流（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的定义提供的。对格赖斯而言，有意的语言交流是指一个说者希望通过说 X 来传达特定的交流目的并实现其目标的过程，这一目的为听者所辨识并成为**共知**（mutual knowledge）。格赖斯（Grice, 1957; 1968）的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强调，说者所说的并不一定是将其交流目的进行明确的编码[1]。于是，当我说“门是开着的”时候，我可能是在邀请你进来，也可能是请你关门。在实践中对这些或其他语用意义的选择，在最低程度上来说就是将词语与它们被表达出来的语境进行配对。在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对这些词语进行处理，可以提供**语句意义**（提供“门是开着的”这个信息）；而对说的**环境**（和下面会详细阐述的其他形式的语用意义一起）的考虑，则可以帮助解释**说者意义**（即确定其说意味着邀请还是要求，或是其他）。[2] 语用学理论涉及解释对话者如何在语句意义和说者意义之间搭建桥梁；因此其分析单位不是通过语言学理论可以定义语言实体的句子，而是**言说**，也就是具体语境中的交流单位。

对话者要达成理解说者意义的过程必然牵涉推论。根据格赖斯的分析（Grice, 1975; 1989），交流是由一系列理性的、普遍原则和次级原则（称为**准则**，maxims）引导的，这些原则和准则使得推论过程系统化，并确保推论的成功。所有的交流首先是基于合作的一般默认假设：用格赖斯的话来说，在任何谈话交流中，对话者会假定所有参与者都会“根据要求，在对话发生阶段，由谈话交流的接受目的或方向”作出他们的贡献（Grice, 1975: 45）。而且，为了确保交流的有效性，对话者会假设所有的参与者按照以下四个准则进行：①**质量准则**，据此一个人不会说出他认为是错的以及没有充分证据的事情；②**数量准则**，据此会话所贡献的信息量既不会多于也不会少于所需求的；③**方式准则**，据此要求说者避免晦涩、含糊，并且要求简洁、有序；以及最后一项④**关联准则**，格赖斯将其简要定义为“使你的会话贡献具有关联性”（Grice, 1975: 45–6）。 【145】

格赖斯并不建议在所有的交流中都要严格遵循所有这些原则。他的论点比较微妙：这些会话规范起到的是一系列启发推论的作用，对话者据此可以判断彼此对谈话的贡献，并理解所说的话的意义。来看以下交谈，记录的是以色列的一个中产家庭晚餐时的对话。有三个孩子参与：丹尼，11 岁半；尤瓦，9 岁；耶尔，7 岁。

（1）母亲：丹尼，你有作业吗？
丹尼：我已经做完了。
耶尔：丹尼没有回答妈妈的问题。
尤瓦：他回答了，他回答了；当他说他已经做完了的时候，他省去了妈妈问下一个问题。
（Blum-Kulka, 1989；译自希伯来语）

字面上看，丹尼的回答没能回答他妈妈的问题，因而似乎违背了关联准则。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种违背难以察觉，从社会传统上说，父母询问是否有作业必然被解读为对孩子的表现

1 格赖斯对 meaning 和 implicatures 都有研究，前者通常译为“意义”，后者为“含意”。两者分别属于语义学和语用学两个领域。格赖斯将“意义”区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后者由字面意义和含意两部分组成。所以，含意是比意义更低一级的分析单位。两者的关系很复杂，格赖斯也没有很清楚地论述，后期的语言哲学家也有诸多争论。——译者注

进行检查。但对于一个较小的孩子而言，所需要的推论远非那么明显，耶尔的评论表明了这一点。尤瓦年龄稍长，能明白答话可能与**说的意义**而非**说了什么**相关。这样的**标准会话含义**（standar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1]，[3] 是日常交流的一部分。对“你好吗？（How are you?）”这一问候，可以不回应说“好（Fine）”或“不太好（Not so good）”，而是很可能回答说“我中了彩票”或者“我语用学考试不合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听者都可以根据他对世界的了解以及有关合作和相关性共享假设来推断说者的目的。

后来的**新格赖斯理论**提出对四个准则的不同的重构，或者假定一个基本准则来解释所有的推论（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Sperber and Wilson, 1986），或者，更近一时期的理论提出探索可能与语言结构相联系的推论系统性（Ariel, 2008）。语用学中的大多数理论成果（如 Carston, 2002; Recanati, 2004）都一直在探索字面意义（“说了什么”）和推论意义（“意味着什么”）之间的关系。一些新格赖斯理论解释了为何某些言说支持因级别优先而得出的解释。例如，在与使用诸如“**一些**”（some）或“**所有**”（all）这样的表达相关联的梯级含意（scalar implicatures）[2] 中，一个较低级的表达（**一些**）意味着说者不是处在一个能够对高级别表达（**所有**）进行断言的地位——否则的话，假如说者处在这个地位，根据**数量原则**，他／她会使用更强的句子来下断言，而如果不这么做则会被认为是违反原则的（Levinson, 2000）。

【146】

格赖斯特别感兴趣的是在对准则的蓄意利用基础上产生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即说者为了暗示一些事情，**公然违反**其中一些准则。言说中的某些修辞手法，比如同义反复或反语（格赖斯举的例子是“他是个好朋友”，说的是一个泄露了秘密的朋友），就是**藐视准则**的极端例子。同义反复如“男人就是男人”是对数量准则的公然违反，只有在可能暗示的事物层面才具有有用信息——例如一个女性用这句话来表达一个男性的举止时。

下面一段引用文字来自一篇对以色列时任空军司令丹·哈卢兹的报纸采访，它说明了对准则的蓄意利用如何产生意义以及这样做可能涉及的风险。贯穿整个采访，记者通过反复询问坚持，要求哈卢兹对空袭加沙地带居住区涉及的道德、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发表看法，但哈卢兹都回避这些要求。采访以如下对话结束：

（2）问：一个飞行员丢下一颗炸弹，无意致儿童死亡。就此结果询问这个飞行员的感受，难道不是合理的吗？期望他自问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合理的吗？查问空军内部是否甚至被问及了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合理的吗？

答：不。这是个不合理的问题，而且我们甚至不会去问。但如果你真的仍想知道我释放炸弹时的感受，那我会告诉你：我感到一束光射向飞机，释放炸弹都会造成这种后果。一秒钟之后它就没了，就这样。这是我的感受。

（Levi-Barzilay，2002 年 8 月 23 日；译自希伯来语）

在哈卢兹的回应中，他显然藐视了两条准则：通过反复用词（over-wording）、重复（repetition）和回答问题前后的元评论（meta-comments）[3]，他违反了**质量准则**。在他冗长的预回应（pre-response）中，他将“感受”一词与情感的和身体的两个维度关联起来（“如果你

1　不违反任何会话准则而产生的含义。——译者注

2　是会话含意的一种，说者按照语义维度将一套命题所描述的事物或情景置于语用刻度中，刻度上某个命题可以传递刻度上其他命题的含意，早期的梯级含意研究主要与量词相关。——译者注

3　对评论的评论，比如案例中的“这是个不合理的问题”。——译者注

真的想知道我的感受”），由此获得了对该词的双重解读。但在正式回应中，他明显地将对“感受”的使用仅限定在身体层面，回避了原有问题并违反了**关联准则**。但从哈卢兹的回应中，显然可以感受到他试图通过采用会话含义来解决回答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所带来的困境（Weizman, 2008），其生成的具体含义本质上是模糊的。在完整序列的语境中来考察哈卢兹的全部陈述，其中一种解读是将其视为会话含义，重复那些启动他回复的明确的元交际批评（meta-communicative criticism），并且可以看作是间接地拒绝回答问题。在这种解读中，哈卢兹带有讽刺性地暗示了飞行员的情绪状态完全是私人问题，且不是一个用来公共讨论的适宜话题，鉴于飞行员全力专注于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隔离了他们的个人想法。需要注意，在哈卢兹生成这一蕴含意义的同时，坚持采用直接回答（“那我会告诉你”）的**形式**，可能是作为一种回避被记者再次判定为无回应的可能性的方式。在这种解读中，哈卢兹的回应是对语言使用的“不严肃”的明显案例。【147】

然而，哈卢兹没有意识到，根据这一充满争议的话题以及他自身呈现的超然的“分析式头脑”这样的公共形象，对他的陈述所能作出的较为简单直接的解读就是生成一种标准会话含义：也就是说，如果他真有可以言说的情绪反应，他就不会将他的回应仅限于身体感官上——因此，他没有任何感受。报纸、媒体、公众普遍采取这种解读，导致对哈卢兹的严厉批评，认为他毫无道德，并产生了“谈话丑闻”（Ekström and Johansson, 2008）。三年后，当哈卢兹被提名为下一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时，这一丑闻又被再度提起。对哈卢兹陈述的反复引用都是高度去语境化的，并且关注点都只是他这一单句话“一束光射向飞机”，而无视他这一回应中的讽刺性元交际维度。这一短语后来成为了一种文化流行语，至今总是在有关军事伦理和道德的讨论中被提起。

正如这个例子所述，生成和推断含义的过程在语境上是高度敏感的，而且对格赖斯准则的应用是**受语境变化影响的**。例如，对信息量程度的期待，会随着会话参与者的社会角色以及交流环境的其他特征而改变。而且，在许多制度化的不对称接触中（老师—学生、医生—患者、采访者—受访者），对准则的坚持程度会由权力方决定，并由制度约束所控制。通常是由老师、医生或采访者来判断［有时通过使用元语用评论（metapragmatic comments）］[1]对方的回应是否与问题相关，是否有充足的信息量，如果没能达到他们的预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对准则的诠释也是**文化依赖性的**。对不同情境下所要求的准则，其遵守程度会有不同的预期，文化会在它们各自的预期上有所不同，也会在每条准则的相对重要性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在马达加斯加这样紧密结合的农业社会，所有重要的新信息都被看作是稀有物品。在这样的社群中，并不一定要求说者满足其同伴的信息需求，是否期望一个人的讲话“有信息量”也会随着社会情境以及问题中信息类型的不同而不同（Keenan Ochs, 1974）。

8.3 言语行为理论

格赖斯的意义理论，最关注的是对话者辨认相互之间交流意图的方式；而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为交流意图提供系统分类以及如何将它们在语境中进行语言编码的方法。

哲学家约翰·L. 奥斯汀为后来人所共知的标准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中，奥斯汀从对实施交流行为的语言表达能【148】

1 metapragmatic 是一个专业术语，国内译为“元语用”，是指语言使用自身成为话语对象。——译者注

力的基本洞察，转到关于交流行动即**言语行为**的一般理论。奥斯汀首先指出，某些表达如“我抱歉”或“因此我为这个孩子施洗礼”都无法被证实为真或假，因为其目的主要是用语言来“做”一些事情。他把这样的言说叫作**述行语**（performatives）[1]，以此区分于其他言说。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起到道歉或警示的述行作用（performative function）[2]，这样的言说需要满足特定的语境条件，称为**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或**适当条件**（appropriateness conditions）］。

但是奥斯汀还更进了一步：他意识到，实施交流行为并不限于他最初的述行语所包括的言说的既定子集，而是**每个**言说的内在特性。任何言说都同时实施了至少两类行为：[4]

①**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和所指的句子的构成[3]。言内行为是**说了什么**，通常包含一个指称性表达（例如“约翰”、“这个老师”、“这个政府”）和一个述谓表达（predicating expression)（“要结婚了”、“离职了”、“要协商和平条约”）。

②**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交流功能的实施，如陈述、质疑、发号施令、承诺等。言外行为是言说者在进行语言表达时**做了什么**。例如，当一位老师说“将书本翻到第20页”时，其实施的言外行为——也就是表达的**以言行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4]——是下达指令（Austin, 1962）。

基于奥斯汀的理论，约翰·R. 瑟尔（Searle, 1969; 1975）更进了几步，对言语行为进行分类，并对实施这些行为所需要的适切条件的性质予以系统化阐述。瑟尔（Searle, 1979）[5]提出了五类主要的言外行为：

①**断定式**（representatives）：通过断言、总结、声称等方式来描述事态的表达。

②**指令式**（directives）：用来让听者做一些事情的表达，通过表现命令、指令、请求、要求和提问（问题由一系列指令组成的子集构成）进行表达。

③**承诺式**（commissives）：对听者承诺要做一些事的表达，含有诸如许诺、发誓、效忠联盟等行为。

④**表达式**（expressives）：通过感谢、致歉、祝贺和慰问来对听者表达心理状态的行为。

⑤**宣告式**（declarations）：用来表达在一些事态中可能形成的变化，通常是制度化的。范例有洗礼、宣布和平、解雇职工，以及逐出教会（最初包含在奥斯汀的“述行语”中的行为类型）。

然而瑟尔的分类并未被广泛接受。一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分类原则（Bach and Harnish, 1979），而其他人则拒绝了瑟尔的主张“言语行为的进行有着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表明对言语行为的概念化和口语化模式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跨文化差异（例如，Rosaldo, 1990）。

【149】

瑟尔主张，任何表达行为的成功，都需要满足**具体的语境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不同的可执行的以言行事的力量，而它们的实现**因实施的言语行为类型而系统性地变化**。

---

1 或译为“施事句”、“施行话语”。——译者注

2 或译为“施事作用”、“施行作用”，意指表述行为的作用。——译者注

3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言内行为是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也即通过句法、词汇和音位来表达字面意义的行为。——译者注

4 或译为“言语行为力量”、“话语施事的力量”。——译者注

5 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发展言语行为的标准理论奠定了基础。奥斯汀是瑟尔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期的老师，他的很多语言观念在瑟尔的言语行为研究中得到传承和发展。——译者注

瑟尔提出了四个这样的条件参数：

①**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言说的语义内容的特征。例如，要求中通常包含着对未来的提及，而道歉通常指向过去发生的行为。

②**预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实施言语行为所需要的必要的语境特征。比如，（在指令式情况下）听者实施所要求的行为的能力，或者（在道歉情况下）对已犯错误的假定。

③**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s）：说者的所想所信，例如，（在请求情况下）他希望听者去完成所要求的行为，或者，（在道歉情况下）他确信已犯错误，同时听者也认识到这个错误。

④**根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在请求情况下）言说被当作试着让听者去做某事所依照的惯例，或者，（在道歉情况下）被当做采取措施对社会失衡进行补救所依照的惯例。

这些条件表明，实际使用中对言语行为的识别取决于语言特征（命题内容）、语境特征（预备条件和诚意条件）和文化传统（根本条件）的具体组合。这种思考方式在辨认诸如煽动这样有问题的言语行为的话语表现中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有助于评估具体言说的社会和道德意义（Kurzon, 1998）。

8.3.1 间接言语行为

正如瑟尔（Searle, 1975）指出的，间接性是言语行为表现最迷人的特征之一。当然，鉴于一个人可以直接提出要求，具体说明交流意图以及用明确的词语表达出的行为的本质（如“请关门”），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下面的任意一句来间接地达到相同的交流目的：

（3）我可以请你把门关上吗？（May I ask you to close the door?）

（4）请您把门关上好吗？（C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door?）

（5）这里好像有点冷。（It seems a bit chilly in here.）

一些间接形式如例（3）和例（4）是依据语言特定的**使用惯例**（Morgan, 1978; Searle, 1975）；因此至少是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中，一句关系到听者实施行为能力的问话带有请求力，但只是在以特定方式措辞的情况下［“你能关上窗户吗？（Can you close the window?）”而不是“你有关上窗户的能力吗？（Are you able to close the window？）”］；（Blum-Kulka, 1989）。不是所有的间接形式都受到这种措辞惯例的影响。例如，“这里有点冷（It's a bit cold in here）”，或者“这里很冷（It's very cold here）”，又或者“冷死了（It's freezing）”，这些形式尽管在语义上不是等值的，但都具有相同的请求语用潜力。因此我们可以区分请求中两种不同的间接性：**常规间接性**［如例（3）和例（4）］和**非常规间接性**［如例（5）］（Blum-Kulka, 1989）。 【150】

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似乎与恪守常规的程度与类型紧密关联。因此像例（3）这样的**常规间接性**（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本质上是模糊的；请求性解释（requestive interpretation）是言说的意义可能性的一部分，并且可能和字面解释（literal interpretation）共现。另一方面，在例（5）那样的**非常规间接性**（non-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中，解释可以更为开放式得多。像“我饿了”这样的言说，根据不同的语境，可能有多种解释：出自一个乞讨者，请求给钱；出自在睡觉时

间的孩子，请求延长大人的陪伴；或者，在走进餐厅时说，表达对美食带来的愉悦的一种预期。

建立在言语行为理论上的研究包含了多个方向。一个主要焦点是在日益扩大的语言范围中个体言语行为的实现方式，包括请求、道歉、抱怨和赞美（例，Ogiermann, 2009）。这类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的效度带来了持续不断的争论，诸如用来分析直觉的和发明的例子的“扶手椅”法[1]，用来刺激控制组数据的“实验室”法，以及用来分析自然发生的话语的“田野”法（Jucker, 2009）。作为持续不断的语言心理学经验研究的主题，第二个焦点是对间接性的解释，包括常规形式和非常规形式（例，Clark, 1992）。

争议的另一个关注点是言语行为理论对分析互动序列的适用性（Parret and Verschueren, 1992）。可以说，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分析互动的话语语用视角，可以为理解互动作出贡献，同时也为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重要见解。这一点将通过下面一个例子进行阐述。

8.3.2 言语行为的话语语用视角：语境中的协商意义

（6）以下对话摘选自一个以色列中产阶级家庭的晚餐时间对话。桌上有几道菜。加迪和萨拉是夫妻；同时在场的还有他们的两个青春期前的孩子和一个观察者。

44 加迪：萨拉，你的计划是什么？
45 萨拉：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46 加迪：不，计划，吃什么食物，[这样我才知道要不要为自己准备
47 萨拉：[((现在)) 没有计划食物。
48 加迪：[这就是食物？
49 萨拉：[我看你也是，呃 :: 要自己做，我可以帮你加热
50 加迪：[不，我想知道是什么
51 萨拉：[或者你可以给自己做
52 加迪：除了米饭以外，其他是不是都在桌上了？
53 萨拉：是。
【151】 54 加迪：太棒了，很好。
55 萨拉：是。
56 加迪：那，那如果我去为自己准备，可以吗，我说
57 萨拉：我拒绝回应。特别是对可以吗，我拒绝。((都大笑))
°可以吗。° 无论我做什么，我可能仍然是他妈妈。((疲惫的语气))

（Weizman and Blum-kulka, 1992）[5]

这一系列对话的完整分析超过了本章的范围；以下我们将重点关注它体现的话语语用的几点原则：

◎话语可以是模糊的、多层次的

正如典型的间接言语行为，加迪的表达“计划是什么？”（第 44 行）是高度模糊的：它至少可能意味着，一个寻求信息的问题、间接的批评、对食物的间接需求，或是间接请求许可离开桌子来准备食物。这种模糊性可能是故意的，以满足加迪平衡人际的考虑和免除责任。

1　源于“扶手椅哲学”这一说法，是指一种只依靠先验概念进行思辨的研究方法。——译者注

加迪请求许可的个人目标在第 56 行变得明确，但是在第 57 行中萨拉的反应表明在这段对话中这对夫妻的共同目标还是模糊的：他们是想在桌边讨论劳动分工，还是社会性别与权力？相应地，加迪和萨拉在这两个层面可能会理解或误解对方，即他们的个人目的和这段互动的共同目标（Weizman and Blum-Kilka, 1992）。因此，这段摘录表现了语言使用的层次性，它涉及个体和集体的相互影响，也涉及工具的和互动的意义（Brown and Yule, 1983）。

◎逐步的要求：互动与合作在言语行为的生成和具体化中至关重要

在整个对话摘录中，加迪的要求经过了多道转换，逐渐明确了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这一逐渐去模糊化和修正意义的过程是通过合作达到的，是随着萨拉对每一阶段的需求澄清进行的（见第 44—46 行）。因此，这一系列对话强调了吸收领会和对话者角色在协商意义中的重要性。

◎话语是嵌入语境的，语境对于诠释至关重要

语境的两个方面对于参与者和研究者双方理解对话都是必要的。第一，直接背景和情境：例如，第 46 行的模糊性明显违背了食物早已经摆上桌子的事实。第二个方面更为开放，并涉及关于个人和人际历史的延展层面，这有助于为言语行为的成功进行提供预备条件（即，加迪的表达只有在萨拉被预设为负责食物的时候可以起到请求的作用）。此外，为了判断这一互动从戏谑转为严肃的冲突这一连续过程中的关键点，对话的参与者依赖的大概是他们的共识以及这个家庭的会话准则和方式。

◎话语塑造语境，也塑造认同和权力

从宏观视角来看，这段摘录似乎是对权力、性别角色和家庭关系的持续谈判的一部分。同样，它也建立在夫妻关系历史的基础上，并对关系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见德菲纳写的本书第 13 章，费尔克劳、马尔德里格和沃达克写的本书第 17 章，拉扎尔和克拉马雷写的本书第 11 章）。注意这在第 57 行萨拉的元交流评论中尤其明显，表明反身性是语言使用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用来理解规范和期望的宝贵资源［例如，Blum-kulka, 1997; Weizman, 2008; 同样参见上文对例（2）的分析］。

有关认同、关系和权力等方面的语用学论述在礼貌理论中体现得更为完整。

8.4 礼貌理论

【152】

对间接性的讨论表明世界各地的语言为其说者提供了多种形式选择来达成他们的交流目的。在实际使用中，说者往往并不遵循格赖斯的四条准则，并不用最清晰和可能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目的。正如佩内洛普·布朗和史蒂芬·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 1987）最早发展的关于“礼貌”（politeness）的理论，是建立在合作假设之上的，并提出社会动机可以解释为何会与明确性、直接性及其社会意义之间存在偏离。

本质上，对礼貌语用学的研究旨在解释语言行动中的语境和文化变异：哪些社会动机是固有的，哪些社会意义是附着于语言策略的选择（也即“礼貌策略”）以达成交流目的。对于布朗和莱文森来说，**礼貌**是有意为之的，个体的策略行为是为了防止威胁而满足自我和其他**面子需求**（face wants）。

正如欧文·戈夫曼认为的，当个人在互动时，他们关注的是自我的公共形象即**面子**的呈现和维护，是“在一次特定的交往中，一个人为自己努力声称的、其他人也依此假定他所具有的正面社会价值”（Goffman, 1967: 5）。延续戈夫曼的思想，布朗和莱文森声称，维持面子是人类互动的一个基本动机，并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积极面子**，就是人们关注他/她在别人看来是不是好。同时，人们也希望维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一个“空间”，在其中他/她可以自由行动且有权不被强迫。要求不被强迫的权利被称为**消极面子**。社会互动建立在对话者平衡自己的积极面子、消极面子需求与其他互动者的面子需求这两方面的满足基础上。

平衡面子的需求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多数的交流行为从内在上是强迫性的，或者说是**威胁面子**的。例如，指令挑战了听者对行动自由的需求（**消极面子**），并可能因为展现了需要帮助而威胁到要求者的**积极面子**；道歉涉及承认错误，因此会威胁到说者的**积极面子**，而在许下承诺时，因为应允了未来的行动，而影响了她的**消极面子**。礼貌策略是互动者用来规避和补偿这些对于面子可能产生的风险而采取的办法。因此，在前面的例（6）中，可以论证加迪的极端间接性的动机是需要规避对他妻子作为照料者这一角色的积极面子的潜在威胁。

如果风险是最小值，或者有压倒性的理由可以忽视面子风险，说者可能变得**直接**（Bald on Record），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交流行为（例如，在课堂上的“把你们的书翻开到第20页”。）

致力于对话者的面子需求，说者可以应用**积极礼貌策略**，如表达关心、强调互惠、呈现共同观点和表现乐观（例如，“吉姆叔叔问你身体怎么样了，他想知道是否可以跟你借锤子”）。其他典型的积极礼貌策略包括使用群内身份标志、俚语、玩笑、昵称和绰号。

【153】

另外，说者可以选择**消极礼貌策略**，专门指向听者对于免于强迫的自由的需求。这些策略经由各种方式而实现：寻求（而非假设）合作，给予听者不完成行动的选择，采取悲观态度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防备。消极礼貌策略包括常规间接性（例如，“我**在想**你知不知道比尔有没有来过”）、遵从的语言标志，以及迎合听者的逻辑解释中的理性。

在有巨大风险的情况下，说者可能以**间接**（Off the Record）的方式实现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为否认留下了最大的可能（例如，非常规间接性请求或暗示，如加迪询问“计划是什么？”）。

最后，如果认为风险太高，说者可能**决定退出**并同时制止实现威胁行为。

在语境中，对于这五种策略的选择大概由三种语境变量的结构决定：说者和听者间的**社会距离**，他们的**相对权力**，以及在既定文化中的相对**强迫等级**。

这种将礼貌概念化为表达自主权、理性个体努力避免冲突并通过间接性策略来维持互动和谐，这样的概念化受到研究非西方文化的学者的强烈质疑。理论上说，面子的普遍观念这一假设无疑是依赖于西方特有的个人主义和理性这些前提之上的（如，Hanks, Ide and Katagiri, 2009）。另外，布朗和莱文森声称五种策略这一列表代表的是有关礼貌的从直接到间接的普适性量表。然而，有证据表明某些文化呈现出不同的量表，与将礼貌等同于间接性并不符合（Blum-Kulks, 1987）。例如，在像以色列这样的倾向于将社会距离最小化、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中，普遍的方式是积极礼貌，而直接性也不总被认为是不礼貌的（Blum-Kulka, 1997; Katriel, 1986）。

近年来，在不同学科中关于礼貌的学术成果十分丰硕，讨论的议题从社会性别关系到计算机中介传播（CMC）。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话语的，依此检验序列中的，以及文化、制度和社会

语境下的礼貌。其中诸多研究都对布朗和莱文森所提供的理论驱动的模式进行了批判，这种模式将礼貌定义为抽象的分析概念。取而代之的是，这一新的研究脉络聚焦于语言的实际使用者和实践社群界定和评估礼貌的方式。这种对礼貌的新旨趣同样拓宽了分析的范围，这种分析最早是分析理性个体的意向性语言行为，这些理性的个体寻求多方位缓和面子威胁行为（FTAs, face-threatening acts）：这些研究探索了礼貌的全部范围，适宜的和不礼貌的行为；不仅聚焦于【154】说者行为，也关注听者的评估；对广范围的语言和非语言线索和资源予以关注；最后，他们较为一般性地探索了礼貌、面子行为与关系性的和认同性的工作之间的区别和关系（Culpeper, 1996; Mills, 2003; Watts, 2003）。

如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对话语中的面子现象的分析显示了礼貌策略的选择差异反映和建构社会世界的方式。

（7）两个女孩，雷切丽（4—7个月）和内奥米（5—10个月）在幼儿园打扮成了皇后，来庆祝普陵节这一犹太教节日。其中一个戴着她从家里拿来的皇冠。

129 雷切丽：这个？（2.9）这是我的。((可能是回应内奥米摸她的皇冠))
130 内奥米：（4.3）是::吗？=
131 雷切丽：=是我的↑
132 内奥米：>是但有可能可以戴上((它))吗？<是吗？
133 雷切丽：你要试除非它是你的尺↑寸？
134 内奥米：是。那么如果它是我的尺寸那有没有可能，让::让我戴一下下？
135 雷切丽：好吧。((雷切丽把她的皇冠递给内奥米))
136 内奥米：好耶↑，对我来说尺寸刚刚好。((用高音调的声音说着，非常开心))
（Blum-Kulka, 2008）[6]

在成人的使用中，这种对需求物品价值的协商与请求所涉及的强迫程度有关，而且直接反映在用于将强迫最小化的口头努力中。它也展示了如何通过有序恰当的推进步骤，以及请求者与被请求者之间经由良好调整的协商来达成目的。在这个例子中，有价值的物品是其中一个女孩戴着的皇冠。内奥米，这个垂涎皇冠的女孩，努力用最最小心的方式来让她的朋友同意她戴皇冠：她首先通过一个不承担责任的“是”（130）来承认他者对所有权的宣称（129），在她明确地用缓和的常规间接性（“有没有可能”是希伯来语约定俗成的形式）礼貌的语言来小心地提出要求前，她使用了一些进一步缓和的方式（132）——对“但”这一质疑语调的使用，以及特定句法和词汇的选择（使用不定式无人称句（impersonal infinitive construction）和紧跟的“是吗？”）。当她的朋友通过划定条件来拖延时（“只是试试它是不是你的尺寸？”，133），内奥米使用接受来准备下一个步骤。首先她接受，然后继续重新提出她的要求（134），接纳雷切丽的条件作为当前要求的缓和语法，重复间接无人称句，并加上另一个降级语（downgrader）（“一下下”）。一旦她成功了而且拿到了皇冠，她利用“除非是你的尺寸”这一限定来保证确立她【155】暂时的拥有权：“对我来说尺寸刚刚好”（136）。这个例子还证明了礼貌行为在建构和认可社会角色和关系，正如两个女孩的行为将皇冠拥有者置于短暂权力的位置上。

8.5 话语语用学研究的兴趣领域[7]

8.5.1 跨文化和不同文化间的语用学

跨文化语用学中一个被广泛研究的领域，关注的是对特定类型的语言行为进行跨文化之间以及母语与非母语说者之间的比较（如，Chen, 1993; Rose, 2009）。譬如，对不同语言中请求和道歉的实现的研究体现了高度的文化差异，不同语言的说者在既定情境下针对请求会选择不同程度的直接性（Blum-Kulka, House and Kasper, 1989）。

这种语用系统方面的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Scollon and Scollon, 2001）。在母语与非母语交流时，非母语说者可能依赖的是他们的源文化的语用规则，产生错误的传达（例如，日本的高度间接拒绝的规范可能不会被非日本对话者理解）。相异于目标语言规范的语法变体很容易辨认，给这种语言的生产者增添了一种保护性的“非母语”身份，但语用变体却不容易辨认，而且可能存在着被归咎于人格缺陷或种族文化的风险（例如，在英国会把粗鲁归咎于印度英语说者；Gumperz, 1982）。

8.5.2 翻　译

由于既定文本中的语用意义可能会通过特定语言的语用语言学意义编码，翻译者可能而且也有时的确无法提供目标语言中的语用对应（比如含有同样的语用潜在意义的表达）。例如，英语短语“I beg your pardon（请您再说一下/你说什么）”可能会在美式英语中标志着缺乏理解，表达愤怒，或者要表示道歉。在语境中，这个短语可能是故意模糊的，就像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跑吧》（*Rabbit,Run*）[1] 中一个（已婚）女性角色对这个短语的使用那样，在她递给一位（已婚）男性角色一杯咖啡被拒绝后，她说了这句话。这个男性在拒绝时所用的方式表明了他对她提供这杯咖啡的理解（“不，你看……你很好……但我现在有妻子了”）（Updike, 1960: 223）。希伯来翻译者对这个短语采用字面翻译“我请求你的原谅”，只考虑到了它的道歉含义，因此失去了原著潜在的语用意义。

【156】

8.5.3 发展语用学

发展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宗旨是拥有对语言的广阔的功能视野，超越语用学领域的传统概念，认为语言从内在性质上是多功能的、基于语境的，而语言习得的过程则是通过创造共享意义的合作过程而发展的演进。对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反映了19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乔姆斯基理论的流行，将重点从关注语言的正式领域拉回至作为交际的语言（Bates, 1976）。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和倾向多年来已大有改变，但语言的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凸显，以及将传播意义视为语言的中心所在，这些已成为研究语言发展的多种功能路径的共识，其中包括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发展语用学（Kasper and Rose, 2002; Ninio and Snow, 1996）、跨文化的语言社会化（Blum-Kulka, 1997; Duff and Hornberger, 2008）以及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研究路径（Tomasello, 2003）。对第

1　为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兔子”是男主人公哈利的绰号，讲述其不满平庸的工作和家庭而不断出走、逃跑的经历。——译者注

一语言的发展语用学的研究关注三个主要领域：言语行为、会话技巧以及扩展话语的类型，如叙事、说明和定义。

所有这些领域从语用学角度对语言习得的研究揭示了交际能力发展的一些原则，大多数有着语言交际的重要意义。首要的可能是**意义优先于形式的发展**和它们发展的不同节奏：儿童会习得他们大多数的交际言语使用——标记、游戏、注意方向、讨论和行动协商——在他们两岁半的时候。在这一时间到五岁之间，儿童不会显著扩展他们的交际本领，但是会提升他们表达先前获得的交际意图的语言手段。

其次，语用能力的发展路径揭示了语言交际的**主体间性**的重要性，同样也体现了它的复杂性。因此，举例来说，**言语行为**，这一需要复杂的社会认知理解的行为，将听者纳入考虑中，就好像通过承诺把自己交付给未来的一个行动，直到很晚才被掌握（Ninio and Snow, 1996）。会话技巧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种将听者纳入考虑的困难和慢速的习得。尽管年幼的儿童会从很早开始，在言语开始之前很久，就会按照恰当的轮次说话——因此揭示了交际背后作为主要驱动力量的**社会性**——但是，他们参与持续的**对话性**常规互动的能力会随着与成人和同龄人的互动较为缓慢地发展，实际上到了入学年龄，诸如表现得像活跃听者这样的具体技巧会在相对晚些时候获得（Hamo and Blum-Kilka, 2007）。【157】

最后，生成**扩展类型**（extended genres）如叙事、解释、定义或争论等所需要的技巧的发展，对儿童有特定的要求。这需要多种视角间的互惠考虑以及受众心理状态的细微调节，也需要熟悉不同的类型惯例以及产生话语的连贯结构性延伸所需要的语言方式。例如，对叙事发展的研究，大多数研究的是扩展类型，表明了对语言结构进行打磨以获得叙事功能，这些功能包括与年龄挂钩的暂时性和因果关系，与之相伴的是对叙事宏观结构的掌握和对会话式说故事模式的日渐成熟等方面的平行发展（例如，Berman and Slobin, 1994; Blum-Kulka, 2005）。

8.5.4 媒体话语

近几十年来，媒体谈话（media talk）和媒体文本（media texts）已成为话语分析者日益增长的兴趣的焦点。其中一些成果是在特定的学科传统中完成的，而对媒体话语的研究日益涉及不同路径和分析框架的跨学科融合。语用学已被吸纳成为一个分支，为分析媒体谈话提供了灵活的成套工具，这种分析将以语用为定位的概念（比如作为社会行动的话语或主体间的推论法则）与源自于批判性话语分析、会话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及其他领域的概念相结合。这种分析工具系列被应用于对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多种话语类型的研究，包括广播新闻、名人访谈、脱口秀和政治竞选（参见文献综述，Tolson, 2006）。

语用学特征还从较为具体的两个路径上体现在媒体话语研究中：

◎**作为一种传播理论**。在派迪·斯坎内尔（Paddy Scannell）对电视和广播现象的研究中，斯坎内尔将语用模式特别是格赖斯的交际理论及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理论视为概括任一形式的社会互动的关键前提。该研究反过来成为了大量研究媒体谈话的基础。利用语用模式，他强调了意向性和可说明性在节目编排和制作以及塑造广播电视的传播精神中的重要性（Scannell, 1996）。

◎利用特定的语用学模式来**作为研究媒介话语的分析框架**。这一传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介化的政治话语**，包括：例如，对政治语境下面子和礼貌的探索（如，Harris, 2001）；对公共话语和政治话语的特定言语行为的研究（如，道歉；Kampf, 2009）；以

> 及分析政治访谈中一致性和意义制造的语用模式的应用（如，Weizman, 2008）。政治话语中两个语用特征成为了中心——对间接、模糊的信息的使用，以及设计话语时社会和自我展示的考虑的影响。

【158】 媒体话语的研究对语用模式和概念的采用，为深化话语语用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首先，向不在场的分散受众播出的电视和广播话语的公共中介性质，强调了在这种离散的状态下，需要关注包括说者和听者在内的**不同的话语位置和角色**的影响（Fetzer and Weizman, 2006; Weizman, 2008）。其次，媒体谈话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类型和形式所创造的独特条件，吸引了学者对语用概念如合作准则的**语境敏感性**予以关注（Tolson, 2006）。最后，中介化的公共话语通常提供了语用过程中**策略使用**的例子，比如对话语规范的故意违反（Tolson, 2006; Weizman, 2008），或使用礼貌作为侵略行为而不是恭顺行为的话语资源（Harris, 2001; Kampf, 2009）。这样的使用唤起了对语用过程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的关注。

8.6 结　语

正如上面的概述所说，话语语用学是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出现的，它融合了来自不同研究传统的见解和分析工具，同时保持了研究语言使用和意义制造的基本的语用定位。这样的定位可以说源自于语用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其一是**作为社会行动的语言使用**的观点；其二是**作为持续意义制造的语言使用**的观点。这两个假设概括了语言交际的主要特征，并与“话语分析”下不同次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共振。

8.6.1 作为社会行动的语言

将语言使用作为社会行动而不是自治系统的观点，是当代话语分析背后的主要驱力。由此，比如对批判性话语分析者来说，语言因其在操控社会现实中作为政治力量的工具而值得关注，而对于会话分析者来讲，互动中的语言是社会现实得以建构和维持的主要过程（同样参见吉瓦尼和里查德森撰写的本书第 12 章）。

将语言使用作为社会行动这一视角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对语言使用的动机性本质的强调，将对话者当作**有目的的和负有责任的**社会行动者。于是，对话者被看作是由太多考虑有意无意驱动的，涉及对理解的认知限制的注意到人际义务如顾及面子（例如，在对礼貌策略进行选择时）。[8]【159】对话者同样被看作是需要对社会契约负责的，要遵守特定的条件比如真挚，以获得成功（Searle, 1969），也需要遵守合作这一基本社会契约（Grice, 1975）。在后来的语用学理论中，这个概念得以拓展，包括了语言使用的道德和伦理方面（Mey, 2001）。

将语言使用看作社会行动这一观点，使得我们要承认语言使用的**多功能性**。对语用学中的多功能性的最早见解是与这样一种观察相联系的，即一种言说基于不同的使用条件可以满足不同的言语行为，但后来为了更细致地考虑语境和共文（co-text）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由此拓展了早期的见解。比如，克拉克和卡尔森（Clark and Carlson, 1982）指出，对于不同的接受者角色，同样的言说可以满足不同的言语行为。特别是在政治话语的案例中，言语行为可能是非常模棱两可的，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产生不同的效果（Bavelas et al., 1990）。

8.6.2 作为意义制造的语言使用

意义生产在语用学中占据的中心位置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即话语天生是多层级的，要求在说了什么和意味着什么之间不断搭建桥梁。有一种共识，意义制造是多维的、中心的，诠释的过程是不一致的。对一些人来说，语用理论呈现的是基于编码的、意义制造的单向路径，通过这一路径将语言使用和诠释理解为根据一系列严格规则对信息进行编码和解码的操作。语用学因此受到了批判，被认为关注个体说者而忽略了其他人的角色，同样关注个体言说，把个体言说看作意义的独立单位（Linell, 199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认为，对人类沟通的对话性和主体性本质的认识，自语用学理论伊始即是其基础，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得到了凸显。从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开始，这一点在关于诠释的语用学理论中也十分明显。合作的测量是相对于“谈话交流的公认意图或方向”而进行的，这被认为是所有参与者都要遵守的（Grice, 1975: 45）。在后期的语用学理论中，**共享意向性**（shared intentionality）这一思想受到了多个研究方向的持续关注。因此，对达斯卡尔（Dascal, 1992）来说，会话是集体行动的真正形式；参与者可能有着不同的个体意向（I-intentions），但所有会话的贡献一定需要遵守共同的我们意向（we-intention），小到参与会话的意向，直到更明确的共同目标。

语用学中对话性的另一方面与互动中后续言说间的关系有关。对意义制造中**序列**的最早关注隐含于奥斯汀（Austin, 1962）提出的领悟（uptake）这一概念中，它承认了听者这一角色。从理论视角来看，序列在格赖斯模式中重要突出，在这个模式中，言说是在由序列中先前的言说而建立起的预期的比照中加以判断的。 【160】

话语的语用倾向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语境**对于我们理解语言使用而言的中心性。然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理论和经验上建构语境[9]。传统的语用学理论的兴趣点在于语言与其直接语境（一般而言是指示性和索引性）和认知语境的联系，这一点可以由种种预设和心理模式标示出（van Dijk, 2006; Levinson, 1983）。语用学中对社会语境的关注因为礼貌理论的建构而加强，在这一理论中社会语境可以通过社会距离、地位和强迫程度这些主要参数来辨识（Brown and Levinson, 1987）。随着语用学者对自然话语产生兴趣，社会语境这一概念获得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和发展，引入了更多的参数，比如情感、社会角色、社会性别和文化身份（如，Blum-Kulka, 1997; Holmes, 1995）。而且，话语语用学从原来将语境仅仅看作是既定的、决定语言使用的概念，转向以更为动态的、互惠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语境交谈和语境文本的关系。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语境是由互动同时假设和建构的：一方面，对已有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意识告知参与者如何语言使用；另一方面，社会角色和地位通过互动被再协商和建构（同时见，吉瓦尼和里查德森撰写的本书第12章）。后来关于可索引性的研究特别继续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Hanks, 1996）。

对话语序列的研究（包括书写的和口述的）引发了上文对语境探讨的另一个方面，也即揭示出话语结构、期待和诠释的文本和谈话的**序列组织**（sequential organization）。如上分析表明了互动的序列排位和逐步呈现是如何揭示出意义制造的。在此未予说明的另一方面是，文本和谈话的总体宏观结构及其内聚力及连贯性（Brown and Yule, 1983）。

将所有这些方面纳入考虑，在话语语用研究中，语境作为一个多维度概念而被考察，包括背景、认知语境和共有知识、社会文化语境，还有话语序列（Hamo et al., 2004）。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语用学对我们理解语言使用的贡献代替了话语分析的特定模式。当然，它提供了有关文本和谈话中意义制造的一种功能性的、多层次的、社会语境化的、互惠的和浮现式的视角。因此，语用学最好作为传播学理论来进行解释。

在此我们感谢图恩·梵·迪克（Teun van Dijk）、塔利亚·哈比卜（Talia Habib）、谢娜·基西莱维兹（Sherna Kissilevitz）、佐哈尔·坎普弗（Zohar Kampf）和埃尔达·韦茨曼（Elda Weizman），他们为本章的较早版本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注 释

[1] 关注语用学理论的语言哲学家（例如 Kasher, 1998; Recanati, 2004）一直持续发展着这一研究脉系。

[2] 在早期的提法中，格赖斯（Grice, 1975）区分了语句意义和“表达者意义”（utterer's meaning）。后来他引入了中间层面，搭建了说者意义和语句意义之间的桥梁，称之为“一种表达类型的永恒的应用意义”，意即该表达通常负载的脱离语境的意义（Grice, 1968）。这一层面在后来的提法中被标示为“表达意义”（utterance meaning）（Dascal, 1983）。

[3] 含义（implicatures）的这些类型在格赖斯（Grice, 1975）对会话含义的类型分类中属于“A 组”；莱文森（Levinson, 1983）针对这个组，引入了“标准”这一标签。

[4] 奥斯汀还提出了第三类行为，叫作**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将**表达**对**听者**起到的效果具体化。在言语行为理论化中，言后行为所受关注相对较少，仍处在界定之中（相关讨论参见 Gu, 1993）。

[5] 译自希伯来语原文。序号表示其在所有互动的原抄本中的排序。转录的惯例用法：[词语]——重叠部分；((评论))——转录员的评论；词语 ::——声音拉长；° 词语° ——低音量。

[6] 译自希伯来语原文。序号表示其在所有互动的原抄本中的排序。转录的惯例用法：(2.9)——停顿时间，以秒为单位；((评论))——转录员的评论；词 :: 语——声音拉长；=——长闭；词↑语——音调直升；> 词语 <——快节奏；词语——强调。参看数据搜集的完整讨论和转录方法，见 Hamo, Blum-Kulka and Hacohen, 2004。

[7] 对话语语用学的兴趣日益增长的另一领域是通过自然数据探索语法和语用的交互作用（Ariel, 2008）。这一议题通常是在与话语标识的关系中进行探索，并包含了基于语料库的分析（Bordería, 2008; 同时见 Maschler, 2009）。

[8] 在批判性话语分析中，这种语用学定位，因对语言的非意向性使用所携带的信息包括意识形态意义的节制性表达，而获得了补充，（参见图恩·梵·迪克撰写的本书第 18 章）。

[9] 这一问题在话语分析中一直处于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在会话分析与话语心理学或批判性话语分析之间的辩论中（Billig and Schegloff, 1999）。语用学者并未直接卷入这种辩论；然而，如我们的讨论所示，语用学立场提供了关于语境的最全面的概念。

延伸阅读

语用学的文献非常丰富，包括权威性理论论文、入门教材和新近经验研究。目前对话语语用学的研究多见于《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语用学》（*Pragmatics*）、《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和《礼貌研究杂志：语言，行为，文化》（*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这几份期刊。

Grice, H.P.(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41-58.
一篇展示了会话中的意义制造的格赖斯模式，并含有一些基本的语用学理论假设的论文。

Austin, J.(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这本开创性的著作，虽然不长，但为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基于奥斯汀和其他人的理论，瑟尔发展了迄今为止最详细和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

Brown, P. and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篇权威的、理论的和经验的研究被看作是当代礼貌研究的基础。

Thomas, J. (1995)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对语用学的理解性回顾。

Ariel, M.(2008) *Pragmatics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近期对语用和语法间复杂关系的探索。

Mills, S. (2003) *Gender and Pol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当前对礼貌的重新出现的兴趣和重新概念化的示例。

在线阅读

以下论文可以在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上获取。

Billig, M., & Schegloff, E.A. (199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 exchange between Michael Billig and Emanuel A. Schegloff. *Discourse & Society*, 10, 543-582.

Ekström, M. & Johansson, B. (2008) Talk scandals. *Media,Culture & Society*, 30, 61-79.

Harris, S. (2001) Being politically impolite: Extending politeness theory to adversarial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12,451-472.

参考文献

Ariel, M.(2008) *Pragmatics and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stin, J.(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ch, K. and Harnish, R.M. (1979)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Speech A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ates, E. (1976) *Language and Context: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avelas, J.B., Black, A., Chovil, N. and Mullett, J. (1990) *Equivocal Communication*. London: Sage.

Berman,R. and Slobin, D.(eds) (1994)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A Cross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Study.*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Billig, M. and Schegloff, E.A. (199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 exchange between Michael Billig and Emanuel A.Schegloff'. *Discourse & Society*, 10: 543-82.

Blum-Kulka, S.(1987) 'Indirectness and politeness in requests: same or different? '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 131-46.

Blum-Kulka, S. (1989) 'Playing it safe: the role of conventionality in indirectness'. In S. Blum-Kulka, J. House and K. Kasper (eds),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pp.37-70). Norwood, NJ:Ablex.

Blum-Kulka, S. (1997) *Dinner Talk: Cultural Patterns of Sociability and Socialization in Family Discours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Blum-Kulka, S. (2005) 'Modes of meaning-making in children's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In J. Thornborrow and J. Coates (eds),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Narrative* (pp. 149-7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lum-Kulka, S. (2008) '"If it's my size,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wear it a bit？ ": Israeli children's peer talk requests'. In A. Stavans and I. Kupferberg (ed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anguage Educ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Elite Olshtain* (pp. 23-47). Jeruselem: Magnes.

Blum-Kulka, S., House, J. and Kasper, G.(eds) (1989)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Requests and Apologies*. Norwood, NJ:Ablex.

Bordería, S.P.(ed.) (2008) 'Empirical data and pragmatic theory'.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8).

Brown, P. and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as Brown, P. and Levinson, S.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 Goody (ed.), *Questions and Politeness* (pp. 56-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G. and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rston,R. (2002)*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Chen, R.(1993) '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49-75.

Clark, H.H. (1992) *Arenas of Language U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ark, H.H. and Carlson, T.B. (1982) 'Hearers and speech acts'. *Language*, 58: 332-73.

Culpeper, J. (1996)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349-67.

Dascal, M. (1983) *Pragma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ascal, M. (1992) 'On the pragmatic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 In H. Parret and J. Verschueren (eds),*(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pp.35-5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uff, P.A. and Hornberger, N.H.(eds) (2008)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 8: Language Socialization*. New York : Springer.

Ekström, M. and Johansson, B. (2008) 'Talk scandal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 61-79.

Fetzer, A. and Weizman, E. (2006) 'Political discourse as mediated and public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8:143-53.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New York: Doubleday.

Grice, H.P.(1957) 'Meaning'. *Philosophical Review*, 66:377-88.

Grice, H.P.(1968) 'Utterer's meaning, sentence meaning and word meaning'.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4: 1-18.

Grice, H.P.(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pp.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rice, P.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 Y. (1993) 'The impasse of perlocu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 405-32.

Gumperz, J.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mo, M. and Blum-Kulka, S. (2007) 'Apprenticeship in conversation and culture: emerging sociability in preschool peer talk'. In J. Valsiner and A. Rosa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al-Cultural Psychology* (pp. 423-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mo, M., Blum-Kulka, S. and Hacohen, G. (2004) 'From observation to transcription and back: theory,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nalysis of children's naturally occurring discours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7: 71-92.

Hanks, W.F. (1996)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Hanks, W.F., Ide, S. and Katagiri, Y. (2009) 'Towards an emancipatory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 1-9.

Harris, S. (2001) 'Being politically impolite: extending politeness theory to adversarial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and Society*, 12: 451-72.

Holmes, J. (1995) *Women, men, and Politeness*. London: Longman.

Jucker, A.H. (2009) 'Speech act research between armchair, field and laboratory: the case of complimen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 1611-35.

Kampf, Z. (2009) 'Public (non-) apologies: the discourse of minimizing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 2257-70.

Kasher, A. (ed.) (1998)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Kasper, G. and Rose, K.R. (2002)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 Malden, MA: Blackwell.

Katriel, T. (1986) *Talking Straight: Dugri speech in Israeli Sabra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enan Ochs, E. (1974) 'Norm-makers and norm-breakers: uses of speech by men and women in Malagasy community'. In R. Bauman and J. Sherzer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pp. 125-4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rzon, D. (1998) 'The speech act status of incitement: perlocutionary acts revisited'. *Journal of Pragmatics*, 29:571-96.

Levi-Barzilay (2002, August 23) 'Bleeding hearts, you're growing old'. *Haaretz* (in Hebrew: available at http: // www.haaretz.co.il/hasite/pages/PrintArticle,jhtml?item No=344000 last accessed 2 November 2008.)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S. (2000) *Presumptive Meanings: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inell, P. (1998) *Approaching Dialogue: Talk, Interaction and Contexts in Dialogic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aschler, Y. (2009) *Metalanguage in Interaction: Hebrew Discourse Mark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ey, J.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Mills, S. (2003) *Gender and Pol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gan, J. (1978) 'Two types of convention in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9: Pragmatics* (pp. 261-8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Ninio, A. and Snow, C. (1996) *Pragmatic Development*. Boulder, CO:Westview.

Ogiermann, E. (2009) 'Politeness and in-directness across cultures: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German, Polish and Russian requests'.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 5:189-216.

Parret and J. Verschueren (eds) (1992)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ecanati, F. (2004) '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In L. Horn and G. Ward (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pp. 442-62). Oxford: Blackwell.

Rosaldo, M. (1990) 'The things we do with words: llongot speech acts and speech act theory in philosophy'. In D. Carbaugh (e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ntact* (pp. 373-407).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2.]

Rose, K.R. (2009)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phase 2'.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 2345-64.

Scannell, P. (1996) *Radio, Television and Modern Life*. Oxford: Blackwell.

Scollon, R. and Scollon, S.W. (200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2nd edn).* Malden, MA: Blackwell.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pp. 59-8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earle, J. (1979) 'The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 *Language in Society*, 5: 1-24.

Sperber, D. and Wilson, D.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olson, A. (2006) *Media Talk: Spoken Discourse on TV and Radio*.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Tomasello, M. (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 A Usage 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pdike, J. (1960) *Rabbit, Run*. New York: Fawcett Crest.

van Dijk, T.A. (2006)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1(2)： 115-40.

Watts, R.J. (2003) *Pol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ezman, E. (2008) *Positioning in Media Dialogue: Negotiating Roles in News Interview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eizman, E. and Blum-Kulka, S. (1992) 'Ordinary misunderstandings'. In M. Stamenov (ed.), *Current Advances in Semantic Theory* (pp. 417-3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5】

会话分析：一种分析社会互动的路径 9

Conversation Analysis: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

⊙ 安尼塔·波梅兰茨　B. J. 费尔

9.1 引　言

人类生命中的大量时间被用来与彼此交往互动。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整合自己的活动，并由此构成日常的亲密互动以及社会习俗。我们与同伴结伴步行上班，讨论着即将到来的一天。我们回复顾客致电，告知他项目的进展。我们与同事协调合作，在路面挖坑，竖起新的电线杆。我们给婴儿换尿布，时而停下给他搔痒逗乐。我们在本地超市里购买晚餐食材，小心地避免撞到其他客户的购物车，然后为全家人准备晚饭，以保证他们到家时，晚饭已经做好。我们和妈妈在手机上聊天，聊她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旅行。

更为仔细一点检视一下，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涉及一种行动的进程或行动的序列。和朋友结伴步行上班，其间的谈话可能是由一句问候（“嗨，亚历克斯”）开始的，接着是询问个人近况（“最近怎么样呀？”）。随着交流的展开，其中一个或另一个朋友可能会开始讲述一些新闻（“你有没有听说……？”），获取信息（“那要花多长时间？”），或者对繁重的工作表示同情（“啊，真多！”）——在这一过程中，双方会始终注意调整他们的步伐，从而与对方保持并肩而行。在与他人的交谈中，我们会循序渐进地并同步地调整我们的谈话和肢体动作，【166】这在我们的日常活动中屡见不鲜。从会话分析（CA）的角度来看，这些日常活动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并且正是这些行动和互动，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成为了会话分析的研究重点。[1]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及其同事与合作者伊曼纽尔 ·A. 谢格洛夫（Emanuel A. Schegloff）和盖尔·杰斐逊（Gail Jefferson）在研究中提出了会话分析这一内容。当时，萨克斯正在研究基于日常互动的经验性细节而开展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他无意中获得了打给自杀预防中心的通话内容的录音。他发现，通过这些录音，可以对那些社会科学理应能够研究的日常惯例、世俗行为进行考察，于是萨克斯开始着手分析磁带录音中的互动。从他获得了这些录音材料的那时起，会话分析就应运而生（Schegloff, 1992a）。

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和构成长久以来一直是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而这些领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是无序且几近随机、不合文法的（例如参阅，Chomsky, 1965）。然而，与此相反，萨克斯和他同事们的研究调查却表明，人类实际上会以有条不紊、秩序井然的方式来实践我们的日常行为，已有详尽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此

后的 40 年间，会话分析催生了大量以社会互动的组织为研究对象的严密分析。[2] 本章的目标在于呈现出会话分析的研究项目的基本特征，阐明它的基本分析概念以及一组分析任务，并从会话分析的视角来解释，如何利用这些任务来展开对于材料的处理和研究。

9.2 会话分析的分析程序

会话分析的研究是为了针对自然发生的人类行动、互动所具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基于经验和实证来作出阐释。更详细地来讲，会话分析的目的在于，解释人类在组合日常行动和活动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比如，打招呼是出现在许多场景的常规的行动类型。对此，一个会话分析的分析问题是：社会成员们采用以及通过怎样的行为来共同构成打招呼？比如，“你好”、“嘿”、“嗨”、“唷”，这些话都可以用来打招呼。招手、微笑、动一下眉毛，这些可视的动作也可以用于打招呼，这取决于动作发生的语境。

会话分析认为，行动和互动都与它们自身发生的语境紧密相连、难分难解。行为 / 互动与语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语境在部分程度上由展开的行动 / 互动所构成，而行动 / 互动则会对它们所构建的语境作出回应。在工作场所的初次会面中与同事打招呼，部分地假定了在这一语境中打招呼是恰当的。而采用一种不那么正式的问候方式（嘿，最近怎样呀？），可以反映出问候双方的工作背景以及先前的关系。 【167】

进一步而言，会话分析会优先对参与者的视角进行分析。就其行为的有序和可辨认性而言，参与者是为了对方而展开这一行为的。为了表情达意，参与者必须注意到任何场景或环境中存在的内在偶然性，并且通过动作行为来表明他们对于互动的推进方式及其正在一起做什么的理解和看法。

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有序的、集合的做法，是能够表意的做法。当参与者采取了这些做法，他们就共同形成了一种对于其自身与合作互动者的行为的理解。比如，一个发言者可以通过在会话中首先提出某件事来表达其重要性。他可能会在简短寒暄之后立即引出这一主题，甚至干脆省略寒暄这一步，直入正题。这种做法就暗示了话题的重要性，参与者可以据此来与他人协调，生产和理解他们行动的意义。又例如，通过观察互动对象眼神注视点，互动者可以确定其注意力的焦点所在，通过观察他人，他也可以反观自己的注意力所在。

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可以看作是这些做法和行动的集合内容。正如萨克斯在他的某次讲课中谈到的那样（Sacks, 1992, Vol. I: 226）：“文化是生产可辨识行动的一台装置……”一种文化的成员们在与彼此的互动交流中，分享采用这些做法和行动的能力，以生产出有序的、可理解的行动和互动过程：共同表意。

因此，会话分析将日常的、自然发生的互动实例作为其分析重点。谢格洛夫（Schegloff, 2006: 70）认为这种互动的特点是“主要的、基本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随着人们共同协调他们的行为，他们便构建起了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现存的人类充分调遣人类肢体的能力和资源，来施展行为——因此我们才说“具体的”行动与互动。

说话，显然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所具备的典型能力，许多人类行动与互动的核心要素就是

说话。会话分析兴起之初，以及许多后续的工作，都把解释说明互动中的谈话的条理组织作为重点。在会话分析的相关文献中所讨论的互动构成的基本秩序，最初都是根据互动中的谈话实例而归纳总结的（关于行动，参阅 Schegloff, 1996；关于话轮，参阅 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n, 1974；关于顺序组织，参阅 Schegloff and Sacks, 1973；关于修补纠正，参阅 Schegloff, Jefferson and Sacks, 1977；关于认识主张，参阅 Heritage, 2008；关于互动片段的整体结构，参阅 Schegloff and Sacks, 1973）。

【168】 当互动双方同时出现时，我们可以观察肢体动作、聆听声音，还可以考察眼神、面部表情、手势、身体姿态以及动作所传达的意义之间的关联性。在这个方面，查尔斯与马乔里·古德温（C. Goodwin, 1980, 1981; M. Goodwin, 1980）以及克里斯琴·希思（Heath, 1981）的开拓性研究值得注意。最近，在一些期刊特辑以及著作合辑中可以发现，对于谈话和可视的肢体活动这二者共同进行考察的研究分析有所增多（Jones and LeBaron, 2002; LeVine and Scollon, 2004; Sidnell and Stivers,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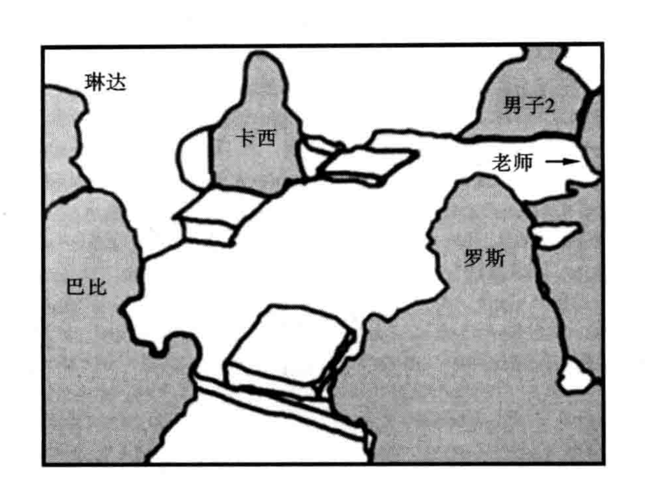
从方法上来说，这些考虑带来了一些特定的建议。由于互动中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与其生产和理解的语境息息相关，因此会话分析的研究是在自然发生的日常生活的情境中进行的。记录的内容是自然发生的行为与互动。这些记录既是分析者可用的资源，也是对于分析者的限制，因此，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查看和回顾这些互动。这些记录对于阅读分析结果的人而言也是一种资源，使得他们能查阅研究员们所用的材料。研究双方都在场的互动，推荐使用音视频录像，而研究电话交谈时，则可以利用录音。因此，截至目前，同步互动是首要的研究重点，尽管人们也不难设想对于非同步的互动所进行的会话分析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技术的发展使这种交流互动方式变得十分常见。

在研究中，通常需要把互动内容作转录文字的处理。这些转录文本详细地记录了人们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以及在相关的时候，可以表示互动的视觉维度。盖尔·杰斐逊（Jefferson, 2004）开发出了一个针对互动中的谈话的转录系统，可为会话分析者所使用。个人研究者也找出一些可以表示他们所研究的互动的视觉特征的方式。转录文本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工具，与记录一起协同帮助分析，使得研究者们能够将行动“冻结”以供更细致的考察。

9.3 分析概念

会话分析的分析文献已经对诸多互动中的组织顺序作了细致地阐释。在会话分析中，有一些研究额外关注这些组织顺序的结构特性，而另一些研究则更关注这些组织顺序的偶发的、互动的产生和管理。在此，我们将简要地考察六项内容：活动与行动（activities and actions）、话轮（turns）、序列（sequence）、修补（repair）、认知（epistemics）以及互动片段的边界。为了说明这些人类互动的常规要素，我们提供了一段有关一个研讨会的片段的转录文本（详见本章附录），会议中有 6 名医学学生和 1 位老师，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示意图如下：

【169】



这次研讨会有视频记录，拍摄会议组员的摄像机位于巴比和罗斯之间。出于其位置和镜头的关系，摄像机并不能在镜头中一次性捕捉到全部组员。因此摄像机的操作者在组员互动过程中使用了摇镜头的拍摄方式，任何时刻都只能捕捉到部分成员的影像。

随着嘉宾的发言和讨论的展开，会议开始了。接着小组休息了一会儿。休息的过程中，会议参与者们针对此前老师已经邀请学生参加的一场晚宴，讨论了具体的安排事项。而就在正式的文本转录开始之前，老师正在告知大家他的住址以及前往路线。学生们正在他们的日历或笔记本中记录这些信息，或者在某个场景中，有人打开了一罐汽水，此时老师正在问："六点半？"（第1行）（烦请花些时间通读附录中的转录文本，在本章剩余部分中我们将会多次用它来说明问题。）

9.3.1 活动与行动

活动与行动是互动的基本构成元素。人们大多是以活动的形式来组织所做的事情，比如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进行一次演讲，或者在研讨会间隙稍作休息。一般而言，一项活动中常常会有一个或多个会话行动的序列。行动指的是参与者们在面对面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做了些什么；他们常常都是按照话轮来进行的（Schegloff, 1996）。比如，邀请受话者共享晚餐、提出会面的时间，询问信息，这些都是本研究的互动中所做的事情或所展开的行动。

行动由诸多实践组成，这些实践是为了行动能够清晰明了地执行。当老师以结尾上扬的语调说："六点半？"（第1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听起来就是"建议受邀客人们到达他家的时间"的这么一种行动。只有一个学生口头应答了，琳达说"好："（Ka：y）（第3行），确认了把"六点半"作为到达老师家的时间的可接受性。而摄像机镜头里可以看见的五个学生中，有四个都开始本子上动笔写字，作为对"六点半"这一提议的回应。这一行为同样可以被看做是确认了这项提议的可接受性。而第五个学生在继续写字。这个例子清晰地表明了，有哪些类型的信息是我们在仅使用音频录音来分析互动时容易遗漏的。【170】

行动可能会在或会通过其他行动的实施而产生（Schegloff, 2007）。在研讨会中，琳达告知了大家她的饮食习惯："我不太吃肉"（第14行）。这一告知，是对于关于饮食禁忌的询问的

一种回答，也可以被认为是在表达希望吃一顿素食，或者也可能是希望一顿饭中有可吃的素食的这种要求。

9.3.2 话　轮

行动通常是轮流进行的，通过"一次一个说者 / 互动者"这种常规惯例来组织结构。研究（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m, 1947）已经归纳了话轮的构成要素（如，话轮的构建单位，TCUs）以及变换互动中占有发言权的一方的种种规则（比如当前发话者选择了下一个发话者）。话轮是互动中的参与者所占有或被分配到的互动的时间段或时刻。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者可以贡献他们的话语。对于许多互动形式而言，在一个话轮内，一次一个人发言。互动的参与者们一般不会侵入他人的话轮，如果强行插入其中，则会受到处罚。对于他者的轮流发言，一般的互动中都表现出了适当的容纳和包容。考察研讨会小组的转录文本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大体上都没有和在场的其他人的发言重合，因此，这就是一次只有一人说话的组织结构的一个例子。但是，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即琳达和巴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发言相互重叠。在紧挨着的前一个话轮中，卡西问："° 尽管如此° 你们还是会吃鸡和鱼？"（第 30 行）。这个问题可以被认为是针对巴比和琳达两个人提出的，因为在之前的话轮中，他们都说自己不怎么吃肉。因此他们发言时似乎并不是相互有重叠（第 31—32 行），也不被认为是对彼此的打断（参见 Lerner, 2002）。

9.3.3 序列组织

随着时间发展的行为的组织是会话分析的一个核心的研究旨趣。互动者针对互动的发展特征或有序的组织，展开行动。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展示了对于先前行为的理解，也反映了与接下来应该采取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表明接下来不必再行动（Schegloff and Sacks, 1973）。比如，卡西在"° 尽管如此° 你们还是会吃鸡和鱼"（第 30 行）这句话中显示出了对于巴比和琳达的讨论的欣赏，他们说他们都不太吃肉。卡西也引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即琳达和巴比将会吃鸡和鱼。她提出的这种可能性便与肯定或否定卡西所提议的回答产生了关联。琳达和巴比都肯定了卡西的假设，但琳达和巴比的确认并没有与某种下一步的行为发生关联。类似卡西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开启式行为，虽然他们也与之前的行为有关。而类似琳达和巴比的确认可以被认为是回应式行为，尽管它们同样也有可能会蕴含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行为的暗示，即使不是特别详尽。

【171】

9.3.4 修　补

在互动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处理、修饰或更正他们自己或其他互动参与者所说的内容。互动者可以区分为两种：一是更正自己本身说的话（自我 - 修补），二是更正其他参与者说的话（他人 - 修补）。修补通常发生在可修补内容的三个话轮之内。琳达的话"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太爱吃肉"（第 13—14 行），就是同一话轮之内的自我 - 修补现象的一个例子。琳达的这

番话在完整表述之前起了三次头。前两次被她自己突然中断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和老师在同时说话。在第三次尝试时她完成了要说的话，尽管作了一些修改。

他人 – 修补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微妙的行为。交谈者们无须自行更正，也可能会发起一系列的修补行为，因此让他人来纠正他或她自己。或者，他们可以在话题转换的过程中嵌入对其他互动者的话语或行动的更正，因此并不会把它作为一种修正暴露出来。

9.3.5 认知顺序

互动参与者会倾向于使用他们认为自己和他人有权、需要或禁止掌握的知识。赫里蒂奇（Heritage, 2008）将这种倾向作为一种认知的顺序。比如，通常人们被认为一定了解有关他们自身的某些事务，而这种期待会表现在行为之中。在研讨会上，当老师问到有没有哪位同学有饮食禁忌的时候，他假设所有的同学都应当知道他们自己的饮食禁忌。他并没有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有无饮食禁忌，而是他直接就问：“>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第 7 行）

参与者在互动中引入的知识同样也可以表明某种相关关系（Raymond and Heritage, 2006）。比如在琳达和巴比将他们自己描述为“不太吃肉”之后，卡西毫不含糊地说“°尽管如此° 你还是会吃鸡和鱼”（第 30 行），此时她的话就好像是她了解琳达和巴比以及他们的饮食习惯一样。进一步来说，卡西说的这句话好像是可以代表琳达和巴比的意见一样。

9.3.6 互动片段

【172】

互动以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方式进行开头与结尾（Schegloff and Sacks, 1973）。互动往往以问候开始，以再见结束，并把这些作为互动的边界。像研讨会这样的互动中，同样可以有这种以类似方式开头和结尾的分片段，同样用于区分不同的互动类型。在上述医学研讨会中，老师提议结束对晚餐聚会这一话题的讨论，将关注点重新回归到研究会内容，他说：“嗯，我们还没有讨论黑板上的这位女士吧，是吗？”（第 86 行）在讨论完晚餐聚会之后，老师把注意力重新转向了病人（“这位女士”），她是接下来的会议中要讨论的内容。

9.4 分析工具：分析之初要展开的任务

会话分析关键的出发点在于，观察所录制的互动中的种种现象。观察可以基于各种研究兴趣点。这种决定了观察视角的会话分析的分析旨趣具有其目的：在互动中，为了理解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为了达成行动或活动，人们会采取并依赖某些做法，而分析旨趣的目的就在于增进我们对于人们的这些做法的理解。

表 9.1 中所列任务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开始分析时的步骤，以及指导分析者的研究观察。他们引导观察者仔细审查发生在某段边界时间内的互动行为，比如，在某人的话轮之内，或者是在话轮转换的时候，然后再转而考察另一个边界时段内的行为。我们在某个边界时间段内所要考

察的内容，包括归纳行动的特点，思考它们如何纳入更广的行动序列，分析这些行动如何达成的，思考这些行为是如何与之前的行动发生关联，如何预测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行动，呈现出行动之间互动与合作的方面，指出那个行为的角色以及所暗示的关系。这些任务的目的在于对用于完成与识别行动以及确立角色和关系身份的做法进行分析。

【173】

表 9.1 分析任务序列

任务 1	选择一个行动序列，考察、确定开头和结尾	
任务 2	选择序列中的一个话轮，以作细致地分析	
	任务 A	归纳这个话轮中行动的特征，思考它们是如何纳入行动序列之中的
	任务 B	描述这一行动开展的方式方法，思考使用这些方式所传达的意义
	任务 C	描述取得、保有以及转换话轮的方法，思考使用这些方式所传达的意义
	任务 D	思考互动者们设定身份、角色和关系的方式
任务 3	选择该序列中的其他话轮，对每个话轮按照任务 A—D 的方式过一遍	

9.5 分析任务示范

任务 1：选择一个行动序列，考察、确定开头和结尾

在看视频录像或听录音时，先确定参与者们正在进行的活动。通常，在一个活动中会有一个或多个会话行动的序列。选择其中一个行动序列作进一步观察。你可以出于任何原因来选择某个序列：或许是因为你在这个序列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可能是因为你对这种行动类型格外有兴趣，也许是因为你希望从整个活动开始就进行观察，看它如何发展，又或许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行动相对而言比较完整，还可以是因为你想从一个音质、画质都清晰的片段开始分析，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些新颖有趣或者话题性强的行动序列比较吸引你。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研究者所得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与个人对于序列的选择并无关系。

在选择了一个序列之后，查找它可识别的边界在哪。为确定序列的开始之处，要找出其中的某个参与者发起行动的那个话轮。要确定序列的结尾，需要一直顺着互动的发展，直至参与者们不再详细地回应那个行动为止。[3] 我们要将每个序列的开头与结尾看作是协商的产物。虽然互动的一方可以提供某个开头或结尾，但是通常只有取得了其他协同互动者的同意，这个开头或结尾才算全部达成。

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序列，老师 / 主人正在试着确认是否有学生 / 受邀的客人有饮食禁忌。整个序列的内容展示在附录之中。要确定该序列的开头位置并不难，因为老师 / 主人所开启的新的话轮，与之前的序列是分离的。[4] 前一序列由两个行动组成：老师 / 主人建议到达的时间（第 1 行），学生们 / 受邀的客人们以口头应答“好：”（第 3 行）以及 / 或用笔记下该时间表示赞同。此处存在一个 6 秒的间隔，期间老师 / 主人喝了口苏打水，学生们 / 受邀的客人们继续在面前的纸上写字。在这 6 秒中，前一序列在潜在中已经结束了，没有哪个成员想要继续，也没

有哪个成员发起一个新的序列。

在这个互动时刻之前，老师提出了一些关于聚会的地点和开始时间的信息，学生们 / 受邀的客人们以口头和 / 或记录的方式表示了认可。老师 / 主人随后完成了一个话题 / 序列转换——【174】他放下自己的苏打水罐子，说了第 5 行的那句话（“嗯：：啊：：好的”），暗示他将转而进行下一个活动（在教室里面可以意味着，中间休息的结束，教学活动的继续进行），但是，随着他的这一转换标志的结束，他又继续进一步讨论起聚会的事宜，这次是要从学生们 / 受邀的客人们那里了解可以作为聚会上供应的食物的这些信息。而询问是否有哪个学生有饮食禁忌，这就是我们要仔细考察的这个序列的起始点。

老师 / 主人提出了关于聚会食物选择的这个话题 / 序列的结尾，然后学生们共同结束了它。老师引用一句格言或比喻式的措辞，结束了有关食物偏好的这个序列。“好的，那么这样你们可以有一次全新的体验了”（Drew and Holt, 1999）。在使用了这句比喻之后，他转过身，看着黑板说道“我们还没有讨论黑板上的这位女士吧，是吗？”简而言之，他正在向学生们传达：前一个序列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继续教学活动了。学生们则将注意力集中到黑板上，结束了休息时间，以此协助老师结束了上一个序列。

任务 2：在一个系列中选择一个话轮以详细考察

我们选择了关于饮食禁忌的这个序列中的第一个话轮进行了深入分析（“>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相比从中间部分开始分析，我们从序列的开头开始着手，这样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序列是如何展开的。

1　老师：　六点半？
2　　　　（0.6）
3　琳达：　好：
4　　　　（0.6）
5　老师：　嗯：：啊：：好的
6　　　　（1.0）
7　老师：　>你们当中有谁有<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8　　　　（1.4）
9　巴比：°可能 嗯°
10　　　　（0.6）
11　老师：　不能吃洋葱啊(。)对花生过敏啊(。)
12　　　　　素[食者之类的呀]
13　琳达：［嗯　我不是－我　不是］太－
14　　　　我不太爱吃肉[5]
15　　　　（0.4）

【175】

任务 A：归纳话轮中的行为并思考这些行为是如何纳入行动序列之中的

话轮中的发话者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行动以及不同的序列，在这些序列中话轮起着一定的作用。[6] 首先，我们会把行为描述为信息交换序列中的一个部分，然后把它看作是在征求同意

或反对意见。之后我们讨论了一个更大的序列，在这个序列中信息搜寻行为或许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描述这种信息搜寻行为可能发生的语境。

当老师说“>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的时候，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从听者处**征询信息**。说者**征询**有关聚会的信息的行为，代表了一种转移，即从他之前向听者提供有关聚会信息的行动，转向发起一个新的行动序列。虽然他的话开启了新的序列，但它也和之前的序列和话题有关，因为它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晚宴的安排。询问信息是一种最初的、或者起始的行为，跟接下来的某个具体行为存在关联。听到说者询问信息之后，一般来说，听者们被认为会给出一些受欢迎的信息。

说者的行动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征询信息，但这种行动可以进一步具体展开。对饮食禁忌的询问，是以是否来作答的一般疑问句，所以它寻求的信息就是听者们有无饮食禁忌。也就是说，对于有无饮食禁忌，说者在**征询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虽然这种征询信息的特定形式，与接下来的肯定或否定的行动都有关系，但是这两种行动并不是在序列上等价的选择。在许多依次进行的、互动的情境中，肯定的答复更加直接，否定意见的表达则通常更加小心翼翼，通常包含迟疑、言辞闪烁、解释说明、抱歉等。有趣的是，在我们手头的这个序列情境中，我们会认为否认饮食禁忌的方式将会比较直接，无须深思熟虑，而肯定的回答则会更加详细。肯定的回答之所以会显得复杂，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受邀客人表明他有饮食禁忌意味着什么。

由于听者惯常是根据提问所推断出的或已表明的目的来分析所提出的要求（Pomerant, 1988），因此作为受邀客人的听者可以推测出，主人提问的目的在于，晚宴菜单是否需要进行相应地调整或计划。在这种情况中，肯定的回答可被视为会给主人增添负担。[7]

【176】作为主人的说者看似即将开启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行动序列，与是否需要变更菜单这一决定有关。在寻求是否有饮食禁忌的确认或否认回答时，作为主人的说者看起来是在初步询问，此后有可能会**进一步给出提议**，也就是说这个询问是一种**预先的提议**。询问受邀客人的饮食禁忌，意味着主人愿意根据客人们提出的饮食禁忌来调整菜单，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预先的提议。接下来，如果受邀的客人肯定了自己有饮食禁忌，就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即组织者是否应该相应地调整聚餐中供应的食物，这通常伴随着协商，即“主人”提议应该调整菜谱，而受邀者则表示不需要这样做。相反，否定存在饮食禁忌则无异于对任何聚会菜单都没有意见，并且不需要将序列延长。

另外，作为主人的说者询问是否有饮食禁忌，这个行动的另一个用意在于，有可能可以使受邀的客人**不必犹豫是否要说出自己的饮食禁忌**。波梅兰茨（Pomerantz, 1984a）分析了诸如批评这样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如何被抑制在整个序列的发展过程中，从序列中较前的位置一直推迟，或者在某个序列情境中有所隐瞒，而在另一个情境中才稍有表露。[8] 如果受邀客人假定自己提出的禁忌会迫使主人更改菜单，也就是给主人增添了负担，那么他们也许会不太愿意说出自己的饮食禁忌。作身主人的说者进行询问，这个行动是**为听者提供一个机会**来说出自己的饮食禁忌。当主人询问受邀的客人们的饮食禁忌的时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人们说出自己的饮食禁忌，只是出于对他问题的一种回答，而非一个自发的行为。如果某个受邀的客人说出了自己的饮食禁忌，来作为某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或她只是诚实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而已，而不是拐弯抹角地提出了一个强人所难的要求。

任务 B：描述采取行动所用的方法，思考使用这些方法所传达的意义

当会话分析者在考察参与者展开行动所采取的方法时，他们应该关注手势、眼神、身体姿态、语言表述、相对于之前的话轮的发话的时机，以及使用的物品。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研究：【177】这些不同方面的做法是如何有助于所表达的意义的；它们如何与前一行为关联起来；它们如何塑造或构建受话者的回复。很可惜，老师／主人在他的话轮内并没有被录入视频，因此对于他的话轮前、中或结束不久的时间之内的手势、眼神或身体姿态，研究者们一无所知。有些行动从部分程度上来说是由其所采用的表述方式所塑造的，我们将主要考察这些行动的意义。

询问受邀客人的“饮食禁忌”是什么，和询问他们爱吃什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饮食禁忌”这种表述，询问的是受邀客人不能吃的食物，而“饮食偏好”这种表述方法，询问的是客人们喜欢或不喜欢的食物。“禁忌”意味着所问及的相关食物，对于受话者，不是喜不喜欢吃的问题，而是一种限制，因为受话者们可能会因其而产生消化问题或对其过敏。在“饮食禁忌”之前还用到了“任何”（“>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一词，这意味着发话者意识到了大家可能会说出多种饮食禁忌，并且受邀者们应该知道什么可以算作是一种饮食禁忌。这种表述似乎是在鼓励受话者提出任何与之相符的饮食禁忌。然而，一项关于急性病基础会诊的研究表明，“任何”一词在鼓励受话者表达想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还不如用其他的措辞效果更好（Heritage，Robinson, Elliott, Beckett and Wilkes, 2007: 1432）。[9]

> 医师们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虽然坐诊教材普遍建议使用任何这个词，但它在引导病人说出更多的情况以及减少疑虑这个方面的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似乎“任何”这个词所具有的消极的一面，在微妙地期待着“没有”这个回答，这有可能会打消病人说出疑虑的念头，也就是破坏了问题本身原本想要达到的效果。

基于这一发现，我们想知道，如果使用“一些”而不是“任何”来修饰“饮食禁忌”（“>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是否更能鼓励受邀客人们说出自己的饮食禁忌。

当老师／主人问起学生们／受邀客人们的饮食禁忌时，他还加上了“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定语，他的表述方式是，让学生自己掂量哪些食物禁忌或许会影响晚餐菜单的安排。询问有【178】哪些学生的相关信息是主人应该知道的，这取决于学生自己决定让主人知道哪些信息。这同样表明主人愿意根据客人们的饮食禁忌来调整菜单。它意味着，如果主人不知道客人的饮食禁忌，那么他就无法根据这些禁忌做调整，而一旦他了解了，他就会相应地据此安排菜单。

任务 C：描述人们用于取得、保有以及转换话轮的方法，思考使用这些方法所传递出的意义

老师／主人自发地选择在一个会话情境中成为发话者，且可以认为此前的行动序列已经完成。学生／受邀客人通过口头或者提笔记录的方式，认可了聚会的时间，并且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当老师开始询问饮食禁忌时，两个学生仍然是在埋头写字。老师认为学生在埋首写字之时听见了他的问题，并且没有打扰到他们。

通过询问“>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老师／主人以“你们当中有谁”这种表述指定了其问题的接收者，由此，他的问题至少是面对在场的所有人，邀

请任何一个或多个人来自愿回答这个问题。很可惜，在这一话轮中我们看不到老师／主人注视的方向，我们也许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在向谁发问，弄清他是否在寻找应答者等这些问题（Goodwin, 1981; Kidwell, 2005; Lerner, 2003）。在话轮建构单位（TCU）的结尾，老师／主人为学生／受邀的客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转换话轮的机会，即确认或者否认他们有饮食禁忌。然而，回应者们却没有等到话轮建构单位结束之后再去理解老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在说者的话轮之中就加以理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他们一直都在注意聆听说者的发言。一种方式是直接注视着说话者，说明自己在用心听。在老师提问的过程中，有两个学生采用了这种方法：

老师：你们当中有谁有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男子2：　　　　　　　　　　[看着老师
琳达：　　　　　　　　　　　　[看着老师

男子2在听到“饮食”这一词时开始看着老师／主人，并在该话轮剩下的部分里一直看着他，直到话轮转换处。琳达在刚听到“禁忌”一词的第一个音节时开始抬头望着老师，也是直到话轮转换处为止。通过注视这一行为，这两个参与者展示出在整个话轮中他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老师和他所讲的话上。

在老师／主人完成了他的询问后，出现了一段空挡。1.4秒之后，巴比，仍然低着头，轻轻【179】地发出了“唔 嗯”的声音，并略微摇了摇头。如此，巴比既通过口头语言又以摇头的形式，非常轻柔地否认了自己有饮食禁忌。

而几乎同时（在前一问题提出后约1.5秒），卡西把头向右转，看向琳达。卡西的这一行为，当然是对于老师提问的回应，但它并不是一个与问题内容有关的回应行为。相反，卡西微笑地看着琳达，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卡西在表明，她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让谁犯难。这个行为把琳达认定为问题的相关者，并预料到了琳达要回答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尴尬。如此，卡西的目光和微笑回应了之前的行动，并在不改变行动序列中下一个相关行动的情况下，预期了下一个即将发生的行动。

任务D：思考参与者行使角色和／或关系身份的方式

分门别类是组织知识的一个基本方式（Pomerantz and Mandelbaum, 2005；Sacks, 1992; Schegloff, 2006）。萨克斯（Sacks, 1992）说描述人口的类别系统是“富含推论的（inference-rich）”[1] 由此，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成员们所具有的关于社会的大量知识是以这些类别的形式储存的”（Sacks, 1992: 40）。其中有部分是关于世俗知识（lay-knowledge），也就是在人的类别和该类别所具有的典型活动、行动、动机以及兴趣这两者之间可识别的关联。这种假设的关联可用于解释，人们在做什么以及这些人是谁（他们的身份）。

老师询问饮食禁忌之后，所发挥的互动作用是**指挥协调活动流**。在录像机捕捉到的一系列行为中，在嘉宾离开之后，某一个参与者发起了这场讨论，还提出了会议中场要休息，然后又

1　此处指的是从人所属的类别／身份可推断出其典型活动或行动。——译者注

宣告了休息的结束 / 回到教学研讨中来。由于在研讨会中，指挥协调活动流可以被看作是担任老师这种制度性角色之人的权利和 / 或义务，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该参与者扮演着老师的角色。所有角色的扮演都需要共同参与或者某种形式的认可。学生们遵从老师开展和结束系列活动，毫无违抗旨意，这就是一种对于老师指示活动进程的权利的认证。

说者所扮演的另一个互动角色是信息给与者（这与接下来聚会晚餐的事宜有关）。说者提供了他的家庭住址、行车路线，敲定了受邀客人的到访时间，并向他们征询了饮食禁忌方面的信息。由于这些活动与主人这一身份类别紧密相连，通过操持这些，老师在那个时间段中扮演着聚会主人的角色身份。[10]

在转换话轮处老师 / 主人询问结束，卡西展示了自己与琳达之间亲密的关系。一听到老师 / 主人的询问，她就抬起头并看向了琳达，并微笑着。以这种方式，她表明了自己听到了老师的问题，且这个问题与琳达尤为有关，因此也表现出她对琳达的饮食习惯有一定地了解。她的微笑，表明她有这样的一种估计，即对于这个问题琳达可能会有些为难。她站在琳达的角度上思考，说明她不仅了解琳达的饮食习惯，还明白这个问题使得琳达有些尴尬，因为她确实有饮食禁忌但是却不想告诉主人，以免给他添麻烦，尤其是这个主人还是她的老师，或许出于此她更不愿意说出来。 【180】

任务 3：选取序列中的其他话轮，针对它们按照任务 A 到 D 再考察一遍

我们选取了老师的下一个话轮作为焦点话轮。

任务 A：识别行动。思考它们是如何纳入行动序列之中的

当老师 – 主人说“不能吃洋葱啊（。）对花生过敏啊（。）像素食者之类的呀”，该行动是在**阐明**他所说的饮食禁忌是什么。通过举出一些饮食禁忌的例子，他阐明了什么是饮食禁忌。给出这些饮食禁忌的例子，是因为老师认为他之前提出的关于饮食禁忌的问题，需要进行解释说明。修补序列是由学生 / 受邀客人没有充分作答而引起的。说者稍作解释，其所暗含的意思是，他认为无法作答的原因可能是大家并不明白他说的“饮食禁忌”是什么意思。在下一个话轮中听者的表现，可以说明说者的解释是否起了作用，因而这些解释与听者的表现关联了起来。而一旦学生 / 受邀客人给予了饮食禁忌的相关信息，修补序列就结束了。

老师 / 主人说“不能吃洋葱啊（。）对花生过敏啊（。）像素食者之类的呀”这句话时，所采取的另一行动，是在**提示**学生们回答——依次地，与之前的话产生联系。把这些所列举的内容理解为饮食禁忌的具体示例——也就是之前话轮中的问题所在，这决定了这些内容之间的连贯。提示这个行为是在说，目前为止的任何作答都不充分和 / 或不能令人满意，并意味着仍然有待一个充分的和 / 或令人满意的回应。它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提示者仍然在等待一个有关的回答。

任务 B：思考行动展开的方式

老师 / 主人通过列举饮食禁忌的类型，作为他想了解的信息的示例，以此阐明了他之前的话。说者对前两个示例的表述方式是，这不是个人的喜好或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些个人必须屈从的限制，与其愿望、偏好或口味无关。在第一个例子当中，“不能吃洋葱”，“不能吃”这种说 【181】

法关注的是客人无法安然下咽的那些食物。在他的第二个例子当中，“对花生过敏”，“过敏”一词意味着，他在问听者是否有什么食物吃了以后会危及他们的健康。而他所举的有关饮食禁忌的第三个例子，是“素食者”。素食主义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选择，一般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往往伴随着一种作为支撑的、道德或伦理的决心。这些例子包含了老师/主人之前所说的“饮食禁忌”这类他要了解的信息的具体涵义。在这三个例子之后，老师/主人补充道“任何类似的东西”，以这种方式强调了他已经给出的例子，并且表明这些例子并没有穷尽所问及的食物禁忌的所有类型。它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受邀客人们说出一些除此之外的忌口类型。

关于提示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老师/主人首先就饮食禁忌举例，一个一个地说出来，并且给学生们提供了说出自己是否有任何饮食禁忌的机会（如果想要进一步探讨所用到的方法，请看接下来任务 C 中的讨论内容）。

任务 C：思考取得话轮的现象

在完成最初的有关饮食禁忌的提问之后和开始举例说明/提示之前，老师空出了 2.5 秒的时间等待回应。由于他初次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地回答，他以列举每一个具体内容的方式继续寻求答案，这些具体内容便可以是一个个的话轮建构单位（TCU）。他把第一饮食禁忌的例子称为“不能吃洋葱”，以一种根据清单点名的语调，并且说完之后稍微停顿了一下。这种做法（点名语调外加停顿）可以看作是在向受话者发出邀请/机会来作答，同时也在暗示大家可以多说一些别的。在这个可能发生话轮转换的地方，并没有学生/受邀的客人开口回答。

老师/主人接着举出了第二个饮食禁忌的例子，“对花生过敏”。这个例子也在已有的菜单中，短暂的停顿，给学生和受邀者提供了一个回答的机会/邀请大家回答。

在老师给出了第二个饮食禁忌的例子之后，两位学生/受邀客人，卡西和琳达，确实对关于饮食禁忌的问题作出了回应。虽然表面上，卡西和琳达是在“素食者”的第一个发音出来之后作出了回应，但是我们发现，这更可能是针对“对花生过敏”这一点，在其说出之后所作出的慢了一拍的回应。

【182】

老师：[不能[吃洋[葱，（。）[对花生过敏，（。）素[食者任何这之类的
卡西：[看着琳达　　　　　　[注视老师　　　　　　[摇头
琳达：　　　[看着老师　　　　　　　　　　　　　　[嗯 我不，我不太，
巴比：　　　　　　[注视老师

正如之前所讨论的，在老师/主人开始关于饮食禁忌的提问后，卡西转头微笑地看向琳达。在老师列举第一个例子（“不能吃洋葱”）时，卡西接着继续看着琳达。当老师举出第二个饮食禁忌的例子时，卡西注视着老师。正当老师开始举第三个例子时，卡西摇了摇头，表明自己没有什么饮食禁忌。这是一个与最初的问题的条件相关的回应，没有使用口头语言，示意她没有饮食禁忌。

有两点对于我们而言非常值得注意。第一，虽然卡西可能很想知道琳达对这个问题作何反应，但是老师/主人继续用例子提示大家，促使或提示了她表现出，她正在听他讲话。她通过看着老师传递了这个信息。第二，在回答老师提出的饮食禁忌的问题之前，她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他。回应他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在准备开始回答的时候注视着他。

当老师 / 主人完成了他的第一个提问后，琳达正在吃东西。经过了 2.5 秒的停顿，她咬了一口并嚼起来，但是接着摆出了一副姿势。她把手放低到膝盖处，稍微地蜷下身子，抬起双眼，抿嘴微笑。对于这副神态的特点的最恰当的表述是“对于我不得不说的话，我感到不太舒服”。从老师 / 主人开始举第一个例子时她望向老师 / 主人，直到她开始回答问题，这期间她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这当中有几点内容值得注意。首先，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初次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的 2.5 秒停顿中，老师 / 主人正在看着谁，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到（根据卡西转头看向琳达并且微笑，以及琳达多少有些奇怪的姿势和表现），他可能已经觉察到学生的回应包含着一些敏感情绪。这种敏感情绪可能与确认饮食禁忌有关。他所作的提示可能是对于第一次提问后缺乏令人满意的回答所作的回应，以及 / 或者是基于他观察到的蛛丝马迹，即有一些还没有说出的话，使得相关学生 / 受邀客人感到不太自在。其次，不太情愿可能会表现为久不作答，然后说话支支吾吾、闪烁其词，等等。不情愿（并且因此作一些不太喜欢做的事：Pomerantz, 1984a）的部分表现形式，可能包括那种咧嘴而笑和不自在的面部表情，或将身体稍微蜷曲，等等。

任务 D：思考角色扮演和 / 或关系身份

老师 / 主人的行为，是在表明扮演了一位随和的主人的角色。具体来说，首先他询问受邀客人的饮食禁忌，接着，在没人回应的情况下，他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当他表示要修改菜单：“我和格拉迪斯每周至多吃一次肉（。）因为我们也很素食主义（0.5）所以我们十分愿意把它改成素食餐”，这个时候，主人这一身份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具体表现是：迟迟不愿表明自己有饮食禁忌，并且在之后的相关回答中躲躲闪闪。

【183】

主人和那些有饮食禁忌的受邀客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11] 如果主人对于饮食禁忌的问题采取的是主随客便的做法，那么有饮食禁忌的客人则会显得有些添麻烦。经过主客之间细致贴心地讨论与协商，其中双方都以适当的身份表明立场，讨论的结果是，主人将会供应牛排，这对于有饮食禁忌的学生们 / 受邀客人们的一个“新体验”。

9.6 结　论

本章中我们的目标是给读者们介绍一些会话分析中的核心前提和概念，以及帮助读者开始分析社会互动的一组任务。在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我们将重点阐释两部分内容。第一，我们把本章中所介绍的分析任务定位为，个人在分析之初可以使用的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第二，我们对于分析者如何在本章所述的分析任务之外来展开分析，我们将给出建议。

9.6.1 可用于初始分析的其他路径

根据谢格洛夫（Schegloff , 1996）的研究，克莱曼和吉尔（Clayman and Gill, 2004）提出了两种分析数据的路径：从留心观察开始以及从一个情境中的行动开始。从留心观察开始分析，他们是指，当分析者已经注意到在互动中的某处的某个说者的说话做事的方式之后，他或她应

该要思考的是，通过这种言 / 行方式，他达成了什么行动，以及这种言 / 行方式如何能够推进互动的发展。而从情境中的行动开始，克莱曼和吉尔是指，在分析者已经归纳出在互动中某处的一个或多个已完成的行动的特点之后，研究者应该探索这一行动本可以采取的不同方式，并且思考这些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对后续的谈话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于社会互动的研究者而言，有大量的现象值得关注，因此研究观察可以从诸多领域展开。克莱曼和吉尔（Clayman and Gill, 2004）认为，互动现象可以在多种不同的层面进行观察和分析【184】每一个层面都可以说明活动和行动达成的潜在过程。这些层面分别是活动框架、离散的行动序列、异常的行动、特定的词汇选择，语调变化、非口语行为，以及谈话的话轮中所调动的其他话轮组成部分。

可供我们观察的互动现象的种类有许多，如果能够鼓励初学者们专注而技术性地进行观察，他们将会受益良多，秉持着这么一种假设，勒纳和谢格洛夫在会话分析高级研究院连续多年展开的数据分析中，提出了这么一种被他们称为“关键点”的研究方法。当我们单独使用或者混合使用这些**关键点**时，它们就是一串可以用以“解锁”互动片段的分析兴趣点。在这里主要包括：话轮组成成分的顺序性连接；序列 – 组织的联系；转换空间的做法和行动；人称指代；言语表述；同一话轮中的中修复的起始；重叠的发生，决心，以及后果；沉默；笑声与话语中夹杂的笑声。

9.6.2 展开对实践的分析

对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说了和做了什么进行细致描述，并不等于对参与者为达成一个行动所展开的**实践（做法）**进行分析。一种针对实践的分析模型，应该要能够使人们可以成功地运用这种实践去完成一个行动。这涉及了一个转变，即不再讨论某些具体的人在所处情境中做了什么，而是要去思考，人们应该知道和做些什么，才能在任何新的情境中也恰当地采取行动。在理想的条件下，这应该包括：描述完成这项行动的方法；实践所展开的互动环境；相关作答的选择；与采取这一做法（实践）有关的权利和限制；可能的角色 / 关系含义；或许还包括将该实践的功能与其他可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方法进行对比。

为了提供一种对于从最原始的观察到分析实践的这一转变的一些思考，针对本章中所讨论的两种出现于互动序列之中的可能的实践，我们将会给出一些评论。其中一种可能的实践，涉及运用例子来追寻回应；另一个可能的实践是，以表现出自己为对方预测到某种互动难题来展示一种亲密关系。

9.6.2.1 运用例子来追寻回应

回顾一下，当老师 / 主人在说“不能吃洋葱（。）对花生过敏（。）素食者任何这之类的”这句时，他正在通过举一些可能是之前关于饮食禁忌的那个问题的答案的例子，以得到相应的回答。他一个接一个地为大家举例，因而为受话者创造 / 提供了一个回应的机会。

对于当听者的初次回复没有立即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时，说话人继续追寻答案的那些做法，波梅兰茨（Pomerantz, 1984 b）在研究中进行了分析。在那一情境下，一种用以获得同意或异议的方式或行动，就是阐明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在波梅兰茨的数据当中，通过将初次陈述中的指【185】示代词，在接下来的表述中替换为一个解释性名词，发话者得到了受话者的同意或不同意的表态。

在我们所考察的例子当中，老师 / 主人通过连续给出几个受邀客人们可能有的饮食禁忌的

例子，来进一步追寻回应，也就是说，他为回答问题者提示了可能的答案。我们想知道的是，当说者有理由相信听者不愿意透露所需的信息时，他是否还会采取这种追寻回复的办法。在这里，我们希望能搜集到更多追寻回应的例子，并且比较它们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比较使用它们的环境。我们同样想知道，在不同类型的序列情境中寻获回应时，眼神是如何发挥作用的（Rossano, 2009）。

9.6.2.2 预期互动交流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来拉近关系

回想一下，当老师 / 主人问道“> 你们当中有谁有 < 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卡西看向琳达并微笑。通过这种方式，她表现出，她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可能给琳达带来的困扰，并且她可以站在琳达的角度上思考这个问题，她对琳达的饮食习惯有几分了解，她也知道她会在互动中如何处理她的饮食习惯问题。简单而言，这似乎就是一种表明自己与对方亲近关系的做法。

德鲁与奇尔顿（Drew and Chilton, 2000）研究了家庭成员之间只为保持联系而定期拨打的电话交谈，并界定了参与者在首个话题处所使用的三种短对话类型：参与者会说一些在身边所处环境中的“所注意到的事”；他们也会自己讲述，或者引用别人的话来讲述当天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会询问上次说过的一些事件或遭遇有无新的进展。关系的达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一个人先有所表示，而第二个人认可或者拒绝这种示意，波梅兰茨和曼德尔鲍姆（Pomerantz and Mandelbaum, 2005）确认了四种有助于构建这种互惠友谊的口头行为：P1 询问 P2 生活中发生的具体事件，P2 提供了更多的关于那个事件细节；P1 说了一些他 / 她自己的问题，而 P2 表现出其对 P1 的问题很关心；P1 从侧面提及了一些与 P2 共同的经历，P2 则进一步深入谈论了那些经历；P1 用词不当，P2 也顺势用了其他不当的表述以及 / 或笑声。

除了前述学者们提出的这些暗示关系的语言活动之外，我们认为，目光注视和对目标对象微笑，预测他 / 她会如何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和作出反应，是另一种表明一个人具有作为“朋友”这类人所具备的知识、权利以及义务的表达方式。在卡西和琳达的例子中，在老师 / 主人询问有关饮食禁忌的问题之后，琳达确实笑了，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她是否看见了当她在笑的时候卡西正在对着她笑。

作为本章的结尾，我们应该注意到分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包括转录、观察、发现更多潜在的有趣现象，等等。随着你继续看或听所录下的互动内容并且注意观察时，你最初的分析想法会逐渐地成形、成熟。没有谁，包括卓有经验的会话分析学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就作出完整彻底的分析。这种类型的工作必须要有一系列的修正和细化的过程。事实上，本章中所涉及的论证分析就涉及了这种缓慢推进的工作，本书当前发行的这个版本与我们早前的版本在选材方面有许多的不同，以后还有可能会有修改。总的来说，探寻发现互动现象，以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待互动，正是这些所带给我们的愉悦和乐趣，不断使我们重新仔细检视社会生活的种种行为。【186】

本章作者要感谢威廉·赫森（William Husson），他对本书早期版本中的这一章节给出了有建设性的评点与建议。我们还要对柯蒂斯·勒巴伦（Curtis LeBaron）表示感谢，他允许我们在阐释的过程中使用他的数据。

附　录

"饮食禁忌"

1　老师：六点半？

2　（0.6）

3　琳达：好：

4　（6.0）

5　老师：嗯：：啊：：好的

6　（1.0）

7　老师：>你们当中有谁有<任何饮食禁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8　（1.4）

9　巴比：°唔 嗯°

10　（0.6）

11　老师：不能吃洋葱（。）对花生过敏（。）

12　素［食者任何这之类的］

13　琳达：［嗯 我不是－我不是］太－

14　我不太爱吃肉

15　（0.4）

16　巴比：我也不

17　（0.2）

18　巴比：>但是我<

19　（1.8）

20　琳达：我觉得心里很舒服每当巴比－=

21　这以前［嗯也发生过对吧？

22　巴比：［. 嗯　［呵呵

23　琳达：不

24　（1.2）

25　琳达：我们不是一个小组的［之前

26　巴比：［唔 嗯

27　（1.2）

28　琳达：我总会觉得好受些如果小组内还有别人

29　也不吃肉的话

30　卡西：°尽管如此°你还是会吃鸡和鱼

31　琳达：［嗯嗯

32　巴比：［噢是啊

33　（0.3）

34　卡西：只要不是°猪肉和牛肉°

35　老师：不吃红色的肉（。）好的。

36　琳达：°是的°但是如果（。）你想做这些

37　［还有其他东西

38　卡西：［猪肉是另一种白肉

39　琳达：像沙拉和其他我可以就（0.6）我丈夫（2.0）他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嗯

40　老师：我想她正准备要做一个叫做弗拉芒啤酒炖烤肉的食物，是种

41　比利时菜，不过里面有牛肉

42　（0.6）

43　琳达：那没关系的。我的意思是

44　（1.3）

45　老师：不是牛排

46　（1.0）

47　琳达：没有关系。我真：的－（0.4）我的意思是我不－（1.0）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看你

48　以前吃过羊肉对吧

49　巴比：°嗯嗯°

50　（0.5）

51　琳达：我们在这方面都有点矫情

52　老师：那么

53　卡西：呵呵［呵呵呵

54　老师：我和格拉迪斯一周至多吃一次肉。因为我们

55　也相当素食。

56　（0.5）

57　老师：所以我们十分愿意把它改成素食的

58　（1.5）

59　琳达：噢：：，我并不想要您那：么做

60　（2.2）

61　琳达：我不－我不是－我不是因为宗教或者什么类似的关系我［只是

62　老师：只是不喜欢

63　（1.0）

64　琳达：不是，我甚至不是不（0.6）喜欢它。

65　罗斯：啊。既－既然你说－如果你说你要做热狗或者什么

66　你知道的食物那么它将会

67　［（改掉）］

68　琳达：［是的我不喜欢［热狗（（笑道））

69　罗斯：但是既然你说嗯，你在做这道

70　　　美味的比利时菜
71 琳达：[像有这个[名字的比利时菜并且我已经
72 罗斯：　　　　[是啊是啊
73 琳达：从来没吃过听起来很不错((笑))
74 罗斯：现在现在素食主义者们都无所谓了
75 卡西：做这道比利时菜！
76 罗斯：对！
77 男子(笑)
78 罗斯：换句话说
79　　　((组中大部分人都立刻大笑或说起话来))
80 罗斯：((我们需要)食肉动物)
81　　　(更多夹杂在一起的笑声和说话声)
82 琳达：(……一次使用塑料或类似东西的机会)
83 卡西：((笑))
84 老师：好的那么你们可以有一次全新的体验了
85 卡西：笑
86 老师：嗯：那么 我们还没有讨论黑板上的这位女士吧，是吗？
87 男子：唔 嗯
88 女子：嗯　啊　嗯　啊
89 老师：那么我们可以从这里重新开始讨论。

注　释

[1] 会话分析(CA)，作为在此处讨论的研究传统的名称，其实有些用词不当，在考察某些现象时容易给人带来困惑。非正式的(比如，会话的)和正式的(比如，机构的)互动都属于会话分析的研究范畴。谈话，包括诸如语调与停顿以及可视的肢体动作等的副语言特征，都包含在会话分析的研究中。会话分析关注的是，在不同的生产和理解的环境和形式(视觉或听觉的)中，丰富的人类行为是如何组织的。

[2] 请参看延伸阅读(第 166 页，原著第 186 页)中这些拓展文献的示例。

[3] 当参与者采取一个新的行动，并回应之前的行动时，他们的协同参与者通常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由于开启一个新的行动序列或者回应一个之前的动作，这是能够被互动者识别的，因此分析者也可以识别这一点。

[4] 有时候，要确认一个序列的开头可能并不容易，因为话题的转换可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话题的转折点上，一个话轮既可以与前一个话题 / 序列相关又可以与下一个话题 / 序列相关(Jefferson，1984)。

[5] 在记录中，我们把参与者的身份定位为“老师”，并且为了便于阅读以及理解场景，我们给学生用了化名。不过这并不是说被我们称为“老师”的这个人一直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在说话。在对即将到来的聚会的讨论中，该说者也具有“主办即将到来的宴会”的这一身份。是其中的某一个身份在起作用，还是两个身份都在发挥作用，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析问题。

[6] 归纳行动的特点对于会话分析的初学者而言或许有些困难。令人欣慰的是，要记住，一个话轮中通常有多个行动存在，适用于话轮的动作不止一个。同样，我们应该把最初命名的动作看作是暂时的——只是最初的尝试，如果以及当我们发现有其他更适合这个话轮的动作时，我们也许可以作出改变。

[7] 在关于礼节的文献中，增添负担的行为被认为是负面的面子威胁(Brown and Levinson，1987)，并且在会话分析的相关文献中被称为不受欢迎的行为(Pomerantz，1984a)。

[8] 说者在一个序列情境中压抑住自己批评，而最终在另一个序列中提了(或被鼓励表达)出来，针对这一点，波梅兰茨(Pomerantz ，1984a)举了以下这个例子，F 曾为 N 做过一次美甲，他正在询问效果如何。

F：嗯，那么你觉得抛光做得怎么样？

N：还，还：行，还：不错，其实我这整个星期都没怎么碰过它们

F：你没

N：没有

F：我还担心它们可能会出点小气泡，你知道的它们 [有点

N：　　　　　　　　　　　　　　　　　　　　[嗯，它们确实是。做了假指甲的那一个确实有点小气泡

F：是啊，我就担心它会。

N：( ) 这个甲片有点气泡

这个片段解释了一个参与者很知道哪类信息或许应该有所保留，因此可能会使用一系列的信息搜寻策略来引出这些信息。

[9] 赫里蒂奇、鲁滨逊、埃利奥特、贝克特和威尔克斯（Heritage，Robinson，Elliot，Beckett，and Wilkes，2007）设计了一个实验，随机抽取医生以两种方式征求病人的意见，一组是“今天还有任何别的你想问的吗？”（任何别的）另一组是“今天你还有某些别的想问的吗”（某些别的）。他们发现使用“某些别的”能够引出 78% 没来得及说的疑问，而“任何别的”的问法则让病人这些疑问都咽了回去。

[10] 考虑到他所涉的行动（如，询问有无饮食禁忌）与“主人”这一身份类别密不可分，他使用“我们”在“我们应该了解的”当中，大家能理解是在指他和他的妻子，即菜单的计划者。

[11] 参见陈（Chen，1990/91）的一项针对中国餐桌上主人和客人之间冲突的面子问题的分析，及其参与者处理这种冲突问题时采用的策略。

延伸阅读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会话分析者，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积累分析的技巧，阅读并消化会话分析前辈的著作；还要了解在不同的互动领域所展开的经验研究。下述阅读书目有助于初学者了解本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 Ⅰ and Ⅱ. Oxford: Blackwell. 由盖尔·杰斐逊（Gail Jefferson）编著，伊曼纽尔·谢格洛夫（Emanuel Schegloff）撰写导论。

盖尔·杰斐逊编写了萨克斯 1964 年到 1972 年间的授课内容，并于 1992 年出版，伊曼纽尔·谢格洛夫为此书撰写了导论部分。萨克斯于 1975 年逝世，他生前所发表的论文相对较少，出于此，这些授课内容为我们呈现了他的分析思想的深刻洞见，十分宝贵。虽然书名为《会话讲义》（*Lectures on Conversation*），但是其中囊括了与“思想、文化和互动的社会组织”有关的更广的话题的讨论和分析（Schegloff，1992）。

Schegloff, E.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是计划出版的合辑中的第一卷，此套合辑书介绍并详细说明了会话分析的原则、实践以及研究发现。而在这一卷中，针对序列与基本序列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组织类型如何与序列组织联系在一起，谢格洛夫作了全面地概述。所有的经过转录的互动片段都可以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网站链接进行查阅和/或收听。

Drew, P. and Heritage, J. (eds) (2006) *Conversation Analysis*. London: Sage.

初学者常常抱怨他们不了解哪种会话分析论文可以代表本领域内的高质量研究。这四本汇编丛书为大家呈现了大量高水准的会话分析研究。它们收录了关于获取话轮、话轮设计、修补、行动构成、序列、互动组织以及机构性谈话的诸多论文。

Hutchby, I. and Wooffitt, R. (2008) *Conversation Analysis*,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这本对话分析的导读课本，讨论了本领域的建立及其分析视角，以及针对多种情境中的核心发现的研

究调查。此外，还有两个章节关注的是分析的具体实践，而最后一章则介绍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关的会话分析。

在线阅读

在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可以在线阅读以下文章：

Mondada, L. (2007) 'Multimodal resources for turn-taking: point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sible next speakers'. *Discourse Studies*, 9(2): 194-225.

Craven, A. and J. Potter (2010) 'Directives: Entitlement and contingency in 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12(4): 419-422.

Jefferson,G. (2004) 'A note on laughter in "male-female"interaction', *Discourse Studies*, 6(1): 117-133.

参考文献

Brown, P. and Levinson,S.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en, V. (1990-91)'*Mien Tze* at the Chinese dinner table: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al accomplishment of fac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4, 109-40.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MA: MIT Press.

Clayman,S.E. and Gill, V.T. (2004)'Conversion analysis'. In M. Hardy and A. Bryman (eds) , *Handbook of Data Analysis.* London: Sage.

Drew, P. and Chilton, K. (2000)' Calling just to keep in touch: regular and habitualised telephone calls as an environment for small talk'. In J. Coupland (ed.), *Small Talk.*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 pp. 137-62.

Drew, P. and Heritage, J. (eds)(2006) *Conversation Analysis*. London: Sage.

Drew, P. and Holt, E. (1999) 'Figures of speech: figurative expression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opic transition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27, 495-522.

Goodwin, C. (1980) 'Restarts, pause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mutual gaze at turn-beginn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50(3-4): 272-302.

Goodwin, C. (1981) *Convers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New York: Academic.

Goodwin, M.H.(1980)'Processes of mutual monitoring implic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description sequences'. *Sociological Inquiry,* 50(3-4): 303-17.

Heath, C. (1981) 'The opening sequence in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In P. Atkinson and C. Health (eds), *Medical Work: Realities and Routines*.Farnborough: Gower.pp. 71-90.

Heritage, J. (2008) 'Conversation analysis as social theory'. In B. Turner (ed.),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 300-20.

Heritage, J., Robinson, J. D., Elliott, M.,Becket,t M. and Wilkes, M. (2007) 'Reducing patients' unmet concerns: The difference one word can make'.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2: 1429-1433.

Hutchby, I. and Wooffitt, R. (2008) *Conversation Analysis(*2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Jefferson, G. (1974) 'Error correction as an interactional resource'. *Language in Society*, 3(2):181-99.

Jefferson, G. (1984) 'On stepwise transition from talk about a trouble to inappropriately next-positioned matters'. In J.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1-222.

Jefferson, G. (1987) 'On exposed and embedded correction in conversation'. In G. Button and J. R. E. Lee (eds), *Talk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pp. 86-100.

Jefferson, G. (2004) 'Glossary of transcript symbols with an introduction'. In G. Lerner (ed.), *Conversation Analysis: Studied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3-31.

Jones, S.E. and LeBaron, C. D. (2002) Guest editors of a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emerging integrations'.

Kidwell, M. (2005) 'Gaze as social control: how very young children differentiate " the look" from "a mere look" from their adult caregivers'.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8(4), 417-49.

Lerner, G. H. (2002)'Turn-sharing: the choral co-production of talk-in-interaction'. In C. Ford, B. Fox and S. Thompson (eds), *The Language of Turn and Sequ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5-56.

Lerner, G. H. (2003) 'Selecting next speaker: the context-sensitive operation of a context-free organiz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32(2). 177-201.

LeVine, P. and Scollon, R. (2004)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tz, A. (1984a).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with assessments: Some features of preferred/dispreferred turn shapes'. In J.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7-101.

Pomerantz, A. (1984b)'Pursuing a response'. In J.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2-63.

Pomerantz, A. (1988) 'Offering a candidate answer: an information seeking strategy'.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5:360-73.

Pomerantz, A. and Mandelbaum, J. (2005) 'Conversation analytic approaches to the relevance and uses of relationship categories in interaction'. In K.L. Fitch and R.E. Sander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µm. pp. 149-71.

Raymond, G. and Heritage, J. (2006) 'The epistemic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owning grandchildren'. *Language in Society*, 35(5): 677-705.

Rossano, F. (2009) 'Using gaze to pursue respons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 Ⅰ and Ⅱ. Oxford: Blackwell.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manuel Schegloff).

Sacks, H., Schegloff, E.A. and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Schegloff, E. A. (1979) 'The relevance of repair for syntax-for-conversation'. In T. Givon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12: *Discourse and Syntax*.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261-88.

Schegloff, E.A. (1992a) 'Introduction'. In G. Jefferson (ed.), *Harvey Sacks: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ume 1. Oxford: Blackwell. pp:ix-lxii.

Schegloff, E.A. (1992b) 'Repair after next turn: the last structurally provided place for the def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conver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5):1295-345.

Schegloff, E. A. (1996) 'Confirming allusions: toward an empirical account of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1): 161-216.

Schegloff, E. A. (1997) 'Practices and action: boundary cases of other-initiated repair'. *Discourse Processes*, 23:499-545.

Schegloff, E. A. (2000) 'When "others" initiate repair'. *Applied Linguistics*, 21(2): 205-43.

Schegloff, E. A. (2006) 'Interaction: the infrastructure for social institution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niche for language, and the arena in which culture is enacted'. In N.J. Enfield and S.C. Levinson (eds), *Roots of Human Sociality*. Oxford: Berg. pp. 70-96.

Schegloff, E. A.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egloff, E. A. and Sacks, H. (1973) 'Opening up closings'. *Semiotica*, 8: 289-327.

Schegloff, E. A., Jefferson, G. and Sacks, H. (1977) 'The preference for self-correc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53(2):361-82.

Sidnell, J. and Stivers, T. (2005) Guest editors of a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ca* 156(1/4) on multi-modal interaction.

机构性互动中的对话 10

Dialogue in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s

⊙ 保罗·德鲁　马嘉·丽娜·索杰农

10.1　机构性对话：一个研究的领域

当我们去医院看病，在工作中开会，作为目击者出庭，进行商务洽谈，当我们在购物时讨价还价，为了新工作而面试，热线求医或咨询其他信息，紧急求助，（作为教职员工）在工作时间与学生会面，或（以心理咨询师或客户的身份）参与到咨询治疗中时，我们是在机构性的“语境”中谈话、交流、互动。我们运用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中的各项事务。要么是作为这些机构中的专职人员，要么是机构服务的对象（消费者、学生、病人、公民等）。语言——以互动中的谈话的形式——是参与者们达成他们各自的机构性任务和目标所采取的手段。

其他的交流形态以及语言形式，比如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或短信，互联网和线上预定表，视频会议以及其他传播技术，同样在机构会面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rminen, 2005，第8章；Hutchby, 2001）。在许多类型的机构性互动中，参考或使用不同种类的文件和物品至关重要。因此，在特定的机构性互动中，不同的交流模式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例如，在谈话与其他形式的以技术为媒介，并与社会相关的信息之间，就会发生相互作用。但是，在本章中我们尤为关注的是，面对面的或通过电话进行的口头对话。那么，**机构性**对话的研究，考察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完成实践性任务，以及展开与所参与的机构中的语境有关的特定活动。比如教学、描述症状、质证（cross-examining）、咨询、协商、销售或购买，以及访谈。在考察机构性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层面的语言资源：词汇的、句法的、韵律的、序列的，等等——它们都是在机构中开展互动性工作时所需要调动的语言资源。

虽然机构性互动经常出现于指定的物理环境中，比如医院和学校、社会保障工作处以及商店，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它们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些地方。因此，我们并不经常从地点的角度来看待机构，比如，一个私人住所，也有可能成为机构性或与工作相关的互动所发生的环境/场所（例如当家政服务人员或者健康随访员来到家中访问老者，或者主人给某地打电话下订单或预约服务时）。类似地，人们在办公场所也可能进行随意的社交性闲谈，这些交谈与他们的工作根本没有关系。因此谈话是否具有**机构性**，并不取决于它所发生的具体物理环境。

因此，让我们来思考，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机构性互动”以及由此发生的机构性对话。通

过阅读及思考以下片段，我们可以阐明其中涉及的复杂性（要了解一般性定义语境的困难，请参阅如，Goodwin and Duranti, 1992），该片段摘录自美国政府的一个行政办公室的员工通过内线电话展开的交谈的开头部分。[1]

（1）【J1MORE:12:4】

```
 1  凯特：  嘿吉姆?
 2  吉姆：  最近怎样，凯特·费舍尔
 3  凯特：  你最近怎么样呀
 4  吉姆：  嗯，我最近还不错啊，非[常[感谢
 5  凯特：                          [那[那么挺好
 6  吉姆：  并且多:好的天气啊今天
 7  凯特：  噢:，可不是嘛，特别[棒=
 8  吉姆：                      [是呀
 9  凯特：  =我午饭时偷偷溜了出去
10          而要回[来可[真[不容易
11  吉姆：        [啊，[你哦，[啊这可不好哦
12  凯特：  你看，这(就是[是-)
13  吉姆：               [你本应该待在你办公室的
14          然后一直不停地工作工作工作[呵呵哈:哈
15  凯特：                             [好吧-
16  凯特：  简和我去-她-她也在我们办公室工作
17          我们也:是一起去 呃-呃:买了点东西
18  吉姆：  [嗯哼
19  凯特：  于是我们分别都劝对方要回:来
20  吉姆：  好样的姑娘，是:的 我懂你的意思
21  凯特：  所以或许那才是我们[那么做的关键
22  吉姆：                    [哈哈哈
23  吉姆：  就是的
24  吉姆：  但是。呵呵[怎么了
25  凯特：            [是这样-
26  凯特：  嗯-我今:天接到了一个保罗的电话，他打来之后
27          我查了一下你那边的终端他们说
28          我们的订单还没有发出去
```

【193】

我们可以看到，从第26行到第28行，凯特是给同事吉姆打了一个电话，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总的来说，这通电话是和这些互动参与者的机构工作任务相关的。但是，在他们开始处理公事之前，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这种谈话的方式可以认为仅仅只是在社交（从第1行到第25行）。因此，参与者可以在同一次交谈中同时参与到社交性和机构性的谈话中，并在两者之间相互转换。

要注意，尽管如此，这种互动的机构性，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在讨论公事的那个谈话阶段。

比如，即使是在开头 1–23 行中的社交性质的客套话中，他们那种作为机构员工的说话的态度也有所体现，具体表现为，关于天气和购物的聊天话题都是置于办公惯例和员工职责的语境之中（如，凯特在第 9 到第 10 行的“坦白”以及吉姆在第 11 行以及 13–14 行中的玩笑式的责骂）。在这个阶段中，某些语言和语序特征同样可以为他们的谈话增添几分机构的味道。（例如，第 1 行到第 4 行中他们的相互问候，参阅 Drew, 2002；在第 4 行吉姆的回复中，他使用了重复上文部分词语的表述，而没有将其省略；以及第 6 行中他多少有些不寻常的词汇表达顺序，即从语法上来说，他前置了名词性谓语**多好的天气啊**）。此外，他们明确了彼此作为行政机关同事的身份（例如，第 13 行，16–17 行，以及第 19 行）。

因此，一方面，参与者可以在同一段对话中，来回使用不同种类的话语——或者类型（例如，Eggins and Martin, 1997）或者风格（例如，N. Coupland, 2007），而另一方面，表面上是非机构性的对话阶段，可能会在其语境中暗含机构性的内容。实际上，在和同事及客户构建基于机构的适当关系时，社交性的寒暄似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英国的）就业中心与要求补贴的失业者交谈时，就强调要通过“社交性的”聊天来建立交往关系，在销售时的互动中也是如此（Clark, Drew and Pinch, 2003）。尽管参与者在社交性和公务性的谈话中进行着转换，总体而言，例 1 中的对话可以被看作是机构性的，因为参与者们参与并完成了与机构相关的活动（例如，确认订单已经下发），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在互动中适应了他们的机构身份。

对话中不同类型的话语的转换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闲谈（small-talk）（如例 1 所示）所起的作用，在近来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J. Coupland, 2000）。由此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析性研究，它们考察的是这些随意的、社交的或者是看起来并非在谈公事的闲聊是如何运用于互动中的系统性位置的，以及它在不同类型的机构性互动中的位置和角色会有何不同。（参见 Holmes and Stubbe, 2003: 87–108; Raevaara and Sorjonen, 2006; 还有在雷瓦拉的研究中（Raevaara, 2009），她研究了在便利店中顾客挑选货品，如挑选巧克力时，售卖员对货品的说明，以及这些说明是如何引起关于顾客个人生活的谈话的。 【194】

总之，机构性谈话（talk）和会话（conversation）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参与者适应相关的机构身份和角色，承担与该角色有关的特定责任和义务，生产和管理与机构相关的任务和活动，由此，对话的机构性得以建立。分析机构性对话需要考察的是，通过使用语言、谈话间的协调作用、非言语行为以对话场景的空间和技术维度的特点，它们所表现出的或所行使的机构身份和角色。

10.2 本领域的发展

在过去的 30 年中，机构性对话的研究，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出现，它得益于诸多兄弟学科以及同类型的研究视角的发展，主要包括（互动）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研究说话的民族志学研究以及语言人类学、研究面对面互动的微民族志，以及影响尤为显著的会话分析。

传统上，社会语言学研究一直关注的是与诸如阶级、种族、年龄、性别这些社会身份有关的语言的流变。而最近研究逐渐转向关注，因所处的社会情境而产生的语言的变化——这种变

化多少是独立于其他的（与说者有关的）身份和变化源头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从传统地主要根据说者自身属性来解释语言变化，转而更关注社会身份的情境化 / 语境化建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尤其具有革新的意义。（例如，N. Coupland, 2007; Gumperz, 1982）。这一路径的关键贡献在于，重铸了说者的身份，这种身份不是作为一种"既定的"背景，而是以互动的方式，产生于当今官僚体制下工业社会中的重要场所的语境之中。在一系列关于工作面试、委员会、学校（Rampton, 2006）、法庭审讯（Cotterill, 2007）、咨询、工业培训以及医患沟通（例如，Cordella, 2004）等这类场景的研究中，都致力于达成这一纲领性的研究目标（参阅 Gumperz and Cook-Gumperz, 1982）。

把言语事件视为建立于特定的动作成分，或**言语行为**之上，这种认识是涉及机构性对话的绝大多数观点赖以形成的基础。但是在关于口头互动的分析中，最基于言语行为这一概念（从语言的哲学角度）的研究方法就是**话语分析**了，它是由伯明翰话语分析小组发展出来的。他们描述了行为或行动的标准化顺序，这些行为或行动组成了双方的交谈，而交谈则是某些特定场合所具备的特征，比如教室或问诊室，他们的这种描述，代表了研究机构性情境中所使用的语言的一种更为对话性的研究方法（Coulthard and Ashby, 1976; 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认识到特定机构性情境中存在典型的顺序性 / 结构性的对话模式，这是本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研究进展（例如，Mehan, 1979）。虽然目前，这种研究路径可能会被认为有些过于结构化，以及会遗漏一些互动序列中的依具体情境而定的特点，但是它仍然在本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前，被称为研究机构对话的话语分析已经变得多样化，包含大量的研究路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批判性话语分析（见费尔克拉夫、马尔德里格和沃达克所撰写的本卷第 17 章中的内容）。

【195】

与**语言人类学及言说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有关的研究强调，一个说者的"身份"与其在社区中的成员身份紧密相关（由基廷和杜兰蒂所撰写的本卷第16章中有对此内容的概述）。他们已经表明，特色鲜明的、凸显文化的沟通风格与特定的言语社区有关，这在分析特定言语情境的过程中是一个必须纳入考虑的民族志因素。由此，针对到底是什么构建了言语事件的民族志语境，我们有了一种更加宽泛的认识。根据这种视角，分析交流意义需要描述和理解的内容有：那些体现了说者的社会身份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他们的过去以及其他个人传记性细节；对话中表现出的知识背景与期望；以及在特定的机构事件中的权利、责任还有其他与参与者角色或职位有关的义务。所以，本领域研究的特点就是，强调要把对言语意义的分析和对这些民族志特点的描述整合起来（参阅如 Duranti, 1997; Fitch, 1998；Heath, 1983 ）。

类似的强调还见于对机构情境中的**面对面互动的微民族志研究**中，比如埃里克森和舒尔茨针对学术建议 / 咨询的会谈的研究（Erickson and Shultz, 1982）。这种研究考察的是某个场合中的民族志特征——包括它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以及参与者根据自身身份在社区中所贡献的知识——它们既反映在言语和非言语行动的组织细节当中，同时也影响了这些组织细节。这些微民族志研究的典型特点之一在于，从结合语境理解、回应、行动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沟通序列的协调问题的角度，来关注特定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

这种研究机构性互动的、具有更多偶然性和动态性的研究路径，主要是通过**会话分析**的相关研究发展出来的。在社会学范畴内，其他研究趋势也对机构性对话研究的兴起有所贡献，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戈夫曼的一项研究（Goffman, 1972），他探索了面对面会面中的互动顺序，

这些会面包括那些机构性的场景，比如精神病院或医疗手术，同时，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的发展则突出了对于诸如儿科诊所（Silverman, 1987）这类场景中的言语互动的更细化的分析。但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些对于机构性场景中的互动的众多探索之中，以会话分析视角所展开的研究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在研究预防自杀中心的电话录音及面对面小组治疗的过程中，萨克斯（Sacks, 1992[1964–1972]）开创了会话分析。后续的会话分析的相关研究——如今已经延伸到多个学科领域——发展出了这么一种：阐明参与者运用和通过建构话轮以及话轮次序的方式，如何展示他们所保有的特定机构身份，以及因此而管理与任何给定机构情境相关的实际任务（关于这一内容的概述性介绍以及具体示例，可参阅本章末的延伸阅读文献书目）。 【196】

上文所概括的本领域的进展，汇聚成了三个大的主题：①概念的拓展——社会语言学中的“语境”这一概念得到了拓展，涵盖了语言对于多种社交情境（包括机构情境）的敏感性；②分析框架的出现——这些框架把语言的本质看作是行动，并且处理社会行动和互动的动态特征；③对音频视频的分析——从方法上看，要分析的是那些在机构对话以及职业场合中自然发生的互动的音频视频录像：

◎参与者对自我的机构角色和身份的适应
◎他们对与机构相关的活动的管理
◎他们对与机构相关的推理及意义的适应

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三个主题。

10.3 参与者对自我的机构角色和身份的适应

根据我们早前对社会语言学中说者身份这一概念的重铸的种种研究，我们可以把参与者的机构身份视作一种在互动**中**形成的身份，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或决定性的变量。因此，机构对话的研究重点在于，展现出参与者是怎样通过言语行为（包括**话轮转换**）以及诸如**人称指代**、**词汇选择**、**语法句式**等语言资源的使用，来适应他们的机构身份和任务的。

10.3.1 话轮转换

在思考什么是互动谈话的典型特点，或者是什么使得谈话变得具有机构性这些问题时，也许第一个跳进脑海的就是一些机构情境中的相较严格或正式的**话轮转换**系统的组织安排，比如，在法庭上、课堂里、市议会中、新闻采访或工作面试中，参与者的行为是根据他们在谈话中所面临的约束而形成的。最明显的一种约束在于他们要严守话轮转换系统，这与随意会话中转换话轮的方式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例如，在法庭（Atkinson and Drew, 1979; Maynard, 1984）、教室（Jones and Thornborrow, 2004； Margutti, 2006; McHoul, 1978; Seedhouse, 2004）、警方审讯（Stokoe and Edwards, 2008）、电视辩论节目（Emmertsen, 2007）、咨询（Perakyla, 1995; Perakyla, Antaki, Vehvilainen and Leudar, 2008; Silverman, 1997）、会议（Asmuss and Svennevig, 2009; Ford, 2008）、总统新闻发布会（Clayman, Heritage, Elliot and McDonald, 2007）以及新闻采 【197】

访（Clayman and Heritage, 2002）中的互动里，系统性地展现出了独特的话轮转换形式，这些形式有力地架构了这些情境中的行为的诸多方面。

这些话轮转换系统涉及对参与者们的不同话轮类型的分配。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的互动都是按照一问一答的顺序组织的，其中，提问的通常是专业的那一方（如，律师、记者、老师），而回答的则是委托方（如，目击者、受访者、学生）（参阅 Heritage, 1997）。

但是，即使是机构性的语境（其中并没有掌管话轮转换系统的正式指令），也似乎具备这么一种特征：在参与者之间存在的是不对称的问答分布。这说明，谈话中的问答结构，形成了参与者依据语境具体进行的互动管理所具有的一种即时浮现（emergent）的特质（Frankel, 1990）。类似地，即使话轮转换系统是预先规定好的，但是分析的任务仍然在于要详细说明，通过显示出参与者在适应其在情境中所应该做的事，这一话轮转换系统是**如何**依据所处的情境而进行具体管理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任何特殊的机构性话轮转换系统，看作参与者适应其关于任务的身份和角色的一种产物。

新闻采访中经常出现问答的结构，这是很常见的。但是，接下来的这一则选自英国的新闻访谈中的例子则展示了，随着提问和回答的展开，如何通过对语境中的谈话进行具体的管理，从而形成这种问答的结构。

（2）【选自 Clayman and Heritage, 2002: 106】
1 IE: 呃 区别在于是报纸上
2 经常把我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我自己可没有，（。）
3 并且从来没有（。）呃 呃 这么标榜
4 我自己。[呃 我 -
5 IR: [但是我听说你 -
6 我听说你会非常欣然把：把：呃
7 呵呵 呃把你自己称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8 会不会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
9 你想要淡化你是一位
10 马克思 [主义者] 这种印象
11 IE: [呃] 绝对不是这样戴先生。= 并且我很（。）
12 抱歉我必须反对你说的话，= 你从来
13 没有听过我说自己 呵呵 呃 是一个
14 马：克思主义者。

【198】

此处的重点在于，首先，采访者（IR）构建了他的话轮（第 5–10 行），以至于无论他还采取了何种其他的表述形式（见第 5–7 行中的陈述形式），该话轮的落脚点都是一个问题（通过疑问词而展开，第 8–10 行）——因此把他在情境中的任务设定成了“提问”。其次，虽然受访者（IE）不认同采访者（IR）在第 5–7 行中的表述，但他直到对方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才说出了自己的回答 / 异议。因此，IR 将其话轮建构为一个提问，IE 只有在 IR 提问之后才发话（作答），这一现象反映出，参与双方都在适应这次采访中各自的任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说，双方话轮的组织安排，是参与者在语境中具体管理互动行为的一种浮现产物。

在这里，关于“问题”的构成，有许多有趣且重要的议题。提问活动不仅仅只是语法形式的问题（Heritage and Roth, 1995）。根据以往经验，“提出一个问题”以及“挑战”受访者（例如表达一个相反的意见），这两者之间可以存在某种明显的交集。这种可能的交集对于参与者而言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片段中就有明显的体现，IR 正在给 IE 施压，以至于很明显，IR 似乎已经不是在简单地提问了。

（3）【美国 ABC“这一周”栏目：1989 年 10 月：存款 & 贷款救助】

1 IR: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达尔曼先生，纳税人
2 将支付更多利息，相比他们只支付
3 一般收入中的（利息）。
4 IE: 不。没必要，那只是原则上的
5 说法
6 IR: 这不是 - 先生，我能这样说吗？这不是一种原则上
7 说法。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8 IE: 不。这绝对不是一个事实。因为首
9 先，500 亿当中已经有 200 亿是
10 在按照你希望的方式进行处理
11 通过国库融资的方式。剩下的 -
12 IR: 我只是在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并非
13 表达我的个人观点
14 IE: 我明白。

在这个片段中，IR“提问”中的几个特点使其具有了一种审问的特征。其一是 IR 在采访初期使用的“**难道……不是事实么**”，在法庭上的质证中，当向证人展示相反的证据或“事实”时，常常会使用这一措辞（例如，**难道这不是事实么？（名字）小姐？你今晚所去之地至少离公路主干道有 1/4 英里**）。其二是 IR 向 IE 施压的方式，他打断了 IE 的发言（见第 6 行和第 12 行中 IR 插入的话轮）。在第 10 行中，当 IE 说“**按照你希望的方式**”，他是在认为 IR 持有一种“立场”，也就是说，他认为 IR 并不仅仅只是在提问题，而是在表达一种意见或是立场——这是一种委婉的指控，在第 12-13 行中，IR 就此为自己作了澄清和辩护（“**我只是在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这种认为采访者跨越了“提问”和“审问”之间的边界的指控，在另外一些地方表达得更明显。【199】

（4）【英国 BBC 电视台“新闻之夜”栏目：1993 年 11 月 2 日：联合国调查】

1 IR: 你表达的是赞同还是反：对？
2 （0.5）
3 IE: 啊：我们这是庭：审（。）还是采访呢。
4 IR: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要接受
5 联合国调查员的调查，是这 [: 样吗
6 IE: [当然

在这个片段中，从 IR 的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他是在给 IE 施压，问他是否准备好了接受联合国调查员的调查（这是这个序列中出现的第三个类似的问题）。当 IE 问道“**我们这是庭审还是采访**”时，他在明确地质疑采访者提问的中立性。

所以考虑到这种可能存在于某个既定的机构情境中的、专门的话轮转换系统，以及它是如何牵涉或导致了参与者们话语机会的不均等，考虑到这些内容，我们同样也在探索，例如，提问的本质和特征配合参与者的机构任务的具体方式，以及在某些互动类型中如何利用“提问”来管理其他活动。

10.3.2 人物指代和词汇选择

从更加局部的层面来看，参与者也许会在选择**相互指代的方式**以及指代第三方的方式时，展现出他们的机构角色所承担的义务，或者说能够代表机构的一面。例如，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个**人称代名词**，来指出他们的机构身份，而非个人身份。这样的例子如下文所示，它取材于美国急救服务的一通电话录音。

（5）【选自 Whalen et al., 1988：344】

1 人工台：　城中区急救中心
2 　　　　　.
3 　　　　　.
4 人工台：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5 呼叫者：　我们有一个昏迷的，呃：糖尿病患者
6 人工台：　他们是在室内吗？
【200】 7 呼叫者：　是的：
8 人工台：　具体是哪一栋楼？
9 呼叫者：　在成人书店？
10 人工台：　我们马上就会派人过去

在这个片段当中，呼叫者称呼自己的时候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代名词**我们**（第 5 行），因此指出了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在说话（例如，作为发病者的家属），而是代表了病人发病时所在的商店（第 9 行，**成人书店**）。类似地，人工台在提到病人的时候也使用了第三人称复数代名词，而在之前用的则是单数形式（比较第 5 行，**一个昏迷的糖尿病人**，和第 6 行的，**他们**），还有第 10 行中，当他宣告即将展开的救助行动时，他用的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

而在下面的一则选自芬兰的医患咨询的例子里，人称指代的形式同样也受制于“机构方面的”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像例（5）当中那样直接指出一个机构角色。在这个片段当中，刚刚完成了对患者的口头问诊和身体检查的医生，开始大致介绍治疗的办法：

（6）【医生－患者 12B1：8】[2]

1 D:　.mhh >Kyllä meiä täytyy　ny　sillä tavalla tehdä
　　　　　Surely we have. to now the way　do
　　mhh >We do have to do so now

嗯 > 目前我们必须这么做

2 että me alotetaan se verenpaine°lää:kitys°.=

that we'll start the blood pressure °medication°.=

我们要开始使用血压药物。

3 =Ja keotetaan edelleen sitä laihdutasta ja

and try still the diet and

= And let's continue trying to diet and

我们还要继续控制饮食并且

4 °.hh° ja jos koettaisitte jättää vielä °a-°

and if try-CON-PL2 leave still ?

°.hh°and if you'd try to leave out even °( )- °

并且如果你愿意尝试更大程度地减少

5 (0.4)vielä tiukemmalle sen suola ja (0.2)

still stricter the salt and

(0.4)even more salt and

摄取盐分 并且

6 o- 0 yrittäis olla vaikka ilman alkoholiaki

? be 0 try-CON.SG3 be say without alcohol-even

be-try to be say even without alcohol

尝试 比如说 禁酒

7 jos vaa #onnistuu ja#,

if just succeeds and

see if that #work out and#,

看看这么做会不会有效

在此，医生指出了为了降低血压病人应该做的四件事，即吃点药（第 1–2 行），控制饮食（第 3 行），减少盐的摄入（第 4–5 行），完全禁酒（第 6–7 行）。他用了三种不同的策略来表明，要使治疗取得疗效主要责任在谁。在前两句话中，医生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的 *me*“（英语的）we（我们）”以及 / 或与之相匹配的动词形式（第 1–2 行，第 3 行）。[3] 因此，他把这些行为表述为他们共同要做的事。接着（第 4 行），他转而使用第二人称复数的动词形式 *koettaisitte*“你愿意尝试”，将下个行为当作病人的责任。最后，在建议病人应该放弃喝酒的时候，他使用了没有主格的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形式（第 6 行，yrittäis“应该尝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称指代形式——这是一种指出，例如，在提出话题的时候所涉及的敏感问题的方式，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指出患者的饮酒习惯。因此，在这里，医生使用了可用的人称指代资源，从落实主要的执行责任人，以及话题的潜在敏感度的角度，来指出他对于每一个治疗环节的特定的立场（参阅 Sorjonen, Raevaara, Haakana, Tammi and Peräkylä, 2006）。 【201】

这些简洁的例子不仅说明了参与者们是如何通过人称代词形式的选择，来展示和适应他们的机构身份的，而且也初步表明了在人称指代方面所采取的语言策略和机构活动管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构成关系。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词汇选择**这一更为普遍的维度中——词

汇选择是指对一些描述性词语以及其他词汇内容的选择，这些词语是参与者所认为合适的词语，因而它们可以说明参与者对其所处情境的理解（见 Danet 的例子，1980）。简单来讲，这涉及到那些根据具体情境而定的、适合于情境的语域（register）、代码或者风格的语言概念。说者会适应会面交谈的机构性，部分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对词语的选择来达成的，也就是从多种描述人物、物体或事件的词语中进行选择。这牵涉到在描述机构语境的类型方面，词汇选择所具有的充分性（例如，这是否是法律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医学方面的，等等）。

现在，通过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开始考察，词汇选择如何激发和唤起机构情境以及机构任务。这个例子节选自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一所美国高校的考勤老师（AC 是考勤老师，M 是母亲，F 是父亲）：

（7）【梅代罗斯 5】

1 AC： 您好，我是梅代罗斯小姐，这里是雷唐多
2 高中
3 M： 嗯
4 AC： 查理今天是生病在家没来学校上课吗？
5 （0.3）
6 M： 呃……
7 （0.8）
8 M： （（电话线下））查理今天没有生病在家
【202】 9 是吧？
10 （0.4）
11 F： （（电话线下）） 才没有呢
12 M： 不是的：。
13 （。）
14 AC： 不[是吗？
15 M： [不是这样，他没在家
16 AC： 呃（。）据说他缺席了
17 今天的第三节和第五节课
18 M： 啊？
19 AC： 嗯，我们需要他今天早上来一趟办公室
20 把这些情况解释一下

在询问过这位母亲她的孩子是否生病在家之后，考勤老师告知她，她的孩子那天“**据说缺席了**”。注意，考勤老师说孩子“**据说缺席了**”，而不是简单地说他是缺席了。她使用了“**据说**”这个词与“**缺席**”相搭配，显得有些谨慎或模棱两可——至少这种说法避免了直接指责孩子旷课，相反，对于他逃课与否还留有了后续调查的余地。而且，这暗示了学校里报告缺席的程序，这套程序可能会出错，因此可能信息有遗漏。所以，虽然“**据说**”这一动词并不局限于机构性情境中，它出现在这里是对考勤老师任务的一种适当的管理（见 Drew and Heritage, 1992: 45–46; Pomerantz, 2004）。此外，选择“**缺席**”作为补语来描述孩子不在（学校），这使得不

再具备一种特别的机构形式（例如，这个人在学校或者工作上“缺席”了，而不是“缺席”了一个聚会）。

在例（7）中选择“**缺席**”这个词，体现出了词汇选择与机构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某些例子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这些例子中，参与者使用的往往是更局限于其具体情形中的传播的用词（如，专业术语）。许多研究都记录了，专业词汇（如，在医学和法律的语境中的词汇）的使用可以体现专门的专业知识的确切说法。通常，这些研究指出了专业的参与者在使用专业词汇时的互动特点。这常常与专家和外行参与者之间知识的不均衡有关，也和这种看法有关，即他们使用专业词汇是让专家可以个别地控制客户所得信息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因此这或许会影响互动的结果（关于医科方面的互动研究的议题的综述，参阅 Roter and Hall, 1992）。

然而，关于通过专业词汇进行专业控制的研究，可能实际上依靠的是一种相当简单化的二分法的思想，即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以及客户（如，病人）所拥有的外行知识。一方面，外行参与者很容易在有关专业词汇的知识方面，展现出某种认知上的平等，正如下面这个例子，这段对话发生在一个美国医院中的初级治疗中的开头部分。

（8）【美国初级保健】 【203】

1 患者： 嗯 –（。）我有点（。）我肩膀有 : 点 : 疼
2 并 : 且（0.2）并 : 且（。）（是从）我的大臂开始疼，而 : 且
3 （0.2）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 > 几年
4 以前 < 我另一条胳 : 膊患了冻结肩，于是
5 我不得不做了手术，结果 =（）它就开始
6 僵硬，我想要在它僵硬之前停下它
7 （0.4）
8 医生： 粘 [连 : 性关节 [囊炎
9 患者 [我逐渐不能] [是 : 的。
10 患者： 我的手 : 臂（0.4）逐渐不能活动了

当医生用更专业的、诊断性的术语**粘连性关节囊炎**来替代病人所说的**冻结肩**时（比较第 4 行和第 8 行），病人在第 9 行确认了“**是 : 的**”，说明医生是对的——由此声称 / 表示出自己在（如何描述）她的既往病史方面所具有的某种知识的权威性。另外，外行的参与者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比专家更多地使用专业性术语，如下面这个例子所示，这个例子源自在非工作时间打给一位英国全科医师的诊所的电话。

（9）【非工作时间电话，英国初级保健】

1 呼叫者： 他正躺在床上，看起来真的非常难受，呃呃
2 医生： 那他整晚都在肚子痛 [是吗？
3 呼叫者： [是的
4 在偏下部位 他的
5 （1.0）
6 医生： 肚子

7　　　　　　（0.3）
8　呼叫者：　腹部 [是的
9　医生：　　　　[嗯，这种疼是不是时隐时现：？

呼叫者，把她丈夫形容为正在承受**最可怕的胃痛**，没有使用医生所惯用的口语化的**肚子**一词，而是（以一种自我修补的形式）使用更为专业的**腹部**（第8行）一词。所以参与者使用更专业的词汇，这绝不仅仅只是专家试图通过使用这些词来“控制”外行参与者这么简单，它还涉及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例如，有关准确性、基于以往经验确立的知识的权威性等问题）。

针对谈话中的话轮设计时的词汇选择问题，所要研究的不只是人称指代形式以及专业术语这些内容。正如前文中关于学校考勤办公室打来电话的例子（例7）以及相应的讨论所示，词汇和短语的使用——如用“**据说缺席**”来表述一个学生（可能）旷课——可以揭示与某些机构活动的行为有关的大量的信息。例如，赫里蒂奇等人（Heritage et al., 2007）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其中的一组内科医师，在咨询接近尾声时，也就是病人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询问病人是否还有其他的想法和诉求“今天来还有**任何**其他问题要解决吗？”而另外一组则使用这种问法“今天来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要解决吗？”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一些**作为问句中的极性标记可以更有力地鼓励病人说出他们大部分的其他顾虑，而不会延长问诊时间。而当医生问有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时，病人通常不会再进一步地表露病情方面的疑虑，但是医生只需要在提问时改换一个用词，把**任何**其他改为**一些**其他，病人就会很爽快地说出来。

【204】

10.3.3　语法形式

在设计安排话轮以及随后的行动时，除了词汇选择，在语法上参与者也有多种形式可供使用。对特定的词汇句法形式的使用，比如某种问句结构，这并不专属于或局限于机构性情境。但是，形形色色的语法形式，是参与者在管理特定的机构任务时可使用的语法资源。由于这些任务是给定情境中的常规互动的组成部分（例如，给出治疗建议是医疗咨询中的惯常做法；尝试攻讦证人的证据则是庭审中的交叉询问环节的常规做法），那么特定的语法形式可能分布在既定情境中的特有位置。也就是说，某种语法形式可能在某些情境中非常普遍；或者它们也许具备与情境中参与者所参与的特定活动有关的典型用法。

比如，林斯特龙（LindstrÖm, 2005）和海涅曼（Heinemann, 2006）分别探讨了在瑞典和丹麦的家务助理服务中心里，提出要求的方式，也就是被照顾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护工之间的互动。他们发现，被照顾的老年人是如何能够通过在设计话轮时对语法形式加以选择，以此展示出她了解自己的要求所具有的不可预见性，并且表明她对于自己是否有权提要求所持的立场。比如，是选择祈使句还是选择疑问句，这就与有无权利提要求有关，而陈述句则显示出这种要求有商议的余地。海涅曼（同前）表示，选择以正极性词的形式还是负极性词的形式来提要求，这涉及权利的问题：使用包含正极性词的疑问句来提要求（比如，*vil du*“你会……吗”），受照顾者会认为他没有权利提要求，其他的一些特征也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缓和语调的策略以及对动词的选择）。而相反，包含负极性词的疑问句（比如，*ka'du ikk'*“你不能……吗？”）表达了提问者认为自己有权利提这样的要求。林斯特龙和海涅曼说明了，接待者、家庭护工是

如何在回应这些要求时认可了这一权利问题，以及当提出要求者要为这一要求作出解释时，这种对于权利问题的认可和适应又是如何从中发挥作用的。

所提诉求中所采用的词汇－句法形式，以及参与者所认可的词汇－句法形式，体现了允许提要求以及有权获得服务的相对可能性，这种体现的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比较下面这两个不同情境中所提出的要求来作清晰地说明——（英国的）全科医生的诊所在非工作时间所提供的就医服务，以及紧急救援服务的例子。不管是在非工作时间致电全科医生诊所的人，还是拨打紧急求助（警察）电话的人，他们通常都没有明确地说出请求的内容；通常，在给医生打电话时，他们只会汇报一下情况（描述发病症状），或者在打报警电话时，他们只汇报发生的事情。然而，当呼叫者请求医生来自己家里看看病人时，他们通常会以这种形式表述：**我想知道你是否……** 【205】

（10）【非工作时间电话，英国：1:2:4】

1	呼叫者：	我上星期一直在吃扑热息痛[1]
2		（.）
3	医生：	好的
4	呼叫者：	（我的意思是）不疼了，吃了以后一个小时都不会疼
5		（0.2）之后又开始疼，我一直努力忍着（它），因为你
6		只是每四个小时（就会好一点）（。）是吗（每
7		[四个]
8	医生：	[是的，
9	呼叫者：	所以那是什么－我想知道你是否能（或不能）给
10		（我们）一些止痛剂（为了完全止痛）
11		（0.5）
12	呼叫者：	（我试试看）（。）我知道你一直到周一才有空。但是我得告诉
13		你我真的（。）疼得很厉害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吸气））
14	医生：	好 ：的，我的意思是－所以你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几个月了，你是这么说的吗？ =
		·
		（省略10行）
		·
15	呼叫者：	但是 呃：：我想说真的它或许－如果你过来看看
16		那，也许你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或者：（是不是要）止痛药或：者
17		（0.5）给它照个X光 = 我也不知道……
		·
		（省略6行）
18	医生：	对，嗯，那我的意思很明显 X光（其他类似）
19		那样的，我们一般在病情不属于急性的情况下使用
20		紧急情况的话－我们更希望你自己的
21		医生，周一去找他们看看，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1 原文拼写为 paracetmol，疑为原文有误，应是 paracetamols，是一种运用广泛的药物，用以缓解发烧、头痛及其他疼痛。——译者注

呼叫者使用“**我想知道你是否**”这种句式，请求医生过来一趟并带一些止痛药（第9行），包括他第15行用条件句式的进一步追问，这些都清晰地表明他知道他这一请求被达成的不可预见性——在第12行，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这一不可预见性，“**我知道你一直到周一才有空**”（由此呼叫者的意思是医生可能会建议病人周末过完之后再去看外科），这一不可预见性在第19至21行得到了确认，医生实际上拒绝了登门看诊。所以，**我想知道能不能**……这种句式说明，说者明白自己没有权利要求这种服务，考虑到他提出的要求被同意的不可预见性（Curl and Drew, 2008）。

相反，当呼叫者明确地要求警员紧急援助时，他们一般会使用情态动词来提出要求，通常是“**能否……**”，正如这个例子所示。

【206】 （11）【警局紧急求助电话，英国：19】

1 警员： 警局紧急求助 需要什么帮助吗?
2 （0.5）
3 呼叫者：是的 你好 呃 我们能否让你们派一辆警车到：（0.8）呃
4 格雷林大街的老绿房呢。
5 警员： 老奶油房。
6 呼叫者：老绿房，
7 （0.8）
8 呼叫者：在格雷林。
9 （1.8）
10 呼叫者：（（对一话筒外的人说））（（名字））去开门。（1.1）
11 关上这扇门［关上门别关门
12 A: ［（）［请（名字）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3 呼叫者： 不要开门（名字）
14 A: 不要打－（。）打开门［（名字）
15 呼叫者： ［我们能不能让
16 警员： 能啊 是什［么－
17 呼叫者： ［()
18 警员： 是［的 对不起＝
19 呼叫者： ［这－
20 呼叫者： 这边，呃，有位女士（0.5）说她
21 被强暴了，她很惊慌。她的男：朋友
22 在门外
23 警员： 好的［可以了－
24 呼叫者： ［我们在这里的保安室

在这个紧急事件中，通过呼叫者请求警察援助的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并不认为有什么可能的原因会阻止警察来到现场。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一桩强奸案，第20/21行）足够有让警方必须到场的理由。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呼叫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有一个比较机

构性的身份，保安人员（第 24 行），这个身份在他使用第一人称复数的时候就有所预示，也就是出现在之前的这个体现了机构性的“**我们**”一词。并且，呼叫者请求的是派一辆警车到所他**报告**的事发地点（第 3 行），这种词汇的选择不仅表现出明显的机构用语的风格，同时也显得比较“肯定”。但是，呼叫者对于警察会前来提供帮助的这种期待（以及没有什么理由会阻止他们这么做），尤为明显地体现在他向警察寻求援助的方式上——他使用了情态动词**我们能否让**……**我们能不能让**……（分别在第 3 行和第 15 行）。相比例子（10）中的呼叫者询问医生能不能到他家来一趟所表现出的迟疑，以及该呼叫者明白医生可能并不准备这样做，在例（11）中，呼叫者在提出要求时则明显没有表现出这种迟疑，相反，他提要求的方式表现出，他认为没有什么会阻止警察来到案发现场（欲了解更多隐含在不同的请求形式之中的、关于是否有权获得服务及其可能性的个人预期，参阅 Curl and Drew, 2008）。总的来说，拨打报警电话的呼叫者们不使用“**我想知道能否**”来引出他们的请求，在报警电话中，呼叫者所采取的请求形式，是为了表明这是一个紧急事件，警察（或消防员、医疗救护人员）应该到场。【207】

10.4 参与者对与机构相关的活动的管理

我们必须谨记，语言并不能传递意义——相反，它传达的是行动。并且，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些工作场所、业务以及机构性的情境中，语言传达着某种特别的、与情境有关的行动和活动。或者更具体地来说，参与者会使用语言来达成这样一些活动，比如庭审中对被告进行的**交叉询问**、**预定商品或服务**、**协商合同**或雇佣条款、**教授课程**、**指导**客户如何做生意、作为健康顾问给妈妈们提供如何养育新生儿的**建议**、拨打紧急求助电话**请求**警员帮忙、在就业服务中心给申领失业补助者**提供**建议、并且**鼓励**他们一步步走向工作岗位，等等。有些时候，与情境中的某种互动有关的活动，其内容是相较固定的（比如打电话至某处下订单或进行预约）。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参与者可能会展开广泛的活动，例如，在初级保健医疗咨询中，病人会**讲述自己的**问题，而同时医生可能会（通过口头上询问以及 / 或者在生理上）**检查**病人，**诊断**问题，并且**推荐**合理的**治疗**方案。研究机构话语的关键在于，探索和理解参与者会如何利用彼此互动的语言来处理这些通常比较专业的行为。

在近期的关于机构话语的研究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些有关医疗互动的研究，尤其关注的是，在初级保健的急性病诊疗中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Heritage and Maynard, 2006; Stiver, 2007）。同时，近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例如， Mangione-Smith et al., 2003），并且它们通过聚焦初级保健的急性病诊疗中医生和病人所参与的核心活动，也就是会话分析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一种关注点，以此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新的发现。比如，他们研究了医生展开询问、引导病人报告或者描述他们感受的不同形式，以及这些不同的提问形式会对病人的回答产生怎样的影响（Heritage and Robinson, 2006; Ruusuvuori, 2000, 第 3-4 章）。而其他的研究则关注了，医疗方面的权威性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这当中医生会把自己的诊断告知病人，并和病人讨论理想的治疗方案，同样的，也会考察这些诊断结果的表述形式的区别，会对病人的回应产生哪些影响（Peräkylä, 1998）。【208】

医生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告知他们诊断的结果，其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会对病人的反应产生影响，尤其会影响到他们是否会接受检查或诊断结果。这些表达方式所存在区别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医生是否会明确地描述出他们所观察和诊断的病情的具体迹象。比如，医生【208】检查病人的身体，他也许会用眼睛看或者用手触摸（比如，对身体的某部位进行触诊），但是这期间没有说或者也没有透露有关他所观察和发现的症状的任何信息。而另一种情况是，在医生检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告诉病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后者正是赫里蒂奇与斯蒂弗斯（Heritage and Stivers, 1999）所谓的“实时评论”，对此，以下例子当中的第22，24，31行中有所说明。

（12）【选自 Heritage and Stiver, 1999】

1 医生： 你感觉怎么样今[天：。
2 病人： [。呃呃 好些了 呃[呃
3 医生： [你的鼻窦炎呢？
4 （.）
5 病人： 呃，它们还是，它们还是老样子
6 （.）
7 医生： 还是老样子？好吧。我现在让你在这里坐一会儿
8 （1.1）
9 医生： 大概上：（0.5）个月我给你开了很多药
10 为了治你的鼻窦炎
11 （0.4）
12 医生： 但是 heemobi::d[1] 以及 vancena::se（二丙酸倍氯米松），还有抗生素，
13 沃格孟汀
14 （0.7）
15 医生： 而：：且你应该注意到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16 病人： 比起我第一次来，（。）好多了
17 （.）
18 医生： 好：[的
19 病人： [它还是.呃 >你知道的<它不能百分之百治愈
（（谈到用药，接着检查身体，省略））
20 医生： 是的 因为那个一般来讲需要你花多：一点时间
21 （3.4）
22 医生： 嗯 我没看到任何液态的=你的耳朵看起来不：错
23 （3.6）
24 医生： 这一只也一样
25 （5.6）
26 医生：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引流的情况
27 （.9）
28 医生： 说“啊”

1 原文是录音对话转录文字，可能因口语带口音，有些发音不清楚，因此转录时拼写有省略，疑为 hemobilia，胆道出血。——译者注

29 病人： 啊
30 （0.2）
31 医生： 那个看起来也真的挺好
32 （0.8）
33 医生： 你有没有任何特殊的问题，比如咳嗽或者其他
34 类似的症状，> 和鼻 [窦炎一起出现的 <
35 病人： 嗯只是我会时不时地
36 喉咙真的发疯似的（0.2）奇痒无比。于是我就会
37 不停地咳咳咳，咳（0.2）一会儿。
38 （.）
39 医生： 好 [的：：
40 病人： [接着我（。）清喉咙，重复几次，就不咳了，
41 （.）
42 医生： °° 好 [的：°°]
43 病人： [但是它会反复（0.4），每天 > 两到三 < 次
44 医生： °（那么）我们检查一下你的鼻窦，看看它们今天情况如何。°
45 （1.0）
46 医生： 看起来好多了 = 今天我看它一点也没有肿
47 （0.8）
48 医生： 挺 [好
49 病人： [（那就好。）
50 （.）
51 医生： 那就有疗效了。
52 （1.0）
53 医生： 所以你应该差不多：快好：了，我不 -（我）真的不太
54 认为你有持续性的感染 = 这看起来
55 沃格孟汀确实对 °它° 起了作用
56 病人： 那就好。
57 医生： 好：了。（。）关于你的心电图我们还需要讨论什么别的吗？

【209】

通过对正在观察和触摸的身体部位做实时的描述，以及给出医师对于病情的评估，这种对病人进行身体检查的方式，在说服病人其病情并不严重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病人说自己的鼻窦一直有问题，他也一直因为这个在吃药。很明显病人始终在抱怨他的症状（如，第 5，19 及 35–37 行），直到医生继续边检查边评说（见从第 22 行开始的内容），并且最终说服了它们并没有什么大碍（第 48–56 行），在这之后，他们便转向其他话题了（第 57 行）。赫里蒂奇和斯蒂弗斯（Heritage and Stivers, 1999）发现，当医生和病人在病情评估方面产生了分歧时——病人认为他 / 她的情况比医生所说的更为严重——那么医生采取边检查边评价的方式，通常都可以使病人相信他们的病情真的没有大碍。

关于边检查边评价的策略的使用，有一个重要的推论，正如第 12 行说明的那样，通过使病人接受“没有问题”这一诊断结果，他们会更愿意接受一种无抗生素的治疗方案，由此医生不当开出抗

生素类药品的可能性就会减小（Mangione-Smith et al., 2003）。这就说明了，针对机构话语的研究可以产生实际的应用价值——这个话题很大，限于篇幅不作展开叙述（但是可以参阅 Antaki，即将出版）。

10.5 具体的机构性推理

参与者通过参与针对谈话中的彼此话轮所作的特定推理，所形成的认识以及所作的反应，【210】使他们适应了所处的机构情境。“推理”指的是参与者对每个人正在展开的行动的理解，以及对与情境相关的语句意义的理解；这些理解是参与者根据所处场合的性质以及彼此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建立的一种常规期待。

对于他人通过一句话所表达的意义或者所做的事，参与者形成认识的推理基础包括与每个参与者的相关机构活动有关的期待。比如，在接下来这个片段当中，卫生随访员（HV）进行家访，随访员看到宝宝正在享受地吮吸着什么（第 1 行），母亲（M）认为这表明宝宝可能是饿了（第 3 行）。由此，她既适应了 HV 到访所肩负的机构性任务是监察和评估婴儿护理状况这一点，同时也适应了自己要护理婴儿的这一责任和义务（请注意，父亲对 HV 所观察的婴儿行为的理解很不一样，见第 2 行）。

（13）【来自 Drew and Heritage, 1992: 33】
1 HV: 他很享受这样 [不是吗
2 F: [是呀 他肯定很喜欢 =
3 M: = 他应该不是饿了 因为他 才喝了 一瓶奶 . 呃呃
4 (0.5)
5 HV: 你给他喝的是优质牛栏牌（Cow and Gate）[1] 奶粉

下面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参与者是如何适应具体的机构性推理的。这个片段选自美国的一位起诉律师（DA）对一位被告（D）的交叉询问，被告被指控为一桩谋杀案的从犯。简单地说，她的男朋友皮特与他们的一位朋友发生了争执，争执中这位朋友 / 被谋杀者向皮特捅了一刀，皮特则开枪杀死了他。对她的指控是她帮助皮特进入了受害者的公寓。在此，交叉询问的目的似乎是要使她协助男友的这一动机成立。

（14）【谋杀审讯：Cheek：35-A-1:136】
1 DA: 那时候你和皮特感情很深吗？
2 D: 是的（.）那时候我是他的女朋友。
3 DA: 他被刺了你很不高兴？
4 D: 我没有不高兴。
5 DA: 你没有不高兴？难道你高兴么？
6 D: 不是。
7 DA: 对于他受伤你一点感觉也没
8 有。
9 D: 我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

1 一个英国原产奶粉品牌。——译者注

10 DA: 他受伤了你伤心吗?
11 D: 我不知道。
12 DA: 你不知道你什么感觉? 我的意思是你那时候
13 可能开心吗?
14 D: 不。
15 DA: 你知道你那时候不开心。
16 D: 我想::是的
17 DA: 但是你不知道你那时候是否感到悲伤? 【211】
18 D: 我感觉不太好。((声音颤抖))
19 DA: 你感觉不太好。你是记得的。
20 D: 是的, 我感觉不太好。
21 DA: 你记得那一点。
22 D: 是的。
23 DA: 你感到生气。
24 D: 是的。
25 DA: 你对那个捅他的人感到生气。
26 D: 不。
27 DA: 你明确地记得自己对那个
28 捅他的人完全不生气?
29 D: 我生气是因为……((混乱且听不清))
30 DA: 你对他不生气
31 D: 不生气。

很明显，此处律师（DA）把自己的提问设计为，要建立被告帮助自己男友的这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则来自于男友被刺之后她的感受。同样很明显，被告（D）非常清楚这就是律师这些质询问题所渴望达到的最终目的（关于证人对于质询问题的理解，参阅 Atkinson and Drew, 1979: 112–121, 173–181）。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她抵制律师对于她感受的暗示，并且对于他不断地试图质疑、破坏她对这一事件自我陈述感受的合格性，她都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在她的回答中，例如，她不同意律师说因为她男朋友被刺所以她很不高兴这种看法（第 3–4 行），或者她拒绝承认自己**对捅他的人感到生气**（第 25–26 行），并且律师说她**对于他受伤一点感觉也没有**，她对此的回应是她自己的那一套表述，也就是她**关心的是发生了什么**（第 9 行）。

在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对于律师提问中所暗含的意思，她是作何处理的，以及为了拒绝这些暗示她采取了哪些策略。同样的，律师如何敏锐地解读她回答中的言外之意，以及怎样与她的抵抗相互较量，这些内容也都一目了然。因此，在指控以及与谋杀事件有关的环境的语境中，参与者根据彼此描述所作的推理设计安排了他们的话轮。

因而他们每个人都读出了对方的描述所包含的**策略性**目的，并也根据自己的策略性目标构建他/她自己的表述（Drew, 1990）。这种推理出的意义以及所采取的策略之间的关联，就是我们所说的机构对话的实用意义的部分所在。

10.6 结 论

到现在为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都还没有明确探讨，在此，我们应该加以强调。机构性交往中的参与者运用口语或者非口语的互动资源，他们把这些资源作为他们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技能的一部分——他们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获取了这些技能，并且一般而言都潜藏于互动时的谈话之中，即，在我们日常世俗的社会交往之中，也在我们每日的（而且有时候不那么乏味的）工作场所以及机构性互动之中（一项非常有趣的、涉及“世俗的”与“机构性”互动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是梅纳德（Maynard, 2003）针对日常的医疗机构中的坏消息的传播所作的研究调查）。因此，机构情境中的语言实践并不只专属于这一种情境。所以，针对机构对话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揭示出某种机构性实践或者常规模式是某一给定（机构性）情境所具备的专门的**特点**，或者某种语言特点或语言行为在给定的情境中具有典型的用法。【212】

这一研究目的，源自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明确了互动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的概貌——即，要证明某一对话不仅只是恰巧发生在某一机构性情境之中的，而是通过语言的运用，参与者会适应各自在情境中的机构身份、角色以及任务，也就是说，参与者的机构身份和角色与他们的谈话之间是**一步一步**关联起来的，证明这一点十分重要。（参阅前文有关文本片段（1）的讨论；关于这些问题，参阅 Schegloff, 1992）。我们这里所探讨了的语言使用的诸多方面（层面）——词汇选择、语法/句法，次序（包括话轮转换问题），以及实用性推理——对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进行研究，都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参与者自己是如何适应他们的机构身份以及管理他们的机构活动的。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本章只能对机构性互动中的语言使用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尤其是话轮转换、词汇选择、句法/语法结构、活动以及具体的情境性推理这些方面。当然，对于机构性互动的分析，还涉及许多其他有待研究的内容。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此所作的探讨，至少可以说明，通过研究，在类似看医生、工作面试、广播采访、社会安保求助、出庭等场合中的共同参与者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展开活动的，我们据此可以着手获得怎样的发现。

未来，本领域的研究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进一步发展，包括：

◎深入地探索通常所谓的社交性的互动谈话和机构性互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关于机构性互动谈话的特色问题，以及在理解更为专业的场合所使用语言方式方面，日常互动如何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的基础，就这些问题，我们要形成更深入的认识；
◎对不断扩大范围的机构情境以及互动类型的探索；
◎进一步发展针对医疗互动的研究，因为医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专家和病人彼此之间的交流；
◎更为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这将有助于提升机构情境中沟通的有效性。

注 释

[1] 本章中引用的文本片段均作了转录处理，采取的是会话分析领域的盖尔·杰斐逊（Gail Jefferson）提出的传统的转录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自然发生的话语的学者们都大量采取了转录这一方法。

[2] 例子当中的缩写符号分别代表：CON=conditional（有条件的）；SG3=singular third person（第三人称单数）；PL2=plural second person（第二人称复数）

[3] 第一人和第二人的表述不需要有单独的主格，因为动词的形式暗示出了人称和数。在口语中通常与第一人称复数相关联的动词形式，就是所谓的被动形式，第 2 行和第 3 行中均有使用。

延伸阅读

Clark, C., Drew, P. and Pinch, T. (2003) 'Managing prospect affiliation and rapport in business-to-business sales encounters', *Discourse Studies*, 5: 5–31.

http://dis.sagepub.com/content/5/1/5.full.pdf+html

Peräkylä, A. (1998)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delivery of diagnosis in primary health car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1: 301–20.

Stokoe, E. and Edwards, D. (2008) '"Did you have permission to smash your neighbour's door?": Silly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in police-suspect interrogations', *Discourse Studies*, 10: 89–111.

http://dis.sagepub.com/content/10/1/89.full.pdf+html

关于机构对话，有一些综述性的文章，探讨的是其所涉及的更广阔的理论性和方法性问题，并且涵盖了大量的机构情境。一些其他的专著以及丛书关注的是特定的机构情境里的互动，例如医疗中的互动，或者法庭上的互动。这些重要的出版物将会增进你对于这一日新月异的、日渐重要的研究领域的了解，这其中的一些出版物列举如下。

Heritage, J. and Clayman, S. (2010) *Talk in Action: Interactions,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Chichester: Wiley.

这是在整个领域之中的非常权威和全面的概述性著作，其中包括对于大量领域中（医疗的、法律的，等等）最相关的研究的论述。目前，在机构对话方面，这是一本标志性的最佳读本。

Arminen, I. (2005)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 *Studies of Talk at Work*. Aldershot: Ashgate.

这是本领域的一部最新的、优秀的综述性著作，这本书的主题结构非同寻常且在分析上妙趣横生。

Atkinson, J.M. and Drew, P. (1979) *Order in Court: The Organisation of Verbal Interaction in Judicial Settings*. London:Macmillan.

这或许是针对机构互动所展开的第一项研究，考察的是法庭上的交叉询问，采用的是会话分析的视角和方法。

Drew, P. and Heritage, J. (eds) (1992)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极力推荐，作为此领域的关键性“教科书”，它有清晰的理论介绍、方法论介绍，还囊括了针对大量机构性情境的相关研究。

Heritage, J. and Clayman, S. (2010) *Talk in Action: Interactions,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London: Blackwell.

本领域最新的教科书，属于必读书目。对整个领域的概况作了精彩的介绍，还有关于医药咨询、电话报警、法庭、媒体采访以及政治演说的各个章节。

McHoul, A. and Rapley, M. (eds) (2002) *How to Analyse Talk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 Casebook of Methods*.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本书从别具一格的视角，以实践的以及方法的角度展开论述。

Sarangi, S. and Roberts, C. (eds) (1999) *Talk, Work and Institutional Order. Discourse in Medical, Mediation and Management Setting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这是一本有趣且实用的合辑，精妙地编写，采用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方法论的立足点。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从网站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获取。

Clark, C., Drew, P. and Pinch, T. (2003) 'Managing prospect affiliation and rapport in business-to-business sales encounters'. *Discourse Studies*, 5, 5–31.

Stokoe, E. and Edwards, D. (2008) '"Did you have permission to smash your neighbour's door?" Silly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in police-suspect interrogations'. *Discourse Studies*, 10, 89–111.

参考文献

Antaki, C. (ed.) (forthcoming) *Applied Conversation Analysis: Changing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London: Palgrave.

Arminen, I. (2005)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 Studies of Talk at Work*. Aldershot: Ashgate.

Asmuss, B. and Svennevig, J. (eds) (2009) 'Meeting talk'.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46 (1): 3.

Atkinson, J.M. and Drew, P. (1979) *Order in Court: The Organisation of Verbal Interaction in Judicial Settings*. London: Macmillan.

Clark, C., Drew, P. and Pinch, T. (2003) 'Managing prospect affiliation and rapport in business-to-business sales encounters'. *Discourse Studies*, 5: 5–31.

Clayman, S. and Heritage, J. (2002) *The News Interview: 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layman, S., Heritage, J., Elliot, M. and McDonald, L. (2007) 'When does the watchdog bark? Conditions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i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23–41.

Cordella M. (2004) *The Dynamic Consultation: A Discourse Analytical Study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otterill, J. (ed.) (2007) *The Language of Sexual Crim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Coulthard, M. and Ashby, M.C. (1976). 'The analysis of medical interviews'. In M. Wadsworth, and D. Robinson (eds), *Understanding Everyday Medical Life* (pp. 69–88). London: Robertson.

Coupland, J. (ed.) (2000) *Small Talk*. London: Longman.

Coupland, N. (2007) *Style: Language Variation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rl, T.S. and Drew, P. (2008) 'Contingency and action: a comparison of two forms of requesting'.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1: 129–53.

Danet, B. (1980) '"Baby" or "fetus":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a manslaughter trial'. *Semiotica*, 32: 187–219.

Drew, P. (1990) 'Strategies in the contest between lawyers and witnesses in court examinations'. In J.N. Levi and A.G. Walker (eds),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pp. 39–64). New York: Plenum.

Drew, P. (2002) 'Out of context: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domestic life and the workplace, as contexts for (business) talk'.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2: 477–94.

Drew, P. and Heritage, J. (1992) 'Analyzing talk at work: an introduction'. In P. Drew and J.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pp. 3–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ranti, A. (1997).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ggins, S. and Martin, J.R. (1997) 'Genres and registers of discourse'. In T.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ume 1* (pp. 230–56). London: Sage.

Emmertsen, S. (2007) 'Interviewers' challenging questions in British debate interview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570–91 .

Erickson, F. and Shultz, J. (1982) *The Counsellor as Gatekeeper: Social Interaction in Interviews*. New York: Academic.

Fitch, K. (1998) *Speaking Relationally: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New York: Guilford.

Ford, C.E. (2008) *Women Speaking up: Getting and Using Turns in Workplace Meeting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Frankel, R. (1990) 'Talking in interviews: a dispreference for patient-initiated questions in physician-patient encounters'. In G. Psathas (ed.), *Interaction Competence* (pp. 231–62).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Goffman, E. (1972)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London: Penguin.

Goodwin, C. and Duranti, A. (1992) 'Rethinking context: an introduction'. 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pp. 1–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mperz, J.J. (ed.)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mperz, J.J. and Cook-Gumperz, J. (1982)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n J.J. Gumperz (ed.),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pp. 1–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ath, S.B. (1983) *Ways with Words: Language, Life and Work in Communities and Classroo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inemann, T. (2006) ' "Will you or can't you?": displaying entitlement in interrogative reques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8: 1081–104.

Heritage, J. (1997)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talk: analyzing data'.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61–82). London: Sage.

Heritage, J. and Maynard, D.W. (eds) (2006) *Communication in Medical Care: Interaction between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and Pati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ritage, J. and Robinson, J.D. (2006) 'The structure of patients' presenting concerns: physicians' opening ques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19: 89–102.

Heritage, J. and Roth, A.L. (1995) 'Grammar and institution: questions and questioning in the broadcast news interview'.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8: 1–60.

Heritage, J. and Stivers, T. (1999) 'Online commentary in acute medical visits: a method of shaping patient expectat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9: 1501–17.

Heritage, J., Robinson, J., Elliott, M., Beckett, M. and Wilkes, M. (2007) 'Reducing patients' unmet concerns in primary care: the difference one word can make'.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2: 1429–33.

Holmes, J. and Stubbe, M. (2003) *Power and Politeness in the Workplace: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alk at Work*. London: Pearson.

Hutchby, I. (2001) *Conversation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Telephone to the Internet*. Cambridge: Polity.

Jones, R. and Thornborrow, J. (2004) 'Floors, talk and the organisation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Language in Society*, 33:233–423.

Levinson, S. (1992) 'Activity types and language'. In P. Drew and J.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p. 66–1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dström, A. (2005) '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 a study of how senior citizens request assistance with practical tasks in children's speech'. In A. Hakulinen and M. Selting (eds), *Syntax and Lexis in Conversation* (pp. 209–3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cHoul, A. (1978)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s at formal talk in the classroom'. *Language in Society*, 7: 183–213.

Mangione-Smith, R., Stivers, T., Elliott, M., McDonald, L. and Heritage, J. (2003) 'Online commentary during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 communication tool for avoiding inappropriate prescribing?',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6: 313–20.

Margutti, P. (2006) ' "Are you human beings?": order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rough questioning in primary classroom interaction'.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7: 313–46.

Maynard, D.W. (1984) *Inside Plea Bargaining: The Language of Negotiations*. New York: Plenum.

Maynard, D.W. (2003) *Good News, Bad News: Conversational Order in Everyday Talk and Clinical Setting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ehan, H. (1979) *Learning Less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ndada, L. (2007) 'Operating together through videoconference: members' procedures for accomplishing a common space of action'. In S. Hester and D. Francis (eds), *Orders of Ordinary Action: Respecifying Sociological Knowledge* (pp. 51–67). Aldershot: Ashgate.

Peräkylä, A. (1995) *AIDS Counselling: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and Clinical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räkylä, A. (1998)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the delivery of diagnosis in primary health car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61: 301–20.

Peräkylä, A., Antaki, C., Vehviläinen, S. and Leudar, I. (eds) (2008)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tz, A. (2004) 'Investigative reported absences: "neutrally" catching the truants'. In G. Lerner (ed.), *Conversation Analysis: Studi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pp. 109–2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aevaara, L. (2011) 'Accounts at convenience stores: doing dispreference and small talk'.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556–71.

Raevaara, L. and Sorjonen, M.-L. (2006) 'Vuorovaikutuksen osanottajien toiminta ja genre: keskustelunanalyysin näkökulma'. In A. Mäntynen, S. Shore and A. Solin (eds), *Genre—tekstilaji* (pp. 122–50).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Rampton, B. (2006) *Language in Late Modernity: Interaction in an Urban Scho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er, D.L. and Hall, J.A. (1992) *Doctors Talking to Patients/Patients Talking to Doctors*. Westport, CT: Auburn.

Ruusuvuori, J. (2000) '*Control in medical consultation: practices for giving and rece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visit in primary health care*'. Electronic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ampere. Acta Electronica Universitatis Tamperensis 16. http://acta.uta.fi.

Sacks, H. (1992 [1964–197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umes 1 & 2 (edited by Gail Jefferson). Oxford: Blackwell.

Schegloff, E.A. (1992) 'On talk and its institutional occasions'. In P. Drew and J. Heritage (eds),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pp. 101–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edhouse, P. (2004) *The Interac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 Conversation Analysis Perspective*. Malden, MA: Blackwell.

Sinclair, J.M. and Coulthard, M. (1975)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ed by Teachers and Pupi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lverman, D. (1987) *Communication and Medical Practice: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Clinic*.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7) *Discourses of Counselling: HIV Counselling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Sorjonen, M.-L., Raevaara, L., Haakana, M., Tammi, T. and Peräkylä, A. (2006) 'Lifestyle discussions in medical interviews'. In J. Heritage and D.W. Maynard (eds), *Communication in Medical Care* (pp. 349–7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vers, T. (2007) *Prescribing under Pressure: Parent-Physician Conversations and Antibio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tokoe, E. and Edwards, D. (2008) '"Did you have permission to smash your neighbour's door?": silly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in police-suspect interrogations'. *Discourse Studies*, 10: 89–111.

Whalen, J., Zimmerman, D.H. and Whalen M.R. (1988) 'When words fail: a single case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5: 335–62.

话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11

Gender and Power in Discourse

⊙ 米歇尔·M. 拉扎尔　谢丽斯·克拉马雷

11.1 引　言

如今许多人都很熟悉，至少会用层级性社会结构和规范的某种方式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类，同时清楚不同的任务、期待和评价是如何赋予在这两类人的身上并使之有了不同的谈话方式。通过本章，我们将深入地探究社会性别（gender）和权力（power）的不对称性概念，并探讨话语分析研究的方式如何帮助我们改变一些想法，如“社会性别”是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交谈和文本而建构的。

一些人认为“女性”和“社会性别”是同义术语，而且都假定关于“社会性别”的研究主要是属于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或者与“特殊”或“边缘”兴趣相关的课程内容。我们的讨论表明对社会性别的研究涵盖了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者（feminist）对话语中的社会性别进行批判，对于任何一个关注当前重要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的人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本章的组织结构围绕标题中的三个关键词：“话语”，“社会性别”和“权力”。尽管这三个词密不可分——很难将“社会性别”从“权力”中剥离出来，而且两者非常关键地形塑着话语，并被话语形塑——但为了将该领域中学者们已有研究的相关议题梳理出来，我们将对这些概念逐一聚焦。因此在组织本章时，我们从大量的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学者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和方法论中提取出范例和个案，尽管他们致力于各种特殊的理论、方法论和分析视角，但都广泛地定位于并展示了这些议题的鲜活性。在结论之前，我们以 2008 年《欲望都市》（电影版）节选为案例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该案例分析凸显并汇集了话语中社会性别和权力的一些关键点。【218】

11.2 话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早期，“性别歧视（sexist）语言”的研究和批评（正如俗语“人人都会在晋升中得到机会”所揭示的，以及用来形容女人和男人性活跃程度不同的词，这些词的使用比例是失衡的）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而且大部分媒体报道所使用的词都是嘲讽语气

的）。少有人将目光投向对于那些呼吁关注日常互动中社会性别化动态过程的研究，而这种动态性恰好揭示了性别歧视意义是社会性（再）生产，并隐藏在语言使用者和使用情境中，而不是在性别歧视的字词本身。显然，大部分人都认为性别歧视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行为应该接受更大的批评监督。

当代语言和社会性别的探究大多聚焦于话语的社会建构。其共识是我们的社会世界包含了社会性别与权力，部分程度上形塑于并形塑着我们对语言的使用，而非仅仅将语言视作既存现实的反映。话语的研究转向标志着从早先对“性别歧视语言”的关注转移到了话语中社会性别（以及社会性别不对称）的研究。学者们观察到，尽管不存在非性别歧视的语言学专业术语，却在社会互动中以一种刻板印象式的、带有偏见性的方式来使用语言，并通过社会实践和制度结构，（再）生产出贬损和弱化女孩和妇女的看法（Cameron，2006；Weatherall，2002）。

举个例子，一项对发生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成人和未成年人之间谈话的研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青少年如何习得社会性别及其具体体现方式。凯瑟琳·洛夫林（Kathryn Lovering，1995）发现，由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就身体和性的交谈在不列颠文化里有些普遍接受的规则，加之在学校又缺乏性别对待方面的平等性，因此男孩和女孩对“长大”有了不同的理解方式，同时这也影响了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女孩和男孩们交谈时都认为，女性身体是羞耻且不同寻常的，男性身体普通且不是注意力的焦点，也不像女性身体那样会遭受同等程度的嘲讽或压抑。例如，你可以听到一个女孩这样的反映：“感觉像是女孩要经历所有的变化，因为没人教过我们任何有关男孩的东西，真的”（Lovering, 1995:24）；“我简直无法忍受男孩儿们的笑”；“因为它压抑了我们，要让我们把一切都藏起来”（Lovering, 1995: 27）。

然而，学校里的男孩却可以肆无忌惮地谈论关于如何不断地建立男子气概和异性恋的话题。在另一项对英格兰某英语课上的小组讨论的研究中，女孩儿们受到了一些隐晦的嘲笑和攻击，同时个体的男生则常常会因为不具备“真的”男孩儿特质而显得格外异常（Davies, 2003）。有一个男孩，关注于作业任务中所研究的诗歌里面提及的颜色，使用了诸如“耀眼的”、“华丽的”、“金黄的”和“深赭色的”等词汇。那么，在整个讨论中，他和他的谈话都会受到其他男孩的批评，类似的评价如“你真笨啊，你！”，“闭嘴”，“听听他/听听他说的/哦，上帝啊！”，“看见没？/你一定要像那样讲话、像个怪人一样张牙舞爪吗？”以及“愚蠢”、“怪人”和“讨嫌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下，男子气概岌岌可危，可又必须要拥有这样的气概。不仅如此，通过戴维斯（Davies, 2003）的观察发现，男孩们对同性恋的调侃以及反学校、反女性文化（anti-female culture）使得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招致更多麻烦，这是由于他们自己过度地呈现出他们所认为的（非同性恋标准）男子气概，却使得自己成为了受害者。

【219】

因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方式去了解特定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在这种情境下，同样的文本或谈话中不同话语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人们认识与话语相关的自我和他者的意义成为了研究兴趣所在。

举个例子，米歇尔·拉扎尔（Lazar, 2000）通过对促进新加坡家庭生活的系列政府广告进行社会性别关系的批判分析，发现在一组同样的文本中有关父母身份的社会性别关系的两种话语同时并存。其中一种是基于（女权主义）平等原则的激进话语，例如，在使用“家长”/“父母身份”这个性别中立词语时存在着一种偏向，与共享的父母身份相一致。另一种话语是保守性的，

基于对男人和女人的文化上的规范期待；例如，广告中反复提及女性需要“平衡”好她们的事业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应作出有利于家庭的“正确选择”（Lazar, 2000: 392），而对于男性却没有类似的强调。其研究假设就是较之于父亲身份在男性的自我感中的地位而言，母亲身份在女性的自我感中更加中心化。通过对话语中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记录了竞争性话语中存在明显的张力和聚合，以及男女之间权力关系的意义。该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一段常见的预示着异性婚姻的异性恋话语中嵌入了双重的社会性别话语。关于社会性别和性的话语的不可分离性，产生了不同的方式去了解在一个给定的社会里如何成为一个（支持性的和“他者中心的”）异性恋妻子和母亲，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家中领导者和“有闲的父亲”）异性恋丈夫和父亲。

在话语和社会性别研究中，分析者会利用语境化的、自然发生的以及口述、转录为文本并打印出的语料数据，这些数据取材于诸多领域，如教育、媒介、法律、医学、工作场所、家庭、竞技团体以及非正式的社交网络。紧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性别分析的数据资料已经不限于传统印刷文本和面对面地互动，进而发展到了互联网和各种计算机中介传播（CMC）的研究。我们通常是在现有的互动模式中对新传播技术加以发展和利用，因此我们看到甚至是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环境下也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嘲弄、玩笑和绯闻等互动模式，尽管它们的呈现方式和面对面交流有明显不同。

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对符号模式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具有重要价值。基于长达 15 个月的田野调查和对参与者借用相机制作的视频的分析，格里·布朗斯廷（Bloustien, 2001）对此作了充分地阐释。在布朗斯廷的研究中，她分析了来自不同背景的澳大利亚青年女孩是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服饰、姿态、体态、肢体接触以及语言，来参与、感知和呈现她们世界的，布朗斯廷注意到，在女孩们讨论和探索人的距离、身体和关系等问题时，会不断地对外貌作出审视和评论。在她们所处的文化中，关于女孩和妇女应该怎样打扮以及应该如何行事，普遍存在着矛盾，身处其中，她们既要努力合群，又要保持个性，她们学着适应、吸收和抵抗她们所理解的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举个例子，女孩们谈论着自己的难处，即她们的身体是作为性别物体而被他人感知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很快失去“好声誉”。其中一个女孩说道：“当一个男孩被称为‘**小白脸**’的时候，他反而高兴。但是当一个女孩被称为‘***荡妇***’的时候，她就得哭死了。”另一个女孩补充道，“你可以在一周内惹上一个坏名声。但是想要摆脱它——（耸肩并无奈地笑笑）那么，估计得花上一年时间！”观察女孩们的“身体运作”过程，听听她们是如何理解别人的具体实践，是研究者调查女孩们调用自我感知的方式的关键所在。 【220】

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多维度话语分析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然而，我们预测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增加，特别是随着新技术工具和多媒体的推广，以及随之出现的新话语形式的增多。很多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创新性地超越了现有的分析水平，从近距离检视日常交际转向考察这些交际的社会情境，包括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考察（Thorne，2001）。以多维度视角对话语进行分析，必将拓宽和深化我们对当代生活以及社会性别的理解。

11.3 话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女性主义者对“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区分：性别更多地归属于生物属性，[1]而社会性别则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过程获得的（West and Zimmerman, 1987）。当时的性别社会化理论认为性别和社会性别相互勾连，由此，“仅有的两种性别” 差异投射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并导致了身份分类，而且这样的分类通常被认为是固化、稳定以及二分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思考，我们将在后文予以详述）。

这种理解方式在早期的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中行之有效，而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惯用的二元描述符号（例如，“女性”、“男性”和“两种社会性别”）、对女人和男人言语风格的刻板印象[2]、对男女恰当的说话方式的期待，以及（由此导致的）用于讨论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身份之间关系的词汇的匮乏。这类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对差异的追问和研究结果大抵都被认为是对女性解读欠佳，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男性的行为才是符合社会规范的（Lakoff, 1975）。总而言之，仅仅关注于差异问题，不是挑战，而是支持促成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3]

【221】

在诸多语言和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对女性 / 男性*差异*问题的关注，同样也不能公正地反映大多数互动类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这会使得许多相似之处被一笔带过。例如，在美国学校中，男孩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玩“男孩的游戏”，而女孩会花更多时间来玩“女孩的游戏”，但是同样也存在跨社会性别的游戏，如果研究者只将注意力放在差异上，那么他便会忽视那些跨社会性别的游戏（Thorne, 1990）。过分地关注男女差异也会导致无法明辨他们在社会互动时的目的是什么。举个例子，如果有研究发现在交谈中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加强语气的“所以”一词，那也无法说明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处于何种背景之下才出现这样的情况（Swan, 2002:51）。更进一步说，“社会性别差异”的研究忽视了“社会性别”这一范畴的复杂性。[4]举个例子，在太平洋地区，一些汤加男人“表现得像女人”一样，采用了汤加女人典型的说话方式，例如说话时声调比较高，速度比较快，而且会夹杂英语。这些行为表明，这些转换了社会性别的男性（或者 *fakaleitī*，*跨性别者*）已经与“天生的男性气概”相去甚远，转而更具有女性气质（femininity）（Besnier, 2003）。

实际上，当代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转向，从调查什么*是*社会性别以及在话语中各自的表达如何，转而关注社会性别是如何作为情境化的语境和实践社区中的话语结果而出现的。从 1980 年代末以及 1990 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性别其实是人们扮演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别并非既有的和固化的，也并非与性别[5]相连，相反，社会性别持续性地生成于行为和话语之中。社会性别是一种日常且反复出现的活动，而且是通过大量制度性背景下的互动来完成的。“实践社会性别（doing gender）”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创造了分层和等级差异，且被用于强化社会性别的“要素”以及为歧视进行辩护和正名（West and Zimmerman, 1987）。朱迪思·巴特勒（Butler, 1990: 25）假定社会性别是“身体的重复性格式化，也就是说在一个具有严格规章制度框架内一整套重复的行为，这个框架会随着时间而趋于固定，以生成实质行为的外在表现，一种自然存在的外在表现”。更具体来说，在语言使用方面，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研究语言和社会性别的学者已经开始把分散的行为看作是人们生产其社会性别身份场所（而不是相反的看法），而且在演绎社会性别的过程中，人们也会再生产出文化的

【222】

制度规范。如果社会性别是需要来完成或表现的，社会性别同样也可以是“未完成的（undone）”（Deutsch, 2007）或者是“被解构的（de-constructed）”（Butler, 1990）。

一项关于旧金山某幻想热线的话务员所采取的话语风格的研究，说明了人们通过谈话来演绎社会性别身份。基拉·霍尔（Hall, 1995: 200）发现，为了迎合她们的（异性恋的）男性客户，电话性爱的话务员不断地说着某种依附于霸权男性感知中的“理想女性”的语言，这种语言以频繁使用加强语气词、女性化词汇（如“卷卷的”，“温暖舒适的”）、支持性的问题和评论（如“你喜欢那样吗？”）以及一种动态的语调模式（“一种女性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节奏”）为特征。正如霍尔所注意到的，这些词汇所具备的语言学特征，在早期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中被认为是无力的“女人的语言”，这些话务员就常常采用这类语言以表现出一种女性特征，并将其“兜售”给（异性恋的）男性市场。基于这种基本的对话风格，幻想热线的话务员同样可以继续展现出多种其他的与种族和年龄因素相关的女性身份。例如，一个话务员假扮为一个高音调的、18岁的女孩，或者是具有端庄的亚洲口音的女人，抑或是一位有着东欧口音的专横“老女人”。而正如该研究所表明的，当一个（双性恋的）男性话务员表达出一种“轻柔且安静”的声音，并且采用了与女性有着固化联系的细心的话语风格时，男人同样可以扮演一个（异性恋的）女性身份（Hall，1995:201−203）。该研究突出之处是揭示了社会性别身份的表演意识。但是，不那么明显但同样也是一种表演的是，人们常规性、重复性的言谈举止的方式往往是无意识的，这些方式在其文化中被感知为“属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别。

总而言之，话语分析中的社会性别研究阐释了互动可以生产、改变社会性别身份范畴的方式。与此同时，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为了避免作出过于简单和普遍化的论述，“社会性别”需要与其他社会身份类型和分层体系相互联系起来考察，例如种族和民族、社会阶层和地位、性别、有（无）能力、年龄、文化和国籍等。这也就是说，女人和男人长期参与到各类社会互动中，以多种对抗普遍性的方式来进行交谈。在美国，由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以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所具有的“双重意识”，他们或许尤其擅长使用多种语言风格，将依据必要性和个人意愿在多种语言风格间进行转换（Bucholtz, 1996；Scott, 2002）。男孩，和女孩一样，也可以说是通过不厌其烦地参考性征、阶层、种族和年龄等因素来构建他们的社会性别身份（Frosh et al., 2002）。我们要格外注意这些“差异”，例如，要认识到社会性别是种族化和阶级化的，即使我们竭力避免陷入刻板印象的困境（Kroløkke and Sørensen, 2006）。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性别身份既不是同质的、也并非单一的；当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本就不均匀而且多样化，认识到这一点十分必要。

【223】

在技术的助推下文化全球化发展迅速，“全球”和“本土”之间的关系为社会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基于社会身份网络的研究维度。说明社会性别、性征和跨国/全球身份之间相互交汇的一个例子是，一些中国网民通过对汉语书写系统进行创新和改编从而建构了他们的身份（Gao and Yuan, 2005; Yang，2007）。近几年，对“同志”[1]这个词玩笑式的新用法，就是吸收了本土语言的使用习惯，如今这个词已经广泛地用于“同性恋”的另一种表达，这种词语的变迁，或许正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想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国民身份有关。在中国一些女同性恋网络

1 原文此处为中文汉字，其英文“comrade”是个多义词，它可以指“道同志合的人”，代表朋友间的称呼。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广泛使用该词以表达具有共同志向的人，用于人民之间彼此称呼，区别于阶级敌人；如今有了“同性恋者”的含义。——译者注

社区，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用于女同性恋的更新潮的表达——“拉拉”[1]（发音lā lā），“拉拉”是汉语书写系统中对英语词汇“Lesbian”首字母的一种改编用法，这个词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因此，通过创造性地将民族的和国际的语言资源整合到一起，一些中国女同性恋者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这表明了她们既想与世界接轨又能保持本土性的强烈愿望（参见 Zhang and Kramarae, 2008）。

11.4 话语中的社会性别与权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伴随着重要的社会变革，不同国家和亚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或多或少也发生了变化，话语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对于记录这些变化显得至关重要。举个例子，如今更多的女人在性生育方面有了更大的决策权，并且有机会获得教育，谋求一个有薪资的职位，也有一些女性似乎已经打破了人们俗称的天花板效应。一些教育系统、工作场合以及媒介中公然的性别歧视状况也不再那么普遍，并且越来越多的女人和男人都宣称他们支持社会性别的平等。[6]【224】然而这样的转变是如何持续的，或者如何深化的，仍不甚明晰。世界上大部分的女人还是集中在一起做着同样类型的工作，赚得比男人要少，在争取领导职位时面临更大的困难，她们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活儿，要照顾小孩和老人。一些女人甚至比其他女人更加窘迫——例如，在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尤其处于弱势地位（Browne, 1999）。甚至是在那些已有立法针对公然的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性骚扰和身体暴力仍然存在。网络空间曾一度被认为是对于女人而言具有民主潜力的“中立”前线，在这里女人可以获得与男人并驾齐驱的平等资格，然而事实很快证明，面对面互动中的社会性别的不对称性在虚拟空间的交际里同样存在。尤其是在收发邮件、短信、即时通讯时，在聊天室、博客和其他社交网站中进行交流时，女性显然沦为了网络欺凌的对象，网络欺凌的手段包括羞辱性言论、有害信息、流言蜚语、造谣中伤以及其他“虚拟的嘲讽”等。

根据苏珊·赫林、德博拉·约翰逊和塔玛拉·迪本尼德托的一项研究（Herring, Johnson, and DiBenedetto, 1998），即使是在一个对女性友好的学术性线上讨论组中，女性有时也会受到欺负。在他们研究的一个讨论组中，尽管女性的发帖量只占总体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在一个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讨论中，女性的发帖贡献超过了男性，不过讨论也因为一些男性的抱怨而中断了，他们威胁要退出讨论组，而且声称自己被“沉默”了，他们认为女人们的说话语调充满了“责难”和“不切实际”。而研究者发现与男性抱怨的情况恰恰相反，唯一一条毫无争议持负面语调的发帖却来源于一位男性，他“指责讨论组里的女人们‘不经斟酌地发表观点’，而且通常，对那些没有严格遵循女权主义原则的男人都进行‘猛烈抨击’、‘良心谴责’和‘欺侮威吓’”（Herring, Johnson and DiBenedetto, 1998: 202）。

一些理论家认为，尽管主要的权力不平衡仍旧存在着，人们或许不再那么情愿或者无法说出这些不平衡现象存在的种种原因，他们常常说，社会性别与他们无关，并且，导致社会不公和持续性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不是性别歧视，而是不平衡现象背后的种种原因（Wetterer,

---

1 原文此处为中文汉字。——译者注

2003）。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是，在许多情境中，无论你是社会性别歧视的施者还是受者，现在都成为一件不受社会欢迎而且是我们想要极力否认的事情。对女性和男性的话语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深度挖掘社会性别公正的冲突性感知是如何作用的，以及表明细微的性别歧视形成的机制。例如，在伊丽莎白·凯兰（Kelan, 2007）的一项研究中，她让瑞士的信息传播技术工人说说女人在这个工作领域中的不足之处，继而考察他们的回答，结果她发现，虽然这些男性工人否认公司歧视女性，但是在他们解释本领域女性员工之稀少的原因时，经常会使用“我不知道”以及常常是相互冲突并且非常复杂的原因来作出解释。

对于工作场合的交际中权力关系的建构方式，我们有一些理所当然的假设，而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往往形成了这些假设的一部分内容。在一项针对新西兰工作场合的研究中，珍妮特·霍姆斯（Holmes, 2005）发现，人们对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模式有所期待，这种模式将控制性谈话与男人联系在一起，将支持性谈话与女人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这种话语模式的期待，决定了在工作场合的文化中，什么是男人和女人各自合适的、或者说“正常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当某位女经理在“行使权力”时公开采用了“男子气概”的话语风格，也就是跨越了得体的社会性别行为边界，那么那些男人们或者其他人通常会以表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边界的方式作出回应。例如，一个女经理在坚决地否定了某个组的项目之后，她会去询问她的同事，“有没有人因为那个决定而有被剥夺权利的感觉［？］”（Holmes, 2005: 51），这说明她对于自己公然地缺乏女性气质的、不合适的话语风格具有一种自我意识。此研究还阐释了，社会性别在社会互动中常常隐藏于表层之下，并随时浮现出来，重现那些针对职场女性而言的可接受行为的限制，而男性经理则免于这种限制。

【225】

关于话语中的社会性别的近期研究凸显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复杂性，这是因为社会性别和其他层级因素，如种族、阶层、性征以及地域有着交互影响。当下的一些研究同样强调权力的关联性（而不是绝对性），处于此种关系中的女性的代理和抵抗被认为受到了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例如，由游说团体和政府工作人员发起的针对性工作者的全球性的讨论，经常将从事性工作的女性描述为“奴隶”或者“受害者”，而且是无助的、被忽视的和被愚弄的。然而在与柬埔寨的性工作者交谈的过程中，拉里莎·桑迪（Sandy, 2007）发现，总体的经济结构与她们的家庭经历交互作用，促成了她们的行为：这些女性常常是被动地选择这份工作，作为一种对个人境况的实际的回应，即使并不情愿。这些女性的选择都受到“层级结构，诸如社会性别、阶层和社会－文化职责以及匮乏的就业机会”的限制和影响（参见摘要，http://www.ass.asn.au/TAJA/Content_18_2.html）。她们不仅是受害者，她们同样也是决定如何生存的行动者，尽管所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道德至上者和家长主义者的分析和解救方法根本不能解决她们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基于对所牵涉的诸多社会制度的理解所推动的社会福利项目和其他主要的社会变革开始着手寻求办法。正如维多利亚·德弗朗西斯科（DeFrancisco, 1997）所论述的，话语分析仔细考察了个人和社会制度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本地的还是全球的变革中，这种分析都举足轻重。

另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在家庭中处于附属地位、在工厂工作遭受剥削，一群年轻的爪哇工人阶级女性创造了对抗工厂压迫者的抗议话语（Berman, 1994）。重述，是她们在口头交流中一种分散的资源，它可以用于满足两个功能。一是通过直接引用压迫者在息事宁人时由那些工厂

管理者所使用的印度尼西亚语，妇女们把她们自己和那些不道德以及不公平的权威人士划清了界限。同时，通过使用本地的爪哇语，相互重述同僚的话，表现了这些妇女们的团结一致和同仇敌忾。尽管她们遭受到社会性别和贫困的双重压迫，并因此而失语，但她们仍然试图去抵抗剥夺了她们权利的支配的意识形态。不同于早期仅仅关注男性对女性支配的研究，伯曼的研究强调了妇女们采取话语上的赋权和团结等抗争策略（尽管这个案例中的抗议以失败告终）。

【226】 文献研究表明权力关系复杂性的另一方面是，与社会性别和权力相关的社会问题如何在制度情境中由行动者加以利用和中立化对待。对此，米歇尔·拉扎尔（Lazar, 2006, 2007）在对全球媒介中的“权力的女性气质（power femininity）”的相关界定中有所阐释。权力的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份，和新自由学派的后女性主义话语有关，这一概念吸收了女性主义自由解放和赋权的价值观，同时传递着普遍流行的后女性主义假设，即女性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理论都过时了，（所有）女性都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平等，并且权力关系正在转向对女性有益的一面。从媒介语言和视觉形象中呈现出来的女性已经是强大的代言人，她们自主独立、掌控大局且积极主动。例如，有关美容产品的广告，用言语鼓动消费者“发现最棒的你”以及“摆脱传统，引领潮流”，或者表达具有自我决策意识的女性心声：“我的身体，我做主”。视觉方面——通常是通过一种直视和某种姿态，或者有时是“不好惹”的搏斗姿势——来呈现出坚定自信的女性形象。从批判的角度来看，拉扎尔质疑了新自由学派的后女性主义的话语研究，因为它显然忽视了社会抗争、社区以及社会正义等议题。但另一方面，它却促进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和自我陶醉的商品化赋权（commodified empowerment），这种商业力量与传统的（非女性主义）女性气质的目标和实践相共存，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

11.5 话语中的社会性别和权力分析——节选自《欲望都市》

在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个话语分析的案例，以揭示当代文本是如何演绎社会性别的。所选择的文本摘引自《欲望都市（电影版·2008）》（*Sex and the City*），该剧改编自十分受欢迎且获得了 HBO 电视大奖的同名系列电视剧（自 1997 年到 2005 年），主要角色是四位女性朋友——凯莉、夏洛特、米兰达和萨曼莎。与其他相类似的电影（如《BJ 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和《口红丛林》（*Lipstick Jungle*））一样，《欲望都市》（无论是电视剧系列还是电影版）也属于“鸡仔文学”（chick lit）（亦称“小妞文学 / 电影”（chick flick））[1]。在西方国家，尽管这类电影定位于女性受众，但它的传播和消费却更加的全球化。与之类似的电影作品的生产既反映也推进了流行文化中的“后女性主义思潮”的形成。如早先提到的，基于女性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这种论断，将女性的解放和赋权看作是“给予”，并且把新标准的女性气质当作一项权利，后女性主义思潮具有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特点，因为它包含了女性主义、非女性主义、反女性主义的元素（参见 Lazar, 2009），这些复杂的构成，模糊了社会和政治权力 / 赋权的问题，并且中止了女性主义的批评，这也就是为何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对于当代批判性女性主义话语分析而言尤需关注的内容。此外，像《欲望都市》这类针对女性观众的电影具有广

1 是针对女性观众的电影，俗称言情片或者文艺爱情片。——译者注

泛的大众吸引力，给年轻女性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且不可低估的快乐源泉，因此也使得类似这样的女性主义批判文本显得更加至关重要。

我们所分析的文本由三个连续的电影片段组成（参见本章附录的文字稿）。在第一部分之前，凯莉和她的“男朋友”大先生[1]正在参观曼哈顿的顶层公寓，并计划一起搬进来同居。凯莉看上了顶层公寓，但价钱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价格底线（尽管她认为放衣服、鞋子的房间不够大）。大先生为了给凯莉一个惊喜，买下了这层公寓，而且答应给她建造一个更大的衣帽间。第一部分展示了凯莉一边与夏洛特和米兰达走在时髦的纽约大街上，一边兴奋地向好姐妹分享关于公寓的事情。这一片段以她们遇到萨曼莎而结尾。在第二个片段中，四个朋友走进了一家拍卖会场，萨曼莎竞拍她情有独钟的镶花戒指失败了。第三个片段回到了大先生和凯莉的场景。根据之前朋友们的告诫，凯莉担心这个公寓是单独以大先生的名字购买的，一旦分开了，在房子的事情上她将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大先生则提议结婚。 【227】

节选的这些部分，当然，仅仅是一种互动的“抓拍”，它嵌入在整个电影更加宽泛的背景之中，而且也与其电视剧系列具有互文的关系。因此，我们对这一节选片段所作的分析不能孤立于其语境。我们也不指望对样本的分析能够达到完全的详尽、彻底。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将文本作为案例来展示话语中的社会性别是如何被演绎的，从而以一种权力关系的视角，来凸显出在这种演绎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由后女性主义思潮而加深的矛盾和冲突。为了完成这项针对社会性别的分析，我们根据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身份**的建构，组织整理了这一节选部分的内容。社会性别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涉及女人——这四个朋友之间——关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则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凯莉和大先生之间。

这四个女人之间有着紧密而又团结的友谊关系。和社会性别一样，友谊也是通过持续产生的意义和实践，在社交中建立的。通览整个电影和剧集，在长期的友谊关系中，这几个女人常常交换意见、相互批评而且彼此支持。在摘录的第一个片段中，我们可以知道凯莉手舞足蹈地与夏洛特和米兰达分享关于顶层公寓的事情，夏洛特和米兰达的回应也显示了她们之间和谐亲密的关系。夏洛特的表态（“听起来很完美”），以及当凯莉说她自己现在必须把毛衣放在火炉中，夏洛特捧腹大笑，这些都反映了她对凯莉的事情所展现出的浓厚兴趣和感情投入。米兰达的感情投入则体现在她的担忧之上，正如她所说“所以他买下了，你会和他一起住在那儿？”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但是，那是他的房子，所以你还会留着你自己的住所，是吗？”与凯莉忘乎所以的兴奋劲儿相比，米兰达则表达了自己理性的看法。米兰达两次使用了“所以”，且使用了转折词“但是”，以为凯莉重申（为了澄清）她的现实情形——仅有大先生自己才拥有那套公寓。当米兰达说“我仅仅只是想确保你在这事儿上是聪明的”这句话的时候，充分表达了她对凯莉的担心，对此凯莉表示理解和感激——“为此我爱你”。尽管米兰达对凯莉的反应持谨慎态度，但她同样能够去分享凯莉的那一份喜悦。在这个时候，显然凯莉很需要来自米兰达的一份不一样的支持，凯莉传达了这一点，米兰达也微笑默契地照做了（参见下文的节选）。米兰达重新与凯莉达成一致，具体表现在她对凯莉所说的“嫉妒”一词进行了附和，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她也煞费苦心地组织自己的语言。 【228】

1 由于影片中凯莉特意强调她要找一个“big”的人，另外官方的电影简介也使用“大先生”的名称，因此将 Big 翻译成大先生。——译者注

凯莉：　那现在，你可以停止为我担心然后去感受我想让你感受的，嫉妒？喔，嫉妒我就要住进曼哈顿豪华的顶层公寓。

米兰达：　好吧，我嫉妒了。

凯莉：　哦，谢谢。

米兰达：　你住在房地产的天堂，而我住在布鲁克林。

这群纽约朋友陪萨曼莎竞拍的行为也印证了她们的友谊，萨曼莎在一个拍卖会上为了一枚优雅的戒指竞标。相互问候的场面证明了她们的团结——热情的叫喊声，亲吻和拥抱，她们激动的声浪相互叠加，以至于很难区分到底是谁在讲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场景中，凯莉和萨曼莎上演了她们之间的亲密无间：

萨曼莎：　[……] 这枚镶花戒指就是我的精华所在。独一无二，魅力四射。

凯莉：　有点过了啊。

萨曼莎：　正是。[……]

如果没有背景信息，凯莉的嘲讽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就像她对戒指的评价也影射了萨曼莎，萨曼莎将戒指比作她自己的“精华”。然而，考虑到她们之间的友情，凯莉针对萨曼莎的描述所作的回应其实是一种亲密的表现。事实上，萨曼莎也肯定了凯莉的观察。同样，在稍后的场景中，当萨曼莎在拍卖会上没能得到那枚戒指的时候，凯莉安慰地紧握住她的手，在这一幕中亲密无间的友谊再次被“成功塑造”。

朋友之间的团结和支持反映了一种“姐妹关系”，这也是女性主义者非常欣赏的，尽管确实，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她们各自的家庭成员，如果这些角色存在的话。因为这里的女性是个体的人，但同时也是“集体的力量”（Southard, 2008：153）。这一点，在街上的那段场景可作为清晰的明证，凯莉搂着夏洛特和米兰达，这三个人紧挨着彼此，并肩走在路上。在拍卖会的大厅也是如此，凯莉、夏洛特和米兰达围着萨曼莎，一起欣赏挑选展出的戒指，随后在整个拍卖会她们都是坐在一排。虽然这几个女人很团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系列剧中，她们的互动主要都是围绕购物、男人和感情关系而展开（Gerdes, 2008）。她们几乎没有谈论更广阔的社会问题，或者试图将个人与政治联系起来。并且，她们的友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排斥其他女性，例如夏洛特称呼与萨曼莎为竞拍对手的那个女人为“婊子”。

再来看看女人和男人的社会性别关系方面，这部分我们节选了凯莉和大先生之间的权力协商。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凯莉后来决定要卖掉自己的公寓，如此便可以和大先生一起出资购买顶层公寓，这显示了她想要在这段关系中保持平等、合作的愿望：也就是“我希望这间公寓是属于我们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凯莉的这个决定是在试图矫正他们之间先前的权力不对称关系：【229】

凯莉：　可以吗……？我们买得起吗？

大先生：　我搞定了。[对房产经纪人说：]好的，我们来签合同吧。

凯莉怀疑他们是否能够买得起顶层公寓，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大先生做了一个

单方面的决定，也如实说道“我搞定了”。随后大先生说“我们来”其实指的是房产经纪人和他自己，不包括凯莉。但是在这一刻，凯莉却并没有感到此情此景中的她被剥夺了权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得知了购房的惊喜之后，凯莉笑着望向大先生，而接下来的场景就是她兴奋地向她的朋友们复述这件事。毫无疑问，从买房交易过程看，我们知道大先生可以自己独立地买下房子。因此凯莉后来提出的共同购买房产，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并不是为了达成一种财产上的必要行为。此外，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节选内容的末尾，凯莉期待着大先生将会（并且应该）给她建一个更大的衣帽间——“就给我一个真正足够大的衣帽间吧”。这完全是凯莉使用的衣帽间，但打造衣帽间的花销和责任都落到了大先生身上。

在讨论结婚的时候，我们再次发现了先前的权力不对称关系有所体现。

大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
凯莉：　嗯，我……我不认为那是一个选择。
大先生：　假如是一个选择呢？
凯莉：　为什么？什么？你想结婚？
大先生：　我并不介意跟你结婚，你介意嫁给我吗？
凯莉：　不。不，倘若……假如这不是你想的……我的意思是，是……那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大先生：　我想要你。所以……好啊。
凯莉：　所以……？真的吗？我们……我们要结婚了？
大先生：　我们要结婚了。

上述凯莉的回答充满了犹豫、停顿和错误的句子开头，这都显示了她支支吾吾、不确定以及需要得到确认。实际上，每次轮到她说话，她都使用了问题式的措辞。从电影画面上来看也是如此，她的站姿和面部表情展现了她有多么不确定；她耸耸肩，说话的时候甚至不敢保持目光直视。与此相反，大先生是果断且有自信的，他的眼神直截了当。最终，是他宣告了“我们要结婚”才结束了这次讨论。他们要结婚了。句号。（在文稿中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这一点，即当凯莉和大先生交谈时，她的话语风格就典型地开始犯错了（例如，“可以…我们可以付得起吗？”），然而，这可不是大先生说话的一贯风格。但是当凯莉在和她的女性朋友交谈时，就明显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在考量了社会性别关系是如何在互动中形成之后，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后女性主义的女性气质身份的建构。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考虑节选的片段中解放和自主是如何得到体现的，并分析据此展开的矛盾心理；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社会性别身份和其他同样存在的显著的社会身份之间如何相互影响。【230】

萨曼莎说过这样的话“让我们花花我在好莱坞赚的辛苦钱”和“我努力工作，我值得拥有这个”，这些都凸显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以及她们这种因为自己挣钱所以有权享乐的态度。女性有能力为自己花钱购买昂贵的珠宝，这表明了一种基于消费的启用来源。换句话说，对自由和独立的理解变得相当狭隘，也就是能够通过消费来满足个人的欲望。萨曼莎把镶有花

朵的戒指描述为抓到了她自我的精髓所在，以及她自己为自己花钱的行为，这些都成了个人自主的象征。尽管自主被解读为一种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但是，当后来我们了解到其实萨曼莎的男朋友史密斯买下了戒指，而且是作为庆祝他们周年纪念的礼物时，戒指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便是在他们分手后，戒指重新寓意着一段（异性）恋情关系的象征，戒指此后的意义依然是，萨曼莎承诺任何时候，只要看见戒指就会想起史密斯。

有人买东西给你（而不是自己买给自己）显然是异性恋的特权，在节选内容的其他地方也可以得到印证。请注意：这枚镶花戒指的原主人是布莱尔·埃尔肯，最初是她的男朋友买给她的；大先生询问凯莉是否他们（理解：他）应该给她买一颗钻石（订婚）戒；凯莉期望大先生能够为她打造一间更大的衣帽间。因此，从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个人自主和异性恋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其中也隐藏了内心矛盾纠结的“现代”女性对自由解放和独立的看法。

对话中反复出现 “聪明”以及“聪明的女孩”，也体现了已经解放的女性身份。在文本中，一个女人的聪明之处在于要理性地对待以及留心自己的法律权利。“聪明”一词的使用在节选中出现了四次，要么是指称说话者自己，要么是指涉其他女性，这种用法的前提假设是，事实上，女人被刻板地认为是情绪化的、幼稚的。当布莱尔·埃尔肯表露出感情的时候显然就已经不“聪明”了：“当她坠入爱河，她就不再是个聪明的姑娘了。”而米兰达给凯莉的建议是“我只想确定你是聪明的”，以及凯莉说的话（对米兰达）“我没有搞清楚细节，但我是个聪明的姑娘”，以及（对大先生）“得了吧，这事儿上我必须变得聪明。我们没有结婚，我没有法律权利，你知道的，对于……对于这个我俩共筑的家”，以上这些都是理性超过感性的表达。所有这些的例子都反映出，情感与理性之间存在着张力和两极分化，女性不仅要与之抗衡，还必须支持理性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理性代表着赋权。更进一步地说，“聪明的女孩”这个短语本身也展示了一种有意思的张力。尽管“聪明”是一个被看重的个人属性，与悟性高、自由解放的女性有关。但选择 “女孩”这个词则会使我们不去严肃对待它，因为这个词语义表示的是年轻、不成熟。比较地来看，在电影中，大先生拒绝被称为凯莉的“*boyfriend*”[1]，因为作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他绝不认同这个词的语义（男孩），所以凯莉非常幽默地使用了替代性的词“manfriend”[2]。然而，其实凯莉也40岁了，却欣然接受了用“女孩”（“我是个聪明的女孩”）这个词来进行自我描述。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在后女性主义流行文化中，曾经出现过对少女时期的颂扬，媒体也会刻画年轻的女性超级英雄（例如，《飞天小女警》（*Power Puff Girls*）和《吸血鬼猎人巴菲》（*Vampire Slayer*））。同样的，这里的《欲望都市》的节选内容中使用了“女孩”一词，很可能说明它也可以被成年女性使用（以指赋权）。确实，《欲望都市》（电影版和剧集版）被评价为属于展现“新女孩秩序”的作品。（Hymowitz, 2007）。虽然可能情况是这样，但是，妇女永葆青春的特权是一种赋权的标志，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231】

《欲望都市》中的一种后女性主义女性身份的形成，取决于与其他几种相关的社会范畴的共存。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几个显著的范畴，如阶层、区域主义和异性恋行为。但是，在此之前，

1　英语中 boyfriend 译为男朋友，本章作者要强调的是 boy 这个词，与前文的 girl 对应，因此不作翻译。——译者注

2　针对前文“boyfriend”而言，“man”强调了成熟的男子气概，因此不作翻译。——译者注

我们同样可以先简单考察一下白人以及年龄这两个范畴。

尽管纽约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欲望都市》主要反映的是白人女性的生活。白人，尽管在节选内容的语言中没有明确地表述，但是我们却从四位女性朋友的肤色的具体表现中看到了其重要性。也有人注意到了她们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ASP）姓氏”：霍布斯、布拉德肖、约克和琼斯（Negra, 2004：12）。年龄在我们节选的片段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范畴，但在电影里的其他部分（关于凯莉在她 40 多岁的时候结婚，以及萨曼莎快 50 岁才结婚的情节）中，年龄是一个焦点。在我们所摘录的部分，就有前文已经提到的成熟女性想要永远做个少女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特点。一方面，类似“女孩”和“宝贝”1（大先生就是如此称呼凯莉的）这些词，矮化了这些妇女，就好像她们没有完全成年一样（Negra, 2004:12）。另一方面，成年女性颂扬少女时期，把它作为一种年龄歧视文化中的赋权的状态；甚至是随着女人年纪增长，她们也必须永远年轻。

中产阶级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也是电影中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身份建构的基础。消费和物质获取是这些女人确立身份的关键，这从萨曼莎坐飞机到纽约只为竞拍一枚昂贵的戒指，以及凯莉想要更大的衣帽间等细节都可以看出来。昂贵高雅的高级时装和奢侈的生活，无论是在剧情中还是在这些女人的谈话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穿着定制衣服和鞋子，戴着昂贵的首饰，生活舒适无比。这些行为为这些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树立了标杆，而这些女性几乎不会质疑她们的工作和特权，因此也会排斥穷人。

区域主义和城市主义助长了凯莉和她的朋友们所奉行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纽约（特别是在曼哈顿）对于富裕的女性来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地方。在节选的片段中，女人走过的街景，包括时代广场、蒂凡尼品牌店和克里斯蒂拍卖行，都是一些成功和魅惑的标志性地点（尽管这些并不是纽约典型的普通工薪女性白领能够消费得起的地方）。在她们走路时，没有无家可归的人出现、说话或者与之交谈，也不会出现任何会削减她们在大街上尽享的行走之美（具有艺术感的，色彩斑斓的店铺橱窗）或畅谈美好愿景之喜悦的事物。

在节选的片段中出现了三段情感关系，都是异性恋：凯莉和大先生；布莱尔·埃尔肯失败的感情；萨曼莎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史密斯。在节选片段以及整个电影（包括剧集）中，对于女性而言，异性恋就是一种“给予”，她们之间开诚布公讨论最多的就是男人、性和感情话题，这使得异性恋再正常不过。[7]而在现代女性与男性关系中，异性恋婚姻并不认为都是众人期盼的结果。[8]从前文所展示的大先生和凯莉之间的对话（复制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可以看出，凯莉在大先生询问她有关结婚的事情时卸掉了防备（尽管，三个回合之后，她回击了）；她们都从选择的角度来表述婚姻，而大先生则以假设性地问题的方式提出了结婚的可能性。【232】

大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

凯莉：　嗯，我……我不认为那是一个选择。

大先生：　假如是一个选择呢？

凯莉：　为什么？什么？你想跟我结婚？

1　英文 baby，本章作者侧重其孩子气、婴孩的含义。——译者注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婚姻仍然被认为是女人经济保障的基础，特别是当婚姻关系破裂后她们可以诉诸法律。在布莱尔·埃尔肯的故事中，布莱尔·埃尔肯的朋友们建议她结婚，而她无法结婚，这给她带来了伤害——“有天晚上她回到家里，他把她锁在了门外。她甚至没有别的容身之处”。而在凯莉那里，有关结婚的议题是由财产保障问题引出的——假如他们分开了，凯莉将在公寓分配上没有任何的法律权利。这两个情节揭示了，女性将婚姻作为保障，需要借此维护她们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如果仔细研究这部戏剧作品（尽管我们看不到太多的艺术制作痕迹）中所展现的非常受欢迎的、时髦的、虚构人物的世界，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结论。我们仅从电影中节选摘录了部分片段。即使如此，当我们从这些片段中体察到各种充斥着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诸如“钻石”或“权利”的这类表达（例如，自己的财产保障，大的衣帽间，一枚昂贵的戒指）时，我们可以发现，在更广泛的女性自由解放运动背景之下，哪些内容有所表达，又有哪些内容还没有被探讨。这种女性自由解放运动包括同工同酬和教育平等；注重社会和个人选择；权利和财产独立；拒绝性暴力和性胁迫，以及帮助女性从种族、阶级、年龄和性取向的压迫和歧视中解放出来。在我们节选的片段中，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和野心勃勃的个人成就（并非针对一般性的女性的论断）一再被突出和强调。整个分析展示了后女性主义不仅是有选择性地和部分地涉及女性主义，而且它催生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表明，女权主义运动消亡了，却也胜利了，但终归难逃失败的结局（Walters, 1991:106）。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其余的交谈文本和观看电影的其他情节，来进一步探讨我们在整个章节中提到的社会性别身份实践和权力关系。

【233】

11.6 结　语

本章通过话语研究的例子，分析了人们建构、抵抗和颠覆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多种方式的部分内容。正如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长久争论的，意义永远生成于情境之中，而绝非仅仅只是基于语言结构。一般化的脱离语境的“社会性别差异”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社会性别关系和语言方面的指南，但这样的研究无法带领我们近距离地去理解，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不对称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建造和再造的。语境以及语境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化为几个独立的变量（例如：性别，教室，对问题的回答）。语言使用是从社会实践发展而来，因此，也是从个人、团体和社区的权力关系中发展而来的。

通过本章，我们指出，包括“女人”和“男人”在内的社会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且具有多变性。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些范畴却常常被认为是固定的、不证自明的，并把作为一个阶层的女性看作是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附属，显然这种情况，不管在何时何地的社区都认同这一点。因此，在我们对所有的社会范畴提出质疑的同时，也需要识别出使得这些范畴经久不衰的条件是什么，并予以分析。因此，这需要话语分析者和来自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科学以及法学的学者，共同合作，开展研究。通过合作，我们便能够揭示其中的不公平所在，以此帮助寻找出全面可行的干预策略。

本章还着重考察了话语形成的方式，以及那些由社会制度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方

式。同时还表明了，社会主要的变革不可能脱离语言和其他形式的符号而孤立发生。话语分析不仅能厘清细节，还可以使我们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歧视、种族主义、阶级地位和其他不平等现象同步加剧的显著方式。这些讨论的潜在假设是，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掌权者控制和限制团体中弱权成员的个人贡献的方式，我们就能够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更多公平的机遇以供选择以及展开话语实践。

然而有研究者和理论家认为**所有**语言互动中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相较于在“私人化的”群体中，如家庭和亲密友谊关系中的随意谈话，这种权力在社会制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所有真正的平等，都要求在一个理想化的环境中依次展开对话，而且这个环境是完整的、不带强制性的（参见 Wang, 2006）。但是，即使这样对等的互动几无可能，我们仍然应该在任何一个共同渴求民主理想的社会中，审视话语再生产以及挑战社会不公平、权力关系的各种方式，并且为了更平等的话语实践而努力，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

一种针对传播而言的还在探索发展的女性主义研究路径，被称作“邀请式修辞（invitational rhetoric）”（Zhang and Kramarea, 2008），它包含更彬彬有礼、更流畅灵活的合作，这些随着我们在一种更加尊重彼此、更加平等协商的对话交流中产生新的见解，这种研究路径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交流的可能性获得新的洞见，同时也帮助我们学会以一种聆听、奉献、反省以及可能是改变自己而非他人的姿态，来形构讨论并达成决策。【234】

附录

背景	语言	画面
凯莉和大先生在房地产经纪人陪同下参观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顶层楼房。	大先生：我可以为你设计个更好的衣帽间。欢迎回家，宝贝儿。 凯莉：能够？……我们能够付得起吗？ 大先生：我搞定了。 ［大先生对房地产经纪人说］：嗯，我们来签合同吧。	大先生看着凯莉露齿一笑。 凯莉难以置信地看着大先生。 大先生给凯莉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很快点了下头。 镜头里凯莉面带微笑看着大先生的场景。
凯莉，夏洛特和米兰达正走在一条时髦的纽约街道上。凯莉走在正中间。	凯莉：“我搞定了”，就是那样，“我搞定了”，就像他是拿着一张支票买咖啡或其他东西一样。 夏洛特：听起来不错呀！ 凯莉：大先生说要重新做衣帽间，除此之外，他还说厨房也需要些功夫。当然，我不了解那些，因为我把毛衣都放在炉子里。 夏洛特：［大笑］ 米兰达：这么说他买下那里了，你要和他同居了。 凯莉：是的，我要和他住在一起。 米兰达：但是他才拥有那房子，所以你会留着你自己的地儿，对吗？	

续表

【235】

背景	语言	画面
	凯莉：[噢，米兰达]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些细节，但是我是个聪明的女孩，我会想出一个让我舒服的办法。 米兰达：我只想确定你在这点上足够聪明。	
	凯莉：我爱你（这么为我考虑），那现在，你可以停止为我担心然后去感受我想让你感受的，嫉妒？喔，嫉妒我就要住进曼哈顿豪华的顶层公寓。 米兰达：好吧，我嫉妒了。 凯莉：哦，谢谢。 米兰达：你住在房地产的天堂，而我住在布鲁克林。 凯莉：好吧 米兰达：纽约杂志说布鲁克林是新的曼哈顿。 凯莉：呃…… 米兰达：写这个的人一定是住在布鲁克林的。[大笑]	凯莉面对着米兰达，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 凯莉用她的双手搂着两边的女人。 米兰达点点头。 凯莉依然用手搂着两位朋友；这三个人一致地走着。
四个女人站在精美的克里斯蒂拍卖房前。	凯莉 [看见了萨曼莎]： 嘿，她在这儿呢，嘿，好莱坞。嘿。	一个萨曼莎大笑并张开双臂的镜头。
	[?] 你好，女士。 夏洛塔：你的旅程如何呀？	萨曼莎被亲吻和拥抱。
四个女人走进了拍卖房里，钢琴音乐响起。	萨曼莎：很好。 [?] 噢，真好 [?] 让我们进去吧，我很期待。	
	[?] 快给我们看看。 [凯莉说完话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场合，把各种类型的纽约女人集合到了一起。布莱尔· 埃尔肯一开始是个服务员，后来做了模特和艺人，后来成了亿万富翁的女朋友，结果一天晚上回家时突然发现自己只能露宿街头了。现在她为分手而做最后的复仇：尴尬地公开拍卖在他们还两情相悦时他送给她的所有的珠宝。	背景是埃尔肯大篇幅照片，前面是放置珠宝的展柜。这四个女人，和其他出席的人一起，正浏览着展品。 通过展示柜，萨曼莎直勾勾地看着一朵镶花戒指。
	萨曼莎：就是它了，我的小宝贝儿。	所有四个女人围着一起，专注地看着戒指。

续表

背景	语言	画面
	夏洛特：哦，它美极了。 萨曼莎：当我在介绍目录里看到它的时候，我对史密斯说[和他同居的男人]：“这枚镶花戒指就是我的精髓所在。独一无二，魅力四射。” 凯莉：有点过了啊。 萨曼莎：正是。……让我们花花	
钢琴声停下， 这四个女人坐在一排，与其他人参与这拍卖会的人一起。对于竞拍，萨曼莎有个自己的底线数目。	在好莱坞赚的辛苦钱。 [女人们笑] 女拍卖师：现在是 39 号藏品，这个镶花戒指。我们现在起拍价一万美元。现在一万美元了。	萨曼莎示意她叫价。
	谢谢你夫人。[对萨曼莎]一万美元，一万五千美元。	四个女人看着同一排远处的一个竞标的竞争对手。
	夏洛特：嘿，她是在帮打电话那头的人竞拍。 [?]这不公平。	
	夏洛特：娘的。 凯莉：嗯，要来真的了。	竞争对手举起牌子。
	拍卖师：三万美元。现在是针对你了。三万五千美元。	萨曼莎举牌。
	萨曼莎[对凯莉耳语说]：我辛苦赚钱，这是我应得的。 拍卖师：现在四万了。四万？四万？四万，谢谢。四万五。现在四万五千，现在五万？ 萨曼莎[大声咆哮]：去你的五万。 [房间里哄堂大笑]	竞争者举牌。
竞拍后，四个女人都在洗手间照镜子，还有其他女人。	拍卖师：现在五万了。五万五千了，他们出五万五千来压你。[对萨曼莎说]你想喊六万么，对我们激动的投标人喊出六万吗？六万？ 萨曼莎[对她边上的凯莉说]：我的底线是五万。	凯莉握紧萨曼莎的手。
	夏洛特：我本以为这次拍卖会很有意思，没想到更多的还是悲伤。 一个穿蓝色裙子的女人：不是吗？我原以为只有我悲伤，因为我认识她。但是这真是个悲伤的事儿吗？搞笑的是他们还如此开心。	

【236】

续表

背景	语言	画面
大先生和凯莉在大先生的厨房里面，准备晚餐，大先生正站在那切做菜的用料，凯莉则坐着，剥玉米的壳，背景钢琴乐响起。	萨曼莎：是的，直到他们不开心为止。 穿蓝色裙子的女人：我懂，不是吗？我们都告诉她应该结婚，但她不想要听。 他之前结过三次婚了，所以她让他骑在了头上。有一天晚上，他把她锁在门外了。她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多丢人啊。十年前，在她坠入爱河之前，她还是个聪明的姑娘。	蓝裙女子走了。朋友们都安静了。米兰达看着凯莉，然后收回了目光。
	凯莉：我正在想……我想卖掉我的房子把钱用在天堂五号上。	他露齿而笑。 继续坏笑地抬起一边眉毛。
	大先生：为什么？你很喜欢你的房子呀。	
	凯莉：我知道，但是在新住处有足够的房间，而且除此之外，我……想我们在那里生活。你知道的，我……我想让它是我们的。	
	大先生：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为我们买的它。	
	凯莉：这真让人觉得很棒， 但是你买了它。所以这事实上是你的地盘，如果某些事发生的话……	凯莉耸耸肩。
	大先生：会发生什么？	她再次轻轻耸肩膀。
	凯莉：这么说吧，我必须在这件事上保持清醒。我们没有结婚，我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你知道的， 对于……对于这个我们共筑的家而言。	大先生直视她。
	大先生：你有没有想过结婚？	再次看着她。
	凯莉：嗯，我……我不认为那是一个选择。	凯莉的目光忽上忽下。 （大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大先生：假如是一个选择呢？	
	凯莉: 为什么? 什么? 你想结婚?	他耸耸肩。
	大先生：我并不介意跟你结婚，你介意嫁给我吗？	
	凯莉：不。不，倘若……假如这不是你想的……我的意思是，是……那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她摇摇头。然后张开双臂表示身姿的大小。两人都笑了，凯莉开怀大笑。
	大先生：我想要你。所以……好啊。	
	凯莉：所以……？真的吗？我们……我们要结婚了？	
	大先生：我们的确要结婚。 我们是不是该给你准备一枚钻戒？	
	凯莉：不，不。就给我一个真正的大衣帽间吧！	

【237】

注 释

[1] 甚至是口语实践或能力方面的各种变化，如声音的高低和音调的大小，都被认为是生物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也被研究证实部分取决于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实践，这些实践与性取向、社会经济地位和伦理相关联（McConnell-Ginet, 1978）。

[2] 女性说话的刻板性特征包括：委婉的，情绪化的，闲言碎语的，友好的；而关于男性说话的刻板特征包括：直接的，非情绪化的，有力的，还有点幽默感（Kramer, 1987; Holmes, 2006: 6）。这些早期研究的后续拓展研究指出了考察“种族”和“性别”的重要性。一项关于白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白肤色的说话者，黑肤色的说话者（无论男女）显得更加直接和情绪化，而且不那么得体和有趣（Popp, Donovan, Crawford, Marsh, and Peele, 2003）。

[3]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女性和男性之间（或者男同性恋和异性恋，或者任何其他有关的身份“群体”）的语言使用差异的研究和主张都是无用的。正如巴斯克（Basker, 2005）所言，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分类的存在，承认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的存在，因为它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此普遍；我们不是以此来强化类型的存在，而是揭示出它们作为对立但又多变的内容是如何被建构的（Basker, 2005:14-18）。

[4] 这种“两种社会性别”的观点已经受到了酷儿和变性理论家的强烈质疑。例如，朱迪思·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 , 1998）就提出了“女性男子气概”（female masculinity）这一术语，涵盖了多种形式的与男人**无关**的男性化气质。

[5] 没有一种分类系统（如女人/男人）是固定的或者说“自然的”。一些人具有的社会性别身份，并不符合其他人从生物学上对其进行标识的方式。还有一些人是通过手术，努力从身体上变“性”，或者以此来遵循“只有两种性”的区分法则。性取向并不总是与社会和法律实践所推行的区分性别的主导方式完全匹配。想要以某种类别来予以识别的人通常会采取传统惯例中所认可的那种属于某个群体的说话特征。

[6] 但是在有些社会中，年轻女性会格外注意与“女性主义”的身份标签保持距离，尽管她们支持性别平等的原则。

[7] 我们要感谢埃林·凯文指出，在电视剧版的某一季中，萨曼莎和一个女性约会了一段时间。这是将女同性恋关系短暂地切入四位好友习以为常的主导性的异性恋性别秩序之中。

[8] 然而，请注意电影的核心情节是凯莉和大先生的婚礼，并且以“幸福快乐”的童话式结局把剧情推向高潮。

延伸阅读

我们对于社会性别的看法影响了对我们的制度、话语以及其他行为的构建。虽然一些研究没有反思或质疑关于社会性别的共识，仍然支持现存的理论假设，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全面且细致的关于社会性别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开展这些研究的学者来自各个领域，包括语言学、传播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也包括一些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动者和批判分析学家。以下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学术资源，它们探讨了可以通过语言学分析进一步了解的与社会性别有关的诸多议题。

Cameron, Deborah (2006) *On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London, N.Y.: Routledge.

这本论文集探讨的是社会性别和语言的问题，它揭示了日常交流选择的方式其实是伴随着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政治性选择。卡梅伦采用了多种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包括批判性话语、文本和语义分析。

Eckert, Penelope and McConell-Ginet, Sally (2003) *Languag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重新评估了几十年来不同国家的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在了解语言和其他用于展现我们的女性和男性形象的资源方面，这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

Holmes, Janet and Meyerhoff, Miriam(eds.) (2003)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Malden, MA: Blackwell.

这本书展示了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各种主题和路径。它提出了一些当下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和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对语言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一种重新审视。

Lazar, Michelle (ed.) (2005)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Gander, power and ideology in discours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本书将批判话语分析和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以探究性别、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多种文化和国际背景下的话语中交互作用的。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从网站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获取。

Lazar, Michelle M. (2009) 'Entitled to consume: postfeminist femininity and a culture of post-critique',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3(4): 371-400.

Weatherall, Ann (2000) 'Gender relevance in talk-in-interaction and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11: 290-292.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 125-51.

参考文献

Baker, Paul (2005) *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 London: Routledge.

Berman, Laine (1994) 'Empowering the powerless: The repetition of experience in Javanese women's narratives'. In Mary Bucholtz et al. (eds), *Cultural performance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Berkeley women and language confer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Berkeley. pp. 28-36.

Besnier, Niko (2003) 'Crossing genders, mixing languages: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transgenderism in Tonga'. In Janet Holmes and Miriam Meyerhoff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pp. 279-301.

Bloustien, Gerry (2001) 'Far from sugar and spice: Teenage girls, embodiment and representation'. In Bettina Baron and Helga Kotthoff (eds), *Gender in interaction: Perspectives on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ethnography and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 99-136.

Browne, Irene (ed.) (1999) *Latinas and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t work: Race, gender,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ucholtz, Mary (1996) 'Black feminist theory and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linguistic practice'. In Victoria L. Bergvall, Janet M. Bing and Alice F. Freed (eds), *Rethinking language and gender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New York: Longman. pp. 267-90.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Cameron, Deborah (2006) *On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oates, Jennifer (2004) *Women, men and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third edition). London: Pearson Longman.

Davies, Julia (2003) 'Expression of gender: An analysis of pupil's gendered discourse styles in small group classroom discussions'. *Discourse & Society*, 14(2):115-32.

DeFrancisco, Victoria (1997) 'Gender, power and practice: Or, putting your money [and your research] where your mouth is'. In Ruth Wodak (ed.), *Gender and discourse*.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37-56.

Deutsch, Francine (2007) 'Un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21:106-27.

Frosh, Stephen, Anne Phoenix and Rob Pattman (2002) *Young masculinities: Understanding boy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ampshire, NY: Palgrave.

Gao, Liwei and Rong Yuan (2005)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Qian Gao (e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17)*: 66-83.

Gerdes, Lindsay (2008) 'Carrie Bradshaw's feminism is a sham'. *Business Week*, 25 March.

Goodwin, Marjorie Harness (2007) 'Occasioned knowledge exploration in family interaction'. *Discourse & society*, 18(1): 93-110.

Hague, Gill, Audrey Mullender, and Rosemary Aris (2003) *Is anyone listening? Accountability and women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Halberstam, Judith (1998) *Female masculin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ll, Kira (1995) 'Lip service on the fantasy lines'. In Kira Hall and Mary Bucholtz (eds), *Gender Articulated: Language and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sel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 183-216.

Herring, Susan C., Deborah A., Johnson, and Tamra DiBenedetto (1998) *Language and Gender: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p. 197-210.

Holmes, Janet (2005) 'Power and discourse at work: is gender relevant?'. In Michelle Lazar (ed.),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Gender, power and ideology in discourse*. Basingstoke: Palgrave. pp. 31-60.

Holmes, Janet (2006) *Gendered talk at work*, Oxford: Blackwell.

Hymowitz, Kay S. (2007) 'The New Girl Order'. *City Journal*. Autumn 2007. Retrieved 17 June 2008 at http://www.city-journal.org/html/17_4_new_girl_order.html.

Jones, Rodney H. (2004) 'The problem of context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Phillip LeVine and Ron Scollon (eds),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pp. 20-33.

Kelan, Elizabeth K. (2007) '"I don't know why": Accounting for the scarcity of women in ICT work'.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0: 499-511.

Kramer, Cheris (1978) 'Women's and men's ratings of their own and ideal speech'.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6(2): 2-11.

KroløKke, Charlotte and Anne Scott Sørensen (2006) *Gende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analyses: From silence to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 and London: Sage.

Lakoff, Robin (1975)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Lazar, Michelle M. (2000) 'Gender, discourse and semiotics: The politics of parenthood representa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11(3):373-400.

Lazar, Michelle M. (2006) 'Discover the power of femininity! Analyzing global "power femininity" in local advertising'. *Feminist Media Studies*, 6(4):505-17.

Lazar, Michelle M. (2007)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rticulating a feminist discourse praxi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4(2):141-64.

Lazar, Michelle M. (2009) 'Entitled to consume: postfeminist femininity and a culture of post-critique'.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3(4):371-400.

Lovering, Kathryn (1995) 'The bleeding body: adolescents talk about menstruation'. In Sue Wilkinson and Celia Kitzinger (eds), *Feminism and discours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Sage.

Negra, Diane (2004) '"Quality postfeminism?": Sex and the single girl on HBO'. *Genders OnLine Journal*, 39:1-16.

McConnell-Ginet, Sally (1987) 'Intonation in a man's world'. *Signs*, 3(3): 541-59.

Pascale, Celine-Marie (2007) *Making sense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opp, Danielle, Roxanne A. Donovan, Mary Crawford, Kerry L. Marsh, and Melanie Peele (2003) 'Gender, race, and speech style stereotypes'. *Sex Roles*, 48(7/8):317-25.

Sandy, Larissa (2007) 'Just choices: Representations of choice and coercion in sex work in Cambod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8(2):194-206.

Scott, Karla (2002) 'Conceiving the language of Black women's everyday talk'. In Marsha Houston and Olga Idriss Davis (eds), *Centering ourselves: African American feminist and womanist studies of discours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pp. 53-76.

Southard, Belinda A. Stillion (2008) 'Beyond the backlash: *Sex and the City* and three feminist struggle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62:149-67.

Swan, J. (2002) '"Yes, but is it gender?"'. In Lia Litosseliti and Jane Sunderland (eds), *Gender identit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43-67.

Tannen, Deborah (1991)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London: Virgo.

Thorne, Barrie (1990) 'Children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In Deborah Rhode (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sexual differenc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00-13.

Thorne, Barrie (2001) 'Gender and interaction: widening the conceptual scope'. In Bettina Baron and Helga Kotthoff (eds), *Gender in interaction: Perspectives on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ethnography and discour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 3-18.

Trinch, Shonna (2003) *Latinas' narratives of domestic abuse: Discrepant versions of viole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alters, Suzanne Danuta (1991) 'Premature postmortems: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Politics*, 3(2):103-12.

Wang, Jinjun (2006) 'Questions and the exercise of power'. *Discourse & Society*, 17(4):529-48.

Weatherall, Ann (2000) 'Gender relevance in talk-in-interaction and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11:290-292.

Weatherall, Ann (2002) *Gender, language, and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125-51.

Wetterer, Angelika (2003) 'Rhetorische Modernisierung: Das Verschwinden der Ungleichheit aus dem zeitgenossischen Differenzwissen'. In Gudrun-Axeli Knapp and Angelika Wetterer (eds), *Achsen der Differenz—Gesellschaftstheorie and feministische Kritik Vol. 2*.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pp. 286-319.

Yang, Chunsheng (2007)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adaptations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Language@Internet, 4*. Retrieved 20 January 2008, from http://www.languageatinternet.de/articles/2007/1142

Zhang, Wei and Cheris Kramarae (2008) 'Feminist invit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a digital age: Looking over disciplinary and national borders'. *Women and Language*, Fall. (This article is also published as a (collaborative, changing) wiki at http://en.wikibooks.org/wiki/Gender,_Communication,_and_Technology)

话语、种族与种族主义 12

【241】

Discourse, Ethnicity and Racism

⊙ 亚斯敏·吉瓦尼　约翰·E. 里查德森

12.1 引　言

在定义和塑造社会中少数族群的现实方面，话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主流社会所生产的关于少数族群的种族主义的言谈和思想在日常谈话和文本中最为明显。但在当今的西方文化里，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和相似的被明确编码的种族主义文本是禁忌，经常在法律层面判为不合法，并在社会层面受到谴责。然而，借用利兹·凯利（Kelly, 1987）在性暴力研究里的一个概念，可以论证种族主义言论和思想跨越了话语暴力的一个连续体，在其中隐含的种族主义占据了一个连续体的终端，而公开的言论和思想，即极右的种族主义话语占据了另一端。在本章里，我们使用话语分析的工具来检视种族主义话语更公开的例子，既在日常谈话里也在大众媒介化的文本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些隐含的种族主义确实仍然存在。我们认为这些文本是政治性混杂的——吸收、重铸并折射了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议题，从而再生产了关于少数族群的主流定义，并沿袭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本章从概述一些话语分析工具开始，后者已经被用来分析种族主义会话和文本。随后我们讨论未受到谴责的种族主义谈话的现象，展示其用于描述和定义他人的话语策略。种族主义话语在大众媒介化的文本，如学校和大学里使用的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等流行的媒体格式以及新闻和时事里也被编码。这些大众媒体具备放大和合法化种族主义话语的力量，并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头，通过它来拷问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流行的假设和前提。但是，对媒介化文本的分析则涉及对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的思考。【242】

大众媒体也是策略性站点，通过它们种族主义的政治团体和党派可能传播他们的宣传。因此在本章的后面部分里，我们将讨论英国国家党，特别关注通过对该党传单的分析所得到的视觉话语。在结尾，我们强调种族主义话语的谱系，它的运作使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特权等级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沿袭和维持。

12.2 话语分析的工具

带有明确种族主义贬义的词语在当今话语里的使用比起一个世纪甚至 50 年前都少见得多。但是，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种族主义的增长，在形式和频率上，将种族主义的旧形式再语境化并重新利用，以瞄准新种族化的群体（Richardson and Wodak, 2009）。为了解释这些信息是如何提出的——经常很含蓄地——我们需要使用许多不同的分析工具。

正如本卷的许多供稿者一样，我们假设语言使用是一种与它运用的语境辩证联系的社会实践：不仅被社会认识所创造，也创造着社会认识，因而对社会现实产生作用——包括种族不平等。为了检视话语是如何能够产生这种作用的，我们的分析需要聚焦在三个层次：文本，生产与消费的话语实践，以及话语帮助（再）生产的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实践。如果种族主义是通过话语而被再生产的，那么它将明显存在于在话语传播的所有三个层次——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和文本本身——通过整合与互相自立自给的方式（van Dijk, 2005）。文本的分析涉及检视形式、句子和更小单元的语法、高于句子的文本组织的 [……这一] 分析等（Fairclough, 1995: 57）。最近，视觉设计的语法多模态分析（Kress and van Leeuwen, 2001）已经引入了对该层次进行分析的一个新维度。多模态方法要求分析员检视**视觉**的话语元素“能创造情绪和态度，传递观念，创造穿越作品的流，其方式如同在文本里完成同样事情的语言学手段”（Machin, 2007: xi）。

我们也需要思考传播事件的话语实践，这通常涉及检视“文本生产与文本消费的多种方面。其中一些有更制度性的特征而其他的则是一个更狭义的意义上的话语过程”（Fairclough, 1995: 58）。一个对这一分析层次的关键假设是文本意义不能从生产和消费的语境中剥离出来。【243】更进一步而言，考虑到“一个话语的意义存在于它在一个特定情形里的使用”（Wodak, 1996: 20），一个全方位的检视应该涉及对话语的社会文化实践的分析。这一层次的分析“也许是从特定事件的多层次抽象化：它也许涉及它的更直接的情景语境，事件所根植的制度性实践的更广泛语境，或者社会和文化的更广框架”（Fairclough, 1995: 62）。

因此，话语应该在各种层次上被分析，而且通过聚焦不同的语言学维度，每一个维度“可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对抗少数群体成员的歧视互动”（van Dijk, 1999: 4）。在一系列研究里，梵·迪克（van Dijk, 1987; 1992; 1993a）开创了一个被称为“意识形态方阵”（the ideological square）的概念工具，他认为它主导了种族主义谈话和文本，后者是针对或关于“种族上的”和“人种上的”他者。意识形态矩阵以正面的自我呈现和与之同步的负面的他者呈现为特点，在一个文本的所有语言学维度都可以观察到。跟随着赖西格和沃达克的研究（Reisigl and Wodak, 2001: 44），我们发现在分隔话语和操作化我们对意识形态矩阵的检视时，聚焦在五个问题上是非常有用的：

◎**指称策略**（Referential Strategies）：在符号学上，人们是如何被命名和提及的？
◎**述谓策略**（Predicational Strategies）：这些人是如何被描述的？有什么品质或特性属于他们？
◎**论证**（Argumentation）：什么论证（显性的和/或隐性的）被用于支持这些特性描述，并且/或者对利用、区别其他描述提供证明？
◎**视角化**（Perspectivization）：从哪些人的视角里，这些命名、描述和论证被表达？

◎以及这些话语是被显性地还是隐性地陈述的？它们是受到强化还是弱化？

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 45）说明，在对人们进行命名的行动中：

> 一个人建构和呈现了社会行动者：例如，内群体和外群体。这由多种方式来做到，比如成员范畴化手段，包括通过修辞的、生物学的、自然化和使其去个性化的比喻与转喻，以及采取以局部代表总体（*pars pro toto*）或以总体代表局部（*totum pro parte*）等形式的提喻法。

当然，显性种族主义词语的公开使用现在可能受到至少是公众的批评，有时还会是蔑视。现代种族主义话语倾向于使用“负面词语去描述移民或少数族群的性质或行为（如“非法的”）”，或者其他人会在负面语境里采用“福利母亲”或“内城青年”等特殊代码（van Dijk, 1991）。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城市爆发的骚乱提供了这样的负面语境，其中对“种族的”和少数族群的熟悉的负面标签被所有报纸频繁而重复地使用。这些标签中的一些，以及它们运用的指涉策略，如下所示：

◎《太阳报》：头条“野蛮人”（原始化，primitivization）
◎《每日邮报》：“社会的最坏因素”（过度问题化，superlative problematization）
◎《泰晤士报》：“愚蠢的年轻人会出动并且一夜之间摧毁一个社区”（负面心理的躯体化，negative mental somatization）
◎《卫报》：“毒品联谊会”（犯罪化，criminalization）

正如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 46）所论证的，检视人们被命名的方式“非常有利于我们准确描述歧视性地 [……] 建构、确认或隐藏社会行动者的更细微的形式”。 【244】

明确指涉策略打上了**述谓**（predication）的印记——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 54）将其定义为“语言学上将特质指派给人、动物、物体、事件、行为和社会现象的非常基本的过程和结果”。但是，它是通过述谓**策略**，人们“在特质、数量、时间、空间等方面被具体化并被赋予特征”（同上）。有时，这些述谓是这样实现的：通过提及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物理的或隐喻的）空间，在修辞上与“我们自己的”空间相区隔，由此将一种（负面的）社会价值加载于这一空间，并且通过延伸，加载于它的占有者上。举例而言，在 2000 年有一个关于 10 岁的尼日利亚男孩达米洛拉·泰勒的悲剧案例，他在伦敦被杀害，当时他正从学校走回家；2006 年，两个兄弟最终被判过失杀人罪。在同一期《星期日泰晤士报》（2000 年 12 月 3 日）的五篇文章里涉及：

◎“一个习惯了暴力犯罪的社区”（Woods and Gadher, p. 1）；
◎一种“**自称达米洛拉的暴力的贫民区文化**”（Woods 等，pp. 14-15），和“由根植于情感混乱和忽视的狂怒”引发的“一个道德、精神和情感真空”，存在于“泰勒一家人生活的悲惨区域”（**孩子们在一个道德消亡的地带学习杀人**，Phillips，p. 19）

注意这些引述没有一个显性地宣称孩子们的“黑人属性”是他们犯罪行为的原因，或者黑人比白人更有犯罪倾向。但是，这些和其他报道犯罪的文章却直接地主张犯罪、道德沦丧（参

阅："道德真空"）、堕落、暴力等，是典型的加勒比黑人社区经常被体验的品质，因为他们"习惯于"这些。接下来是一步非常小的推论，归纳为在这一"暴力的贫民区"的居民的"黑人属性"对这场悲剧起到了作用。因此，命名和描述人和地点的词语选择在分析组成"意识形态矩阵"的正面的自我呈现和负面的他者呈现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第三，存在着论证策略和一个**论式**（topoi）[1] 储备，通过它们，正面的和负面的属性被证明为正当合理的。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将**论式**定义为与内容相关的证据或"结论规则"，它将单个论证或多个论证与结论或立场联系起来。更不正式的说法是，**论式**可以被描述为普遍性关键理念的水库，由此可以生成特定的陈述或论证（Ivie, 1980, 援引自 Richardson, 2004: 230）。通过类似的理性论证，这些论式被频繁地用来为驱逐移民提供证据（"他们是社会的负担"，"他们很危险，是一个威胁"，"他们耗费了太多"，"他们的文化太不同"，诸如此类）。以这样的方式，移民被建构为替罪羊；他们因失业、犯罪、滥用社会福利体系而受到指责，或者他们更普遍地被视为对"我们的"文化的威胁（Richardson and Wodak, 2009）。关于他们和我们的论证，也可以通过更不直接的或伪论证的（pseudo-argumentative）【245】方式，以及像**弃权**（disclaimers）这样的策略来提出（Kleiner, 1998）。这些弃权是结合了正面自我呈现和负面他者呈现的总体策略的语义学手段，并且包括如下行动：

◎表面的否认："我不反对移民，但是……"
◎表面的让步："当然**某些**穆斯林是包容的，但是总体上……"
◎表面的同情："当然寻求庇护者遭受了艰难，但是……"
◎表面的忽视："现在，我不知道全部事实，但是……"
◎反转："**我们**是所有这些……的真正受害者"
◎转移："当然**我**不反对他们，但是我的顾客们……"（引用自 van Dijk et al., 1997）

这些手段被标记为"表面的"弃权是因为它们的话语结构如此，一个话语表面的功能——承认一个观点，夸张地表达同情，等等——"很快就被下文的从句所嘲讽"（van Dijk et al., 1997: 170）。当反思更广泛社区的"公共场所"价值时（Billig, 1991），这些弃权被参与者用于"努力预先阻止他人的负面推论，并设计一种理性、客观并公正的形象（Kleiner, 1998: 206）。

"转移弃权"引导我们来到涉及正面自我呈现和负面他者呈现的第四种话语策略：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认为，分析会从聚焦于视角化而受益。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说话者将表达——或隐藏——他们在话语里的卷入，并在描述、叙述或对相关事件或言论的引用里置入自己的观点（参阅 Reisigl and Wodak, 2009）。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分析应该检视强化和弱化的策略。在口头话语里，这些不仅可以通过音调（和音调的变化）、音量（和音量的变化）和传递的速度，还可以通过强调特定的词语来实现。除了这些表达形式，与手势和面部表情一样，重复也可以作为强化的标志（Reisigl and Wodak, 2001: 83）。在文本上，卷入可能"由强调小品词（"真的"、"非常"、"绝对"、"只有"）等强化标志来表达"（同上），或者，在另一个方面，通过弱化和减轻小品词（"可疑地"、"值得质疑地"、"无关紧要的"、

1　即论证型式，是指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论证方案，以及在论证或论辩中相对固定的一些因素。——译者注

“不充分的”）来表达。这些策略会是话语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鉴于它们加剧或减轻了观念内容，并且通过这样做，有助于为说话者或写作者建构一个特定的（也许是“非种族主义的”）身份。

12.3 日常谈话里的种族主义

分析自然发生的谈话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考虑到记录这些数据的内在难度。这点尤其适用于关于种族、种族主义和少数族群社区的谈话，因为有些人发现谈论种族等尤其艰难。这一点，和对种族主义情绪的自由表达的社会禁忌，都表明这种话题上的谈话“对研究和分析的‘可捕捉性（capturability）’来说，通常被视为是难以捉摸的”（Stokoe and Edward, 2007: 341）。的确，日益增多的“社会禁忌在过去的50年里对抗了种族主义情绪的公开表达，并导致了话语策略的发展，后者将有关外群体的负面观点呈现为合理且正当的同时，也保护言说者免遭种族主义和偏见的指控”（Augoustinos and Every, 2007: 124）。然而，对外群体的偏见观点**确实**仍然表现于日常生活里，不仅通过报道、笑话和论证，还通过我们在前面的部分里引用的话语形式库；社会规约如今要求这些偏见被转化为合理的。图恩·梵·迪克（van Dijk, 1987: 58–9）表明，偏见性的“有关种族群体的谈话 [……] 在主题上聚焦于一些核心概念，如差异、变异和威胁”。尤其是，少数族群的“起源”成为“种族偏见结构的主要范畴（van Dijk, 1987: 52）。随着第一代移民，这一话题在“他们已经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移民政策应该更严格”等看似理性的论证，并且以“他们应该被遣返”等极端的表述方式出现。联系到第二和第三代种族化的群体，该话题在“你们从哪里（即**哪个国家**）来？”这一问题中被表达出来——一个以“他们是移民”为先决条件的问题（Jiwani, 2006）。面对这种话语的“可捕捉性问题”，研究者们已经注意采用两种策略中的一种来检视“种族谈话”——进行访谈或搜集“自然产生的数据”。

【246】

访谈研究聚焦于互动中谈话特性的多样性，包括言说者“对监督对话、纠正和抑制偏见谈话的表达而可能承担共同责任”的方式（Condor et al., 2006: 441）。这些方式利用人们的刻板印象的解释，并且采用了各种话语策略来转移对偏见的指控（Billig et al., 1988; van Dijk, 1987；又参见 van den Berg et al., 2003a 的一些章节）。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数据是“真实行为观察”的低劣替代品（Heritage and Atkinson, 1984: 2）。正如斯托克和爱德华兹（Stokoe and Edwards, 2007: 342）所言，访谈研究“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教给我们“关于种族划分或种族主义会话如何发生于日常生活的知识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互动不可避免地由研究者的话题和议程，以及访谈自身的本质和语境所指导”。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样的论点。但是，我们也认为关于或指涉“种族”的访谈保持了一种兴趣，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话题，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制度性的会话的特定范畴”（van den Berg et al., 2003b: 4）。为了探索斯托克和爱德华兹所提出的问题的种类，自然数据是必要的——在参与者既不害怕谴责也不知道他们在被记录的情况下记录。

鉴于种族主义偏见与无理性和薄弱的合理性具有广泛的联系（Billig, 1991），为了表现出非歧视性，“把一个人的观点呈现为合理、理性且由深思熟虑而来，是很重要的。[……] 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言说者经常诉诸可观察的因此也大体上是‘真实的’断言，后者将外群体少

数族群的行为再现为负面的、反社会的或违背了主流群体的社会规范”（Augoustinos and Every, 【247】 2007: 127）。关于外群体令人不快的行为的故事以一种言说者将他们自己的（带有偏见的）看法植根于外部世界的方式来呈现。换言之，他们可以将自己对于种族化的他者的负面观点作为与“他们”开展社会联系的必然结果，并且在一个经典的论证反转里，“他们”只能为其所遭受到的种族歧视而责怪自己。以下摘录是在 1991 年 11 月 11 日奥地利极右政党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简称 FPÖ）的竞选集会时未经参与者知晓而录下的（Wodak et al, 1990; Wodak, 1997）。奥地利自由党的政策和政治观点是鲜明地反外国人、反欧盟，以及广泛的平民主义（Wodak and Pelinka, 2002），所以他们的集会吸引了与这些观点有共鸣的人。在此，三位参与人（Y 和 E 是男性，F 是女性）分享了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任何听不见的材料都表示为（……）：

Y：是的，他从他的叔父那里得到了继承，从一个犹太人那里，是的，嗯，那么那些犹太人是怎么得到它的？

F：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工作。

[……]

Y：我亲眼见过犹太人，我亲眼见过，就像这样

Y：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了我们，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我在这个国家长大。这些犹太人来了，我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的父母不得不借钱去给我买衣服和食物。犹太人在收获时节来了，并且拿走了一切，在夏天，从那以后我们，我们再一次没有任何剩余的吃的，就是这样，犹太人就是这样，我亲爱的女士，那么，我现在问你

F：呃，我从年轻时就为犹太人工作

Y：我靠自己渡过了艰难。我靠自己渡过了艰难，不是吗？小伙子

F：姑娘（……）

Y：他们已经得到了该有的好处。我听说发生了什么

F：（……）

Y：这些犹太人，我有许多朋友，而且他们告诉我犹太人利用了他们。

F：（……）

Y：也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了他们。好的，这里曾经有一个好的，看，不论哪里都有好有坏，但是我能，但是，但是

F：没错。大多数犹太人，他们真的很诚实（……）

Y：但，但实际上有许多坏人，而且这个犹太人他，他让他们那样，不是吗？他没有，没有自己在那里耕种（……）他从什么地方撇油，不是吗？呃，然后，你们犹太人。

F：他们工作努力

Y：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商人，他不自己工作，他让别人为他工作。

F：好吧，是的，他就

E：犹太人这里有主意，我亲爱的女士（指指他的脑袋）

这段交流是一场更长交流的一部分，其中，外国人的和由外国人引起的问题——主要是被蔑称为“*Tschuschen*（外国人、老外）”的土耳其人——被讨论。这个故事起到了含蓄地让（奥

地利）犹太人扮演外国的、他者角色的作用，鉴于它是作为另一个奥地利人对外国人的一般恶劣印象的例子而提供的。在这则摘录的开头，男性说话者 Y 使用了概化谓词“the Jew（那些犹太人）”——原话是“*der Jude*”[1]。以单数使用的谓词是反犹话语的一种典型的沿袭策略。在此，【248】使用“以局部代表整体”的论证提喻法，这一策略有利于将局部普遍化和本质化为“一整个群体的人，以一种平缓的方式”（Reisigl and Wodak, 2001: 57）。

根据这种本质化，这个故事的第二个功能是将“犹太人”塑造为坏人。当然，对“犹太人”的一个典型的反犹特征就是，他们是投资者——一个狡猾的、欺诈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剥削者（Reisigl and Wodak, 2001: 56）。利用这种经久不衰的反犹的刻板印象，言说者 Y 呈现了他杜撰的故事，将“犹太人”刻画为一个经济寄生虫，让别人工作而不是自己工作，并且攫取穷苦的（非犹太）农民的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个故事是以反转为基础的：鉴于 1938 年**德奥合并**后奥地利犹太人财产和所有物的大量占用，受害人与施害人的倒置。沃达克（Wodak, 1997）评论说，这个故事“与我们发现的 1986 年和 1987 年的许多其他故事在结构和内容上非常相似”，在“瓦尔德海姆事件”（Waldheim Affair）期间，当关于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的纳粹战争记录在他竞选奥地利总统时被披露（详见 Wodak et al., 1990; Reisigl and Wodak, 2001）。这种概化产生于这个故事里详细叙述的单一的实证案例，反映并延续了将“犹太人”作为剥削者的反犹主义刻板印象。而且，尽管 Y 知道“不论哪里都有好有坏”，这只是一个表面的让步，因为他随后马上重申，“**犹太人**”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故事最后以一个更进一步的概化结束，来自男子 E，当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犹太人这里有主意”。我们可以假设他暗示“犹太人”很聪明，也许比非犹太人聪明。局部语义，尤其是紧随 Y 的故事的这种方式，作出了如上假设，以致更进一步的概化被应用于论证这个故事里的中心偏见论断——“即，因为犹太人很聪明，所以他们不必自己工作”（Wodak, 1997: 85）。

这个女性参与者的评价倾向于抵消男子 Y 的刻板印象的概化；但是，她也将“犹太人”置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他们被以第三人称来谈论，并且被定位为一个外群体。这种话语建构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没有潜在的实质后果。遍布欧洲的激进政治的历史，尤其是在中欧的，向我们展示了一旦犹太人被视为“他们”，“那么种族政治的动态经常意味着‘理性的’甚至‘现代的’答案就是将犹太的‘外群体’作为目标来补偿‘聚居的大多数’”（Beller, 2007: 70）。

这种人际互动是局部的，而且局限于明确表达共同情绪的少量参与者，然而当被大众媒体放大时，种族主义话语的力量将被充分增强。

12.4 大众媒介化的种族主义话语

媒介化的传播涉及话语的“基于技术和机构的大众生产和发布”（Gerner, 1972 [1967]: 51），包括文本的、图像的和视听的媒体。从学校教科书和儿童文学，到面向成人的新闻和娱【249】乐媒体，通过这些多样的话语，种族主义的再生产趋于增加并形成互文。虽然类型和媒体格式

1 德语，意为“那些犹太人”。——译者注

具有差异，这些媒介化的话语编码了一个以高级建构“我们”和低级化“他们”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矩阵（Henry et al., 1995）。

约翰·斯特克利（Steckley, 2003）对加拿大77本社会学教科书里有关原住民的陈述进行了分析，他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来描述一些策略方式，其中关于他者的知识或是被隐匿，或是被去资格化。在这些学校教科书里，最常见的策略是采用消除少数族群对于建设这个国家的贡献的话语，或者在白种人殖民者社会（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情况里，对原住民的征服就是全部撤离。相反，少数族群的贡献被框定为不存在的或最小化的，或者被渲染为自利的行动。换言之，“他们”来改善他们的命运并寻求庇护，以远离他们饱经战乱、困于贫穷的国家。这些表述删去了将这些社会塑造为依赖西方经济权力和慷慨援助的征服、殖民和新殖民化的历史。斯特克利认为，“加拿大的入门级社会学教科书在对原住民的讨论里有如此多的错误，涉及他们没有说的事物、他们没有问的问题、他们从未想到的答案、他们没有引用的资源，以及他们没有倾听或者允许去说话的声音”（2003: 14）。这回应了前文提到的五点：人们是如何被命名、被感知、被描述、被特征化的，以及各种各样的论证策略是如何被用来合法化行动（如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或不行动（如忽视原住民的困境）。

设法隐藏主流群体的权力的指示策略不止局限于教科书，而是被策略性地应用于其他媒体格式里。例如美国的《24小时》（*24*）和它的加拿大对应节目《边境线》（*The Border*）等犯罪类电视剧，利用新闻和时事的节目录制产生恐惧感，借此获得意识形态。这两部流行的犯罪电视剧都利用了我们对于恐怖主义的恐惧感。《边境线》于2008年在加拿大开播并随后出售给法国播出，聚焦于将加拿大与美国分隔的“最长的无防备边界”。这个节目的演员阵容是多种族的，并在一个曾经是军人的白人男性官员的领导下，在一个团队里工作。这个团队运营着一个虚构的政府机构——移民和海关安全局（ICS）——不仅在边境线巡逻，而且将日益增多的监控技术的使用合法化。第一季的大部分剧集聚焦于非法越境的武装人员和普通人、他们（是指普通人）被捕获，随后被驱逐出境，或者有条件地接纳为合法的庇护寻求者（见Jiwani, 2010）。

团队里唯一的黑人男性是一个名叫达内尔·威廉斯的代理调查员角色。作为一个被同化的非洲裔加拿大人，威廉斯例证了无威胁性的、驯服的他者。在他们对于在1985年至1986年在电视上播出的五部北美警察电视剧的分析里，德罗什和德罗什发现“黑人被塑造为比白人对应者更中产阶级的典范，更加自主并高效规划，而且更有品位”（Deroche and Deroche, 1991: 86）。他们认为这些表征的流行源自对“安慰人心的形象”的需要，这会清除结构性的种族主义的观念，并肯定自由主义的精神。正如他们所言，“正直、良好的黑人形象与厌倦了罪恶感的白人观众产生了共鸣，也与急于要求社会经济上的而非种族主义上的主人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选民都产生了很好的共鸣（Deroche and Deroche, 1991: 87; 另见Hooks, 1992; Gray, 1986）。达内尔·威廉斯的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开明的种族主义”（Jhally and Lewis, 1992）或者现代种族主义（Entman, 1990）的一个标志——一种在将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行为正常化的同时寻求清除种族不平等的观念并强调通过发展而向上流动的种族主义。

【250】

《边境线》中特别有趣的一集（第8集）围绕对一个穆斯林妇女索拉娅的审问，她合成了炭疽，准备释放于多伦多地铁系统里。（再次注意，这个恐怖主义分子是穆斯林。）在这一集里，达内尔·威廉斯被描绘为通过使用一种平等的话语来小心地抹除加拿大少数族群历史上的剥削——

因而抹平差异：

> 索拉娅：你不觉得讽刺吗，你，一个非洲男人，在审问我，一个穆斯林女人，当白人正通过一面单向镜监视着我们？［注意指涉策略］
>
> 威廉斯：事实上我是一个加拿大人。
>
> 索拉娅：你的祖先是非洲人。
>
> 威廉斯：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某种人。
>
> 索拉娅：他们被用链子拴着来到这里。
>
> 威廉斯：来到美洲。他们来到加拿大是为了自由。
>
> 索拉娅：他们在这里被像屎一样对待。
>
> 威廉斯：每个人都被像屎一样对待。读读加拿大历史。原住民，中国人；见鬼甚至还有爱尔兰人。历史是那样。人们都侮辱其他人。
>
> 索拉娅：在阿富汗，过去是我们的所有。甚至是在最原始的村庄。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几千年以前的。
>
> 威廉斯：对痛处挑剔是不会痊愈的。谁会像那样活？谁会一直每天都不开心？你为什么这么愤怒？我们对你做了什么？

在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话语活动，否定历史、抹平压迫，并归纳出索拉娅的形象（以及通过代理，是所有的阿富汗人），他们受到幻想的驱使、不愿放开过去，而且被一种未解决的、未耗尽的愤怒所征服。这次交流的中心是将指涉策略用于参与者对于殖民过去 / 现在的叙述的争论。索拉娅首先将达内尔称为“一个非洲男人”，一种去空间化的隐性种族化的指示策略；在她接下来的回应里她通过使用“祖先”尝试了一种初始化。他以一个特定空间化的指涉策略——他是“一个加拿大人”来回应。这直接反击了索拉娅他有（或者应该有）一种超国家关系的暗示，这种关系基于一种种族身份，不同于——或者潜在地冲突于——他的官员同事（白人，加拿大人）的种族身份。

整个交流给人一种同化伦理的有形感觉——我们都被“像屎一样”对待，所以为什么抱怨？【251】在抹平被直接殖民的和被用于殖民代理的人之间的差异这一点上，针对原住民、中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平等论证策略是揭示性的。它消除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黑人定居地的历史，那里正如索拉娅所正确注意到的，展示了黑人是如何被“像屎一样”对待。并非所有移民到加拿大的人都像达内尔·威廉斯一样是效忠者，也不是所有在加拿大的黑人都被视为加拿大人（Hay, 1996）。尽管如此，达内尔在审问中有最后的发言权。在此，他应用了述谓策略，强调了阿富汗人民的愤怒和固执的怨恨，因此再生产了将“他们”作为野蛮、原始的观念，而“我们”则是进步的、自由的、民主的。通过用于这次交流里的话语策略，权力等级和不平等被隐藏了。白人的主导性被免于命名。它保存在背景里，不被注意，却观察着一切（Fiske, 1996）。

正如霍尔（Hall, 1997）所言，霸权从来都不是稳定的，从来都没有被完全获得。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为了获得同意而付出的努力是永恒的。为了保持这些，《边境线》反映了一种加拿大与同情心、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剧集突出一种努力，即“拯救”非法移民，并向那些被错误拘留或驱逐的人提供庇护。有趣的是，在上面描述

的这一集里，索拉娅揭示了她自己是一个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美国女人——换句话说，“我们”中的一员变成了原住民！

12.4.1 新闻中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新闻业是深深扎根于国家话语的一项活动。正如理查德·卡普兰雄辩地说道，“新闻是国家的传说，它纪念并同情国家的喜悦和悲剧”（Kaplan, 2003: 212）。检视全国性日报所呈现出的对少数族群的新闻描述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闻如何再生产不平等和主流关系的视角（Henry and Tator, 2002; van Dijk, 1991）。最近对于《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加拿大主要的一家日报）在七年期间出版的 190 则新闻的语料库分析表明对加拿大原住民女性所犯下的结构性暴力的显著消除（参见 Carter, 1997; 历史上或当今对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叙述，参见 Smith, 2005）。相反，这些新闻强调了大多被刻画为可怜的贫穷受害者的原住民女性是有罪的，她们的生活以酒精和药物成瘾、无家可归、高婴儿死亡率和患病率、更高的 HIV 发生率、肝炎感染和妇科癌症为标志。实际上，她们被描绘为社会上最没有希望的部分之一（Jiwani, 2009b）。

相比较而言，《环球邮报》在同一时期对于阿富汗女性的报道明显不同。尽管阿富汗女性【252】也被描绘为塔利班政权的受害者，但她们扮演的不是完全的、可怜的受害者，对她们自己的命运有罪。不同的是，阿富汗女性是个人化的——她们比原住民妇女更经常地被点名道姓——而且她们的抵抗行动被强调和庆祝（Jiwani, 2009a）。在这一比较分析中，“好的”与“坏的”女性的二元划分基础是那种可以被解救进而有利于西方帝国利益的女性。原住民女性不符合要求，但阿富汗女性符合，考虑到在阿富汗完成的有利可图的重建任务。

对《环球邮报》里关于阿富汗和原住民女性的一些头条新闻进行对比，可以洞悉语言在话语上对这些女性的特定建构进行再生产的方式。

表 12.1

原住民女性	阿富汗女性
研究表明土著面临更多暴力。（Sallot，2001 年 8 月 9 日）	国家新闻女性阿富汗（National News Female Afghan）的运动员想要有尊严地生活。（Dareini，2001 年 10 月 30 日）
土著为“被偷走的姐妹”而落泪。六个年轻女性在偏远的B.C.路走失。（Lunman，2003年3月11日）	在喀布尔的阴影里等待公正；女性希望阿富汗新宪法阐明她们的权利，但旧法的受害者依然在监狱里受苦。（Ghafour，2003 年 12 月 22 日）
更多女性的残骸被发现；警方特别小组找到了在 B.C. 猪场调查中发现的另外九名受害者的遇害证据。（Armstrong，2004 年 1 月 28 日）	无国界美容师向阿富汗女性教授基本课。（Ghafour，2004 年 2 月 24 日）

对这些头条的粗略分析表明一个群体的女性（阿富汗的）是如何因她们的英雄主义、对塔利班

的抵抗和对女性权利的坚持而受到赞扬。相比较而言，有关原住民女性的新闻则强调她们作为受害者和罪犯而与法律的触碰，并强调她们在统计学意义上的高风险。在这些表述里产生作用的指示和述谓策略使意识形态矩阵复杂化了，也即被正面评价和描绘的人是"在那儿"的女性，相对的是"在这里"的女性。运用于这些描述里的这种有差别的评价和论证策略暗示了一种"对支配的隐藏"（van Dijk, 1993b），在其中支撑这种评价的动机在于发挥作用的物质利益，也在于精英通过将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在那儿"的情况以遮挡"在这里"的女性的状况所获取的好处（Khan, 2001）。然而，牢记这一点是重要的：一种权力等级在盛行，它将原住民定义为相较于白人占据较低地位。

12.4.2 给议题蒙上面纱——"处于危险中的穆斯林女性"

【253】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事件标示出已经盛行于美国境内和其他地区的针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歧视态度的增强。拉扎克（Razack, 2008）观察到，在作为结果的媒介化的图景里，穆斯林恐怖主义者、处于危险的穆斯林女性和英勇的白人男性形象在角色阵容中处于支配地位。从批判性话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历史路径，已经有许多关于这些袭击事件及其后续的论述（如，Graham, Keenan and Dowd, 2004; Stenvall, 2003）。在以下部分里，我们聚焦于"**希贯布**"（hijab）[1]。

从法国拒绝穆斯林女性戴"**希贯布**"，到其他欧洲国家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受到许多蔑视和非议的服饰。这个话题本身已经生成了大量的和延伸的文献（如，Alvi, Hoodar and McDonough, 2003; Klaus and Kassel, 2005; Macdoald, 2006; Scott, 2007; Sreberny, 2007;Tévanian, 2005; Vivian, 1999;Yeğenoğlu, 1998）。而且我们也许有些迟缓，没有提及这一符号是如何成为压抑的、受传统束缚的伊斯兰教的表征。尽管在获取塔利班信息和合法化对自由派阿富汗女性的解救行动方面（Russo, 2006），"**希贯布**"和"**波卡**"（burka）[2] 有其策略性使用；但是，它们已承载了标志穆斯林女性在西方是下层的和性化的他者这样的意义。媒体对于"**希贯布**"的报道和形构已实现了这一目标的大部分。例如，见证这则由一个广播脱口秀主持人进行的一段采访，对象是一名正在竞选当地机关的穆斯林女性候选人，随后这则采访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公报》（*Montreal Gazette*）上被报道：

> 主持人贝努瓦·达特里扎克邀请（萨米拉·拉欧尼）在周三进行一次坦诚的聊天……
> "它真可爱，你的面纱，伊斯兰面纱——它很性感，"达特里扎克开始说。
> "它是我的头巾，"拉欧尼纠正他。
> "不是的，但对我们而言它正在变得性感。西方男人，像我这样的异端，我们正开始发现它性感——小心！"
> [……]
> 休息之后，达特里扎克又继续发起攻击。一个"好的穆斯林女性"可以与不同的男人做爱吗？

---

1 穆斯林女性戴的头巾或面纱。——译者注

2 伊斯兰教徒的长袍。——译者注

她们可以喝酒吗？
她是自由的，可以做自己的决定，拉欧尼回答道：“轮不到我去评判任何人。”
她是不是知道，根据穆斯林教法，“如果我今天要强奸你，你需要证人来验证你不同意？”
达特里扎克问。
（Heinrich, 2008: A15）

这段交流的语气暗示着这个广播脱口秀主持人故意制造关于穆斯林的极端的宣告式陈述，以使候选人震惊。他重复提及性、强奸和性感，以此强化了他使用的论证策略。详细叙述了这些的记者亨里希通过使用“又继续发起攻击”等词语明确地强调了达特里扎克的极端行为。尽【254】管如此，这则访谈展示了“陈腐的”种族主义会话如何变得如此，以至于可以在谈话节目里被清晰表达而不会引起广泛的谴责。这则访谈调用了一系列话语行动和表面的让步，并揭示了被表演的话语暴力。也有一种反转策略在此产生作用，因为这些女性自己对可能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性别暴力负责任。这则访谈在魁北克最大的英语日报再版，这说明了精英的纷争——在这一案例里是在法语和英语主导的（或“宪章”）[1]群体之间——是如何在一场一方更具种族偏见而相反另一方更宽容的竞争里呈现的（Jiwani, 2006），双方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权力（Hage, 1998）。

面纱的符号象征在政党修辞、宣传资料等形式的政治话语里也很明显，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的部分里要讨论的。

12.5 “种族”、种族主义和政治话语

鉴于政治话语具有话语的和物质的权力，它能吸引众多的分析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 Blommaert and Verschueren, 1998; Mehan, 1997; Reeves, 1983; 以及尤其是 Wodak and van Dijk, 2000 里的章节）。在此，对关于“民族事务”的政治辩论“以宽容、平等和好客的人性价值为前提”，正面的自我呈现和负面的他者呈现的一般路径再次占据主导，但同时推进了“精英种族主义的更加含蓄的形式，在他们将移民和少数族群关系呈现为本质问题的时候”（van Dijk, 1997: 31）。相应地，政治精英“使用人权标语、民族主义修辞和平民主义等多种话语构成将自己描述为宽容的、好客的和理性的，而少数族群则被刻画为有问题的和排斥他们的”（Augoustinos and Every, 2007: 129）。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明显的种族主义例子。英国政治话语经常，尤其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将移民建构为一个政治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 1964 年大选的前六年里，保守党在伯明翰斯梅西克的选民里所使用的种族主义宣传为“种族”在竞选活动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划定了一个分水岭。在这次选举之前，保守党候选人彼得·格里菲斯对当地报纸写下了以下的话：

显然，课堂里英国孩子被不说英语的孩子所击退这样的困境并没有引起移民领袖的忧虑。嗯，它却困扰着斯梅西克保守党（Smethwick Tories）[2]，而我们的孩子将要得到一个公平

1 这里是指法语和英语作为加拿大宪法上认可的官方语言。——译者注

2 “保守党”又称为“托利党”，是英国历史上较为悠久的政党，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得到发展并日渐活跃，是英国最大的保守右翼政党。——译者注

的交易，尽管社会党成员和他们的移民朋友联合反对（致《斯梅西克电讯》（*Smethwick Telephone*）的读者来信，1964 年 1 月 17 日，引用自 Foot，1965: 4）

在竞选期间，同一位彼得·格里菲斯（Peter Griffiths）使用标语“如果你想要一个黑鬼邻居，就投给工党”，以此与现任工党议员帕特里克·戈登（Patrick Gordon）竞争。尽管这个活动广受关注，但鲜有批评之声。当工党议员表示抗议时，格里菲斯甚至宣称“孩子们已经组织好了要反复喊”这句标语。他告诉《泰晤士报》，“我不会谴责任何说这话的人。我把它当做一种民心所向的示威运动”（Foot, 965: 44）。当格里菲斯获胜并在下议院获得一个席位时，用莱顿－亨利（Layton-Henry, 1984: 57）的话来说，这是“抗议被有效利用的选举优势”。正如达默特所认为的，从那以后英国的政治话语假定了两件事：第一，“英国大众是种族主义者”；第二，“比起大众，政治领导人和‘国家权力机构’人员是 [……] 自由主义的，而且必须竭尽全力地限制或安抚任何种族主义的流行符号，在无法成功清除的地方就把它们扫到地毯下面”（Dummett, 1973: 244）。这些假设开启了论证空间，在其中精英有可能“在批评比他们以更为种族主义的方式行动的人的同时，采取为种族主义手段辩护的立场”（同上）。这些策略在其他民主国家里也可以观察到，比如澳大利亚（Hage, 1998）、奥地利（Reisigl and Wodak, 2001）、加拿大（Thobani, 2007）、法国（van der Valk, 2003）、德国（Jäger, 1992）、荷兰（van der Valk, 2002）和美国（Mehan, 1997）。【255】

关于种族化的他者的政治话语的另一个维度是极右政党对主流辩论的参与和影响。在特定环境里，极右政党可以利用“反移民政策的合法性，后者借由主流政客和新闻记者而盛行起来”（Richardson, 2008: 322）。相反，在特定环境里极右政党在吸引投票和党员上的成功，可能暗藏于主流政党转向右派并模仿极右政党的语言甚至政治观点。例如，在 1979 年作为保守党领袖赢得大选之前，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受到了特别关注——右派的赞扬和左派的批评——因为她在电视访谈里发表了以下观点：

> 我是第一个承认从内政部获取关于移民的明确数据是不容易的，但曾经有一个委员会浏览了它，并说如果我们在本世纪末继续如此的话，这里将会有四百万来自新联邦或巴基斯坦的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多。我认为这意味着人们真的害怕这个国家有可能被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拖入困境，而且，你知道的，英国的角色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和法律贡献颇多，所以如果这里有任何恐惧感，可能是陷入困境的人准备做出反应并更友好地对待外来者。

后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英国的黑人和犹太人社区的暴力攻击在一段时间内增加了，在此期间撒切尔的独裁主义、新右派政府导致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的支持率跌落（Troyna, 1982）。显然政治领域的不同元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结果可能成为原因，反之亦然。达默特和达默特（Dummett and Dummett, 1982: 100）也讨论了这一问题，称之为“相互作用”，在其中“政客的活动不仅反映了而且已经成为种族主义态度产生严重炎症的主要原因”，这种炎症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记住这种相互作用，我们将描述一个极右宣传的案例，它来自英国国家党（the British National Party，BNP）。【256】

首先，英国国家党是英国最大的极右政党，并且最近正在获得迄今为止历史上英国极右

派无法相比的一定程度的竞选胜利。在 2010 年的大选里，英国国家党参加竞选的 338 名候选人一共获得了 563743 张选票，大大超过 2005 年大选时积累的 193000 张选票，而且也显著高于 2001 年它所吸引的 47000 张选票。这场胜利与主流政治话语里关于种族和民族上的他者的显著的歧视性看法和观点直接相关。因此，“当英国国家党于 1993 年在托尔·汉姆莱茨（Tower Hamlets）竞选时，移民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此相似的是，移民和庇护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Rhodes, 2005: 9），所以英国国家党再次赢得了地方议员的席位。基于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反移民政策公开保留于政党的核心：党章宣称他们“致力于消除并扭转非白人移民的趋势，并通过法律上的变化、协商和同意来恢复 1948 年以前英国人口构成中白人的优势性比例”。

该党具有高度发展的宣传网络，出品一份报纸、一份杂志、两个常规更新的网站，关于国家性和地方性话题的各种传单，而且最近还拥有了一家唱片公司。2008 年，英国国家党生产了一本用光面纸印刷的四页 A4 传单，作为他们的竞选大伦敦市政府（GLA）席位的活动的一部分。这里复制了传单的扉页（更多详细分析参见 Richardson and Wodak, 2009）。

在这里，“伦敦正在改变的面孔”不仅是修辞上的使用，指伦敦的特质、角色或性格已经（在表面上）发生变化的方式；而且在字面上是指伦敦居民的真实面孔，他们隐喻性地代表了这座城市。图 12.1 里的第一张图片显示了快乐的、微笑的白人家庭——女性和孩子为主——在阶梯道路上进行社交活动。英联邦旗表明这条街道是在英国。左侧的箭头——标题为“从这……”——让观看者的注意力朝向一个开怀大笑的女性，因此提供了欢迎进入图片的点。第二张图片里的女人则不友好得多。很快就看出她们显然是穆斯林，戴着**面纱**意味着你只能看到她们的眼睛，这些眼睛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读者。读者的注意力在此被左侧的箭头所引导，这次指向的是一个举起两个手指的女人——在英国手势里大致特指“迷失”（或者更具侮辱性的意思！）。

运用这两张图片的互相对比帮助英国国家党将种族和宗教问题表达为所谓的“社区价值”的失落。在一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有趣融合中，传单利用这些妇女的形象来再现纯真的失落和对“我们的价值”的威胁：简言之，伦敦已经变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不再能注视着友好的、微笑的、有吸引力的（白人）女性；在这里的都是侮辱性的、戴面纱的（穆斯林）女性。这是英国国家党新近的方向，并且与男性的凝视进行对话，这在他们的宣传里极为普遍（Miller, 1999）。【258】

选择描述带着**面纱**的穆斯林女性，选择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有人做出一个侮辱性手势），并选择将她们设立在放大的特写框架里，因而否定了她们的地区和语境感，这样的生产除了强调她们的穆斯林属性外，很难再建构出对这一图片的其他阐释。所以，从这种建构里，我们可以演绎为伦敦已经变了：

“从这（白人女性和孩子）到这（穆斯林女性）”

而且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各种正面社会特质的失落。但是，传单语言内容没有指涉种族（“白人”）或宗教（“穆斯林”）的事实，让英国国家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看似合理的否认”。换言之，对于无批判力的眼睛来说，传单可能是建议回归“社区价值和社会包容”——一个许多人难以反对的主题。但是，与图片一致，命题的种族化假设不能被忽视；实际上，它是这座

城市的种族净化或宗教净化的一个论据。由此，可以重新建构一个立场和它的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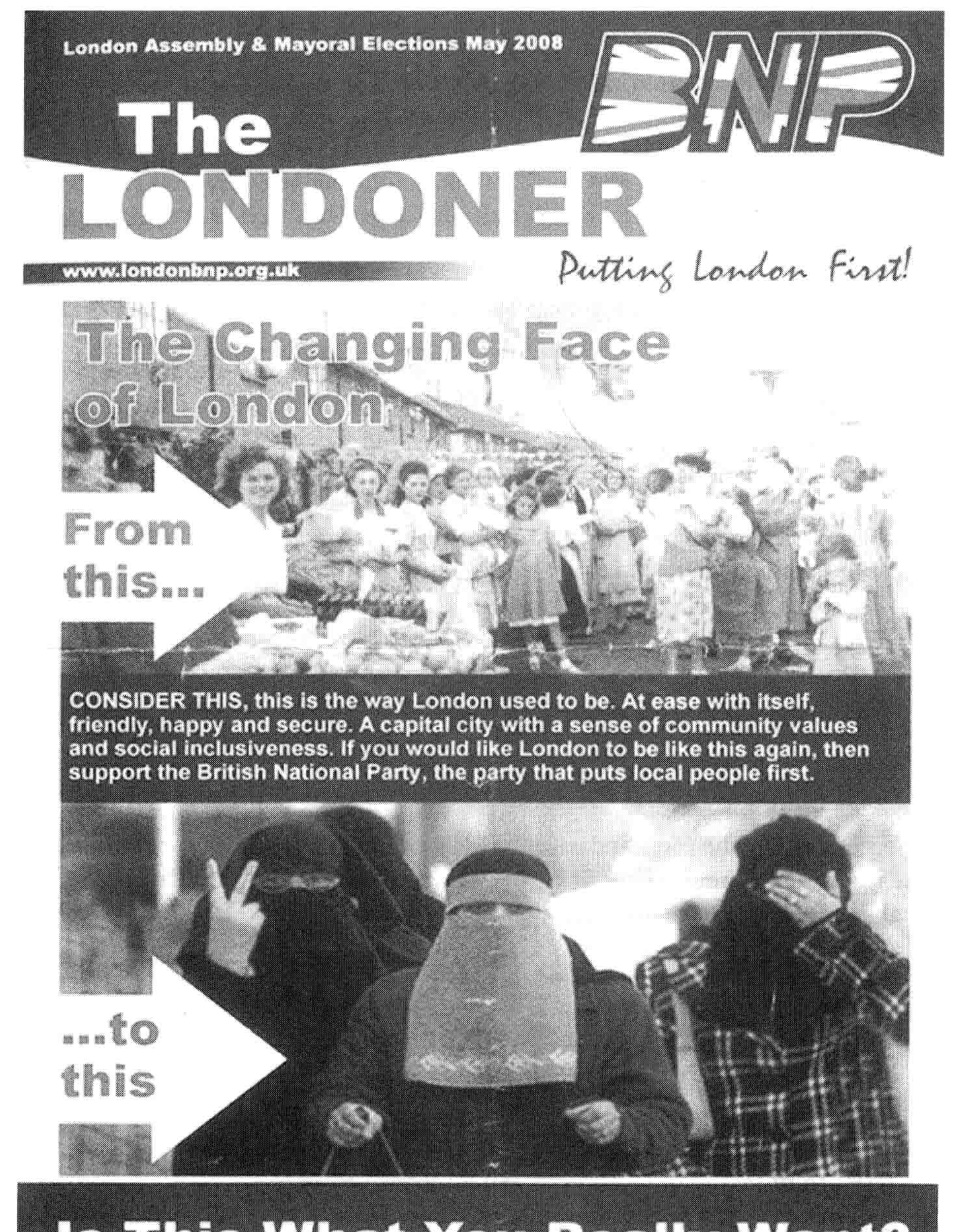


图 12.1

伦敦曾经像这样（白人的）。

当它像这样（白人的）时，伦敦悠然自得、友好、快乐而安全。

英国国家党希望伦敦悠然自得、友好、快乐而安全。

悠然、友好、快乐而安全意味着像这样（白人的）。

因此，英国国家党将让伦敦像这样（白人的）。

模糊指示词“这样（this）”的重复使用导致了这一论据的视觉部分和语言成分在修辞上的交叉渗透——而且使得英国国家党在修辞上免于讲出“这样”的准确含义。

12.6 结　语

正如本章所论证的，种族主义话语是普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了语言如何被用于再生产已有的社会不平等，并在此过程里将种族主义合法化。通过多种论证策略、修辞手段、词汇风格、故事叙述、命题、依靠精英作为权威的知识来源、日常谈话和媒介化的文本，传播了对自我的正面评价和对他者的负面评价。通过问题化、边缘化和低级化他人，这些谈话和文本确认了将我们自己视为理性的、文明和进步的，并且“我们”对待他人从根本上很公正的“我们”的感觉。但是，这样的谈话和文本存在危险。正如本章所表明的，因为这些回应实际上是反转。【259】它们将话题转移到情感层次——感觉的层次——通过删去需要他者存在的结构性框架，例如，那些对如此多人进行驱逐和剥削的殖民和帝国主义历史。这些反转也模糊了由精英利益导致的并存在于其中的阶层不平等，以巩固权力和特权。换言之，它们是责备受害者因而隐藏支配权力的策略性行动。

延伸阅读

有许多文献检视了话语里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与话语，所以我们选择了四本深入考察了本章提到的主题的书。

关于话语和种族 / 种族主义

Reisigl, M. and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Routledge.

运用话语历史学路径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并且分析了包括演讲、法律文件、新闻报纸报道和日常谈话的一系列类型，赖西格和沃达克的书检视了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民族歧视在话语中是如何被反映、建构并再创造的。

关于人际话语

van den Berg, H., Wetherell, M. and Houtkoop-Steenstra, H. (eds) (2003a) *Analysing Race Talk: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Inter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部选编的合集，供稿者都是话语分析者，他们分析了同一个数据：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做的三则访谈，被收录于关于种族主义话语的一个大型项目里。这些章节采用了多种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包括会话分析、话语心理学和框架分析），而且突出了数据中的一系列现象。

关于大众媒体话语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霍尔在第一章里简明介绍了从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表征的研究。本书面向学生，并且清晰地解

释了复杂的概念。

关于政治话语

Wodak, R. and van Dijk, T. A. (eds) (2000) *Racism at the Top*. Klagenfurt: Drava.

一部选编的合集，检视了关于种族、民族和欧洲议会“差异”的话语。供稿者的每一章都论证了政治精英在生产和再生产种族主义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获取。

Augoustinos, M. and Every, D. (2007) '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prejudice: a discourse of denial, reason, and liberal-practical politic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2): 123-41.

Klaus, E. and Kassel, S. (2005) 'The veil as a means of legitim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gender, media and war', *Journalism*, 6(3): 335-55.

van der Valk, I. (2003) 'Right-wing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in France', *Discourse & Society*, 14(3): 309-348.

参考文献

Alvi, S.S., Hoodfar, H. and McDonough, S. (eds) (2003) *The Muslim Veil in North America: Issues and Debates*. Toronto: Women's Press.

Augoustinos, M. and Every, D. (2007) 'The language of 'race' and prejudice: a discourse of denial, reason, and liberal-practical politic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2): 123-41.

Beller, S. (2007) *Antisemit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llig, M. (1991) *Ideology and Opinions: Studies in Rhetorical Psychology*.London: Sage.

Billig, M., Condor, S., Edwards, D., Gane, M., Middleton, D.J. and Radley, A.R. (1988) *Ideological Dilemma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king*. London: Sage.

Blommaert, J. and Verschueren, J. (1998) *Debating Diversity: Analysing the Discourse of Tolerance*. London: Routledge.

Carter, S. (1997) *Capturing Women: The 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Imagery in Canada's Prairie West*. Montreal: McGill-Queens.

Condor, S., Figgou, L., Abell, J., Gibson, S. and Stevenson, C. (2006) " 'They're not racist": prejudice mitigation and suppression in dialogu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441-62.

Deroche, C. and Deroche, J. (1991) 'Black and white: racial construction in television police dramas'.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23(3): 69-92.

Dummett, A. (1973) *A Portrait of English Racism*. London: Penguin.

Dummett, M. and Dummett, A. (1982)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Britain's racial crisis'. In C. Husband (ed.), *'Race' in Brita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pp. 97-127. London: Hutchinson.

Entman, R.M. (1990) 'Modern racism and the image of blacks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332-45.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Arnold.

Fiske, J. (1996) *Media Matters: Race and Gender in US Politics* (revised edn).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ot, P. (1965) *Immigration and Race in British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Gerbner, G. (1972 [1967]) 'Mass media an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In D. McQuail (ed.), *Sociololg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pp. 35-58.Harmondsworth: Penguin.

Graham, P., Keenan, T. and Dowd, A.M. (2004) 'A call to arms at the end of history: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of Geoyge W. Bush's declaration of war on terror'. *Discourse & Society*, 15(2-3):199-221.

Gray, H. (1986) 'Television and the new black man: black male images in prime-time situation comed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8: 223-42.

Hage, G. (1998) *White Nation: Fantasies of White Supremac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nandale, Australia: Pluto.

Hall, S.(1990) 'The whites of their eyes, 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 In M. Alvarado and J.O. Thompson (eds), *The Media Reader*, pp. 9-23.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rtley, J.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Hay, S. (1996) 'Blacks in Canada, the invisible minority'. *Canadian Dimension*, 30(6): 14-17.

Heinrich, J. (2008) 'Politics 101: the art of staying calm in the event of obnoxious questioning'. *The Montreal Gazette*, 13 September, p. A15.

Henry, F. and Tator, C. (2002) *Discourses of Domination: Racial Bias in the Canadian English-Language Press*. Toronto, London,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Henry, F., Tator, C., Mattis, W. and Rees, T. (1995) *The Colour of Democracy: Racism in Canadian Society*. Toronto, ON: Harcourt Brace Canada.

Heritage, J. and Atkinson, P.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oks, b. (1992)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Jäger, S. (1992) *BrandSätze: Rassismus im Alltag* (DISS-Studien). Duisburg: Duisburger Institut für Sprach-und Sozialforschung.

Jhally, S. and Lewis, J. (1992) *Enlightened Racism: The Cosby Show, Audiences, and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Dream*. San Francisco, CA: Westview.

Jiwani, Y. (2006) *Discourses of Denial: Mediations of Race, Gender, and Violenc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Jiwani, Y. (2009a) 'Helpless maidens and chivalrous knights: Afghan women in the Canadian press'. *Toronto Quarterly*, 78(2): 728-44.

Jiwani,Y. (2009b) 'Symbolic and discursive violence in Canadian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Aboriginal women'. In D. Weir and M. Guggisberg (eds), *Violence in Hostile Contexts*.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Available at http://www.inter-disciplinary.net/publishing/id-press/ebooks/understanding-violence-contexts-and-portrayals/, 2009

Jiwani, Y. (2010) 'Soft power – policing the border through Canadian TV crime drama'. In J. Klaehn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a and Power*, pp. 275-93. New York: Peter Lang.

Kaplan, R.L. (2003) 'American journalism goes to war, 1898-2001: a manifesto on media and empire'. *Media History*, 9(3): 209-19.

Karim, K.H. (2000) *Islamic Peril*. Montreal, Quebec: Black Rose.

Kelly, L. (1987) 'The continuum of sexual violence'. In J. Hanmer and M. Maynard (eds),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ontrol*, pp. 46-60. London: Macmillan.

Khan, S. (2001) 'Between here and there: feminist solidarity and Afghan women'. *Genders, 33*.Available at http://www.genders.org/g33/g33_kahn.html

Klaus, E. and Kassel, S. (2005) 'The veil as a means of legitim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gender, media and war'. *Journalism* 6(3): 335-55.

Kleiner, B. (1998) 'The modern racist ideology and its reproduction in "pseudo-argument" '.*Discourse and Society*, 9(2): 187-216.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1) *Reading Images*. London: Routledge.

Layton-Henry, Z. (1984)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Britain*. London: Allen & Unwin.

Macdonald, M. (2006) 'Muslim women and the veil: problems of image and voice in media representation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6(1): 7-23.

Machin, D. (2007) *Introduction to Multimodal Analysis*.

London: Hodder Arnold.

Mehan, H. (1997) 'The discourse of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debate: a case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Discourse and Society*, 8(2): 249-70.

Miller, L. (1999) 'Ideological themes of eugenics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ascism: a discursive analysi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Razack, S. (2008) *Casting Out: the Eviction of Muslims from Western Law and Poli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eves, F. (1983) *British Racial Discourse: A Study of British Political Discourse About Race and Race-related Ma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isigl, M. and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Routledge.

Rhodes, J. (2005) 'The "local"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Party'.*SAGE Race Relations Abstracts*, 31(4): 5-20.

Richardson, J.E. (2004) *(Mis)Representing Islam: the Racism and Rhetoric of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ichardson, J.E. (2008) '"Our England": discourses of "race" and class in party election leaflets'. *Social Semiotics*, 18(3).

Richardson, J.E. and Wodak, R. (2009) 'The impact of visual racism: visual arguments in political leaflets of Austrian and British far-right parties'. *Controversia*, 6(2): 45-77.

Russo, A. (2006) 'The 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s campaign to stop gender apartheid'.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8(4): 557-80.

Scott, J.W. (2007) *The Politics of the Ve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ohat, E. and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 A. (2005) *Conquest, Sexual Violence and American Indian Genocide*.Cambridge, MA: South End.

Sreberny, A. (2002) 'The power of the veil: Reviews Editors' Introductio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2): 267-72.

Steckley, J.L. (2003) *Aboriginal Voic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Canadian Introductory Sociology Textbooks*.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Stenvall, M. (2003) 'An actor or an undefined threat ? The role of "terrorist" in the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2): 361-404.

Stokoe, E. and Edwards, D. (2007) '"Black this, black that": Racial insults and reported speech in neighbour complaints and police interroga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18(3), 337-72.

Tévanian, P. (2005) *Le Voile Médiatique: Un Faux Débat, L'affaire du Foulard Islamique*. Paris: Raisons d'agir éditions.

Thobani, S. (2007) *Exalted Subjects: 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Race and Nation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royna, B. (1982) 'Reported racism: the "British way of life" observed'. In C. Husband (ed.). *'Race' in Brita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pp. 275-91. London: Hutchinson.

van den Berg, H., Wetherell, M. and Houtkoop-Streenstra, H. (eds) (2003a) *Analysing Race Talk: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Intervie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en Berg, H., Wetherell, M. and Houtkoop-Streenstra, H. (2003b) 'Introduction'. In H. van den Berg, M. Wetherell and H. Houtkoop-Streenstra (eds), *Analysing Race Talk: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Interview*, pp. 1-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er Valk, I. (2002) *Difference, Deviance, Threat? Mainstream and Right-Extremist Political Discourse on Ethnic Issu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rance* (1990-1997). Amsterdam: Aksant.

van der Valk, I. (2003) 'Right-wing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in France'. *Discourse & Society*, 14(3): 309-48.

van Dijk, T.A. (1987) *Communicating Racism: Ethnic Prejudice in Thought and Talk*.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Dijk, T.A. (1991)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van Dijk, T.A. (1992) 'Discourse and the denial of racism'. *Discourse and Society*, 3(1): 87-118.

van Dijk, T.A. (1993a)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Vol. 6: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Dijk, T.A. (1993b)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2): 249-83.

van Dijk, T.A. (1997)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acism: describing others in Western parliaments'. In S.H. Riggins (ed.),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pp. 31-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 Dijk, T.A. (2005) *Racism and Discourse in Spain and Latin Americ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an Dijk, T.A., Ting-Toomey, S., Smitherman, G. and Troutman, D. (1997) 'Discourse, ethnicity, culture and racism'. In T.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2*, pp. 144-80. London: Sage.

Vivian, B. (1999) 'The Veil and the visible'.*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2): 115-39.

West, C. (2002) 'A genealogy of modern racism'. In P. Essed and D.T. Goldberg (eds), *Race Critical Theories*, pp. 90-111. Malden & Oxford: Blackwell.

Wodak, R. (1996) *Disorder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Wodak, R. (1997) '*Das Ausland* and anti-Semitic discours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other'. In S.H. Riggins (ed.),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pp. 65-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Wodak, R. and Pelinka, A. (eds) (2002) *The Haider Phenomen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Wodak, R. and van Dijk, T.A. (eds) (2000) *Racism at the Top*. Klagenfurt: Drava.

Wodak, R., Nowak, P., Pelikan, J. Gruber, H., de Cillia, R. and Mitten, R. (1990) *Wir sind alle unschuldige Taeter! Diskurshistorische Studien zum nachkriegs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ain: Suhrkamp.

Yeğenoğlu, M. (1998) *Colonial Fantasies: Towards a Feminist Reading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话语与认同 13

Discourse and Identity

⊙ 安娜·德菲纳

13.1 引 言

人类传播涉及信息的交换、行为的完成、情感和情绪的表达。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向其他人传递出以下信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地理、民族或社会群体的归属如何；我们有怎样的伦理和道德立场；或者，我们在政治上忠诚于谁。当我们用语言表达自身形象的同时，我们也在用语言对人进行认定、分类和评价，使自己与他人结盟以表示我们的相似性；或者，我们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性，进而与他人保持距离。总而言之，语言和话语对认同（identity）的建构、协商极为关键。

认同与话语的紧密相关性在过去的研究中被经常提及。但是，直到近些年，认同才在话语分析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中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独立的研究领域。对认同的概念、认同研究中现存的诸多路径进行详尽的讨论，将会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任务。然而，即便是对认同进行较为适度的描述，也需要比本章多得多的版面空间。所以，接下来对话语与认同的介绍也必然是有选择性的。我的目标是呈现出这个研究领域里的理论发展概况，并重点强调理论在近年朝着社会建构论和互动论发生的转向。具体来说，我将会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描述其他不同学科的发展如何影响这个研究领域的新近演变。在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认同的不同类型，并分析互动论范式下对认同建构发挥关键作用的几种话语过程（discursive processes）：可索引性（indexicality）、局部语境化（local occasioning）、定位（positioning）和对话性（dialogism）等。以范畴化（categorization）为起点，我也将讨论话语中微观认同与宏观认同相互影响的问题，并倡导这样一种认识路径：在强调互动论视角的同时，也应看到更加宏观的社会语境对局部互动的影响。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将进行总结。

13.2 认同、自我、互动与话语

从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话语认同研究融合了多种理论。这些理论探究自我、互动在创造个人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角色，以及语言在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同理论趋向的融合也显示出，新近研究在重新界定话语认同这个研究领域时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关于认同和语言之

间的关系，长达 20 年的辩论和反思引发了一个新范式的出现。这个新范式具有社会建构论的特征，倾向于语言实践和互动（关于这一点，参见 De Fina, Schiffrin and Bamberg, 2006）。这种研究视角的转移不仅是因为话语研究领域内部在发展，还源于其他学科的思想和运动潮流所发挥的日渐显著的影响。在这些思想和运动潮流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有：社会理论对后现代自我的反思（Bauman, 2005; Giddens, 1991）、女性主义者对认同的理论建构（Butler, 1990）、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Berger and Luckman, 1967）、象征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Mead, 1934）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Garfinkel, 1967）。我将在下文说明这些理论框架是如何影响话语分析的新近发展的。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着眼于研究视角发生转移的三大领域。正是这些领域的视角转移导致话语分析者改变研究认同的路径。

第一个领域是对自我本质的反思。在传统的理论视角下，自我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自足的实体。通过对传统理论视角的批判，一种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转向已经在这个领域发生。第二个领域包含了对认同建构、展现、协商中人际传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构想。在这个方面发生的焦点转移是：从将认同作为个人表达，到对人类互动作为认同产生的场所这个中心的承认。在第三个领域中，对认同与语言之间关系的理论建构也已经发生转变。具体而言，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联简化为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与语言现象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种倾向在近些年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对认同与语言之间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改变：由对孤立的语言条目（language items）的关注转向对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s）的关注，由对同质性的关注转向对变异性的关注。接下来，让我们对这三大领域进行具体分析。

【265】

13.2.1 认同与自我

尽管社会科学对认同的关注在日益增加，这一领域的论文和书籍的数量也在攀升，但令人惊讶的是，有关认同的定义难以追寻。即便是那些现存的定义，也因术语和焦点的多变、多样而使人眼花缭乱。认同可以被看作或定义为个体的所有物，或者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某种东西。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而且，认同常常被设想为在本质上是个人的，或与个人相关的。因此，研究者对认同进行怎样的概念化，选择何种方法去研究认同的具体语言表现，这些都受到他们的认识视角的影响。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历史上认同总是与自我这个概念相关联。在心理学领域，这种关联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研究认同的理论总是与研究个体和自我的理论相关。在个体发展领域写下重要研究文章的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提供了一个例证。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既隐含了个体内部的持续一致（自我一致），也隐含了个体与他人对某种本质属性的持续共享”（Erikson, 1980: 109）。定义中“本质”和“持续”这样的语言表达揭示出一种范式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美国当代心理学理论中尤为强大，该范式将自我看作是固定在精神里的个体所有物。对有关个体的心理学理论进行综述后，维伟恩·伯尔（Burr, 2002: 4–5）发现，有关个体的现代概念把个体当作是构成他/她个性的一系列固定特征，是笛卡尔笔下由理性协商指引行动的人[1]，或者是完全独立于他/她所属群体的致力于道德完善的某个人。

1 笛卡尔倡导的认识论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即用理性寻求真理。理性又被称为良知，它是正确判断、辨别真假的能力，是使我们成为人、使我们异于禽兽的东西。具体参见《谈谈方法》，笛卡尔著，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译者注

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以及将个体剥离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本质化和抽象化的倾向，已经遭到了像乔治·H. 米德（Mead, 1934）这样的互动论者的强烈反对。米德相信，自我具有社会的本质。但是，对这些概念的批判只是到了最近20年才得到尤为广泛的传播，为一种更加注重细微差别、更具历史敏感性的视角让路。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91）和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2005）等当代社会观察家指出，不确定性、碎片化以及物理和社会的位移，与对流动和不统一性的经验一样，都是后现代生活的特征。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在社会环境中，现代男女都更能感受到持续性和永久性的缺失。因此，自我本质具有统一性、持续性和理性这样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构成自我的一个必要的、典型的条件。

13.2.2 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

在这场关于自我的非本质论运动中，像朱迪思·巴特勒等女性主义思想家也作出了贡献。巴特勒（Butler, 1990）对性别的反思在多个学科的认同研究者中引起共鸣。她认为，性别认同不能根据具有稳定的共同特征的一种核心来界定，而是一种更具弹性的建构。她也强调，认同不是某个人“所有”（has）的东西，而是某个人“所做”（does）的事情，或者是通过人们之间具体的交流、话语和互动而展现和再创造的。因此，对一个男性、女性或任何一个社会范畴的成员进行定义，不仅在语境上是变化的，对持续再定义具有开放性，而且还与人们的行动、行为、情感和思想相关（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见本书第11章拉扎尔和克拉马雷的相关论述）。表现（performance）是认同研究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能够唤起对认同建构和传播的具体的交流内容。认同与表现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形成一种认同就是在具体的社会场合和交流情境中以特定的方式去说话、去行动。

【266】

通过一个案例，让我们去看一下认同是如何被表现的。下面复制的这段对话发生在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之间。这两个人从儿时起就是朋友，但在高中之后各奔东西。他们通过电话和邮件保持日常联系。下面的文本复制了他们见面交流的起始部分。埃德已经离开了华盛顿特区去追求他的学业。亚历克斯还住在华盛顿特区，埃德从外地匆忙返回，并与亚历克斯见面。

（1）

Ed: Alex what's up guy? How you doin' man?
埃德：亚历克斯，怎么样哥们儿，你过得还好吗？
Alex: Chillin' yo chillin' man.
亚历克斯：别着急，哥们儿。
Ed: Long time no see guy.
埃德：好久不见了，哥们儿。
Alex: It's been a minute son I should be sayin'.
亚历克斯：要我来说，就是一分钟而已。
Ed: What's thrashing the DC scene man?
埃德：特区怎样？
Alex: Ahh ufff I mean everything's pretty much the same man, you know man how it is!

亚历克斯： 啊，一切都是老样子，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哥们儿！

这段口语交流是短对话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两个久未见面的人之间，语言被用来破除坚冰，创造一种亲善的关系。另一方面，上述对话的语言细节也揭示出，这两个人在建立认同。通过语言选择，亚历克斯和埃德在表现一种“年轻人”的认同。与此同时，因为“说相同的语言”，他们也凸显了自己与对方的亲密性。他们做出的语言选择发挥着提示功能，暗指出这些认同。亚历克斯和埃德都使用了可以称之为俚语的语言变种。俚语被视为“标准语言使用的一个口语分支”，它也是富有想象力的、生动的（Crystal, 1997: 53）。俚语由单词、词句和发音方式构成，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群体成员身份作出暗示。在这个案例中，那些无声的暗示（silent cues）包括：用单词“chill”来表达“take it easy”（别着急）；用“guy”替代常用的插入语“man”（哥们儿）；使用隐喻性表达如“What's thrashing the DC scene?”，去替代实际的表达“What is going on in DC?”（特区怎样）。其他显著的语言暗示有：在动词 -ing 形式的结尾省略掉“g”的发音（如“doin”、“chillin”和“sayin”），这种特征主要与非正式表达相关；对连系词“are”的省略（如“How you doing man”），这通常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方言表达（一种非标准的语言变种）相关。对俚语的选择说明，在这两个人的说话方式、而不是说话内容中，认同借由语言暗示得到表现。他们在年轻人这一范畴中的成员身份以及他们与对方的亲密性，完全视他们能说同样的语言并理解彼此的情形而定。

【267】

将认同视为“所做”（doing）的事情，而非“所是”（being）的特征，以及自我的去本质化是社会建构论的两个核心方面。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社会建构论路径，在话语研究和诸多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这场运动的基本理念是，社会现实不存在于任何独立的实体中，而是社会建构的。社会建构论的思想家们（参见 Hall, 2000）认为，人们应该将认同看作是一个过程（认同化，identification），而不是一个属性或一系列属性。对过程的关注将思考引向具体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人们将设想他们的成员身份，彼此将对方归属于不同范畴的成员特性，或者抵制这种归属。换句话说，他们将“认同建构”视为一种社会的、“话语的作用”（Zimmerman and Wieder, 1970）。

13.2.3　互动与认同

我们已经看到了，针对自我的笛卡尔式概念进行的批评强调的是认同的社会性本质。在众多的社会过程中，互动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认同的优先场所。因为，互动代表了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通过互动，人们获得其对生活和社会的绝大多数认识，进而与他人分享。象征互动论者有如乔治·H. 米德（Mead, 1934）和赫伯特·布鲁默（Blumer, 1969），社会学家有如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67 and 1981），以及常人方法学者有如哈罗德·加芬克尔（Garfinkel, 1967）都强调，互动也是一个显现出行为规则和道德价值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建立起对社会事务进行平稳控制的基础。

如果互动对认同的展现和协商而言是无处不在且极为关键的；那么，语言也是如此。尽管人们能够通过多种符号传播他们的认同，例如衣着、举止，或使用某些具体的物件，但是，语言仍是认同表达和协商中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语言与认同之间的关

系就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例如威廉·拉博夫（Labov, 1966 and 1972a）关于纽约市中英语使用的经典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他说明了诸如阶层、性别和年龄等范畴是如何决定人们发音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说“forth”（第四）或“floor”（楼层）时吞掉“r”音的习惯是和社会阶层相关的。属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远比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更容易吞掉“r”音。在拉博夫之后，详细分析语言如何随阶层、性别、年龄这些变量发生变化，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精力所在。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社会语言变化的认识。然而，正如库普兰德（Coupland, 2008: 268）所认为的，在这个研究传统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用太过简单的关系去看待语言与认同选择之间的相关性。正因如此，较新近的研究已经采用了一个更加注重细微差别的视角去认识语言行为与认同之间的关联。这些研究提出，对某个特定语言变种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对这个语言群体的认定。人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佯装某些口音、模仿某些语言风格，这些原因可能包括嘲笑或拒绝与这些口音、语言风格相关的认同。另一面，人们可能“跨入”（“cross”）（Rampton, 1995）外群体，用外群体的语言和风格来表达自己与他们的团结。例如，一个美国白人青年为了传达他与学校青年都市文化之间的联系（Bucholtz, 1999），可能会使用非洲裔美国人的言语特征。同时，一个德国青少年群体可能会使用土耳其移民的言语风格，作为内群体的一种娱乐方式（Depperman, 2007）。这些考量将更多的注意力引向社区语言实践和话语研究，而不是孤立的言语要素。 【268】

现在让我们转到对认同类型的一些重要辨析上，然后看看那些能够用于认同话语建构、认同传播的过程。

13.3 认同的类型

我们已经谈论过，认同是多样的、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也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认同的产生可能涉及不同类型的施事者和传播过程。例如，个体认同（individual identities）与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当我们与朋友进入一段对话，或者在一个治疗期内和心理学家谈话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协商出自己作为个体的认同（比如，将自己表达为沮丧的或愉快的人），并且只对我们建构起来的这些形象负责。与此相反，在一个公共会议或一个机构会面中，我们可能说自己是政党或公司之类的群体的成员，并且我们的话语建构至少会部分涉及我们代表的团体的认同。此外，一些认同会有私人的、具体的所指对象（比如，约翰·布朗）；而另一些与国家或宗教团体相关的认同则可能是非常抽象的，并且不指向具体的人（比如，美国人）。除了**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区分外，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私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ies）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ies）之间的差异。**社会认同**是大的归属范畴，如那些附属于种族、性别和政治派别的认同（比如拉丁美洲人、天主教徒，等等）。而**私人认同**这一构念则可能不仅包括一系列成员范畴（membership categories），也包括将一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道德上和身体上的特征（比如勇敢的人或一个懦夫）。最后，**情境认同**（situational identities）可以看作是与特定互动语境相关的角色，如教师 / 学生、或医生 / 患者（关于这一点，参见 Zimmerman, 1998）。

但是，上述所有的认同区分在话语实践中可能会变得十分模糊。例如，私人认同建立在社【269】会认同范畴的基础上，而集体认同可能被私人化（正如这句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我就是国家"）。此外，社会认同也不总是与性别或年龄一类的被界定好的宏观社会范畴相对应，因为新的认同将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在那些附属于国家和宗教团体的认同中，有些能够穿越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变得明确、稳定；而另一些认同（比如与新的网络在线团体相关的认同）则可能更加短暂、更具协商性。不过，上述所有类型的认同在日常传播过程中将会被调整、协商。认同也只有通过调整和协商的过程，对人们来说才是可获得的。在这一节里，我将更多地关注社会认同和日常传播过程。然而，如我所希望呈现的那样，认同的不同类型之间、微观与宏观的认同过程之间相互关联是复杂的。

13.4 认同过程

13.4.1 可索引性

认同以不同的方式被传播着。它们可能被公开地讨论，成为一个焦点，也可能以间接的、象征性的方式被传递。当一个人宣称自己是一个"好母亲"、"一个美国人"，或一个"曼联队粉丝"时，这个人是在公开地拥抱一种认同。一个政治小组的成员可能会将自己描述为"名副其实的保守派"或"和平主义者"，并设定、协商这些范畴的成员标准。但是，正如我们在案例（1）中所看到的那样，认同建构的绝大多数工作是在意义连结过程中间接地完成的。一种语言的发音、词汇、词句和表达风格不断地与素质、观念、情境、社会表征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相连结（关于这一点，参见图恩·梵·迪克在本卷第 18 章的论述）。反过来，素质、观念、情境、社会表征和意识形态系统又与社会群体和范畴相关联。这种关联也可以看作是意义创造过程中的认同分享或认同表现。意义创造的过程建立在被认可的社会意义的基础上，并被持续地调整。这个过程被称为**"可索引性"**（indexicality），它基于这样一个观念：符号（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符号）能"标记"（index）（Silverstein, 1976）或指向社会语境要素。例如，当一个人用"mate"（伙伴）一类的词语去称呼另一个人时，"mate"标识的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的亲密关系。而且，词汇、口音和词句也可能与更大的社会语境的某些方面相关联，因为它们激发出的具体特征、观念、行动和共性可能被看作是具有典型性的特定社会认同。由于持续的重复和累积，这些关联成为社会共享的对群体和范畴的表征。但与此同时，因为意义在持续不断的创造过程中，这些关联也对经常性的论争和重新讨论保持开放。

举例来说，当一种口音类型或者具体词汇和表达的使用与一类特定的人物形象产生关联时，【270】可索引性便发挥作用。例如，在意大利，小舌音"*r*"是与势利的、吝啬的人物形象相关联的。由于政客们经常操纵他们的语言来达到构建特定认同的目的，这些模式化的关联在政治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2008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就是当时的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帕林（Sarah Palin）对语言的利用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新案例。当萨拉·帕林站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自我介绍时，她总是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华盛顿政治的门外汉，一个"普

通的冰球妈妈”，一个朴实而实际的女性，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美国人一样。创造出这种形象的关键就是她的语言。她使用语言的典型特征就是以创造出一种“平易近人的修辞”为目标(Goyette, 2008)，对词汇进行谨慎选择，这种修辞能够提升她的平民形象。在萨拉·帕林和民主党的乔·拜登（Joe Biden）开展第一次副总统竞选辩论之后，《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如下一篇政治评论，对语言和认同之间的关联进行公开讨论。在这场辩论中，共和党的这个提名者极力通过语言和手势来强调她的平民形象。

（2）

好吧，**该死**(darnit all)，如果那个**倒霉的女孩**(dadgum girl)(眨眼，眨眼)没有打破乔·拜登的诅咒；那么，不符合政治常规的萨拉·帕林也**一定会**（fersure）超过预期，并在太阳底下说出一切。帕林是一个平民主义专家，她击中了能与非精英美国人产生共鸣的所有东西：家庭（**嗨，爸爸妈妈**），“我可以叫你乔吗？”，个体责任，华尔街的贪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和美国人直接对话，并且告诉乔那就是她**将做**（gonna）的事情，**不是么**（doggnit）？（Parker, 2008：楷体部分为本章作者强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评论的作者把萨拉·帕林描述为一个平民主义者，一个想要吸引“非精英美国人”的人。作者关注的是，萨拉·帕林的语言如何索引标记出与那些群体相关联的特征和素质：家庭价值、个体责任，以及与财富和权力阶层的对抗。这种与非精英美国人认同的关联在交流中呈现出来：通过非正式表达的使用，如“darnit all”（darn it all）或“doggonit”；以及对非正式语言的选择，如用名字来称呼竞争对手（‘Can I call ya Joe?’），这索引出纯朴和实际的品质。这篇评论的作者还在写作中模仿帕林对某些单词的发音（用“fersure”替代“for sure”，用“ya”替代“you”），来传递一个理念：这样的发音能够将她的认同引向日常可见的普通美国人。这个例子说明了作为一个过程的可索引性对认同建构、认同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对建立一个共享假设、共享知识的网络的重要性。索引标记的过程正是建立在这些共享假设、共享知识的基础上。事实上，如果萨拉·帕林使用的词汇和表达不与大众语言相关联，那么她的语言也就无法传递出一个朴实的人物形象。

13.4.2 局部语境化

一些研究者将认同看作是产生于具体社会语境和实践中的一个传播过程。在理解认同如何被建构和协商时，他们也低估了对局部谈话（local talk）的细节进行细致观察的重要性。安塔基和威德库姆从会话分析中引入**局部语境化**（local occasioning）原则，作为理解这些具体语境细节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种认同’，那么这个人必定可以归入一个具有相关特性或特征的范畴中”(Antaki & Widdicombe, 1998: 3)。同时，这种归类是可以被索引的，也是可以被局部语境化的。“局部语境”这一概念抓住了这样一个理念：人们呈现自己的认同、区分他人认同的方式，不仅取决于话语产生的语境，而且会形塑语境，从而使认同与后续的谈话具有相关性，或具有因果关系。因此，说传播语境决定了特定类型的认同的相关性，这样的观点是不太能引发争议的。社会角色以及与社会角色相关的认同也许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实践

【271】

相关，而与其他的东西无关。所以，在我所任教的大学的某个会议上进行自我介绍时，我极有可能选择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意大利语系的成员。而在我孩子的学校家长会上进行自我介绍时，我发现说自己是“西尔维奥的妈妈”就足够了。

但是，“局部语境化”的观念不但认识到认同、语境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通过指出以下事实进一步触探到认同的动态本质：一方面，认同和角色取决于语境；另一方面，范畴的准确意义也是可以被索引标识的，并根据情境和参与者而发生变化。因此，同样一种社会认同范畴能够用来分辨某些人，但是这一范畴也会因语境的不同方面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可索引性和局部语境化是两种过程，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认同是如何通过语境中的语言行为来建构和传播的，人们又是如何理解认同、协商认同的。

13.4.3 关系过程：定位和对话性

我们已经讨论过，认同是一个扎根于社会的过程，涉及自我与他人的持续性遭遇。将认同看作是一个基本的关系和对话过程的认识视角，也反映了对“我是谁”、“他人是谁”的界定的社会本质。个体和集体通过占据社会和言语空间，在其中划定自己与他人的对立或互补关系，从而表达和协商他们自己的认同。“我们是谁”通常是以“我们不是谁”或“我们和谁相似”的形式来定义的。这种对立和相容往往是认同建构的典型特征，甚至在独白式的谈话（monological talk）中。例如，对政治话语的研究汇聚至一点，共同指出“我们”与“他们”的对比建构是政治认同表达的一个中心机制（在其他讨论中参见 Wilson, 1990; De Fina, 1995; Van Dijk, 2010）。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下，这种对立在认同的话语建构中被不断创造，因为区分是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的一个基本过程。

“**定位**”（positioning）这一概念很好地捕捉到认同作用中的动态机制（dynamism）和关系属性（relationality）。此前已经有一些社会理论家用“定位”来描述话语限制认同的过程（Fairclough, 【272】 1992）。但是，这一构念最近被戴维斯和哈里用更具动态性的术语重新框定了。他们将“定位”界定为“自我多样性的话语生产”（Davies & Harré, 1990: 47），把它看作是“角色”这个静态概念的对立物。戴维斯和哈里的概念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人们涉及的社会语境和话语实践是多样的，与此相关的认同也是多重的；但同时，认同也是关系性的，因为人们在持续不断地定位自身、被他人定位或定位他人。

在大部分有关认同的叙事研究中，“定位”概念已经得到了运用（诸多文献中，请参见 Bamberg, 1997; Bamberg and Georgakopoulou, 2008; Moita Lopes, 2006）。这些研究运用“定位”概念来分析话语者如何瞬时变换不同的认同：作为叙述者、作为故事世界里的人物以及作为与他人正在实时交流的一个人。然而，这个概念的意义又不局限于叙事这一种话语模式中，因为任何一种话语都涉及对自我和他人的社会位置、道德位置进行动态定位。定位过程明显存在于辩论和冲突性对话中，但它在更加平和的、日常的和非冲突性的活动中也能发挥作用。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从我的一项人类学研究所搜集到的数据中抽取的。该项研究关注华盛顿地区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纸牌俱乐部，探究它的成员是如何进行认同建构的（参见 De Fina, 2007a and b）。下面这个讨论的片段始于两个朋友的会面和问候。当时，我是在场的。

（3）

1. 乔： 路易斯！
2. 路易斯： 我今晚来迟了。
3. 乔： 你还好吗？
4. 路易斯： 还行，你呢？
5. 乔： 你长胖了。
6. 路易斯： （（对研究者说））看看他现在身材多棒，他看上去就像是
7. 刚刚从山坡下来的一个滑雪的人。
8. 乔： 没有，我不滑雪。
9. 路易斯： 你再也不滑雪了？
10. 乔： 在我的人生里，我就没去过滑雪坡。
11. 路易斯： @@@
12. 乔： 你知道的（（……））我自己的人生。
13. 路易斯： 是啊。
14. 乔： 我们没去过，我们一直都没有汽车。

在这段对话文稿的开始部分，乔和路易斯用一种友好的方式问候对方。接着，乔说出了路易斯长胖了的事实（第 5 行），而路易斯回应说乔看上去身材很棒，并把乔称为“一个滑雪的人”（第 7 行）。这是一个刚刚形成的认同类型。乔在暗示路易斯[1]通过滑雪来保持身材。由此，乔将路易斯[2]定位在特权阶层里，因为滑雪是一种昂贵的运动，也是一项通常与有钱人联系在一起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乔立即作出“我没有滑过雪”（第 8 行）之类的回答，拒绝被纳入在滑雪者这个范畴。路易斯的反应是要努力对乔进行重新定位，问乔是不是“再也”（第 9 行）不滑雪了，暗示出乔以前经常滑雪，从而将他再次定位到“滑雪的人”这个范畴里。我们看到，乔再次否认他曾经有过滑雪的爱好（第 10 行），然后强调他家连一辆汽车都没有（第 14 行）。通过最后一行话，乔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不富裕（也不吝啬）的人。

【273】

这个例子呈现的是，认同如何在人们日常的协商中被确定、被拒绝，以及被假定。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认同都能够这么容易协商，因为所有的社会作用者都处于权力关系之中，其中一部分人被准许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部分人的基本表达权利却被否认。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和群体都可能被定位在他们难以拒绝的社会角色上。例如，在媒体报道中，媒体对个体的描述将担负起他们自己的生命，受其影响的人在今后都难以改变这种描述。对于社会上最为弱势的成员而言，这种改变更是难上加难（参见 Briggs, 2007）。所以，“定位”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建构的概念，如此才能抓住认同确定过程中那些变化的和稳定的特征。

在认同的对话本质中，认同的关系属性也是清晰可辨的。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活动中，通过与他人开展具体的或虚拟的互动来表达他们的认同；但另一方面，话语也可以被看作是复调的，它包含了表达不同认同的多重声音。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的“话语立场”（footing）概念中捕捉到了这种声音的多重性，这一概念就是“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在场呈现是因我们管

1 原文如此。根据上段对话文稿，应为“路易斯在暗示乔”。——译者注

2 原文如此。根据上段对话文稿，应为“路易斯将乔”。——译者注

理言语的生产或接收的表达方式而作出的调整”（Goffman, 1981: 128）。戈夫曼提出将“说者”概念解构成：

◎**发声者**（the animator）：从物理的角度上看，张口说话的那个人。
◎**创作者**（the author）：对表达出特定话语负有责任的那个人，最先说出这些话的人。
◎**责任主体**（the principal）：通过这些说出的话建立起自己地位的那个人（Goffman, 1981: 144），例如，说出特定话语内容并对其负有责任的那个人。

要理解说者如何通过对他们所说的话在原创和责任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假定，而在他们的话语中生产出不同的认同，发声者[1]、创作者、责任主体[2]这些概念是有帮助的。通常情况下，即便言说者通常既是话语的创作者和发声者，说话的环境或意图也会彰显认同的差异。例如，人们心照不宣而接受的一点是，说者通常只承担话语的发声者角色，有时也会承担起创作者角色，从而使他们的认同与他们所表现的那些人、那些群体的认同区分开来。但是，说者可能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运用这些区分，于是他们可能抹掉自己的认同而成为某个群体的责任主体（参见 De Fina, 1995）。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选择去嘲讽其他人的话语，从而使其原创性和责任性与原有的话语内容相偏离。

此前，社会语言学家们（参见 Eckert and Rickford, 2001; Auer, 2007）低估了**风格**（style）和**风格化**（stylization）在认同建构过程中扮演的基础性角色。就某种程度而言，风格和风格化为话语中的自我表达和意见表达提供了策略。正如我们在分析萨拉·帕林的语言选择时所看到的那样，说话方式、社会范畴和社会语境之间持续不断地连结，创造出语体。通过运用这样的连结，人们在话语中可能会表达不同的意见，也因此表达不同的认同。风格可能被当作一个亲近或分离的策略来使用；与此不同，风格化则更多地传递出某个人意见的相异性。库普兰德写道：

【274】

> 当说者故意变得“虚伪”或“佯装一种声音”，单个的言论就被风格化了。被风格化的言论具有一种表演的特性，并且能够索引标记出说者的某种认同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她向互动的其他参与者表明，现在所承担的认同并不是他/她所处语境中应有的那一个。（Coupland, 2001: 346）

我们再一次回到案例（2），风格化的言论传递出创作者与她所描述的这个角色之间的差距。说者要建构“我们是谁”、“他者是谁”，而定位、话语立场、风格和风格化都是承载这些建构的重要机制。它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话性和关系属性是认同建构过程的中心。

13.4.4 范畴化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另一个话语过程：**范畴化**（categorization），它对认同的建构和传播也至关重要。话语中的认同范畴不仅反映出这一语境下能够使用的认同目录，更反映出特定社

---

1 在戈夫曼的论述中，发声者就是一台谈话机器（talking machine），它是传播系统里物理层面上那个说话的人，不指涉社会角色、社会等级层面的意义。发声者与接收者处于一个层级上，前者制造言语，后者接收言语。——译者注

2 在戈夫曼的论述中，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物理层面、文本层面和法律层面。责任主体在话语中经常使用“we”（我们），而不是“I”（我），以作为某个群体、某种认同的代言人。——译者注

会和历史时期里被普遍使用的认同类型。以美国为例，种族被划分为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等等。种族分类是标示人们之间差异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种族类型的建构也不断地出现在话语中。对范畴化进行研究可以让研究者进一步探索以下问题：用于认同过程的一般性标签，界定范畴成员的标准，以及与此相关的属性、行动和情境。正因如此，有关范畴化的研究成为了认同研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领域。此外，我要在这里讨论范畴化还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De Fina, 2006）。那就是，范畴化过程对理解互动中表达出的局部认同如何反映、建构更广阔的社会过程是极为重要的。社会过程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s）、信仰与意识形态，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对认识、分析认同的不同途径的辩论将研究者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这场辩论的中心要旨是话语中部分认同（local identities）与整体认同（global identities）之间的关系。辩论的一个问题围绕接受或拒绝社会范畴和范畴化过程的认知成分而展开。像梵·迪克（van Djik, 1998; 2010）这样的批判话语分析学家认为，社会认同不仅是社会结构，也是认知结构，相当确定和稳定，并在某种程度上预设和先于其在社会互动中的确立。这样的认知结构是包含了社会认同、社会知识、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的心理模式。在这个视角下，当人们声言自己的认同时，他们会实例化，并不断地调整他们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处于视角谱系另一端的是会话分析学家们，尤其是成员范畴化分析（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简称为 MCA）运动的倡导者们（参见 Hester and Eglin, 1997; Antaki and Widdicombe, 1998）。安塔基和威德库姆的研究围绕着由萨克斯（Sacks, 1972; 1995）首次提出的“范畴化”概念来分析潜在的假定，互动参与者们根据这些假定来创造和运用“成员范畴”（membership categories），并常规性地将特定活动与成员范畴联系起来。成员范畴分析的倡导者们历来强烈反对用“认知”来解释范畴化的运行机制（Edwards, 1998: 18），他们呼吁分析者在分析认同的话语建构时，能够坚持去讨论局部语境（local context）和互动参与者的局部倾向（local orientation）。

【275】

在我看来，范畴化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一个浮现式的话语过程。首先，它是建立在互动参与者共享的知识、信仰、意识形态、预设、角色等基础上。如果说所有这些围绕认同主张并使之语境化的知识和过程，只有通过对互动策略的细致分析才能捕捉到，那么，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和历史在设定话语语境时所具有的极度复杂性。此外，以下观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社会认同的范畴与情境、角色、特性和意识形态等容易被模式化的东西相关联；另一方面，这些关联又成为群体共享知识、共享表征的一个部分，反过来又汇入更广阔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之中。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说认同只是产生于对话中，且无法在对话之外获得独立的生命。无论如何，话语分析者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如下两种视角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一种视角把认同看作是对先在的社会范畴、心理范畴的简单反映；另一种视角把认同看作是局部语境化的创造性生产。在话语认同研究中，对浮现和互动的关注所强调的是对语言行为和社会实践进行细致分析的重要性。与此相反，另一种分析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分析者在其中“寻找”能够证明他们假设的东西。因此，探究人们用何种范畴来建构认同、处于什么样的语境中、范畴与语境之间是如何协商的、它们对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等问题，诸多互动论者（比如，把互动当作研究社会语言现象的一个重要场所的学者）赋予其相当的重要性。与此相比，他们对认同的认知基础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认知基础的本质很不清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范畴化在叙事中如何被用来索引、讨论认同。在诸多研究者（例如 Schiffrin, 1996; De Fina, 2003; Georgakopoulou, 2007）看来，叙事是一个表达认同的重要场所。因为，一方面，叙事为讲述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讲述者能够将自己表达为社会世界里的角色；与此同时，讲述者也能够与其他互动参与者协商他们当下的自我身份。案例展示的这段叙述来自于一个社会语言学访谈，叙事者阿尔伯托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在叙述中，阿尔伯托既诠释了他在工作中遭遇过的危险经历，也含蓄地表达出他对种族认同（racial identities）的看法。按照拉博夫（Labov, 1972b）的分类，言语在叙述中的作用分为定位（orientation）、复杂化行动（complicating action）和评价（evaluation）等。在定位阶段，叙事者提供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复杂化行动代表叙事的主体事件，而评价则传递出叙事者显在的（通过公开的评论）或潜在的（借助某个人物的口吻）视点。

【276】这段叙事的搜集来自一项移民话语和认同研究（参见 De Fina, 2003）。当研究者问阿尔伯托是否经历过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任何差异时，阿尔伯托开始了这段叙述。他回答说，在他从前居住的村庄里，人们可以在夜间出行而不受到干扰；然而，夜间出行在美国则是危险的。在叙事文稿的起始处，研究者提示阿尔伯托回答他是否有过危险经历（第 1 行）。这次访谈的参与者包括阿尔伯托（化名，简称为 A）、研究者（简称为 R）和另一个墨西哥移民伊斯梅尔（简称为 I）。

（4）

1 R: A usted le ha pasado algo aquí?
Did anything happen to you here?
你在这里遭遇过任何危险吗？

2 A: Nada más una vez (.)
Only once (.)
有一次（.）

3 nos asaltaron trabajando en un apartamento,
they attacked us while working in an apartment,
在一个公寓施工的时候，他们攻击了我们，

4 R: Uhu.
Uhu.
嗯。

5 A: Remodelando un apartmento, entraron y nos asaltaron ahí mismo,
While remodelling an apartment they came in and attacked us there,
当时，我们在改建一个公寓，他们进来，就在那里攻击了我们，

6 a mí y a un patrón,
me and an employer,
我，另一个是雇主，

7 mhm,
uh,
嗯，

【277】

8 y con pistola y se imagina qué hacíamos,
and with a pistol and can you imagine what could we do,
他们拿着一把枪，你能想象我们还能做什么，

9 a mí me quitaron veinte dólares que traía nada más,
they took from me twenty dollars that I had nothing else,
他们从我这里拿走我仅有的 20 美元，

10 a mi patron su reloj y su dinero,
from my employer his watch and his money,
从我的雇主那里拿走了他的手表和钱，

11 y toda la herramienta se la llevaron,
and all the tools they took,
还有所有的工具，

12 y y fueron morenos verdad? morenos,
and and they were dark skinned you see? Dark skinned,
而且，他们是黑肤色的人，你知道吗？黑肤色的人。

13 y todavía cuando fuimos a poner la demanda,
and on top of it when we went to notify the police,
然后，我们去报警的时候

14 nos dice el policía, 'Y cuántos hispanos eran?'
the policeman says to us, 'How many Hispanics were they?'
警官问我们，"他们有多少个西班牙人？"

15 R: @@[@@@@
@@[@@@@
@@【@@@@

16 I: [@@@
[@@@
【@@@

17 A: A ver.
Let's see.
让我想想。

18 R: Directamente.
Directly.
直截了当地。

19 A: Uhu.
Uhu.
嗯哼。

20 y, y, y se enojó porque, el policía era moreno,
and, and, and the policeman got mad because he was dark skinned,
而且，警官恼怒了，因为他也是黑肤色的人，

21 le digo 'No, eran puros morenos,
I tell him, 'No they were all dark skinned,
我告诉他，“不，他们都是黑肤色的人，

22 puros negros,'
only blacks,'
就是黑人。”

23 verdad? (.)
right? (.)
对吧？（.）

24 ahora por ejemplo aquí ya no se puede salir ya ni en paz-
now for example here one cannot go out in peace any more-
现在，比如说在这里，人们出行再也不是安全的 –

25 ya no se vive en paz aquí,
one does not live in peace any more,
人们再也不可能生活在和平里，

26 por tant droga que hay,
because of so much drug that there is
因为有那么多的毒品，以及

27 tanta, tanta drogadicción, tanta cosa.
so much drug addiction, so many things
那么多的吸毒成瘾，多种多样的事情。

为了回答第 1 行中的问题，阿尔伯托描述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一次遇袭。那时，他为一家施工公司工作，在改建一个公寓。我们注意在故事的开始部分，阿尔伯托并没有对那些攻击者进行描述。他没有用确切的指称，而是用“他们”（第 3 行和第 9 行）。阿尔伯托的第一次评价（第 8 行）强调的是他和他的雇主在面对抢劫者时的无力，因为后者有武装。然后，他继续描述那些被抢走的东西：他的 20 美元，他雇主的手表和一些钱，加上所有的工具。直到第 11 行，阿尔伯托并没有对事件进行太多的评价，也没有对抢劫者的身份进行确认。但是在第 12 行，几乎每增加一个细节描述，阿尔伯托[1]就会提供一种延伸的定位，并把这些抢劫者具体化为“黑肤色的人”。在访谈中，墨西哥人使用了“黑肤色的人”这一类型，把它看作是一个比“黑人”更具“政治正确性”的标签。有意思的是，这种定位具有评价的功能，它的标识就是 12 行行末那个重复的限定符[2]。接着，阿尔伯托复述了他们在报案时遇到的那个警官的问话：那里有多少个西班牙人（第 14 行）？由此，阿尔伯托也开始用种族术语描述攻击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意义。

尽管这段叙述没有明确地说出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阿尔伯托在含蓄地表达警官对西班牙人的偏见。从研究者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尔伯托的含蓄表达得到了理解。研究者首先发出笑声，并评论说“直截了当”（第 18 行），由此表明她对警官公开表达出自己对西班牙

1 原文是 Antonio 安东尼奥，应为拼写错误。——译者注
2 即黑肤色的人。——译者注

人的偏见而感到惊讶。在“直截了当”这个评价之前，研究者和伊斯梅尔的笑声（第 15 至 16 行）也表明他们觉察到阿尔伯托的这种诠释，并且和阿尔伯托一起含蓄地抵制警官的这种偏见。从这一点来看，阿尔伯托已经标示出，而且他的对话者也已经接受了，将攻击者认定为黑人所具有的意义。同时，通过外显的（他把那些攻击者称为黑人）和内在的评价，他也标示出黑人 / 西班牙人的对立所具有的意义，因为人物自身能够表达出他们自己对作为一个黑人或西班牙人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事件的理解。例如，在阿尔伯托的叙述中，警察预先假定抢劫行为是西班牙人做出来的（第 20 行），但阿尔伯托则表现出对这种诠释的抵制（第 21 至 22 行）。故事世界里黑人或西班牙人与抢劫行为之间的关系，也由如下事实得以突出：警察恼怒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黑人（注意第 20 行使用的连接词“因为”：“警官恼怒了，因为他是黑肤色的人”）。通过对评价的如上运用，阿尔伯托将警官描述为一个带有偏见的人。【278】

其他的故事叙述策略不仅让阿尔伯托表达出他对特定事件和人物的态度，也表达出他对更为一般化的种族关系的认识。叙事者在多个不同的地方（第 12，21，22 行）通过重复来强调攻击者的种族属性，从而强调警察的诠释与实际事实相背离。此外，这种重复还有一个效果：突出民族属性作为一个建构因素的重要性，去阐释故事中一些更为深远的意义。其实，在故事结束之后的几行评价里（第 24—27 行），阿尔伯托谈及在他居住的地方过上平静的生活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此，在叙事者作为抢劫受害者的经验基础上，这个故事得到再一次的展现，用来说明叙事者所在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由于叙事者在案例中强调了抢劫者的民族属性，这个故事的话语属性就发生了变化：它不仅是一次抢劫，而且是一次由黑人实施的抢劫。这些信息创造出一个相关性空间，其中不仅涉及故事世界里的这次抢劫行动，更涉及对这个故事的更为一般性的评价，因为这个故事关注的是那些有犯罪行为的黑人，社区里的吸毒、暴力等行为也很容易归结为是他们做的。

在这段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伯托是如何运用范畴化来谈论认同的。这段叙事围绕着西班牙人与黑人之间（隐含）的对立关系展开。在叙述的故事世界里，西班牙人被呈现为攻击行为和偏见的受害者；与此相反，黑人被描述为攻击行为和偏见的实施者，并且对社区里泛滥的毒品和暴力行为负有潜在的责任。这些范畴化与有关黑人犯罪的主流话语形成了互文性呼应，也回应了有关西班牙人的类似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通过警察这一人物在故事中得到表达。尽管这种观念没有在辩论式的故事中公开地表达；但是，叙事能够起到案例示范作用，因为抢劫行为被归结为是由某些人物实施的，这里的人物不是指个体，而是某个群体的成员。此外，在叙事中，种族范畴与故事行为之间关系的意义并没有在话语中得到明确的表达，相反，这种关系的意义完全是通过认同与故事世界里的行为之间的关联才得以建立的。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这段叙事，故事讲述和认同要求涉及多重语境。在其中的一个层次上，成员范畴是在本地语境下建立相关性并得以协商的。例如，在这个案例中，参与者通过轮番说话和他们相互对说的方式索引出他们作为访谈者和受访者的角色。在另一个层次上，种族范畴在特定话语中的运用又不能脱离广阔世界里的意识形态、信仰和群体关系，恰如它们在社会实践和话语实践中整个得以塑造和再塑造。在上述案例中，“黑人”、“西班牙人”等种族范畴以特定的方式在历史和社会中建构起来，其使用在不计其数的社会实践中被强化。从美国不同人口之间的统计对比，到公文中的类型划分，再到新闻出版的信息呈现，社会各方力量的协奏【279】

作用让这些社会范畴被强加为真实存在。范畴与品质和行动之间的刻板模式化关联也被不断地再生产。

这并不意味着叙事事件中的故事讲述者和参与者无法协商出成为一种社会范畴的新意义，或对有关成为一种社会范畴的意义的预设提出挑战。相反，细致地分析人们诉诸社会认同范畴时的意义以及人们如何使用社会认同范畴，是话语分析的一项中心任务。但它也意味着，不同于成员范畴分析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参见 Edwards, 1998），话语分析者不能用一种狭隘的视角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互动，而不考虑具体的社会语境里那些被重复讲述的东西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

13.5 结　论

这一章里，我概括了重在话语的认同研究在近些年的发展状况。我描述了多种多样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促使形成了一种社会建构论的范式以及一种研究认同的新路径。这种路径提倡研究者关注社会实践、互动，并对互动参与者的定位进行分析。我关注认同的建构过程，进而让读者对认同作为话语实践的产物有一个深刻的理解。这些话语实践包括：可索引性、局部语境、定位、对话性和范畴化。通过对范畴化的讨论，我还提出要将认同放置在多重语境下来理解，包括局部语境和整体语境，而且研究者需要在两种倾向之间寻求折中：一种倾向是完全地依赖局部互动的细节；另一种倾向是运用业已形成的范畴来分析被话语建构的认同。

附　录

录音文稿抄写惯例

（（笑））	非语言行为
（……）	听不见
（.）	明显的停顿
.	明显停顿之前的降调（例如在陈述句的结尾处）
?	明显停顿之前的升调（例如在疑问句的结尾处）
,	声调持续：可能是声调范围内的一点点上升或下降（声调变化的量比“.”或“？”更少）；可能不在停顿之前（比“.”或“？”更短）
-	自己中断讲话
=	由说话者自己或其他说话者终止对话
::	元音或辅音的拉长
【	话语之间的重叠部分
→（行）	强调关键现象
@	笑声（@ 的数量粗略地标示出笑声的持续时间）

延伸阅读和在线阅读

对重在会话分析、常人方法论的话语和认同的介绍，参阅 Benwell, B. & Stokoe, 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理论视角方面可参阅 Bucholtz, M. and Hall, K.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4-5): 585-614. 文献可在如下网站地址获取：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这些作者提出一项一般性建议，即在一种社会互动的框架下研究认同。

关于认同和社会性别，参阅 Bucholtz, M., Liang, A.C. and Sutton, L. (eds) (1999) *Reiventing identities: The gendered self in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认同和风格的不同视角，读者有必要参阅这本论文集 Auer, P. (ed.) (2007) *Styl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如果要了解批判的话语路径，参阅 van Dijk（2010）对政治认同的研究，以及 De Cillia 等人对民族认同的研究，见 De Cillia, R., Reisigl, M. & Wodak, R. (199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ies', *Discourse & Society*, 10(2): 149-173。在线获取地址：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有关认同与话语的早期研究，一个重要的文献是 Lepage, R. and Tabouret-Keller, A.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关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对认同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参阅 Du Gay, P., Evans, J. & Redman, P. (2000). *Identity: A reader*. London: Sage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参考文献

Antaki, C. and Widdicombe, S. (eds) (1998) *Identities in Talk*. London: Sage.

Auer, P. (ed.) (2007) *Styl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Bamberg, M. (1997) 'Positioning between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Narrative and Life History*, 7: 335-42.

Bamberg, M. and Georgakopoulou, A. (2008) 'Small stories as a new perspective in narrative and identity analysis'. In A. De Fina and A. Georgakopoulou (eds), 'Narrative analysis in the shift from text to practices'. Special Issue, *Text & Talk*, 28 (3): 377-96.

Bamberg, M., De Fina, A. and Schiffrin, D. (eds) (2007) *Selves and Identities in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Amsterdan: John Benjamins.

Bauman, Z. (2005)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Benwell, B. and Stokoe, E.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P. and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Briggs, C. (2007) 'Mediating infanticide: theorizing relations between narrative and viol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22 (3): 315-56.

Bucholtz, M. (1999) '"You da man": narrating the racial other in the production of white masculinity'.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3 (4): 443-60.

Bucholtz, M. and Hall, K.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4-5): 585-614.

Bucholtz, M., Liang, A.C. and Sutton, L. (eds) (1999) *Reiventing Identities: The Gendered Self in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rr, V. (2002) *The Person in Social Psychology*. Hove,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Coupland, N. (2001) 'Dialect stylization in radio talk'. *Language in Society*, 30 (3): 345-75.

Coupland, N. (2008) 'The delicat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in face-to-face accommodation: a response to Trudgill'. *Language in Society*, 37 (2): 267-70.

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B. and Harré, R. (1990)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selve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0: 43-63.

De Fina, A. (1995) 'Pronominal choice, identity, and solidar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ext*, 15 (3): 379-410.

De Fina, A. (2003) *Identity in Narrative: A Study of Immigrant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e Fina, A. (2006) 'Group identity, narrative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In A. De Fina, D. Schiffrin and M. Bamberg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pp. 351-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 Fina, A. (2007a) 'Style and sty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in a card-playing club'. In P. Auer (ed.), *Styl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pp. 57-8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e Fina, A. (2007b) 'Code switching and ethnicity in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Language in Society*, 36(3): 371-92.

De Fina, A., Schiffrin, D. and Bamberg, M. (eds) (2006)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pperman, A. (2007) 'Playing with the voice of the other: Stylized *Kanaksprach* in conversations among German adolescents'. In P. Auer (ed.), *Style and Social Identit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pp. 325-6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u Gay, P., Evans, J. and Redman, P. (2002) *Identity: A Reader*. London: Sage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Eckert, P. and Rickford, J.R. (eds) (2001) *Style and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D. (1998) 'The relevant thing about her: social identity categories in use'. In C. Antaki and S. Widdicombe (eds), *Identities in Talk*. London: Sage. 15-33.

Erikson, E. (1980)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London: Norton.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eorgakopoulou, A. (2007) *Small Stories, Interaction, and Identit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al Ritual: Essays on Face to 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Anchor.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oyette, B. (2008) 'Comment: On Sarah Palin's use of language'. *The McGill Daily*, 30 October, retrieved 3 Nov 2008, from http://www.mcgilldaily.com/article/5536-comment-on-sarah-palin-s-use.

Hall, S. (2000) 'Who needs identity?' In P. Du Gay, G. Evans and P. Redman (eds), *Identity: A Reader* (pp. 15-30). London: Sage and the Open University.

Hester, S. and Eglin, P. (1997) *Culture in Action: Studies in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Labov, W. (1966)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abov, W. (1972a)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bov, W. (1972b)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erience in narrative syntax'. In W. Labov (ed.),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pp. 354-96).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ePage, R. and Tabouret-Keller, A.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Ethni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d, George,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ited by C.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ita Lopes, L. (2006) ' On being white, heterosexual and

male in a Brazilian school: multiple positionings in oral narrative'. In A. De Fina, M. Bamberg and D. Schiffrin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pp. 288-3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S. (2007) 'The micropolitics of personal national and ethnicity identity'. *Discourse and Society*, 18 (5):653-74.

Parker, K. (2008) 'Views from *Post* pundits'. *The Washington Post*, 4 October, A17.

Rampton, B. (1995) *Crossing: Language and Ethnicity among Adolescents*. London: Longman.

Sacks, H. (1972) 'On the analyzability of stories by children'. In J. Gumperz and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pp. 325-45).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Sacks, H. (1995)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edited by G. Jefferson). London: Blackwell.

Schiffrin, D. (1996) 'Narrative as self-portrait: socio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Language in Society*, 25 (2): 167-203.

Silverstein, M. (1976) 'Shifter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nd cultural description'. In K.A. Basso and H.A. Selby (eds), *Meaning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van Dijk, T.A.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Sage.

van Dijk, T.A. (2010)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In C. Ilie (ed.), *European Parliaments under Scrutiny: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Interaction Practices* (pp. 29-5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ilson, J. (1990)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Wodak, R., de Cillia, R., Reisigl, M. and Liebhart, K. (199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nburgh: EUP.

Zimmerman, D. H. (1998)'Identity, context and interaction'.In C. Antaki and S. Widdicombe (eds), *Identities in Talk* (pp.87-106). London: Sage.

Zimmerman, D.H. and Wieder, D.L. (1970)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 comment on Denzin' In J.D. Douglas (ed.),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pp. 285-98). Chicago: Aldine.

【283】

组织话语 14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 丹尼斯·K. 马姆比　珍妮弗·米斯

对组织话语（organizational discourse）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理解和探索组织形成方式中最世俗的领域——员工会话、会议、文档、日常仪式，等等——其实是组织的“本质”。尽管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它们想成庞大、威武、稳定的结构，独立存在于工作在“里面”的人们，然而从话语视角进行的研究表明，组织结构出人意料地不稳定，这种结构仅仅通过成员们的日常话语实践而存在。这种过程导向的视角表明，话语**构成**组织化（Deetz, 2003; Pacanowsky and O'Donnell - Trujillo, 1982; Putnam, 1983）；因此不可能将成员的日常话语实践与组织本身区分开来。这一路径是“以意义为中心的”，即在于其努力探索成员合力建构社会现实和制度结构的复杂方式中。以意义为中心的研究目标是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访谈、民族志等），“从当地人的视角”（Geertz, 1983）来考察组织，这些方法可以提供对潜在于创造组织现实之下的假设的见解。

组织作为“话语建构”的这一观点（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被北美、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的组织学者热烈采纳。这种学术的扩散伴随着会议、期刊的特刊、对定义和术语和概念的适用范围的争论，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组织话语手册》（*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的出版，它将大量的研究带入了这一跨领域的学科（Grant, Hardy, Oswick, Phillips, and Putnam, 2004）。

【284】

然而，这种研究的爆发实际上是以若干不同议题和视角为特点的。首先，学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对“话语”和“组织”间的关系进行架构。其次，组织话语的研究有多重理论视角路径，其中包括批判性的、后现代的以及女性主义的。在后面的部分中我们简要陈述“话语 - 组织”间的关系。接着我们探讨在过去 20 年中有所发展的几个组织话语的理论路径。

14.1　架构话语 - 组织关系

在最近几年里，受到组织话语学者关心的议题之一是如何用适当的方法对话语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化（Alvesson and Karreman, 2000a, 2000b; Chia, 2000; 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 Keenoy, Marchak Oswick and Grant, 2000; Reed, 2000）。尽管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学术争论，但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组织实践和过程建构人们生活的方法。

在吸收借用艾尔维森和卡里曼研究（Alvesson and Karreman, 2000a, 2000b）的基础上，费尔赫斯特和普特南（Fairhurst and Putnam, 2004）认为，组织学者在其研究中使用“话语”这一概念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在“宏观”层面，“话语”（英文中“Discourse”的“D”大写）的功能是为广阔的社会语境设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发生日常组织化过程。例如，一个组织可能通过多种多样的话语来执行，借此，组织行为和决策制定要以增加组织中代表人数不足的团体出席为前提。当然，这种话语可能会与其他框定组织行为的话语产生冲突，例如效率、利益率、对利益各方问责等，每一个都可能影响组织成员理解作为组织话语的“多样性”的方式。在微观层面，组织话语（英文中的“discourse”的“d”小写）指的是在日常层面上一个组织的成员如何互动、开会、创造文件、闲聊、讲故事讲笑话等的方式。这个层面的话语构成了组织的“本质”——那些赋予组织实质的日常的、意义制造活动。

而对许多研究者而言，研究组织话语需要对话语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的考察。对组织的理解涉及探索话语如何制定框架并为日常组织行为和意义建构提供语境和资源；同时，研究者可以观察日常组织话语（小写的 discourse）何以能够同时确认和抵制宏观层面上制度化的组织话语。在这一层面，两种话语（大写“D”和小写“d”）的功能是交互、辩证的。在本章后面我们会用一些合适的例子来佐证这种关系。

除了宏观和微观层面话语之间的区别，费尔赫斯特和普特南认为，可以根据话语－组织关系将话语研究划分成三类不同的取向：①客体取向；②形成过程取向；以及③基于行动的取向。在客体取向中，组织被设想为是客体的、稳定的结构，是相对独立的、优先于组织的存在。在这种视角下，组织结构是具体的，与成员行动相对分离。形成过程取向将这一关系反转，认为话语恰好为组织创造了可能性，而组织本身就是成员谈话的持续产品。在此，对成员介入作用的强调要大于组织形式的有限结构。最后，第一种路径强调的是结构，第二种强调的则是介入作用，而基于行动的取向则是关注两者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因此，话语既可以被看作是有知识的行动者所吸取以创造社会现实的资源，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塑造和限制被认为是合法行动的沉淀结构（例如，规则和制度文本以及人工产品）（Giddens, 1979）。【285】

这三种视角采取了竞争性的立场，考虑到人——作为话语生产的社会行动者——如何被他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结构决定，或相对自主地作用于社会结构。如果采用较为“现实主义”的视角，则会倾向于视社会结构的作用优先于个体介入作用；如果赋予构成作为社会结构的组织的话语以首要性的话，那么人类行动者及其行动的可能性则处于中心地位。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不同的研究传统以不同的方式采用这种关系。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从思考话语－组织的方式转向对三种研究传统的讨论，它们考察了权力、话语和组织间的关系。在上文讨论的对话语－组织关系的两种解读中，暗示了一个观点，即组织，根据其定义，是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努力试图发挥介入作用并对组织意义和结构进行控制的权力场。基于你的视角，组织成员的概念从被实施控制的组织结构蒙蔽的不知情者，到主动、自知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有能力反抗和颠覆组织性控制努力。下面，我们将解开话语－权力－组织间的联系。

14.2 话语、权力和组织化

鉴于篇幅限制，不能广泛综述。权力研究的主要轨道一直是从行为的观点出发，将权力看成是可以扩展的个人财产或物质资源（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Dahl, 1957; Pfeffer, 1981），而在近些时候的观点中，权力直接关系到塑造和修正意义和社会现实的能力（Clegg, 1989; Foucault, 1979; Lukes, 1974; Mumby, 2001）。在后来的概念中，话语和权力都直接联系并辩证相【286】关；也就是说，权力关系既为话语和意义的展现提供了更大的语境，同时也被话语性地建构（Van Dijk, 1993）。下面我们将解开这种辩证的关系。

对权力、话语和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源于范围更广的研究，它们将权力作为通过多种话语形式而确立和竞争来考察。这些形式包括：组织性的故事讲述（Boje, 1991; Brown, 1998; Helmer, 1993; Mumby, 1987, 1993; Witten, 1993），职场礼仪（Collinson, 1988; Rosen, 1985, 1988），组织性的隐喻（Deetz and Mumby, 1985; Smith and Keyton, 2001; Smith and Eisenberg, 1987），幽默（Collinson, 1988; Holmes, 2000; Rhodes and Westwood, 2007），日常职场交谈（Holmes, 2006; Holmes and Stubbe, 2003），反讽和嘲弄（Fleming and Spicer, 2003; Hatch, 1997; Taylor and Bain, 2003），以及其他。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探索这些不同话语形式是如何使得相互竞争的利益相关群体塑造组织意义，并对他们在组织中的自身利益和"赌注（stake）"予以合法化进行解释。

因为权力存在于惯例性意义生产的形塑过程中，对日常话语的研究是理解这种动态发生的关键。然而，对话语、权力和组织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多重视角的发展而更加复杂，每种视角都强调了这种关系的不同领域。下面我们将讨论这些视角的其中三种：①批判性研究；②后现代研究；以及③女性主义研究。

14.2.1 组织话语的批判性研究

批判视角的研究产生于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其关注的议题是意识形态和霸权（Althusser, 1971; Gramsci, 1971; Marx, 1967）。从这一视角出发，话语研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组织能够在职场中生产与再生产支配关系的方式。尽管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关系大多数是强制性的，但当前的批判传统更多关注的，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更人性化和更具参与性的现代工作环境中，工人是如何顺应那些可能对他们的利益不是最大化的权力体系的。在这一语境下，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扮演的是解释性的中心角色。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不指向一个简单的观念系统，而更多指向的是完整的、生动的、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通过不同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塑造的。意识形态为社会行动者实现其与世界的关系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然而，意识形态没有用一个中立的方式来架构世界，而是同时具象化和遮蔽了潜在的权力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遮蔽一个社会统治思想的源头，这样，其表现出的不是一种特定的、存在于历史的统治阶级的特定产品，而是表现出普遍的、大众接受的"自明之理"。如此一来，这样的统治思想就是历史特有的而不是普遍的，可以轻易通过思索现在已经过时而之前普遍被相信的观点进行论证。例如，相信【287】国王是由神明选择的，或者更近一些的，认为妇女没有资格投票或担任要职。在这两个例子中，

这种“普遍真理”服务的是特定集团（分别对应贵族和男性）的利益。关于意识形态的要点在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是维持现状，同时遮蔽这样一个事实：现状具有历史偶然性，并服务于特定集团的利益。

霸权的概念（Gramsci, 1971）和意识形态相关，但指的是竞争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特定权力关系。为了使权力最有效地被行使，统治集团一定不能强迫下级组织，取而代之的是创造让下级组织服从的条件，并且确实能够积极支持统治集团的观念和意义系统——意识形态。当一个集体是“霸权的”，那么其观念和世界观将被其他组织作为“事情本来的样子”而“自发地”接受。

在批判性组织研究的语境中，研究者探索了组织话语如何在意识形态上作用于职场权力关系的架构。这种研究最为著名的早期事例可能是布洛威（Burawoy, 1979）在一个机器零件工厂对工人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展示了这些工人是如何更努力地为公司工作，不是被高压的管理体制驱使，而是被一个叫作“赶工游戏”的车间游戏驱使。在这个游戏中，他们在彼此之间竞争并和机器比赛，来弄清怎样最能获得绩效奖。布洛威指出“赶工游戏”——被工人话语性地建构并共同实践——意识形态起到了维持和再生产管理层和工人之间霸权关系的作用。建构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布洛威称游戏通过使工人关注游戏本身和其自身打败机器的欲望，在意识形态上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忽视了本质上是敌对的、作为资本主义代理的管理与工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就像布洛威论证的，游戏保证了资本家追求的“剩余价值”，而在对工人自身的剥削中遮蔽了这一价值的根源。

自布洛威的研究之后30年里，批判组织学者探索诸多话语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包括故事（Helmer, 1993; Mumby, 1987; Witten, 1993）、仪式（Rosen, 1985, 1988）、幽默（Collinson, 1988; Linstead, 1985）、隐喻（Deetz and Mumby, 1985）和日常谈话（Huspek and Kendall, 1991; Mumby and Stohl, 1992）。尽管其中的许多研究在日常话语层面探索了霸权是如何生产与再生产的，而一个显著的研究群体考察了对支配的意义和意识形态进行的抗争和抵抗形式是如何出现的。正如这一研究显示的，权力，根据其定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现象。在这里，一个最有用、最具见解的领域是有能力证明日常的，组织成员的世俗话语（小写“d”）如何对组织权力和抵抗等更广阔的议题产生重要意义。

在有关组织权力和抵抗的批判性研究中，一个极佳的例子是柯林森（Collinson, 1988）在一个卡车工厂车间对日常职场幽默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展示了幽默不仅是这种全男性车间文化最普遍和典型的特点，同样也很大比重地挣扎在工作和合理的管理－工人关系的竞争意义中。因此，幽默同时被用在回避工作的无聊和拙劣模仿及对抗管理行为，这种管理行为编派工人进入一种强调管理－劳动力合作的新的公司文化。在一种根植于富有劳动阶级强烈男子气息和对管理动机深度怀疑的车间文化中，幽默是一种将男子气息合法化和再生产，同时反抗塑造组织现实的管理工作的有力途径。正如一个工人简洁有力的陈述：“车间伙伴们是真实的。他们是社会中坚，但他们在‘办公室’都是傻瓜和娘娘腔”（Collinson, 1988: 186）。柯林森论证了“欢笑一刻”以及能够给出并接受侮辱是怎样不止被看作是男子汉工人阶级的特征，而且还否定了白领工人，视其为没有男子气（“娘娘腔”）。尽管这种评论非常恐同[1]和性别歧视，但 【288】

1　害怕、反感同性恋。——译者注

它证明了车间工人是如何将他们的男子气息特点联系到“真正的工作”（困难的、体力劳动）而以女性化来否定文书工作。正如一个工人观察了柯林森在洗手间洗手后对他说的：“你是跌倒了吗？”当然，在这里的含义是：作为“智力工作者”他不可能因为干真正的活儿弄脏手。

柯林森的研究是一个很有用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示例，因为它有效地证明了组织成员的日常话语实践是如何与动态的权力及抗争紧紧相连的。此外，他的研究站在了（大写D和小写d）两种话语的交集上，在此，他在理解工人阶级男子气概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宏观层面的话语之中框定了对日常话语的分析。每一层面的话语分析都有效地反映了其他层面。

总之，对组织话语的批判性研究为了解权力和意义在日常组织生活中是如何交叉地提供了重要的见解。这一学术的绝大多数兴趣点在于职场介入作用的可能性；也就是雇员所能够“言行不一”的程度（Giddens, 1979），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建构出替代性的组织现实，后者区别于那些与管理利益相关联的组织现实。

14.2.2 组织话语的后现代研究

大约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组织权力和话语的后现代研究，反映了一个与批判性研究有一定差异的概念集和经验问题（见Alvesson and Deetz, 1996，一篇有用的关于这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首先，后现代研究反映并试图捕捉工作和组织变化的特征。而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典型地关注的是传统的福特主义组织形式，其特征是权力中心，极强的等级，明确界定了利益相关者（管理者、工人等）集团的界限，正式的官僚结构等，后现代研究通常研究的是【289】组织化形式（通常称为“后福特主义”），它反映的是新职场——也就是组织被扁平化的等级、去中心的和/或基于团队的决策结构、知识密集型的工作进程、“及时”生产系统等所赋予的特征。

第二，在大量吸取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的基础上，后现代组织话语研究对权力的架构不是依照意识形态和霸权的进程，而是依照建构员工主体性的规训机制。在福柯（Foucault, 1979）的认识中，权力是“多产”的而不是消极的。因此，后现代学者试图解释组织话语建构身份的方式，这些身份屈从于嵌入在新职场的规训控制机制。这种新职场结构功能是“全景式”的，员工一直知道自己被监管的可能性，哪怕是在他们没有被上级直接观察，甚至是没有被同僚监管的情况下。无论是否被监管，工人们都处于一种“自我监管”的形式，借此他们将主体性内化了，这种职场主体性前置于、依靠于职业道德，它被整个群体理解并监督。

后现代研究反映了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新的权力形式成为（后）现代组织的特征。与其认为权力是集中在精英集团的（通常是所有者/管理者），后现代的观点则将其看作是一种分散在整个组织中的去中心的方式。乍看之下这种权力分布的系统似乎更加平均主义和民主，后现代研究者却有相反的认识，比起老的福特主义组织，这种权力的分布结构是为了创造更具压迫性的组织形式。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论证这一反直觉的观点。

巴克（Barker, 1993, 1999）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关于高科技公司在制订决策时如何从传统官僚组织结构向一个平面的、去中心的形式转变的，同时给予员工在组织的日常职能层面有更多的参与空间，并介绍了一种比起以前的官僚系统更具渗透性和隐藏性的权力和控制系

统。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巴克展示了这个公司如何真正从其传统的官僚的决策系统一夜之间转变为去中心化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员工被组织为自主的工作团队，有着对工作进度所有决策完整的控制。面对这种新的结构，雇员一开始不能确定如何行动。如果他们出错了怎么办？公司总裁保证他们这里没有“错误”的决定，如果他能够提供建议，他不会干涉他们讨论如何组织自己的工作。巴克论证了一段时间后这种明显自由的决策制定如何进化为一种自我生产的“协调控制”，它支撑了小组成员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

巴克（在 Tomokins and Cheney, 1985 之后）讨论了在这种协调控制之下，权威的所在之处可以从非个人化的官僚性的规则体系转为“成员的价值共识及其社会衍生规律体系”（Barker, 1993: 412）。换句话说，在官僚结构中，雇员可能会准时上班，因为规则制定他们必须按时上班，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惹麻烦，在协调控制体系之下，一个雇员会准时上班是因为团队成员们会集体产生一种“价值前提”，在这种前提下时间性被看作既是工作的出色表现也是团队对自我出色的定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雇员就没办法简单地辩驳这种规则体系是对他们的强制。另外，雇员根据自我生成的价值集合而不是一系列官僚规则来行动，其原因甚至都是不明显的。【290】

在巴克的研究中，他描述了这种协调控制系统是如何从雇员团队中产生的，制造了一定程度的监视和管控，这种管控比原有的官僚模式之下的还要严格。正如一个成员陈述的：“我不用坐那儿看老板有没有在周围；假如老板不在周围，我可以坐那儿和我邻座聊天或干任何我想干的事情。现在，这个团队在我周围，而整个团队都在观察我在做什么。”（Barker, 1993: 408）

巴克的研究清晰表明了在后福特主义的职场，一种对权力和控制的主要挣扎发生在对身份和主体性的建构中。再次建立在福柯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学者们探索了雇员如何成为特定的“知觉对象”，他们需要“有纪律地”像一个“优秀雇员”那样行动（唯恐被揭发为坏员工！）。这种变化同样包括雇员对**自己**的观点，将自己视为自觉的；也就是说，根据规则话语这种显而易见的效果，雇员会有规律地对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做全面的检查，以查看自身是否符合所支持的组织标准。这样的系统围绕着身份问题规律地产生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感，雇员们会经常发现自己缺少足以达到成功的特质，至少是组织定义的成功的特质——而这一定义时常发生变化（Collinson, 2003）。

霍尔默·纳迪桑（Nadesan, 1997）对广为使用的现代组织雇员性格测试的分析，为作为权力、话语、主体性的交集在职场如何进行操作提供了一个绝佳例子。这一章的许多读者可能做过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测试。通常公司会用这些测试作为“客观地”测量他们未来或现任员工对其工作的适合度。霍尔默·纳迪桑表示这种“广为使用的性格测试需要被当做一种话语实践来理解”（Nadesan, 1997: 190），它建构了一种人格特定模式，公司通过它可以训练和客体化雇员。使用一种福柯式框架，她分析了性格测试作为一种“忏悔技术”，让员工向自己或他人揭示自己性格中的“客观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雇员被建构为一种特定的“人格类型”，也被建构为一种组织（可管理的）知觉对象和一个对雇员来说自觉的主体。正如霍尔默·纳迪桑展示的，这样的测试并不“开发”雇员已有的许多个性特点，尽管它们创造了特定的类目，用（尽管被认为客观的）非常详细的方式进行了定义，这样的人依此可以被作为能为公司更好服务的“人力资源”雇佣。

【291】从一个后现代视角出发，权力如何在话语方面发挥作用以创造控制的客体，这种控制不会比话语本身的建构优先存在，纳迪桑的研究正是一个完美例子。同时，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绝佳例子：组织话语研究者关注的不只是组织成员的日常对话，也关注塑造作为一个组织成员意味着什么这一思想的“大写 D”的话语。在这一例子中，纳迪桑阐述了一个对（后现代）员工明显中立的评价系统如何真正为**建构**（对自己和组织）作为知觉对象的理想雇员而服务的。

最后一个关于作为话语的权力如何产生主体的例子是鲍里斯·布鲁曼斯对他父亲签署安乐死宣言的智慧和感动（Brummans, 2007）的讨论。布鲁曼斯可能并不同意将他的论文归类为后现代，然而它是一个有力的例子，证明话语——在这里是一份文档——如何建构与之互动的人们的身份和行为。出自组织传播研究的“蒙特利尔学派（Montréal School）”（Cooren, 2000; Cooren and Taylor, 1997; J.R. Taylor, Cooren, Giroux and Robichaud, 1996; J.R. Taylor and Van Every, 2000），这篇论文探讨了一份文档（在这里是一份安乐死宣言）如何不仅是一种传达信息的中立方式，同样也有其自己的介入作用，为那些与这份文档互动的人创造了可能的条件。这篇论文是不凡的，大部分是因为这是一首从文档自身的视角出发创作的诗篇，因此进一步强调了这份文档在那些与之接触的活着的人中所呈现的作用（布鲁曼斯的父亲及他的家庭）。因此，“论文”以下述方式开头：

> 不要活着
> 如你
> 或那个
> 我帮着去杀死的人
> 我不呼吸或擦除
> 一个文本行动者
> 由签署与签名定义
> 一份安乐死宣言
> 代
> 哈布·布鲁曼斯
> 那将死之人
> 他与我休戚相关
> 也代其他那些人
> 鲍里斯（他的儿子）
> 乔辛恩（他的女儿）
> 蒂（他的妻子）
> 今日是我出生之日
> 我的行为有效
> 不久后
> 它们会被知道
> （Brummans, 2007: 712）

布鲁曼斯指出，安乐死宣言写下了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和他的家人如何行动。例如，在说到宣言的介入作用的时候，他说：【292】

> 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父亲死亡前的一周，决定的作出不再仅仅是根据我们是谁。它们也根据我们曾经是谁而形成文本形式。奇怪的是，我们所签的文本虽确定了我父亲的心愿会被实施，但似乎也在以其自己的方式行动。它为我们不是的人或我们再现的人代言……我们不再是我们。为什么要打破我们承诺要成为的人是如此困难？为什么简单的一张纸有着如此的力量？（Brummans, 2007: 724）

布鲁曼斯论证了我们是如何使用文本（来发表宣言、主张、创造法律等），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本。当人们创造文本，那些文本会以一定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人，它会显著地塑造我们对世界和周围事物的认识。因此，在分析安乐死宣言时，布鲁曼斯表示："作为人类行动者中的一个非人类行动者，文本从过去计划了我父亲生命的终结，创造了以我们曾经希望成为的人和我们所成为的人为界限的行动领域——一个感觉超现实，但却是真实的空间。"（p. 723）

对布鲁曼斯来说，那份最终终结他父亲生命的安乐死宣言是一个深刻的个人案例，作为存在于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的人，我们是如何既被我们创造了的无数文本的介入作用赋予行动的可能，又被这些介入作用所限制。在这里，文本是相互连结的意义网络，有着诸多潜在意义，以深刻塑造人类身份和人类与世界、他人互动的方式来刻画着社会现实。

因此，"权力 - 知识"（在这里诸如安乐死宣言这样的文本是一个部分）的组织形式不仅仅简单地禁止或支持特定类型的行为，而是更"系统地形成了它们言说的客体"（Foucault, 1979: 49）；特定主体性的权力是**多产**的，这后来也成为知识的客体和职场的规范。福柯（Foucault, 1979, 1980）的成果被大量应用于组织话语研究，研究者们试图批判地检验职场主体性的特定形式是怎样通过这一复杂的过程建构的（Brewis, 2001; Clegg, 1998; Knights and Vurdubakis, 1994; McKinlay and Starkey, 1998）。

为了防止我们留下后现代组织研究仅仅关注规训实践的印象，许多研究者同样十分关注不同种类的工人反抗，包括话语形式比如幽默、讽刺、嘲弄（Fleming and Sewell, 2002; Fleming and Spicer, 2003, 2007; Hatch, 1997; Sotirin and Gottfried, 1999; Taylor and Bain, 2003）。这种研究尤其是从话语视角入手，因为它检验的是组织雇员如何通过不直接反对主流话语的话语语库（repertoire）来质疑和反抗主导的组织意义，却又是一种合理颠覆的方式。例如，泰勒和贝恩（Taylor and Bain, 2003）论证了工人们在一个呼叫中心（一个原始的、被广泛研究的后福特主义组织形式）如何利用既幽默又嘲弄的方式来破坏管理权威。例如，一份在雇员间秘密传播的传单上写着：【293】

> 你孤独吗？讨厌必须要作的决定？宁可说也不要做？那为什么不开会呢？
> 你能：
> 看到其他人
> 安稳入睡
> 卸下决定

写一堆无意义的纸条
感觉重要
给同事留下印象（或让别人无聊）
并且都在工作时间哦！

“会议”：工作的实用替代品！

另一份传单描述的是被设为工作站的浴室储物间——有电脑和电话——因此戏仿管理者的努力充斥在雇员们每一个清醒的时刻里。

像泰勒和贝恩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是有意义的。第一，他们表明了关注明显琐碎的、非官方组织文本是很重要的，它们经常可以揭示隐藏的、边缘的或可替代组织生活的话语建构——这种建构揭示了与管理制裁的非常不同的现实。第二，他们论证了反抗是如何不直接涉及冲突，或不需要集体行动；然而，却涉及精妙的（却又不是那么精妙！）努力来重新架构主流意义，以及从话语上明确表达替代的——而且通常是颠覆性的——世界观。这样的研究描述的雇员不是规训权力的被动主体，而是为自己建构替代性职场身份的积极的行动者。

14.2.3 组织话语的女性主义研究

我们将讨论的最后一部分组织话语研究是女性主义研究。我们考察这一领域不是因为它区别于批判性或后现代研究（其实它常常受到这些领域的影响并与之交叠），而是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后者不断意识到组织作为话语、权力和身份的场所被高度“性别化”了（Acker, 1990）；也就是说，组织建构的基础围绕着并且通过男子气和女性化的概念和关系产生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展超越了男性和女性有特定的行动方式、展现出特定的传播类型这一观点，相反，它尝试去理解日常权力关系是如何通过性别组织过程和结构进行的（见 Ashcraft, 2004，这种研究的一个有用的回顾）。简单来说，这一研究领域根植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性别、权力和话语是紧密相连的。

【294】研究者将性别作为宏观层面的“话语”和微观层面的“话语”都进行了考察。从宏观视角看，学者们关注的是理解男性和女性如何在社会层面的话语中进行定位，这种话语同时启动和限制了性别身份的表现。从微观视角看，研究者将性别看作是情境化的和暂时的成就，掩饰了性别身份的明显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性别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表现，根据对性别规范的忠诚而持续有效（West and Zimmerman, 1987）。

由于分析方法不同，在组织研究中这两种视角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随着研究者在日常谈话和行为层面探索男女如何采取这些更大的话语，用不同方式同时再生产和反抗这些话语（Ashcraft and Mumby, 2004a, 2004b; Holmer Nadesan, 1996; Holmes, 2006; Holmes and Stubbe, 2003; Murphy, 1998, 2003; Trethewey, 1997, 2001）。例如，特雷西韦（Trethewey, 2001）对中年职业女性讨论她们的身体的访谈研究，揭示了宏观层面的社会话语在意义生产上的复杂性，这种社会话语将年长女性置于因身体“走下坡路”而职业价值减少的位置。特雷西韦展示了她的访谈对象如何再生产这种话语，声称她们付出一切努力来维持年轻、苗条和美丽，因此具有

职业竞争力。其他人则拒绝这种走下坡路的主流话语，并接受她们的成熟和皱纹。这些访谈对象讨论了作为年长女性，她们不再被物化，也不再如同她们年轻时那样是男性凝视的对象；因此，她们一定程度上决定自由，对他人承担的责任减少。特雷西韦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职业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ies）更显著地被性别化，而在一定程度上男性的职业身份却不然；主流话语表明当女性老去（有时还不是优雅老去）而男性只是变得更加出色。这里的重点是，由于这种话语对男性和女性走下坡路的不同建构，后者被置于一种由于老去而需要持续对其性别表现而负责的地位。

许多女性研究探索了性别和权力如何通过日常话语释放。例如贝尔和福布斯（Bell and Forbes, 1994）论证了女性文书工作者如何讽刺性地使用“办公室涂鸦”（影印卡通）来戏仿性别刻板印象（“我有经前综合征和手枪。有问题吗？”），以巧妙挑战她们工作的正式官僚体系（注意与前面讨论的泰勒和贝恩的研究的联系）。墨菲（Murphy, 1998）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女性空中服务人员如何卷入抗争的日常实践来颠覆航空公司为其努力建构的特殊种类女性身份，例如她们的体重、外表和恭敬的举止。

尽管没有采用明确的女性视角，社会语言学家珍妮特·霍姆斯发展了一系列采用一种微观层面的路径来探讨性别、权力和职场关系的研究（Holmes, 2000, 2006; Holmes and Stubbe, 2003）。采用了“实践社群”视角，她关注的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建构职场的性别身份。霍姆斯指出为了理解社群或群体成员，必须关注他们做了什么——“那些表明他们属于该群体的实践或行动”（Holmes, 2006: 13）。【295】

在考察性别实践，包括谈话，霍姆斯指出这个焦点不应该在男女的性别差异上，而应该在性别产生的差异上；也就是说，男女如何利用性别资源，包括语言，来建构包容性和排斥性的结构？在这种语境中，面对面交流中的语言使用对于理解社会重要的社会界限是如何建构的格外重要。因此，霍姆斯指出，“职场文化在持续的讨论和行动中一直被拿出来举例；它发展了持续交流的日常社会互动中大大小小的行为，并被它们逐渐修改”（Holmes, 2006: 15）。

霍姆斯的研究与大多数性别、权力和组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分析涉及对职场互动在会话轮次层面上的非常细致的观察。她仔细转录了日常会话（例如，在会议中），然后将这些副本置于分析中，说明会话如何创造出哪些包容或排斥社会行动者的意义社群。例如，下面的对话发生在两位女性同事（佩内洛普和赫蒂）间，用来证明同事关系和权力之间的意义如何通过对话建构：

1. **佩：** /以及是以及以及\ 坚守阵地
2. **赫：** /嗯是是\
3. **佩：** [呼吸]大步走上街/[大笑]
4. 发出一堆感叹词\……
5. **赫：** /[大笑]: 我确定你明白了主要核心 :\
6. [其他人大笑]
7. **佩：** 她确切感到/我们同样这样觉得\
8. **赫：** /是[大笑]\

9. **佩**： 我的意思是人们侮辱你时显然会发生这种事
10. 那就是你感觉生气和不合作
11. 以及所有我们感觉到的事情
（Holmes, 2006: 16）

注意这里研究者并没有试着由于重复或者语法而编辑这段对话，对话同时发生的情境（用[]标记）也被仔细记录了，因此对话传递了一种很强的力量感。霍姆斯的意图是对这段对话碎片进行双重分析。首先，她论证了两个女性同事（刚刚从一个其他公司的会议出来，感受到被怠慢了）如何在会议起立发言并共同话语地建构了一个对自身肯定而强烈的看法（“大步走到街上……发出……感叹词”），因此修复了她们先前在会议上感受到的弱势感。注意这两个女性在分享经验时通力协作，并明显有着相同的波长。霍姆斯的第二个意图是表现在段落最后佩内洛普（组织的首席执行官）改变了她的交流方式并采取了更加确定、有距离的、阳刚的语气，“将自己建构为领导，有权评估互动的重要性”（Holmes, 2006: 17）。【296】

当然，诸如此类的互动在组织中一天可能发生成百上千次。霍姆斯的观点是“通过重复个人案例的积累，会呈现出更大的图景，每一次的案例在与既定规范的背景相杭衡中获得意义”（Holmes, 2006: 15）。因此，在孤立状态下，佩内洛普和赫蒂的互动相对不重要，但它证明了性别对话如何既吸取了沉淀规范和习俗，也同时再生产了那些规范（例如，女性必须协同来维持积极身份；女性领导必须时常吸取男性化话语模式来强化其领导地位）。

最后一个组织话语的性别分析案例，我们将简述卡伦·阿什克拉夫特对男性航空公司飞行员的研究（Ashcraft, 2005; Ashcraft and Mumby, 2004a, 2004b）。这一研究提供了与霍姆斯的分析相反的例证，在这里阿什克拉夫特采用了一个更为宏观层面的路径来研究性别身份建构的方式。她的研究由历史上航空公司如何建构男性飞行员身份的档案研究和对男性航空公司飞行员谈作为飞行员对自己的意义的访谈研究组成。档案研究在阿什克拉夫特的研究中格外重要，因为它展示了航空公司如何擅自和有策略地建构了一种话语（大写“D”），这种话语在制造飞行员身份是雄性的（专业、理性、酷、父亲般的、确定的等）过程中有严重的性别性，而补充的空中服务人员身份则是女性化的（性感、抚育的、情绪化的、关怀的等）。飞机的飞行员这一话语不是偶然形成的，是航空产业需求的结果，以说服多疑的公众飞行是安全的；这种安全可以由建构两种非常不同但相互补充的性别身份而部分地构成——一种开飞机的雇员群体是专业的，另一种照顾乘客并让他们忘记自己在哪儿，飞得多快。

有趣的是，阿什克拉夫特表示，尽管最近在专业方面，历史上主要是白人和男性的规则有了修改，许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对专业度的身份和感知仍源自这种性别话语，并难以认同航空公司飞行员专业度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近期修改（尽管这种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修改获得了许多尊重——承认更多女性和少数族群飞行员——这种修改仍是小量的）。在针对这种威胁而对航空公司飞行员进行访谈时，先前对这种身份的安全感变得明确：

飞行员：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职业是真实的，如你所说，它一定程度上是需要许多技巧的……而你看到，一些瘦小的女孩儿，你知道，飞走了，开这种大飞机……你可能会想，妈的！……实际上，当我看到这些，有时当我看到这

些女孩中的一些……我会想，伙计，你知道，如果她成为机长或者从事这个行业，嘿，那我怎么办，那些我付出的汗水，又算什么，你懂吗？

访谈者： 那你的意思是，“伙计，如果她是机长了，那我流的汗呢？”你的意思是什么？

飞行员： 就是——这对你来说是男性-女性那点事儿。就好比，就好比假如你去战斗，你知道，对你来说是个大事。你会萌发勇气和决心去打敌人，你会觉得只有有准备的硬汉才能完成这场战役。而突然之间，你看到一些女人从战斗的硝烟中走出来，肩上扛着机枪。然后你意识到，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97】

访谈者： 这有点伤人？

飞行员： 确实，确实有点伤人，戳到一些痛处。

(Ashcraft and Mumby, 2004a: 36)

在这个访谈片段中，男性飞行员直接将特定种类的主流的、男子气概和他的职业身份相联系。航空产业中这种主流的、性别的话语，作为一种资源起着作用，凭借着这种资源，他得以建构一种（职业）自身安全感——一种至上的能力、理性、父亲形象，能为上百人的安全负责。女性进入这种曾经排他的主流，是对这种安全感的（性别）意义的挑战，并导致他对职业价值产生质疑。从话语视角看，这一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它证明了不只是性别身份利用了话语，同时——可能更重要的——一旦受到替代话语的挑战，这些身份是何等脆弱。可能没有更好的例子来表明身份是如何话语地建构，并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14.3 结 论

让我们为自己有兴趣做一些组织话语研究的读者做一些实用性推荐来结束本章。这不是为了做出一些“如何”的解释，而是希望能提供一些“敏感化”的建议，以帮助引导读者从话语的视角考察组织生活时的思考方向。

1. 组织话语研究试图捕捉组织成员集体的意义建构过程的复杂性；人们如何卷入组织、卷入意义制造的过程？同样的，话语研究需要对成员如何解释自己的组织生活具有敏感度。在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 1983）的名言中，组织“从当地人的角度”意味着什么？研究者的目标不是将业已认定的意义强加于组织，而是解释，通过分析成员的话语，组织——及组成组织的日常行为——对其成员意味着什么。
2. 同时（这是分析组织话语的难点之一），解释成员的意义不表示简单接受组织成员说了什么。最好的话语研究在尊重成员的意义建构努力和提供对作为意义建构基础的潜在假设进行批判分析之间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们只能解释其居住的意义网络的部分意义（例如，想想作为一门语言的本土言说者，我们如何只对所说语言的一小部分规则有见地）。例如阿什克拉夫特的研究中，那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可能不会把自己描述为性别歧视者，【298】但尽管如此，可能是他并没有察觉到他惯例式地吸取以建构自己身份的性别话语；这是阿什克拉夫特作为研究者的任务来解释这种话语使得这个飞行员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建

构自己的身份。组织话语研究者的任务是尊重组织成员的意义建构实践，同时，试着解释意义的"深层结构"，后者经常回避组织生活中"第一线"的工作者。

3. 组织中没有"客观"的、价值无涉的分析。每一个分析都是"一种建构的建构"——一种对于他人日常意义建构进行建构的努力。研究者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接近组织，这些工具能够强调特定的组织特征，但是遮蔽其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经典议题合拍，但通常忽视性别议题；女性主义分析优先分析性别议题，但有时忘记了种族和经典议题。另外，所使用的方法论工具会形塑即将出现的数据种类。例如，霍姆斯的方法是谨慎地转录自然发生的会话，并将其置于一种几乎是一个轮次接着一个轮次的分析中，以捕捉组织生活的对话"细节"能够洞察包容和排他等更宏大的过程。另一方面，阿什克拉夫特转录由访谈收集而来的会话，以接近组织成员对自身和其组织或职业的意义建构，当访谈者把他们置于反思的位置时。两种方法同样有效，但发掘的是组织进程中相当不同的领域。在思考应该使用何种方法论工具或理论视角时，了解你有兴趣回答的是哪一个研究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4. 组织话语研究最有趣的是齐心协力连接组织生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也就是说，关于意义和权力更大的、制度化的结构，组织成员的日常话语努力告诉了我们什么？相似的，话语如何在微观层面作为吸收和/或排斥那些更大、制度化的形式而得以分析？这里的关键是话语分析应该比简单维持在"局部"层面做得更多；对社会行动者的谈话和文本的诠释涉及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话语和制度中，这些话语和制度提供的是"可能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话语才能"当场"产生意义。组织是每天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地方，但也是重要的社会分层地；缺失看见这种联系的研究，其分析力也会大打折扣。

5. 最后，我们认为真正好的组织话语研究是世界常识观点的敌人。也就是说，当组织无比复杂，多重意义系统经常冲突时，它们常被看作独立存在于生存在它们中的人以外的稳定结构。有洞察力的话语研究超越了理所当然和常识理解，探索看似稳定的现实如何成为社会建构，而这些建构往往是相对不稳定，且必须被日常生活即时即刻地再生产。有趣的话语研究包含"啊哈"的时刻，这个时刻为社会建构过程这一复杂的工作带来光明，微妙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观。

延伸阅读

下面这个短短的拓展阅读列表将为你提供概念的和经验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学者们是如何试着理解组织现实，如何被话语地建构。

Alvesson, M. and Karreman, D. (2000b) 'Varieties of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Human Relations*, 53: 1125-49.

对本章讨论的两种话语（大写"D"和小写"d"）的精彩讨论。

【299】 Collinson, D. (1988) '" Engineering humor"; Masculinity, joking and conflict in shop-floor relations'.*Organization* Studies, 9: 181-199.

性别职场身份是如何通过员工日常话语进行建构的优秀案例。

Grant, D., Hardy, C., Oswick, C., Phillips, N. and Putnam, L.L. (eds) (2004)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London: Sage.

组织话语研究的一个“顶级”的理论和研究回顾；将管理和组织传播领域的学者带到了一起。

Holmes, J. (2006) *Gendered Talk at Work: Constructing Gender Identity Through Workplace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提供了近距离的、微观层面的“实践社群”方法，研究日常职场谈话，检验包容的和排他的性别结构是如何产生的。

Mumby, D.K. (1987)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narrative in organization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4: 113-127.

有关组织故事讲述如何能够从话语路径进行分析的一个早期例子。

在线阅读

以下文章可以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获取。

Ashcraft, K.L. (2005) 'Resistance through consent? Occupation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sculinity among commercial airline pilot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 67-90.

Holmes, J. (2000) 'Politeness, power and provocation: how humour functions in the workplace'. *Discourse Studies*, 2: 159-85.

Van Dijk, T.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49-83.

参考文献

Acker,J.(1990) 'Hierarchies, jobs, bodies: a theory of gendered organiz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 *4*: 139-58.

Althusser, L.(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Alvesson, M. and Deetz, S. (1996) 'Critical theory and postmodernism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studies' . In S. Clegg, C. Hardy and W. Nord (eds), *Th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pp. 191-2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Alvesson, M. and Karreman, D. (2000a) 'Taking the linguistic turn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challenges, responses,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6*: 136-58.

Alvesson, M. and Karreman, D. (2000b) 'Varieties of 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Human Relations*, *53*: 1125-49.

Ashcraft, K.L. (2004) 'Gender, discourse, and organizations: framing a shifting relationship'. In D. Grant, C. Hardy, C. Oswick, N. Phillips and L.L. Putnam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275-98.

Ashcraft, K.L. (2005) 'Resistance through consent? Occupationa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sculinity among commercial airline pilot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 67-90.

Ashcraft, K.L. and Mumby, D.K. (2004a) 'Organizing a critical communicology of gender and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6*: 19-43.

Ashcraft, K.L. and Mumby, D.K. (2004b) *Reworking Gender: A Feminist Communicology of Organiz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chrach, P. and Baratz, M.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947-52.

Barker, J.R. (1993) 'Tightening the iron cage: concertive control in self-managing tea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 408-37.

Barker, J.R. (1999) *The Discipline of Teamwork: Participation and Concertive Control*. Thousand Oaks,

CA: Sage.

Bell, E.L. and Forbes, L.C. (1994) 'Office folklore in the academic paperwork empire: the interstitial space of gendered (con) texts'.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4*: 181-96.

Boje, D. (1991) 'The storytelling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story performance in an office-supply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106-26.

Brewis, J. (2001) 'Foucault,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re)-constructing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8*: 37-60.

Brown, A.D. (1998) 'Narrative, politics and legitimacy in an IT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5*: 35-58.

Brummans, B. (2007) 'Death by document: tracing the agency of a text', *Qualitative Inquiry*, *13*: 711-27.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a, R. (2000) 'Discourse analysis as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rganization*, *7*: 513-18.

Clegg, S. (1989) *Frameworks of Power*. Newbury Park, CA: Sage.

Clegg, S. (1998) 'Foucault, power and organizations'. In A. McKinley and K. Starkey (eds), *Foucaul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Panopticon to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pp. 29-48). London: Sage.

Collinson, D. (1988) ' "Engineering humor"; masculinity, joking and conflict in shop-floor relations'.*Organization Studies*, *9*: 181-99.

Collinson, D. (2003) 'Identities and insecurities: selves at work'. *Organization*, 10: 527-47.

Cooren, F. (2000) *The Organizing Property of Communic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ooren, F. and Taylor, J.R. (1997) 'Organization as an effect of mediation: redefining the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7*: 219-60.

Dahl, R.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 201-15.

Deetz, S. (2003) 'Reclaiming the legacy of the linguistic turn'. *Organization*, *10*: 421-29.

Deetz, S. and Mumby, D.K. (1985). 'Metaphors, information, and power'. In B. Ruben (ed.), *Information and Behavior*, Vol.1(pp.369-86),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Fairhurst, G.and Putnam, L.L. (2004) 'Organizations a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14*: 5-26.

Fleming, P. and Sewell, G. (2002) 'Looking for the good soldier, Svejk: alternative modalities of resist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place'. *Sociology*, *36*: 857-73.

Fleming, P. and Spicer, A. (2003) 'Working at a cynical distance: implications for power, subjectivity, and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10*: 157-79.

Fleming, P. and Spicer, A. (2007) *Contesting the Corporation: Struggle,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R. Hurley, Trans. Vol. 1). New York: Vintage.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ci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 Hoare and G.N. Smith,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rant, D., Hardy, C., Oswick, C., Phillips, N. and Putnam, L.L. (eds) (2004)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London: Sage.

Hatch, M.J. (1997) 'Irony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ntradiction in the humor of a management team'. *Organization Science*, *8*: 275-88.

Helmer, J. (1993) 'Storytelling in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tension and stratification'.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59*: 34-44.

Holmer Nadesan, M. (1996)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space of ac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7*: 49-81.

Holmer Nadesan, M. (1997) 'Constructing paper dolls: the discourse of personality testing i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Theory, 7*: 189-218.

Holmes, J. (2000) 'Politeness, power and provocation: how humour functions in the workplace'. *Discourse Studies, 2*: 159-85.

Holmes, J. (2006) *Gendered Talk at Work: Constructing Gender Identity Through Workplace Discourse*. Oxford: Blackwell.

Holmes, J. and Stubbe, M. (2003) *Power and Politeness in the workplace: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alk at Work*. London: Longman.

Huspek, M. and Kendall, K.(1991) 'On withholding political voice :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vocabulary of a "nonpolitical" speech commun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7*: 1-19.

Keenoy, T., Marchak, R.J., Oswick, C. and Grant, D. (2000) 'The discourses of organizing'.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36*: 133-35.

Knights, D. and Vurdubakis, T. (1994) 'Foucault, power, resistance and all that'. In J.M. Jermier, D. Knights and W.R. Nord (eds), *Resistance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pp. 167-98). London: Routledge.

Linstead, S. (1985) 'Jokers wild: The importance of humour in the maintenanc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33*: 741-67.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Marx, K. (1967) *Capital* (S. Moore and E. Aveling,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ckinlay, A. and Starkey, K.(eds) (1998) *Foucaul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From Panopticon toTechnologies of Self.* London: Sage.

Mumby, D.K. (1987)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narrative in organization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4: 113-27.

Mumby, D.K. (ed.) (1993) *Narrative and Social Control: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bury Park, CA: Sage.

Mumby, D.K. (2001) 'Power and politics'. In F. Jablin and L.L. Putnam (eds), *The New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pp. 585-6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Mumby, D.K. and Stohl, C. (1992) 'Power and discourse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absence and the dialectic of control'. *Discourse & Society, 2*: 313-32.

Murphy, A.G. (1998) 'Hidden transcripts of flight attendant resisitanc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1*: 499-535.

Murphy, A.G. (2003) 'The dialectical gaze: exploring the subject-object tension in the performances of women who str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 305-35.

Pacanowsky, M. and O 'Donnell-Trujillo, N. (1982)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6*: 115-30.

Pfeffer, J. (1981) *Power in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tnam, L.L. (1983) 'The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an alternative to functionalism'. In L.L. Putnam and M. Pacanowsky (eds),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pp. 31-54). Beverly Hills, CA: Sage.

Reed, M.J (2000) 'The limits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rganization*, 7: 524-30.

Rhodes, C. and Westwood, R. (eds) (2007) *Humour, Organization, and Work*. London: Routledge.

Rosen, M. (1985) ' " Breakfast at Spiro's": dramaturgy and domi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1*(2): 31-48.

Rosen, M. (1988) ' " You asked for it": Christmas at the bosses' expen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 463-480.

Smith, F.L. and Keyton, J. (2001) 'Organizational storytelling: metaphors for relational power and identity struggle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5*: 149-82.

Smith, R. and Eisenberg, E. (1987) 'Conflict at Disneyland: a root metaphor analysi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4*: 367-80.

Sotirin, P. and Gottfried, H. (1999) 'The ambivalent dynamics of secretarial, " bitching"; control, resi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rganization*, *6*: 57-80.

Taylor, J.R., Cooren, F., Giroux, N. and Robichaud, D. (1996) 'The communic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 between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text'. *Communication Theory*, *6*: 1-39.

Taylor, J.R. and Van Every, E.J. (2000) *The Emergent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as its Site and Surfac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Taylor, P. and Bain, P. (2003) ' "Subterranean worksick blues": humour as subversion in two call centres'. *Organization Studies*, *24*: 1487-509.

Tompkins, P.K. and Cheney, G. (1985). 'Communication and unobtrusive control in contemporary organizations'. In R.D. McPhee and P.K. Tompkins (eds),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raditional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 (pp. 179-210). Beverly Hills, CA: Sage.

Trethewey, A. (1997) 'Resistance, identity, and empowerment: a postmodern feminist analysis of clients in a 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4*: 281-301.

Trethewey, A. (2001) 'Reproducing and resisting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decline: midlife professional woman's experiences of aging'.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5*: 183-226.

van Dijk, T.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49-83.

West, C. and Zimmerman, D.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 125-51.

Witten, M. (1993)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e of obedience at the workplace'. In D.K. Mumby (ed.), *Narrative and Social Control: Critical Perspectives* (pp. 97-118). Newbury Park, CA: Sage.

话语与政治 15

Discourse and Politics

⊙ 保罗·奇尔顿　克里斯蒂娜·沙夫纳

15.1 引　言

一些哲学家——这里最知名的是笛卡尔（Descartes）——将人类基本上界定为语言的动物。而另一种有名的界定则出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将人类定义为政治动物。这两种定义无疑都蕴含了真理的胚芽。政治话语分析者可能会声称，如果他们要从哲学上来思考的话，一种定义必然与另一种相牵连。可以肯定的是，无语言则无政治的实施，而且还可能的是，社会群体章程的语言使用引向了我们在宽泛意义上所说的“政治”。

尽管对语言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关注政治的各种学科的中心，但一些政治哲学家已时时明确地指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觉察意识。在有关语言的学科中，值得一提的是修辞研究——也即言语说服艺术——被希腊和罗马的作家认为是“政治科学”的一种。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教廷，修辞传统一直在演讲人培训中发挥作用，他们要履行各种重要的公共职责，包括政治职责，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言语性的政治行为的批评性观察提供评论资料。

随着印刷和电子媒体在 21 世纪的大规模扩张，人们现在接触到多种言语信息，其中相当多的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尽管我们在下文会指出，到底何谓“政治的”是一个诠释的问题。政治信息的日益中介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对政治文本和谈话的接收、诠释和批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并且因互联网的扩散而愈发增加（比如由博客和推特带来的机会）。另一个意义是对政治意识和批判性评价的需求也相应随之增长。也许有人认为，批判性地应对政治话语的能力是天然生成的，无须由学术界或任何其他人来深度研究。对此观点可以提出两个辩驳，第一个适用于对人类行为的深度研究的所有批评。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习是天然的，但这并不排除对认知或教育过程的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和利用。同样的，政治话语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复杂形式，仅凭其自身就值得研究。第二个在性质上与伦理相关。许多评论者以及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人，的确都感到政治家和政治机构是靠语言的“说服性”或“操纵性”使用来维系的，而公众对此使用却只是半知半解。事实上，早期的修辞学家如伊索克拉底（Isocrates）[1]、柏拉图（Plato）、西塞罗（Cicero）[2]即持这种观点，他们怀疑公共演讲者能够通过特殊的谈话来蒙蔽公民。在 21 世纪，整个语言操纵的观念发展成了梦魇般的政治话语，以小说化的方式体现在奥威尔的

1　公元前 436—前 338，古雅典雄辩家、修辞学者。——译者注

2　公元前 106—前 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小说《1984》（Orwell, 1949）中。政治话语分析（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DA）的这两种理论基础合力产生了对所有政治动物的智识上的好奇和关注。

15.2 政治与政治话语

15.2.1 政治科学与语言哲学

在政治哲学里，词语意义历来产生问题并引起焦虑。例如，有关“民主”、“平等”、“自由”以及类似词语的意义问题一直是争论中复现的主题。早期研究假定这样的术语具有“本真”（true）意义（Sir George Lewis, 1898），而且这种倾向一直贯穿至20世纪大半个世纪都很强势。许多受到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和维也纳学术界影响的“政治科学者”希望使政治语言去除混乱不清和含糊其词。有意思的是，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是持类似观点，他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人。在20世纪末的最后30年，出现了一种更为相对论的路径。萨托利（Sartori, 1984）的路径就比较富有弹性。政治概念与政体“语言”相关，因而是“可争论的”，这种观念在加利（Gallie, 1956）、康诺利（Connolly, 1974）、卢克斯（Lukes, 1975）和鲍尔等人（Ball et al., 1989）的研究中成为明确的焦点。这一发展还受到已故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以及奥斯汀（Austin, 1962）和瑟尔（Searle, 1969）等人研究的影响，同时伴随着一种认知的日益增长，也即语言实际上是一种行动形式。

【305】

15.2.2 后结构主义与解构

在1980年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Anglo-Saxon departments）[1]受到“大陆”哲学的影响。当时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法国的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致力于研究“话语”的观念，认为话语包括语言实践，但并未给出精确的语言学上的描述。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促成了“解构”观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相对论者的诠释。虽然“文本”对德里达而言至关重要，但他并未采用语言学的理论框架。解构这一脉系产生了诸多著作和论文，但说明其路径演进的则是夏皮罗（Shapiro, 1981; 1984）以及德尔德里安和夏皮罗（der Derian and Shapiro, 1989）。重要的是，许多政治“科学家”已向前迈进，认为无论是政治争论还是政治进程本身，这两者都是通过文本和谈话来构成并交流的，这一发展也被称之为政治科学中的“语言学转向”。

15.2.3 社会－心理学路径

从社会心理学中衍生出与上述发展并非完全不相容的多种路径，包含了定性和定量方法，这些方法旨在表明政治行为的非理性和不明确。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受到萨丕尔（Sapir）的人类语言学影响而秉持一种语言观，与政治“科学”是“权力的科学”这样一种

1　在地缘政治学、史学和经济学中，都有“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与大陆学派相对应。前者主要是指英美国家学者。——译者注

观点相结合，促使他对语言的政治“功能”进行了定量调查。他还在分析上辨析了**句法**（syntax）、**风格**（style）和**语义**（semantics）之间的区别，且着力于后者，根据政治标语和象征对语义进行了界定（Lasswell et al., 1949）。另一个重要的路径是对政治迷思以及政治制度的象征和仪式这样一个维度的研究（Edelman, 1964; 1971）。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一些政治科学家开始寻求对政治言语行为的定量的实证解说，他们将传播视为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例如参阅 Graber, 1976）。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冲突研究中还尝试采用了一种定量的语义路径（Leites, 1963; Osgood, 1971; Tetlock, 1985）。尽管这些研究运用的是心理学家而非语言学家的方法，但他们的确在寻求一种描述上的精确性，而这在受到哲学视角影响的研究路径中是缺位的。

15.3 语言学与政治话语

语言学者共同持有上述的一些观点，如批判观和一般性的认识论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政治现实在话语中并通过话语得以建构。然而，有些学者则坚持政治客观性（Wilson, 1990）。语言学者与他们在政治学系的同事大多明显不同，在于他们的研究方式受到源自于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他们一直采取多种不同的路径，这种变异性实际上也许看起来相当令人困惑。而且，他们一直醉心于政治议题和现象的不同寻常的变异性。为了传达出这种变异性，我们考虑了 PDA 中广义上的三类“文献”，这些文献本身就是话语，且与特定的国家和文化的历史具体性相关，至少是在部分程度上。【306】

15.3.1 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路径

15.3.1.1 法国路径

关于“法国学派”，值得一提的是它综合了政治科学家、政治哲学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带有法国烙印特征的语言学。方法论上主要有两大明显的倾向。

第一个是“政治词汇测量（political lexicometry）”，一种借助于计算机对政治词汇进行统计的路径，该路径创立于 1967 年，以在圣 – 克劳德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th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为基地，并由“政治文本和词汇测定实验室”（Laboratoire Lexicométrie et textes politiques）发展而来。此方法建立了一个语料库（例如由法国共产党创作的文本），包括一篇篇独立的文本，能够在相对频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广义地讲，这样一种方法只能与关于政治话语的宏观社会学和历史问题相关联。譬如，一项研究表明“工人（*travailleur*）”和“挣工资的（*salarié*）”这些词的相对频次在法国商业协会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显示了（从 197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末）词频的跨时段变迁，还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历时转向（Groupe de Saint-Cloud, 1982; Bonnafous and Tournier, 1995）。正如圣 – 克劳德小组自己所承认的，定量研究只是为诠释性的政治分析提供了原始数据。

政治话语分析者的第二种方法倾向虽与圣 – 克劳德小组有所重合，却呈多样化。其中一个

阵营受到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0）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影响，强调"国家机器"观（Pêcheux, 1975; 1990）。这与将国家的政治现象视为创造政治"主体"的一系列复杂话语的话语研究路径如出一辙。另一个指导性的观念是"话语形构"（discourse formation），取自于福柯（Foucault, 1971）。然而，这些抽象的观念与细致的语言分析方法相互啮合。譬如，一些研究者详细地考察了 1988 年和 1995 年的总统大选中的修辞模式（Groupe de Saint-Cloud, 1995）。盎格鲁－撒克逊语用学（言语行为、会话意涵、相关性等）的影响也很显著，加之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1966/1974），其对"陈述"（*énonciation*，言说或话语）的研究专注于指示现象（deictic phenomena）。这一框架帮助一位成熟的分析者如阿卡德对大范围的文本类型的政治功能予以详细的说明（Achard, 1995），他也保留了一些阿尔都塞的总体框架。

【307】词汇测定的路径已在探究政治话语的研究者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从语料库语言学中汲取营养并予以发展。在里昂、佛朗什－孔泰[1]、尼斯[2]及其他地方的各巴黎大学[3]，形成了一个运用定量方法的政治话语分析者的合作网络（著称 Céditec）[4]。由该路径兴起的众多研究一直关注词汇的频次分布，将其作为政治分营的指标，与此同时，其他学者考察的则是政治领导人和社会议题如种族主义的词汇特性（在这些其他学者中，参阅 Mayaffre, 2000; 2004）。有个名为 Textopol 的在线数据库颇为著名，由皮埃尔·菲亚拉（Pierre Fiala）指导维护，他长期致力于对政治话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比如参阅 Fiala and Ebel, 1983; Fiala, 1994）。

大多数定性研究路径借由修辞学获得丰硕成果，在当代人文科学领域里将这种经典传统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研究聚焦在说服技巧上，采用特别有用的视角检视体现政治言说者的自我呈现的**气质**（ethos），以及诉诸公众情感的**感情**（pathos）（Amossy, 2000; Chareaudeau, 2005）。还有些研究试图将政治话语理解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譬如勒巴特（1998）的著作将大量研究包括词汇测定路径都融入至话语，并辨析了不变的或至少是持续的结构与条件性的话语策略实践之间的区别。《词：政治的语言》（*Mots: Les languages du politique*）这份刊物刊载了一系列广泛方法路径的论文，研究与同样广泛的政治领域相关，无论是一般政治还是危机政治。法国路径的一个特征要素是对法国政治过程的活动家式的介入，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DA）学者都具有这一特征。

15.3.1.2 德国路径

在德国，对政治语言、政治文本和政治词汇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特别受到德国政治利益和议题的激发，尤其是法西斯主义这段过往历史以及随后的东、西德政治分裂。奥地利研究者也一直在分析法西斯主义语言和新纳粹话语，因此他们的部分研究也将包括在此小节中。

在对法西斯主义语言的研究中，最初的焦点在于字词，也即它们发展出来的具体意义以及对它们的使用或误用（例如参阅 Klemperer, 1975）。更近些时候，一直有人认为，第三帝国的语言不能由语言形式而只有以其功能来界定。民族社会主义者语言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具

1　法国东部地区，旧省名，靠瑞士边界。——译者注

2　法国东南部海港及名旅游胜地。——译者注

3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学生运动之后，巴黎大学被分成十几所相互独立的大学，并非不同的校区。——译者注

4　Céditec 是 Centre d'étude des discourse, images, texts, écrits, communication 的简称，意为"话语、图像、文本、写作、交流研究中心。——译者注

体的话语实践为特征（例如参阅 Ehlich, 1989；对不同路径的全面考察，可参阅 Sauer, 1995）。在话语历史性分析的框架下，可以从奥地利政治家就纳粹历史发表的讲话的话语中发现持续性的论证模式（如暗指、否认、缓解等）（例如，Wodak, 1989; Wodak and Menz, 1990）。

从以词为中心的语言学语义分析向定位于文本和行动的交流分析，这一发展在东西德语言（使用）的研究中也很明显。为了比较东西德的政治词汇的语义结构，研究者引入了 Ideologiegebundenheit（**意识形态的束缚**）和 ideologische Polysemie（**意识形态多重解释**）等概念（Dieckmann, 1969, 1981; Schmidt, 1969），这些概念在 1960 和 1970 年代的多数研究中占据了主导。【308】

研究的一个焦点是批判性地反思政治关键词的策略性使用，这种使用是为了达到特别的政治目的。对词语的策略性操控被冠以"语义之战"和"概念吞并"之名，并一直在此名义下被研究者分析；譬如，从政治反对者那里"强取"术语，为的是赋予其新意义，或者将一种基本价值（诸如"团结"、"自由"等）与一个政党相关联，其关联的方式是最终将该党认定为具有那种价值（参阅 Burkhardt et al., 1989; Klein, 1989; Liedtke et al., 1991）。

一些受到盎格鲁－撒克逊实用主义、会话分析和媒介研究影响的研究者，一直关注语言行为（诸如轮换策略、图式定位、言语行为、会话暗示等）发生的组织原则，比如在与政治家的访谈、政治演讲和电视辩论等语境中。赫林格（Heringer, 1990）和克雷布斯（Krebs, 1993）的研究即是将政治演讲结构与其对受众的效果联系起来。

东德在 1989—1990 年间的政治转型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统一，为政治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界。（主要来自于实用主义、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各种路径组成宽泛的光谱，被运用于对变化中的政治词汇、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仪式性话语、文本类型和话语策略的变迁以及东西德之间的话语互动等研究中（比如参见 Burkhardt and Fritzsche, 1992; Lerchner, 1992; Reiher and Läzer, 1993; Roth and Wienen, 2008）。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和奥地利的语言与政治研究一直聚焦于产生和接收文本和谈话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较为广阔的语境。所探讨的话题包括政治传播的历史变迁（Jarren et al., 1998; Diekmannshenke and Meißner, 2001），议会话语特征（Dörner and Vogt, 1995; Burkhardt and Pape, 2000），政治家的语言与演讲术（Patzelt, 1995; Holly, 1996），以及认同的话语建构（Distelberger et al., 2009）。福柯的话语概念常常作为研究的基础，以揭示和／或重构文本中与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排外主义和移居海外等相关的权力维度（Matouschek et al., 1995; Pörksen, 2000; Jaeger and Halm, 2007; Krzyzanowski and Wodak, 2008; Wodak and Krzyżanowski, 2008）。在方法论上，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各种流派（诸如社会认知学、话语史学、社会符号学、系统功能等路径）占据主导，并与日俱增地伴随以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Musolff, 2004）。近期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话语分析者越来越多地介入公共讨论，这一点可以从德国政治语言研究协会（Arbeitsgemeinschaft sprache in der Politik e.V.）的学术会议话题中得到证明，会议话题包括"语言与公信力：政治事务的语言学"、"公共话语中的移民与其他问题"、"全球化：传媒、语言和政治"，以及"竞选游说活动中的语言"等（也可参见 Dörner and Vogt, 2002; Burkhardt and Pape, 2003）。【309】

15.3.1.3 英语国家的路径

在此小节，我们不但包括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工作，而且还涵盖了以英语为发布语言、特别是那些源自于荷兰和比利时的研究。

奥威尔对政治话语的非正式的批判性立场，得到了一些试图将现代语言学的洞见借用过来的英国语言学家（福勒、克雷斯、霍奇、费尔克拉夫）的认可。随着与时而来的语言学倾向，转换－生成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它提供了描述具有政治实用意义的特定句法形式的手段（Fowler et al., 1979）。然而，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路径中更为重要的是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Halliday, 1973）。这一研究框架使得语言形式与社会活动的联系，也进而与政治活动的联系成为可能。但是英语国家的政治话语分析工具基本上都是折中性的（eclectic）[1]，特别依赖于语用学，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各种类型的隐含意义（Richardson, 1985; Wilson, 1990; 1991; Blommaert and Verschueren, 1991; 1993）、认知语言学（Chilton, 1985a）、布朗和莱文森（Brown and Levinson, 1987）的“礼貌现象”（Chilton, 1990）、会话分析（Atkinson, 1984），以及由梵・迪克（van Dijk, 1980; 1985）发展起来的欧式文本分析。梵・迪克本人将一系列分析方法，包括文本的、语用学的、人种志方法论的以及认知学的路径，运用于政治话语研究以及对传媒和其他领域的种族主义话语的批判中（参见 van Dijk 1987; 1989; 1994; 1995; 1997; 2002; 2005）。费尔克拉夫最近的研究分析了社会结构、社会事件、社会实践与话语之间互为交织的关系。他将话语当作社会事件和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要素，而且话语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涉及话语的再语境化，例如他分析了与政党和全球化相关的过程（Fairclough, 2000; 2006; 2007）。

在美国，乔姆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历来尖锐并引发争议。尽管他已指出是什么在本质上构成话语过程，比如“制造共意”和“宣传”，但他并没有尝试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这些过程（例如参见 Chomsky, 1988a; 1988b）。乔姆斯基对语言学这门学科的革命性贡献没有直接运用于话语或政治研究。试图将语言学分析运用于政治话语的美国学者，缺乏像更为激进的欧洲研究者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而且似乎能预估到他们的研究通常会采取一种语言学理想主义的形式。博林格（Bolinger, 1980）从其扭曲或操控的效果这一视角考察了一系列的语言手段，这种视角也是美国修辞批判学所持的观点。语义理论的发展为自霍布斯以来的政治分析提供了又一方面的洞见，也即象征所起到的令人不安的作用。譬如，奇尔顿和拉克夫（Chilton and Lakoff, 1995）利用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检视外交政策话语，拉克夫还考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象征基础。这一研究脉系也随之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发表出版（Lakoff, 2004; 2008）。这其中有些是探究竞选领域，以对诸如总统大选、2001 年“9・11”事件以及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等当代事件作出研究回应。隐喻理论在政治领域中更为广泛的应用见于格特力（Goatly, 2007）以及一批新起的“批判隐喻”分析者。【310】

奇尔顿（Chilton, 2004）一方面仍然在认知框架内展开研究；另一方面也将几种分析视角引入政治话语，包括广播电视政治访谈、议会辩论、精英对犯罪种族主义谈话的影响、宗教－政治跨界话语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多个领域。议会话语研究成为关注焦点（Bayley, 2004），同样，

1 意思是根据特定环境选择看似最佳的分析工具。——译者注

对政治演讲的正式修辞的分析亦是如此（参见 Schäffner, 1997; Ensink and Sauer, 2003）。

然而，现已清楚明了的是，政治语言涉及的维度一般并未明显展现于其公共外表上或者引人注意。沃达克（Wodak, 2009）是这方面里程碑式的代表，她为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分析视角。一方面，这些新视角聚焦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话语，包括政治家在其体制环境下的“后台”和“前台”的活动；另一方面，新视角突出了理解政治的“表演”观（the notion of “performance”），包括政治生活的中介化，当然还有虚构化。

自本章的第一版本于 1997 年发表以来，政治话语的分析有诸多发展，归纳总结如下：①由出版物的增长反映出对此话题的关注在与日俱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书系列，比如《政治学的话语路径》（*Discourse Approaches to Politics*）、《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语言、政治与社会》（*Sprache-Politik-Gesellschaft*）以及新出版的刊物《语言与政治学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②有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政治话语分析，比如波兰的“政治语言学”会议，还有像“跨学科话语分析的批判路径”（CADAAD）系列会议等，涵盖了大量的着眼于政治话语的论文；③我们还注意到研究视角在不断拓宽，所应用的分析方法也是如此。我们已提到过语料库语言学应用于政治话语，特别是在与象征分析的结合中（Musolff, 2004; Charteris-Black, 2004; 2005; Semino, 2008）；④在传媒研究和新闻学等学科（Bhatia, 2006; Fetzer and Lauerbach, 2007）以及翻译研究（Inghiller, 2005; Schäffner, 2004; 2007）中对政治话语的兴趣也日渐增长；⑤研究者的地理分布越来越广（仅提及波兰的卡普（Cap, 2002; 2006）；或者中国的陆（Lu, 1999），他们的分析不仅限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语境，也包括了比较分析以及超国家政治的分析（如对欧盟的分析，参见 Muntigl et al., 2000; Kryzyzanowski and Oberhuber, 2007; Millar and Wilson, 2007）。 【311】

15.4 政治话语的语言学分析

研究政治话语有许多方式，从经典的修辞学及其传承分析，到上面小节所概述的各种路径。本章所介绍的路径绝不是唯一可以运用和发展的。

15.4.1 政治文本与策略功能

政治话语分析的任务是将细致的语言行为与我们所理解的“政治”或“政治行为”联系起来。这里存在着可能立即冲击到读者的两个问题：①何谓“政治的”取决于评论者的观点立场；②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即话语）的多样性可以因服务于许多不同的目的——不单单是政治的，还有启发式的、戏谑的和告知信息的，等等——而有不同的诠释。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长篇讨论的，但这里我们只能限于如下几点：

就第一个问题，我们将那些（语言上的或其他）可能具有“政治性的”行为界定为涉及权力或其反面抵抗的行为。当然，“权力”这个概念缺乏一个政治理论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而我们这里也不打算去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想通过一个我们称之为策略功能（strategic functions）的中间层，把

政治情境、政治过程与话语类型、话语组织层级联系起来。**策略功能**这一观念，能使文本和对话的分析者聚焦于形成那些人们直觉地理解为“政治性的”现象，而不是关注其他诸如告知信息、戏谑等之类的功能。

现提出如下策略功能[1]以供讨论，但肯定不止这几种：

◎**强制**（coercion）**与抵抗**　显见的例子包括（法律和口头上的）许可的言语行为：命令、律法、法令，等等。形式较不明显的被强制的行为（coerced behavior）包括那些人们会发现难以避免或者甚至没有注意到的言语角色，比如不由自主地回答问题、对要求作出反应等。政治行动者也常常采取强制性行动，方式有设置议程中的话语、会话中话题的选择、具体关系中对自我和他人的定位以及对现实予以假定，迫使听者为了处理该文本或谈话而不得不至少暂时接受这些假定。也可以通过控制他人对语言的使用，也就是通过不同程度的各种审查和进入控制来运用权力。

【312】当权者为强制而采取的许多话语策略也可能为那些自认为是反权力的人反利用。但是，那些相对无权力者的话语特征可能也有其特定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包括媒体（苏联帝国下的地下出版物，被边缘化的种族群体、抗议者等的涂鸦）以及特别的语言结构（比如标语、赞美诗、请愿书、诉请、集会等）。

◎**合法化与去合法化**　政治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不会只是通过肢体力量而行动，除非是在极端情况下，而在这种情况下说一个人仍然处于人们所理解的“政治”领域，是会遭到质疑的。这种合法化功能与强制密切相关，因为它确立了受人服从的权利，也即“合法性”。人们因何要服从在其政策方面极为不同的制度呢？受人服从的理由必须通过语言来交流，无论是公开声明还是隐含意义。所使用的技巧包括论证选民之所想、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凸显领导魅力、夸耀绩效以及正面的自我呈现等。

◎**再现与歪曲**（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政治控制涉及信息控制，从定义上来讲事关话语控制。它或许是定量的，也或许是定性的。保密是一种阻止民众获得信息的策略；它是审查的反面，审查是阻止民众**提供**信息。在另一种歪曲方式中，也许**提供**了信息，却不足量，无法满足听众的需求或兴趣（就如一位英国政治家曾指出的，“对真相精打细算”）。定性的歪曲，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简单地说就是撒谎，但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言语回避和拒绝（“我并不是强烈反对补助，但是……”），或者不提及行动者。委婉语具有在概念上对不需要的所指进行“模糊”或“散焦”处理的认知效果，这些所指是客体或行动者。不同类型的隐含意义也构成了将注意力从恼人的所指上转移开的手段。

如上列举的这三种策略功能与由整个社会生活所发现的功能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在“政治”中。然而，根据这三种策略功能来审视语言行为和其他类型的交流行为，就是以政治的眼光来考察那些行为，将其政治化。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就是以这种方式而成为政治性的。例如，直到新近时期，对于许多社会里的民众而言，假定“外国人”、妇女、同性恋者、残障人要低人一等或是病人，就好像事实即是如此，这样的假定一直以来似乎是很自然的（而非政治性的）。但是，这类群体已开始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自己，并被他人如此看待。这样的政治化已侵蚀了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之间的边界。

这三种功能可以被视为诠释性的或生产性的，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政治诠释的策略——这是从如下意义来讲的，一位分析者可以这样来使用它们，或者作为一种假设，一位分析者可以将这样的功能归因于听众（无意识的）诠释策略。此外，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同样也是作为一种假设，即在于分析者可以将它们归因于言说者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进行连贯一致的话语生产时所使用的策略。

这些策略是如何经由语言的选择而实施的呢？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对语言细节的细致的参与式分析来回答。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点，我们关心的不是文本结构、句法和词汇本身，而是将它们作为言说者和听众积极生产复杂而多样的意义的手段来理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兴趣在于遣词造句，因为它们被赋予了与我们的背景知识和价值观相一致的意义，鉴于我们作者和你们读者所栖息的英语政治文化。它还意味着，尽管准确和严谨的语言描述很重要，但政治话语分析是一项分析者参与其中的活动。【313】

诚然，何谓"政治的"取决于参与者，但社会一般会将通过不同类型的文本聚丛和谈话形式而传播的话语制度化。这样的聚丛可以从两方面检视：组成第一个聚丛群的是讨论政治思想、信念和一个社会或其中一部分的实践的文本（文本生产者不一定就只是政治家）。严格地讲，这是"元政治话语"（metapolitical discourse）。第二个聚丛群包括那些在提升——或者用政治术语来讲，构成——一个（或多或少一致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共同体或群体或党派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的文本。这样的文本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是构成和维系整个政体的机构，或者它们（也）可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运转，比如说一个政治党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个人层面上。在这第二个群组中，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家—内部（国内）话语与国家—之间（对外政策和外交）话语；对内的—政治话语（政治家们内部间的对话、规划、决策等）与对外的—政治（政治家与公众沟通）。不同形式的文本和对话与这些不同的话语区分相对应。

15.4.2 语言学层面

在将策略功能与文本和谈话的语言学分析联系起来时，语言的所有层次和方面都需要牢记在心。政治话语分析者需要参考如下几点：

◎语用学（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
◎语义学（意义，词汇结构）；
◎句法（句子的内部组织）。[2]

政治话语分析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将这些层面上细节性的语言选择与政治诠释的三大范畴也即我们所指的"策略功能"联系起来。

考察语言选择的政治功能作用有两条路径。首先是从一般性的语言学层次入手，探问一般性问题，如由降调、被动句法、反义词或者话语中预设的意义等所实现的通常是什么策略功能？这样的问题要借助于一个人的语言（及政治文化）知识，同时也可以是对文本和谈话实例的经验调查（当然要具备语言和文化的相关知识）的目标。【314】

其次，可以从文本和转录本入手，利用一个人对语言和政治文化的理解，以厘清语言选择

与策略功能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应的问题只是任何公民在时间和反思能力的理想条件下可能要询问的："为什么 X 选择（或者为什么 X 被迫）使用如此之类的一个发音 / 语调 / 措辞 / 造句 / 文本类型而不是其他某种可能的替代呢？"

15.5 分析政治文本和谈话：一个示例

本章节我们对一段转录文本的分析择取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这段文本取自于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一次演讲。在分析这段文本时，我们从微小的语言学细节入手，探询的问题是："在较为广义的政治文化和较为狭义的政治语境下，可以从哪些方面将演讲者的语言选择诠释为功能性的政治策略方式？"这里无法对所有相关现象予以直接评论，特别是那些在意义上重要的间接现象只能粗略带过了。

这段演讲是梅杰于1994年10月14日在英格兰伯恩茅斯召开的第11届保守党大会上发表的。[3]这些年度党会属于国内事件，因此其主要听众是全英国国民，特别是忠实的党派成员。保守党大会是在新任改革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大会召开后不久。从其经济和社会政策来看，工党在此前的十年期间已在意识形态上转向政治右倾，这种转向迹象体现在工党的一系列措施上，诸如接受公共产业的私有化，并在工党大会自身内部限制工会联盟等。西方政治党派的意识形态融合已成为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早期共产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之后的标记。托尼的这次大会在此被视作对这一转变了的大背景的一种反应，而在较为狭义的语境下则被视为国内政治发展中的"宏大对话"的一次转向。

15.5.1 语用学

15.5.1.1 语言作为行动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已显示出谈话管理的微妙之处。参与者有轮次以及各种说话和打断的权利，这取决于会话类型和他们自身的地位。在面对面互动中强行或被要求的这种说话或聆听的权利或义务，以及安排这些权利或义务的方式，都表明了日常语言中的政治维度。对何为"政治的"更常见的想法，是将说或听的权利和义务理解为一种分布，提供指令或遵从，制定规则或遵守规则，传播或作为一个听众，诸如此类。更为一般地来讲，可以根据其话语控制的特有手段来思考民主和极权制度。从城市国家到大型的现代国家，是政治"会话"的系统性界定了政体的性质。

【315】

谈话的语言细节远非是偶然生成的，而是精心组织而成的，并在管理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潜在的政治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假定在某一特定情境或目的下，一个轮次的谈话得到的反应或被标记或不被标记，或"被看好"或"不被看好"。言语行为（提议、指令、许可等）可能被理解为对谈话参与者之一或对方的威胁（"危及面子的行为"），会以各种语言的方式得以缓解或掩盖，包括委婉语、辩解（"说明"）、诉诸共同利益、诉诸权威，等等。即使是在一段谈话或文本显然是独白时，也通常会涉及隐含的对话结构，反映出周围政治文化的对立性

话语。[4]

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对于政治话语分析很关键，因为它消解了语言和行为相分离的这一日常观念。在对言语行为进行归类的诸多努力中，瑟尔（Searle, 1969）做了如下有用的区分，**表征式**（representatives，声称真相）、**指令式**（directives，命令、要求）、**承诺式**（commissives，承诺、威胁）、**表达式**（expressives，赞扬、谴责）以及**宣告式**（declarations，宣布一项章程、宣布竞选、宣战）[1]。这种区分可以被认为是与政治话语具有直接相关性。言语行为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完成，也就是奥斯汀（Austin, 1962）和瑟尔（Searle, 1969）所称的"适切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事实上，这样的条件出现于体制安排，而且是无限开放的。具有政治相关性的言语行为也许包括了诸多复杂的条件，如言说者的权力或地位、机构位置、选举资产、所使用的语言风格以及其他诸多因素。

无论是交谈式对话还是言语行为，如果没有参与者分担特定的说和听的角色，就都无法发生，说和听的角色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角色"或者"地点"或者"位置"相关。你也许"被定位"为某个言说、下指令、给予建议或提供"事实"的人；或者，你也许"被定位"为某个倾听、接收指令、听取建议或接受"事实"的人。政治话语分析者常常发现，代词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提供了展示隐含于话语中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某种地图。[5]

15.5.1.2 领导者与其他主体

在我们的文本样例中，演讲者约翰·梅杰参与（并再生产）了一种类型（genre），这种类型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构成了非常特殊的关系。这在两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在演讲者、听众和第三方"旁听者"或观察者之间存在着系列关系；而另一方面，在他的政治领域中也有着一组政治行动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演讲者提及他们或以他们为前提，尽管演讲不一定针对他们。这些关系最为明显地以代词为中介，这些代词描画出人和群体各就其位的社会或政治"空间"。【316】

在英语资源中，正是像**我**、**你**、**我们**、**他们**（及其变体）这样的代词具有生成一个说者、听者和其他人被"定位"的社会和政治"空间"的特殊功能。"**我**"（I、me、my）以及"**我们**"（we、our）等代词出现的简单频次可以是指标性的：I 出现 112 次，my/me35 次，we125 次，our45 次。

演讲的主要对象是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我可以告诉会议这个"，"我将告诉你为什么"。这样显然多余的形式具有什么功能呢？除了单纯让听众准备聚精会神于一段特殊的讲话外，它们同时也将演讲者定义为一个信息或者知识的权威来源，并将（可能是批判性的）听众界定为服从的、不了解情况的、而且是无知的（"我想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准确地知道已确立的医院项目……有多少……我有最新的简报"，"我知道"，"我明白"）。这些话**迫使**听众承担了某种交流角色和政治角色，而且它们将演讲者的合法性予以**合法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假定演讲者的合法性。当然，还有演讲所针对的对象，该党的成员，他们本来是批评性的（特别是在关于欧洲的辩论方面），原本是需要被说服以确信这位领导人的坚定性。因此需要开场白式的表达，以及这些表达可能具有的主动出击的言后效果。

在建立起领导者—被领导者、言说者—言说对象以及教导者—被教导者的关系时，梅杰的

1 参见第 8 章相关内容。——译者注

文本通过使“I”成为特定动词的主语，将他摆放在了特定的角色上。这些动词所属的语义领域与言说、感觉和行动相关联。也就是说，它们在话语中一方面将梅杰定位成真相的叙说者或信使，另一方面又将其定位为行动之人。于是，在梅杰的演讲中 25 次提及言说的行为，例如，“我只是想说”，“我来告诉你”，“我给你的信息”。这位政治家的角色几乎就是神谕似的；他是真相的保卫者、未来的预言家以及喜讯的捎带者：“让我来给你们些好消息。”言语行为包括对据称是其他人津津乐道的言说类型进行批评和谴责的权利：“小心不要将歪曲与真相相混淆。”它们还包括发出特定类型的言语行为的权力，恰如我们在下文要看到的。

首先，作为对其“优柔寡断”的批评的部分回应，梅杰的讲话中有 44 处表明决策、下令和行动的表达，例如，“我已让吉利安·谢菲尔德去……”，“我要求对……有个新的认识”，“我不会耽搁……但我用我自己的时间来处理”。有些行动将梅杰定位于一张地理方位图上，这些行动事关向历史危险之处运动和行进，而且是嵌入在微型叙事之中的：“我曾在华沙——那是 1939 年第一颗炸弹坠落的地方……我飞往柏林……我当时在南非……我对（南非）议会发表演说……我从南非飞往契克斯（Chequers）[1]……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是我的贵客。”

为了将保守党与其他党派区分开来，演讲者不得不假定或者制造出一种内部共识——对【317】某些概念、行动和关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有种集体性的理解。其必然结果是假定或者制造出外部意见分歧，这里指的是对手工党。此外，对于任何党派而言，而不特别是对保守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声称这种共识扩展至整个国家（尽管有些矛盾，因为全国性的意见分歧对于他们的立场定位也是必需的）。这在狭义和广义语境下都是一种**合法化功能**。政治家要将他们自己和他人在与他们的党派、政府、潜在的选民及其国家的关系中进行定位，其中一个主要方法是使用代词 we/us/our/ours（主格的 ***we***“我们” / 宾格的 ***us***“我们” / ***our***“我们的” / ***ours***“我们的”）。在日常的会话中，we（**我们**）通常包括说者和听者；在梅杰的讲话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话语中，we（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往往是开放性的，可以对其预期所指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于是，“we”也许包括演讲者、大厅里的听众，以及可以想象的还有其他听者，认为他们自己是该党的成员或者支持者。它被赋予句首位置，或者是句法焦点，或者是（语音上的）重读。从语境上来说，它排除了工党（“they”，“them”，主格和宾格的“他们”），而且其关联的动词取自于关涉信念、冲突、道德正直和供给（为他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等方面的词汇领域。同样明显且与此段话语的其他意识形态要素相一致的是，财产和所有权的概念使用了所有格形式（“our”，等）。如下是样本之一（下划线原文即有）：

> <u>他们</u>一直以来有多错……而我们一直以来有多正确……是我们已经……我们已赢得了胜利……我们已击败了……<u>我们</u>是工会的党……他们是<u>我们</u>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阵地[而不是工党的]……让我来告诉他们我们所捍卫的是什么……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对手

然而，“我们”的所指可以重叠或者至少同时指涉其他两个群体。第一个所指是政府，在此语境中可以构想为在党内有反对者或异议者，由此，**我们**的独有意义显然是指政府，而有别于整个保守党听众，例如，“我们已听说……我们已改变主意”。“我们”可以指涉的第二个

[1] 位于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座庄园宅第，从 1921 年开始成为英国首相的官方乡间别墅。——译者注

群体是整个国家："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国家做得很好。"这句话接下来的各种**我们**的形式于是就有了不确定的意义，可以只是指保守党人，或者指这个国家，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指这个政府，或者这几种所指的任何组合。在这些实例中听众会将哪个类别进行概念化，这一点并不明确，但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国家"和"保守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为一个模糊不清的类别。于是梅杰继续说道："我们要持续重建复苏。"可是此时的这个代词转向了貌似合理的所指混合体——保守人，整个国家，或者某个与代词"one（人们）"相当的对等体，如下文所示：

> 我们[人们？保守党人？英国？]被告知，失业将持续增加……我们[保守党人？政府？英国？]被告知，我们[保守党人？政府？]不会降息。我们已经降了。

代词把对保守党人、政府和整个国家的指代混为一体，这种作用在对外政策领域特别明显，在对外政策方面工党的目标与国家利益不一致这一点具有间接意义。例如：

> 那是今天的英国。那么就让我们[听众，还是所有英国人？]来认识一下我们[英国人]是什么……将我们自己特别的英国标志[贴在世界之上]……[冷战期间]有和解人和调停者。但不在我们的[保守]党内。我们[保守党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在这个大厅内从未听过他们的声音[引发这样一个推论：不像工党大会，在那里，一些人为单边核裁军而争论]。

【318】

这样的话语显然不是简单的政策陈述，其主要功能是为了在公众对保守党的支持以及党内对领导人约翰·梅杰的支持都在下降的时候达到党内统一。这种定位可以被认为是不仅服务于**合法化功能**（legitimizing function），事关梅杰作为领导人在党内的权威，而且也服务于**去合法化功能**（delegitimizing function），因为它在群体之间划出边界，声称其中一方是正确的，而另一方却是错误的。

15.5.1.3 言语行为

言说者作为一个权威性的叙事者和信使，以及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者来定位，这一点很关键。[6]某些类型的言语行为如指令、要求、建议、警告、誓言、承诺等，只能在得到承认的权力基础上"恰如其分地"表现。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诸如对真实性、知识或一个准确的评价作出明确或含蓄的断言，则部分取决于是否能从经验上根据事件而被驳倒；但是许多不加掩饰的断言似乎仅仅基于言说者的权威，即算是"恰当得体"。我们来考虑一下上面提到的五种言语行为中的三种类型的作用，也即断定式、指令式和承诺式。

①**断定式**　英国保守党政策在此以简单的陈述和宣称呈现出来，往往是宣称实情。到目前为止使用最多的言语行为类型及其典型形式是："我们现在做得很好……英国正更多地制造、更多地销售、更多地出口。"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参照，特别是对于"制造"和"更多"这样的说法而言，那些听者无法判定。乍一看这似乎像是对格赖斯准则（Grice's maxims）[1]的一种公认藐视，但在实践中，处在这种情境下的受众会惯例性地容忍低度信息和证据：挑战或质疑不在目前游戏的规则之中，而且演讲者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在许多情况下断言就是"自夸"——这是成问题的，尽管它是政治修辞的本质之处，是必

1　又称为"格赖斯合作原则"，指会话中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倾向于合作、相互接受，从而以特定方式被理解。——译者注

须通过礼貌手段来加以回避或消解的，而且它也常常发挥着对夸大了的或过于一般化的断言的立场根据进行模糊化的功能。更重要的一点是：根据格赖斯原则，断言只有与背景前提联系起来才具有相关性，梅杰和他的听众相互了解工党话语中所做的这些前提。

②**指令式**　指令可能是最需要仰仗权力的，也是最明显的强制功能的语言实现。既然是这种类型，如果明确指令的实例出现在梅杰演讲中，那当然非常奇怪了。只有三个基本的祈使形式的小例子：一个是梅杰“下令”“轻轻低语”，一个是用反语来调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现在做得很好”这样的自夸，还有一个是祈使句“等一会儿”。最后一个是发给听众的一道指令，要求他们暂缓对一个有关医院供给的自夸作出反应——这是演讲者掌握会话轮次的控制权的一个例子，但也可被视为与听众的友好互动。在演讲中几乎立即随之而来的是其反面例子——一道发给工党健康部门发言人（当然是不在场）的假指令：“扔了它，布伦基特[1]！”其意图主要是说给现场听众的：一个强硬者抵抗其对手的一次虚拟表演。可以认为，这里的目的不仅仅是驳斥对保守党健康政策的批评，而且也是两党之间的对立和差异的一种表达。

【319】

尽管在此次演讲中并没有下达任何真正的命令，但能确定的是对指令的断然提及是针对部长们的。演讲中可能还有间接言语行为的例子，它们也许能被在场的听众接受，并要求他们在行为上做出一些行动或改变：“撤下这个标记的时候到了”，“让这个国家再一次提升它的视野的时候到了”，“加速这一趋势的时候到了”。对那些距离更远的听众来说，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并非为真：“学校……必须开放它们的设施”，“我不想议会廉价出售学校的体育场”。

与这些例子密切相关的是，梅杰话语中使用短语“let’s（让我们）”（不是“let us”，它请求许可而对诠释保持开放，就像他频繁使用的“let me（让我）”里的情形一样）的诸多言语行为：“那么让我们具有这种期待的勇气”，“那么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状态。怀有信心地去看这个新世界”。这里的否定形式是：“不要让我们愚弄自己。”这里指涉的过程是心理方面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受外部安排的影响。在此提及的这种言语行为可以被称作是一种“敦促”，它典型地是由领导者来使用的。

③**承诺式**　作出明确的承诺式（承诺、威胁、供给）通常需要极大的谨慎，尽管政客们确实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在做出承诺。这样的承诺一贯被认为是“空泛的”。那些具有最为明显的标识的承诺述行语（歪曲功能），也伴随有多种多样的语用推诿或语义模糊形式。例如：

> 由于我们正在推进持续改变学前教育的机会，我们将不得不阶段性地引入这个额外的规定。但是我今天要做的是给你们一个如铁般坚固的承诺，它**将会**发生。并且，我现在就要给你们这个承诺，这样吉尔·谢菲尔德就能在下周开始就此展开征询了。

“一个如铁般坚固的承诺”大概是想要做出再一次的保证，尽管听众们可能不会相信，因为这个短语是陈词滥调。此外，言说者也没有指出这样的“规定”可能具有的确切本质，强调的“将会”在事实上没有指出未来的一个准确时间，也没有说谢菲尔德将会做不只是“就此展开征询”的任何事情。[7]

承诺的反面是威胁（与警告接近），而且在政治话语中两者的界限是不稳固的，因为

1　英国工党前内政大臣。——译者注

这两个言语行为指涉的未来行动对某些听众来说是值得想望的，而对其他听众而言却不是。现在梅杰的演讲对象，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不仅仅是聚集起来的人群，还有其他中介化的听众，尤其是当时被残酷分离的北爱尔兰群体。那么，不同的潜在听众将会如何理解下面这段话？这是梅杰的一个言语行为，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梅杰在履行之前就把它传达出去。

> 但是，让我做出这个保证。时间尽其所需，警察和军队尽其所需，将会在北爱尔兰尽忠职守，保护所有的北爱尔兰人。

读者到现在已经能够识别出“尽其所需”这样一个推诿。人们也能够指出“保证”（某种“再保证”，也是某种承诺）的含糊不清。但是，这个有关驻军于北爱尔兰的承诺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值得向往的；相反，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不值得向往的。因此，这个“保证”是对“亲英派”的承诺，是对“独立派”和一些中间派别的威胁或警告。

15.5.2 语义学

15.5.2.1 字词与世界

语言里的词汇通常被认为是对真实世界的“中立”反映。但是，把他们看作是对真实的建构可能会更加准确，这种建构会反映一个言语社区的利益——或可能是一个社区里主导群体的利益。由于国家语言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复杂，[8]不同领域的活动（政府、宗教、司法、教育、官僚机构……）也将会使他们的词汇更加复杂。这些词汇通常可以在结构性的“词汇领域”方面作出描述。与这些词汇领域相关联的是认知“架构（schemata）”或“脚本（scripts）”，后者是有关物体和活动的知识基础（比如，“做一次交易”、“投票”等社会活动的脚本）。语言由话语历史性地组成，也不仅仅是一种在社会或政治上保持“中立”的资源。政治话语就是这样一种话语，它不独立于其他的话语，而是吸取、确证或调整它们。同一领域里、不同领域间的意义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相关联（语义关系）。有时，同一个单词会有不同的意义（“一词多义”），这取决于话语差别（例如，技术话语里的“权力资源”与政治话语里的“权力资源”）。反义关系是政治话语里的一种重要关系，它使言说者能够表达他们的反对立场，并划出界线（**合法化功能、去合法化功能**）。【320】

在政治意义的生产中，有一种关键的概念和语义机制就是隐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隐喻不只是一次性的“修辞炫耀（rhetorical flourishes）”，而是形成、传播有关现实的概念的认知机制，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存在问题。从互动的视角来看，隐喻使言说者能够避免直接的（威胁到面子的和过度揭露的）指涉。循环的隐喻嵌入在语言和文化之中，并同时依赖于人类的概念系统和文化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被选择以建构特定的话语，并象征性地再生产出这些系统。在政治话语里，人们会引用两个普遍的隐喻：**“辩论是战争”**（例如，敌对方的主张被击败了），一个将对立辩论建构为准自然战争状态的隐喻；**“国家是容器”**（比如，主管外事的部长对外国力量突破本国安全界线表示忧虑），它将地理和文化边界上的“主权”国家建构为国际关系的自然单位。[9]

15.5.3 市场营销的隐喻：一件真品

出现在约翰·梅杰演讲中的词汇领域，是从语言里范围更广的可获得的词汇领域中选择而来。就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政治和行政能够很好地实例化。同样的，**“论证是战争”**这个传统隐喻在这里出现了：“我们已经在观念的战场上获胜——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胜利。”当隐喻运用一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领域，并把它运用到另一个领域里，隐喻就发挥了作用。在梅杰的【321】演讲中，一个被频繁运用的领域就是市场经济的高度词汇化领域：这个领域隐喻性地建构在其他领域之上，且这一隐喻建构有若干个分支。以下摘录就是例证：

> 工党已做的就是研究我们的直觉和态度，然后走开，用市场去验证它们……但是，工党所做的一件事是对我们的语言进行重大盗窃[10]。工党说市场研究已经告诉他们人们想去倾听，这是一回事。但是，去递送它又是另外一回事……

> 从工党那里购买保守政策，就像在街角处购买一块劳力士表一样。它可能会有商标名称。但是，你知道它不是真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推销真品，并揭露赝品……对这个新的、在生物层面上更为先进的工党也是如此。它可能会冲洗得平淡无奇。但是，我想给它三年以下的保质期。

上例中标注出的词汇属于市场语义领域，且在事实上与一个结构性的脚本相对应（**市场→研究→推销→卖→递送**）。此外，“一块劳力士表”、“在街角处”等短语则依赖于有关经济价值、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赝品”等背景知识。对隐喻的理解，要求听众知晓、分享特定的价值。特定的理解结果将会随之而来。如果政治是市场营销，那么政策就是可以销售的商品，而从定义来看商品就是一种所有物的形式。

这个概念从与另一个隐喻链条相连接，后者对上述段落的连贯负有责任。由于政策是观念，观念被看作是和语言相同的事物，“政策是商品”推导出“语言是一种商品”——因此，梅杰说的是“我们的语言”，一种“属于”保守党的语言。这能够建构出一种反对工党的具有如下形式的论证：

①工党的语言是保守党的语言。
②语言是一种商品。
③商品为某人所独有。
④使用为其他人所有的商品，就是盗取那件商品。
⑤因此，使用保守党的语言就是盗取那种语言。

所有这一切不“仅仅是”隐喻。首先，对政策的商品化可能会被接受为是保守党话语里政治生活的一种“事实”，或者这个隐喻会让人们把它当作一个事实来讨论、记录和行动。其次，无论这是事实与否，即市场的本体论（和道义论），它的概念和潜在推论被听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熟悉的和自然的现实。在这个“根据”的基础上，隐喻能够形成且不被挑战。将自由市场模式当作一个前提，一个论证被建构出来，它将工党再现为做出违法行为，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党派。这种隐喻策略不仅是对基于假定中的“市场”本质的一种特定世界观进行确证（**合法化功能**），它也损坏了竞争对手的名誉（**去合法化功能**）。

【322】

表 15.1　话语与政治：保罗·奇尔顿和克里斯蒂娜·沙夫纳

	主语	动词	宾语	命题短语
（1）	政府	派	军队	到巴尔干
	施事者	原因、动作	客体（theme）	目标
（2）	军队	被派		由政府
				主语
	客体	原因、动作		到巴尔干
				目标
（3）	军队	被派		到巴尔干
	客体	原因、动作		目标
（4）	军队	去		巴尔干
	发起人（author，或施事者）	动作		目标

15.5.4　句法

15.5.4.1　施事和焦点

大多数的句法组织都与观念和交流功能相关，后者无法在一种语言词汇的词语内容中得到直接的显现，因此它不那么容易被感知到。

对于分析人员来说，研究政治话语句子组织的两个方面通常是有意义的：“论旨角色（thematic roles）”和“主题化（topicalization）”。与“论旨角色”相关的是，比如，谁（**施事者**）对谁（**受事者**）正在做什么（运动、影响、引发的**过程**等），在哪里（**处所**），为什么（**原因、目的**），以及用什么方式（**工具**）。言说者指派这些角色的方式可以被诠释为与政治世界的特殊表征相关，或与有关原因、施事和责任的断言相关。[11]思考一下表 15.1 中的案例，它们很简单，是假设的、缺乏语境的；但是，它们显示出语义角色的一些潜在意指。在这张表里，**客体**（theme）这个术语用来表示一个由施事者驱动的实体，**发起人**是一个看起来像施事者但不是行为的直接原因的实体。

句子结构与词汇成分的语义以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必须在知晓、假定有关主权国家政府权力的知识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比如，区分一下语法上的主语和宾语。人们可以说“阿尔夫派伯特到巴尔干”，也同样可以说“伯特派阿尔夫到巴尔干”；但是，“军队派政府到巴尔干”这个句子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语法的”。或者，人们也可以说它仍然符合语法，但语义角色的指派却是反常规的。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国家的主权包括了政府调派军队的权力。这种关系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含蓄表达（**歪曲功能**），尽管它对理解这个句子来说是必要的。表 15.1 中的句子（1）看似是以最为中立的句法形式，对这种关系作了最为清楚的表达。（2）和（3）两个被动句把同一种关系表达得更加间接（在这一语境里，尽管结尾的肯定句做了特殊的强调）。但是，英语里的被动结构能够省略针对施事者的公开指涉，就像句子（3）。句子（4）里的“军队”可以被含蓄地理解为是他们自身行为的施事者，这与背景知识相反；虽然这个句子的原因和施事可以得到理解，但是两者都没有被**公开**表达。所以，一个事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句法组织形式。

【323】

与句子结构的第二个维度相关的是，言说者希望将什么意指为进行中的话语世界里的“话题”，以及他或她希望将什么呈现为“新信息”。“话题”一般是英语句子里的首要因素，而“新信息”则一般读重音或被置于句尾。句子里的词语顺序与声调、重音相互动，使言说者能够选择性地关注政治世界里的某些因素，并以这种方式去限制听众在现实时间里的处理。

如上句法选择具有的政治功能将会根据语境而变化；但这一点是清楚的，比如说，句子（1）在声称名誉或指派责难时可能会被使用，根据言说者是否为政府自身（**合法化、去合法化功能**）。

15.5.5 变化的施事者

有关短时稳定性的概念也被编码进入基础性的语法范畴里：名词一般指涉更为静态的、不分时间的、独立的现象；动词则一般指涉短暂的、与时间相关的、动态的现象。在对引发行为的施事者进行编码时，英语言说者有特定的选择。

传统保守党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围绕 change（改变、变化）这个概念展开的。这种意识形态反对改变现状、推行事先已形成的模式的计划性尝试。然而，保守主义更为新近的形式没有反对某些形式的改变，并把他们自己表现为动态的。对一个保守党言说者来说，其话语难题就是调和变化与传统、运动与稳定之间的对立。

让我们来看看梅杰的演讲对动词 change（改变、变化）的使用，对比一下它的不及物性使用（没有施事 agency）、及物性使用（有一个作为原因的施事者），以及衍生的名词形式（至少是在这个具体语境下，施事和作为原因的施事者都没有被**明确地**表达）：

【324】 **不及物（没有施事）**

政治图景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然改变，并且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再度改变……英国已然改变了。
涉外事务：这个世界已然改变了……
希望之花已然盛开，这个世界已然改变了…… [12]
事情正在变化中［指的是北爱尔兰］……

及物（施事被提及）

……是我们改变了政治的整个核心，并让它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行……
如果我们要改变气候以对抗犯罪……
我们必须改变态度……
莱奇·威尔萨，一个协助改变历史的造船厂工人……

衍生的名词形式

那就是我们的改变所具有的全部意义……
在近些年的课程变化之后，教师们应该得到稳定……
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真的了不起……
哈罗德·麦克米伦谈到这股变化之风……
有关变化的四张印象快照……

对那些可能伤害英国的变化，我只会说“不”……
为了变化的变化将永远不会吸引任何一个保守党人……
在一个充满令人迷惑的变化的世界里，这个政党必须维护持续和稳定、家庭和健康……

如上变化词语的出现的组织模式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其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可以发现，对施事进行及物性表达的频率比其他两种要低得多。同时，及物性表达有多种限制方式（对照上文“如果（if）”的使用）。其中一个及物性表达指涉的是波兰的领导者，有趣的是采用了准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1]；而另一个及物性表达指涉的是保守党在教育政策方面的变化。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对梅杰来说，尽管对其目的、责任和行动做出声称是很重要的，但是避免“干涉主义者”这一指控也同等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保守党领袖要维持一种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假设：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是不值得的。还有一个假设能够解释不及物性的流行和衍生名词形式的使用：存在一个“自然”的事物次序和一个“自然”的事件过程。因此，不及物结构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世界的变化是独立发生的，它也使避免复杂而有争议的议题方面的指责和责任成为可能。衍生的名词形式，就像读者能够核实的那样，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变化自己“发生”），或者让保守党的政策更为间接、不具体，同时对名誉进行声称（“我们的改变”）。这些语法选择具有的功能可以被诠释为自我合法化，也结合了歪曲的功能。然而，我们不能夸大使用衍生名词形式的重要性。在绝大多数的案例里，尽管小句中并没有明确地指涉施事者，但是读者或听众极有可能会从共文或语境中推断出这一指涉，并且也不存在合理的、可论证的意识形态动机。

15.6 结　语

【325】

通过展示文本中所做的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等方面的一些选择，如上所述的分析让我们有意识地考虑到文本建构的概念世界，以及言说者与其他人在文本的实际言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可是在概念层次上，这样的分析能够根据议题和意识形态假设表明一个政治行动者（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当下关注之所在，这些意识形态假设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为了表达而被选择。在相互作用的层次上，这种分析展示了文本之*所为*——文本所假设或生产出的诸如领导人与会议、保守党与公众、保守党与对立者、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等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和政治位置及关系。

总之，此段文本样本的分析说明了在诠释上将语用学、语义学和句法等层面的语言细节与政治策略功能如强制与抵抗、合法化与去合法化、再现与歪曲等联系起来的程序。我们提出“策略功能”这一概念，特别是我们所标注的三种“功能”，纯粹以假设的方式。我们的主张是，这些策略是由言说者——就如一个在政治和文化语境中的社会行动者——通过语言选择来实现的。这一假设由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经验来评价。

1　是指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组建团结工会，成为波兰第一位民主选举总统。——译者注

注 释

[1] 在本章的第一版本（Chilton and Schäffner，1997）中，我们区分了四种策略功能。奇尔顿（Chilton，2004）将四种缩减为三种，也即这里提出的三种。有关功能的文献，参阅 Jakobson，1960，Halliday，1973；关于“策略的”，参阅 Habermas (1979; 1981)。在此强调一点很重要，即我们不是在提议将“合法化”和其他功能纳入至一种普适性的语言结构中（参阅 Chilton，2004：45）。

[2] 因篇幅原因，语音学和音系学在此不作讨论，尽管政治话语分析的重要一点是，一般要考虑 a. 发表演说的语音资源（停顿、重音、音量、音高等）以及 b. 特殊口音的地区和阶层相关性，由此对政体的社会和地理结构进行再生产。

[3] 此处所用的转录文本是由保守党中央办事处保守党新闻办发布的官方文本（该演讲可以从如下网站获得：http://www.totalpolitics.com/speeches/speech.php?id=254）。

[4] 是沃罗斯洛夫（Volosinov，1973）指出这一点。

[5] 参阅阿尔都塞的“召唤（interpellation）”这一概念（Althusser，1970）。

[6] 这样的权威当然也是由于在演讲的特殊情境界定下演讲者同时承担的不同角色而确立的（不单单是作为人的约翰·梅杰，而且也是首相、保守党领导人、大会演讲者）。

[7] 事实证明，在 1995 年的夏天，保守党政府对学前教育宣布一个有争议的“学券”计划。

[8] 参阅 Haugen (1966)。

[9] 有关对政治话语中隐喻的研究，参见如 Chilton，1985a；1996；Chilton and Lakoff，1995；Lakoff and Johnson，1980；Schäffner，1991，以及政治科学研究者视野下的研究 Opp de Hipt，1987。

[10] “重大盗窃”被《牛津英语词典（OED）》定义为对“价值超过 12 便士……的所有物”进行的偷盗。

[11] 关于论旨角色的指派与政治世界的表征，参阅 Hodge and Kress，1993；Kress and Trew，1978；van Dijk，1995。

[12] 在有关涉外事务的部分，“世界已然改变了”这个句式被使用了三次。

延伸阅读

Charaudeau, P. (2005) *Le Discours politique*. Paris: Vuibert.

这本书代表了法国学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丰富的政治话语研究的重要趋势。基于分析话语的路径之一，该书借助传统的修辞分析聚焦于民主公共空间里所利用的“话语策略”。它还介绍了与现代政治话语相关的一个关键要素，强调在公共传播中需要一种新的话语道德。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此书为研究语言和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利用语言学理论框架，作者以国际政治的各种话语类型（访谈、演讲、议会语言等）来说明，呈现了政治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论框架。此书为深入了解政治话语的认知和行为效果提供了洞见。

Klein, J. (ed) (1989) *Politische Semantik.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Sprachverwend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此书说明了语言在政治辩论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德国。此书认为，负载意识形态的词语是政治影响的工具，在政治争论中发挥武器的作用，因此竞争激烈。书中展示了政治概念包含了（隐蔽的）论证结构。利用（词汇）语义学和论证理论，此书还描述了“为词语而战”的类型。

Lakoff, G. (2008) *The Political Mind: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Century American Politics with an 18th-Century Brai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此书反映了由拉克夫从认知科学、语言学和社会学里借用并应用于美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的几种流行理论。此书提出了一些有力而引起争议的主张，试图基于脑科学来理解政治行为，考察了何谓欧洲传统中更为常指的“话语”或“意识形态”。

在线阅读

如下文章可以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获取。

Bhatia, A. (2006)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 Society*, 17: 173-203.

Chilton, P. (1990) 'Politeness, politics and democracy', *Discourse & Society*, 1(2): 201-24.

Lu, X. (1999) 'An ideological/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Discourse & Society*, 10: 487-508.

Schäffner, C. and Porsch, P. (1993). Meeting the challenge on the path to democracy: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governmental declara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4: 33-55.

van Dijk, T. A. (1994).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5: 163-64.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6: 243-89.

Wilson, J. (1991). 'The linguistic pragmatics of terrorist acts', *Discourse & Society*, 1: 29-45.

参考文献

Achard, P. (1995) 'Formation discursive, diologisme et sociologie', *Languages*, *117*: 82-95.

Althusser, L. (1970)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Amossy, R. (2000) *L'argumentation dans le discours. Discours politique, littérature d'idées, fiction*. Paris: Nathan.

Atkinson, M. (1984) *Our Masters' Voices*. London: Methuen.

Austin, J.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The William James Lectures, 1955). Oxford: Clarendon.

Ball, T., Farr, J. and Hanson, R. L. (1989)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yley, P. (ed.) (2004)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Parliamentary Discours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Benveniste, E. (1966/1974)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 vols). Paris: Gallimard.

Bhatia, A. (2006)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political press conferences'. *Discourse & Society*, *17*(2): 173-203.

Blommaert, J. and Verschueren, J. (1991) 'The Pragmatics of minority politics in Belgium'. *Language in Society*, *20*: 503-31.

Blommaert, J. and Verschueren, J. (1993) 'The rhetoric of tolerance, or what police officers are taught about migrant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14*(1): 49-63.

Bolinger, D. (1980) *Language-The Loaded Weapon: The Use and Abuse of Language Today*.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Bonnafous, S. and Tournier, M. (1995) 'Analyse du discours, lexocométrie, communication et politique', *Languages*, *117*: 67-81.

Brown, P. and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khardt, A. and Fritzsche, K.P. (eds) (1992) *Sprache im Umbruch: Politischer Sprachwandel im Zeichen von 'Wende' und 'Vereinigung'*. Berlin: de Gruyter.

Burkhardt, A. and Pape, K. (eds) (2000) *Sprache des deutschen Parlamentarismus* (Studien zu 150 Jahren parlamentarischer Kommunikation).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Burkhardt, A. and Pape, K. (eds) (2003) *Politik, Sprache und Glaubwürdigkeit.*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Burkhardt, A., Hebel, F. and Hoberg, R. (eds) (1989) *Sprache zwischen Militär und Frieden: Aufrüstung der Begriffe?* Tübingen: Narr.

Cap, P. (2002) *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Methodolog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Verlag.

Cap, P. (2006) *Legitimisa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US War Rhetori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Céditec http://www.univ-paris12.fr/www/labos/ceditec/

Chareaudeau, 2005; Charaudeau, P. (2005) *Le discours politique. Les masques du pouvoir*. Paris: Vuibert.

Charteris-Black, J. (2004)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Charteris-Black, J. (2005) *Politicians and Rhetoric: The Persuasive Power of Metaphor*. Basingstoke: Palgrave.

Chilton, P. (1985a) 'Words, discourse and metaphors: the meanings of *deter, deterrent and deterrence*', in P. Chilton (ed.), *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 (pp.103-27). London: Pinter.

Chilton, P. (ed.) (1985b) *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 Nukespeak Today*. London: Pinter.

Chilton, P. (1990) 'Politeness and politics', *Discourse and Society*, *1*(2): 201-24.

Chilton, P. (1996) *Security Metaphors: Cold War Discourse from Containment to Common House*. New York: Peter Lang.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ilton, P. and Lakoff, G. (1995) 'Foreign policy by metaphor'. In C. Schäffner and A.Wenden (eds), *Language and Peace* (pp.37-59). Aldershot: Dartmouth.

Chilton, P. and Schäffner, C. (1997) 'Discourse and politics'. In van Dijk, T.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2: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pp.206-30). London: Sage.

Chomsky, N. (1988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propaganda system'. In N. Chomsky (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pp.662-97). Montreal: Black Rose.

Chomsky, N. (1988b) 'Politics and language'. In N. Chomsky(ed.), *Language and Politics* (pp.610-31). Montreal: Black Rose.

Connolly, W. (1974)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Lexington*, MA: D.C. Heath.

Der Derian, J. and Shapiro, M.J. (1989) *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Dieckmann, W. (1969) *Sprache in der Politik: Einführung in die Pragmatik und Semantik der politischen Sprache*. Heidelberg: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bücher.

Dieckmann, W. (1981) *Politische Sprache: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Diekmannshenke, H. J. and Meissner, I. (2001)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im historischen Wandel*, Tübingen: Stauffenburg.

Distelberger, T., De Cillia, R. and Wodak, R. (2009) 'Osterreichische Identitaten in politischen Gedenkreden des Jubilaumsjahres 2005'. In *Gedenken im 'Gedankenjahr': zur diskursiven Konstruktion österreichischer Identitäten im Jubiläumsjahr 2005* (pp. 29-78). Innsbruck: Studien Verlag.

Dörner, A. and Vogt, L. (eds) (1995) *Sprache des Parlaments und Semiotik der Demokrati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in der Moderne*).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Dörner, A. and Vogt, L. (eds) (2002) *Wahl-Kämpfe: Betrachtungen über ein Demokratisches Ritual*.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Edelman, M. (1964)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Edelman, M . (1971)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Ehlich, K . (ed.) (1989) *Sprache im Fasch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Ensink, T. and Sauer, C. (eds) (2003) *The Art of*

Commemoration (Discourse Approaches to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2000)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2007) 'The contribu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research on social change'. In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London: Peter Lang.

Fetzer, A. and Lauerbach, G. (2007)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Medi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Fiala, P. (1994) 'L'interprétation en lexicométrie', *Langue fran*ξ*aise, 103*: 113-22.

Fiala, P. and Ebel, M. (1983) 'Sous le consensus, la xénophobie'. *Paroles, arguments, contextes (1971-1981)*. Lausanne: ISP.

Foucault, M.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Gallimard.

Fowler, R., Hodge, B., Kress, G. and Trew, T.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allie, W.B. (1956)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 *56* (1955-6), 167-198.

Goatly, A. (2007) *Washing the Brain: Metaphor and Hidden Ideolog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raber, D.A. (1976) *Verbal Behaviour and Politic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rewenig, A. (ed.) (1993) *Inszenierte Information. Politik und Strateg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n Medi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Groupe de Saint-Cloud. (1982) *La parole syndicale: Etude du vocabulaire confédéral des centrales ouvrières fran*ξ*aises (1971-1976)*.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Groupe de Saint-Cloud. (1995) *Présidentielle: Regards sur les discours télévisés*. Paris: INA-Nathan.

Habermas, J.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Suhrkamp.

Halliday, M.A.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Haugen, E. (1966) 'Dialect, language, n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 922-35.

Heringer, H.J. (1990) *'Ich gebe Ihnen mein Ehrenwort': Politik, Sprache, Moral*. (Beck'sche Reihe BSR 425). München: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Hodge, R. and Kress, G. (1993) *Language as Ideology*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lly, W. (1990) *Politikersprache: Inszenierung und Rollenkonflikte im informellen Sprachhandeln eines Bundestagsabgeordneten*. Berlin: de Gruyter.

Holly, W. (1996) 'Die sozialdemokratischen Bundeskanzler an das Volk. Die Ansprachen von Brandt und Schmidt zum Jahreswechsel'. In K. Böke, M. Jung and M.Wengeler, (eds), *öffentlicher Sprachgebrauch* (pp. 315-29).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Ilie, C. (1994)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A Pragmatic Study of English Rhetorical Questions as Discursive and Argumentative Acts*.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Ilie, C. (ed.) (2010) *European Parliaments Under Scrutiny.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Interaction Practices*.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Inghilleri, M. (2005) 'Mediating zones of uncertainty: interpreter agency, the interpreting habitus and political asylum adjudication. *The Translator, 11*(1): 69-85.

Jaeger, S. and Halm, D. (eds) (2007) *Mediale Barrieren? Rassismus als Integrationshindernis*. Münster: Unrast.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pp. 350-77) Cambridge, MA and New York: MIT press and Wiley.

Jarren, O., Sarcinelli, U. and Saxer, U. (eds.) (1998)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in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 Ein Handbuch*.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Klein, J. (ed.) (1989) *Politische Semantik: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Sprachverwend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Klemperer, V. (1975) *LTI: Notizbuch eine Philoogen*. Leipzig: Reclam.

Krebs, B.-N. (1993) *Sprachhandlung und Sprachwirkung: Untersuchungen zur Rhetorik, Sprachkritik und zum Fall Jenninger*.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Kress, G.R. and Trew, A.A. (1978)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 or how the *Sunday Times* got its message acro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311-29.

Krzyzanowski, M. and Oberhuber, F. (2007) *(Un)doing Europ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Negotiating the EU Constitution*. London: Peter Lang.

Krzyzanowski, M. and Wodak, R. (2008)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Debating Migration in Austri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Lakoff, G. (1996) *Moral Politics: What Conservatives Know That Liberals Do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2004)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The Essential Guide for Progressives*.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Lakoff, G. (2008) *The Political Mind: Why You Can't Understand 21st-Century American Politics with an 18th-Century Brai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sswell, H.D., Leites, N., et al. (1949) *Languag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e Bart, C. (1998) *Le discours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Leites, N. (1963) *A Study of Bolsherism*. Glencoe, Il: Free.

Lerchner, G. (ed.) (1992) *Sprachgebrauch im Wandel. Anmerkungen zur Kommunikationskultur in der DDR vor und nach der Wend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Lewis, Sir G. (1898) *Remarks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Terms*. Oxford: Clarendon.

Liedtke, F., Wengeler, M. and Böke, K. (eds) (1991) *Begriffe Besetzen: Strategien des Sprachgebrauchs in der Politik*.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Lu, X. (1999) 'An ideological/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slogans in Communist China', *Discourse & Society*, *10*(4): 487-508.

Lukes, S. (1975) *Power: A Radical View*,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Matouschek, B., Januschek, F. and Wodak, R. (1995) *Notwendige Maßnahmen gegen Fremde? Genese und Formen von rassistischen Diskursen der Differenz*.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Mayaffre, D. (2000) *Le poids des mots: Le discours de gauche et de droite dans l'entre-deux-guerres. Maurice Thorez, Léon Blum, Pierre-Etienne Flandin et André Tardieu(1928-1939)*. Paris: Honoré Champion.

Mayaffre, D. (2004) *Paroles de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 (1995-2003) et le discours presidential sous la Veme Républiqu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Millar, S. and Wilson, J. (eds) (2007) 'The discourse of Europe: talk and text in everyday life'. *Discourse Approaches to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2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untigl, P., Weiss, G. and Wodak, R. (2000) *European Union Discourses on Un/employ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mployment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usolff, A. (2004) *Metapho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Debates about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Opp de Hipt, M. (1987) *Denkbilder in der Politik: Der Staat in der Sprache von CDU und SPD*. Westdeutscher Verlag: Opladen.

Orwell, G. (1949)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Signet.

Osgood, Ch. E . (1971) 'Conservative words and radical sentences in the semant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G. Abcarian and J.W. Soule (eds),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olumbus, OH: Merrill.

Patzelt, W.J. (1995) 'Politiker und ihre Sprache'. In A. Dörner and L. Vogt (eds), *Sprache des Parlaments und Semiotik der Demokrati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in der Moderne* (pp.17-53).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Pêcheux, M. (1975)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linguistique, sémantique , philosophie*. Paris: Maspéro.

Pêcheux, M. (1990) *L'inquiétude du discours: Textes 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Denise Maldidier*. Paris: Editions des Cendres.

Pörksen, B. (2000) *Die Konstruktion von Feindbildern: Zum Sprachgebrauch in neonazistischen Medien*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Reiher, R. and Läzer, R. (eds) (1993) *Wer spricht das wahre Deutsch? Erkundungen zur Sprache im vereinigten Deutschland*. Berlin: Aufbau.

Richardson, K. (1985) 'Pragmatics of speeches against the peace movement in Britain: a case study'. In P. Chilton (ed.), *Language and the Nuclear Arms Debate: Nukespeak Today* (pp. 23-44). London: Pinter.

Roth, K. S. and Wienen, M. (eds) (2008) *Diskursmauern Aktuelle Aspekte der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 zwischen Ost und West Diskursmauern*.

Sartori, G. (1984)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rmatic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Sauer, C. (1995) 'Sprachwissenschaft und NS-Faschismus. Lehren aus der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Erforschung des Sprachgebrauchs deutscher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Propagandisten für den mittel- und osteuropäischen Umbruch?' In K. Steinke (ed.), *Die Sprache der Diktaturen und Diktatoren* (pp.9-96) Heidelberg: Carl Winter Universitätsverlag.

Schäffner, C. (1991) 'Zur rolle von metaphern für die interpretation der auBersprachlichen wirklichkeit'. *Folia Linguistica*, *25*(1-2): 75-90.

Schäffner, C (ed.) (1997) *Analysing Political Speech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Schäffner, C. (2004)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3*(1):117-50.

Schäffner, C. (2007) 'Politics and translation". In P. Kuhiwczak and K.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37-47).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Schäffner, C. and Porsch, P. (1993) 'Meeting the challenge on the path to democracy: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governmental declarations'. *Discourse & Society*, *4*(1): 33-55.

Schmidt, W. (1969) 'Zur Ideologiegebundenheit der politischen Lexik'. *Zeitschrift für Phonetik, Sprachwissenschaft und Kommunikationsforschung*, *22*(3): 255-71.

Searle, J. (1969)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mino, E. (2008) *Metaphor in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M.J. (1981) *Language and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M.J. (ed.) (1984) *Language and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Sucharowski, W. (ed.) (1985) *Gesprächsforschung im Vergleich: Analysen zur Bonner Runde nach der Hessenwahl*. Tübingen: Niemeyer.

Tetlock, P. (1985) 'Integrative complexit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rhetoric: a time-series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6): 156-85.

TEXTOPOL-available at http://textopol.free.fr/

van Dijk, T.A. (1980) *Macrostructur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Global Structur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and Cogni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van Dijk, T. A. (1985)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Berlin: de Gruyter.

van Dijk, T. A. (1987) *News Analysis.* Hillsdale, NJ: Erlbaum.

van Dijk, T. A. (1989) 'Structures of discourse and structures of power'. In J. A.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2* (pp.18-59).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Dijk, T. A. (1994)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5*(2): 163-64.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6*(2): 243-89.

van Dijk, T. A. (1997)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acism: Describing others in Western parliaments'. In S. H. Riggins (ed.),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pp.31-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 Dijk, T. A. (2002)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In P.A. Chilton and C. Schäffner (eds), *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 (pp. 204-36). Amsterdam: Benjamins.

van Dijk, T. A. (2005) 'War rhetoric of a little ally: political implicatures of Aznar's legitimization of the war in Iraq'.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4* (1): 65-92. (Special issue 'The Soft power of War: Legitimacy and community in Iraq war discourses', edited by Lilie Chouliaraki.)

Volosinov, V.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J. (1990)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Oxford: Blackwell.

Wilson, J. (1991) 'The linguistic pragmatics of terrorist acts', *Discourse and Society*, *1*(2): 29-45.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 G.E.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Wodak, R. (ed.) (1989)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Wodak, R. and Menz, F. (eds) (1990) *Sprache in der Politik-Politik in der Sprache: Analysen zum öffentlichen Sprachgebrauch*. Klagenfurt: Drava.

Wodak, R. and Krzyzanowski, M. (2008) 'Migration und rassismus in österreich'. In *Rassismus: Beiträge zu einem vielgesichtigen Phänomen* (pp. 257-79). Wien: Mandelbaum.

话语与文化 16

Discourse and Culture

⊙ 伊丽莎白·基廷　亚历山德罗·杜兰蒂

这一章的论述，我们从一个假定开始：人类话语是一种资源，语言使用者运用这种资源来确定他们是谁、他们反对什么，以及什么是人生中值得追求的东西。换言之，正是话语让人类文化得以形成，且具有独特性。事实上，我们使用“话语”和“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意识到每一个术语含义的模糊性和潜在冲突性，就像它们各自的发展历史所呈现的那样。有关“话语”的研究是从 1970 年代才流行起来的。这种流行是对正规语言学家从“语言”视角开展叙事研究的一种回应，也成为检验语言单元的意义的一种方法。研究者认为，与单独的句子相比，语言单元有更广泛、更复杂的意义。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话语”也成为了一个能够涵盖语言之外的其他现象的术语。甚至在有些时候，“话语”意味着“思维方式”或“行事方式”等更为一般的概念。“文化”这个术语也是模糊的，并在 1980 年代遭到了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文化”这个术语被狭隘地或专门地用于描述世界上非西方的存在方式。在这种理解下，文化就像“口音”一样，我们只能通过外来者的言语去感知它，而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言语。除了这种批评外，绝大多数最初受到反殖民主义、反本质主义立场影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是继续使用“文化”这个术语（或至少是“文化的”这个形容词）。因为，他们难以找到一个替代性术语，用来描述“文化”所能够描述的东西。与我们的同行一起，我们也从对话语含义、文化含义的批评性讨论中有所获益，这其中包括，对我们关于其他人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书写，我们能够更加敏锐地理解其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们对这些术语的使用尽可能清晰。有关“话语”、“文化”及相关术语的更加完整的讨论，我们建议读者去查阅参考文献。

在一个世纪之前，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对人类行为的多样性进行谨慎的、详尽的记录。但是，近年来，人类学家转而关注那些有关跨文化传播中的复杂性、冲突和令人迷惑的失败的指导性内容。影响这种兴趣转变的是，研究者意识到人们生活在一个多样性逐渐增加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里，而那些能够维持、解释这些环境的话语需要得到谨慎的记录和分析。

同时，人类学对语言的理解在过去的 50 年里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语言不仅是一个表达思想、表征人类行为和目标的符号系统；而且，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即预先设定人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并赋予这些存在方式以独特性的一种行为形式。正是从这一点来看，“话语”这个术语比“文化”更加有用。例如，就像在会话式的叙事活动中所实现的那样，借助话语、集

体和个体的过去能够与现在和未来相连接。同时，说话者能够进入他们从未直接经验的世界。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表现认同的方式，并对其他人的道德特征、智识、社会阶层、个性、专业技术，甚至是意图作出评价。说者和听者对这些以语言为中介的、由语言构成的行为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通常无法看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在学校里习得一种语言之后，我们在走进使用这种语言的社区时常常会发现，语法书本和课堂练习遗漏了一些能够让我们合格、流利地使用这种语言的关键部分。当我们使用新的语言技能时，我们发现语言**使用**的很多方面是我们没有学习过的。并且，在我们的言语中，这些方面的缺失会严重地影响其他人对我们社会能力的认识。

通过接触会话、政治演讲、仪式、历史叙述、诗歌，以及报纸、电视、电影等媒体，我们持续不断地体验着言说方式与人们在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联。在提供有关话语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模式时，我们将会呈现这方面的案例。同时，我们会关注下列问题：关于个人的范畴被话语建构的动态方式，改变语言或使其适应特定活动和目标的不同方式，以及对表征手段的反思。

我们在这一章使用的资料是我们从多个地点——萨摩亚（Samoa）[1]、波纳佩（Pohnpei）[2]、美国、德国和东欧——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搜集而来的，这些调查的语境包括如下活动：发表演说、网络游戏、政治竞选中的玩笑、闲聊、对得体称呼形式的元评价（metacommentaries），以及手语使用者的网络视频交流。话语资料为探究以下问题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方式：人们如何时刻创造、维持和检验文化；人们如何向彼此展现，并共同建立关于他们是谁、他们应开展什么活动的共享性认识。在这些行为中，语言能够被呈现为一种建立文化意义的关键资源，也就是说，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很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关系、观念、结构和连贯方面的差异。通常情况下，这些通常不是直接地表述出来的，而是通过结盟、同意、反对、风格、谈话数量和类型、对听众的关注等这样精巧的手段表现出来。在讨论话语与文化之间如何相互建构时，我们遵循的是人类学中一个长期延续的传统。这个传统以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对美洲印第安语言的记录为起点，一直延续到当今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它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主题、理论和方法路径（Duranti, 2010）。

【333】

在我们详细勾勒这些当代研究发展趋势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

16.1 什么是文化？

关于文化“是”什么，多种观念对我们理解话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所帮助（参见 Duranti, 1997: Chapter 2）。一种共同的文化观是，文化由人类代代相传的实践和知识构成，它是一个群体习得、共享的行为模式特征。通过观察、模仿、尝试和犯错，我们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一些人类学家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观称为“**认知**”视角，因为它最主要的关注

1 南太平洋中部一群岛。——译者注

2 又译为“彭培”，位于西太平洋，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一个州。——译者注

点是现实的心理组织："文化不是一种物质现象……它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的事物的形式，以及人们感知事物、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诠释事物的模式"（Goodenough, 1964: 36）。无论是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还是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都能够为我们理解关系提供指引，为我们完成工作或语言使用方面的任务提供模式。我们看待知识的方式，必然会影响我们分析文化的方式。例如，它关系到我们所说的知识是否只是包括个体心智里的知识，或是与他人一起显现的知识，或是散布于环境中的人和事物之间、因人类协作努力而浮现的知识。

在另一种视角下，文化是传播，或是一个符号系统。这种有关文化的**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于神话、仪式和范畴中的表征系统。这种认知路径关注诠释的过程和意义。它并没有试图去提供有关行为的一般性法则或模式，而是提供一个协商、生成特定世界观的系统。这个把文化视为传播的理论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把人们与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事物连结起来。传播要素预先设定或确立了语境特征（比如，指出当下语境和过去语境中的某些方面），作为传播信息和传播关系的一个部分。这种传播关系虽然不甚清晰，但仍然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

文化还可以被视为一个中介系统，或者人类学习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学习如何使用工具，包括语言在内。在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看来，语言是"覆盖在我们精神四周的隐形衣，它们预先决定了一切象征表达的形式"（Sapir, 1921: 221）。不论我们是否选择去遵循萨皮尔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的认识语言的相对主义视角或决定主义视角；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借助话语或作为话语，语言成为过去与现在、潜在与实在、不可见与可见、立即显现与想象之间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需要他人、卷入他人——行动者、合作者、目击者，等等——的东西，那么它也是一个**参与系统**（Goodwin and Goodwin, 2004）。在我们的人生里，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将建立、分享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将运用有关文化的知识去组织、阐释我们的社会互动。我们的过去会影响当下的行为、诠释和选择（Bourdieu, 1977: 82）。 【334】

认识文化的种种视角都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与群体成员共享习惯和倾向系统的方式是多样而复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去思考这个有关习惯和倾向（dispositions）的系统，直到一些事件发生，我们才会反思和分析交流中的误解和中断。比如，有时我们发现自己处于群体外成员到访的场合；或者我们处于一个新的环境，这个环境设定的交流方式与我们所熟悉的存在差异。

在所有这些有关文化的理论中，话语——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或活动——都是一种主要的、最初的力量。

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来想象话语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那就是考察"聋人文化"（Deaf culture）这个术语的出现。我们介绍"聋人文化"术语是要特意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与常人相比，聋人对语言的不同体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聋人研究者已经用文化术语对聋人，尤其是视觉符号使用重新进行了定义，从而抵制听觉体验的支配性优先权。同时，聋人研究者强调聋人儿童的独特体验；但是，绝大多数聋人儿童都是在不懂手语、具备听觉能力的家庭中长大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缺失关键文化信息的情况下成长的，他们所处环境的关键文化信息产生于注重听觉的语言使用。在这种语境下使用"文化"术语，也是试图更正一种观念：耳聋是一种残疾。根据个体感知系统（使用视觉系统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听觉基础上的语言的必要性）所具

有的特征，聋人语言社区以独特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聋人在日常里也必须依赖具备听觉能力的诠释者，后者在转达意思的同时也会影响前者的态度和理解。可见，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是如此之强。那些要具体理解这两者关系的尝试已经产生了诸多有趣的研究。

与过去的研究形成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类学家现在都倡导这样一个假设：文化是公共的，它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也不仅仅存在于博物馆里的古代文本和物件中。文化可以被积极地探究，它是我们开展的诸多互动的产物；反过来，它也会增进我们与不同语境之间的协调。由于文化在行动和参与领域中显现，对文化的研究要求人类学家浸入日常生活里。这种研究类【335】型被称为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研究带来参与式观察，后者要求研究者对诸多复杂的惯例以及群体成员在社会和文化中行事中的自发行为保持“中立”的立场。通过说话、与其他人交流等行为，文化群体里的成员持有一种特定的立场，“在社会世界里，所有的立场都在移位，并在与另一个立场的相对关系中得到界定”（Hanks, 1996: 201）。由此，我们建立起一个“社会结构化的世界（socially structured universe）”（Ochs, 1988: 14）。这种努力是一个过程，它极大地依赖语言，包括多种多样的、令人迷惑的语言形式。

16.2　前人有关话语和文化的研究

在博厄斯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中，土著语言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当博厄斯收集与北美原住民语言、文化有关的文本和手稿时，他开始对如下问题感兴趣：各种语言如何对言说者的经验进行分类？言说者如何使用他有关美洲印第安语的语法、词汇知识去反驳后来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即欧洲人具有智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Boas, 1911）。一方面，博厄斯的研究与他之前的一些德国研究者（例如，约翰·赫尔德和威廉·冯·洪堡）存在观点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博厄斯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又呈现出差异（Bauman and Briggs, 2003: 第8章）。他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会选择出一部分概念而忽略另一部分，由此提供认识现实的相同层面的不同视角。例如，英语中说“the man is sick”（“**这个人生病了**”）（Boas, 1911: 39），就必须要用特定的语法范畴表达，如定冠词（definiteness）（the）、单复数（the man vs. the men）以及时态（is vs. was）。就像博厄斯所说，这个英语句子可以改写成“a single man that I believe you can ~ identify is at present sick”（一个我相信你也认识的男人现在生病了）。但是，在夸夸嘉夸语（Kwak’wala）——英属哥伦比亚的一种土著语言里，可见性、指示功能等不同范畴必须以语法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上面这个英语句子可能被表达为：“definite man near him invisible sick near him invisible（那个在他附近的而看不见的人，在他附近而看不见的地方生病了）”；或者“that invisible man lies sick on his back on the floor of the absent house（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人生病了，他卧躺在不在此地的那个房子的地上）”（Foley, 1997: 194）。在英语里，可见性或不可见性并不是常规语法表达的一部分。而在一些语言里，它是必须表达的有关言说者和所指的状态。比如，当一个言说者在话语中要提及另一个言说者时，法国人一定会选择 *tu* 或 *vous*，德国人一定会选择 *du* 或 *Sie*，而当代（不是古老的）英语却只有一个选择——you[1]。博厄斯的

1　tu 或 vous、du 或 Sie、you 分别是法语、德语和英语对“你”的表达。——译者注

学生爱德华・萨皮尔（Spair, 1972）又进一步探讨了这样一个思想：语法范畴会影响到言说者如何反思和建构思考世界的多样化方式。

在不同意义系统之间进行翻译是困难的。这对详细探究话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挑战，但也促使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它们。例如，波利尼西亚语中有一个词叫“*tapu*”。英语借用该词，形成了另一个词“taboo（禁忌）”，但意义发生了变化。在波利尼西亚语世界里，*tapu* 是指那些因其神圣而被认为是不能被亵渎或触碰的东西。然而，在英语世界里，taboo 被用来指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禁忌，或是明令禁止不良的或冒犯性的事物。在波利尼西亚语的观念里，某【336】种东西可以同时是神圣的和忌讳的。但是，这种把事物的两面性统一在一个术语上的观念，对英语世界里的人来说却是陌生的（参见 Shore, 1989）。一些文化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对应的语言转换是不能克服且令人沮丧的。与此相反，另一些文化研究者则将这种语言转换视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拓展我们的想象，并欢迎新思想的进入。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在新传播影响的基础上新概念的出现，都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对社会变迁进行理论化的机会。术语 cargo cult（物资崇拜）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案例，它展现了文化接触的情景和语言转换的复杂性。物资崇拜是指最早在太平洋岛屿的某些区域内观察到的一种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量庞大的物资（cargo）空降给占领岛屿的士兵。岛屿上的原住民群体看到后，开始从理论上说明这种活动：如何能够（从天空中）延续物资供给，并获得已见证于西方文化的同等物质财富。他们为模式化的实践活动建立起象征（仿造的飞机跑道和控制塔），并向神灵和祖先呼唤。他们相信神灵和祖先应该为外国人获得大量财富而产生的不平等负有责任。如今，“cargo cult”一词在英语中也偶尔用来表示轻蔑。有一个案例是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对“cargo cult”的使用，他用该词指称那些取其形却不关注科学探求的适当严密性的那些人。

一种语言是否接受借词（loan words）——也即词汇借用——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器，标明使用该语言的特定群体对外部语言影响的闭合程度或开放程度。对于亚利桑那州的特瓦（Tewa）这个美国原著群体来说，宗教仪式上的话语不能有外来语表达或借词（Kroskrity, 1998）。另一方面，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波纳佩，描述基督教活动的词汇是从西班牙人——最早的西方殖民者——那里借来的，有关篮球、凉鞋和内衣的术语是从日本殖民者那里借来，而“win（赢）”和“lose（输）”一类的词汇和概念则是从美国人那里借来的。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文－斯特劳斯（Cloude L é vi-Strauss）通过关注他在神话中找到的语义对立，试图去描述意义系统之间的巨大差异，并用可以理解的术语去完成话语系统的转换。他以有关超自然现象的叙述作为材料，来理解当地的观念和行为系统，最终提出文化间共享的隐含区分（例如，烹饪了的、生的、腐烂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部分地受到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启发，后者是布拉格语言学学派的成员。这一学派关注一系列语言现象，从音系到诗学（Jakobson, 1960）。他们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作出了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提出在关系中理解意义。在这种视角下，要理解意义系统里的各个要素，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一个既定的整体中观察每一个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所具有的特征。这种路径的有力之处在于，通过建立对比和对立关系，既能够处理最小的语言单元，如语音差异（比如 /f/ 与 /v/），也能够处理一个故事里的人物类型（比如英雄与坏人）。

约翰・甘柏兹和德尔・海默斯（Gumperz and Hymes, 1964）拓展了博厄斯和其他人类学【337】

家、语言学家的研究，并意识到话语和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他们通过使用**言语事件**（speech event）这样的分析单位，开始把有关文化的描述和分析与有关语言的描述和分析整合到一起。言语事件是一个由言语使用规则或规范界定的有边界的活动（例如，演讲、面试、电话会话、交换问候、故事、广播新闻）。海姆斯发现，在关注言语跨文化研究的书籍中，没有一本“会把言语搁置在比较宗教、比较政治等诸如此类的语境之外”（Hymes, 1972: 50）。甘柏兹和海默斯提出的**交流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也部分地回应了1960年代由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倡导的语言学研究。后者坚守一种独立于文化和语境的语言分析（参见Chomsky, 1975）。语言如何被文化塑造？或相反地，语言如何塑造文化？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民族志描述把更多的注意力引向语言使用的特定语境。在话语和文化研究领域，更多方法和理论上的新近发展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会话分析、对形态表达的描述，以及语言在创造和维系社会制度方面的角色。

16.3 对话语的一种文化性理解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了很多研究者，他们的中心主题是：如果将话语抽离于它浮现的语境，那么它是无法被理解的。因此，语境是所有话语研究者展开研究的核心关注点。空间的组织，人类身体的展现、控制和诠释，工具和其他人造物品的使用，诸如此类的文化特征都被看作是种种关系而加以研究。这些关系生产出话语，并受到话语的限制。例如，在由文化组织起来的空间里（比方说一间厨房、一个舞台、一个公共广场、一家餐厅），人如何举手投足逐渐地被人们共享，人们必须学习如何控制物品，学习形体如何表现。通过在人和事物之间建立起关联的形式的使用，也通过空间里展开的活动，特定空间里的特定互动使语言和文化形式具有意义。法庭、男人和女人的房间、教堂和家庭，这些空间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实践，也会影响我们对言语实践意义的诠释。在这些空间里，说话者的身份可以通过他们是坐还是站、坐或站的位置来确定。语言可以被当作一个中介用来传递多个维度的意义。比如，音量降低所传递的意义是，说话者正在说的内容应该被诠释为面向在场的每一个人，或者是与互动的核心关注点相关（Goffman, 1963）。在利用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来赋予互动以意义、或建立角色和关系方面，人类拥有一段很长的历史（Lawrence and Low, 1990）。通过日常的话语实践，包括问路和导航（参见Brown and Levinson, 1993），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诸如示意图、导航图一类的图像表征的创造是以影响人类认知和想象的方式在处理空间地带（Hutchins, 1995）。太平洋岛民的房子和北非柏柏尔人的房子都是我们“写下”（writing）、“阅读”（reading）地位差异的场所，因为我们通过进入和活动的方式来表现举止（Duranti, 1992）。赛博空间，这个全新的空间和架构，已经影响到了话语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逐渐成为我们工作和休闲活动的一个富有成效的语境。在网络可视化环境中，互动可能会要求人们在空间推论和空间理解方面形成新的习惯（Fisher, Agelidis, Dill, Tan, Collaud, and Jones, 1997）；反过来，这又会对人们如何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之间完成协调行动提出有趣的挑战。

【338】

韵律、语言条目、具体行动、身体定位、手势、面部表情、凝视、物体、工具和器具，以

及环境中的建筑，它们都有附着的文化价值，例如，直接盯着别人，或在特定语境下为特定目的而做出手势（比如，指点），这些行为是否是恰当的。在该言语事件中，通过语言来界定举手投足的方式是否与参与者的社会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相称。

想要理解话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知晓如何交流、什么是能够说的，而且也要明白什么是不能说的。借助语言，我们表达的意思可以是明确而具体的，也可以是模棱两可的，这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经验如何在文化上塑造了我们。在某些社会里，当你说“yes（是）”的时候，你表达的意思可能是“not at this time（这个时候不要）”，因为直截了当地回绝一个请求是不礼貌的行为。同时，听话人必须依靠特定语境来诠释这一回应对他或她后续行动的影响方式。在美国，有关约会强奸的法庭判决存在争论，而争论的核心就围绕这样一个议题：男人是如何诠释女人口中的“no（不）”（Kulick, 2003）。美国聋人社区里，率直被赋予很高的价值。与听力健全的人那些相对间接的话语风格相比，这种率直的话语风格被认为是更加开放的、更值得信任的。在波纳佩及其他的太平洋岛屿上，兄弟与姐妹之间不能谈论相同的话题。于是，作为某个人的兄弟或姐妹，会影响他们能说什么以及不能说什么；反过来，那些不能说的内容也部分地创造了兄弟或姐妹的角色。这些实践活动又支持了开始与兄弟或姐妹角色联系起来的态度、观念。在另一些语言社区里，人们为了准确处理这样的情境而使用特别的词汇，譬如，某个人要当着在场的亲戚的面说话，但又必须向对方表示尊敬，且要避免谈及某些话题。这些“回避语域（avoidance registers）”[1]被称为“内兄 / 弟语言（brother-in-law language）”或“婆婆 / 岳母语言（mother-in-law language）”。它们在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中普遍存在，其使用标示出说话者对特定亲戚在场的敏感（Haviland, 1979）。

在接下来的几个部分里，我们通过一些案例来看看话语是如何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关系**、**观念**和**连贯性**的。尽管互动参与者会对共享意义进行抵制和协商，参与者的行为也具有多样性，但是日常生活里众多的“微”互动、“微”活动仍会强化文化实践。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们当前的行动深深地嵌入到过去的行动和话语中，并与之对话。我们将会运用来自于广泛不同的语境和参与者的案例来说明，话语如何使独特的人类社群成为可能。

16.4 话语建立并维持关系、观念和自我的连贯性

【339】

连贯性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个体对他们自身经验甚至他们情感立场的感知和认识，都是通过与他人的话语实践而得以产生和表达的。例如，在萨摩亚，当地居民经历的、谈论的乡村生活就是一个断断续续却又稳固的**事件**（*fa' alavelave*，英语表达为“trouble”或“accident”）流。这些事件打乱了理想而轻松的日常生活，它要求人们在认知、情感、体力和经济等方面有不同寻常的卷入。**事件**包括婚礼、葬礼、新首领上任的仪式和朋友或亲戚不期而至的拜访。

通过观察话语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们已经对“经验”概念作出了反思。在他们看来，“经验”不再是感觉资料的一个自动生成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观念：经验是一个以话语为中介的实践产物（Bauman, 1986; Mattingly, 1998; Throop, 2003）。他们说明了话语如何形

1 在交流中具有“回避”这一特定功用的语言变体。——译者注

成公共个体经验，如何把经验结构作为元文化（meta-culture）传递给我们各自的受众（Urban, 2001）。比如，有关情感本质的话语可能呈现出很大的跨文化差异。

下文中，我们提出可以考察话语与文化之间关系的三种基本方式：人的范畴和属性、语言的范畴，以及表征和再生产的系统。我们将会详细地讨论多种多样的案例，用它们来说明语境的作用，以及用来理解文化的分析可能存在的多个层次，因为文化通过富有创新性的语言使用而得以表达和再创造。这些案例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研究项目，旨在用来表明人们如何协同创造和协调一系列富有弹性的、变化中的关系，同时参与到对个体认同、活动和价值的建构中。

16.5 人的范畴和属性

正是借助话语，社会范畴和认同才得以创造、界定和协商。比如说，社会性别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是一个关键的社会范畴。但确切地说，这个范畴怎样、何时才具有意义，在不同社会里会千差万别。在某些社会里，年龄是一个人的重要属性，它影响着语言的使用方式。与此相反，在其他社会里，年龄却不一定成为有关个体认同或说话方式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一位研究助理，也是一个研究生，曾帮助基廷研究传播技术在地理分散的工程公司中的使用状况。研究过程中，一位工程师问她：“你起这么早跑到休斯顿【离奥斯汀有 400 公里远】，你丈夫会说什么？”这位研究生说，这场“友好的谈话”不仅反映了工程师对她手上佩戴的结婚戒指的注意，也反映了工程师对婚姻地位、性别、工作，以及美国文化预期的丈夫和妻子角色所持有的看法。

不同社群的成员具有的自我概念和诠释自我的策略可能极为不同。通过对象征行为进行分析，这些差异都可以显现。同时，人格的建构也可能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人们在他或她所属的群体之外想要拥有何种认同。在某些社群里，出生次序是个体的本质属性——其中，有些文化把优先继承权赋予给母系家族，而另一些文化则赋予给父系家族。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同文化存在一个共性：性别认同通过衣着、饰品、发型、角色和行为被构建为多种形态，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与他人对话而呈现为一个具象化主体的过程的自我。【340】

认同的本质以及能够用来建构认同的社会关系的类型，也是千差万别的。确切地说，个体由什么构成这个观念存在差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个体的欧洲中心假说。来自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1] 的人说“我们感觉不舒服”（Lutz, 1988）；在同样一个语境下，一个欧洲人则会说“我感觉不舒服”。欧洲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都被邀请进入这一语境，对个体构成、生病、治疗计划或调适过程等想象出一个极不相同的概念。

政客在持续不断地监控他们的个体连贯性。例如，政客们会考虑他们在某个场合下说出的话是否与以前说过的话相冲突；这是因为，选民和竞争对手主要根据他们在言语中展示的个体去评价他们。在美国，身份认同被认为是个体的某种属性，它在不同的时间里借助互动而持续存在；因此，连贯性或一致性的缺乏会被评价为不诚实、不可信。在那些连接政治候选人与他们想服务的社区的归属性叙事中，他们根据自己是否视当地社区为一体而建构出他们的认同，也建构出他们与其他政治候选人的差异。在公共演说的语境下，政治候选人把他们当下的目标

1 为西太平洋岛国，属于加罗林群岛。——译者注

和志向叙述为他们过去的选择和经历的一种自然延伸。正如下面这个案例所展示的那样，沃尔特·卡普斯（Walter Capps），一个民主党候选人，把他参加 1995—1996 年国会选举的决定描述为他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学经历的一种延伸，尤其是他有关越南战争的一门颇受欢迎的大型课程的延伸（Duranti, 2006）。

（1）（1996 年 8 月 15 日，加利福尼亚，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美国众议院候选人的公共辩论）

卡普斯：［……］我进入政治就像是我过去一直从事的教学……一种延伸，……嗯，我教过的这些－这些课程。［……］我进入政治，就像是我做过的有关－越南战争影响这方面工作……一种延伸，我教授的这门课程……已经被［电视节目］“六十分钟”报道过三次，……我已经在三个场合下向国会议员作证。

我们从这段摘录可以明显地看到，卡普斯的教学经历被认为并被表达为过去诸多经历之一，它使卡普斯能更好地胜任他所希望竞选的职位。在国会议员面前作证是卡普斯列出的论据清单上的另一个事件。借助话语，卡普斯将自己认定为一个在重大国家议题和历史方面得到认可的专家。通过他过去与大学学生的互动、参加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电视节目等经历，卡普斯把他自己与未来那个有影响力的、有趣的人连接起来。当他在协调对他的特征和选择的理解一致性时，他的观众也在倾听。之后，其他人可能会赞同、修正、反对或重新诠释他对特定观众的说话内容所具有的意义。【341】

这一点在 1979 年法莱法（Falefâ）[1] 萨摩亚人村议会的一次公共演说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清晰的说明。在这场公共演说中，两位高级的演说者之一墨诶奥诺·克奥里奥决定要竞选村议会，他批评同区的在职议会成员此前没有成为所在社区的一名积极参与者。通过把他界定为一个在学校里表现优秀但对村庄日常生活不具有正确判断的人，这位在职议会成员的负面特征就被成功地传达出来。

（2）（1979 年 1 月 25 日，法莱法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分发的部分演讲的免费英文翻译稿）

墨诶奥诺：他一赢得他的职位，就急匆匆地去为他的－他的妻子办事，所有的事。而我已经对他提出建议，去建造他自己在这个村庄的住处，并很好地生活下来。……一个先知是不会在他自己的村庄里受到尊重的，如果只是住在其中。

其他人：说得好！

墨诶奥诺：但是很显然这些天因为他用幼稚的方式想要变得聪明……很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获得过一项奖学金……上帝不会抛弃那些追随他的人。

其他人：说得好！

墨诶奥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大脑，并怀有对在座的首领们、（我的同事）这位资深演说者和阿图阿王的子民们（比如其他的演说者）应有的尊重。无论一个人从学校获得多少个学位，甚至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上帝都

1 在萨摩亚乌波卢岛的北部沿海。——译者注

赐予他百分之一百的正确判断，那样的（人）是最好的。

其他人：　说得好！

这里，可以将这位资深演说者的演说理解为一种信号：即便在职议会成员可能在学校里表现优秀，但他缺乏正确的判断，一种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同时，他想要变得聪明的方式也被描述为是幼稚的。

在所有的社会里，政治领袖一旦当选，他们都会持续地通过日常的参照和演说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独特成员。在波纳佩，这种独特的社会身份是通过语言形式的选择来创造的，这些语言形式表征着首领的行动、地位和所有物，并使他们区别于"神圣"于其他的社会成员。下面的案例里，一个参与者的行动由一个低地位[1]的动词暗示出来，一会儿后，副首领的行动（他的言说）则由一个高地位[2]的动词表现出来（Keating, 1998: 58）。

（3）（1992年，波纳佩，在副首领的宴会厅里为卡瓦仪式（kava）[3]作准备）

门宁德：　*patohwansang ahmw sehten koh patohdala*

take[LOW STATUS] off you shirt you go[LOW STATUS] up there (...)

脱[低地位]下你的衬衫，你走[低地位]到那里（……）

ohlen nek masanihonguhk

that man (the chief) could tell[HIGH STATUS] you

那个人（首领）会告诉[高地位]你

dahme pwungen ahmw pahn mwohd

the correct way for you to sit

你坐下的正确方式

【342】　动词"mahsanish（告诉）"只能用来描述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最高首领的讲话也是通过动词"poahngok（告诉）"来标示其属于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范畴。研究波纳佩的男首领或女首领与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较低地位的言说者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们"礼貌地"为自己和其他人选择较低地位的语言形式，而为首领们选择高地位的语言形式；由此，他们通过话语再生出等级制度，恰是这个等级制度通过这些恰当的、认可的语言形式的选择来降低他们的价值。波纳佩的首领从不在他们自己的言语中使用可以标示地位的语言形式，除非他们要提到上帝。换言之，他们从不降低其他人的社会地位。只有社会地位较低的社群成员才会降低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社会地位，并持续地再建该社群的等级制度。在波纳佩语中，单个的短语可以标示指向处在两个不同等级体系的两个独立的层次；而在同一个话语互动里，某个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可以由两个不同的言说者予以不同的建构，显现出这种语言资源所具有的动态属性。即便是在某种语言里不存在用于表达社会地位的语法形式，也会有言说和具象行为去标示人们之间的差异、等级或范畴。

1　言说者使用特定的动词，标示出其所处的较低的社会地位。——译者注

2　言说者使用特定的动词，标示出其所处的较高、最高社会地位。——译者注

3　是南太平洋上特有的一种植物，属胡椒科，其根可磨制成粉，加水溶解可饮用。——译者注

像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样的欧洲语言也有用来标示对比关系范畴的方式，这种对比关系范畴主要是围绕上级与下级、亲密与疏远这些轴线。正如波纳佩语一样，这些欧洲语言标示社会地位的过程也是动态的。下面的摘录来自基廷的一项研究，其中两个德国高中生在讨论，尽管已经存在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规定了特定语境下称呼代词 *du*（非正式的、亲密的“你”）或 *Sie*（正式的、有距离感的“你”）的使用，但要公开对一个人或他者表态仍是多么困难。可以将这种困难看作是在管理个人所属范畴或所具属性时产生的问题。两位学生讨论的是他们选择**在社交上**正确的代词形式时所经历的冲突，因为两种形式在语法上都是正确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发生在他们的社会地位随年龄而变化的情况下遭遇到的典型冲突案例。就像其中的一个学生所说，“按照一个或多或少不成文的规定指示，学生从十一年级开始就应该被称呼为 *Sie*”。但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学生从低社会等级到与老师平级的变化远非是自动的，它还取决于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协商。接下来的摘录里，安德列亚讲述了他和一个老师之间的互动，是关于称呼语从 *du* 到 *Sie* 的变化。

（4）

Andrea: Also ein Lehrer hat uns gefragt: “Soll ich euch jetzt dozen
-aeh, sol lich euch jetzt siezen?” Und wir so: “Aeh, nein, danke,
Sie dozen uns jetzt schon seit drei Jahren, warum sollten sie uns
Jetzt siezen?”
*(One teacher asked us: “Should I address you with du, uh, am I to
address you with Sie now?” And we responded: “No, thanks, you
addressed us with du for three years, why should you change that now?”)*

安德列亚：一个老师曾经问我们：“我应该称呼你们为 *du*，呃，还是现在要开始称呼你们为 *Sie*？”我们回答：“不，谢谢，你称呼我们为 *du* 已经有三年了，为什么现在应该改变呢？”

这位老师要改变学生地位的提议（改变社会地位的提议必须由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提出）被拒绝了，学生表达了他们想要和老师保持在“*du* 关系”里的愿望。另一个学生连带提及到，在重新校准她与老师关系中的地位认同时，她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她被要求将她对老师的称呼变为 *du*，并用老师的名字来称呼老师。这个学生说，“我当然不能那样做（*aber ich konnte es einfach nicht*）”： 【343】

（5）

Anna: Ja, das kommt... da erinner ich mich dran, also zum Beispiel
in der sechsten Klasse, kurz bevor ich ins Gym-ich ins Gymnasium,
andere auf die Realschule oder was anderes kamen-
sagte mein Lehrer: ‘Also, wenn ihr dann den Abschluss macht, dann
könnt ihr mich dozen. Also dann bin ich für euch der Daniel.’
(Yes, I remember that in sixth grade before I attended the Gymnasium
My teacher said: ‘Well, after you have graduated, you can address me with

du then. I will be Daniel to you')

安娜： 是的，我记得是在六年级的时候，我进入健身房之前，我的老师说："如果你已经毕业了，那你就可以用 **du** 来称呼我了。对你来说，我也将会是丹尼尔"[1]。

Andrea: Sagen viele Lehrer, ja.
(A lot of teachers say this, yes.)

安德列亚： 是的，很多老师都这么说。

Anna: Abe rich konnte es einfach nicht, weil irgendwie, ich weiss nicht, es ist einfach so die Beziehung, es ist einfach, dass die Lehrerbeziehung auf einmal `ne mehr familiaere Beziehung wird, `ne engere Beziehung, das fand ich total komisch irgendwie. Das hab ich dann auch nie gemacht. Es ging nicht darum, dass ich irgendwie unbedingt da, weisst du, so überhöflich sein wollte oder so, aber es war einfach, Gewohnheit.
(But I couldn't do it because somehow, I don't know, it is simply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eacher, and if this is suddenly more on a familiar base, a closer relationship, then it feels weird.That's why I never addressed him with du. I was not about to be extremely friendly, I was simply used to it.)

安娜：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因为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仅仅是因为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并且，如果这种关系突然间建立在一个更加熟悉的基础上，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它就会变得奇怪。那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用 *du* 来称呼他。不是我要变得极度友好，而仅仅是我已经习惯了。

Andrea: Es ist schwer sich umzugestellen, es ist sehr schwer sich umzustellen.
(It's hard to reorient; it's very hard to reorient.)

安德列亚： 这难以调整；这非常难以调整。

Anna: Auf jeden Fall.
(Definitely.)

安娜： 确实。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突然改变范畴，不仅会带来不适，就像安德列亚所说，"这难以调整，这非常难以调整"；而且，选择不恰当的称呼形式还会带来社交后果，因为这种称呼形式的选择体现了社交知识。一个特定的称呼选择会因为看起来太熟悉或不够熟悉而冒犯被称呼者，并暗示出社交上的能力不足。当安德列亚在许多年后遇见一个朋友的母亲时（朋友家已经搬走了），她就碰到了这种选择上的困难。

（6）

Andrea: I was already considerably older and *Sie* played a much bigger role. It was not easy for me to address this woman with *du* again.

---

1 丹尼尔是这位老师的名字。——译者注

I simply wanted to use *Sie*, I had to. And she said: 'Tell me,
Why are you addressing me with ***Sie*** now, you always said *du*?'
And I was like: 'I'm sorry, it's not my fault, I didn't mean to.'

安德列亚：我已经很大了，而 *Sie* 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要再用 *du* 来称呼这位女性，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只是想用 *Sie*，我必须用。然后她说："告诉我，
为什么你现在用 *Sie* 来称呼我，你以前总是用 *du* 的？"
我像这样回答："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错，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做。"

在这个案例中，与（时间和空间上的）现实距离相关联的是感知到关系或关系范畴在亲密程度上的变化。【344】

在美国的聋人社区里，等级的价值明确地被降低了。其实现，部分是通过直接坦率的言语实践而获得；聋人对他人的尊重是不以语言形式的选择、区别、回避或模糊为条件的。对美国的聋人来说，言语中的暗示和模糊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冒犯性的"（Lane, 1992: 16）。

在以计算机为中介的语境下，比如网络游戏，玩家也难以协商处理个人的范畴，他们可能会改造出全新的认同和属性类型（Keating and Sunakawa, 2010）。我们下面展示的案例中，玩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去发展他们的角色或屏幕上的自我表征，去磨炼那些赋予角色或玩家在同伴中的地位的技能。在下面的摘录里，玩家正准备进入游戏，他们在买卖"权力"，"权力"是角色的属性，或如游戏指南描述的那样，是"构成角色人格的要素"。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远程专家……［一个人可以］成为"令人心醉神迷的艺术家"（www.cityofheros.com/game_info/rewards/enhancements.html）。玩家们协同建构出各自角色的权力，建立起群体连贯性，以及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潜在可能。玩家布雷恩向其他三个玩家拿出一个耐力、准确度或控制来交换。有两个玩家作出了回应，这场交易也就完成了。

（7）（德克萨斯州奥斯汀，2007 年）

布雷恩：　我需要，呃 ::（.）有人想要一个耐力或
　　　　　一个准确度［ 或一个控制吗？
格里格：　　　　　　　［ 呃 :::］
　　　　　（1.5）
戴维：　　耐力？（.）［ 准确度？ 呃 ::: 算了 ］
凯特林：　　　　　　　［ 准确度是什么级别的？ ］
布雷恩：　　　　　　　［ 耐力 ］或者准确度，或者其他的
　　　　　(……)
布雷恩：　（？ ）百分之二十五的准确度，因为我不想把它扔掉
　　　　　我不在乎（（戴维看着布雷恩））
戴维：　　＝我－我为了你的苏醒买了它
布雷恩：　好的。那么你想要哪一个？
戴维：　　准确度。

在网络中，利用新创造出来的社会属性形式（Turkle, 1995），我们从其他语境中吸纳言语

惯例，并发掘出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属性和关系。借助话语，包括游戏开发者提供的象征形式，真实与虚拟（或如戈夫曼所述，真实到底是什么）之间的边界在不断地变化（Keating, 2008）。

从人的范畴和属性出发，我们转向第二个焦点：语言自身以何种方式被组织为可识别的范畴。这些范畴与言语行为相联系，并创造出言语事件和文本的特定形式，比如政治、艺术、治疗、魔术和闲聊。

【345】

16.6 语言的范畴：类型、艺术及互文性

说明话语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观察语言为特定活动和目标而改变或适应的方式，以及语言的艺术性或娱乐性使用。在每一个言语社群里，言语方式都可以被组织为类型（genres）或范畴，它们能够被母语言语者轻易地辨识出来。比如，问候、演讲、仪式、歌曲、文字游戏、祷告和会话。由文化界定的范畴或本土分类系统能够组织社会生活和实践。因此，通过参与家庭和社区里的一系列不同的传播事件、与不同的人进行互动，即便是年幼的言语者也能够掌握语法技能和社交技能。他们可以学会如何借助称呼和交谈的形式（就像我们在前一个部分阐述的那样）来区分不同的人，学会什么时候说话、对谁说才是恰当的，以及学会不同的言语风格。

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萨摩亚，社会生活的组织和想象方式适宜于**拉乌加**（lâuga）[1]这种特定言语风格的不断产生和评价。**拉乌加**是一种正式言语，通常由称为**马他伊**（matai）[2]的社群首领来使用。一个**马他伊**承担的职责是，只要特定场合一出现就使用这种言语风格。使用这种风格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是通过直接观察和实践来获得（参见 Duranti, 1984; 1994）。下面的摘录来自杜兰蒂的田野笔记，首领萨维（简称为 S）讲述了在学习所需知识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马他伊**的过程中，语境所具有的重要性。

（8）（1979 年，西萨摩亚，法莱法，A. 杜兰蒂的田野笔记）

AD: 你是如何学到那些与传统、村庄历史和［主要的］首领相关的所有东西?

S: 通过听其他**马他伊**［有头衔的人］说话。在萨摩亚，这些东西是口耳相传的。

AD: 书写的引进对这种学习过程有影响吗?

S: 有的人会写下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说，如果你爱你的儿子，你不会让他看你的笔记本［上面是你记录的有关传统的笔记］，否则当他长大并可能获得一个**马他伊**头衔时，他就会变得 *velea*［“愚蠢”］。要是我的儿子走过来问我，“谁是某某？”如果我爱他，我就不会告诉他。相反，我会对他说：“去**马他伊**们聚会的那座房子，去**马他伊**们喝**卡瓦**［仪式上的饮品］的地方，并为他们服务”。那才是我会告诉他的东西。那才是你学习的方式。记得［最高首领］勒加吗？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坐在那儿，什么也没说。［我们都在想：］“他一定是看过勒加的笔记本了”。

要习得言说的专门方式和风格方面的知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参与乡村生活的社会组织。

1 萨摩亚的仪式性话语。——译者注

2 即酋长。——译者注

萨维说，他的儿子必须通过参加有**卡瓦**供应的事件才能学习；由此，服务、学习和特定类型的言说这三者之间就建立了关联。由于**卡瓦**只在重要的场合下供应，这就意味着当年长者为了重大事务而聚集在一起时，年轻人必须要在场。为了学习，年轻人必须遵循更为年长的社群成员制订的次序。因此，学习这种价值很高的言语风格也是在既定的社会等级次序中自我定位过程的一部分，是参与等级次序所处的话语再生产的一部分。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仅仅通过读书或上学（参见前文的案例 2），而不是通过参与年长群体并为他们服务，就能学到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演说家，都极有可能会让他自己出丑，因为，他有关类型和风格的知识是不充分的。【346】

在关于类型的诸多研究中，都说明了在场受众的显著重要性，但在具体分析中又经常被忽视。同样的，即兴化（improvization）作用也一并被低估或忽略了。但事实上，那些发表公共演说的人总是被要求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去更改他们的内容，以便与特定场合相适应。实际上，人们对专业的公共演说家进行准确的评价的根据是他们适应新情况以调整原有计划的能力，这些新情况包括受众的构成和特定群体的不期而至。这在萨摩亚和美国都是如此。区别在于发表演说中的一些特征，比如“调子”（key）。萨摩亚人的**拉乌加**倾向于在一种严肃的“调子”下发表（幽默通常是作为开场白或是演说发表之后的评论）。但是在美国的竞选演说中，幽默是非常普遍的，少数情况除外。例如，在杜兰蒂记录的美国国会 1995—1996 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第 22 区竞选中，最终获胜的政治候选人在竞选的第一天就展示了他的才能：根据演说面对的听众调整他的幽默点。那天，当他列出他已经拜访或将要拜访的众多加利福尼亚社区时——说明他努力与整个区的选民进行交流——他可以根据所面对的听众类型使用不同的结尾方式。第一个案例中，这位政治候选人面对的是一群绝大多数已经退休的人。

（9）（1995 年 11 月 14 日，加利福尼亚，帕索罗布尔斯。）
卡普斯：（好的）我们一分钟后就要坐上这辆车
　　　　因为 - 呃，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呃 -
　　　　我们要去：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然后我们去圣塔玛丽亚，……
　　　　然后我们去圣塔芭芭拉，……
　　　　然后我们去隆波克，……
　　　　然后我们去比尔顿，……
　　　　然后我们去 :- 索夫昂。……
　　　　然后，我觉得 - 呃，之后（（更快 ->））我们很有可能是去睡觉。
听众：　（（大笑声））哈！！呵呵呵！！！

这个幽默点（“然后，我觉得 - 呃，之后我们很有可能是去睡觉”），是为了让由多数老年市民构成的听众理解和赞同。通过观察这个笑点的组织技巧，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演说类型（形式—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范式。列举地名的框架因提及一项活动（“去睡觉”）而被打破，它保持了之前四个从句（“去 + 名词”）的句法框架和语义框架，却插入了一个非地点名词（“床”），与其他从句有别。此外，这个幽默点描述了一个与特殊活动相对应的普通活动，介绍了一个与公共空间相对应的私人空间，并指向休息、睡觉和其他更加私密的活动。这一说【347】

笑收获了响亮的笑声，它说明听众被“去睡觉”这个笑点逗乐了，也能够理解一个人在拜访了卡普斯提及的所有地方之后可能会疲惫。对于这一人群来说，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亲密接触的含义，如果被感知到，也不会觉得是有问题的。在第二站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卡普斯已有写好了的演说稿摆在面前，这种日程性叙事（itinerary-narrative）再一次上演。但这一次，地名的罗列出现在演说的起始处，也没有一个幽默的结尾，这说明案例（9）中的结尾应该是即兴创作的。然而，在第三站和第四站，幽默点回归到演说中，这两站的听众成员主要是学生。事实上，每一次幽默点的改变说明演说者在创作他的话语时都格外谨慎。在第一站，圣塔玛丽亚附近的汉考克学院（Hancockcollege）[1]，卡普斯受邀在政治科学课堂上发表演说，他知道听众里可能包括媒体成员和一些非学生支持者。

（10）（1995年11月14日，圣塔玛丽亚，汉考克学院。）

卡普斯：　我们处于一个……一个非常非常满当的日子中间。……呃
　　　　　我们从－圣米格尔教堂……开始了这样的一天。……呃
　　　　　我们那样做是出于，呃……精神和宗教礼拜方面的原因
　　　　　为了具有……（你知道）根源和方向上的……正确性……
　　　　　然后我们从那儿出发…… 来到帕索罗布尔斯，我们拜访了一些
　　　　　人……呃－在街角，并且－……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我们刚刚从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过来
　　　　　我们接下来将会……回到我们的大学校园，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然后，继续前往……隆波克
　　　　　和－……比尔顿
　　　　　以及……索夫昂
　　　　　然后－极有可能就到了晚餐时间。// 呃
听众：　　（（稀疏的笑声））呵－呵－呵

演说的最后一句是去晚餐而不是去睡觉，在这里是有意义的；因为人们都知道学生和年轻人一般都睡得晚，去睡觉可能所具有的性含义在这种语境下也许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接下来的一个地点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校园，卡普斯曾是那里宗教研究方面的教授，也是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那里，卡普斯在地名列举的结尾处提到了一个市中心的酒吧，那是一个本科生最喜欢去的地方，但不可能是卡普斯和他的妻子会去的地方。

【348】

（11）（1995年11月14日，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园）

卡普斯：　你们知道－我们－我们－我们在圣米格尔开始了这样的一天。呃，
　　　　　在这里的北边。呃－
　　　　　我们一直走到了－到了蒙特利县的县界……
　　　　　我们在那里开始演说＝
　　　　　＝接下来，我们去了帕索罗布尔斯。……
　　　　　我们去过圣路易斯奥比斯波＝

1　全称为“艾伦·汉考克学院”，美国加州的一所公立学院。——译者注

我们去过圣塔玛丽亚。……
我们 - 我们 - 我们现在当然到了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们要去 // 接下来要去，呃，我想这很清楚
听众： （（稀疏的笑声））呵 - 呵 - 呵
卡普斯：很清楚，我正站在这里。
听众： （（笑声））哈哈 - 哈哈哈 - 哈哈
卡普斯：（（清嗓子））
呃，我们接下来要去……去隆波克，……
然后我们去比尔顿，比尔顿
然后我们去索夫昂，=
= 然后，呃 -……如果 -
如果我的妻子同意，我们将会去马蒂酒馆 // 在那之后。
听众： （（笑声，欢呼声））呵呵呵 - 呵呵呵呵呵

幽默、调侃和笑声的使用可以成为创造或抵制预期的强有力的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幽默的使用也显现了演说者对他自身的类型和听众的理解，而这正是一个政客的关键素质。

除了像演讲这样正式的言说风格，人类学家认为非正式言说在理解文化如何适应特定目标和活动方面，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例如闲聊，它是一种扩散传闻的活动，在不同文化里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具体的、有名称的言语活动。闲聊通常被去合法化而处于权力的正统语境之外；但是，闲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语境，人们在其中讲述故事、讨论和协商权力关系、文化规则、社区处罚，并建立起社会关系（Brenneis, 1984; Haviland, 1977）和连贯性。同时，人们频繁地作出评价、确认评价（Goodwin and Goodwin, 1992），也运用传闻去组织共同的诠释，包括什么是道德的（如 Besnier, 1990）。闲聊使人们对行为的诠释成为一个互动的事件。

在案例（12）中，言说者正在聊一种新的、不太体面的女性穿着形式。这种穿着形式是波纳佩与美国文化接触的结果，它被认为是威胁到了波纳佩的女性身体的传统表现。其中一个言说者是一名女性，她自我反思地指出，不把闲聊当作一种受到敬重的活动——事实上，闲聊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无论如何，闲聊在任何一个地方仍然是一种受欢迎的消遣！）。

（12）（1991 年，波纳佩）
A: *ah R ((her husband)) inda dene kilang pw eke pahn riahla*
but R ((her husband)) says ‘careful because you will be cursed’ (for gossiping)
但是 R（她的丈夫）说，“当心，因为你可能会被诅咒”（因为闲聊）
((A animates his voice)) ‘kowe mwahuki kawe arams’ 【349】
((A animates his voice)) ‘you’re always criticizing people
（（A 模仿他的声音））“你总是在评论别人
menda remw kin pil indinda songen style in emen’
never mind your habitual talking about some people’s style
更别说你习惯性地谈论一些人的衣着式样了

这个言说者在评论另一个女性M的衣着。尽管M穿了一条在文化上被认为是恰当的裙子，但是她选择的是一条言说者A认为太薄的编织裙，以至于人们可以看到M的大腿轮廓。在波纳佩（Pohnpei），女性绝对不能在公共场合显露她腰部到膝盖之间的身体轮廓。

（13）（1991年，波纳佩）

A: *i pirekek kilang a likou tangete wasahn*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her colthes were like this
我回头就看见她的衣服是这样的
((voice changes pitch)) 'M ((name)), ke urohs?'
((voice changes pitch)) 'M, are you even wearing a skirt?
（（音调发生了变化））"M（（名字）），你难道穿了一条裙子吗？
eri mwahu men re aramas kileng weite dahngemwen
you think it's good if people can see your thighs?
如果别人能看到你的大腿，你认为这样好吗？
dah ke kin koasongosongih ohlakan'
what are you doing always enticing men?'
你正在做的就是经常引诱男人？"

通过这样的话语，人们不仅表达、再生产出有关性别、从众性，以及个体、他人与群体之间合理关系的本土观念，而且检验了有关这些文化形式的持久性的想法（Keating, 2002）。

另一种形式的公众共享表征和图像再生产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我们也将转向检验话语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第三种基本方式——再生产和表征的系统。

16.7 再生产和表征的系统

在有关文化的学术话语中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描述文字社会、无文字社会或前文字社会之间的差异。这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描述模式假定了印刷技术的优越性，并倾向于忽略口头叙事和记忆作为历史和文化记录形式的重要性。有文字群体与无文字群体的二分法因其对文字效果的假设受到了广泛批评。如今，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表征技术、表征工具的融合和使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即便是在相同的文化里。例如，在美国的爵士音乐家中，对文字的崇尚和轻蔑同时存在，爵士音乐家使用文字可能会招致严厉的批评（Duranti, 2008）。人们期望爵士音乐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旋律，以区别于原始作品中的旋律。演奏中的创新部分就成为这些音乐家形成认同的重要部分，他们认为阐明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不读乐谱演奏是一种审美选择，而不是知识和训练的一种缺乏。正如我们在前文案例（8）中看到的那样，萨摩亚人把对写作的依【350】赖看作是获取有关传统的真实知识，包括获得发表正式演说的能力的一种障碍。一个只从书本中学习的人得到的是次等知识。事实上，这种信念还存在于一个人人都读《圣经》的社群，演讲常常借用《圣经》里的表述，这说明文化属性对确定受人喜好、被人准许的话语类型具有关键作用。

既然我们知道，与文字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文化价值，它们说明何种类型的知识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对部分群体（比如美国的爵士音乐家、萨摩亚人演讲者）质疑文字作用这样的事实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当外来者把文字引进一个社群，他们可以运用文字使本土传统知识（Schieffelin, 2000）和本土话语形式去合法化。

新的表征形式在一系列不同的文化群体、工作类型之间组建而成。例如，计算机工具正在改变工程设计工作中协作的本质（Monteiro and Keating, 2009）。如今，工程计划和表征的传达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在分散的地点之间能够组建虚拟团队。在过去，工程师要共享一个实体的工作场所，并在其中完成设计任务。现在，出于在全球劳工经济中"保持竞争性"的渴望、工程师在美国的短缺、跨越巨大的文化和时间差异以实现设计的即时共享交流的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老板要求他们雇用的工程师与其他工程师展开合作。后者处于较低的"成本中心"，所在国家的生活成本、每个小时的工程设计成本要低很多。在一个类似的群体里，描述一个在建工厂的建筑计划的文件，以及列有已经完成的和尚未完成的工作任务的文件，都成为每周会议的一个重要部分，并要求协调团队工作。在这些会议中，工程师们对工作进程、面前的文件所表达的信息都必须建立起一个共享性理解，以及如何把"所需"或"行动清单"转化为今后的分配任务。清单的意义不单单是指诠释的完成。下面的案例中，工程师们在推进一项已经印刷成文的议题。由于其惯例性的、抽象的和去语境化的形式，印刷成文的议题遗漏了一些为完成行动、解决理解方面的问题而需要的重要信息。

传统上，工程师习惯在同一个实体场所里工作，那里盛行口头叙述和口头工程文化，手头工作所需的详尽细节很少被书写下来。在案例摘录的起始处，工程师们正在制作每周的需求清单。几乎是在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份清单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出共享的知识状态和设计基础。工程师们来回多次交谈才对一个关键的工程特征——数字和水坑的类型——的错误呈现达成一致理解，并着手去更正它。只有一部分人知道这个重要的更正，包括东欧办公室在内。因此，它在整个环境下被当作"新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类新闻表明糟糕的团队沟通和能力的不足。在工程设计这样的跨文化工作中，沟通能力的不足经常被列入原型设计失败事件的清单里。

（14）（2008年4月7日，12点06分） 【351】

欧洲经理：　我提议集中关注下－去看看我们的需求清单。
美国工程师R：　我没有我没有看到它，哦，需求清单，现在是另外一个了。
欧洲经理：　是的。
美国工程师R：　好的，那么行动清单已经完成了。
美方（？）：　嗯。
欧洲经理：　关于压力的行动清单。
美国工程师R：　压力。现在我们来大体看看这个行动清单。
欧洲经理：　是的。
美国工程师R：　好的。（.）继续。
欧洲经理：　第九项。
美国工程师R：　嗯，一个水坑的容积
欧洲经理：　氢工厂，地下管道与氢工厂的连接。有另外一名设计师将分配到我的

团队里，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美国工程师R：　谁能重新－讲一下有关－据我所知，这个水坑是（（东欧办公室那边在谈论的东西））

美国工程师R：　好的。但是我先告诉你有关水坑的事情。这个数字九，好吗？我们没有－

欧洲经理：　不是数字九。我谈论的是这两个水坑。一个是油和污水，另一个是油和水。

美国工程师R：　哦，我们有两个水坑？

美国项目经理：　是的

(……)

美国工程师R：　谁知道它？

美国工程师安迪：一共有三个水坑

这样的情景成为工程师们的原始叙事（source narratives），用来质疑离岸外包工作的价值，并构建他们对传统工程设计方式的优越性的信念系统。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信息渠道和口头交流渠道，工程师可以和他长期、每天都有互动的人展开交流，这是传统工程设计方式之所以有效的地方。与印刷资料的协调统一、文档计划的再现表达相关的问题，在一开始看来就是一个琐碎事件的陈列。其中，有一个讨论关注的是描述月份和日期的数字排序，它在北美和欧洲是有差别的。

文本表征形式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得到检验：一个聋人复述她第一次使用TTY[1]的体验。TTY是一种在电话线路上进行文本转换的技术（因为互联网有更加优越的视觉表征潜力，这种技术已经过时了），它增强了聋人话语交流的自主性，也扩大了话语交流的范围。

（15）（2000年，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注意：我们遵循惯例，用大写字母做手语标识注解。）

TO:　YES. ON OF MY MOST THRILLING, BECAUSE I FINALLY CAN HAVE TTY TO TALK WITH MY FRIEND FAR. NOT MUST DRIVE, I ASK MOM, ‘PLEASE DRIVE SEE MY FRIEND’. NOT MUST, COLL.

Yes. It really was one of my most thrilling experiences [using the TTY for the first time],because I could finally talk to my friend who lived far away. I didn't have to get in the car and drive, or ask Mom, 'Please drive me to See my friend'. I didn't have to do that. It was cool.

是的。这是我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第一次使用TTY]，因为我终于可以和住在远方的朋友说话了。我不用坐上车再驾驶过去或请求母亲，‘请开车带我去见我的朋友’。我不用那样做了。真酷。

【352】

TO:　NOW I USE INTERNET, BETTER INTERNET. ME TTY, FORGET IT. BETTER THROUGH INTERNET. AMAZING.

Now I use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is better. For me, the TTY, forget it. It's better through the internet. Is'amazing.

1　全称为teletypewriter，即电传打字机。——译者注

我现在使用互联网，互联网更好。对我来说，TTY，
忘了它吧。在互联网上交流更好。真是不可思议。

在很多地方，新的系统现已成为理所当然，这些新系统用于表征和再生产大大超越了一个人紧邻的空间范围的人类信息，创造出新的互动框架并投入其中。上例中这个聋人所描述的“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比 TTY 或输入文本更加优良。TTY 依赖话语轮回的转换，后者必须借助 GA 或“go ahead”（发送）的使用才能组织起来，如下所示。

（16）（研究者 E. 基廷和 G. 米鲁斯之间交流的一个键入文本或 TTY）

G: HI GA
嗨，发送

E: HI THIS IS ELIZABETH, IS ALL FINE WITH GENE THER4
嗨，我是伊丽莎白，吉恩[1]他们四个都好吗
AND THE COMPUTER GA
还有计算机，发送

G: UV THIS IS GENE ANDI JUST DOWNLOADED NETMEETING AND
AM GETTING READY TO HAVE IT ISTALLED GA
UV[2]，我是吉恩，我刚下载好 NetMeeting[3]
我准备要安装了，发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互联网拥有丰富的中介渠道，用来呈现、发送视觉语言形式，正如下面这张手语会话图片所示。基廷的图像是右下角的那个小方块。在所展示的情境里，基廷在德克萨斯，而她的研究合作者米鲁斯（那个正在打手语的人）则在华盛顿特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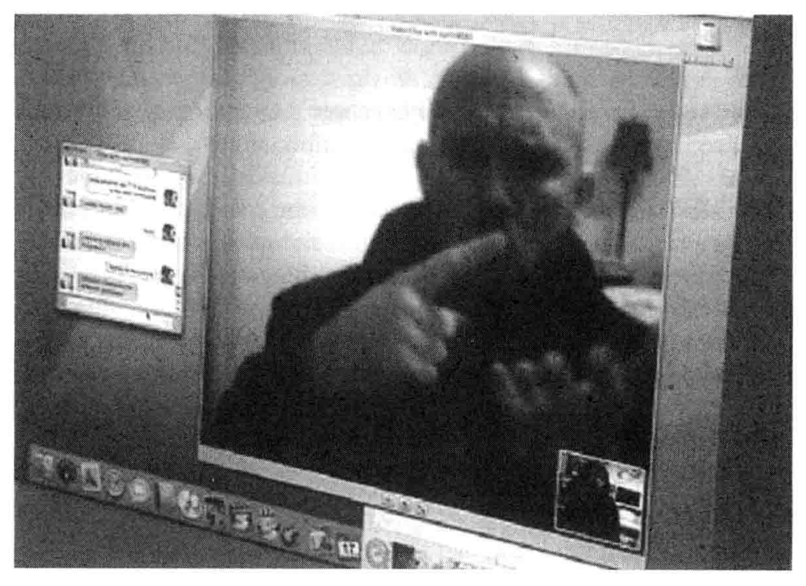


图 16.1

1 这是研究者米鲁斯的名字。——译者注

2 原文未标注，可能是“unique visitor 独立访客”的缩写。——译者注

3 一个实时的语音、图像和视频交换程序。——译者注

【353】 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手语空间对手语话语产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影响。由于打手语的人无法共享同一个空间，他们要跨越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不同属性，用新的方法创造出指向或指示参照的意义（例如，用食指来指是否意味着我空间里的“这”或你空间里的“那”）（Keating and Mirus, 2003）。无论如何，打手语的人和其他人都展示出他们对媒体再生产和表征的不同属性、对新话语领域的巧妙的适应，他们也会影响这些表征技术的使用方式。同时，他们能灵活地运用各种类型的资源来达成连贯性、形成认同、维持关系，以及理解相互间的看法。

16.8 总　结

我们在这一章里展示了话语与文化是如何相互建构的。从我们自己在波纳佩、萨摩亚、美国、德国和东欧的研究中，我们抽取、识别出大量语境，在这些语境中，通过言说和其他符号资源生产出社会认同，并对其加以管理。我们还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的语言会提供许许多多的具体资源，用来形成和诠释属性、协商社会等级、应对互动语境里的变动。跨文化研究证明，话语在表达、引导个体和集体经验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

我们分析话语的方式有着很深的人类学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总是从民族志经验出发（比如通过在特定社区里的参与—观察），并努力获得对一个语境的民族志理解，也就是从参与者视角上获得的一种理解。我们发现，言说者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完成的大多数事情都指向认同问题；因此，我们关注话语对人的范畴和属性的建构。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认为用社会规定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出人类的存在困境。从这种意义上看，广义的语言既为我们实现目标提供工具，也为我们在任何既定场合下的言语内容设定限制。人们与他人进行日常交流的那些“自然状态”是表面的，它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自己做出的每一个表达负有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偏向、价值和属性会通过话语显现出来。

语言人类学家们相信，在社会生活里，这种复现的、被普遍误解的、复杂的意义表达和协商过程可以得到详细的分析。我们在这一章中对文化与话语的主要交换方式进行了讨论，意在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话语工程这样的观念提供一瞥。

延伸阅读

对那些希望扩展他们对话语和文化的理解的读者，我们推荐下面这些文献：

Gumperz,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展示了说者和听者运用语言特性进行交流的诸多方式，比如语调和韵律，还有风格转换和代码转换。它既讨论了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的交流问题，也对语言的社会意义分析进行了讨论。

Duranti, A. and Goodwin, C. (1992) *Rethinking Contex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探究了语言和语境之间相互定义的现象。这是一本论文集，关注语境在面对面互动、广播谈话、医疗诊断、政治会面、社会实践等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Silverstein, M. and Urban, G. (1996)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iscour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这本书讨论了作为文本的文化概念，尤其是话语的“文本化”（entextualization）和“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过程。书中的论文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文化实践，从沃洛夫（Wolof）[1]流浪艺人中的辱骂诗到美国法律学校的课堂。

Hill, J. (2008) *The Everyday Language of White Racism*. Malden, MA: Blackwell.

该书分析的是种族主义如何通过日常语言实践被生产出来，这些日常语言实践在不断的累积中维持种族主义者的刻板印象。该书对美国文化给予了关注。

在线阅读

以下论文可以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网站上获取。

Monteiro, M. and Keating, E. (2009) 'Managing misunderstanding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Vol. 31, No. 1, 6-28.

Duranti, A. (2010) 'Husserl, intersubjectivity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0(1): 1-20.

参考文献

Bauman, R. (1986)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uman, R. and Briggs, C. (2003) *Voices of Modern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nier, N. (1990) 'Conflict management, gossip and affective meaning on Nukulaelae'. In K. Watson-Gegeo and G. White (eds), *Disentangling: Conflict Discourse in the Pacif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0-334.

Boas, F. (ed.) (1911)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40. Reprinte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Introduction reprinted with J.W. Powell, *Indian Linguistic Families of America North of Mexico*.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6].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enneis, D. (1984) 'Grog and gossip in Bhatga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Fiji Indian convers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11:3.

Brown, P. and S. Levinson (1993) ' "Uphill" and "downhill" in Tzeltal'.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3*(1): 46-74.

Chomsky, N. (1975)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Plenum Press.

Duranti, A. (1984) 'Lauga and Talanoaga: two speech genres in a Samoan political event'. In D.L. Brenneis and F.R. Meyers (eds), *Dangerous Words: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Duranti, A. (1992) 'Language in context and language as context: the Samoan respect vocabulary'. 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7-99.

Duranti, A. (1994) *From Grammar to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ranti, A. (1997)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沃洛夫人，是一个非洲民族，分布在冈比亚、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译者注

Duranti, A. (2006) 'Narrating the political self in a campaign for US Congress'. *Language in Society* 35: 467-97.

Duranti, A. (2008) 'Orality with attitude: Ambivalent views of literacy among Samoan speechmakers and jazz musicians'. *L'Homme* (printed with the title 'L'oralité avec impertinence: Ambivalence vis-à-vis de l'écrit chez les orateurs samoans et les musiciens de jazz américains'), 189: 23-47.

Duranti, A. (2010) 'Husserl, intersubjectivity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0(1): 1-20. ant.sagepub.com/cgi/content/abstract/10/1-2/16

Fisher, B.D., Agelidis, M., Dill, J., Tan, P., Collaud, G. and Jones, C. (1997) 'CZWeb: Fish-eye views for visualizing the world wide web'. In M.J. Smith, G. Salvendy and R.J. Koubed (eds), *Design of Computing Systems: Social and Ergonomic Considerations: Advances in Human Factors/Ergonomics*,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pp. 21b, 719-722.

Foley, W. (1997)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 New York: Free Press.

Goodenough, W.H. (1964)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 In D. Hymes (ed.),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Goodwin, C. and Goodwin, M H. (1992)'Assessm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xt' . In A. Duranti and C. Goodwin (eds), *Rethinking Context: 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47-89.

Goodwin, C. and Goodwin, M.H. (2004) 'Participation'. In A. Duranti (ed.), *A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p. 222-44.

Gumperz, J. and Hymes, D. (eds) (1964)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Special iss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6), part Ⅱ .

Hanks, W.F. (1996)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Haviland, J. (1977) *Gossip, Reputation, and Knowledge in Zinacant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viland, J. (1979) 'How to talk to your brother-in-law in Guugu Yimidhirr'. In T. Shopen (ed.), *Languages and their Speakers*. Cambridge, MA: Winthrop.

Hutchins, E. (1995)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ymes, D. (1972)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J. Gumperz and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Jakobso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398-429.

Keating, E. (1998) *Power Sharing: Language, Rank, Gender and Social Space in Pohnpei, Microne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ating, E. (2002) 'Everyday interactio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social inequality'. *IPRA Pragmatics* 12, 3: 347-59.

Keating, E. (2008) 'Space shifting: New technologies, new opportunities'. *Texas Linguistic Forum*, 52: 70-9.

Keating, E. and Mirus, G. (2003)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n virtual space: interactions between deaf users of computer-mediated video communic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language practices'. *Language in Society* 32: 693-714.

Keating, E. and Sunakawa, C. (2010) 'Participation cues: Coordinating a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in complex online gaming worlds'. *Language in Society*, 39: 331-56.

Kroskrity, P. (1998) 'Arizona Tewa Kiva speech as manifestation of a dominant language ideology'. In B. Schieffelin, K. Woolard and P.V. Kroskrity (eds), *Language Ideologies, Practice and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3-22.

Kulick, D. (2003) 'N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 139-51.

Lane, H. (1992) *The Mask of Benevol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Lawrence, D. and Low, S. (1990)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for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 453-505.

Lutz, C. (1988) *Unnatural Emo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ttingly, C. (1998) *Healing Dramas and Clinical Plot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nteiro, M. and Keating, E. (2009) 'Managing misunderstanding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31 (1): 6-28. ant.sagepub.com/cgi/content/short/3/2/219.

Ochs, E. (1988) *Cultur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a Samoan Vill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pir, E.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anovich.

Sapir, E. (1927) 'The unconscious patterning in behavior in society'. In E.S. Dummer (ed.), *The Unconscious: A Symposium*. New York: Knopf. pp. 114-42 [reprinted in D.G. Mandelbaum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544-59].

Schieffelin, B. (2000) ' Introducing Kaluli literacy'. In P. Kroskrity (ed.),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e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Shore, B. (1989) 'Mana and Tapu'. In A. Howard and R. Borofsky (eds), *Development in Polynesian Eth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37-73.

Throop, C.J. (2003) 'Articulating experience'. *Anthropological Theory* 3: 219-41. ant.sagepub.com/cgi/content/short/3/2/219.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Urban, G. (2001) *Metaculture: How Culture Moves Through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57】

批判性话语分析 1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诺曼·费尔克拉夫　简·马尔德里格　鲁思·沃达克

17.1　何谓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 CDA）在近几十年里已成为在社会科学中确立起良好地位的领域。但是，与语言学的一些分支相比，CDA 并不是一个与一系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相分离的学科。相反，我们最好是将 CDA 看作是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运动，它涵盖了诸多不同研究路径，每种路径都有着不同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和议程。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的是对权力、不公、社会弊端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变迁的符号学维度的共同兴趣。CDA 的独特之处在于：①它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分析视角，以及②它在方法论上批判的研究路径。我们现在来讨论这几点，首先从探讨"话语"和"批判的"这两个概念开始。

"话语"这个术语在社会科学以及 CDA 领域中有多种使用方式。在最为抽象的意义上，"话语"是一种分析范畴，用以描述我们可获取的大量的意义制造资源。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使用"意指过程"这个替代术语（包含了词语、图片、符号、设计、色彩、姿态等），以此将它从其他常识意义上的"话语"中区分出来，后者是用以辨识再现社会生活某个方面的特殊方式的范畴（比如共和党与民主党有关移民问题的话语）。CDA 视话语（或意指过程）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这意味着，在一个特殊的话语事件与架构该事件的情境、机构和社会结构等所有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的。对话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是一种双向关系：话语【358】事件被情境、机构和社会结构形塑，但也形塑着后者。换种不同的方式讲，话语构成社会，也由社会所形塑：它构成了情境、知识对象以及人与群体的社会认同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话语帮助维系和再生产社会现状以及改变社会现状这两种意义上，话语都具有建构的功能。由于话语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导致产生了重要的权力议题。在对话性理解中，社会世界的一种特殊结构（比如宰制与分歧之间的关系）隐含于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概念化；在语言中，我们并不简单地命名事物，而是将其概念化。这样，话语实践便有了重大的意识形态效果：也就是说，它们通过再现事物和确定人的位置等方式，帮助生产和再生产（比如）社会阶级之间、女性和男性之间以及种族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如此，比如说，话语可以是种族主义的或者性别歧视的，并试图将任一方面的社会生活的相关假设（通常是虚假的）伪装成只是常识而已。使用语言的特殊方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以及隐藏在这种承载之下的权力关系，对于民众

而言往往并不清楚明白。CDA即是指在使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这些方面由不透明而变得较为明显可见。

在时至今日的大多数CDA学术研究中，“批判的（critical）”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是不言自明的词语，同时它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相当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意义。在西方，批评（critique）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传统，可追溯至古希腊，经过启蒙时代哲学家的阐述而发展至现代。日常生活语言中采用这个词，意思是运用理性思考来质疑论点或流行的看法。这个术语在CDA的运用可以回溯至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在这些流派中批判同时是解释社会现象和改变社会现象的机制。这一解放性的议程对于CDA作为一种科学实践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CDA并不是将自身视为一种冷静而客观的社会科学，而是参与投入式的，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介入形式。与其他研究路径相比，CDA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妥协于社会科学客观性和严谨性，而是公开明确地置自身于被宰制、被压抑的群体的立场，反抗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兴趣和政治运用通常是不那么直接明确的。当然这不一定意味着CDA就不像其他研究那样具有学术性：如同其他路径一样，小心谨慎的、严格系统的分析标准也同样适用于CDA。

以问题为导向的、批判的研究路径意味着方法论上的独特视角。与其他以话语为基础的研究形式所不同的是，CDA不以某种固定的理论和方法论态度为始。相反，CDA研究过程始于一个研究话题，譬如种族主义、民主参与、中东政治、全球化、工作场所素养、消费文化等。方法论是一个形成于理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话题进一步提炼，以建构出研究对象（准确找到具体的焦点和研究问题）。[1]这种对合适方法（数据搜集和分析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一个人所要调查的内容。于是，比如说，考察福利政策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探讨北爱尔兰工作场所的宗派主义，有可能需要一系列不同的分析和理论工具。这要求CDA研究必须采用多种多样的路径，借助于不同的语言分析技巧和理论，尽管所有这些分析技巧和理论都将涉及到某种形式的细致的文本（和/或者多种模式的）分析。

【359】

17.2 语境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近期的发展，是回应于、有助于、而且借力于对当代社会中语言的批判旨趣的急剧增长。例如，针对商业广告修辞、用于非个人化服务接触（service encounter）[1]中的模拟私人性，以及政客们为了向公众推售其想法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旋转”（spin）[2]手段等，对于这样的语言使用，存在着广泛批评。而在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对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方面的语言使用，大众意识的程度也很高。与此类似，政治行动主义和公众对所谓的“恐怖主义之战”的批评，将推进并合法化战争的军事和语言策略凸显出来。这种对人们在日

1 是服务营销中的一个术语，指服务供应者与客户之间的人际接触。——译者注

2 最早起源于体育运动，用于指代在板球、桌球和棒球等体育运动中运用的一种旋转式击球动作，这种动作能使运动员更好地控制球的运行轨道和方向。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个体育名词开始表示“通过有倾向性或歪曲的报道以期在公众面前制造对己有利的影响”。从此，spin成了通过改变事实的“轨道”来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译者注

常生活中遇到的语言实践的批判意识，反映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的重要转向，其中一些转向历时较长，并且构成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其他一些转向则出现在较为近一时期，描绘了“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1] 特征（Giddens, 1991）。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语言在大范围的社会过程中越来越显著和重要。语言在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令人瞩目。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2] 语境下，经济生活的平衡已日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文化和休闲产业。这类行业的收益与成功严重依赖于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以符号为中介的）“面子”，这解释了它们为何倾心关注设计、表演和传播技巧。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要求这些行业在竞争性的市场基础上运行，已致使对设计的大范围关切成为必需（在教育领域，参阅 Fairclough, 1993; Mulderring, 2003）。

与此同时，社会生活的关键领域也日益以媒体特别是电视为中心，这在政治领域尤为显著。现在的政客们拥有空前的渠道，定期接近广大受众，为他们形塑意见并赢得支持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但同时也加大了公众曝光和丧失名誉的风险。政治语言的精心设计是政治斗争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近些年政客日益加剧使用公关代理或者“媒体公关”（spindoctors）[3] 去修护其公共形象，并管理其思想的散播（Chilton, 2004; Wodak, 2009）。上届英国政府以其准商业实践而著名，这种实践包括将它自身“重塑”为“新”工党（Fairclough, 2000b；有关其政策话语的策略性呈现，参见 Mulderring, 2007; 2009; 2011a）。

【360】如同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增加了对控制和形塑语言使用的有意识介入，这种介入依经济、政治和机构目标而定。这种将“传播设计”与机构环境的系统整合已被相关学者称之为“话语的技术化”（Fairclough, 1992），也是当代语言和话语秩序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事实上，这是后现代社会生活总体上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一个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形式“反身性”（reflexivity）。正如吉登斯（Giddens, 1991）所指出的，当代生活是反身性的，即在于人们会激进地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其改变基础是有关那些实践的（“专家”）知识和信息。“生活方式”大师在媒体中的盛行恰是这种趋势的一种表现。话语的一种“技术化”就是这种“自上而下”，也即现代反身性的机构面向；但还有“自下而上”的另一面，与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相关。我们可以将此描述为一种对话语实践的普遍的批判意识，以及一种将它们转化为社会抗争的定向。这种对自我的反思性建构和重构是日常生活的常态特征，也会持续性地采取新的形式。譬如，当前流行的“社会联网”（social networking）趋势引发了反思性话语实践（如脸谱、MySpace、推特），建构着社会认同、关系、政治抗议、社会抗争、消费和娱乐。因此，这种“批判的本能”及其在话语中的应用首先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其次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作为一种学术追求，批判性话语分析坚实地植根于当代生活的特性上。

1 又称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是现代性基本特质的极端化，全球化是其标志。具体参见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 年。——译者注

2 以小型、更加灵活、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为特征，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相区分。——译者注

3 是指总统竞选中所雇的媒体顾问或政治顾问，他们负责对候选人进行从演讲谈吐到穿着打扮的全方位包装，旨在保证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获得最佳宣传。候选人在公众场合的每一句演讲乃至每一个手势，都可能是由 spindoctor 们设计过的。因此，该词也有译作“政治化妆师”。——译者注

17.3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理论缘起

CDA 在其诸多不同的形式上有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根源。从广义上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这必然意味着，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机制的意义（意指过程，semiosis）和意识形态成为关注中心。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20世纪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关键人物和运动，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路易斯·阿尔都塞等。批判性话语分析者并不总是将他们自己纳入在这一传承之中，但这一传承无论如何也架构了他们的研究（对这些关键的理论家与 CDA 的关系的论述，一个可获得的文献是梵·迪克的论文［van Dijk, 1998］）。葛兰西对当代权力的维系的观察不但基于强制性力量，而且也基于“霸权”（hegemony）（赢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他的观察分析在 CDA 中一直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对霸权的强调必然导致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实践如何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常态化的强调。阿尔都塞（Althusser, 1971）对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主要贡献，他表明了这些社会关系是如何与嵌入在社会机构内（如学校教学）的有形实践联系起来的。他还说明了社会关系将人定位成社会“主体”的能力，尽管他在看待这一过程时，有着一种过于决定论（结构主义者）的倾向，这种看法给主体行动留下的空间寥寥无几。福柯的话语研究指向反对这样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主义论述，其研究激发了对话语分析的浓厚兴趣，但这种分析是相当抽象的，它不是定位在对特定文本的细致分析上。对于福柯（如，Foucault, 1971; 1979）而言，话语是人类科学（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揭示出社会和政府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现代社会构成了权力（也可参阅 Jäeger and Maier, 2009）。一个进一步产生影响的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特别是他对动态权力关系中语言、社会位置与象征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论述（Bourdieu, 1991）。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里，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1986）的研究在话语分析中也历来相当重要。与之密切相关，沃洛希洛夫的研究（Volosinov, 1973）是关于意识形态的首个语言学理论，主张语言符号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原料，所有的语言使用都是意识形态的。在发展了一个理论类型的同时，巴赫金的论述强调文本的对话属性，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思想引入进来（参见 Kristeva, 1986）。正是这一思想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文本链中的一环，它回应、利用并转换其他文本。

【361】

“批判的”这一术语与法兰克福哲学流派特别相关。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检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康德（Kantian）的“批判”意味着需要运用理性分析质疑人类的知识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将此点扩展至对各种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至关重要的文化形式的分析。根据于尔根·哈贝马斯（J ü rgen Habermas），批判的科学必须是自我反思的（反映了其背后隐藏的利益），而且它还必须考虑语言和社会互动发生的历史语境。

17.4 当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与发展

接下来我们简要概述一下 CDA 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些理论路径。如需对此更为全面地梳理，建议读者参考大量有关 CDA 的专著的概述和介绍（参见本章末的“延伸阅读”）。

17.4.1 批判语言学与社会符号学

CDA 作为一个已确立起来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其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 1970 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批判语言学”（CL）奠定的（如，Fowler, et al., 1979）。这与“系统”语言学理论密切相关（Halliday, 1978），该理论说明了它对分析文本的实践路径的强调，以及它对意识形态分析中语法作用的注意。在一般意义上，CL 关注某些语法形式的意识形态效力，比如像被动【362】结构和名词化。这样的语言形式（以及其他形式，像某些隐喻、论证谬误、修辞手段等）此后一直被证明是颇富成果的切入点，由此对社会不公平或不公正进行批判符号学分析。然而，要说明的重要的一点是，分析者不能简单地从这样的形式中“读取出”（read off）意识形态分析；批判性诠释助推研究对象的描述，同时，任何这样的诠释必须与社会**语境**相联系。

后来的几位批判语言学主要人物发展了“社会符号学”（van Leeuwen, 2005a; van Leeuwen and Kress, 2006）。社会符号学凸显了当代社会中大多数文本的多重符号特点和潜在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且还探索了分析语言、形象、设计、色彩、空间安排及其他要素交汇的方式。近期的研究聚焦于版面设计（van Leeuwen, 2005b）和新媒体比如动态设计（van Leeuwen and Caldas-Coulthard, 2004）的符号学。杰伊·莱姆基的近期研究（Lemke, 2006）探讨了多媒体符号学及其对批判研究和教学的意义。譬如，他强调了在新的多模态类型（multimodal genres）中隐含的价值系统与机构认同和个人认同之间的关联（2005b）。而且，在涉及“超链接”导航的时空转型的基础上，他（Lemke, 2002）认为我们通过一系列多重时段（比如互联网及其多种多样的物质环境）的“穿越”日益频繁地体验生活。该研究扩展至对“跨媒体”的分析（2005a），也即媒体的不同形式通过经济和文化的纽带而相互关联（比如，与某个特许经销权相关的书、电影和游戏）。显然，这些媒体之间的联系同时是符号的、意识形态的、物质的和经济的。因此，它们在所谓的“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的政治经济学里扮演着关键角色，帮助特定的社会价值在全球范围跨地域传递和嵌入（Graham, 2006）。

17.4.2 费尔克拉夫的研究路径

费尔克拉夫的研究发展出了一套话语的对话理论以及一种研究社会变迁的跨学科路径（Fairclough, 1992; 2003a; 2004; 2005b; 2006）。费尔克拉夫的路径探索了当代社会转型过程的话语方面。这种致力于跨学科——由此而来的是不同学科的逻辑和范畴——的投入被引入到学科之间的对话，这也赋予了他与人合作的研究类似的特征。[2]他最近的论著考察了新自由主义（英国工党政治里的新自由主义，2000a; 2000b；新自由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关系，2004），国际安全中的“共同体”观（2005a），以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等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概念（Jessop, Fairclough and Wodak, 2008）。每个分析案例中都引入了 CDA 与其他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话，旨在考察这些社会变迁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反映在话语中，并探讨话语变迁的社会转型效果。

【363】话语变迁是根据文本中的话语和类型的创造性的结合来进行分析的，这种结合经时历久，便导致机构内和跨机构的不同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重构，以及“话语秩序”（与特定社会领域相关联的话语实践的结构化套系）内部和之间的边界转移。譬如，在当代社会影响了诸多公共

机构的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变迁是公共话语的“聊天化（conversationalization）”，是公共领域中会话实践的模仿，这种模仿改变了公共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话语秩序之间的界限。选择聊天化或者市场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是将CDA更进一步带入当代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对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之中（比如参见费尔克拉夫关于聊天化的研究，Fairclough, 1994）。费尔克拉夫的最新研究是这种关于当代社会议题的跨学科路径的自然发展，它明确地与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议程相结合；在其他研究事物中，这一议程与话语理论相融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一些概念，如“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等。[3]

17.4.3 社会认知研究

在以认知路径展开批判话语研究中，一个领军人物是梵・迪克，其论著突出了话语如何运作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知识中的认知维度（如，van Dijk, 1993; 1998）。梵・迪克（van Dijk, 1993）对媒体和精英公众人物在种族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的研究，凸显了（种族主义）公共再现与社会常有的种族偏见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将移民视为入侵，将移民者和避难者视为揩油之人、犯罪分子和暴力实施者。其进一步的研究项目系列包括对知识和话语之间的关系的系统研究，发展出知识类型学，以语境为基础将知识定义为社会群体中共享的信念共识（van Dijk, 2008b）。与此相关的是一项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项目，将语境视作通过话语参与者的诠释而不断建构的事物（van Dijk, 2008a; 2008c）。

将认知视角与CDA相结合的近期发展包括科勒关于认知隐喻理论、特别是在公司话语领域中的论著（Koller, 2004; 2005）。她的研究（2008b）还包括对女同性恋社区以及在公司和公共品牌创建中产生政治共鸣的隐喻使用的分析（2007; 2008b）。保罗・奇尔顿的认知语言学路径为政治话语分析（Chilton, 2002; 2003; 2004）以及CDA研究议程的发展（Wodak and Chilton, 2005）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他最近提出主张，在一个研究共同体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下，CDA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是解决其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问题。具体而言，他认为CDA常常无法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参与批判实践的自由以及对“批判”的理解，在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中会有天壤之别。他的最新论著借用进化心理学来探测人类进化中“批判本能”的可能性，以及文化为促进这种发展提供便利条件的程度（Chilton, forthcoming）。

【364】

17.4.4 话语－历史路径

由鲁思・沃达克（Ruth Wodak）及其他维也纳学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研究路径承继了伯恩斯坦社会语言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该路径与关注性别歧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团队的大型研究项目尤为相关。这种批判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其实践性应用。

具体来讲，“话语－历史路径”（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DHA）（Reisigl and Wodak, 2001; Reisigl and Wodak, 2009）是为跨学科研究奥地利战后反犹主义而设计的（如，Wodak et al., 2009）。这一路径的独有特征是，它试图将分析中所有可利用的背景信息以及对书写或言说文本的诸多层次的诠释进行系统整合，特别考虑语境的四个层次（Wodak, 2001）。DHA得以发展的该项研究，试图细致地勾画出反犹主义刻板印象的构成，即如这种形象是如何出现在库

尔特·沃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1] 的 1986 年奥地利总统大选的公共话语中的。

这一首次尝试之后的其他几项有关偏见和种族主义的研究，引领了维也纳的一个研究群体对种族主义话语的性质进行更为一般性的理论考量（最近的研究见 Krzyzanowski and Wodak, 2008a; Wodak, 2008）。DHA 的设计使分析隐含的带有偏见性的话语成为可能，也有助于识别和解释偏见性话语中所蕴含的代码和映射。它已被应用于对欧洲政治的认同建构（Wodak, 2007）以及奥地利的右翼政治（Wodak and Pelinka, 2002）的不同研究中。与此类似，里查德森考察了英国报刊上（Richardson, 2004）以及右翼党派内（2009）反伊斯兰和其他种族主义形式，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了将 CDA 应用于新闻媒体的系统模式（2007）。

较新近时期，DHA 与民族志方法结合，用以调查欧盟组织内的认同政治和决策模式，为了解政治“后台”[4]和探讨欧盟国家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深刻见解（Krzyzanowski and Wodak, 2008a; 2008b）。在对欧盟机构的论述中，该维也纳研究群体还广泛探讨了社会认同包括国家的和基于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5]

【365】

17.4.5 论证与修辞

既然 CDA 传统上是定位于权力不平等问题，那么不足为奇的是，必须将一部分重要的理论性和应用性的批判话语研究投入至劝说和辩论语言中。这种形式的分析通常与政治话语研究相联系，尽管并不是决然如此。奇尔顿的政治语言研究以各种方式借用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隐喻理论（Chilton, 2003; 2004）。梵·利尤温基于他对话语策略的社会语义学研究（van Leeuwen, 1995），提出一种合法性语法规则的假设（2007）。他使用这一路径揭示了巩固移民政策基础的诸多微妙而心照不宣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van Leeuwen and Wodak, 1999）。与此类似，里查德森辨析了英国传媒中用于将反伊斯兰言辞合法化的一系列话语策略（Richardson, 2004），而马尔德里格（Mulderrig, 2011a）则表明，在新工党话语中自我再现的某些模式是如何可以用作合法性策略。我们可以认为，合法性策略（宽松点讲，就是提供辩解和理由，无论是明确的还是心照不宣的）适宜置入较为宽泛的话语论证分析中。

该领域中的许多研究都已发展了论证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6]，并将其应用于多种语境，遍及报纸的读者来信（Atkin and Richardson, 2007; Richardson, 2001），管理话语（Clarke et al., forthcoming）、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种族歧视话语[7]以及较为一般性的政治话语（Muntigl et al., 2000; Wodak, 2008）。赖西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1）辨识出一系列用作论证手段的常用谬论，其中有许多典型存在于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中（Wodak, 2007）。他们还发现，**“论式”**（或者说整套用作论证基础的一般化思想）在论证策略中是关键要素。与此类似，里查德森和沃达克（Richardson and Wodak, 2009）将话语历史路径的研究工具应用于视觉论证分析中。耶斯库－费尔克拉夫的研究将 CDA 与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语用论辩术相结合，用于分析上世纪整个 90 年代罗马尼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是如何被论证辩护的（Ieţcu, 2006a; 2006c）。更近一时期，她将此路径应用于合法性政治策略的研究中，涉及诉诸公开正当的规范

1　又译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于 1972—1982 年出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 年参加奥地利总统竞选获胜，任期 6 年。他因二战时期在巴尔干地区担任德军中尉军官的经历而备受争议。奥地利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他是否犯下战争罪行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争论。——译者注

和价值观的道德实践推理形式（Ieţcu－Fairclough, 2008）。

17.4.6 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研究路径

CDA 相对近期的发展是它吸取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英国的语境下，这种方法上结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兰开斯特大学在 CDA（Fairclough, 1992; 2003; 2005b）和语料库语言学（McEnery and Wilson, 2001）两方面悠久的研究传统。马尔德里格对英国政治话语的研究（Mulderrig, 2003; 2007; 2009）将这些不同的研究模式引入到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中，[8]而莫特纳（Mautner, 2005; 2009）对基于语料库的 CDA 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的探讨也颇为类似。马尔德里格分析了英国政治话语中的历史变迁。在方法论上，他发展了在 CDA 中使用语料库工具的新方法，说明了这些工具在引导分析者关注于预期之外却往往是富有成效的方向上所具有的启发性价值。譬如，将"关键词分析"与社会理论相联系，以考察不同的英国首相任期内最为著名的政治话语的历史起落（Mulderrig, 2008）。这种混合方法也为 CDA 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可复制的研究路径。[9]利用该方法探讨的具体主题包括代词"我们"在使政府行动合法化并转移其公共问责方面越来越显著的作用（Mulderrig, 2011a; forthcoming）。这种基于语料库的路径所具有的启发性价值也体现在它对"统治的语法（grammar of governance）"的构成进行了初步研究。具体而言，马尔德里格（Mulderrig, 2011b）假定了一个新的社会语义范畴"管理行动"（Managing Action），在当代统治中，该范畴在通过建构较为间接的代理方式和精微的强制形式来确立"软实力"时具有关键的作用。莫特纳的研究探讨了这种混合式的方法路径应用于 CDA 中的可能性（Mautner, 2009; 也可参阅 Koller and Mautner, 2004），并指出，互联网作为这类研究的数据资源富有价值却相对利用不足（2005）。类似的是，贝克等人（Baker et al., 2008）运用语料库方法批判性地分析了新闻中的种族主义话语。

【366】

17.5 行动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本小节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 CDA 的简例，通过对如下访谈摘录的分析凸显出赋予 CDA 实践的典型特色的许多重要原则，该摘录取自于对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一次广播访谈。[10]其中一些原则体现了 CDA 所有路径的一个共同基础，而其他原则则较为有争议。

【367】

1　MC: 首相，
　　　您在 1940 年代以及战后曾在牛津，
　　　英国即将开始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
　　　大家未曾料到的繁荣。
5　　　但是，
　　　如今
　　　有 325 万人失业，
　　　嗯……
　　　单一标准下的英国经济的绩效已经降低到意大利的级别了。

10　　现在，
　　您能不能设想您今天回到了大学校园，
　　讲讲
　　英国必须抓住的机会
　　和我们大家现在的前景呢？
15 MT：你刚刚所谈到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因为，首先，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
　　我们现在的确享受着一种
　　你谈到过的那个时期人们做梦也没想到的生活水平；
　　其次，我记得拉布·巴特勒（Rab Bulter）[1] 说过，
20　　在大约 1951 年到 1952 年我们重新执政之后，
　　如果我们打出的牌得当的话，
　　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未来 25 年内将比那个时期高两倍；
　　嗯……，他说得没错，
　　非常了不起，因为这是我们现在从未想到过的，
25　　我不认为现在咱们只能用一种物质的术语来通盘考虑问题；
　　因为，真的，你们所想要的那种国家，其组成来自于其人民的力量，
　　而我认为，大家正在重新回归我的看法，
　　我把大不列颠看成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从小长大，我历来接受到的
30　　理念就是，大不列颠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人民自己独立思考，为自己做事，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他们不用别人来吩咐，
　　不喜欢被强迫，他们自力更生，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为
35　　他们的家庭负责，诸如此类，
　　这是一种，
　　嗯，我认为是巴里曾经说过的，以你会被对待的方式去做事，额……：你希望他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对待他人。
　　现在为共同体做事也是如此，我想如果你在观察另一个国家，
40　　你会说一个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国民，
　　他们是否在良好地经营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人际关系是否友善，
　　嗯……：他们是否遵纪守法，
　　他们的家庭是否强大，诸如此类。
　　MC：[您认为并不只是经济单方面的事儿，
　　[但是您知道的，人们还是，人们还是会问，
　　嗯：“现在她该往何处去”呢？戴高乐将军对法国有个愿景，嗯：
45　　就像他就法国的想法所说的那样。

1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理查德·奥斯汀·巴特勒的通称，他先后担任过英国的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译者注

嗯：您已经在这个国家打了三场大战役：福克兰群岛之战，（嗯）……反
对矿工和当地市议会、反对公共开支，

50 我想人们会愿意听听您对英国的看法，
这一定是个强有力的看法，也一定是这个想法鼓舞着您的行动。

MT：我在想，我是不是能最好这么来回答，
我如何看待一个政府该做什么，
如果一个国家真的相信人民，人民该做些什么呢？我认为

55 政府必须非常强大以做到只有政府才能解决的事情，
政府必须足够强大以拥有防卫，
因为我所见到的英国应该一贯捍卫其自由，
一贯是一个可信的同盟，
所以政府得坚定地对待

60 自己的民众；而其他国家得了解，你这个政府说话算数，
其次，你得转向内部安全，而且，是的，在法律和次序方面你得要强大，
做只有政府才能做到的事情；
不过，这一部分在于政府，

65 一部分在于民众，
因为你是不可能使民众自动遵守法律和秩序的，除非你与人民之间有伙伴关
系；其次，你得强有力地保持币值，只有政府通过健全的财政能做到，还有，

70 你得创造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社会安全的框架，
在这点上，你有权力替民众说了算；
人民是善于创造的、有创造力的，因此你会期待
人民创造繁荣兴盛的产业、繁荣兴盛的服务，
是的，你会期待人人、

75 每个人，不管他们是哪种背景，都有机会站到他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
是的，你会期待各类人等，
不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都能够有机会拥有他们自己的财产，

80 无比重要的是，
拥有一处房产会给予你一些独立，
当你将来考虑你的孩子时，给予你一个筹码。

MC：但是，
你能否将这一愿景总结一下吗？ 【368】

MT：[( )你说我的愿景，
请就让我继续吧，
如果你对未来感兴趣，那是不够的，
是的，你可能会存下积蓄，
你可能想有一点自己的独立收入，
所以经常考虑未来，
这正是英国，她的人民独立于政府，

但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强大，去做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
MC：但是
你能把它总结为一个，一个，一个短语，或者两个短语，
为了在英国实现或恢复某种东西，
当这个国家明显地在承受很多风险时，
以及赢得像福克兰群岛这样的地方，
它们在你的理念里同样重要［对英国来说就像
MT：［我认为
100 MC：恢复稳健货币，减少英格兰银行里的货币供应
MT：但是，当然，
这说明我们过去在防卫自由方面是可靠的，
并且当英国的某个部分，我们被侵略时，
当然我们去，我们相信防卫的
105 自由，我们是可信的，
我认为如果我试图把它总结为一个短语，
那一直是我认为所有事情里最困难的，
我真的会说，
将我们英国人最为优秀的个性恢复至从前那样的卓越。
110 MC：但是，
这意味着现在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某种东西，
你认为这种描述与这个国家里传统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吗
MT：不，
它就是传统的保守主义
115 MC：但是，它是激进的，也是平民主义的，因此不是保守的
MT：它是激进的，是因为我上任的时候，我们需要变得激进，
嗯：是平民主义的，
我不会说它是平民主义的，
我会说，我说过的
120 很多东西在普通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英国人，
他们的个性是独立的，因为他们不愿被推来推去，因为他们已准备好负起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期望对他们的朋友和忠诚的同盟持
125 以忠诚，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称其为平民主义。
我说，它在人民的心中激起共鸣，
我知道，因为许多年前它曾在我的心中激起共鸣。

17.5.1 CDA 揭示社会问题

CDA 是针对社会过程和问题的语言和符号方面进行分析。在余下部分我们展示的是对上述访谈摘录的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分析看作是分析撒切尔主义的一种贡献，这种主义是政治领域新右翼的一种关键的基础性要素。它也说明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语境予以探讨的重要性。撒切尔主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过时的研究对象，但它持续关系到对当代西方政治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和修辞（广义地讲，“个性政治”的兴起）这两方面的理解。

放在这一语境下，CDA 的关键主张是，像撒切尔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过程和运动在部分程度上具有语言话语特征。这一点将从如下事实而延续下去，当代社会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一般会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实质性要素。

作为旨在建立一种新霸权的意识形态工程，撒切尔主义可被视为一种对政治话语进行再建构的努力，试图通过以一种的新方式将既有的多种不同话语相综合来实现这种再建构。这一点在上述摘录中体现得很明显。传统的保守党话语要素（对法律和秩序、家庭和强大政府的关注，例如，“他们是否遵纪守法，他们的家庭是否强大”），自由党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要素（对个体独立性的关注，例如，“因为他们的个性是独立的，他们不愿意被推来推去，因为[1]他们已准备好负起责任”），以及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个体企业家（例如，“你会期待人民创造出繁荣兴盛的产业、繁荣兴盛的服务”），所有这些不同的话语要素都富有特色地结合在一起。 【369】

从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的话语中获取的各种要素的混合，赋予了撒切尔话语以访谈主持人所指的平民主义性质，例如，“说话算数”、“推来推去”，“在 [人民] 心中激起共鸣”。这种新颖的话语结合与社会现实（包括社会政治关系和认同）的独特再现相关。它在政治话语领域获得了主导地位，尽管从实际赢得广泛的接受认可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支配性的这一点还是个问题。

17.5.2 权力关系是话语的

CDA 凸显了当代社会中权力关系实质上的话语性质。部分程度上这是一个权力关系（如媒体和政治之间）如何在话语中运用和协商的问题，譬如在广播政治访谈中：表面上看来，采访者可以在访谈中对政治家行使诸多权力：决定开始和结束，给予受访者多少时间，涉及什么话题，从何种角度切入问题等。在撒切尔的访谈中，迈克尔·查尔顿的提问的确设置了议程，并力图管控议程（如第 83、93—94 行）。但是，政治家们并不总是服从于这种“管控”努力，并且常常会争夺这种控制。例如在第 83 行，查尔顿试图将撒切尔带回至他在第 49—51 行提出的问题，但她打断了他，继续发表她实际上是一个简短的政治演讲。她进行演讲的努力指出了话语中权力关系的另一维度。撒切尔试图行使我们可能称之为修辞权力，一种“文化资本”形式；根据布迪厄（Bourdieu, 1991）的说法，它是当代社会中职业政治家的特权。这种权力——到目前为止极其有效——是主要施之于受众的权力，尽管它也限制了查尔顿作为访谈者的权力。例如，撒切尔的修辞权力在大量的语言手段中得以实现，这些手段组织安排了她的意见，诸如第 56—

1 原文使用的是 coz，是 because 的口语化用法。这也是撒切尔话语平民特征的表现之一。——译者注

【370】 67 行的三重平行结构（第 56—57 行，“必须足够强大以拥有防卫”；第 62 行，“在法律和次序方面你得要强大”；第 66—67 行，“你得强有力地保持币值”）。[11]

17.5.3 话语构成社会与文化

我们只有通过认识到话语和社会 / 文化是相互构成的，才能了解话语在当代社会过程中的显著性。这必然使语言使用的每一实例都会对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和 / 或改变，包括权力关系，作出自己的小小的贡献。那就是话语的权力；那就是为此斗争的价值之所在。

对分析有所帮助的是，将也许是由话语构成的社会生活区分为三个宽泛的领域：世界的**再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和个人**认同**。例如，从再现来讲，第 11—21 行纳入了一段叙事，给访谈主持人提问的对象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历史再现：访谈主持人将昔日的繁荣与今朝的萧条做了对比，这种对比又重构为过去的保守党政府正在创造当今的繁荣。

此段摘录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构成了撒切尔自己与公众的社会关系，部分程度上是团结的关系，部分程度上又是权威关系。撒切尔对人们所熟悉的非限定性代词“**你**”（相对于“**一个人**”）的使用，含蓄地表明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就像她的选民一样（这是其话语中的平民要素）。她所使用的一些词汇亦是如此：例如请注意她在第 113—120 行是如何回避访谈人所用的**平民主义**（populist）这个词的，并回避了访谈人将“**激进的**”这个词技术性地用作专家的政治术语，也许是因为这些词所具有的理智主义会有损于她所声称的团结。对比之下，上文所提到的撒切尔对政治修辞的使用却是权威性的，譬如她描述英国人的几段话（包括第 27—36 行和第 119—123 行），宣称有权代表他们表述他们的自我感知。

这几段话在认同的构成这一意义上也非常有意思：这段话语的一大特征是它如何将“人民”构建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注意撒切尔明确地将集体认同的设计制造前景化——“**将我们英国人最为优秀的个性恢复至从前那样的卓越**”），这些例句中的特征列举是一个突出的话语策略，将各种不同的话语（保守的、自由的等）编织在一起，同时让听众推断它们之间的联系。还要注意到的是撒切尔的谈话中含糊且变化的代词“**我们**”（第 13—25、101—104 行）的意义。“**我们**”有时是传统上所称的“包容性的”（它包括受众和一般大众，例如，第 13—14 行[1]，“**我们的确享受着当时做梦也没想到的生活水平**”），有时又是“排他性的”（例如，第 20 行，
【371】 “**在我们重新执政之后**”，这里的**我们**只是指保守党）。在其他例子中，二者兼而皆可（例如，第 21 行，“**如果我们打出的牌得当的话**”）。即使我们将此当作排他性的，仍然不甚明确这个**我们**指认的是谁：是保守党，还是政府？还有，说**我们**是“包容性的”也相当让人产生误解的，因为在例句“**我们的确享受着……生活水平**”中，**我们**的确指的是整个共同体，而且它构建这一共同体的方式是将那些未能实现繁荣昌盛的国家排除在外。代词“**你们**”在第 59—88 行的使用方式相似，也是策略性和操纵性的。我们并不是在说，撒切尔或其助手是有意识地计划以这些方式使用“**我们**”和“**你们**”，不过，政治家们对语言的反身性意识也在日益增加。[12] 当然，政治话语有着较为广泛的策略目标（如动员民众支持），以各种语言使用方式来实现，这些方式本身是很可能并无意图指向的。

1 原文行数标识有误，应为 17—18 行。后文中的“第 15—16 行”应为“第 20 行”，“第 16—17 行”应为“第 21 行”。——译者注

最后，话语还形成了撒切尔自己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位女性政治领导人，她具有政治权威而无需终止其女性身份。例如，注意一下第52—92行的情态特征。一方面，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强烈的义务情态（obligational modalities）（注意这些情态动词“必须”should，“不得不”have to，“得要”have got to）以及认知（可能性）情态（epistemic （probability） modalities）（注意第80—82行的分类的现在时态动词），这些都强有力地表达了对政治权威的要求；另一方面，这部分访谈以一个暂时性的、回避性的表达开始（“我在想，我是不是能最好这么来回答，我如何看待……”），这种表达——加之她发表言论的这个时点，以及她的装扮和外表——也许会被人带有偏见式地理解为“女性的”。

17.5.4 话语发挥意识形态作用

意识形态是再现和建构社会的特殊方式，从而再生产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宰制和利用的关系。为了确定一个特殊（类型）的话语事件是否起到了意识形态作用，仅仅分析文本是不够的；分析者还需要考虑文本是如何被解释和接收的，其社会效果怎样。

在我们的例子中，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策略是明确的话题，并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在第52—92行，包含的中心思想是政府要为市场能够自由地运作创造条件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但是撒切尔的表达实际上是围绕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比而建构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主导着“繁荣兴旺的产业”等创造的“人民”其实主要是跨国公司，而且它可以帮助将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既有关系合法化。意识形态一贯都是非常隐蔽的——她将其附着于关键词——诸如自由、法律和秩序，或者坚实的金融，唤起并留下一系列隐含的意识形态假设。还要注意“繁荣兴盛的产业，繁荣兴盛的服务”等用语。这是上文所讨论的列举结构的另一例子。“繁荣兴盛的产业”是一个常见的词组，但“繁荣兴盛的服务”却是一种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新搭配：为了获得这一列举的一种连贯意义，需要假设服务可以在像产业那样的同样基础上予以评价，是一个留给听者去推断的真正的撒切尔式假设。要注意的是，话语中并非所有常识性假设都是意识形态的，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观来看。 【372】

意识形态不单单是一个再现社会现实的问题。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同时表述现实的特殊再现和认同的特殊建构的过程，也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案例中，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试图运用一个特殊的构想，将“人民”当作政治共同体，以此表述出撒切尔式的经济和政治再现。

17.5.5 话语是历史的

话语不是脱离语境而生成出来的，如不考虑语境是无法理解话语的（van Dijk, 2008c）。话语总是与之前已生成的其他话语相联系的，也是与那些同时期和此后生产的话语相联系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互文性和社会文化知识纳入到我们的概念语境中。我们来考虑一下在此段文本中出现、并且以特定的知识世界为前提的典故，以及听众一方的特殊的互文经验。譬如，为了能够深度理解和分析撒切尔的反应，我们需要了解英国在1940年代的形势（第1—2行）怎样，拉布·巴特勒（第15行）或者巴里（第37行）是谁，戴高乐的愿景是怎样的（第45—46行），福克兰群岛之战因何重要以及它包含什么样的象征意义（第58行）。与此相似的是，

当撒切尔暗指**传统的保守主义**（第 114 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词与其他意义相对比，在撒切尔传统中意味着什么。

17.5.6 话语分析是诠释性的和解释性的

话语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诠释，这取决于语境和受众。诠释和理解通过感情、信念、价值观和知识的透镜进行。此次撒切尔访谈尤其复杂，涉及历史的和共时的互文性、类型的混搭以及相当程度的假定知识和价值观。因此我们的批判性分析必须决定我们需要将多少语境知识带入到诠释中。我们的批判性阅读是否以合理与理性的方式说明了隐晦的意义？想想下面这个例句：“**你有权力替民众说了算；人民是善于创造、有创造力的，因此你会期待人民创造繁荣兴盛的产业、繁荣兴盛的服务；是的，你会期待**”（第 72—73 行）。这里我们也许会问，“人民”指的是谁？保守的选民？企业家？公共服务雇员？所有的英国公民（如果是如此，是否政【373】府也要包括在这种繁荣兴盛的产业和服务的创造中）？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这个群体没有清楚地界定，可能让每个听者都把他们自己纳入其所指内。然而，这些**人**必须是有能力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繁荣兴盛**”）影响产业和服务的发展。事实上，很可能只有其中强有力的一部分人——精英、管理者和政客——将处在做这些事情的位置上，而其他人则可能要经历来自组织管理新模式、削减就业、工作时间增加、问责和审查力度加大、资金竞争更加激烈等方面的过分要求，而且，所谓**人民**的使用也是误导性的含混不清：它同时掩盖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这一现实，并且包含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体，他们被**期待**对创造“**繁荣兴盛的产业**”和“**服务**”负起责任。这一短例说明了语言的霸权潜力，当它被那些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所使用时，它在指称上含糊不清，而且也是劝告性的（Mulderrig, 2011b），一种批判性分析可以通过揭示对社会意义的不同解读进行解构。这意味着不但要对文本的语言学特征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分析它嵌入其社会条件，并与其他文本、社会实践以及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方式。

17.5.7 话语是一种社会行动形式

我们在本章的开始指出，CDA 最主要的目标是揭露各种隐晦之意和权力关系。CDA 是一种社会性投入的科学范式。与许多学者相区别的是，批判性语言学者明确地表达他们的（政治）兴趣。

譬如，我们所分析的撒切尔一例可以是更为广泛的对政治领域中新右翼意识形态的批评的一部分，与福利紧缩的社会运动相关联。但还有些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 CDA 例子。例如，CDA 一直被用作法庭上专家意见的基础，还用于提升人们对右翼民粹政治人物的种族主义的意识（Wodak and Pelinka, 2002）。

非歧视性语言使用在不同领域中都在广为推进。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性别歧视语言使用（关于女性主义 CDA，参见 Lazar, 2005）。CDA 在研究变化中的话语以及机构中的权力模式比如医生—患者之间的沟通等方面也一直相当成功（Lalouschek et al., 1990）。在其他机构、教育、法律和官僚体制情境下也同样如此。

17.6 结 语

我们在前文认为，现代社会后期的特征是反身性增强，并且，对日常生活中话语的批判性定位是现代反身性的一种表现。批判性话语分析者的一个关键议题是，他们在学术机构里产出的分析如何能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批判活动联系起来。在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分：批判性话语分析者必定要利用日常批判性活动（比如与社会性别关系、父权和女性主义相关联），包括分析者自己对这些活动的涉入和体验，而且，这些活动也会得益于学术分析。不过批判性话语分析显然不只是日常批判的复制：它可以借用社会理论和语言理论以及一般无法获得的语言分析方法，而且它具有用以系统、深入考察那些超出日常经验的事物的资源。我们认为它有助于认识日常话语批判与根据葛兰西对当代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视角来进行的学术性 CDA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观点来看，批判性话语分析者必须渴望在一系列社会斗争中成为“知识分子有机整体”（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环保者等），但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时时会有被国家和资本利用的风险。【374】

注 释

[1] 对这种方法论视角的较为全面的说明，参阅 Fairclough, 2003a; 2005.

[2] 例如，Chiapello and Fairclough, 2002;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Fairclough et al., 2007.

[3] Jessop et al., 2008; Sum and Jessop, forthcoming.

[4] Krzyzanowski and Oberhuber, 2007; Muntigl et al., 2000; Wodak, 2009; Wodak and Weiss, 2004; Wodak et al., 2009.

[5] Wodak, 2003; Wodak and Weiss, 2004; Wodak et al., 2009; 有关运用 CDA 来研究认同的，还可参见 Caldas-Coulthard and Iedema, forthcoming.

[6] 这里所引用的研究中，主要的理论模式是语用论辩术(pragma-dialectics)或者是由梵·爱默伦等人(van Eemeren and Grootendorstm, 2004; van Eemeren and Houtlosser, 2002) 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论证理论。

[7] 例如，Ieţcu, 2006a; Ieţcu-Fairclough, 2007; Reisigl, 2007a; 2007b; Wodak and van Dijk, 2000.

[8] 参见 Sum and Jessop, forthcoming.

[9] 对此研究路径的详尽说明，参见 Mulderrig, 2009.

[10] 该访谈由迈克尔·查尔顿主持，于 1985 年 12 月 17 日在 BBC 广播频道 3 上播出。有关详尽分析，参见 Fairclough, 1989 的第 7 章。

[11] 当然，除了话语中的权力问题外，还有个问题是施于话语的权力，这部分程度上是一个接入的问题。很明显，撒切尔的权力允许她能够接入相当广泛的话语机会，比权力较少的民众要广泛得多。然而，权力关系的话语方面并不是固定单一的。因此，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同时考察“话语中的权力”(power in discourse) 和“施于话语的权力”(power over discourse)，会是富有成效的。

[12] 关于政治话语中代词使用的历史分析，参见 Mulderrig, 2009; 2011a; forthcoming.

延伸阅读

如下目录提供给那些希望更多地了解 CDA 的读者。它包括相对容易获得的专著，可用作教材或是对 CDA 最为知名的一些研究路径的入门书。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此书是为有兴趣研究话语问题却不一定有语言学背景的社会科学家使用而设计的。它通过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练习来指导读者。书后附有一个概念术语表以及文本分析样例。

van Dijk, T. (2008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U.P.

本书展示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一种版本，提供了研究语境的丰富路径，将语境理解为是对主题本身的一种建构，而不是外在的“客体”。这一“语境模式”概念作为一种研究透镜而得以发展和使用，通过这种透镜来分析话语时如何反映出人与他们的社会环境互动的。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Sage: London.

此书概述了与 CDA 相关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给读者介绍了该领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他们惯常使用的方法。还讨论了这些方法之间的差异，以便读者可以选择最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的路径。

van Leeuwen, T. and Kress, G. (2006) *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London.

这本书给读者介绍了社会语义学的概念，展示了研究口语或书写形式以外的多种形式的一种批判理论。那些专注于多种形式的意义生产（图像、声音、语言）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的研究者会对此书特别有兴趣。

在线阅读

如下文章可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上获取。

Fairclough, N. (199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2): 133-68.

Pearce, M. (2005) ‘Informalization in UK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s 1966-97’,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4(1): 65-90.

Wodak, R. (2006) ‘Medi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ssessing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CDA’, *Discourse Studies* 8(1) 179-190.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tkin, A. and Richardson, J. (2007) ‘Arguing about Muslims: (un)reasonable argument in Letters to the Editor’. *Text & Talk*, 27: 1-25.

Baker, P., Gabrielatos, C., KhosraviNik, M., Krzyzanowski, M., McEnery, T. and Wodak, R. (2008) ‘A useful methodological synergy? Combin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o examine discourses of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UK press’. *Discourse & Society*, 19(3): 273-306.

Bakhtin, M. (1986)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Caldas-Coulthard, C. and Iedema, R. (eds) (forthcoming) *Identity Troubl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Contested Identities*. London: Palgrave.

Chiapello, E. and Fairclough, N. (2002) 'Understanding the new management ide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new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Discourse & Society*, 13(2): 185-208.

Chilton, P. (2002) 'Do something! Conceptualising responses to the attacks of 11 September 2001'.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1): 181-95.

Chilton, P. (2003) 'Deixis and distance: President Clinton's justification of intervention in Kosovo', In M.N. Dedaic and D.N. Nelson (eds), *At War with Word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Chilton, P. (forthcoming) *Language and Critique: Understanding CDA*.

Chouliaraki, L. and Fairclough, N.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larke, I., Kwon, W. and Wodak, R. (forthcoming) 'Organisational decision-making, discourse and power: integrating across contexts and scales',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Fairclough, N. (199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the universitie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2): 133-68.

Fairclough, N. (1994) 'Conversationalization of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umer', In R. Keat, N. Whiteley and N. Abercrombie (eds),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sumer*.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2000a) 'Discourse,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the discourse of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4*(2): 163-95.

Fairclough, N. (2000b)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researching language in the new capitalism: overdetermination,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textual analysis', In C. Harrison and L. Young (eds), *Systemic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Fairclough, N. (2005a) 'Blair's contribution to elaborating a new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4*(1): 41-63.

Fairclough, N. (2005b)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arges Linguistiques*, 9: 76-94.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and Wodak, R.(2008) 'The Bologna Process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In R. Jessop, N. Fairclough and R. Wodak (ed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Europe*. Rotterdam: Sense. pp. 109-126.

Fairclough, N., Cortese, P. and Ardizzone, P. (eds) (2007)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Berne: Peter Lang.

Foucault, M. (1971) *L'Ordre du discours*. Paris: Gallimard.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Fowler, R., Kress, G., Hodge, R. and Trew, T. (eds)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Graham, P. (2006) *Hypercapitalism: Language, New Media and Social Perception of Value*. Berne: Peter Lang.

Hall, S. and Jacques, M. (1983)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lliday , M.A.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Leξcu, I. (2006a) *Argumentation, Dialogue and Eth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ssays of H.-R. Patapievici*, Editura Universităξii din Bucureξti.

Leξcu, I. (2006b)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s*. Editura Universităξii din Bucureξti.

Leξcu, I. (2006c), 'Argumentation, dialogue and conflicting

moral economies in post-1989 Romania.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Discourse & Society*, 17(5): 627-50.

Leξcu-Fairclough, I. (2007) 'Populism and the Romanian "Orange Revolution": a discourse-analy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2004'. I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Capitalism*, 2: S. 31-74. (http://www.languageandcapitalism. info/)

Leξcu-Fairclough, I. (2008) 'Legitimation and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rgumentation*, 22: 399-417.

Jäger, S. and Maier, F. (2009)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Foucauldi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dispositive analysis'. In R.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n). London: Sage. pp. 34-61.

Jessop, B., Fairclough, N., and Wodak, R. (eds) (2008)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Europe*. Rotterdam: Sense. pp. 149-70.

Koller, V. (2004) *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Koller, V. (200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social cognition: evidence from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16(2): 199-224.

Koller, V. (2007) '"The world's local bank": glocalisation as a strategy in corporate branding discourse'. *Social Semiotics*, 17(1):111-30.

Koller, V. (2008a) *Lesbian Discourses: Images of a Commu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Koller, V. (2008b) '"The world in one city": semiotic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city brand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7(3): 431-50.

Koller, V. and Mautner, G. (2004)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Hewings, C. Coffin and K. O'Halloran (eds), *Applying English Grammar*. London: Arnold. pp. 216-28.

Kristeva, J. (1986)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Krzyzanowski, M. and Oberhuber, F. (2007) *(Un)Doing Europ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Negotiating the EU Constitution*. Bern: Peter Lang.

Krzyzanowski, M. and Wodak, R. (2008a)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Debating Migration in Austri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Krzyzanowski, M. and Wodak, R. (2008b) 'Theorising and analysing social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ontribu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 Galasinska and M. Krzyzanowski (eds), *Discourse and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 17-40.

Lalouschek, J., Menz, F., and Wodak, R., (1990) *Alltag in der Ambulanz*. Tübingen: Narr.

Lazar, M. (ed.) (2005)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Palgrave. pp. 90-114.

Lemke, J. (2002) 'Travels in hypermodality'. *Visual Communication*, *1*(3): 299-325.

Lemke, J. (2005a) 'Critical analysis across media: games, franchises, and the new cultural order'. In M. Labarta Postigo (ed), *Approaches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Valencia: University of Valencia.

Lemke, J. (2005b) 'Multimedia genres and traversals'. In E. Ventola, P. Muntigl and H. Gruber (eds), 'Approaches to Genre', special issue of *Folia Linguistica*, *39*(1-2): 45-56.

Lemke, J. (2006) 'Towards critical multimedia literac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olitics'. In M. Mckenna, D. Reinking, L. Labbo and R. Kieff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iteracy & Technology*, v2.0. Mahwah, NJ: Erlbaum. pp. 3-14.

Mautner, G. (2005) 'Time to get wired: using web-based corpor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16*(6): 809-28.

Mautner, G. (2009) 'Checks and balances: how corpus linguistics can contribute to CDA'.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McEnery, T. and Wilson, A. (2001)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ulderrig, J. (2003) 'Consuming education: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social actors in New Labour's education policy': *Journal of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1* [http://www.jceps.com/index.php? pageID =article&articleID=2].

Mulderrig, J. (2007) 'Textual strategi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legitimation in New Labour policy discourse'. In A. Green, G. Rikowski and H. Raduntz (eds), *Renewing Dialogues in Marxism and Edu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p. 135-50.

Mulderrig, J. (2008) 'Using keywords analysis in CDA: evolving discourses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education'. in B. Jessop, N. Fairclough and R. Wodak (eds), *Educ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Europe*. Rotterdam: Sense. pp. 149-70.

Mulderrig, J. (2009)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atcher to Blair*. Saarbucken: VDM Dr Muller Verlag.

Mulderrig, J. (2011a) 'Manufacturing consent: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 Labour's educ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3(6).

Mulderrig, J. (2011b) 'The grammar of governance',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8*(1): 45-68.

Mulderrig, J. (forthcoming) 'The hegemony of inclusion: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s of Third Way politics', *Discourse and Society*.

Muntigl, P., Weiss, G. and Wodak, R. (2000) *European Union Discourses on Un/employm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mployment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eisigl, M. (2007a) *Nationale Rhetorik in Fest- und Gedenkreden. Eine diskursanalytische Studie zum 'österreichischen Millennium' in den Jahren 1946 and 1996*. Tübingen: Stauffenburg.

Reisigl, M. (2007b) 'Discrimination in discourses'. In H. Kotthoff and H. Spencer-Oatey (eds),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365-94.

Reisigl, M. and Wodak, R.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 London: Routledge.

Reisigl, M. and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CDA'.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Sage.

Richardson, J. E. (2001) '"Now is the time to put an end to all this".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Theory and Letters to the Editor'. *Discourse & Society*, 12(2): 143-68.

Richardson, J. E. (2004) *(Mis)Representing Islam: the Racism and Rhetoric of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ichardson, J.E. (2007) *Analysing Newspapers: An Approach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Palgrave.

Richardson, J.E. (forthcoming) '"Get shot of the lot of' em": election reporting of Muslims in British newspapers', *Patterns of Prejudice*.

Richardson, J. & Wodak, R. (2009) 'The impact of visual racism: visual arguments in political leaflets of Austrian and British far-right parties.' *Controversia*, 6/2: 45-77.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m, N. L. and Jessop, B. (forthcoming)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van Dijk, T.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van Dijk, T. (1998) *Ideology*. London: Sage.

van Dijk, T. (2008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 (2008b) *Discourse Power*. Houndsmills: PM.

van Dijk, T. (2008c) *Society in Discourse: How Context Controls Text and Tal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A. and Kintsch, W. (1983)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New York: Academic.

van Eemeren, F. and Houtlosser, P. (eds) (2002) *Dialectic and Rhetoric: The Warp and Woof of Argumentation Analysis*. Amsterdam: Kluwer.

van Eemeren, F. and Grootendorst, R. (2004)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Leeuwen, T. (1995) 'Representing social action'. *Discourse & Society*, *4*(2): 193-223.

van Leeuwen, T. (2005a)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van Leeuwen, T. (2005b) 'Typographic mean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4*(2): 137-42.

van Leeuwen, T. (2007) 'Legitimation in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1*(1): 91-112.

van Leeuwen, T. (1999) 'Discourses of unemployment in New Labour Britain'. In R. Wodak and L. Christoph

(eds),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World: Issu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Wien: Passagen-Verlag. pp. 87-100.

van Leeuwen, T. and Caldas-Coulthard, C. R. (2004) 'The semiotics of kinetic design'. In D. Banks (ed), *Text and Texture-Systemic Functional Viewpoints o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ext*. Paris: L'Harmatten. pp. 356-81.

van Leeuwen, T. and Kress, G. (2006) *Reading Images-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van Leeuwen, T. J. and Wodak, R. (1999) 'Legitimizing immigration control: a discourse-historical analysis'. *Discourse Studies*, *1*(1): 83-119.

Volosinov, V. I. (1973[1928])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and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p. 63-94.

Wodak, R. (2003) 'Multiple identities: the roles of female parliamentarians in the EU parliament'. In J. Holmes and M. Meyerhoff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d Gender*. Oxford: OUP. pp. 71-98.

Wodak, R. (2007) '"Doing Europ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ies' .In R. Mole (e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in European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pp. 70-95.

Wodak, R. (2008) '"Us" and "Them": inclusion/exclusion-discrimination via discourse'. In G. Delanty, P. Jones and R. Wodak (eds), *Migration, Identity, and Belonging*.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 Press. pp. 54-78.

Wodak, R. (2009)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 London: Palgrave.

Wodak, R. and Chilton, P. (eds) (2005) *A New Research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Wodak, R. and Meyer, M.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n). London: Sage.

Wodak, R. and Pelinka, A. (2002) 'From Waldheim to Haider: an introduction'. In R. Wodak and A. Pelinka (eds), *The Haider Phenomenon in Austria*.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p. vii-xxvii.

Wodak, R. and van Dijk, T. (eds) (2000) *Racism at the Top*. Klagenfurt: Drava.

Wodak, R. and Weiss, G. (2004) 'Visions, ideologies and utopias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ies: organizing, representing and legitimizing Europe'. In M. Pütz, A. Van Neff, G. Aerstselaer and T. A. van Dijk (eds), *Communicating Ideologie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Frankfurt: Peter Lang. pp. 225-52.

Wodak, R., de Cillia, R., Reisigl, M. and Liebhart, K. (200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n). Edinburgh: EUP.

话语与意识形态 18

Discourse and Ideology

⊙ 图恩·梵·迪克

18.1 引　言

如下片段引自一篇典型的报纸社论：

> 因一直未制定任何预防措施，毫无控制的移民刺激我们的人口数量呈螺旋上升。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失败，其规模相当令人惊愕。
>
> 我们最终见证了工党未能控制我们的国界而带来的全面的不良影响。
>
> 这个政府从来就未曾有过值得一提的移民政策，只是一系列缺乏智识连贯性的临时举措，对遏制——或者甚至监控——移民潮毫无助益。
>
> 最佳估计是，移民在过去的十年里增加了两倍，这个国家里有50万非法移民。而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却不只是社会基础结构的超载。（《每日电讯报》，2009年1月7日）

无论此篇社论会有多少其他特性，大多数读者都会认同该社论表达了对（英国）工党及其移民政策的一种负面意见。对于那些了解《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读者来说，鉴于这份英伦报纸的保守观点，这种意见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确，该报同篇社论在此文后不出预料地称赞了保守党的移民政策。

我们赋予这份报纸“观点”的保守特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种**意识形态**。本章旨在分析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在话语中被表达或再生产的方式。

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首先要观察的是，它在我们诸多的日常话语中是如何以一种贬低的方式被使用于特征化**他者**的观念（ideas）或政策：**我们**握有真相，而**他们**有的是意识形态。有意思的是，当意识形态在表达一个内群体与一个外群体、**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两极化时，对这一概念的如此贬低性使用，其本身也许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例证是在传统的反共产主义修辞中将共产主义广为限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使用这种修辞的人为的是捍卫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且不大可能将他们自己的思想视为意识形态。 【380】

本章呈现的是有关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论**及对它的**系统分析**，超越了对该术语的非正式的日常使用，而且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种种意识形态或共享这些意识形态的人的负面评价。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任何群体都可能会发展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捍卫它的利

益，并确保其成员的忠诚、团结、互动和合作，特别是在涉及其他社会群体或阶级时。这也许意味着意识形态，如我们所定义的，不但会被用于主宰或压制他人，而且还被用于抵制或抗争这种主宰，如我们所了解的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或者性别歧视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同样，群体权力既可以被滥用，也可以被用于抵制这种滥用，取决于社会政治境况。

的确，昔日一度是解放性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却成了一种压制性的。例如，古典自由主义曾是一种倡导个人自由、激发人们反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今天却被那些反对种族或民族上有异的他者的自由的人所坚持，这些他者想要移民到“我们的”国家，恰如我们在《每日电讯》报上的社论中所看到的。类似的是，新自由主义会倡导市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反对由社民党（social democrats）和社会主义者（socialists）所支持的国家干预，而后者传统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和权利，也即**他们的**免于剥削的自由。因此，同样是该报，整体上是持反对英国劳工党的立场，特别是反对劳工党的移民政策，这些政策即使是在今天也很难说是慷慨大方的。

于是从非正式的界定来讲，意识形态是由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一般性的基本思想体系，是将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事件和局势的诠释并控制其话语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其他社会实践的思想。如此说来，为了劝服性地阐述并宣传其基于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反工党和反移民的意见，《每日电讯报》使用了夸张修辞，诸如**毫无控制的**、**失败**、**令人惊愕的**，或**不良的**，以及象征词如**螺旋上升**和**刺激**，以此来攻击工党。与此同时，它强调它所称之为**非法移民**的到来和出现的所谓的危险，为的是将这些人与违法联系起来，从而将他们（至少是其中的许多人）贬低为罪犯，由此构成对我们英国人的威胁。

从对这个例子的非正式观察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反移民的立场不但可以基于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如果他者在民族或种族上有别于我们，而且还可以基于民族主义或排外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捍卫“我们的”国家（语言、习俗和文化），以抵御外来者以及**任何**陌生人的大规模定居。这样的意识形态恰恰是通过社论这样的公共话语来表达的，并在读者中令人信服地传播着，由此在日常生活中复制着。本章除了界定什么是意识形态以外，还将展示这些意识形态是如何由置于社会和政治情境中的文本和谈话来表达的。【381】

18.2 关于“意识形态”历史的注解

尽管本章篇幅不足以考察意识形态的思想史（参见下面提到的几本专题著作），但简要地回顾了这一概念的首次使用，它是由法国哲学家德崔希伯爵（Destutt de Tracy）在200多年前引入，指的是一门新学科：**观念的科学**（the science of ideas）。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更一般性地在马克思主义路径中的运用，这一概念获得了其“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负面内涵，由此指涉工人阶级被误导了的关于其生存物质条件的思想，这是统治阶级用作一种剥削和主宰手段来灌输给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意识形态被界定在一个社会隐含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而且通常与**科学知识**形成对比，恰如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所提出的，与至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其他路径也形成对比。特别是后来的葛兰西（Gramsci）强调，当资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被整个社会采纳、统治不再需要靠强力来维持时，

意识形态发挥着作为共识**霸权**的基本作用。

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和一种主宰手段的负面概念至今依然流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提出一种更一般性的多学科理论来说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包括那些抗争性的。与强调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唯物主义不同，我们将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认知属性，视其为社会群体共享的心理表征，反过来以此控制成员的社会实践。然而，我们也的确认同，意识形态也许会由社会的特殊群体比如象征精英群体来灌输，这些群体控制着公共话语的接近渠道，因此拥有操纵广泛的公众的手段。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历史梳理和介绍，参见如下书目：

Billig (1982)；Althusser (2008)；Lrrain (1979)；Thompson (1990)。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参见：Abercrombie, Hill & Turner (1990)；Althusser (2008)；Calsnaes (1981)；Eagleton (1991)；Laclau (1979)；Larrain (1983)；Parekh (1982)；Rossi-Landi (1990)；Sutton (1990)。

18.3 意识形态理论的要素

【382】

在我们考察意识形态经由话语来表达和再生产的方式之前，我们需要根据更加明确的术语来分析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而非上文提到的非正式术语如“观念”和“虚假意识”等。

但是，为了避免与对这一概念的非正式使用相去甚远，对这一理论的见解将保留这一观点，即意识形态包含“观念”，或者是哲学家们和心理学家们所称的**信念**（beliefs）。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首先是**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这也许有点琐碎，但依然很重要，因为有的作者将会把作为信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与**基于意识形态的实践**比如**话语**混同起来。就像我们将语言的知识（比如语法、话语规则等）与该语言在交流和互动中的实际使用区分开来那样，我们也能区分意识形态与其在意识形态实践中的使用或表现。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参见：Blommaert (1999)；Driven (2001)；Gee (1990)；Hodge & Kress (1993)；Malrieu (1999)；Pêcheux (1982)；Wodak (1989)。

有关意识形态和交流，参见：Asperen (2005)；Ballaster (1991)；Fowler (1991)；Garzone & Sarangi (2008)；Mumby (1988)。

关于意识形态和符号学：Larsen, Strunck & Vestergaard (2006)；Reis (1993)；Threadgold (1986)；Zima (1981)。

其次，这样的信念体系不是特殊的、个人的信念，而是**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社会信念。在此意义上，它们可与（认识）社群所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以及语言社群所共享的语言相提并论（参见下文有关意识形态和知识之间的区分）。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认知**形式，

也即由群体成员（的精神）所**共享**并**散布的**信念。

更具体地说，就群体及其成员所共享的信念而言，必须是与他们具有**社会关联性**，比如事关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主要事件和行动的阐述和参与，以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如此，群体将发展出事关他们的存在和历史、生与死、社会性别、自然、组织、权力、工作、性、竞争、战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为了使意识形态服务于捍卫一个群体的**利益**，他们会倾向于特别系统地阐述与其他群体如统治群体、被统治群体或竞争性群体的关系，比如关于作为他们权力基础的稀缺性资源。在上述《每日电讯报》这一意识形态案例中，我们已观察到意识形态的两级性，比如保守党与工党、**我们**英国人与**他们**移民。类似地，反种族主义者会反对种族主义者的实践，【383】和平主义者会反对军国主义者及其战争，而女性主义者则会反对性别歧视的男人（和女人）及其信念和行为。

像意识形态这样的社会共享的信念体系，在用于许多不同的事件、行动和情境时它们更为有用。这意味着它们应该是相当**一般性的**和**抽象**的。因此，女性主义者也许倡导女性和男性的平等权利和机会，而且这种基本的标准会运用于家庭、工作、政治和其他诸多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各种情景。较为**特殊**的信念，比如在竞选中支持某个具体的候选人或是参加一次示威，只有在它们植根于或者源于形成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的较为基础的信念时，才会是意识形态的。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政治理论和政治，参见：Adams (1993)；Ball & Dagger (1990)；Bastow & Martin (2003)；Freeden (1996)；Leach (2002)；Rosenberg (1988)；Seliger (1976)；Talshir, Humphrey & Freeden (2006)；van Dijk (2008b)；Wodak (1989)；Wodak, de Cillia, Reisigl & Liebhart (1999)。

尽管所有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信念也许会被称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部分，但我们必须将意识形态观限定在**由一个群体所共享的根本性的、“不言自明的”信念**，也即控制——而且往往是根源于——较为特殊的信念的一般性信念，这些较为特殊的信念与群体成员所面对的具体事件、行动和情境有关。再者，将意识形态和自然语言相比，也许会说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在特殊情境下的“应用”可以与情境化的语言使用相比，就如我们所知的能力和表现、或者**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之间的传统区分那样。

一个群体成员内共享或散布的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都拥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完全相同的“复本”、也不是说他们会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就如同语言一样，意识形态专家、**“意识形态理论家”**（the ideologues）会比非专业成员更懂意识形态。许多意识形态群体，特别是那些已经体制化了的，也许还有特别的导师（如牧师、古鲁（gurus）[1]、党派领导人等）和特别的传播节事来教授或教化新成员。意识形态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更为广泛地获得，比如通过教材和大众传媒。

1 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译者注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参见：Andrain & Apter (1995)；Garner (1996)；Laraña, Johnston & Gusfield (1994)；Jones (1984)；Oberschall (1993)；Rudé (1980)；Wuthnow (1989)。

由于人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每个人也许会“参与”到不同的意识形态中：一个人也许会同时是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记者等，其活动和话语于是会同时受到几种意识形态（碎片）的影响，甚至在每一种场合一种或几种意识形态占主导的时候，身份认同即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例子（见由安娜·德菲纳所写的第13章）。【384】

群体成员并不是一夜即**获得**或**改变**其意识形态的。他们也许会花上多年来“习得”，比如在个人经历、公共话语以及与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的基础上。它们也许是在许多内群体话语的讨论、公开声明和其他形式中慢慢得以发展和适应的，其例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和环保主义等。而且，在此方面，与针对具体事件的不同的个人意见（集合）相比，意识形态更像是语言体系。它们的界定是为了群体，而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应用”或“表现”意识形态的个体成员，为此我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也即依据**心理模式**（mental models）来解释。

意识形态可以控制多种社会实践，而不单单是话语。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可以引发性别歧视谈话，也可能导致（非言语的）性骚扰、社会性别偏见或暴力。**如上文所强调的，将意识形态化约为话语表现是不够充分的**。意识形态本身是社会共享和散布的**群体层面上的**社会认知形式。它们是共享的心理表征，是作为群体成员的特定的意识形态行为基础而被使用或应用的——其中话语极为关键，但也只是诸多实践中的一种。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参见：Billig (1982)；CCCS (1978)；Thompson (1984)；van Dijk (1998)；Žižek (1994)。

有关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参见：如，Agger (1992)；Bailey (1994)；Gane (1989)；Kinloch (1981)；Smith (1990)；Zeitlin (1994)。

18.3.1 意识形态与知识

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认知的其他形式，比如**知识**。我们已看到，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两方冲突，一方是什么可以（从负面）称得上（纯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则是（现实的、科学的、诸如此类的）知识。遗憾的是，本章因篇幅原因无法展开探讨意识形态和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只能说，一种意识形态为某一特殊群体的成员所共享，而且该意识形态一般是为了一个群体的利益，通常以评价性的命题为特征。

而另一方面，此处所定义的知识则为整个共同体（community）所共享；它是预设于该共同体的所有公共话语中，而且同样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言说者所假定，因此是一种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的形式。关键是，知识是按照一个（认知）共同体的（认知）标准而经过“认

【385】证”的信念——这些标准会因应不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而不同。学者会有不同于外行的认证标准或“方法”，而且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会相异于500年前。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总是相对的、情境化的。然而，在一个认知共同体**内部**，它**不是**相对的，而是假定为“真实的”信念。也即，知识的相对主义本身也是相对的，而且也理应如此。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和科学，参见：Aronowitz (1988)；Diesing (1982)。

根据这样的解释，知识要比意识形态更为根本，因为意识形态，以及基于意识形态的群体知识，是假定整个共同体（也即所有的意识形态群体）所共享的知识。恰恰是这种认知共同基础的特征使得双向理解和讨论成为可能，即使是在也许无法认同其他任何事物的意识形态对立者之间。

要注意的是，知识的相对性也意味着对一个共同体而言什么是知识也许仅仅是一种信念、迷信，或者，在他者看来的确也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旦有重要的社会群体或机构挑战一个社会的一般性知识，这种知识反过来会变成有争议的群体知识或者（反）意识形态，就如同上帝的存在、宇宙地心说、关于女性或黑人在智力上低等的断言等这样一些知识。换言之，我们关于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意指广为接受、共享和应用的信念，恰如一个共同体内的**知识**，从另一个共同体的观点来看或者同一个共同体在较晚的历史时期来看，在定义上却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换言之，信念被当作一个共同体的知识，是在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体成员所有的公共话语都假定这些信念对他们而言为真的时候。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关系，参见：Bailey (1994)；Mannheim (1936)；Dant (1991)；van Dijk (1998)。

有关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Hall, Hobson, Lowe & Willis (1980)；Morley & Chen (1996)；Simons & Billig (1994)。

18.3.2 意识形态结构

尽管有关意识形态属性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少有注意投向意识形态性质的准确性、社会认知结构及其话语再现。事实上，一种关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他实践的一般性的、多学科的理论尚处在初始期。

作为新理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首先将意识形态特征化为社会认知的形式，也即从心理层面上来对待。在当代认知科学里，“观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通常是根据信念和信念体系来分析的，是储存在“语义的”长时记忆中，也就是具体的**心理表征**。但是这些表现看起来是怎样的呢？什么才真正是意识形态（比如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呢？

描绘意识形态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给出诸多意识形态命题的列表，比如，“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或者“战争是错误的”，等等。然而，列表不足以在具体情境中学习和使用。事实上，

这样的命题之间存在着多重双向关系，因此我们倒不如根据具体的网络（这种具体的网络也许与大脑的神经网络相关，但这却不是此处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或者**信念组织**的其他形式来思考意识形态。

既然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心理组织系统知之不多，那么对意识形态话语和其他实践的分析就要求意识形态以关于群体基本属性的命题类别为特征，如图 18.1 所示。

【386】

- 身份（我们是谁？谁属于我们？我们从哪里来？）
- 活动（我们通常做什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 目标（我们想要获得什么？）
- 规范和价值（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是好 / 坏，什么是被允许或禁止的？）
- 群体关系（谁是我们的同盟者和反对者？）
- 资源（我们拥有或缺乏权力的基础是什么？）

图 18.1　意识形态结构的示意范畴

意识形态组织的这些基本范畴构成了一个通用图式（schema），反映出群体是如何逐渐发展出自我概念，而这种自我概念又是他们在社会中的集体共享**经验**的结果。

18.3.3　作为社会认知的意识形态

尽管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信念体系，因此也是**认知构念**（cognitive constructs），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时就是**社会的**。相反，就好像语言一样，它们在一个**集体**的成员中社会性地共享，并在作为**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s）组成部分的**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s）中进行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on）结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恰是意识形态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而言如何**历史地**发展。

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发展起来，并在一个群体内扩散，那么，新的**群体成员个体**就会主要是从对实践、特别是亲朋好友或同事以及大众传媒的**话语**的诠释中获得推论，由此学习这种意识形态。有些意识形态是通过特别设计的教育话语来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特别的群体成员（古鲁、领袖、作家、牧师、教师，即**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教学**。事实上，人们的个人经验——作为我们下文将称为“心理模式”的对事件的诠释——也许会受到他们最初通过话语而获得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糟糕的工作条件而自动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他们只是因“学习”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意识、在与（其他）社会主义者进行意识形态话语交流和互动的复杂过程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387】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与教育，参见：Apple (1979); Apple & Weiss (1983); Ward (1994)。

18.3.4 意识形态与话语

既然意识形态话语是在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界定的，那么这种话语往往显示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某些结构。我们会在下面看到，这事实上是我们分析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之一。在研究意识形态时少有数据会比文本和谈话更好，因为意识形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话语和其他符号信息，比如由论证、叙述或阐述，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实践，来得以明确地表达、辩解或说明。

从方法论上来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循环地从话语引出意识形态，又从意识形态引出话语，因为如我们上文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也会影响其他许多社会实践，诸如压迫和歧视，或者对它们的反抗。因此，意识形态——比如较为一般或抽象的——结构和内容不同于它们在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中的使用或表达方式。事实上，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话语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只是通过几个中间的认知层面而间接关联。因此，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简单地“快速读出”话语隐含的意识形态。我们能够**解释**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实践），但仅仅是根据隐含的意识形态**部分地**解释，而且仅仅是在将话语生产的中级层面考虑进去时。意识形态话语还受控于许多其他非意识形态的限制，如当前的目标、知识和参与者当前语境的概念等。

这也许意味着，在具体的传播情境下，意识形态也许根本无法在话语中表达，或者是以一种转化过的间接方式来表达。如下文我们要看到的，将话语与意识形态相关联会在分析的多个【388】层次上进行，也因此会远离循环：即使意识形态话语在许多方面是自主的，但往往最终形塑于整个语境，其中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只是一个维度。

18.3.5 举例：职业意识形态的图式

考虑下许多记者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作为上文提到的意识形态图式的一个例子。这种**职业**意识形态的首要特征包括：记者作为一名专业工作者的**身份**（identity）（也即在一个既定的共同体内如何作为一名记者而被看待、接纳和雇用等？）；他们典型的职业**活动**（比如搜集和报道新闻）；他们的总体目标（告知公众，“为社会充当看门狗”）；他们的**规范**（客观性、公正、平衡等）；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消息源、读者、政府、公司企业等）；以及确定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的主要**资源**（信息）。要注意的是，由此意识形态图式所组织起来的命题并不描述记者实际所想和所为，却说明了他们如何**积极地表达**他们自己：他们在命题上是**意识形态的**。换言之，一种意识形态就像是一个群体的基本的**自我形象**，包括利益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权力、抵抗、竞争）。

18.3.6 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作为信念体系，体现的不单是一个群体的（可能是带有偏见的、被误导的）**知识**（knowledge），而且还有根据其基本的共同体运用于自身活动及其参照群体活动的**规范**（norms）和**价值**（values）的共同**评价**（evaluations）。的确，职业记者也会有标准用以识别“好”或“坏”的新闻报道，这也反映在行为的职业守则上。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不但

告诉一个意识形态群体的成员什么是“真”或“假”，而且还告诉他们什么是“好”或“坏”，“被允许的”或“被禁止的”，如此等等。

于是，在许多共同体内广为传播的一种价值是**自由**。但是这种价值也许会因意识形态群体的利益而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不同的理解，比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市场自由**与记者的职业意识形态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于是，对事关意识形态群体成员的行动和事件的评价是基于这些作为意识形态上应用的共同体的一般规范和价值。尽管许多意识形态是跨文化的，但这也许还意味着，如果一个共同体的诸多基本价值有所不同，那么该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女性主义）或许也会有别于其他共同体。

参考文献注解

有关意识形态与官僚政治，参见：Burton & Carlen (1979)；Hwang (1998)。

18.4 态　度

【389】

我们已将意识形态界定为可应用于许多情境的**共享的、一般性的**和**抽象的**心理表征，在这些情境中意识形态群体成员可以发现他们自我。然而，意识形态也可能控制——并最初缘起于——与群体成员日常生活相关的较为**具体的**议题的共同信念。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中，这种具体的表现被称为**态度**（attitudes），一种我们这里必须采用（并适应）的观念，因为它在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中具有实践性和有用性。如同知识和意识形态一样，态度也是抽象的，**不是**临时性的个人意见（尽管在许多社会心理学中这些也被称为“态度”）。

态度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于**具体社会议题**的信念聚丛，比如堕胎、安乐死、移民、污染、言论和出版自由、投票等。在聚焦于相关社会议题的同时，态度——如我们这里将要界定的——在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控制中，较之于它们所基于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而言，可以更加直接地运用。

事实上，群体成员也许少有意识到对他们的具体意见和行为发生影响的一般性意识形态。他们通常更加在意于有关具体议题的群体态度，并相应地对其个人意见进行定位。比如，在反女性主义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下，许多年轻的女孩子也许甚至会拒绝成为女性主义者的一般性意识形态标签，但在实际上却仍然认同许多女性主义态度，比如同工同酬、堕胎选择自由等。对于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工人也是同样如此，他们还是在大体上认同许多关于雇用、解雇和工人权利的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态度。与此相反，颇为典型的是，人们也许反对移民和移民者的权利，但会特意强调拒绝宣传种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这典型地反映在为《每日电讯报》撰写移民社论的记者身上。

我们认为，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态度——如所界定的那样——在我们的头脑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即使得非常一般化的意识形态与较为具体的社会领域\议题和实践联系起来，并最后与话语相联系。而相反的是，意识形态通常并不是直接由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概括而来，而是对具体态度的更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一个人通过学习具体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或和平

主义议题而逐渐学会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

参考文献注解

关于意识形态的认知和社会心理，有些成书的研究。比如参见：Billig (1982)；Aebischer, Deconchy & Lipiansky (1992)；Fraser & Gaskell (1990)；van Dijk (1998)。

【390】

18.5 意识形态心理模式

为了将意识形态和基于意识形态的态度与个体成员在特殊情境中的具体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我们最后需要另一层面的社会认知分析，也即**个人经验**。这种经验体现为**心理模式**，储存在我们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一部分的（自传式的）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1]中。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态度不同，模式是**特殊**事件、行动和情境的**主观的**、**个人的**表征，也即人们如何个人化地诠释、生活并回忆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除了个人知识外，这样的模式也许还以个人的评价性信念——**意见**——以及与这些事件相关联的**情感**（emotions）为特征。

一个社会群体的个体成员所形成的心理模式也许在意识形态上受控于有关一个特殊议题的社会共享的群体态度。因此，女性主义者通常会对一个特殊的性骚扰案持一种女性主义意见。这是他们与其他女性主义者共享的心理模式的社会维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群体的成员往往对一个事件持有类似的意见。

然而，模式也是**个人**经验的表征，因此也受到当前目标和早先经验的影响，这些目标和经验也许会与社会共享的态度相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访谈和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同一群体的成员也许同时在个人意见方面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以致学者们往往怀疑或许广泛共享的隐含的态度和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

一个在分析和经验层面足够充分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综合理论，应该描述和解释意识形态话语和行为的个人差异，以及作为群体成员所共同持有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意见。由于心理模式——如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接口——以这两个维度为特征，在解释因人而异、也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意见和话语时，它们是理想的解释基础。

由于只有群体成员作为个人——而不是群体——才有身体，这也才使得意识形态和态度能够被经历、被表达和“体现”于个人经验的心理模式中，典型的例子是**情感**。因此，性骚扰不仅仅是作为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性别不平等或男性压制的例证而被经历着，同时也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和**情感的**深度体验而被感受着——甚至在事后讲述这种经验的**叙说**时，个人情感也许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有关性骚扰的一般态度的例证结合在一起。

1 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关联，对事件或情景的记忆，与情景记忆相区分的是语义记忆。——译者注

参考文献注解

关于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参见：Afshar (1987)；Ballaster (1991)；Charles & Hintjens (1998)；Lazar (2005)；Smith (1990)；Wodak (1997)。

【391】心理模式在解释话语和其他社会实践时很关键，也限定了我们如何亲身规划、理解、诠释、体验以及事后回忆我们参与其中的所有事件和行动。有意识形态“偏向”的心理模式控制着我们所有的意识形态实践，也由此控制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文本和谈话。话语的心理模式表现出话语是什么、话语指向什么，并由此揭示话语的语义。我们也因此将它们称为话语的“语义模式”。换言之，为了对某话语的意义进行诠释，语言使用者会为此话语演绎出一个主观的心理模式，可能还包括他们针对该话语所论及的行动或事件的意见和情感。我们可以看到，心理模式在话语生产和话语理解中都发挥着中心作用。恰恰是通过**个人有所不同但整体社会相类似的心理模式**，一个意识形态群体可以诠释和再现与群体相关的所有社会事件以及关于这些事件的话语。

参考文献注解

在本章中，意识形态主要是作为社会共享的群体心理表征来界定和分析的。根据群体成员对意识形态和态度的“使用”以及代表人们个人经验的评价和情感等方面来说明意识形态的个人维度。这种路径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动力”路径，后者是根据人们的性格来研究意识形态，如阿多诺（Adorno, 1950）的“威权性格”。新近有倡导者提出将后面这样一种路径与较为“自上而下”的集体路径相结合，并产生了新的经验研究，比如（许多研究中的）约翰·约斯特及其同事的研究（如参见约斯特、费德里克和内皮尔等人（Jost, Federico & Napier, 2009）的一篇评述文章）。这篇文章强调，除了产生恐惧的情境性条件（比如以恐怖分子袭击为例），一些特别的“逆向（bottom up）”的性格特征比如“对新体验的开放”等使得人们倾向于左翼分子、自由的意识形态，而对于秩序、稳定和忠诚的偏好则倾向于将人们定位在“选定的”保守的意识形态。

18.5.1 意识形态语境模式

由当下正在进行的**互动**和**交流经验**形成的特殊心理模式即**语境模式**限定了文本和谈话的**语境**。例如，记者的实践受制于主观再现作者自己作为记者的身份、角色、目标、规范和资源的语境模式，并与其新闻搜集和写作过程中的前期个人经验相结合。与此类似，某人在参加关于性骚扰的辩论中也许通常会像**一个女性主义者**说话。这意味着在她（或他）当下正在进行的语境模式中，说者将她／他自己再现为一位女性主义者，而这样的语境模式会影响话语生产或理解的所有层次。

语境模式是对交流情境的**主观界定**。它们控制着话语如何去适应交流情境，由此也界定了其**恰当性**。除了再现参与者的当下身份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语境模式还会赋予信息各方【392】面特征，包括环境（时间、地点）、身份和参与者的关系、正在进行的社会活动（如新闻写作、会话、议会辩论等），以及目标、知识，的确还有参与者当前相关的意识形态。

语境模式是话语的**语用**基础。这也许还要求有关某些经验（我们就什么谈话）的“语义”

的心理模式适应于当下的交流情境。表达一个人所了解、所信仰或所感知的，并不总是恰当的（礼貌的、相关的等）。于是，“语用的”语境模式将控制我们说什么，特别是在一个特殊的交流情境下我们如何说（风格、语域）。而且，对于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的是，如同“语义的”心理模式，语境模式也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偏向的。因此男性（和女性）不单是在就女性问题谈话时，而且在对她们说话时都表达了性别歧视者的意见——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语境模式中以性别歧视者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对话者（及其关系）。

这种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语用说明很重要，因为它更为清晰地显示了我们上文已提到的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时有的间接关系。没错，群体成员的话语通常会受到该群体的意识形态影响，但往往取决于参与者所界定的语境。依据当前目标和利益，以及对话者的意见或意识形态，一个人可以隐藏或只是间接地表达其意识形态。实际上，在许多情境中，这样的意识形态也许无甚关系，一个人在此情况下并不需要作为群体的一员来言说。女性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是像女性主义者或和平主义者那样发言。换言之，语境模式往往是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最终“过滤器”，甚至是在意识形态也许透过自我控制这样的过滤器而微微“渗漏”出去、并被复杂的话语分析探测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从这样的套话中了解到的，如“**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

参考文献注解

关于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参见：Afshar (1987)；Ballaster (1991)；Charles & Hintjens (1998)；Lazar (2005)；Smith (1990)；Wodak (1997)。

18.6 意识形态与话语

在概略描述了意识形态性质以及与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的相关方式后，我们也已了解到意识形态如何与话语相关、它们如何在话语中被表达或表现，以及如何通过话语来获得和改变意识形态等社会 — 认知方面。

我们已强调，***话语极少直接表达意识形态***，可能的例外是诸如圣经、教会问答手册、党纲等这样明显的意识形态文本。更常见的是，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片段，比如在一场有关移民或政府政策的辩论中以对特殊议题的态度形式表达出来，正如我们从《每日电讯报》的那篇社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而且，这种共享的态度甚至可能与作为语言使用者的特殊群体成员的心理模式中的个人经验和意见相结合。【393】

换言之，如前所假定的，一方面，在一般性的抽象的群体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表征（如某种意识形态“深层结构”）；而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具体的意识形态文本和谈话（如意识形态“表层结构”）。我们认为，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不总是在话语中直接可见或可探测的，特别是当语境模式阻碍了直接的意识形态表达时，好比在一个特殊情景下直接表达会被当做不恰当的“不良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明必须把特殊情境下特殊表达（如代码词汇）的使用诠释为意识形态的，语境分析是必要的——如同我们从欧洲种族主义党派的宣传海报所了解的那样。

参考文献注解

关于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参见：De Saussure & Schulz（2005）；Fowler（1991）；Fox & Fox（2004）；Garzone & Sarangi（2008）；Larsen，Strunck & Vestergaard（2006）；Lazar（2005）；Pêcheux（1982）；Pũtz，Neff-van Aertselaer & van Dijk（2004）；Schäffner & Kelly-Holmes（1996）；van Dijk（1998，2008b）；Wodak（1989）；Wodak，de Cillia，Reisigl & Liebhart（1999）。

18.6.1 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的限制因素

出于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原因，意识形态话语分析必须受到三个基本的限制因素的控制：①**话语的**（dicursive），②**社会－认知的**（socio-cognitive），以及③广义上的**社会性的**（social）（包括互动的、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

这首先意味着**任何**话语分析及之后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考虑文本和谈话的一般属性，进而考虑表达或意义与话语中的其他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人也许将一个被动结构解释为意识形态策略的表达，用于缓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消极作用。但是，不能忽略的是被动句子结构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而用在话语中，比如施事者不确知，或者施事者已经识别而无需重复，但需要将焦点聚集在消极行动的受害者，如此等等。换言之，有些原因并不是对话语结构的意识形态限制，一个人必须总是首先要考虑任何表达或意义在那话语本身中的“共文（co-textual）”功能。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显然是针对受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是非常间接地——的话语结构而进行的。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应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能够被显示为深层的社会－认知表征（如心理模式和态度）的表达，并受到群体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控制。这意味着应该将话语的那些意识形态结构聚焦于表达或复制一个群体的身份、行动、目标、规范和价值、群体关系和资源等方面，如果我们假定这些是意识形态结构的一般性类别的话。语言使用者参与到一种积极的自我表现和消极的他者呈现，也许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说话或写作。在那种情况下，隐含在话语下的心理模式并不受到社会共享的意识形态或态度的影响，而仅仅以个人意见和经验为特征，或者是基于群体共享的非意识形态态度的意见。例如，一群学生有关其教授相当负面的话语并不一定是由意识形态所激发的。【394】

最后，除了这些话语和社会认知的限制因素，所有社会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所有文本和谈话都是以社会环境也即正在进行的互动为条件的，还有如参与者所界定的身份、利益、目标、关系以及交流情境的其他属性，也就是**语境**。这也就是说，如前所见，说者也许**并不是**出于语境原因而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观点或意见，比如只是因为礼貌、担心被嘲笑等。

在分析时意识形态基础结构的表达或“表现”，往往需要考虑到正在进行的，而且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当下语境中的话语功能**。例如，《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针对工党政府的公共社论中典型地表达了反移民态度。它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出于多种意识形态上的其他理由而反对这样一个政府，也由此希望其社论将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比如对读者或选民。换言之，其意识形态社论在当前的交流情境下（了解该报的读者类型，了解当前的政治状况等）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而现在，如果保守党获得权力，语境将会完全不同，尽管对移民的负面态度依然相同，指向保守党政府的有关移民政策的社论却很有可能大不相同。

总之，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也即识别和诠释作为群体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复制的话语结构和策略——往往必须考虑文本、认知和社会（语境）等方面对所有话语的限制。事实上相当无足轻重的是，并不是每种话语的所有结构都总是意识形态的！恰恰是根据这些限制因素，我们必须最终考察文本和谈话的某些结构，这些结构常常——但不总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集中讨论文本和谈话如何表达、表现并（再）生产意识形态的。【395】如我们前文所概述的，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形态话语往往受到如下基本的深层表征（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s）的控制：

1. 社会认知
   ① 整个共同体的社会共享表征：社会文化知识或共同基础。
   ② 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共享表征：特殊的群体知识和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态度。
2. 个人认知
   ① 所谈论或描写的事件的主观心理的事件模式（event models）——界定了话语的**语义参照**、**真相**等。
   ② 参与者当前涉入的交流情境的主观心理模式——语境模式（context models），界定了话语的语用适切性。

这意味着，首先我们要考察**意识形态及其结构**影响态度、心理模式乃至最终的话语结构的方式，尽管这种影响往往受到语境模式比如说者或作者的当前目标的控制。这意味着，如果意识形态的确是根据我们如上提出的图式而组织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出现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类别来对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基于理论的分析。

18.6.2 话语中意识形态图式的表达

依照上文提出的意识形态图式，我们可以假定**意义**的如下类型会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显性化：

◎群体身份和身份认同　我们是谁；谁（不）是我们群体的典型成员；对于我们群体而言，什么是典型特性；谁（不）能或者（不）应该被准入群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我们的基础性文本是什么；谁是我们的群体英雄；我们的象征或者其他象征标示物（旗帜等）是什么；以及相当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我们是自主的。总之，这一意识形态类别影响着大量的可能的话语主题以及与该群体的**历史**、**特性**和**界限**相关的地方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范畴的意识形态特征案例有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

◎活动　这一范畴影响着群体成员如何界定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他们之所为以及什么是对他们作为群体成员的期待。这一范畴在职业意识形态中特别重要，但在一些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中也是如此。的确，基督教精神不只是根据其信仰来自我界定的，而且还根据基督徒对他们的“近邻”（不）应有所为来界定的，就如同“摩西十戒”中所规

定的。因此，所有关于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所为或（不）应有所为的话语主题可以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就如同其本身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实践一样。

◎规范和价值　意识形态、态度以及基于前两者的实践永远受控于规范和价值。于是，群体成员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大多数意见都可能基于在每种意识形态中特别拣选和综合起来的规范和价值，比如自由、自主、公正等——尽管是根据群体利益（如市场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歧视的自由等）而被再界定。由此，对诸如什么是好与坏、什么被允许和禁止、谁是好人和坏人、什么是好的或坏的行动等方面的所有指涉，都是通常受到此类意识形态影响的表达。这一范畴在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中特别重要。【396】

◎群体关系　大多数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再现我们自己（内）群体与他们（外）群体、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既然意识形态的自我图式中存在着积极的偏向，于是我们可以预期到，对我们和他们的再现在话语的所有层面上，从整体上来说前者是正面的，后者却是负面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两极化**是如此渗透于话语中，以致我们必须在下文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尽管这一范畴与大多数意识形态相关，但对于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大多数抵抗性意识形态如女性主义与和平主义等而言尤其典型，可是在职业意识形态中却不那么显著。

◎资源　为了能够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并再生产，群体需要资源。没有信息的记者、没有知识的教授等是无法在社会中行使他们的权力的。因此，意识形态话语要适应（有时是暴力）捍卫我们的资源、特权或权力的需求，或者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它们。这样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对于大多数意识形态而言都很典型，但对于抵制性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等）来讲却相当鲜明。

至此，我们已勾勒出意识形态及其基本范畴对话语例如综合性话题的种类以及意识形态话语的地方性意义的一般性影响。然而，这样的分析依然相当一般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探求意识形态形塑文本和谈话的更为具体的方式。理论上，意识形态会影响一段话语的任一部分，这话语会因说者的意识形态而不同。换言之，意识形态原则上可以影响所有话语结构，除了那些遵循语法和话语的一般规则的话语结构。一般规则是用于所有说者的，因而也是面向一个语言共同体内的所有群体的，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必须是相当的中立。这里的一个例外是那些作为群体控制结果而发展出来的规则，如西班牙语中的名词阳性复数，同样也用于指代男性和女性的集合体，或者在语法上属于阳性的许多职业的名称。因此，既然大量的话语结构可以在意识形态上被控制，那么我们必须只是聚焦于某些具有典型特征的话语结构上，并参照上文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一般图式，以求发现和分析其他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结构和策略。

18.6.3　意识形态方阵

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一个主要的总体策略是对意识形态图式的*群体关系*范畴的表现，也即内群体和外群体在文本和谈话中的再现，典型范本是由意识形态名词我们和他们来再现。由于该范畴的意识形态深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极化的，我们因此可以预料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也是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以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方阵*（the ideological square）这种方式出现的，【397】

我们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包含了四种互补的综合策略。

强调我们好的地方	强调他们坏的地方
淡化我们坏的地方	淡化他们好的地方

图 18.2　意识形态方阵

这种强调（淡化）的一般性元策略，也如同我们从传统修辞（如夸张和委婉法）所了解到的，可以用于多重模式的文本和谈话的所有层面，也如我们在下文更详细的说明中所看到的各层面：语音和图像结构、句法和词汇、地方性和全球性语义、语用、修辞和话语的图解（组织）结构等。

在《每日电讯报》的那篇社论中，我们已观察到了几处夸张，也即用词上强调工党及其移民政策的“坏”的属性这样的手法。下面，我们将更为详细地展示这种手法是如何在其他意识形态话语实例中实现的。

18.6.4　正面的自我再现与负面的他者再现

意识形态方阵这种复杂的元策略告诉我们，群体成员倾向于正面地谈论或描写他们自己的群体，对他们界定为反对者、竞争者或敌人的外群体则是负面的，只是因为他者是不同的。

群体及群体关系的这种基本特性在有关群体间感知和互动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常常能观察得到，它要求对话语进行复杂的分析，以考察它是如何在文本和谈话的所有层面上得以展开的。也就是说，话语分析要超越描述内群体或外群体属性特征的正面或负面词语这样表面上的内容分析。

话语也许影响到心理模式的形成或变化，由此以更多的方式来实现劝服目标，从语调的声音结构，图像的视觉结构，句法、风格和修辞的形式结构，到地方性和全球性意义的语义操控以及言语行为的语用维度乃至更一般性的互动策略等诸多方式。

于是，对外群体的负面特征的强调可以由如下种种结构和策略来完成：

语义结构：意义和参照

- 负面话题（语义的宏观结构）：指的是将他们描述为违背我们的规范和价值观的任一综合性的话语话题，如越轨、威胁、不安全、犯罪、无能等。
- 描述的层面（一般与具体）：他们的负面特性或行动与我们的相比，在描述时倾向于更为具体的（较低层次的）细节化。
- 完整程度（描述的每个层面）：有关他们的负面特性或行动的更多细节会在描述的每个层面上被提及。
- 细致度（granularity）（精确性与模糊性）：他们的负面特性或行动与我们的相比，往往以更为准确的词语来描述。
- 言外之意（implications）（明确地表达在话语中的命题所隐含的命题）：有关他们的具有（许多）负面隐含意义的命题。

【398】

- 预设（presuppositions）（要使任何命题有意义、必须为真／为人所知的命题）：预设那些（有关他们的负面）命题，却并不知其为真与否。
- （命题的）命名（denomination）（对参与者的描述）：对他们的命名或标识往往不同于我们（准确地说是他们），如陌生人、移民、他者、反对者、敌人等。
- （命题的）述谓（predication）（句子的意义）：将负面特征赋予他们的命题的任何述谓。
- 情态（modality）（修饰命题的情态表达：必要性、或然性、可能性）：他们的负面特性也许被归因为与生俱来的，也因此是“必然地”适用于他们。
- 施事（agency）（一个命题的论证／参与者的作用）：强调他们（并淡化我们）对负面行动的施事或能动责任。
- 话题 vs 评论的组织结构（句子中既定／已知信息 vs 新信息的分布）：如同预设在命题层面上，假定负面参与者是已知的，如此等等。
- 焦点（focus）：任何参与者、特性或行动都可能成为特别关注的焦点，比如通过特别的重音、音量、大小、颜色等（参见下文），以引起接受者的注意，例如为了强调他们的负面作用。

形式结构

- 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s）（话语诸如论证或叙述的一般“格式”、“图式”或整体“组织结构”。特定的语义范畴（如关于他们的负面意义）在被置于一种非常规的（开头的、较早的）位置如头条或导语时，会被凸显出来。他们的负面属性会被强调，抑或通过说服性论证和错觉，抑或借由令人入迷的讲故事的形式，这种形式也能激起对所称的负面属性的事后回忆。
- 强调负面意义的视觉结构：图像中突出的负面行动或事件；字母和标题的字体、大小和颜色；在页面或媒介（如报纸的头版）上的显著位置；将他们再现为负面行动的行动者；贬低性的卡通；在图像或电影中负面再现的精确度、细致度、特写等。
- 强调负面词语的声音结构：音素的音量、音高等；句调（如表达反讽、距离、怀疑、谴责等）；负面情感的伴随音乐（如表示威胁、危险、暴力等）。
- 句子的句法结构（词序、从句顺序、从句间的层级关系等）——以主动句强调负面施事（与之对应的是淡化施事的被动句或名词化词语）；句首从属的 that 从句可以表达对他们的未知或虚假预设。
- 限定性表达可以表达对他们的未知或虚假预设。
- 代词可以表示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类似于我们对他们，而且在谈及我们对他们时通常可以表示不同程度的权力。
- 指示代词可以表示与所描述的人之间的亲密度或距离，比如那些人。
- 修辞策略像重复、列举（enumerations）、押韵、头韵等，用来强调并以此吸引注意力，从而强调关于他们的负面意义。

我们从这张（不完全的）清单中看到有多种方式可以为语言使用者所用，以强调关于他们的负面意义／信息，由此参与到贬低外群体的话语再生产中，这在意识形态文本和谈话中颇为典型。他们通过运用意义本身的（语义）结构和策略，比如选取或强调负面话题或人以及行动

【399】描述来实现这样的话语再生产，而且还可以运用许多形式的（视觉的、音韵的、结构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常规性地运用于强调这些意义并由此获取对它们的特别注意。

显然，**同样的**语义和形式策略也可以用于对内群体及其成员的正面的自我描述。换言之，如上文强调的，话语的一般结构和策略其自身在意识形态上必须是中立的，因为相同共同体内的任一意识形态群体都可以使用这些结构和策略——它们是可以被任何人采用的语言和交流资源。然而，这些话语手段强调（淡化）了**什么**，当然与意识形态相关。这也意味着需要考虑表达隐含的意识形态信念的**意义**，以及**语境**：谁在言说／书写着什么、对谁、什么时候以及怀有什么目的。

18.7 样本分析

最后，我们来更为细致地考察一下另一个意识形态话语的典型例子，并展示其结构是如何表达和再生产隐含的意识形态的。尽管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一段话语来举例说明我们所称的正面的意识形态，比如那些倡导正义、平等、公正、自治等，但我们还是再次使用了一段话语例证，以此说明在民主语境下意识形态常常被视为负面的。这种分析对于批判性话语研究而言更为典型，此类研究是一种反对诸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这样的权力滥用和支配的学术活动和运动。

正如我们的举例，我们要考察的是西班牙人民党（Partido Popular，PP）[1]的一位成员安杰尔·埃斯比斯·帕尼亚瓜（Ángel Acebes Paniagua）2006年5月24日在西班牙议会（Cámara de Diputados）上关于移民话题的发言，发言是针对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Minister（Secretary）of Work and Social Affairs）卡尔德拉（Caldera），一位由PSOE[2]首相萨帕特罗（Zapatero）（社会党）执政的政府成员（发言内容如下）：

1 部长先生，您的首次决定，几乎是您的政府所采取的
2 唯一一次决定，是要改变我们与欧盟达成一致的政策，
3 且要实现大规模合法化的进程，却是
4 在欧盟中已无人这么去做的时候。尽管本议会群体，
5 还有法国、德国、英国和欧洲委员会都提出了警告，
6 这会产生最严重的呼唤效应（现场哗然），
7 但您依然无视这项政策。首相继续实行他
8 那著名的政策，不让任何人破坏他一个好的新闻标题，尽管该政策
9 给所有公民都造成了问题。
10 后果很快接踵而至，所有西班牙公民每天都看得见：
11 在休达（Ceuta）[3]和梅利利亚（Melilla）[4]，大规模群体在袭击我们的边界

1 西班牙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之一，是一个保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译者注
2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是西班牙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党，全称为Partido Socialists Obrero Español。——译者注
3 即“塞卜泰”，西北非的港市，西班牙在摩洛哥的飞地。——译者注
4 在摩洛哥北部。——译者注

12 有15人死亡，部长先生；在加那利群岛人群蜂拥而至，
13 一周就有2000移民，每天有600人
14 从拉洪克拉（La Junquera）[1]或通过北部的山道进入，还有更多的
15 是通过机场。这就是您的政策的最终结果：仅仅一年中
16 就有超过100万的非法移民。您已打破了无能的所有记录（现场哗然）。 【400】
17 您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吗？这些
18 如雪崩而至的人群已将我们的边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
19 想进就进的地方，犯罪团伙乘此进入
20 西班牙。在我们家园发生的罪行因犯罪团伙而生，他们
21 非法买卖人口，参与暴力抢劫，绑架勒索，
22 杀人。当然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因此我们坚持要求
23 出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政策，这问题日益
24 困扰公民。（现场哗然）。与此同时，此届政府，已完全
25 不知所措了，行事荒谬，就如同您在说整个欧洲都将
26 效仿您的政策时所做的那样 ……（现场鼓掌）。

为了说明国际关系和广为散布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一案例，因为它的话题与《每日电讯报》的那篇社论相同，也即移民话题；它也是由一个保守机构和政党的成员所阐述的，也是批判性地指向一个“劳工”政府。

这里的意识形态两极化是沿着两条轴线来阐述的，第一个是反对保守党以及人民党与社会党政府相对立的立场，第二个是将西班牙本地人与移民相对立起来。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结构是如何在这一片段中表达出来的。

对正面的自我呈现策略的分析结果是，处于反对立场的政治党派在抨击政府时通常呈现出一种内群体的倾向（见表18.1）。尽管他们在当时（2010年）是西班牙的政治少数派，在寻求其合法性时首先是声称他们是欧洲共识的一部分（实际上欧盟议会的2009年选举表明，也是在移民问题上，保守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于是在意识形态话语中，较高级别的政治组织被用来作为一个含蓄论点中的正当理由，以支持“我们的政策是好的”这样的观点。其次，当发出一个同样被呈现为与欧盟共识一致的警告时，发言者也在暗示，他们已经预见到了目前的问题，于是也暗示了他们是好的政治家。随后，发言者寻求反对党政策的合法化，反复指涉（原本地）公民的意愿和态度，由此进一步暗示他所在的党是（更为）民主的，因为它关心民众。我们可以看出，类似这一片段的政治话语中正面的自我呈现步骤全部指向一个主要目标：合法化。

我们可以从表18.2中看出对他者的负面呈现的整个策略的互补性步骤。首先，在话语直接指向部长的同时，反对步骤也许是个人化的，例如在指责部长疏懒和无能时。其次，也是更为明确的是，发言者将首相及其政府贬低为轻浮、荒谬的，由此剥去了他们作为好政治家的合

1 西班牙北部边境城市，隶属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赫罗纳省。——译者注

表 18.1　保守政客在西班牙议会上关于移民的话语中正面的自我呈现步骤

A. 保守者（人民党，“我们”）	正面的自我呈现
1 我们与欧盟一致	•我们是国际共识的一部分
2 在欧盟中已无人这么去做的时候	•我们的政策与欧盟政策一致
3 尽管本议会群体，还有法国、德国、英国和欧洲委员会都提出了警告，这会产生最严重的呼唤效应	• “我们这么告诉你了” → 我们了解政治 •我们认同众多欧洲国家的政策 •我们预见到了问题 → 我们是合格的政治家
4 （……）尽管它给所有公民都造成了问题。	•我们关心公民→ 我们认真对待我们作为代表的职责→ 我们是民主的
5 当然，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	•我们明白事件的因果关系
6 因此我们坚持要求出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政策	•我们采取政治行动去解决问题
7 一个日益困扰公民的问题	

【401】

表 18.2　保守政客在西班牙议会上针对社会党政府发表的关于移民的话语中负面的你们 / 他者呈现步骤

A. 社会党（政府，“你们”）	负面的他者 / 你们呈现
1 部长先生，您的首次决定，几乎是您的政府所采取的唯一一次决定	•→ 你们（部长，政府，PSOE）是疏懒的
2 要改变政策（……）	• 你们与一个达成共识的好政策相偏离；你们是欧盟中的一个例外
3 且要实现大规模合法化进程	•你们容许大规模移民（夸张法）
4 您无视这一政策	
5 您打破了无能的所有记录	•你们是无能的（夸张法）
6 首相继续实行他那著名的政策，不让任何人破坏他一个好的新闻标题	• 你们（PSOE, 政府）只关心你们的形象→ 你们是浅薄的→ 你们是糟糕的政客
7 尽管它给所有公民都造成了问题	•你们不关心公民→ 你们是非民主的
8 后果很快接踵而至	•你们的政策产生（糟糕的）后果→你们的政策是糟糕的
9 有 15 人死亡，部长先生 10 你们政策的最终结果：仅仅一年中就有超过 100 万的非法移民	• 你们的政策导致死亡→ 你们的政策是致命的→你们的政策是糟糕的
11 您知道最严重的是什么吗?	• 你们无视问题的严重性→ 你们是轻浮的→ 你们是糟糕的政客
12 与此同时，此届政府，已完全不知所措了，行事荒谬，就如同您在说整个欧洲都将效仿您的政策时所做的那样	•你们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政府是荒谬的 •无人追随你们的政策→ 你们的政策是糟糕的

表 18.3　西班牙保守政客话语中对移民的再现

对移民的再现	他者的负面呈现步骤
1（……）一个大规模合法化进程	•移民大量涌入→ 他们是一种威胁
2（……）一种最严重的呼唤效应	•他们来，是因为他们受到放纵的移民政策的“呼唤”→ 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有着严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
3（……）对所有公民都是一个问题	•他们对于我们（西班牙人）是个问题
	•他们是暴力的（“袭击”）
4（……）在休达和梅利利亚，大量的人群在袭击我们的边界	•他们威胁着我们的边界→ 他们威胁着我们的国家
5（……）有 15 人死亡	•他们对死去的人负责 •**提示**：死的是我们的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人
6 在加那利群岛，人们如雪崩而至	•**象征**：雪崩 → 自然威胁
7 一周就有 2000 移民	•**数字游戏**：2000，600，100 万等
8 每天有 600 人从拉洪克拉或者通过北部的山道进入	
9 还有更多的人从机场进入	
10 仅仅一年中就有超过 100 万的非法移民	•**时间上的夸张法**：一周，一年
	•**累积，层进法**：更多的
11（……）最严重的	•**非法** → 违反我们的规则 → 异常
	•**过度一般化**：所有的犯罪都归因于他们
12 这些如雪崩而至的人群已将我们的边界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进就进的地方	•**象征**：西班牙边界被描述为“coladero”= 过滤器
13 犯罪团伙乘此进入西班牙	•**鉴定、命名、定罪**：移民被描述和鉴定为犯罪团伙
14 在我们家园发生的罪行因犯罪团伙而生	•**过度一般化**：所有的犯罪都归因于他们
15 非法买卖人口	•**个人威胁**：他们威胁着在家的我们
16 参与暴力抢劫	•他们缺乏人性，侵犯人权：非法买卖人口
17 绑架勒索，杀人	•他们是暴力的（暴力抢劫） •他们参与非常严重的犯罪（暗杀、绑架）
18 当然，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	•他们的到来与这些犯罪有着逻辑关系
19 一个日益困扰公民的问题	•他们对于我们（我们公民）是个问题 → 我们公民是受害者

法性。再次，通过谴责现任政府违背欧盟政策，发言者暗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偏离，因此他们是糟糕的。而且由于政府被指责为无视人民的愿望，他们不但忽略了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和现任领导人的职责，也失去了所有的民主合法性。换句话说，沿着国际共识标准（通过谴责现任政府打破这种共识）以及缺乏民主支持这两条线索，一种负面的他者呈现被系统表述出来。由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现任社会党政府都被谴责为缺乏合法性。在此例中，该策略再现了一种与社会党政府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意味着对保守政策的正面再现。

尽管在议会辩论中因政客对立而产生的双面性的两级化，当然主要是面对现任政府而提出，但发言者也会表达其对其他外群体的意识形态态度——在此辩论中显然是非法移民问题，尽管是隐含的、有时是明确的，这一策略似乎指向所有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南方”和“东方”的移民，他们于是也有了种族上的不同——因此这一策略看起来像是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表 18.3 显示了用于负面再现移民的步骤。

表 18.3 毋庸置疑地显示了埃斯比斯先生的演讲受到一种隐含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他对移民的再现突显了通常所有的种族主义偏见，主要是将（所有）移民从总体上与威胁相关联，特别是与犯罪联系起来。为了确保一般人也明白他的信息，他特别将犯罪威胁与所声称的袭击私宅联系起来，并强调大规模具有威胁性的移民的到来让所有公民都忧心忡忡。在话语上，这种威胁的具体构建是由自然的威胁力量（**雪崩**）这种惯用象征、强调移民“众多”的数字游戏以及暗示死亡和暴力的层进性论断来实现的。通过“袭击”一词，他让人们回忆起发生在北非、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西班牙飞地的边界事件，与此同时他将移民再现为一种对整个国家的威胁，由此也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样也就表现了一种隐含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分。

【403】

要注意的是，这段话语并不单单指具体的事件，而因此形成对事件的孤立的心理模式。话语中反复出现的一概而论直接表达且有意指向形成或者证实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较为一般性的隐含的种族偏见：移民是凶暴的犯罪分子，是对我们公民的一种威胁。这意味着演讲者同时致力于形成我们西班牙人和他们移民之间的意识形态两极化。除了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进入，这段话语并未明确指出所声称的威胁来自于非洲、东欧和拉美，却通过指涉北部边界和机场而得以暗示——演讲者知道公民们明白他所指的是谁。

参考文献注解

关于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参见：Barker（1981）；Guillaumin（1995）；Römer（1985）；van Dijk（1993，1996，1998）；Wetherell & Potter（1992）。

18.8 结 语

可见，对所谓的意识形态隐含结构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以一种系统的、明确的方式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于是我们可以在话语的每个层面上发现蛛丝马迹，以揭示隐含的身份、行动、目标、规范和价值、群体关系以及从属于并辨识于当下情境的意识形态群体语言的利益所在。这里最为明显的是正面的自我呈现与负面的他者呈现之间的一般性两极化，以及文本和谈话的表达和意义通常是如何强调或最小化正面和负面属性的方式。但我们也看到，意识形态话语不单单表达的是两极化态度，比如说，当身份、行动、目标、规范和价值以及群体资源等被利用或讨论时，目的是鼓舞、激发和传播凝聚力和一致统一，以此增强一个群体的社会力量。对稀缺资源的控制的合法化以及有关支配的其他推论形式都是一种在公共领域中运用意识形态控制的独具特色的方式，就所声称的“更高一级的”权力方诸如大自然、上帝、科学、理性或人民等而言尤其如此。

我们也回顾了无论何种典型的话语“意识形态结构”，总是需要将结构纳入当下文本、语境和认知中来分析，也即，**话语结构在孤立状态下不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而是仅仅在它们受控于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共享的隐含的意识形态时才具有这样的功能，而且是在意识形态界定下的文本和语境中，比如作为致力于为内群体谋取利益的实践的一部分。【404】

延伸阅读

现有大量的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献，包括数千本专著，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其中一些已在上文的部分“参考文献注释”中提及。在有关意识形态的诸多专著中，我们特别推荐如下几本，还推荐一些具体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文章（以供下载）。

Billig, M. (1982). *Ide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xtremism, mod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这本书在话语心理学领域是一个代表性研究，作者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造诣突出，广泛撰写了有关意识形态（比如民族主义）的论著，形成了一种分析意识形态“困境”的“修辞学”路径。

Eagleton, T. (1991).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Eds.

这是一本多年来作为意识形态研究介绍的经典。**对于了解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策略极具知识性。**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British press*. London: Routledge.

这是由已故教授、奠基者福勒在 1970 年代末与冈瑟・克雷斯、托尼・特鲁和鲍勃・霍奇等批判语言学者合作的新闻话语意识形态研究的一本经典文集，是批判话语研究之源。这本书依然切中实际的批判性新闻分析。

Fraser, C., & Gaskell, G. (Eds.) (1990).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widespread beliefs*.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本社会心理学中的优秀论文集，探讨各种不同的社会信念，内容事关将意识形态纳入在社会共享的其他再现形式。

van Dijk, T. A. (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England UK: Sage Publications.

仅有的一本对基于群体的社会共享信念而界定的意识形态的多学科研究的专著，特别专注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应用。该书详细阐述了本章所展示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线阅读

发表于《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这份期刊的如下论文可从 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 上获得，并可推荐为有关意识形态详细分析的例子。

Billig, M. (1990). Stacking the cars of ideology: The history of the "Sun Souvenir Royal Album". *Discourse & Society,* 1(1), 17-38.

Bonilla-Silva, E., & Forman, T. A. (2000). "I am not a racist...": mapping White college students' racial ideology in the USA. *Discourse & Society*, 11(1), 50-85.

Chiapello, E., & Fairclough, N. (2002). Understanding the new management ideology: a trans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ew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Discourse & Society*, 13(2), 185-208.

De Goede, M. (1996). Ideology in the US welfare debate: neo-liberal representations of poverty. *Discourse & Society* 7(3), 317-357.

Van Dijk, T. A. (1995).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6(2), 243-289.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Hill, S., & Turner, B. S. (Eds.) (1990). *Dominant ideologies*. London: Unwin Hyman.

Adorno, T. W.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dams, I. (1993). *Political ideology toda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Aebischer, V., Deconchy, J. P., & Lipiansky (1992). *Idéologies et 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 Cousset: Delval.

Afshar, H. (Ed.). (1987). *Women, state, and ideology: studies from Africa and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Agger, B. (1992).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London: Falmer Press.

Althusser, L. (2008). *On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Andrain, C. F., & Apter, D. E. (1995).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change. Analyzing politics*. Washington Square,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Apple, M. W. (1979).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

Apple, M. W., & Weis, L. (Eds.). (1983).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school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y Press.

Aronowitz, S. (1988). *Science as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speren, E. (2005).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ideology*. Utrecht: Pharos.

Bailey, L. (1994).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New York: P. Lang.

Ball, T., & Dagger, R. (1990).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he democratic ideal*.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Ballaster,R. (1991). *Women's worlds. Ideology, femininity and the woman's magazine*. New York: Macmillan Pubs.

Bastow, S., & Martin, J. (2003). *Third way discourse. European ideolog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illig, M. (1982). *Ide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Extremism, mod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lommaert, J. (Ed.). (1999). *Language ideological debates*.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urton, F., & Carlen, P. (1979). *Offical discourse. On*

discourse analysi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rlsnaes, W. (1981).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its usage by Marx, Lenin, and Mannhei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CCC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78). On ideology. London: Hutchinson.

Chares, N., & Hintjens, H. M. (Eds.). (1998). *Gender, ethnic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Dant, T. (1991). *Knowledge, ideology & discours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De Saussure, L., & Schulz, P. (Eds.). (2005). *Manipulation and ideolog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scourse, language, mind*.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 Co.

Diesing, P. (1982). *Science & ideology in the policy sciences*. New York: Aldine Co.

Dirven, R. (Ed.). (2001). *Language and ideology*.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Co.

Eagleton, T. (1991).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Eds.

Festenstein, M., & Kenny, M. (Eds.). (2005). *Political ideologies. A reader and guid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British press*. London: Routledge.

Fox, R., & Fox, J. (2004).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a language-ideology-power perspective*. Westport, Conn.: Praeger.

Fraser, C., & Gaskell, G. (Eds.). (1990).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widespread beliefs*.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eeden, M. (1996).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A conceptual approach*.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ne, M. (Ed.). (1989).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social relations: Literar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arner, R. (1996). *Contemporary movements and ideologies*. New York: McGraw Hill.

Garzone, G., & Sarangi, S. (2008).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pecialized communication*. Bern New York: Peter Lang.

Gee, J. P. (1990). *Social linguistics and literacie. Ideology in discourses*. London England New York: Falmer Press.

Guillaumin, C. (1995). *Racism, sexism, power,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Hodge, R., & Kress, G. R. (1993).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Hobson, D., Lowe, A., & Willis, P.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wang, S. D. (1998). *Bureaucracy vs. democracy in the minds of bureaucrats: To what extent are these ideologies compatable with one another*. New York: P. Lang.

Jones, R. K. (1984). *Ideological groups: Similarities of structure and organisation*.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rookfield, Vt., U. S. A.: Gower.

Jost, J. T., Federico, C.M.,& Napier, J. L.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307-337.

Kinloch, G. C. (1981). *Ide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Laclau, E. (1979).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Verso.

Laraña, E., Johnston, H., & Gusfield, J. R. (Eds.) (1994).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arraín, J. (1979).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London: Hutchinson.

Larsen, I., Strunck, J., Vestergaard, T. (Eds.). (2006). *Mediating ideology in text and image*. Amsterdam: Benjamins.

Lazar, M. M. (Ed.). (2005).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Gender, power, and ideology in discours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each, R. (2002). *Political ideology in Britain*. New York: Palgrave.

Malrieu, J. P. (1999). *Evaluative semantics: Cognition, language,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Mannheim, K.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York: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Morley, D., & Chen, K. H.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umby, D.K. (1988).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Discourse, ideology, and domination*. Norwood, N. J.: Ablex Pub. Corp.

Oberschall, A. (1993). *Social movements. Ideologie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arekh, B. C. (1982).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êcheux, M. (1982). *Languag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ütz, M., Neff-van Aertselaer, J. and van Dijk, T. A. (Eds.). (2004). *Communicating ideologie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Frankfurt: Lang.

Reis, C. A. A. (1993). *Towards a semiotics of ide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Reis, E. M. (1993). *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 for students with bilingual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20*(4), 298-301.

Römer, R. (1985). *Sprachwissenschaft and Rassenideolog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W. Finke.

Rosenberg, S. W. (1988). *Reas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i-Landi, F. (1990). *Marxism and ideology*.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udé, G. F. E. (1980). *Ideology and popular prot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Ryan, B. (1992).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Dynamics of change in 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activism*. London: Routledge.

Schäffner, C., & Kelly-Holmes, H. (Eds.). (1996). *Discourse and ideologies*. Clevedon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Seliger, M. (1976).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Simons, H. W., & Billig, M. (Eds.). (1994).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Smith, D. E. (1990).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Mas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utton, F. X. (1990).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 study of radical Marxism*. New York: Garland.

Talshir, G., Humphrey, M., & Freeden, M. (Eds.). (2006). *Taking ideology seriously. 21st century reconfiguration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Thompson, J. B. (1984).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eadgold, T., et al. (Eds.). (1986). *Semiotics, ideology, language*.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Van Dijk, T. A.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Van Dijk, T. A.(1998).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England UK: Sage Publications.

Van Dijk, T. A. (2008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ijk, T. A. (2008b). *Discourse and power*.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Ward, I. (1994). *Literacy, ideology, and dialogue: Towards a dialogic pedag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odak, R. (Ed.). (1989).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Co.

Wodak, R. (Ed.). (1997). *Gender and discourse*.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Wodak, R., de Cillia, R., Reisigl, M., & Liebhart, K. (1999).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uthnow, R.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Zeitlin, I. M. (1994).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Zima, P. V. (1981). *Semiotics and dialectics: Ideology and the text*. Amsterdam: J. Benjamins.

Žižek, S. (Ed.). (1994).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Verso.

索 引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

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A

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加拿大)
阿尔都塞　Althusser
阿姆斯特丹大学　University of Amsterdam(荷兰)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英国)
阿斯特拉德·吉尔伯托　Astrud Gilberto
爱德华·萨丕尔　Edward Sapir
埃尔达·韦茨曼　Elda Weizman
埃莉诺·奥克斯　Elinor Ochs
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安杰尔·埃斯比斯·帕尼亚瓜　Ángel Acebes Paniagua
安娜·德菲纳　Anna De Fina
安尼塔·波梅兰茨　Anita Pomerantz
《安全隐喻》　*Security Metaphors*
盎格鲁-撒克逊学派　Anglo-Saxon departments
奥克斯　Ochs
奥地利科学院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奥地利是“德意志”领土?》　*Ist Österreich ein ‘deutsches’ Land?*
奥地利自由党　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 简称 FPÖ
奥斯汀　Austin
奥威尔　Orwell

B

巴赫金　Bakhtin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the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霸权　hegemony
鲍勃·迪兰　Bob Dylan
鲍尔　Ball
鲍里斯·叶利钦　Boris Yeltsin
保罗·德鲁　Paul Drew
保罗·格赖斯　Paul Grice
保罗·奇尔顿　Paul Chilton
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美国)
北伊利诺伊大学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美国)
背景　setting, background
背景化　backgrounding
本杰明·李·沃尔夫　Benjamin Lee Whorf
《本土之外的意大利语、意大利人》　*Italiano e italiani fuori d'Italia*
本维尼斯特　Benveniste
比佐尼　Bizzoni
表层代码　surface code
表达式　expressives
表现　performance
“表演”观　the notion of “performance”
表征　representation
表征式　representatives
标度　scales
标记　index
标准会话含义　standar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BJ单身日记》　*Bridget Jones's Diary*
《边境线》　*The Border*
贝克　Baker
贝纳姆　Baynham
彼得·格里菲斯　Peter Griffiths
柏拉图　Plato
波纳佩　Pohnpei
波拉克　Pollak
不定式无人称句　impersonal infinitive construction
部分认同　local identities

C

《餐桌上的交谈》 *Dinner Talk*
层级 hierarchies
层级结构 archical structures
查尔斯·古德温 Charles Goodwin
常规间接性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常人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长时记忆 Long-Term Memory
场景 scenario
场域 field
超级结构 superstructures
超资本主义 hypercapitalism
承诺式 commissives
程序性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
诚意条件 sincerity conditions
成员范畴 membership categories
成员范畴化分析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简称为 MCA
池间 Ikema
《重构论证话语》 *Reconstructing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重构组织传播研究中的差异性》 *Reframing Difference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传播理论》 *Communication Theory*
《传播年鉴》 *Communication Yearbook*
《传播专论》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创作者 the author
词类 parts of speech
《词：政治的语言》 *Mots: Les languages du politique*
《从句合并的跨语言研究：连词的多功能性》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M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
《错位、重定位、移民的叙事》 *Dislocations, Relocations, Narratives of Migration*

D

《大都会》 *Cosmopolitan*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缩写 MMORPGs
戴尔·斯彭德 Dale Spender
戴维·梅钦 David Machin
丹尼斯·K. 马姆比 Dennis K. Mumby
德尔德里安 der Derian
德尔·海默斯 Dell Hymes
黛博拉·希费林 Deborah Schiffrin
黛博拉·约翰逊 Deborah Johnson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美国）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美国）
德崔希伯爵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
德国政治语言研究协会 the Germ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anguage in Politics
德怀特·博林格 Dwight Bolinger
德兰蒂 Delanty
德西里亚 de Cillia
笛卡尔 Descartes
定位 positioning，orientation
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英国）
断定式 representatives
对话性 dialogism
多模态 multimodality
《多模态：当代传播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进路》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多模态话语：当代传播模式和媒介》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多模态理论 multimodality theory
多模态信息 multimodal messages
多模态性 multimodality

E

俄克拉荷马大学 University of Oklahoma（美国）
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美国）
厄勒布鲁大学 Örebro University（瑞典）

F

法莱法　Falefâ
发声者　the animator
梵・迪克　van Dijk
梵・利尤温　van Leeuwen
梵・爱默伦　van Eemeren
反本质主义　anti-essentialism
反馈信道　back channel
反身性　reflexivity
范畴化　categorization
范畴性　categoriality
犯罪化　criminalization
费尔　Fehr
费尔克拉夫　Fairclough
非常规间接性　non-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飞天小女警》　*Power Puff Girls*
《非形式逻辑》　*Informal Logic*
分布　distribution
风格　style
风格化　stylization
福格林　Fogelin
符号逻辑　symbolic logic
符号模式　semiotic mode
符号资源　semiotic resource
弗莱施－金凯德等级水平　Flesch-Kincaid Grade Level
弗朗斯・H. 梵・爱默伦　Frans H. van Eemeren
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
服务接触　service encounter
复杂化行动　complicating action
《否定性话语：种族、性别与暴力的调解》　*Discourses of Denial: Mediations of Race, Gender and Violence*

G

盖尔・杰斐逊　Gail Jefferson
概念表征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格标志　case marking
格赖斯　Grice
格赖斯准则　Grice's maxims
格里・布朗斯廷　Gerry Bloustien
格罗　Guerra
格鲁腾多斯特　Grootendorst
格温・斯蒂芬尼　Gwen Stefani
葛兰西　Gramsci
个体认同　individual identities
个体意向　I-intentions
根本条件　essential conditions
根据　ground
戈夫曼　Goffman
宫古岛　Miyako
《功能性变迁：马来选民秩序个案研究》　*Func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Malay Constituent Order*
功能句子观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共同体　community
共文　co-textual
共享意向性　shared intentionality
骨干信息　backbone information
管道隐喻　conduit metaphor
关联理论　relevance theory
观念　ideas
观念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ideas
关涉性　aboutness
关系属性　relationality
诡辩　sophisms
规范　norms
规范性话语　normative discourse
归谬法　reductio ad absurdum
国防部多学科大学研究计划　DoD Multidisciplina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tiative （MURI）
国际传播协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国际论证研究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国际女子大学　International Women's University （德国）
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性别和语言顾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Language Advisory Council
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美国）
国家新闻女性阿富汗　National News Female Afghan

H

哈罗德·加芬克尔　Harold Garfinkel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哈姆林　Hamblin
哈维·萨克斯　Harvey Sacks
海德格尔　Heidegger
韩礼德　Halliday
含蓄意指　connotation
含意　implicatures
汉考克学院　Hancock College
汉阳大学　Hanyang University（韩国）
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赫尔辛基大学　University of Helsinki（芬兰）
合法化功能　legitimizing function
宏观命题　macroproposition
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互动语言学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互动中的情感表露：芬兰语中定冠词的出现》　*Demonstratives in Intera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Definite Article in Finnish*
话轮　turn
话轮转换　turn taking
《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话题性　topicality
华威大学　Warwick University（英国）
话语　discourses
《话语》　*Discourse*
《话语处理手册》　*Handbook of Discourse Processes*
《话语的历史建构：牢记德意志歼灭战》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Remembering the Wehrmacht's War of Annihilation*
《话语分析》　*Analyzing Discourse*
话语－功能路径　discourse-functional approach
《话语和传播》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话语和语境》　*Discourse and Context*
话语立场　footing
话语－历史路径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 DHA
话语过程　discursive processes
话语实践　discourse practices
话语形构　discourse formation
《话语研究》　*Discourse Studies*
《话语与社会》　*Discourse and Society*
《话语与社会变迁》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话语与身份认同》　*Discourse and Identity*
《话语与实践：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工具》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语义学　discourse semantics
话语语用学　discourse pragmatics
《话语中的论证指标》　*Argumentative Indicators in Discourse*
缓和语　mitigation
《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换置法　obversion
回避语域　avoidance registers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会话含意理论　theory of conversation implicature
《会话讲义》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会话中的应答：芬兰语中的应答词研究》　*Responding in Conversation: A Study of Response Particles in Finnish*
霍珀　Hopper
霍尔　Hall
霍尔默·纳迪桑　Holmer Nadesan
霍华德·霍克斯　Howard Hawks
或然性　probability

J

机构性对话　institutional dialogue
机构性互动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极简派艺术　minimalist art
《极简指称：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中代词的使用》　*Minimal Reference: The Use of Pronouns in Finnish and Estonian*
吉米・斯图尔特　Jimmy Stewart
《纪念年的纪念》　*Gedenken im Gedankenjahr*
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ies
基思・米利斯　Keith Millis
计算机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及物性参数　transitivity parameters
鸡仔文学　chick lit
加利　Gallie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美国）
假言推理　modus ponens
架构　schemata
价值　values
简・马尔德里格　Jane Mulderrig
建构－整合模式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江湖侠侣》　*To Have and Have Not*
降级语　downgrader
脚本　script
焦点管理　focus management
焦点组织　focus organization
交际动态性　communicative dynamism
交流的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交流事件　communicative events
《教父》　*The Godfather*
《教育心理学杂志》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结构建构模式　structure building model
结构数据　constructed data
《解决冲突季刊》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
借词　loan words
金明熙　Myung-Hee Kim
经验性隐喻　experiential metaphor
局部结构　local structures
局部谈话　local talk
局部倾向　local orientation
局部语境　local context
局部语境化　local occasioning
句法　syntax
《绝妙自缢》　*A Good Hanging*
角色榜样　role model

K

卡尔德拉　Caldera
卡伦・阿什克拉夫特　Karen Ashcraft
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美国）
卡梅伦　Cameron
卡普斯　Capps
凯瑟琳・洛夫林　Kathryn Lovering
凯瑟琳・斯诺　Catherine Snow
康德　Kantian
康考迪亚大学　Concordia University（加拿大）
康诺利　Connolly
科勒　Koller
科斯廷・赫塞尔格伦教席教授　the Kerstin Hesselgren Chair
可捕捉性　capturability
可供性　affordance
可能性　likelihood
可能性情态　probability modalities
可视化句法文本格式化　visual syntactic text formatting
可索引性　indexicality
克劳德・列文－斯特劳斯　Cloude Lévi-Strauss
克雷斯　Kress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克里斯蒂娜・沙夫纳　Christina Schäffner
克里斯琴・希思　Christian Heath
克兹扎诺斯基　Krzyżanowski
柯蒂斯・勒巴伦　Curtis LeBaron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美国）

客体　theme
《口红丛林》　*Lipstick Jungle*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Kurt Waldheim
框架　frame

L

《拉丁美洲的种族主义与话语》　*Racism and Discourse in Latin America*
拉克夫　Lakoff
拉洪克拉　La Junquera
拉里莎·桑迪　Larissa Sandy
拉乌加　*lâuga*
莱比锡大学　Leipzig University（德国）
来源　provenance
赖西格　Reisigl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英国）
蓝图隐喻　blueprint metaphor
劳伦·巴考尔　Lauren Bacall
劳特利奇出版社　Routledge
《劳特利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全球妇女问题和知识》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Women: Global Women's Issues and Knowledge*
雷·伯迪慧斯特尔　Ray Birdiwhistell
雷·查尔斯　Ray Charles
礼貌模式　model of politeness
《礼貌研究杂志：语言，行为，文化》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
历史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里特瓦·劳里　Ritva Laury
莉莉·乔利亚拉基　Lilie Chouliaraki
利益　interest
利兹·凯利　Liz Kelly
聊天化　conversationalization
领悟　uptake
类型学派　typological school
连贯　coherence
连续体　continua
类型　genre
零形回指　zero anaphora
林雪平大学　Linköping University（瑞典）
聋人文化　Deaf culture
卢加诺大学　University of Lugano（瑞士）
卢克斯　Lukes
鲁思·沃达克　Ruth Wodak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罗素·S. 汤姆林　Russell S. Tomlin
论辩　dialectic
论辩化　dialectification
论式　topoi
论元　argument
论元结构　argument structure
论证　argumentation
《论证》　*Argumentation*
《论证的使用》　*The Use of Argument*
《论证话语的策略性掌控》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论证理论　argumentation theory
《论证理论原理》　*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论证、交流与谬误》　*Argumen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Fallacies*
论证结构　argumentation struction
论旨角色　thematic roles
《论证讨论中的言语行为》　*Speech Acts in Argumentative Discussions*
《论证与辩护》　*Argumentation & Advocacy*
《论证系统理论》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M

马尔德里格　Mulderrig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马嘉－丽娜·索杰农　Marja-Leena Sorjonen
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
马龙·白兰度　Marlon Brando
马乔里·古德温　Marjorie Goodwin
马他伊　matai
迈克尔·班伯格　Michael Bamberg

迈克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迈克尔·哈默　Michal Hamo
曼德尔鲍姆　Mandelbaum
曼诺谢克　Manoschek
美国国家传播协会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梅利利亚　Melilla
《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每日邮报》　*the Daily Mail*
媒体公关　spindoctors
蒙特利尔　Montreal
《蒙特利尔公报》　*Montreal Gazette*
密克罗尼西亚　Micronesia
密歇根州立大学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美国)
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M. 拉扎尔　Michelle M. Lazar
面子需求　face wants
缅因大学法明顿分校　University of Maine, Farmington(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美国)
民族阵线　he National Front
命名　denomination
命题内容　propositional content
命题性知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谬误　fallacy
《谬误与合理性判断》　*Fallacies and Judgments of Reasonableness*
魔兽世界　World of Warcraft
莫特纳　Mautner

N

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美国)
能指　signifier
尼娜·西蒙娜　Nina Simone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Nebraska(美国)
内塔尼亚学院　Netanya Academic College(以色列)
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英国)
纽卡索大学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澳大利亚)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the 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美国)
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英国)
诺丁汉大学　Nottingham University(英国)
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女性研究　Women's Studies
女性主义者　feminist

O

奥布莱茨一泰特卡　Olbrechts-Tyteca
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欧洲翻译研究协会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欧洲语言协会　Societas Linguistica Europea

P

帕迪·斯坎内尔　Paddy Scannell
帕特里克·戈登　Patrick Gordon
《排外主义政治》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庞培法布拉大学　Pompeu Fabra University(西班牙)
《泡沫电流》　*Bubble Pop Electric*
佩雷尔曼　Perelman
佩内洛普·布朗　Penelope Brown
《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杂志》　*Journal of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批判性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 CDA
《批判性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批判性话语研究》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皮埃尔·菲亚拉　Pierre Fiala

片段模式 episode model
平民主义 populist
濮明明 Ming-Ming Pu

Q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t Bauman
奇尔顿 Chilton
启发法 heuristics
弃权 disclaimers
前景 foreground
前景化 foregrounding
潜在神经表征 the underlying neural representations
强制 coercion
乔·拜登 Joe Biden
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又译乔治敦大学，美国）
乔治·H. 米德 John H. Mead
契克斯 Chequers
青木裕美 Hiromi Aoki
情节 plot
情景记忆 Episodic Memory
情境模式 situational model
情境认同 situational identities
情态 modality
请求性解释 requestive interpretation
倾向 dispositions
琼斯 Jones
躯体化 somatization
去合法化功能 delegitimizing function
权力 power
《权力分享：密克罗尼西亚波纳佩的语言、性别、阶层和社会空间》 *Power Sharing: Language, Gender, Rank and Social Space in Pohnpei, Micronesia*
《全球媒介话语》 *Global Media Discourse*
缺省推理 default reasoning

R

《人类传播研究》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认同 identity
认同化 identification
认知构念 cognitive constructs
认知情态 epistemic modalities
任意性 arbitrary
《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S

萨拉·帕林 Sarah Palin
萨莉·杰克逊 Sally Jackson
萨摩亚 Samoa
萨帕特罗 Zapatero
萨皮尔 Sapir
萨托利 Sartori
《色彩语言》 *The Language of Colour*
瑟尔 Searle
商品化赋权 commodified empowerment
《少女时代，超越极限》 *Girlhood, Redefining the Limits*
社会范畴 social categories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社会符号学导论》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onism
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s
《社会科学中的质性话语分析》 *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
社会联网 social networking
社会情境 social situations
社会认同 social identities
社会性别 gender
《社会性别再探》 *Reworking Gender*
社会意指 social semiosis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社会与话语》 *Society and Discourse*
《社会与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社会语言学杂志》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社会中的语言》 *Language in Society*

社会主义者 socialists
社民党 social democrats
设计 design
深层表征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s
生产 production
圣杰罗姆 St. Jerome
圣米格尔教堂 San Miguel Mission
《生活叙事》 *Living Narrative*
省略三段论 enthymeme
失配 misalignment
施事 agency
施事者 agent
《诗学》 *Poetics*
史蒂芬·莱文森 Stephen Levinson
史蒂夫·梅 Steve May
事件模式 event models
视角化 perspectivization
《视觉传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适切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s
世俗知识 lay-knowledge
授权集中 empowerment focus
受事 patient
受事性 affectedness
述行作用 performative function
述行语 performatives
述谓 predication
述谓表达 predicating expression
述谓策略 Predicational Strategies
斯科特·雅各布斯 Scott Jacobs
斯梅西克保守党 Smethwick Tories
《斯梅西克电讯》 *Smethwick Telephone*
私人认同 personal identities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美国）
所是 being
所有 has
所指 signified
所做 does, doing
苏珊·赫林 Susan Herring
苏珊娜·卡明 Susanna Cumming

T

塔利亚·哈比卜 Talia Habib
塔玛拉·迪本尼德托 Tamra DiBenedetto
态度 attitudes
《泰晤士报》 *The Times*
《太阳报》 *The Sun*
汤普森 Thompson
特瓦 Tewa
梯级含意 scalar implicatures
廷德尔 Tindale
《童年的世纪》 *Centuries of Childhood*
统治的语法 grammar of governance
图恩·梵·迪克 Teun A. van Dijk
图尔敏 Toulmin
图式 schema
《兔子，跑吧》 *Rabbit, Run*
推理许可 inference licence
托尔·汉姆莱茨 Tower Hamlets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W

瓦尔德海姆事件 Waldheim Affair
歪曲 misrepresentation
完成体 perfective aspect
《豌豆公主》 *The Princess and the Pea*
晚期现代性 late modernity
威廉·冯·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威廉·赫森 William Husson
威廉·拉博夫 William Labov
维多利亚·德弗朗西斯科 Victoria DeFrancisco
维伟恩·伯尔 Vivien Burr
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 of Vienna（奥地利）
《卫报》 *The Guardian*
《文本》 *Text*
文本化 entextualization
文本基础 textbase
文体学 stylistics
谓项 predicate
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
沃尔特·卡普斯 Walter Capps

沃达克　Wodak
沃洛夫　Wolof
沃洛希洛夫　Volosinov
我们意向　we-intention
乌普萨拉大学　Uppsala University（瑞典）

X

西奥·梵·利尤温　Theo van Leeuwen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Partido Socialists Obrero Español，简称 PSOE
西班牙人民党　Partido Popular，简称 PP
西班牙议会　Cámara de Diputados
希伯来大学　Hebrew University（以色列）
希尔　Heer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西塞罗　Cicero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澳大利亚）
《吸血鬼猎人巴菲》　*Vampire Slayer*
细致度　granularity
《下笔之前：文字素养之路再思》　*Before Writing: Rethinking the Paths to Literacy*
夏皮罗　Shapiro
衔接　cohesion
象似性原则　iconicity principle
象征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肖沙纳·布卢姆－库尔卡　Shoshana Blum-Kulka
小野毅　Tsuyoshi Ono
谢菲尔德大学　Sheffield University（英国）
谢格洛夫　Schegloff
谢丽斯·克拉马雷　Cheris Kramarae
谢娜·基西莱维兹　Sherna Kissilevitz
心理表征　mental representations
心理模式　mental models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　Sinnott-Armstrong
信息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Sunday Times*
《新工党、新语言？》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新媒体时代的文字素养》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新生儿》　*New Baby*
新斯科舍省　Nova Scotia
《新闻分析：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路径》　*Analysing Journalism: An Approach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新修辞学》　*La Nouvelle Rhétorique*，英文名 The New Rhetoric
心智图景　mental landscape
行动　action
《行动中的政治话语："政治如常"》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
信念　beliefs
信念体系　belief systems
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形式总存　formal repertoires
形态句法学　morphosyntax
形态属性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性别歧视　sexist
《熊的故事》　*The Bear*
修辞结构理论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修辞性谓词　rhetorical pridicates
休达　Ceuta
修复机制　repair mechanism
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序列　sequence
序列性　sequentiality
序列组织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叙事　narrative
《叙事和话语中的自我和身份认同》　*Selves and Identities in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叙事探究》　*Narrative Inquiry*
《叙事中的身份认同：移民话语研究》　*Identity in Narrative: A Study of Immigrant Discourse*
宣告式　declarations

Y

雅各布斯　Jacobs
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亚历山德罗·杜兰蒂　Alessandro Duranti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亚斯敏·吉瓦尼　Yasmin Jiwani
亚瑟·格雷泽　Arthur Graesser
言内行为　locutionary act
言说民族志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言外行为　illocutionary act
言外之意　implications
言语　parole
言语事件　speech event
言语行为　speech acts
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言语、音乐、声音》　*Speech, Music, Sound*
《言语杂志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邀请式修辞　invitational rhetoric
伊安·兰金　Ian Rankin
伊丽莎白·凯兰　Elisabeth Kelan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美国）
伊曼纽尔·A. 谢格洛夫　Emanuel A. Schegloff
《移民、认同与归属感》　*Migration, Identity and Belonging*
伊莎贝拉·耶斯库—费尔克拉夫　Isabela Ieţcu-Fairclough
一词多义　equivocation
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意义理论　theory of meaning
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理论家　the ideologues
意识形态方阵　the ideological square
意愿性　volitionality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意指过程　semiosis
已知性　giveness
隐喻理论　metaphor theory
英国国家党　the British National Party
《影像解读：视觉设计语法》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有界性　telicity
有理据的　motivated
有色研究者和学者权益组织　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of Colour for Equity，简称 RACE
有意的交流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预备条件　preparatory conditions
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与成年人交谈》　*Talking to Adults*
语步　moves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语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语境模式　context models
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预设　presuppositions
《欲望都市》　*Sex and the City*
语序　constituent order
语言　language
《语言》　*Glossa*
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语言与权力》　*Language and Power*
《语言与全球化》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语言与社会互动研究》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语言与新闻》　*Language and Journalism*
《语言与政治》　*Language and Politics*
《语言与政治学刊》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语言人类学杂志》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语言、政治与社会》　*Sprache-Politik-Gesellschaft*
语义　semantics
语义论元　semantic argument
语用交际　pragmatic communication
语用论辩　pragma-dialectic
语用论辩理论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
《语用学》　*Pramatics*
《语用学杂志》　*Journal of Pragmatics*
语域　register
元交际批评　meta-communicative criticism
元评价　metacommentaries
元评论　meta-comments

元语用评论　metapragmatic comments
元政治话语　metapolitical discourse
原始化　primitivization
原始叙事　source narratives
原型　prototypes
原型结构　prototype structure
约翰·奥斯汀　John Austin
约翰·本杰明　John Benjamins
约翰·冈珀兹　John Gumperz
约翰·赫尔德　Johann Herder
约翰·E. 里查德森　John E. Richardson
约翰·梅杰　John major
约翰·瑟尔　John Searle
约翰·斯特克利　John Steckley
约克大学　University of York（英国）
《阅读图像》　*Reading Images*

Z

再现　representation
责任主体　the principal
扎里夫斯基　Zarefsky
策略调动　strategic manoeuvring
珍妮弗·J. 米斯　Jennifer J. Mease
珍妮特·霍姆斯　Janet Holmes
詹姆斯·吉布森　James Gibson
真嗣由佳　Yuka Matsugu
整体结构　global structures
整体认同　global identities
整体主位　global theme
正当理由　warrant
政治词汇测量　political lexicometry
《政治话语分析》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
政治文本和词汇测定实验室　Laboratoire Lexicométrie et textes politiques
《政治学的话语路径》　*Discourse Approaches to Politics*
支持　backing
知识　knowledge
知识整合　knowledge integration
直言三段论　categorical syllogisms
指称策略　Referential Strategies
指称管理　referential management
指称组织　referential organization
指令式　directives
指示词　demonstratives
指示现象　deictic phenomena
《致奥尔加的信》　*Letters to Olga*
《制造恐慌》　*Constructing Panic*
中断　breakdown
种族认同　racial identities
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
主题　mythos
主题化　topicalization
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性　subjectivity
主语　subject
主位管理　thematic management
主位性　thematicity
主位组织　thematic organization
准则　maxim
自我封闭论证　self-sealing argument
自治论　autonomist
《组织传播理论和研究探索》　*Engag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组织话语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组织话语手册》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组织中的传播与权力》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佐哈尔·坎普弗　Zohar Kampf
左偏置　left-dislocation

作者简介

埃莉诺 · 奥克斯（Elinor Ochs），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和应用语言学特聘教授，在马达加斯加、萨摩亚和美国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并因此和别人一起成为语言社会化领域的开拓者，他分析了新手是如何借助和参与被社会文化组织化了的传播实践，来完成学徒过程的。他也分析了家庭协同叙事是如何让儿童参与解决有关生活体验的问题，又会如何促进或阻碍那些典型的、神经发育受损儿童的发展。代表著作有：L. 卡普斯和E. 奥克斯（1995）的《制造恐慌》（*Constructing Panic*）、E. 奥克斯和L. 卡普斯（2001）的《生活叙事》（*Living Narrative*）、E. 奥克斯（2006）的《语言与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Linguaggio e Cultura: Lo Sviluppo delle Competenze Communicative*）。荣誉头衔有：麦克阿瑟研究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研究员、古根海姆学者、路易斯 · 亨利 · 摩尔根杰出教师、荣誉博士（瑞典林雪平大学）。
电子邮件：eochs@anthro.ucla.edu

安娜 · 德菲纳（Anna De Fina），乔治城大学意大利语系意大利语和语言学副教授。她的学术兴趣和著作主要聚焦于话语与移民、语言转换、身份认同以及叙事，其著作有《叙事中的身份认同：移民话语研究》（*Identity in Narrative: A Study of Immigrant Discourse*，2003，John Benjamins 出版社）、《本土之外的意大利语、意大利人》（*Italiano e italiani fuori d' Italia*，2003，Guerra 出版社，与 F. 比佐尼合编）、《错位、重定位、移民的叙事》（*Dislocations, Relocations, Narratives of Migration*，2005，St. Jerome 出版社，与M. 贝纳姆合著）、《话语与身份认同》（*Discourse and Identity*，2006，Cambridge University 出版社，与黛博拉 · 希费林、迈克尔 · 班伯格合著）、《叙事和话语中的自我和身份认同》（*Selves and Identities in Narrative and Discourse*，2007，John Benjamins 出版社，与迈克尔 · 班伯格、黛博拉 · 希费林合著）。
电子邮件：definaa@georgetown.edu

安尼塔 · 波梅兰茨（Anita Pomerantz），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传播系奥利尼荣誉教授。借助有关交往的音频和视频录像带，她分析人们在表达赞同与否决、信息搜索以及对应该受到谴责或值得表扬的行为的责任协商中所使用的优先原则和惯例。她研究病人与看护者的角色问题、病人实施日常事务的方法以及流动诊所值班医生的工作。她曾担任美国国家传播协会、国际传播协会语言和社会交往部主任，目前，则担任一系列语言类杂志的编委。
电子邮件：apom@albany.edu

保罗 · 德鲁（Paul Drew），约克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同时也担任新成立的语言和传播高级研究中心主任。他对普通社会交往，以及机构交往，特别是司法和医疗环境下的机构交往中的一些基础实践和过程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其当前研究主要关注谈话（比如请求、提议、抱怨）中社会行为的建构，这也表明了对“言语行为”的重新认识以及言语行为是如何在交往中进行的。同时，他最近也为（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门的就业服务中心就职业顾问与权益主张者（失业人员）间的会谈做了一些应用性研究。
电子邮件：wpd1@york.ac.uk

保罗 · 奇尔顿（Paul Chilton），从事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认知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家，本科和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供职于诺丁汉大学、华威大学、阿斯顿大学以及东英吉利大学，目前是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和英国语言系语言学教授。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出版和发表了有关隐喻和空间概念化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并且创建了基于几何原理的话语模型。在话语分析方面，他对政治话语的研究涉猎颇广，对批评性话语分

析（CDA）的方法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同时，他也是利弗休姆（Leverhulme）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的新兴话语”的主要协调人。其著作《安全隐喻》（*Security Metaphors*）运用了认知语言学的路径对国际话语的隐喻进行了研究，而《政治话语分析》（*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则综合运用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方面的多种方法。在此之前，他曾对当代法国早期的天主教诗歌进行过文化和政治情境方面的研究。
电子邮件：p.chilton@lancaster.ac.uk

B. J. 费尔（B. J. Fehr），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传播系访问助理教授，她从民俗学方法论和话语分析的视角，对人类日常交往的社会组织展开研究。电子邮件：bfehr@albany.edu

丹尼斯 · K. 马姆比（Dennis K. Mumby）（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博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研究系教授、主任。他主要研究工作环境中话语、权力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出版书籍数本：《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Ablex 出版社，1988）、《社会性别再探》（*Reworking Gender*，Sage 出版社，2004，与卡伦 · 阿什克拉夫特合著）、《组织传播理论和研究探索》（*Engaging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Sage 出版社，2005，与史蒂夫 · 梅合著）、《重构组织传播研究中的差异性》（*Reframing Difference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Sage 出版社，2010）。他曾担任国际传播协会组织传播部部长。
电子邮件：mumby@email.unc.edu

弗朗斯 · H. 梵 · 爱默伦（Frans H. van Eemeren），阿姆斯特丹大学论证理论教授，国际论证研究协会会长，《论证》（*Argumentation*）杂志以及有关论证图书馆和不同情境下的论证系列图书的编辑。他是美国国家传播协会杰出学者，同时也是瑞士卢加诺大学名誉博士。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论证讨论中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 in Argumentative Discussions*）、《论证、交流与谬误》（*Argumen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Fallacies*）、《重构论证话语》（*Reconstructing Argumentative Discourse*）、《论证理论原理》（*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论证系统理论》（*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话语中的论证指标》（*Argumentative Indicators in Discourse*）、《谬误与合理性判断》（*Fallacies and Judgments of Reasonableness*）、《论证话语的策略性掌控》（*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电子邮件：F.H.vanEemeren@uva.nl

冈瑟 · 克雷斯（Gunther Kress），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符号学和教育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在于意义建构和当代社会的传播，同时也试图建构多模态传播的一套社会符号学理论。其（最近）出版的书籍包括：《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1988，与 R. 霍奇合著）、《下笔之前：文字素养之路再思》（*Before Writing: Rethinking the Paths to Literacy*，1996）、《影像解读：视觉设计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Graphic Design*，1996/2006，与西奥 · 梵 · 利尤温合著）、《多模态话语：当代传播模式和媒介》（*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2002，与西奥 · 梵 · 利尤温合著）、《新媒体时代的文字素养》（*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2003）、《多模态：当代传播研究的社会符号学进路》（*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2010）。
电子邮件：G.Kress@ioe.ac.uk

基思 · 米利斯（Keith Millis），北伊利诺伊大学心理系教授，1989 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他在话语理解和推理生成方面发表论文数篇，并撰写了一些书籍的章节。他是 Operation ARIES! 游戏的工程开发负责人。该游戏被设计用来向人们传授有关科学探索方面的知识。
电子邮件：kmillis@niu.edu

简 · 马尔德里格(Jane Mulderrig)(兰卡斯特大学博士),谢菲尔德大学应用语言学讲师,《语言》(*Glossa*)、《话语》(*Discourse*)和《批判性教育政策研究杂志》(*Journal of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的编委会成员。她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用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研究各种话语情境下的身份认同、权力和个性等问题,其著作应用该方法研究了新工党"自旋"、英国教育政策中的知识经济话语等问题,最近又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一种语言学的路径,用于分析当代治理中的"软实力"问题。她在残疾人和性别政策、平等和人类权利领域也发表过相应论著。目前,她主要研究老年人的公共话语问题。要进一步了解她的其他研究动向,或者下载其著作,请访问:http://sheffield.academia.edu/JaneMulderrig; http://www.shef.ac.uk/english/staff/mulderrig.html。
电子邮件:j.mulderrig@sheffield.ac.uk

金明熙(Myung-Hee Kim),韩国汉阳大学安山(ERICA)校区英国语言和文化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话语分析、会话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教学以及语言和文化关系问题。

克里斯蒂娜 · 沙夫纳(Christina Schäffner),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翻译研究教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英语语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翻译与政治、政治话语分析、隐喻研究(特别是政治文本和翻译视角下的隐喻)以及翻译教学法,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她曾担任欧洲翻译研究协会(EST,1998—2004)秘书长。
电子邮件:c.schaeffner@aston.ac.uk

里特瓦 · 劳里(Ritva Laury),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教授,1995年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从语言应用模式中关注语法的反映。她是《互动中的情感表露:芬兰语中定冠词的出现》(*Demonstratives in Intera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Definite Article in Finnish*,Benjamins出版社,1997)一书的作者,也是《极简指称: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中代词的使用》(*Minimal Reference: The Use of Pronouns in Finnish and Estonian*,*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出版社,2005)以及《从句合并的跨语言研究:连词的多功能性》(*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Clause Combining: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njunctions*,Benjamins出版社,2008)两本书的编辑。
电子邮件:ritva.laury@helsinki.fi

鲁思 · 沃达克(Ruth Wodak),2004年起被评为兰卡斯特大学话语研究杰出教授,同时也一直为维也纳大学服务,1991年她在维也纳大学被评为应用语言学正教授。她获得过各种荣誉,1996年还被授予为奖励学术精英而设立的维特根斯坦奖。目前,当选为欧洲语言协会会长。最近,又被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话语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和政治/政治语言、偏见和歧视,同时她对语言学田野调查工作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浓厚兴趣。她是一系列语言学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也是《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批判性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和《语言与政治》(*Language and Politics*)的编辑之一,同时也和别人一起编辑出版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话语研究路径(DAPSAC)系列图书。曾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是奥地利科学院通信院士。2008和2009年,她(在厄勒布鲁大学)任瑞典议会科斯廷 · 赫塞尔格伦教席教授。近期出版的图书有:《奥地利是"德意志"领土?》(*Ist Österreich ein 'deutsches' Land?*,与R. 德西里亚合著,2006)、《社会科学中的质性话语分析》(*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与M. 克兹扎诺斯基合著,2008)、《移民、认同与归属感》(*Migration, Identity and Belonging*,与G. 德兰蒂和P. 琼斯合著,2008)《话语的历史建构:牢记德意志歼灭战》(*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Remembering the Wehrmacht's War of Annihilation*,与H. 希尔、W. 曼诺谢克和A. 波拉克合著,2008)、《排外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与M. 克兹扎诺斯基合著,2009)、《纪

念年的纪念》（*Gedenken im Gedankenjahr*，与R. 德西里亚合著，2009）、《行动中的政治话语："政治如常"》（*The Discourse of Politics in Action: 'Politics as Usual'*，2009）。
电子邮件：r.wodak@lancaster.ac.uk，网址：http://www.ling.lancs.ac.uk/profiles/265

罗素 · S. 汤姆林（Russell S. Tomlin），俄勒冈大学语言学教授。他的工作领域与语言和认知有关，强调注意力和记忆力在语言生产中的作用。
电子邮件：tomlin@uoregon.edu

马嘉 - 丽娜 · 索杰农（Marja-Leena Sorjonen），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教授，对交往与语法的相互作用以及语言变异有专门研究，对不同类型的机构交往也有广泛涉猎。她用英文发表的著作有《会话中的应答：芬兰语中的应答词研究》（*Responding in Conversation: A Study of Response Particles in Finnish*），同时在《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以及《语言与社会互动研究》（*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等编著和杂志中撰写了章节或发表过论文。
电子邮件：marja-leena.sorjonen@helsinki.fi

迈克尔 · 哈默（Michal Hamo）（2005年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传播与新闻系博士学位），以色列内塔尼亚学院讲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话语分析、媒介和广播会话分析以及热门电视节目及其文化、社会和机构情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电子邮件：michal.hamo@gmail.com

米歇尔 · M. 拉扎尔（Michelle M. Lazar），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语言和文学系副教授，艺术和社会科学系副主任，同时也是该校性别研究子项目学术会议召集人，研究兴趣包括：批判性话语分析、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媒介和政治话语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她是国际性别和语言顾问委员会当选成员，同时也是劳特利奇话语专著批判研究系列丛书的创刊编辑。
电子邮件：ellmml@nus.edu.sg

诺曼 · 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兰卡斯特大学前社会生活语言教授，现为名誉退休教授。他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面成果丰硕，出版的书籍包括：《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1989）、《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1992）、《后现代性中的话语》（*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1999，与莉莉 · 乔利亚拉基合著）、《新工党、新语言？》（*New Labour, New Language?* 2000）、《话语分析》（*Analyzing Discourse*，2003）、《语言与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2003）、《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第2版，2010）。目前，他和伊莎贝拉 · 耶斯库－费尔克拉夫一起为劳特利奇出版社撰写一本有关政治话语的书籍。
电子邮件：eianlf@exchange.lancs.ac.uk

濮明明（Ming-Ming Pu），缅因大学法明顿分校语言学教授，获得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学位，其研究兴趣包括：认知语言学、话语研究以及中英文结构和功能的比较研究。
电子邮件：mingpu@maine.edu

萨莉 · 杰克逊（Sally Jackson），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传播学教授，目前已离开教职，出任首席新闻发言官和副教务主任，同时负责监管校园计算和通信基础设施。她在论辩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了（美国）国家传播学会、国际论辩研究协会以及其他学术组织的褒奖。

电子邮件：sallyj@illinois.edu

斯科特 · 雅各布（Scott Jacobs）（1982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传播学教授，此前曾任职于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以及亚利桑那大学。他在许多期刊上发表过有关论辩、话语语用学和研究方法的论文，这些期刊包括《论证》（*Argumentation*）、《论证与辩护》（*Argumentation & Advocacy*）、《传播专论》（*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传播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解决冲突季刊》（*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和《言语杂志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他是《重构论证话语》（*Reconstructing Argumentative Discourse*）一书的作者之一，《论证》杂志的合作主编以及《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前主编。最近，他还担任由NCA/AFA主办一年两次的论证夏季峰会主席。
电子邮件：curtisscottjacobs@gmail.com

苏珊娜 · 卡明（Susanna Cumming），语言学家，专门从事话语、语法以及相关问题如句法变换、话语词汇和计算机文本生成的研究。她主要研究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著有关于选民秩序变化的书籍一本（《功能性变迁：马来选民秩序个案研究》，*Func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Malay Constituent Order*，1991），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

图恩 · 梵 · 迪克（Teun A. van Dijk），阿姆斯特丹大学话语研究教授，2004年退休，从1999年开始，成为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客座教授。他早期曾从事文学理论、文本语法、话语语用学和文本处理的心理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种族主义和话语的批判性研究、新闻报道、意识形态和语境，目前则正进行话语和知识方面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他出版颇丰，四处讲学，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一带。他曾是《诗学》（*Poetics*）、《文本》（*Text*）（现为《文本和谈话》（*Text & Talk*））的创刊编辑，现在则担任国际性期刊《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话语和传播》（*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以及网络电子期刊《话语与社会》（*Discurso & Sociedad*，www.dissoc.org）的创刊编辑。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有：《话语和语境》（*Discourse and Context*）、《社会与话语》（*Society and Discourse*，由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分别于2008年、2009年出版），并担任《拉丁美洲的种族主义与话语》（*Racism and Discourse in Latin America*，Lexington图书出版公司，2009）一书的编辑。
电子邮件：vandijk@discourses.org　网址：www.discourses.org

肖沙纳 · 布卢姆-库尔卡（Shoshana Blum-Kulka），希伯来大学传播系、教育学院荣誉退休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媒介话语、政治话语、跨文化语用学以及母语、第二语言和家庭话语的语用学发展。她曾担任《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社会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语言与社会互动研究》（*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和《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的编委，专著有《餐桌上的交谈》（*Dinner Talk*，1997）、《与成年人交谈》（*Talking to Adults*，2002，与凯瑟琳 · 斯诺合著）。其目前研究主要关注母语和第二语言为希伯来语的以色列儿童的语用学发展。
地址：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传播系
电子邮件：mskcusb@mscc.huji.ac.il

西奥 · 梵 · 利尤温（Theo van Leeuwen），悉尼科技大学媒体和传播教授，艺术和社会科学系主任，在社会符号学、批判性话语分析和多模态领域发表大量学术作品，出版的书籍包括：《影像解读：视觉

设计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与冈瑟 · 克雷斯合著）、《言语、音乐、声音》（*Speech, Music, Sound*）、《社会符号学导论》（*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全球媒介话语》（*Global Media Discourse*，与戴维 · 梅钦合著）、《话语与实践：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工具》（*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色彩语言》（*The Language of Colour*）。他是国际传播杂志《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的创刊编辑。
电子邮件：Theo.vanleeuwen@uts.edu.au

小野毅（Tsuyoshi Ono），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副教授，口头话语研究工作室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通过对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广泛发布的会话数据的分析，开展语法结构的研究。他目前正和来自日本和美国的研究者一起，从事两个大型项目研究：日本语日常口语语料库建设和宫古岛池间方言（一种在远离日本本土靠近台湾的岛屿上所使用面临失传的语言）汇编。
电子邮件：tsuyoshi.ono@ualberta.ca

谢丽斯 · 克拉马雷（Cheris Kramarae），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妇女研究项目主任，德国国际女子大学国际院长。研究领域包括性别和新媒体、科技、教育、传播等。她和戴尔 · 斯彭德一起担任《劳特利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全球妇女问题和知识》（第 4 卷）（*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Women: Global Women's Issues and Knowledge*）一书的编辑。
电子邮件：cheris@uoregon.edu

亚历山德罗 · 杜兰蒂（Alessandro Duranti），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他在（西）萨摩亚群岛和美国开展田野调查工作，研究政治话语、言语表演和日常交往（比如问候）。其笔耕内容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施事（agency）、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有关，最近，则关注即兴创作在音乐和言语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曾担任语言人类学学会会长。
电子邮件：aduranti@anthro.ucla.edu

亚瑟 · 格雷泽（Arthur Graesser），美国孟菲斯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计算机科学兼职教授，同时还是智能系统研究所负责人之一。他是《教育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编辑，在杂志、书籍和会议论文集中发表论文 400 多篇，出版专著 2 部，编辑图书 9 本（其中一本为《话语处理手册》（*Handbook of Discourse Processes*）。他设计、开发和测试了有关学习、语言和话语技术方面的前沿软件，如 AutoTutor、Coh-Metrix、HURA Advisor、SEEK Web Tutor、MetaTutor、Operation ARIES、Question Understanding Aid (QUAID)、QUEST 以及 Point&Query。
电子邮件：a-graesser@memphis.edu

亚斯敏 · 吉瓦尼（Yasmin Jiwani），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传播研究系副教授，出版著作有《否定性话语：种族、性别与暴力的调解》（*Discourses of Denial: Mediations of Race, Gender and Violence*）以及一本合作编著选集《少女时代，超越极限》（*Girlhood, Redefining the Limits*）。她同时也是加拿大有色研究者和学者权益组织（Researchers and Academics of Colour for Equity, RACE）的共同发起人，其学术著作可见于各类期刊和文集。她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战争题材、报纸中有关女性受害者的报道以及热门电视节目中非白人女性的形象呈现等这些情境下有关种族、性别和暴力的调解干预。
电子邮件：yasmin.jiwani@gmail.com，个人主页：http://coms.concordia.ca/faculty/jiwani.html

伊丽莎白 · 基廷（Elizabeth Keating），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人类学教授，其研究兴趣包括新传

播技术的社会影响、语言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语言和空间（含计算机游戏空间）、多模态、符号语言以及跨文化工程设计协作。她曾在美国密克罗尼西亚、美国、罗马尼亚、印度、巴西和德国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是《权力分享：密克罗尼西亚波纳佩的语言、性别、阶层和社会空间》（*Power Sharing: Language, Gender, Rank and Social Space in Pohnpei, Micronesia*，Oxford Universty 出版社）一书的作者，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论文，并在各种书籍中撰写了不少章节，曾担任《语言人类学杂志》（*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主编。
电子邮件：ekeating@mail.utexas.edu

约翰 ·E. 里查德森（John E. Richardson），纽卡斯尔大学艺术与文化学院高级讲师，《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and Society*）、《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以及《语言与政治学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编委，《批判性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特刊编辑。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结构化社会不公、英式法西斯、新闻业中的种族主义、批判性话语研究和论辩。他近年来出版的书籍有《语言与新闻》（*Language and Journalism*，2009）、《新闻分析：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路径》（*Analysing Journalism: An Approach fro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2007），目前正在撰写一本针对英国国家党的多媒体话语进行背景化和分析的专著（Bloomsbury Academic 出版社，2012）。

珍妮弗 ·J. 米斯（Jennifer J. Mease）（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她试图通过研究阐明社会偏见是如何融入到组织化进程，而人们又是如何组织起来打破这些进程的。她和多样性问题顾问一起，专注于研究那些受社会正义所激励的组织行动者在为资本化组织工作的时候，是如何制定策略以促进社会变化的。
电子邮件：jmease@tamu.edu

HUAYU YANJIU

DUOXUEKE DAOLUN

本书由来自各领域的世界级学者撰写、编著而成，是每位话语分析和话语研究学习者必不可少的全面指南。

图恩·梵·迪克是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的一名批判性话语分析教授。1980年至2006年间，他一直是阿姆斯特丹大学话语研究方面的首席终身教授。作为话语研究方面的一名世界领军学者以及逾250本/篇著作和论文的作者，他同时主编SAGE出版的《话语与社会》、《话语研究》和《话语和传播》等期刊。

《话语研究》对话语分析领域进行了最广泛、最完整、也是唯一涉及多种学科的介绍。现将众多学科汇集为一卷，这本必不可少的指南：

◎ 从头至尾进行了全面更新，包括当前的辩论和研究文献；

◎ 涵盖了从语法、叙事、论证、认知和语用，到社会、政治以及批判路径的研究；

◎ 增加了有关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这两个全新章节；

◎ 在www.sagepub.co.uk/discoursestudies网站上提供每个章节的免费在线阅读；

◎ 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操作实例、样例分析和延伸阅读推荐等全新特征。

此次更新的颇受人欢迎的第二版，将进一步巩固图恩·梵·迪克已广为流行的《话语研究》在本领域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本书由众多领军学者撰写各章而成其特色，将继续为新一代学生带来有关话语研究这一学科的富有启发性的广泛介绍。

——马尔科姆·库特哈德，阿斯顿大学

这本集子是话语分析开创者之一梵·迪克所有论著中的一大里程碑。梵·迪克成功地主编了一本历久不衰的书，并且书中的一些章节在此领域中享有最为广泛的阅读。总体来说，《话语研究》引导我们全方位、360度地巡游该领域，带来对话语研究各个方面的丰富洞见，并为学习这诸多方面建构了一个词汇表，与此同时这也成了话语分析的话语。此卷书丝毫没有过时，仍旧是每位学生和进阶实践者的必读书目。

——乔恩·布洛马特，蒂尔堡大学


ISBN 978-7-5624-9014-2

定价：78.00元